Jeremy Rifkin

同理心文明

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

[美] 杰里米·里夫金◎著
蒋宗强◎译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Jeremy Rifkin

同理心文明

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

［美］杰里米·里夫金◎著
蒋宗强◎译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中文版序 孔子、生物圈意识和同理心文明

中国的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曾有弟子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道德生活的关键之处在于"恕"。这里所说的"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同理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简单而深刻的箴言描述了同理心。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么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同理心意识的精髓所在。

孟子也是一位备受尊崇的学者。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孔子思想最杰出的"阐释者"之一。孟子也对同理心意识做出过精辟的论述。直到2300多年之后，西方话语体系中才出现了"empathy"这个词语，西方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发育生物学家才开始了解"同理心"这种生理和心理现象。孟子曾经说过：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孔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还被诠释为，同理心意识的培养与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他深刻的见解揭示了同理心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与人类历史的以往时刻相比，孔子的思想在今天显得更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衍或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要解决人类文明目前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人类具有同理心意识。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下，工业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储量持续减少，基于这些能源的工业技术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拍，基于这些能源的工业基础设施也逐渐老化失修。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世界各地的失业率攀升到了危险水平，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负债累累，生活水平下降，接近1/7的人类面临着饥馑之苦。

更为糟糕的是，基于化石燃料的工业活动引发了气候变化对人类造

成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危及人类的生存。气候变化可怕的一面，是它将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水循环机制。地球堪称“水的星球”，经过亿万年的演变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这种特定的生态系统和水循环机制。现在，人们都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气候变暖以后，大气中的含水量增加，会容纳更多水汽，降水量增加。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吸收从地球表面蒸发的水分就会增加7%，也就是说，降雨量就会增加7%，这必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的降雨频率和降雨量。

如今，地球上的异常天气频频出现，比如，冬天降雪量越来越大，春天居然也会爆发大洪水，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久，飓风越来越多。这些现象表明地球的生态系统无法足够快地适应水循环机制的突然改变，结果就是生态系统的不稳定，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遭到侵害。

科学家告诉我们，在过去4.5亿年间，地球上的生命经历了至少5次物种灭绝事件，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6次物种灭绝事件的边缘。在过去5次物种灭绝事件中，地球的温度和化学组成都经历了剧烈变化，导致地球生命出现了灾难性的灭绝。一般来讲，在每次物种灭绝事件之后，生物多样性需要1 000万年才能得以恢复。我们现在正处于第6次物种灭绝事件的边缘，科学界预测将有70%的地球生命走向灭绝，时间可能是2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也可能是22世纪的头几十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前负责人、美国政府首席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预测说，如果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持续下去，那么到22世纪初，全球气温将上升6摄氏度，从而引发大面积生命消亡，我们所熟知的人类文明也将走向终结。

现实越来越清晰：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工业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正威胁着地球生命的生存前景。如今，我们需要一个大胆的、新的经济范式，引领人类社会在后碳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要意识到，新的技术元素的涌现，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深刻的变革。

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到，任何新的、伟大的经济范式都需要三个基本元素：传播媒介、动力来源、运输机制。新的传播媒介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经济活动，新的动力来源使人们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新的运输机制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为经济活动提供运输保障。这三个元素相互作用，使整个经济体系实现高效运作。

在19世纪，印刷术、电报、煤炭、蒸汽机和铁路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电力、电话、广播、电视、石油等，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条件。

现在，我非常看好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前景。目前，中国正在为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将形成一个超级物联网。在物联网时代，每一个设备和仪器都会内置一个传感器，使它们能够互动。物联网用户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资源管理、配置和运输情况。目前，已有140亿个传感器安装在自然资源、道路系统、仓库、车辆、工厂生产线、电网、零售商店、办公室和家庭中，不断地将大数据输送至通信网络、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安装的传感器总量将超过100万亿，这些传感器为智能化、数字化社会奠定了基础。届时，整个人类社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彼此间直接开展合作，一切的能量调配都在这个网上进行，既可以杜绝浪费，也不会给环境制造更大的压力。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时间、环境等成本大大下降。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指日可待，有利于实现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正如我在最新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数字化经济环境下，所有接入超级物联网的企业都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全部大数据，从而制定一些新算法，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能力，大幅降低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降低商品与服务的物流成本，使中国企业在后碳时代的全球大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生产的边际成本甚至会趋近于零，从而使数以百万计的企业能够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互通有无——这是分享型经济模式的体现。

新的“通信——能源——交通矩阵”不仅催生新的经济范式，还将整个地球转变为一个人类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推动人类意识的转变，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孔子关于“仁”（或者说“同理心”）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用同理心意识去认识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同理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人类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交范围，让我们凝聚在一起，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可以说，同理心就是文明，文明就是同理心。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所需的能量来自人体本身。当时，人类还没有驯服动物作为能量来源，也不知道如何利用风能和水能。每个基于

采集和狩猎活动建立的社会都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口头语言，以便协调采集和狩猎活动，并开展社会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类与其他动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直立行走能力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为数不多的区别之一。当时，人类社会的意识属于神话意识，即便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的类似社会。在那个时代，人类的同理心意识仅仅拓展到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和部落成员。研究表明，在这类社会中，可以保持凝聚力的最大社会单元一般不超过500人。只有在这个规模的社会单元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才能保持稳定的联系和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如果一个部落的迁徙范围内突然闯入了其他部落的人，那么他们或许不会被视为人，甚至可能被视为魔鬼。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中东地区出现了农耕文明。之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长江流域也都出现了农耕文明。通信、能源、运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大规模、集中化的运河灌溉系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多余的谷物被储藏了起来，为人类提供了能量来源，畜力也被用于运输。复杂的农业体系需要大量劳动力运用新技术去建立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个时代的能源体制催生了城市生活、粮仓、国道、货币、市场以及长途贸易。中央政府建立了一批官僚机构去管理谷物的生产、储藏和分配。书面文字出现后，新的通信方式应运而生，从而使官僚机构能够对这些四散分布、地处偏远的水利设施开展良好的集中式管理。文字体系和农耕文明促使人类意识由神话意识转向了神学意识，中东地区的犹太教、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种精神探索）等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和思想都是在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

在人类意识从神话意识到神学意识转变的同时，同理心意识也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拓展到了基于宗教忠诚的虚构的家庭。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犹太教徒开始认同其他犹太教徒，认为大家构成了一个虚构的大家庭。佛教也是如此。早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当一个人皈依基督教时，现有的教徒会亲吻他或她的脸颊，将新皈依者视为兄弟姐妹，而在此之前，这类举动仅仅局限于存在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之间。

这些宗教都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文字系统和水利系统合力催生的农耕文明拓展了人类构建社会关系的时空维度，同理心意识在宗教依附关系的基础上向虚构家庭的拓展，为社会关系的扩大创造了可能性。

在19世纪，煤炭的利用推动了印刷术、工厂和铁路运输系统的发展，促使人类意识由神学意识转向思想意识。新的通信、能源和运输模式为贸易活动从本地市场向全国市场的拓展创造了可能性。同时，管理新经济范式的需要也催生了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人类个体开始将自己视为国家的公民，将国家视为一个虚构的大家庭，将其他公民视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叙事，包括重大事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集体纪念活动和国家庆典，其中大部分都具有虚构的成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本国公民超越血缘关系和宗教关系的限制，将同理心意识拓展到所有公民。法国男性和女性开始认为彼此是兄弟姐妹，同理心意识拓展到了所有公民。全国市场和国家政治边界塑造了同理心意识拓展新的时空维度，新的通信、能源和运输模式催生了法国工业社会。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也逐渐将同理心意识拓展到了本国公民。

在20世纪，集中供电系统、电话、广播、电视、石油、汽车运输和大众消费社会标志着人类意识从思想意识进入了心理意识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习惯于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习惯于思考如何治疗内心的创伤，如何在人际互动和日常生活中协调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在我们的曾祖父那一代，以及更早期人类，能反省内心世界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我的祖父母能够从思想意识、神学意识，甚至神话意识的层面去思考，但他们不具有心理意识。

在心理意识时代，人类同理心的拓展突破了政治边界的限制，人类开始在职业、技术能力、文化艺术偏好以及一系列其他属性的基础上产生同理心。通信、能源、运输模式催生了全球化的市场，人们意识中虚构的家庭超越了国家边界，人们开始对具有类似爱好的志同道合者产生同理心。

新的通信、能源、运输模式及其相伴的经济范式并没有消除之前的意识和同理心。当人类同理心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宽之际，之前的同理心作用范围就成了这个大范围的一部分。心理意识、思想意识、神学意识和神话意识仍然存在，并以不同程度的组合共同存在于每个人类个体的心灵之中，以不同比例和程度存在于每一个文化之中。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极少数的社会维持着采集和狩猎活动，这些社会的意识就属于神话意识。一些社会存在神学意识，还有一些社会已经转变到了思想意识，现在可能转变到了心理意识。

人类意识的转变过程并非是机械和线性的，中间也有黑暗和倒退时期。一种先进的意识可能先趋于湮灭，被人遗忘，只是后来才重新被人发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北欧文艺复兴就是重新发现之前意识的例子。

然而，人类意识的演变过程仍然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模式。虽然不同社会的演变进度不一，但整体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同理心也拓展到了越来越大的虚构家庭中，使人类能够在更加复杂、相互依存度更高的通信、能源和运输模式下相互依存。

现在，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融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覆盖了地球上的所有大洲，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人类同理心的拓展突破了血缘关系、宗教关系、意识形态关系和心理关系，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牢固的生物圈。人类同理心作用范围向整个生物圈的拓展为同理心文明奠定了基础。

这个新现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叙事方式。孔子的学说可以作为道德和哲学指南。孔子生活在伟大的“轴心时代”，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分别独立地出现了规范人类行为的黄金律。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也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从整体上看，人类同理心自然地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然而，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的同理心作用范围仍然存在区别。

在《圣经》的《创世记》中，上帝让亚当和夏娃统治其他动物和植物，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处置它们。亚伯拉罕诸教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是地球万物的统治者，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都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是为人类服务的资源。这种观点是以功利主义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界不值得人类给予同理心。

在这一点上，孔子持有不同见解，因为儒家倡导的“仁”包含对宇宙万物的爱。印度的佛教以及其他东方社会的传统宇宙观也持有不同见解。孔子认为人类是一个看不见的整体，或者说宇宙的一部分。他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和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和维持社会的和谐。同理心是我们与纷繁复杂的地球生命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维持地球社会和谐的一种方式。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仁”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还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曾经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通过将同理心的作用范围拓展到整个自然界，孟子实际上承认了我们人类与自然界是同属于一个整体的。孟子用“仁民而爱物”概括了人类与自然界实属一体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讲，人类的福祉与其他地球生命的福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如果人类要增进自己的福祉，就必须增进其他物种的福祉。这就是生物圈意识。

直到20世纪，科学家们才捕捉到了孔子的思想。今天，科学家们正在探讨复杂的生物圈内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生物圈从海洋深处延伸到平流层，高度还不到65千米。在这个狭窄的生态区内，地球化学过程与生物系统相互作用，为地球生命的延续创造适当的条件。地球生物圈复杂的反馈回路就像一个内在的神经系统一样，保障着整个系统的福祉。

这种新的见解更加凸显了孔子思想的先见之明。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是全人类的财富。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年轻人的意识参照标准从地缘政治转移到了生物圈。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孩子们正在学习关于生物圈的知识，了解到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都会给生态系统留下“生态足迹”，影响其他生物的健康，也影响着构成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他们逐渐明白，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一些人的福祉最终取决于其他一些人以及其他物种的福祉。这就体现了孔子所说的“仁”。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这方面，孔子与西方的哲学传统存在视角上的差异。在现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想侧重于“个人权利”，而儒家思想则侧重于个人在赖以生活的更大的社会中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侧重点，根源就在于对自由的本质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我们认为自由是个人自治，强调通过个人财产的积累来获得独立。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受制于人，不依赖他人，是热爱自由的西方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儒家传统中，自由意味着一种丰富完整的生活，人类生活在诸多不同的社区中，要不断优化与这些社区的关系，成为社区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相互依存关系的丰富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自由的标志。自由需要融入集体，而自治则被视为情感疏远和缺乏仁爱的表现。

在西方，我们相信人类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物种，我们的自我发展来自于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因此，要保障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权利。孔

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在一个社会中，同理心作用越显著，人类个体越是受到尊重，只有将同理心拓展到他人，我们每个人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只有尊重和重视他人，我们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和重视，这是人之权利的内在精神。将我们的同理心拓展到全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物种，是建立和谐生物圈的必由之路。

将近2 500年前，孔子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天，中国已经为承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角色奠定了法律和政治基础，正在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统地缘政治转向21世纪新兴的生物圈政治。这种里程碑式的重大政治转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类似措施，恢复人类与生物圈的和谐关系，确保未来人类能够继续存在于地球之上。

《同理心文明》一书对人类历史的演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与孔子关于人类旅程之意义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本书旨在从历史叙事的角度阐述人类同理心的演变。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是这条叙事主线的下一个阶段。新的经济范式包括整个生物圈，为人类改善自己与地球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孔子明智地告诫人们，同理心是道德生活的关键，是衡量人类仁爱之心的标准，它引导着我们的精神追求，帮助我们建立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杰里米·里夫金

引言

本书分析了人类同理心的演变历程及其对人类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深刻影响，并借此对人类文明史做出一个新的解读。

关于人性，生物科学与认知科学领域正在涌现一种全新的解读，并在学术界、商界与政府间引发了争议。脑科学与儿童发展领域的新发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即人类本性是好斗、物质、功利和自私的。最近，我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具有同理心的物种，这种认识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对于人性的新认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探索之旅的大门。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从伟大的神学文明到主导18～19世纪的思想意识，从20世纪的心理学热潮到21世纪日益兴起的拟剧论，本书揭示了人类同理心戏剧性的演变历程。

从同理心的视角审视经济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中一些之前隐藏着，但丰富多彩的新线条。这些线条来自非常宽广的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神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通信理论。这些线条汇集在一起，勾勒出了一幅新的社会“织锦”——“同理心文明”。

人类历史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与熵的矛盾关系。纵观历史，新的能源机制总是与新的通信革命汇集在一起，并催生出更加复杂的社会。那些技术比较发达的文明又汇集了更加多元化的人群，强化了人们的同理心，拓展了人类意识的范畴，但这些日趋复杂的环境需要加大能源利用力度，加速了资源的枯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得益于地球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消耗，人类同理心意识的日益强化才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但这会导致地球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现在，在一个能源消耗严重、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全球性的同理心正在形成，而由此引发的熵的账单也越来越大，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并危及我们的生存。未来，能否解决同理心与熵之间的矛盾是关乎人类能否在地球上生存与繁荣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需要

彻底反思我们的哲学、经济与社会模式。

为此，本书首先分析了同理心与熵的复杂难题以及这一出人意料的动力在决定人类历史演变方向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审视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对人性的新看法，并取得人类是“同理人”的发现。第二部分探讨了各个更为复杂的、高耗能的文明带来的同理心的强化和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旨在为解读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提供一个新的维度。第三部分为读者报告了在当前这个熵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速度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人类在实现全球性同理心方面的情况。最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正在催生“分布式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以及生物圈意识的萌芽。

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转变，将迎来全球经济的高潮，将彻底改变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在“同理心时代”面前，“理性时代”将黯然失色。

人类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及时地形成全球性同理心以避免文明的陨落并拯救地球呢？

第1章 潜藏于人类历史的悖论

1914年12月24日夜，比利时，弗兰德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5个月。广袤的欧洲原野上纵横交错地遍布着临时挖成的战壕。英德两国的数百万士兵就在战壕里过夜。两军战壕最近时相隔约30米，只要一方喊一声，对方就能听到。战场的环境简直如地狱一般。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又湿又冷的空气直往骨缝里钻，浸水的战壕泥泞不堪，老鼠和虫子四处乱爬。由于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粪便的臭味无处不在。这个临时住所污泥遍布，士兵们不得不坐着睡觉，根本没法躺下。两军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横七竖八地躺着阵亡士兵的尸体，而仍然活着的战友们却无法将其收殓安葬，只得任由尸体慢慢地腐烂。

然而，当夜幕降临时，战场上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德军士兵开始在数以千计的小圣诞树上点燃蜡烛。这些圣诞树是前线士兵用来取暖的。之后，德军士兵唱起了圣诞颂歌，第一首是《平安夜》，后来又唱了其他几首。英军士兵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个士兵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盯着敌军的阵地说烛光闪烁的战壕就像一个“闪烁着霓虹灯的舞台”。英军士兵开始欢呼喝彩，一开始只是试探性地欢呼一声，后来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大家齐声高唱圣诞颂歌，回应那群来自德国的敌人，而德军的战壕里也同样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双方的一些士兵开始小心翼翼地爬出战壕，穿过中间的无人区，向对方走了过去。很快，其他士兵也纷纷效仿，共同庆祝圣诞节的来临。随着消息逐渐传开，数以千计的士兵走出了战壕。他们同自己的敌人握手，互送香烟和蛋糕，向对方展示家人的照片，介绍自己来自何处，共同回忆往日美好的圣诞时光。荒谬的战争成为他们的笑柄。

第二天早上，当圣诞节的朝阳在欧洲战场冉冉升起，数万名士兵（有些人估计多达10万）停火罢战，坐在一起平静地聊天。短短24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兵戎相见，现在却帮着对方收敛安葬阵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还临时组织了几场足球比赛，连前线的军官们也参加了。当消息传到后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他们对此不以为然。这些高级指挥官们担心这会影响士气，便迅速下令禁止士兵参与此类联欢活动。

就这样，这次梦幻般的“圣诞停战”戛然而止，与开始一般突然。总体来讲，到1918年11月结束之际，这场世界大战夺走了850万名军人的生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在无尽的黑夜里，这次停战宛如一束微弱的亮光。在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数万名士兵不仅打破了军规，还超越了对各自国家的忠诚，在握手言欢中展现了共同的人性。他们虽被纠集在了一起相互残杀，却勇敢地挣脱了军队制度的束缚，向对方表达了同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在战场上，士兵本应该崇尚英雄主义，超越个人生活，为了崇高的事业而战斗和献身，但英德士兵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勇气。他们相互诉说内心的苦痛，并在艰难的处境中相互慰藉。他们穿过无人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相互慰藉的勇气来自于内心深处无言的脆弱感，和同对方缔结友谊的愿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时刻，但在当时却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过失、背叛与堕落。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定义这个世界时，会一次又一次无限怀旧地纪念这一段历史的小插曲。

在将近1 700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一直教导我们将人类视为堕落世界里的罪人。如果我们想赎罪，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来世。近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以讽刺的口吻说：“人类生命是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暂的。”如何破除人类生命的噩梦呢？霍布斯的唯一答案就是呼吁政府部门采取强硬手腕，阻止人类在战争中自相残杀。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对霍布斯的这种悲观的人性观进行了调整，涌现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新论述。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了“白板论”，指出人类出生时心灵像白板一样，未受外界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只是通过社会经验的塑造，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因此，经验是观念的来源。较之于霍布斯的人性论，洛克提出的“白板论”可谓是一种妥协，表明人类生命开始之际就存在一种贪婪的倾向。他认为，人类是一个贪婪的物种，用双手和工具将大自然的资源据为己有，改造着地球上大量的荒地，提高了它的生产力。洛克还宣布，生产力是人类的终极使命，也是人类存在于地球上的原因。他在《政府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把完全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作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是零……如果任何人考虑一

下一英亩[1]种植烟草或甘蔗、播种小麦或大麦的土地同一英亩公有的、未加任何垦殖的土地之间的差别，他就会知道劳动的改进作用造成了价值的绝大部分。”

洛克在《批判性评价》一书中还认为，“否定自然是通向幸福之路。”

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完善了人类幸福的定义，指出人类的普遍境况可以归结为对痛苦的规避和对快乐的最大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犹太裔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性的角度对边沁的功利主义人性观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唯乐原则”。根据弗洛伊德的推理，每一个新生儿都倾向于寻求快感——性方面的快感。母亲的乳房不只是营养之源，还是性满足之源，能够让婴儿贪得无厌的性欲得到满足。

然而，1914年平安夜，数万名年轻人在比利时弗兰德斯战场上上演的温馨一幕与原罪或生产劳动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士兵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快乐与19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所谓的肤浅的快乐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与弗洛伊德病态的人性观所说的性冲动更是没有什么相似性。

弗兰德斯原野上的士兵们表达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来源于人类心灵的深处，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和同时期一切正统思想的藩篱。如果你不理解这种情感，那么只需问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些士兵的做法感到欢欣鼓舞。在无情的战争面前，他们选择了人性。他们表现出来的人类核心品质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和人类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生活在远古时代的灵长类动物以及更早的哺乳类动物。然而，直到近年来，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才开始发现所有哺乳类动物都会表现出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同理心，并声称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的大脑具有更为发达的新大脑皮层，所以尤其具有同理心。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以成熟的方式表达同理心。长期以来，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们就发现，即便是刚刚出生一两天的婴儿，也能识别出其他新生儿的哭声并跟着哭起来，这就是由同理心引起的痛苦，是同理心最基础的表现形式。新生儿之所以会表达同理心，是因为人类的生物学机理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但真正的同理心意识

只有在一岁半到两岁半之间才开始形成，婴儿正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换句话讲，婴儿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明白在自己之外还存在不同的人，并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境况，进而做出适当的反应以示慰藉，似乎这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在研究中，当两岁大的儿童看到其他儿童的不幸遭遇时，往往会产生不适感，并跑过去与其分享自己的玩具，或拥抱对方，或者将其领到自己的妈妈身边寻求帮助。对于一个人类个体而言，其同理心意识在儿童期、青春期和成人期的形成、拓展及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在其早期发育阶段的抚养教育方式，心理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依恋性”。此外，还取决于个体所处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该个体同其他个体的交流互动。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隐秘脉络

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是由五彩缤纷的文化叙事组合而成的，而这些文化叙事都具有一个相似相通的人类品质，将每个个体的行为黏合在了一起。这种品质就是同理心。但近年来却涌现出一股质疑同理心的思潮，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很有可能会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然而，证据表明，人类历程中可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历史学家把同理心视为人类历史演变的动力。总体来讲，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社会冲突和战争、伟大的英雄和邪恶的违法者、技术的进步和权力的行使以及经济的不公和对社会不满的纠正。当历史学家在描述哲学问题时，通常只是论述哲学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少听到有人会论述人类经历的另一面，即深刻的社会属性、人类情感的演变与拓展及其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曾经说过：“幸福在历史中都是空白页，因为它们都是和谐的片段。”幸福的人一般生活在一个由密切的家庭关系和宽广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微观世界”中。

然而，历史往往是由那些不满现状、心怀愤恨和思想叛逆的人创造的。这些人喜欢行使权力来剥削他人，纠正错误并恢复正义。在这一点上，人类所写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关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病态现象。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思考人性时总会得出凄凉黯淡的结论。在人类集体记忆中，历史总是充斥着危机和灾难，充斥着令人痛苦的社会不公，充斥着人类自相残杀的可怕暴行。但如果这些是人类历程的决定元素，恐怕我们人类在很久之前就已灭绝。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用如此可怕的方式来思考生命呢？”答案就是：罪恶和悲哀的故事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们出乎意料，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兴趣，而且，它们是新奇而非惯常的，有新闻价值，因此被选为了历史的素材。

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和压力，充满了不公平和不道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许许多多的善良和慷慨之举。人与人之间的慰藉和同情催生了友好关系，建立了社会联系，为人类生活注入了乐趣。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闪烁着同理心的光芒，因为同理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核心品质。同理心是我们构建社会生活和推进文明的手段。简而言之，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给予同理心应有的认真关注，但同理心的演变却是潜藏在人类历史背后的一条典型的脉络。

同理心没有得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真对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演变历程十分曲折。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同理心有时会蓬勃发展，之后却是长期的消退。它的演变历程具有不规则性，但其演变轨迹却非常清晰明确。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同理心的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总是密切关联的，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对能源的消耗日益加剧。（我们将在本书中详细分析同理心演变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

因为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同理心意识的发展完全交织在一起，所以，“同理心”一词直到1909年才进入了人类的词典。也就在这时，现代心理学开始探索人类意识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讲，只有当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开始思考自己与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的本质，进而逐步意识到同理心的存在并讨论和探究其多层意义。

要知道，即便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也没有形成同理心意识。我的祖父母也不懂得如何深入思考他们的情感和思维，不懂得他们过去的情感经历和人际关系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和自我意识的影响，不懂得情感转移和情感投射等无意识行为驱动的概念。如今，心理学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即便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同理心的存在，对如何观察、

思考和分析自身及他人内心的情感、情绪和思想十分了解。

同理心的前身是同情心。“同情心”一词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得到普及的。出生于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写了一本关于道德情操的著作。虽然他的市场理论更加为人熟知，但他在研究人类情感问题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在斯密、休谟等哲学家和文学家看来，同情意味着对他人的困境感到哀伤。同理心与同情心在情感上具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文中的“同理心”（empathy）一词起源于德文Einfühlung，由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菲舍尔于1872年所创造，最初用于美学领域。笼统地说，同理心就是人在观察和了解一个客体（可以是人或艺术品等）时，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投射到这个客体之中，并为这个客体所感染，理解和欣赏其美感，使人感到和对象交融合一的现象。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廉·狄尔泰借用了这个美学术语，用来描述一个人进入他人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人情感和思想的心理过程。

美国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铁钦纳在1909年首次将德语词汇Einfühlung翻译成了一个新的英语词汇，即empathy。铁钦纳曾在欧洲师从被誉为“现代心理学之父”的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如同许多年轻的心理学家一样，铁钦纳的学术旨趣也主要集中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关键概念——“内省”上。所谓内省，指的是一个人经常反思内心的感受、欲望、情绪及思想，以了解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形成过程。英文“empathy”中的“pathy”就是指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

英文“empathy”一词出现之后，很快便出现了其他变体，包括其形容词empathic（同理心的、有同理心的）和动词empathize（拥有同理心、表达同理心）。“同理心”这一心理学术语很快在维也纳、伦敦、纽约等大都市流行起来。与同情心的消极被动不同，同理心是比较主动的参与过程，即一个人愿意主动去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的经历，分享他人的情感与体验。

“同理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新概念，很快在学者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一些人坚持采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理性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试图剥离掉“同理心”一词的情感色彩，认为同理心不过是人类大脑固有的一种认知机能，但要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下才能得到发挥。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承担的角色，理解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意图，从而做出一

个适当的反应。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认知发展理论的提出者让·皮亚杰也同意米德的说法。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善于读懂他人内心世界的所感所想以建立社会关系。支持从认知角度看待同理心的人们认为同理心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一种用于增强自身社会利益、维护适当社会关系的工具。

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一些人则更加倾向于为同理心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指出同理心是一种以正确的情感回应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是一种带有认知元素的情感或情绪状态。具有同理心的观察者不会为了走进他人的体验而丧失自我意识，也不会为了搜集有利于增进自身利益的信息而冷静客观地探察他人的体验。相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所指出的那样，同理心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同理心是使一个人站在他人而非自己的角度对其处境产生强烈共鸣的心理过程。霍夫曼等人不贬低认知机能扮演的角色，认为认知机能有助于提高表达同理心的准确性，但他们更倾向于将同理心视为从内心深处对他人困境产生共鸣并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认知机能会对他人当前的处境进行评估，之后会产生富有情感及带入感的反应，照顾他人的需求，缓解他人的痛苦。

虽然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同理心既是对他人困境的一种情感反应，也是一种认知反应，但同理心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这么简单。由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经常说这句话，所以它流行了起来，后来波普文化中的很多漫画也都配上了这句话。实际上，一个人除了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共鸣之外，也能对他人的喜悦产生共鸣。

通常来讲，对他人的喜悦产生情感共鸣，需要对他人过去的艰苦努力具有深刻的了解。正是这些艰苦努力才使成功的喜悦更加珍贵，才能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鸣。如果你正在经历着痛苦，而一位具有同理心的人能够深刻理解你的处境，那么对方一个简单的拥抱就可能将你的痛苦转变为喜悦。卡尔·罗杰斯对此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评述美国著名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著的《自我与历史的戏剧》时曾经如是写道：

> “当一个人意识到有人理解他的内心感受时，他的双眼会变得湿润。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流的是喜悦的泪水，仿佛在说，‘谢天谢地，终于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了，终于有人知道我的处境了。’”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同理心这个概念的兴趣越发浓厚，越来越关注同理心对人类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关注度更是迅速提升。从医疗卫生到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领域，同理心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研究主题。

生物学家激动地发现了人类拥有一种被称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由于这种细胞的功能是反映他人的行为，所以也被称为“同理心神经元”。这种细胞的存在使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具有表达同理心的遗传倾向。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关于生物进化，尤其是人类进化的性质，一些由来已久的观念逐渐遭到了颠覆。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其著述中指出人类具有热爱生命的天性，颠覆了人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对其他动物的看法。此前，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往往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认为上帝赋予了人类统治与处置其他动物的权力。除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会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督教的观点都是如同人类一样，动物也是“堕落的物种”，虽然有用，但没有内在价值。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也几乎没有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动物表现出多少尊重。他们大都认同笛卡儿的观点，即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物”，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天文钟上那个跳舞的自动木偶没什么区别。

威尔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指出人类具有一种同其他人和其他物种寻求情感共鸣和友好关系的遗传倾向和内在欲望，并大胆地提出如果人类日益脱离大自然，那么人类的身体和心理将会出现问题，引发物质和精神上的贫乏，这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

教育界人士也纷纷扛起了同理心的大旗。在方兴未艾的情商教育中，同理心成为一个熠熠闪光的理念。能否表达同理心以及能否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成为衡量儿童心理发育和社交能力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对课程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新课程在较为传统的文化课程和职业课程之外，还强调了同理心教学法的重要性。

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人更加习惯于在开放的社交网络中互动和学习，他们乐于分享而不是隐藏信息。学校为了适应这一代人的现实状况，纷纷采纳了以同理心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模式，试图将教育从一个竞争对抗的过程转变为合作互助的过程。如今，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都被要

求到社区组织从事公益活动，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提高社区生活的品质。

这类教育创新有助于培育学生更加成熟的同理心。传统的观念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被用来实现个人利益。但现在这些传统思想日趋弱化，取而代之的新理念认为知识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责任——共同增进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福祉。

一些学校采用了新的同理心教学法之后，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测评。早期的测评结果表明，经过同理心教学法的培训之后，这些年轻人的识察及沟通技能、批判性思维等素质都出现了明显改善，学生们更懂得自我反省，更善解人意，懂得以一种充满智慧和同情心的方式去理解和回应他人。由于同理心教学法着重强调的是一种非评判性的价值取向，鼓励学生不把个人标准作为评判其他人和事物的依据，而是兼收并蓄地容忍其他的观点。这就使年轻人在想问题、办事情时更习惯于把复杂程度作为思考依据，迫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既没有简单的行为准则，也没有现成解决方案的现实世界里，鞭策他们不断地探索以取得共识。这种近年来才流行起来的同理心教学法旨在让学生探索宇宙的奥秘——不仅要思考“如何做”，还要思考“为什么做”。

在法律领域，“伸张正义”这一传统概念已经得到了拓展，融入了“和解理念”。这种截然不同的新方法力图在修复犯罪者与受害者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过错方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过错方采取惩罚措施。

和解理念的一个表现就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众多非洲国家在大规模暴力冲突结束之后纷纷建立的机构之一。除了非洲地区之外，爱尔兰、阿根廷和东帝汶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犯罪者与受害者聚在一起。受害者作为犯罪者暴行的见证人，控诉他们给自己造成的身体及心理创伤。同时，也给犯罪者一个机会，使其在受害者面前完整而真实地陈述自己的罪行，并选择是否征求受害者的原谅。这种做法能够让双方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同理心，得到精神的净化与情感的宣泄，并最终达成和解，治疗身心创伤。

恢复性司法也具有类似的作用。目前，这一新型的司法理念已经在

一些国家得到了落实。这一新的案件处理方式鼓励在押犯和受害者坐到一起，在一种精心设计的环境中面对面地交流和分享各自的感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犯罪者在倾听了受害者的讲述之后，能够真心意识到自己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并为此感到内疚，由此做出具有同理心的回应，悔恨不已并寻求受害者的谅解。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恢复性司法程序都正式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道德问题超越了公平问题的范畴，将同样重要的关怀问题包含在内，纠正错误不仅包括定罪判刑，还包括情感上的修复。这类新颖的和解机构和司法理念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闻所未闻，成为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之道，既注重发挥同理心的重要作用，也维护了公平正义。它们在减少未来创伤和犯罪行为方面的表现虽然有好有坏，但依然鼓励着我们拓宽视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法律在纠正错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甚至连经济学这个沉闷的学科也起了些许变化。两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提出，人性使每个人在市场中不遗余力地追逐私利，这句话似乎成为无可争议的至理名言。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声称：

>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尽管时至今日，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刻画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但也再不是神圣不容置疑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已经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在如何看待人性和私利的问题上，互联网挑战了传统的市场假设。“买主自行小心”的传统警告如今已被“所有交易都应完全透明”的信条所取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交易中的买卖双方是相互对立的，但现在人们则普遍比较重视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开展网络化协作。在一个网络中，使别人的利益最大化也增加了自己的资产和回报。合作超越了竞争。市场经济的常态是各方共同承担风险，以开放的态度精诚合作，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玩弄阴谋和幕后操纵。请想一下Linux操作系统。这类开源软件在20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体现了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这款风靡全球的软件背后的设计理念是鼓励数以千计的人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在软件编程和编码方面可能遭遇的困难，然后自愿地花些时间去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Linux操作系统最后成功了，成为微软操作系统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强劲对手。“经济利他主义”不再是一种逆喻，尽管亚当·斯密肯定不会相信这一点。

关于人类同理心本性的新发现甚至还引起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关注。他们逐渐开始将雇员的社交商摆在了与职业技能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雇员在公司内外能否超越传统的人种、民族、文化与性别的界限去表达同理心，对公司业绩至关重要。在一个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学习如何以一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的态度共同工作，已成为一种标准流程。（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探讨同理心这一新的思维范式的崛起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些对我们的人性观有什么启发呢？或许人类并非生性本恶，本质上也不是自私和物质的，相反，同理心才是人的本性。其他一些被视为人类主要驱动力的品质，比如好斗、暴力、自私、贪婪等，其实都是次要的驱动力，只是在我们否定了同理心之后，这些驱动力的作用才开始凸显出来。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利用刚出生的恒河猴所做的研究（观察它们的情感反应），似乎暗示了同理心是人类本性的观点。他们的实验结果震惊了生物学界，并在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产生了连锁反应。

哈洛和他的团队制作了两个人工“母猴”。一只由木块和海绵橡胶制成，外面裹上绒布；另一只是用铁丝网围成的。两只人工“母猴”的体内都安装了一个灯泡作为热源，且两个“母猴”的身上都安装了喂奶装置。结果表明，幼小的恒河猴都喜欢依偎在柔软舒适的绒布“母猴”身边，即便停止供奶，那些猴子仍然缠着它，不愿意挪动几步到缠满铁丝的“母猴”那里吃奶。它们一直坚持到了将要饿死的地步。

1958年，哈洛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爱的本质》，他指出：

> “给予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实验对象对于有奶的铁丝‘母猴’的回应行为趋于弱化，而对于不能供奶的绒布‘母猴’的回应行为则

在加强。”

哈洛及其研究团队对自己的发现也深感震惊，给出了如下的结论：

> “作为一个能够影响情感的因素，哺乳的主要作用在于让婴儿同母亲有频繁和亲密的接触。人当然不能只靠吃奶而活。”

其实，研究人员大可不必把幼小的猴子从“母猴”身边抢走，让它们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实验，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存在这方面的证据——在20世纪早期，美国孤儿院的婴儿们就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模式。这些公共机构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创建的。当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移民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便建立了这些孤儿院来照顾那些孤儿、弃儿和无抚养能力的家庭的孩子。当时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社会上主流的育儿思想认为在照顾婴儿时，要特别注意卫生，而成人与婴儿的身体接触被视为一种不卫生的举动，可能会传播细菌，导致婴儿感染疾病。所以，孤儿院的管理人员不赞成护士拥抱或抚摸婴儿。据说婴儿与成人之间的情感会阻碍其道德意识的形成，使其对成人产生更加严重的依赖感，不利于他们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制力的人。这些婴儿们大都吃得非常好，护士们看管得也很细心，他们生活在无菌的洁净环境中。

即便得到了如此悉心的照料，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孩子成天无精打采，精神状态十分低落，就像处于完全隔离状态的人那样严重抑郁、啼哭、冷漠、退缩、笨拙和缺乏活力。尽管食物充足，医疗护理条件好，而且生活环境舒适，但孤儿院儿童的死亡率却远远高于同亲生父母甚至是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死亡率。

直到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们才开始竭力主张孤儿院改变护理方式。孤儿院开始鼓励护士多抱抱婴儿，多抚摸、摇动、安慰婴儿，通过接触与他们形成亲密的关系。婴儿几乎立即做出了回应，慢慢地恢复了活力，开始积极地与人互动，并充满情感，生气勃勃。

在此之前，孤儿院一直缺失的就是婴儿发育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同理心。无论普遍的看法是怎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的本性不是寻求“个人自治”，成为一个孤岛漂流者，而是寻求友谊、情感和亲密关系。将“自我发展”和“自我意识”与寻求“个人自治”等同起来

的传统观念日渐失去了威望。现在越来越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论断，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深化，而同理心则是建立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寻求友谊和陪伴若不是人性的根本，我们就不会如此害怕孤单和被排斥。一个遭到别人刻意回避的人，一个被放逐的人，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不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同理心是我们融入他人生活并分享他人有意义的经历的一种心理手段。心理学领域所谓的“超越”就是指人类需要超越自我，参与并归属于更大的群体和社会，融入更复杂的意义网络。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威廉·费尔贝恩、海因茨·科胡特、伊恩·萨蒂、唐纳德·温尼科特、约翰·鲍尔比、玛丽·爱因斯沃斯等精神病医生和儿科医生纷纷开始挑战弗洛伊德提出的“现实原则”。请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新生儿都试图满足自己的性欲，即所谓的“唯乐原则”。只是后来到了大概一岁半到两岁时，父母才开始让他们的孩子遵循“现实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现实会给婴儿施加一些约束和限制，从如厕训练和定时喂饭开始。他认为父母需要教会婴儿“延迟满足”，婴儿需要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去遵守社会生活赖以形成的各项准则。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人的本能欲望是反社会的、自我毁灭的，因此，社会化就意味着压抑本能欲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儿童的“现实原则”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原则就包括了寻求爱、友谊、亲密关系和归属感。他们提出，在人的各项基本驱动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寻求归属感。社会为了实现结构上的整体目标，经常会削弱或压制人们追求爱和亲密关系的根本动力，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人的基本属性。（稍后，我们将在第一部分探讨关于人类同理心本性的新的、科学的理解。）

然而，如果人类真的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动物，渴望寻求友谊，试图借助同理心超越自身的限制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如何解释人类彼此之间、人类对其他物种以及对这个地球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呢？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给地球留下了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伤痕。文化史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曾说：“每个人都是国王，脚下横尸遍野。”他说，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在一生中为了生存繁衍而征用和消费的大量生物和资源，我们可能会因自己的屠杀行为而惊恐万分。然而，

我们似乎可以为人类本性与暴力行为之间令人困惑的反差找到一个解释。我认为，人类历史中潜藏着一个很大的悖论，如同居于人类历史的核心之处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伴随着人类历史更迭，意义重大。即便这个悖论不是从人类诞生之际便已出现，至少也是从我们的祖先由远古人类向文明人类进化时，也就是在耶稣诞生数千年之前就存在了。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跨度来看，也就是从地球上开始出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大范围的、肆意的暴力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例外。诚然，牺牲其他动物的生命和改造环境对于维持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其他哺乳动物也是如此。那时，绝大多数的人类靠搜寻食物与打猎为生。远古时代的人们是游牧民族，生活在财产公有制社会中。虽然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们也具有侵略和暴力行为，但这类行为通常规模有限，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或者伴侣。我们人类如同自己的近亲——黑猩猩一样，也是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打扮自己、做游戏和其他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活动上。

考古学家们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的农耕社会里，也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或军事防御工事，以及有关战争或军事占领的证据。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指出，新石器时期，欧洲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他们的社会主要是平等的母系社会，手工艺先进，而且考古成果还表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艺术。

大约从公元前4400年开始，来自东方的侵略者开始侵扰欧洲。欧亚大草原上那些游牧部落的骑兵逐渐开始入侵欧洲南部和东部，破坏了那里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平静的农业生活。这些侵略者被称为库尔干人，他们饲养了大量马匹，在马背上套上马鞍，摇身一变成了灵活机动的骑兵。骑马作战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军事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突袭、践踏和占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村庄。

这些古老的牛仔们传播了一种新的尚武精神。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驯养野牛和放牧。牛群是资本的体现。事实上，“牛”的英文名称cattle和“资本”的英文名称capital具有相同的词源。人们的资本最初是以家里牛的数量来计算的——财富的多寡取决于有多少头牛。牛意味着资本，被视为动产，既可以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也可以用作控制他人和领地的工具。

人类学会将动物转变为资本和财富、力量的源泉后不久，便开始把

这种经验应用在自己身上。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中东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被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修建运河与堤坝，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利农业文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逐渐表现为美国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集权主义的“巨机器”（mega-machine），人类社会的结构迎来了一个彻底重组的时期。母系氏族的家族关系被父权社会的权力行使所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由不同年龄的社会成员组成基本群体，从婴儿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人会被划分到不同的年龄组里。而集权主义的巨机器建立后，权力集中到了行使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手中。掌权的官僚机构开始为整个社会制定抽象的规则，控制和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去开发地球资源、创造更多盈余，拓展人类帝国的疆域。这一刻，人类看到了文明的曙光，而我们的故事也开始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但也令人沮丧的故事，建立在无疑是历史上最奇怪的矛盾之上。

事实上，人类历史中每个新的、更加复杂的、消耗能源的文明，都会提升和扩大人类交流的节奏、范围和密度，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能源流通的增加带来了物质资料的过剩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拓宽了与远近社会间的商贸关系。基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农业社会和基于化石燃料消耗的工业社会构成了更加发达，也更加复杂的人类文明，对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在一个相互依存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下各司其职。社会分化的过程使个体脱离了所属部落，从集体色彩浓厚的“我们”转变成了个体色彩浓厚的“我”。而社会成员的角色分化也为自我意识的萌芽铺平了道路。

在以狩猎和采集活动为基础的口述文明时期，由30~150人构成的典型的家族单位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分化，个体成员也不具有自我独特性。远古时代的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但个体成员并没有自我意识。他们的生活与2010年曼哈顿中区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曼哈顿中区，一个人从家或办公室出发，不消10分钟，就可能遇到22万甚至更多的人，而使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群体中显得突出的，是他们各自的角色、职责和身份。然而，他们却能够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经济与社会有机体内共同工作。

社会分工过程带动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对同理心的形成与拓展至关重要。社会成员的分化程度越高，自我意识越强烈，存在的孤独感就越明显。个体会在追求存在感与成功的道路上遭遇

诸多挑战。正是这些情感使人们能够向具有相似的情感的人表达同理心。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社会里体系中，高度的同理心使日益分化的社会成员产生相互依赖感。这是文明必然会经历的发展过程。文明就是打破原有血缘纽带的“脱部落化”，并在“社团性纽带”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在一起。同理心的拓展使这种过渡与转变成为可能。当我们说到“文明”一词时，就意味着“同理心”。

今天，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同理心意识也拓展到了生物圈的边缘，拓展到了几乎每一种生物。不幸的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将我们相互联结起来的经济结构也在大量消耗着地球上的各类资源，以维系一个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城市文明，在此过程中对生物圈造成破坏。工业发展导致了全球变暖，两极地区的冰川开始消融，我们能够对生活在那里的北极熊和企鹅产生同理心。两极地区已经被冰封了数百万年之久，但现在科学家们却说到2030年，夏季的北冰洋可能不再会有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问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人类还能继续生存吗？”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第一次引发了人类对于集体灭绝的担忧。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负责人詹姆斯·汉森发布的一份报告更加剧了人类的担忧。汉森指出，到21世纪末或之后不久，贪婪的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上升6摄氏度，我们熟知的人类文明可能陨落。他警告说：

> “如果想要保全人类文明赖以形成、地球生命已然适应的星球，古气候学证据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表明，二氧化碳浓度需要从目前的百万分之三百八十五减少到百万分之三百五十或更低水平。”

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目前的减排指标还不够，需要加大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如果对人类的可持续性是否已接近极限仍然存疑，那么下面的数据或许可以揭示出人类的现状：我们的科学家称，在地球资源消耗者的总生物量中，接近70亿人的消耗所占比重还不足1%，而随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目前消耗着地球上将近24%的净初级生产量。（我们将在第12章中谈到全球环境危机的程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类开始关注同理心意识在全球的拓展时，自己已接近灭绝。我们在20世纪下半叶迫不及待地拓展同理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后，人类说“永远不要让这种事再发生”。我们的同理心拓展到了之前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人类同胞——女人、同性恋者、残疾人、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社会权利、社会政策、人权法律以及现在的动物保护法都体现了人类的同理心。我们正在参与一场漫长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存在着“其他人”、“持不同意见的人”和“未被认可的人”。虽然传统的排外思想和各种偏见仍然大行其道，虽然这种新的生物圈意识刚刚散发出极其微弱的光芒，但我们的同理心现在开始触及之前没有触及的领域，这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类进化之旅的一个巨大胜利。

然而，人们认识到要对付气候变化的幽灵可能为时已晚，人类可能会走向灭绝，从而影响了同理心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在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架构越来越复杂，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这类架构，人类才能够强化自我意识，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够汇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伸出富有同理心的双臂拥抱他人，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才能够不断得到拓展。

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虽然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但我们对于整个生物圈的同理心意识却在逐渐强化，不得不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悖论。如果人类想要避免走向灭绝的深渊，同这颗星球重新建立起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关系，那么，理解这个矛盾就至关重要了。

当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深刻反思人类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全面研究可行机制与路径、坎坷与曲折，然后找出一条摆脱当前困境的道路。人类往往倾向于超越自身的孤独感，寻求同他人建立友谊，因此，其社会结构也日益复杂，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而人类这种倾向与能量守恒定律发生冲突，人类历史的内在辩证法就是不断拓展的同理心和不断加强的熵之间永恒的反馈回路。

热力学定律与人类发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苦苦思索哪一种科学规律最有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至于变得无关紧要而被后代颠覆和摒弃。最后，他选择了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爱因斯坦指出：

> “对于一个理论而言，它的前提越简单，所能解释的事物越多，应用领域越广，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经典的热力学理论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是唯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物理理论。这使我相信，在其基本概念应用框架之内，它永远不会被推翻。”

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为我们揭示出，宇宙中的能量总量是守恒的，但宇宙内的熵将随时间不断增加。热力学第一定律，或者说能量守恒定律，提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整个宇宙中的总能量亘古至今都是固定的，而且会永远保持固定。

虽然宇宙中总能量是保持不变的，但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能量的转换永远具有方向性，从可用能量转化为不可用能量，从热物体到冷物体，从集中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等，这种顺序具有不可逆性。比如，一块煤炭燃烧后，总能量虽然保持不变，但却转换成了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散发到空气中。虽然这个转换过程不存在任何能量的丧失，但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煤炭的形态燃烧利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无论任何时候，在能量转化过程中，肯定会有某些拥有具体形态的、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消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68年创造了“熵”这个术语，作为测定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总和的单位。

克劳修斯指出，在一个固有的系统内，为了让能量做有用功，系统内部不同部分的能量集中程度就必须存在差异（即温度差异）。当能量从集中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集中程度低的部分，或者说从温度较高的部分转移到温度较低的部分时，就会产生有用功。比如，蒸汽机之所以能做功，是因为这个系统内部的某些部分非常冷，而另一些部分却非常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需要强调一下。当能量从一个等级转移到另一个等级时，那么下一次可以用来做功的能量就减少了。比如，从火炉中取出一根被烧得通红的拨火棒，它就会逐渐冷却，因为热量总是从温度较高的火棍转移到周围温度较低的空气中，最终火棍与周围的空气具有相同的温度，达到所谓的“平衡状态”，即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不再有任何能量水平上的差异，便无法再做功。现在，曾经有用的能量不再

集中在通红的火棍上，而是随机散布在空气中，已经无法再次使用了。

然而，难道我们不能循环利用消耗的能量，并扭转宇宙体系内熵的演变趋势吗？其实也能做到，只是在循环利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消耗之后又会提高熵的总体水平。

虽然太阳的能量预计还会维持数十亿年，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时间里，太阳都将继续为地球提供新的能量，但必须明白一点，地球上的能量蕴藏于金属矿石与化石燃料中，而且在相当长的地质时期内，地球上的能量总量是相对固定的。因为从热力学角度来讲，同太阳系及整个宇宙相比，地球属于一个半封闭的热力系统。热力系统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敞开系统、封闭系统以及孤立系统。敞开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封闭系统与外界只交换能量，而不交换物质（偶尔情况下会有一些无足轻重的物质交换）；孤立系统与外界既不交换能量，也不交换物质。地球属于一个封闭系统，这就意味着地球同太阳系交换能量，除了偶尔出现的流星和宇宙尘，地球与它之外的宇宙空间不存在明显的物质交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太阳系给地球提供的能量不会自发地创造任何物质。比如，阳光可以照射进一个空荡荡的坛子，却无法催生出任何物质。但诸多地球物质都很有“天赋”，能够在太阳能的帮助下转换为有用的物质，包括生命。早在侏罗纪时代，在太阳能的帮助下，众多地球物质就具有了生命。那些生命现在已经消亡分解了，碳化之后留在了地球内部，变成了我们人类今天所用的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能量以气体形态存在，无法重新用来做有用功了。虽然经过类似的碳化过程也能形成化石燃料，但这毕竟太遥远了，无法满足当今人类的需求，无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多么美好。化石燃料也因此被称为“不可再生能源”。

简单地讲，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是宇宙中的总能量是固定的，既无法创造，也无法毁灭，只有其形式可以转变。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是能量的转换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从可用到不可用、从可获取到不可获取、从有序到无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的一切物质最初都是可获取的、集中的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转变成了不可获取的、分散的能量。在整个宇宙系统内，某个次级系统的可获取的能量被转化成了不可获取的能量，这种不可获取的能量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熵就是用来测定这类能量的单位。

人类社会得以组织和维系是因为我们能够将环境中可获取的能量转

换为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能量。曾经荣膺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曾经针对热力学定律发表过一番非常有深度的评价。他说：

> “归根结底，一个政治体系的兴盛和衰落、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奴役、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趋势、财富与贫穷的起源、一个种族的总体幸福感等，都可以用热力学定律来解释。”

然而，从热力学定律角度来看，能量不停地从可获取状态转换为不可获取状态，从有序状态转换为无序状态，从集中状态转换为分散状态，而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却是人类生命与社会系统似乎在维持着高度集中的能量和秩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两个似乎相悖的现状呢？

起初，生物学家不是非常确定如何解释人类生命与社会结构存在的反常现象。卓越的生物学家哈罗德·布卢姆出面解释了生物学在热力学定律大框架下的适应性。

布卢姆在《时间之箭与进化》一书中指出，生命只是热力学定律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所有生物的生存状态都远非平衡状态，因为它们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和消耗能源，但由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环境中总体的熵。布卢姆解释说：“当局部地区的熵出现小幅降低，宇宙的熵却会大幅增加。”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免费的能源来自于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了太阳的能量，并提供了新能量，蕴含在自身内部，动物吃掉这些植物，便直接消耗了这些能量，或者动物通过吃掉其他动物而间接消耗了这些能量。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指出：“一个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负熵（即固有资源的消耗）……当它在环境中不断地吸收能源时，也会削弱环境的有序性。”

我们的机体不断地“加工”能量以维持生命。如果停止能量流动，或者说我们的机体由于患病而无法妥善地“加工”能量，那么我们就会迅速地走向死亡，或者说走向一种平衡状态。死亡的机体会迅速分解，随后消散并融入周围环境。因此，生命是非平衡热力学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生命通过不断地“加工”那些取自于更大环境的免费能量而维系自身的有序存在，但这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平衡，只有死亡后才能达到平衡状态。

生物体维持一种非平衡的生存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植物堪称地球上最高效的“能量加工厂”，但即便如此，植物也只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极少量的太阳能，其余的能量都散失了。因此，植物的熵小幅下降会导致整个环境的熵出现大幅增加。

20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生物体都如同一个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要把它所处的环境中的资源转移给自己和后代。”在自然界的等级体系中，一种生物的进化程度越高，那么它维系自身生存状态所需的能量就越多，它在生存过程中造成的熵也就越多。

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食物链——青草、蚂蚱、青蛙、鳟鱼和人类。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永远不会消失，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增加整个周围环境的熵，可用能量被转换成不可用能量。化学家泰勒·米勒指出，在生物进食的过程中，“有80%～90%的能量被浪费了，或以热的形式散失到环境中。”换句话讲，只有10%～20%的能量被生物真正摄入。这是因为将能量从一个生物转移到另一个生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就造成了能量的损失。

根据米勒的统计，一个人为了生存每年需要吃300条鳟鱼，而这些鳟鱼要吃9万只青蛙，青蛙则要吃2 700万只蚂蚱，蚂蚱需要吃1 000吨草。

在进化阶梯上，每一个生物体都在一种有序但不平衡的状态下维持自身生存，却给环境造成了更严重的无序状态（即消散的能量）。生物体越复杂，它维持生存所需的能量就越多。

这意味着当我们人类在进化阶梯上逐渐上升时，落后于我们的那些生物必须具有更强大的生理机能，才能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量。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说：“我们可以将生物体视为能量的‘转换者’，生物体主要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等）与头部及嘴巴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了这一点。”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占据优势的生物体能够从自然体系内攫取更多的能量，创造更多的资源，提高能量使用速度和效率，并且创造出盈余的物质”。

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指出，在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中，第一个“发电厂”就是自己的身体。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智人都是作为一个抢劫者

或猎人而生存的，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和合作，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攫取野生植物和动物内部蕴含的能量来维系自身生存。之后，人类从觅食者和猎人变成了农民和牧民，能够从周围的环境中攫取更多的能量。通过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人类获得了持续稳定的能量供应，还出现了能量过剩的情况，随时都有剩余的能量可供使用。这样一来，人类的身体和人类社会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能量，获得更大的发展了。

有了灌溉系统，作物栽培的效率大大提高，人类付出同样多的能量或劳动，能够获取更多的产出。农产品的盈余将一些人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不必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牧师阶层和士兵阶层慢慢出现，后来又出现了工匠阶层。社会角色的分化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催生了新的、更加复杂的制度安排，这又有助于人类获取和利用更多的能量。

大约一万年前，北非、中东、印度和中国开始种植谷物，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谷物被称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食物的盈余为更多人口的生存提供了能量，促进了人口增长，也为人类建立王国和后来的帝国提供了物质条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伟大文明就是随谷物种植而兴起的。人类开始兴建大型的工程，包括修建精心设计的水利灌溉系统。女性发明了陶器，可以用来储存盈余的谷物，这些谷物既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拿来交易。冶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更加复杂先进的武器的诞生，人类逐渐开始利用武器四处征战，企图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奴隶。

农业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再一次增加了人类可以获取、存储和利用的能量。这一次，是可以借助机器来加工利用的化石燃料。机械取代了奴隶，无论是人均可使用的能量，还是整个社会可使用的能量，都增加了很多倍。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格兰特·麦柯迪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人类进化的过程就是其所用能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他写道：“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其文明程度的评价标准都是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能源来实现自身进步和满足自身需求。”对于这个观点，很多人类学家表示认同。例如，莱斯利·怀特也使用能源作为衡量人类文明是否成功的标准。他认为，一种文明的成就是高还是低，与人均能耗具有直接关系。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认为，文明的一个重大功能就在于利用和控制能量，使其服务于人类。美国生态学家霍华德·奥德姆在

阐述人类、思想和能源的关系时，提出警告说，人们必须记住，最终限制人类进步的是能源，而不是人类的灵感。奥德姆写道：

> “所有的进步都得益于能源的增加。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如果能源没有增加，进步就无从谈起。知识和创造力只是运用能源的手段，知识的发展和停滞也取决于能源的多寡。”

奥德姆说，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最严重的制约因素都是能够获取多少能源。如果无法获取和利用足够的能源，那么人类即便再有创新能力，也难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增进人类的福祉。

怀特为衡量能源利用和文明演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捷径。他说，在评估任何文明的“进步”时，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人均年能源利用量”；第二，“能源技术利用的效率”；第三，“每年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怀特总结道：“当人均年能源利用量增加时，或者当能源技术利用的效率提高时，人类文明就会进步。”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物质主义传统如出一辙的是，怀特明确指出能源是主导生物系统和文明系统的因素。他说：“我们追溯了人类文明从类人猿时期到现在的发展历程，结果发现，每当人类能够开发新的能源时，人均年能源利用量就会上升，人类文明也会随之出现阶段性的进步。”

怀特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人类发展的历程。能源虽然至关重要，但也无法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发挥作用。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发生在新能源机制与新通信革命相互融合之际。能源和通信革命的融合长期改变着人类生存状况。新通信革命成为人类社会的“命令和控制机制”，塑造、组织和维护着人类文明的能源流动。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率先建立了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他们修建运河与堤坝以灌溉农田，修建道路系统以把粮食运输到储存地点。与那些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率较低的社会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粮食分配管理需要新的、更高的组织水平，制定更加复杂的管理制度。因此，苏美尔人不得不征发并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来修建和维护水利灌溉系统，开发并操作特定的灌溉工艺技术。社会成员的角色逐渐出现了高度分化，劳动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水利灌溉系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开发与建立催生了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城镇。

日益复杂的能源管理机制需要更加有序的交流媒介，通信革命随之而来。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水利灌溉系统，促进了粮食的生产、存储和分配。楔形文字便于苏美尔人记录和监督庞大复杂的灌溉系统的操作情况，并追踪分析所有的操作流程，包括监督粮食的日常存储和分配。

大规模的农业灌溉系统一旦建立，人们必然会创造一套文字来管理这个系统，在中东、印度、中国和墨西哥都是如此。

近代早期，印刷、媒介和通信革命与煤炭、蒸汽机和铁路会合在一起，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436年，德国工匠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西方社会的铅活字印刷术，带来了一次印刷和新闻传播技术革命，迅速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历史在中国和朝鲜半岛要更悠久。

印刷技术革命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正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反抗成为可能。马丁·路德与随后的改革者极力推动《圣经》译本的大批量印刷，这样每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都可以读到《圣经》，不费气力地了解并领悟上帝的思想，而不必再依赖牧师等神职人员来帮他们解读上帝的旨意。从宗教改革运动，到反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督教的大分裂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面貌。

但直到詹姆斯·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印刷技术的经济影响才开始全面显现出来。印刷革命与煤炭、蒸汽机和铁路革命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1830~1890年，欧洲和北美经历了一场印刷和通信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既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降低了印刷过程的成本。这两个大陆的教育蓬勃发展，民众的识字率迅速提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识字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进步。煤炭、蒸汽机和铁路系统庞大而复杂，通信革命成为组织和管理这些系统的手段。到了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在短短60年里就兴建了起来。经济活动的节奏、速度、规模、密度和相互联系程度都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得益于以燃烧煤炭为动力的蒸汽机、印刷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的辅助，经济活动便无法发展。

在19世纪晚期和整个20世纪，人类发明了第一代电子通信工具——电话、电影、广播、电视、电子打字机、计算器。它们与石油开采技术、汽车制造技术和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结合在一起，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能源革命与通信革命的结合不仅重构了社会架构、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还改变了人类意识。通信革命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的时空定位，进而也改变了人类大脑对现实的理解方式。口述文明充斥着神话意识，文字的出现促进了神学意识的发展，思想意识伴随印刷技术而产生，而早期电力技术的发展则催生了人的心理意识。

每一项发达的通信技术都会将更加多元化的人群汇聚在一起，构成更为宽广和密集的社会网络。通信技术革命拓展了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让人们变得更有包容胸怀，同理心趋于成熟，意识也随之膨胀。

新的能源机制会拓宽人类社会的时空边界，而人的同理心意识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成熟并填充着新的时空边界。同理心成为将专业化和个性化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形成了一个整合的“社会织锦”，一个能够作为整体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有机体。人类意识每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会拓展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对现实领域的思考会变得更广阔，也更深刻。这一切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就是因为有了更加复杂的、能源消耗量更大的人类文明。但问题在于：人类意识只是复杂的社会用来维持生存的管理工具吗？新的能源与通信机制只是人类意识用来拓展其边界的工具吗？（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更加深入地分析能源、通信和意识的变化以及同理心和熵的辩证关系。）

大多数科学家可能认为新的能源、通信和意识结构只是人类在非平衡状态下维持繁荣发展的工具。每一个可延续的社会体系都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持久存在必然会提高环境中的熵的总量。

已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曾经指出，很多非生物系统以及所有的生物系统都是耗散结构，它们通过不断地消耗能源来维持其自组织过程。

能源的流动使非生物系统或生物系统处于永恒的波动状态。大部分

情况下，这些波动都比较小，系统能够通过负反馈逐渐适应，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波动太大，以至于系统无法适应，便出现了正反馈。这些波动相互加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整个系统无力应对。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当全球的石油生产达到顶峰、气候变化愈演愈烈时，人类的生命系统就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当波动太大而系统无法应对时，系统要么崩溃，要么重组。如果能够重组，那么新的耗散结构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和协调性，所需的能源也更多。由于每一个后续系统都比前一个更复杂，所以更加容易受到波动的影响，更加容易崩溃和重组。普里高津相信，一个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会为其进化创造条件。

在过去的38亿年间，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多达数百万种，而人类创造的系统最为复杂，而且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后续量变都比前一个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制造更多的熵。应该指出的是，复杂的能源、通信和意识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不总是呈现出线性特征。比如，在西方，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帷幕，时间间隔长达1 300年。罗马帝国的崩溃给欧洲带来的是破裂的、分权的自给文化与经济，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便是如此。

当前，人类社会复杂的制度安排及社会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我们所需的能源也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社会制造的“熵账单”——两次工业革命消耗的化石燃料引发的气候变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生物圈化学承受能力的临界点，并给人类自身以及我们的星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不过，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认为人类生命之旅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生存和繁衍。他们不断探索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在这样一个更加精细的、相互依存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生活呢？

寻找超越生存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系统之所以不断扩大，并且日益复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具有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如果人类只是为了生存，那么我们的社会网络就不会扩大，我们在旧石器时代那种社会生态

下也能生存。

相反，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动机。如果人类天生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物种，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寻求扩大和深化与别人的联系，参与更加广泛的群体，那么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更复杂、耗能更多的文明使人类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前所述，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拓展，变得更具包容性，同理心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中寻找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意义。博学多才的匈牙利籍科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认为人类是“创新者和探险家，积极热情地让自己更加接近于现实世界”。

作家伊迪丝·科布认同波拉尼的说法，并且更进一步地指出：

> “如果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那么这一定是因为人类存在同宇宙加强联系的主观意愿，并迫不及待地希望探索自己与时间和空间的真实关系。”

科布认为，人类基因内部包含一个比达尔文提出的自我繁殖动机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时空限制下拓展自我的需要——这种需要超越了自我繁殖的需要。

我们开始感觉到人类的进化之旅可能存在一个永恒的动机和目标，即深化自我意识，拓展同理心的应用领域及人性意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超越了自身的界限，探索生命的奥秘，发现新的意义。

严格遵循达尔文主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并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创建更复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冲动恰恰说明我们存在这样一种确保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内在需求。达尔文的观点认为，凡是能够促进生命繁衍的社会创新和建设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我们的基因，很多批评家们都指出这种观点即便不算无聊，也有点儿唆。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认真地观察人类历史过程，尤其是同理心不断拓展和熵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那么我可能会发现人类本性以及人类探索目标或许有些不同。

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同理心，且自己的活动会增加宇宙的熵

时，就会对他人有限的生命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当我们对他人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所认同和支持的是他人谋求生存的愿望。热力学定律，尤其是熵定律告诉我们生命存在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和不可逆转的，我们只会慢慢变老而不会变年轻。我们只有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才能远离死亡和被分解的平衡状态。当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同理心时，就会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的生命，如同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是脆弱的，而且正是连续不断的能量流动才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然而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周围环境的熵。

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始终提醒我们，人性的本质在于同理心。正是同理心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友谊和团结。同理心的拓展表明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共有的脆弱性，体现了人类对于生命的共同渴望。

同时，更加复杂的、耗能更多的文明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接触和联系其他个体的机会。我们接触的对象越是多元化，我们就越有可能在对方的艰苦奋斗中增加对自己方方面面的了解，并拓展同理心意识。

在拓展同理心意识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同理心不仅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苦难或处境，还能反过来加深我们的自我意识。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国贲对这个反馈过程做出了如下总结：

> “由于我在你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身影，你也在我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我在相互对照与肯定中增进了对自己的正确认识。”

同理心的不断反馈是一种社会黏合剂，使人们有可能建立日益复杂的社会。如果人类没有同理心，我们无法想象如何才能创造出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自恋者、反社会者或孤僻者，那么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人们存在对社交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需要拓展自己的同理心。

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够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促使其接触更加多元化的人群，并更有可能拓展同理心。传统的农村生活比较封闭和排外，因为人们生活在内部联系密切的共同体中，往往不愿意接纳陌生人。而城市生活使人们每天通过社交和商业活动接触到更多的人，这样

有助于消除人们的地域偏见和狭隘思维，尽管并非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都具有这种包容胸怀。然而，城市生活会陷入一种悖论——我们为城市生活付出的代价就是给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熵。或许也可以反过来看问题，比如，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给周围环境带来更大的熵，但可以为人类创造适当的条件去拓展同理心，接触到更加多元化的人群。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悲剧性的问题就在于人类同理心意识与敏感性的不断增强给整个地球造成的熵也在持续增加，两者是正相关的。所有人类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依赖地球上的能源维系生存和繁衍，地球遭到的破坏终将反过来影响人类自身的福祉。

我们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同理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遭遇了全球性的熵剧增。虽然同理心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熵也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人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是自私自利、功利和追求快感的，那么同理心和熵之间的悖论便无法解决。但如果人性倾向于追求情感和友谊，渴望社交生活，希望拓展自己的同理心，那么这个悖论至少存在一丝得到解决的希望，我们或许能摆脱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找到一种调和之道，维持与生物圈的可持续平衡关系。

一种全新的人性观正逐渐兴起并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人性观必将给我们认识与处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同理心的存在，形成了“同理人”观念。

---

[1]　1英亩≈6.07亩。——编者注

第一部分 同理人

第2章 新的人性观

我们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这样一个迷恋物质利益的时代，即便是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也往往倾向于从物质角度去诠释生命的本质，更不用说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了，这已不足为奇。直到近些年，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本质是物质的——每个个体都在不遗余力地获取物质利益，尽可能多地把世界上的资源据为己有。流行歌手麦当娜就曾坦然地表示自己是“物质世界”里的一个“物质女孩”，赤裸裸地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

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提到的，霍布斯认为人性是好斗和自私的，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同他人进行斗争和竞争，在无情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控制对方，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上使自己获取物质利益。约翰·洛克的人性观则相对温和，甚至显得有些友善——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人类乐于融入社会，并对他人持友好态度。然而洛克认为，人类具有贪婪的本性，运用我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征用物质世界的资源，对其进行重塑，使其变成能够为己所用的生产资料。杰里米·边沁等功利主义者认同洛克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本质上是物质的，因此人总是试图减轻痛苦，并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9世纪晚期，人类对于思维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感兴趣，这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人类心理的驱动因素上。他们对于抽象的哲学思考不太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去观察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很多早期的心理学家在人性的问题上都保持着物质主义的偏见与成见。如同亚当·斯密一样，他们也假设每个人天生就是为了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在达尔文的带领下，他们认为每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存和繁衍。

弗洛伊德：最后一位伟大的功利主义者

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经常被视为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重新塑造了人类的人性观，但其很多最重要的理论假设都严格遵循着物质主

义原则。弗洛伊德在其著述中，将中世纪教会提出的世俗的人性观（即人类具有沉沦堕落的本性）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物质主义人性观结合在了一起。他对人性的描述令人震惊，但他的观点却非常深入人心，影响非凡，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在塑造着很多人的人性观，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育儿方式、社交生活方式、商业运作模式以及公共政策的实行。

弗洛伊德的伟大遗产是为物质主义利己的人性观披上了一件性感的外衣。不久之后，弗洛伊德提出的色情化的人性观被同一时代的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发扬光大。华生将这种新的人性观应用到了大众广告领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消费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此——人类的欲望和消费行为被色情化了，很多颇具吸引力的广告中都充满了性暗示。

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一书中阐述自己的人性观时，首先探究了人们本身的行为表现了怎样的生活目的：他们向生活要求什么？希望实现些什么？他站到了19世纪功利主义理论一边，指出人类的追求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旨在获得强烈的快感。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地指出：

> “如果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将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归结于追求实用和创造快乐这两个相互交融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承认，文明现象也是如此。”

随后，弗洛伊德问，什么才能让人类获得“最强烈的满足感，并为人类提供实际的幸福”。他得出的结论是“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该将追求生殖器快感作为生命的核心目标”。

弗洛伊德说，人类追求性满足的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所有外部的现实因素都仅仅成为释放性压力的工具。如果不受约束，人类不会允许任何事物阻挡自己对性高潮的追求。因此，人类的动力就是性欲，人类的本性就是好斗的，一心寻求满足无法遏制的力比多。事实上，人类是怪物。弗洛伊德写道：

> “隐藏在这一切之后的，也是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因素，是人类并非温和的物种，需要得到爱，当受到攻击时至多只能够自

卫；相反，人类这一物种被认为在其本能的天赋中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因此，他们的邻居不仅仅是他们的潜在助手或性对象，而且容易唤起他们的进攻欲，即毫无补偿地剥削他人的劳动力，未经允许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霸占他人的财产，羞辱、折磨并杀死他人。”

弗洛伊德认为，在有利于人类发挥进攻本能的情况下，如果抑制这种本能的精神力量失去效用，这种进攻本能就会自动表现出来，这暴露出人类“是一种野兽，对同类的关心与本性不容”。

反过来，文明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心理与文化的监狱，用来限制人类强烈的性冲动，以免导致持续不断的、相互毁灭的战争。弗洛伊德将爱情解释成了一个遏制人类原始性冲动和进攻性的手段。至于“爱人如己”的黄金律，弗洛伊德则是不屑一顾，认为“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人类的原始欲望更强烈”。

在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中，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很不情愿的一时权宜与妥协，在社会中，人类“用其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幸福换取了一部分安全”。

弗洛伊德提出，如果人类的本性是相互毁灭和杀戮，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生命似乎总在寻求更多的秩序、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大程度的一体化的事实呢？弗洛伊德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也遭遇了热力学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带来的困惑。这些新的科学成果表明，生物体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创造更有秩序、更加复杂的结构，以避免走向死亡和混沌。如果人类的本性果真是相互毁灭与杀戮，那么这种人性观似乎既不符合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也不符合刚刚兴起的热力学理论。弗洛伊德最后找到了一条摆脱这个困惑的道路，提出了他所谓的“死亡本能”。这一概念变成了其人性观的核心组成元素，弗洛伊德说他是在1920年撰写《超越唯乐原则》一书时想到的。他写道：

“从对生命开端的思索和与生物学的比较出发，我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保存生物并使它加入更大单位的本能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相反的本能，这一本能试图分解这些单位，并且把它们带回到原始的、无机的状态。这就是说，不仅存在着小爱神厄洛斯，还存在着死亡本能。生命的现象可以从这两种本能的共存甚至互相对立中得到解释。”

弗洛伊德还认为，

> “人类的死亡本能可能被迫为厄洛斯服务，因为有机体在破坏其他某种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而不是在毁灭其自身；相反，任何阻止进攻性向外发展的行为都必定会助长有机体的自我毁灭，自我毁灭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死亡本能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施虐狂，另一种是受虐狂。两者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本能的性冲动。施虐狂试图通过控制和压抑他人来释放性冲动，而受虐狂则通过自我羞辱与摧残释放性冲动。

弗洛伊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人的一生终归是为了死亡本能而服务。他那异常悲观的人性观折服了那个时代很多的主流思想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人类学家盖佐·罗海姆在《梦幻之门》一书中把死亡本能称为“超心理学的支柱”。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接受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论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很多心理学家都摒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其中一位就是伊恩·萨蒂。萨蒂在《爱与恨的起源》一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出了如下描述：

>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人类仇恨情绪的最高表现，提升了仇恨的地位，将仇恨视为一种原始的、独立的人生目标，就像饥饿感一样，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刺激就会自然形成，仇恨就是仇恨本身的目的。”

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人类其他任何一种情感只不过是对性冲动和死亡本能的压抑，即便爱情与温情也被视为性冲动被压抑或削弱之后的表现。文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充当人类控制他人、谋求私利和满足性欲的手段。

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对母爱这种强大的、不可否认的力量进行深刻的思考。弗洛伊德那种显得有些病态的个人心理或许可以从他在《文明与缺憾》一书中所做的一个坦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关于婴儿与母亲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弗洛伊德写道：“我在自己身上体验不到这如同海洋般浩渺的母爱。”虽然他承认其他人可能有这种感觉，但他没有。他认为婴儿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力比多驱动的。在婴儿眼中，母亲不仅为自己提供爱和温情，还能满足自己的性欲和对物质需

求，母亲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满足婴儿对于性满足和性快感的内在需求，依恋感、爱情、亲情和友谊都是幻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功利主义的，都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最多的快感。弗洛伊德还认为，如果婴儿渴望注视着母亲，这只是因为婴儿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母亲会立即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对于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萨蒂评价道：

> “弗洛伊德的这句格言明确否定了人类将自身对友谊的渴望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身体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遗传。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逐渐学会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去看待母亲的角色。”

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人们对宗教、对上帝是否也会形成像母爱那种海洋般浩渺的情感呢？他很快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认为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母亲的关怀。他说，人们之所以会对宗教信仰产生冲动，很可能是由儿童时期的无助感导致的。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中的各种危险，父亲的保护使他感到安全，而宗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给人们提供保护。通过下面这些描述，弗洛伊德透露了他的情感盲区以及对于宗教的态度：

> “我认为童年时代没有任何需要能超过对父亲保护的需要。因此，力图恢复无限自恋的、像海洋般浩渺的感觉所起到的作用肯定不是首要的。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很清楚地追溯到婴儿时期的无助感。也许，在它背后还隐蔽着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

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冲动完全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基础的，宗教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母爱、爱情、友谊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只为掩盖一种更深刻的、自恋的冲动。在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提出二三十年后，20世纪著名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提出了自己的评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学基础具有浓厚的男性色彩，女性即便起到作用，也只是边缘化的。蒙塔古说：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一种父权心理学，女性的本性似乎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也几乎承认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似乎从来没有准确地理解到母亲与子女关系的真正意义和爱的真正意义。”

弗洛伊德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他从世俗角度为古代形成的父权社会做了精彩的辩护。父权社会形成的物质基础就在于中东及远东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这个过程伴随着亚伯拉罕诸教与儒家思想的兴起。弗洛伊德不遗余力地论证男性主导权是人类社会的一条自然法则。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戏剧化的事物，目的就是凸显男性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至于女性的角色，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十分困惑，他也不清楚除了怀孕生子、哺育子女之外，女性的历史角色还有什么其他组成元素。根据他的推理，无论女性具有或表现出了其他任何精神或情感上的掩饰，永远也只是男性投射的一个灰暗的影子。因此，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灵做出轻描淡写的刻画就不足为奇了。弗洛伊德认为，归根结底，女性的一切行为都反映了她们尚在子宫里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阴茎嫉妒”。

虽然弗洛伊德对男性主导地位进行了热情而巧妙的辩护，而且人类文明的父权基础也经过了5 000多年的考验，但历史的力量已经开始侵蚀这一基础，弗洛伊德的辩护似乎也开始站不住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能源和新通信方式打破了父权社会的铜墙铁壁，开始把女性从几个世纪的奴隶地位、农奴处境或奴仆身份中解放出来。印刷技术革命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尤其是爱情小说的普及，使女性能够把小说中的情景作为一面镜子，反思自己的生活，从而逐渐开始走向寻找自我意识的艰苦旅程。与此同时，电话的出现为数百万女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与外界联系的工具，打破了家庭对女性活动范围的限制，仅仅通过一根电话线，女性就可以同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探索所有女性共有的性别利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期的电话。浮现在脑海中的情景往往是一个女性在电话旁边同其他人交谈。）小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工具，而电话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聊天的工具，促进了女性之间的团结。

这两种交流形式有助于将女性从男性警惕的目光下解放出来，女性可以寻找自己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印刷革命、通信革命以及公民识字率得到大幅提升之前，女性与外界处于隔离状态，她们的交流范围非常狭窄，往往仅局限于一个大家族的女性成员。男性的强势姿态确保了他们的顺从。印刷革命和电子通信革命（电影、广播和电视）为女性开拓思维与眼界、寻找女性意识与身份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了新式

通信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男性站到了同一个竞争平台上。汽车的出现、家庭的电气化、家电的大批量生产以及其他家庭日用品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至少她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每日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令人筋疲力尽的家务事，蒸汽机和后来的电力也转变了制造业、物流业和服务业的运作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这样一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工厂做工，也可以从事一些现代商业活动。虽然她们的才华和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她们的薪水也没男性多，但这标志着女性也有了经济来源，半独立女性的出现，在两性关系史的历史性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弗洛伊德著书立说的那几十年间，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他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工厂的动力系统正在由蒸汽机向电力过渡，女性也开上了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车，女性解放运动蔚然成风。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这些新女性刻画成了经济独立、着装时髦的女性，这些女性勇于挑战男性的主导地位，她们的形象成了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标志。

婴儿真正需要什么

所有这些新的发展趋势都引起了年青一代心理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质疑弗洛伊德人性观的一些核心教条。准确来讲，第一个挑战弗洛伊德观点的心理学家是一位女性——梅拉妮·克莱因，不过她的挑战并非蓄意为之，而是无意之举。她提出的“客体关系理论”只不过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大门上撬开了一个缝隙，但这已经足以让其他心理学家破门而入，攻破弗洛伊德的理论堡垒，从而为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人性观，这种新型人性观与正在重塑人类文明的新技术、商业和社会力量更加一致。

克莱因恢复了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地位，但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她其实是无意间做到这一点的，她终其一生都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理论忠实的追随者。

弗洛伊德在探讨人际关系色情化的过程中率先使用了“客体”这个术语。1905年，在一本名为《性欲三论》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把散发出性吸引力的人称为“性客体”。根据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都具有进攻性，

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性客体以满足自己的性欲，达到“暂时熄灭性欲”的目标。

克莱因虽然被誉为英国“客体关系”研究流域的先驱人物，但她坚定地信奉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过有一个方面是例外。虽然她认同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和进攻性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但她认为进攻性更加重要。她指出，人类施展进攻能力的首个目标就是母亲的乳房。婴儿把乳房这个目标分为能够满足自己性冲动的“好乳房”以及不能满足自己欲望、让自己感受到沮丧和困惑的“坏乳房”。

克莱因与弗洛伊德存在分歧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她认为人的自我意识从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使婴儿有能力创造内化的客体关系。她认为某种形式的意识自从婴儿刚刚出生之际就存在了，所以推测婴儿的第一个内化客体是母亲，而不是父亲。

因此，在婴儿时期伊始，母亲——而非父亲，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婴儿的攻击对象。但因为乳房被分为好乳房与坏乳房，婴儿对客体，也就是对母亲形成了模糊的情感。随着婴儿日渐长大，开始认识到乳房并不是母亲的全部，母亲是一个关爱自己的人。这种模糊的情感带来了矛盾的情绪，导致婴儿担心他的攻击可能会伤害到同母亲的情感，开始产生一种后悔和内疚的感觉，并希望去修复它，以免破坏了同母亲的关系，因为他正是依靠这种关系来满足性欲的。

虽然克莱因仍然相信婴儿的主要驱动力是力比多和进攻性，但至少她提出了人际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社交行为加以修复与缓和。然而，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她也相信毁灭冲动和死亡本能是人类心灵的内在属性，所以无法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性不是人的次要驱动力，而是主要驱动力。

然而，其他心理学家利用克莱因带来的微弱希望，对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假设，即“婴儿一出生就试图满足力比多，并在此过程中消耗资源和毁灭他人”进行全面的攻击。克莱因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次要属性，是人对于进攻冲动所做出的反应，而很多心理学家不这么认为——威廉·费尔贝恩、海因茨·科胡特、唐纳德·温尼科特以及伊恩·萨蒂就认为社会性是人的主要属性和主要驱动力，人类对于力比多、进攻性和毁灭性的关注则是在基本需求受挫之后做出的补偿性的反应。对于这些心理学家而言，同客体的关系不是由功利目的和满足力比多驱动的，而是由人类对

人际关系、爱情、情感和友谊的需求驱动的。

费尔贝恩在驳斥弗洛伊德的思想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婴儿会吸吮大拇指呢？"费尔贝恩指出，"性感带的概念以及性欲理论是否正确，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弗洛伊德可能会让我们相信婴儿之所以吸吮大拇指，是因为婴儿的嘴部是一个性感带，而吸吮大拇指会使他产生性快感。乍一看，弗洛伊德的解释似乎有说服力，但费尔贝恩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大拇指呢？"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乳房可吸吮了。"他提出，吸吮"是处理令人不满的客体关系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讲，婴儿是在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客体关系来让自己得到满足，因为他希望与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本身建立联系，而这种愿望没有实现。因此，费尔贝恩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两人分道扬镳，导致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了分裂。他写道："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不是力比多决定客体关系，而是客体关系决定力比多。"

费尔贝恩说，弗洛伊德如此痴迷的婴儿时期各种性方面的事情只是补偿性的做法，目的是缓解婴儿因其小部分或大部分真正的渴望遭到拒绝而产生的焦虑。每一个孩子最大的、最害怕被拒绝的渴望是什么呢？费尔贝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

> "别人不爱自己或者自己的爱不被别人接受，是一个儿童最大的创伤。这种创伤会促使儿童采取多种与性有关的做法来获得替代的满足感，以缓解因无法与外部客体建立情感联系而造成的焦虑和恐惧。"

当婴儿感觉到他人不再爱自己或自己的爱不被他人接受时，他的成熟过程就会暂时趋于停滞，他与外界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正常，并开始表现出病态的症状——进攻性、强迫症、偏执、歇斯底里和恐惧。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归因于婴儿内心深处对于被孤立、被遗弃的担忧与恐惧。

费尔贝恩得出的结论是：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在两个基本方面上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是性冲动的主要地位，另一个是性满足的主要地位。他写道：

> "我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与客体关系相比，性冲动居于次要地位；第二，婴儿在力比多驱动下的各种行为，其最终目标是与客体

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满足性的冲动。”

这两个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挑战了弗洛伊德人性观的基本假设。下面，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弗洛伊德人性观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相信力比多是一种内在的、主要的力量。婴儿从生命刚刚开始之际便试图通过性方面的多种行为寻求无限的快感，即他所说的“唯乐原则”。即便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前，婴儿已经具有了本我意识，而本我意识是促使婴儿寻求性满足的一个主要力量。因此，如果要形成有序的社会交往活动，“唯乐原则”就必须得到社会的抑制。所以社会就把“现实原则”强行施加给了婴儿。“现实原则”的最初表现就是父母对婴儿采取的调节措施，比如如厕训练和其他调节。这些限制措施使婴儿无法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做事，不得不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这种训练有助于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自我意识不过是一个以社会化名义抑制性冲动、控制本我意识的一个机制。

费尔贝恩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婴儿的自我意识是在其出生之际便开始形成并发展的，婴儿表现出的多种形式的冲动是其寻求同他人建立关系的途径。换句话讲，“现实原则”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不是后来由社会施加的。每一个婴儿从出生时就开始寻求同他人建立联系，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费尔贝恩提出，多种形式的冲动，最终只不过是自我结构赖以获得生命力的方式，这些冲动的目的是为了同他人建立联系。

在费尔贝恩的理论模式中，现实原则居于主要地位。婴儿不断地从事着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活动，以期影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是“现实原则”的内涵所在。如果社会性这个主要目标受挫，自我意识无法以适当的方式趋于成熟，那么唯乐原则就是一个拙劣的替代品。费尔贝恩在批评弗洛伊德的核心论点时毫不留情，他如此解释同弗洛伊德的分歧：

“按照这种观点，唯乐原则将不再被视为主要行为原则，而是一个由客体关系缺失激发出来的次要行为原则。当现实原则因自我结构尚未形成或不成熟而无法发挥作用时，唯乐原则才会产生影响。”

其他心理学家纷纷站到费尔贝恩一边，批判弗洛伊德提出的过于色情化的理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人性观，突出社会关系对于人类心智和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性。海因茨·科胡特认同费尔贝恩提出的“毁灭冲动

不是人类的内在属性，而是无法与他人建立信赖关系时的反应”的观点。然而，他为费尔贝恩的分析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强调同理心在成熟的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同理心的缺失对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产生的严重影响。

在《自体的重建》一书中，科胡特提出的观点与费尔贝恩的观点非常相似——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自己，毁灭冲动只是在婴儿试图同客体建立情感联系的努力反复失败时才会出现。他写道：

> “当外界客体的同理心不足，无法对儿童的需求做出最优回应（应该强调一下，不是最大回应）时，就会激发出婴儿的破坏性。婴儿的进攻性或破坏性只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具有主要地位。”

虽然科胡特认识到了婴儿出生时就具有一种谋求强势的冲动，但他认为这并不等于进攻性、狂躁性和毁灭性。谋求强势的冲动有利于促进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自我的成熟，而后面这些特征则表示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缺乏同理心导致婴儿无法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故而婴儿不得不做出这些反应。

科胡特在临床实践中对患者进行了多年的观察。观察结果使他认为对于儿童发育而言，至关重要的不是多种形式的冲动，而是“对自组织性的威胁”。如果父母的同理心较弱或几乎没有，无法对儿童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努力做出适当的回应，那么儿童的发育就会暂停。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冲动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婴儿也会出现毁灭性的躁狂情绪。

科胡特对于弗洛伊德那种严重色情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了驳斥，认为儿童更容易受到周围成年人同理心态度的影响，而不是其机体的各种冲动。当一个小男孩发现他的阴茎比成年男子的阴茎小得多，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但成年人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小男孩的心理变化。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富有同理心，能够理解和欣赏儿童，那么就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儿童最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是否具有良好的同理心。因此，科胡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同理心——也就是我们的同理心环境，对于我们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科胡特做出的最后一个评论。他发现，在儿童早期发育阶段，只要看护者具有同理心，能够对儿童的需求及时做出适当的回应，那么看护者具体是谁其实并不重要。他援引了安娜·弗洛伊德和索菲·丹恩这两位心理学家报告的一个案例，强调一个婴儿赖以成长的同理心环境并不一定非要由其生母来提供。这两位心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6个德国犹太裔孤儿进行了追踪研究。在被囚禁在集中营的三年里，这6个孤儿的看护者，即“代理母亲”一直在变化。一组看护者被杀害后，就会有新的看护者顶上来，继续看护这几个孤儿，如是反复。尽管这段经历也给这些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但幸亏有同伴之间的互相支持，他们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发育问题，而且由于看护他们的那些女性富有同理心，能够用尊重和温情及时地回应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意识。

当费尔贝恩和科胡特对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发起正面攻击时，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个人——唐纳德·温尼科特则根据其数十年的儿科医生经历，发起了更微妙，却同样有力的攻击。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是自私自利的小个体，自出生之际就开始攫取世界上的资源来满足自己无尽的贪欲，但温尼科特对这一观点发起了挑战，认为不能将婴儿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种将婴儿视为个体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婴儿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生存下去，甚至没有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识。温尼科特说：“在婴儿的早期发育阶段，将其视为个体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个体应有的自我意识。”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似乎违反了人们的直觉，但现在回头来看，的确很有洞察力。婴儿是在子宫里形成的，而个体则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他在阐述为什么不能将婴儿视为独立个体时说：

> “如果你给我看一个婴儿，你肯定也会告诉我谁在照顾他，或者至少他躺在婴儿车里，而肯定有人一直在看着，人们会看到夫妻二人都在照顾他。”

温尼科特说的是社会关系先于个体意识，而不是个体意识先于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不是个人创造了社会，而是社会创造了个人。这个简单的观察挑战了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因为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强调了自我控制、自主运作的个体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是这些个体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世界。

温尼科特为了更深刻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分析了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他让我们想想婴儿出生后第一个动作的重要意义。这个动作就是寻找母亲的乳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根据多年的观察指出，婴儿第一次接触到母亲乳头的方式对于其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寻找乳头这个初始动作也是婴儿第一次与另外一个个体建立联系，所以这个关系形成的方式就决定了婴儿对于他人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对他人是否存在期待。

温尼科特认为，在第一次喂奶时，母亲最好不要直接把乳头塞到婴儿嘴里，而是让婴儿自己去寻找乳头。这样一来，对于婴儿而言，寻找乳头的过程就充满了乐趣。更重要的是，这会让婴儿隐隐地感觉到乳头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从而产生一种能够“创造世界”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着，让婴儿来发现自己的乳头。这标志着婴儿建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对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行为，婴儿对于“我”和“你”的意识才会逐渐形成。温尼科特这样总结第一次哺乳的重要性：

> “婴儿的记忆是由与寻找客体、母乳喂养有关的无数感觉及印象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会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相信自己肯定能找到所期待的客体。这种状态就意味着婴儿会逐渐容忍暂时找不到客体的情况，这样一来，便有了外部现实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婴儿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相信自己拥有魔术般的创造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而这正是由于母亲的敏感调整。之后，婴儿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缺乏对外部现实的魔术般的控制力。”

然而，如果母亲不允许婴儿发现和奇迹般地创造了乳头，而是把他的嘴放到自己的乳房上，那么婴儿就失去了一个形成感官记忆的机会。孩子原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如果母亲让孩子自己寻找乳头，以这种方式开始建立同孩子的关系，那么这就有助于孩子形成自我意识。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会让孩子成为一个个体。

如果直接把乳头塞到孩子嘴里，那么孩子就被剥夺了“出力”的机会，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毕竟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温尼科特警告说：

“人们很容易被欺骗，只看到一个婴儿非常娴熟地吃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婴儿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婴儿从没有体验过自己创造世界的感觉，也没有能力处理好同外部的关系，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也会受到影响。”

他总结道：

“让婴儿自己去寻找母亲的乳头，对其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莫大的影响。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心理学家能告诉我们哪一种因素比这更能深刻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了。”

费尔贝恩、科胡特和温尼科特通过各自的方式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假设，共同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人性观，突出社会关系在个体心理和人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弱化了性冲动的作用。伊恩·萨蒂则进一步对人性的本质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在方方面面都与弗洛伊德人性观形成了鲜明反差。

萨蒂回忆说，他最初之所以开始探索一种新的人性观，是因为他发现：

婴儿对于喂养的生物学需求可能会在心理上反映出来，这并不是说婴儿在心理上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哪些现实的基本需求，也不是担心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是说如果得到了母亲及时、充分的回应，与其建立了交往，婴儿就会产生愉快的心理，反之，则会产生孤单和疏离的不适感。

萨蒂逐渐将婴儿对于交往的内在需要视为婴儿确保生存的主要手段，并认为这是人性的核心所在。

如同费尔贝恩、科胡特和温尼科特一样，萨蒂也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性欲支配人性”的观点是毫无依据的，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毕竟，如果真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尚未充分发育的婴儿在刚刚出生之际对母亲的欲望都是色情化的，而且其在以后的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具有色情化特征，这似乎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情感体验。相反，萨蒂认为，一个人此后所有的行为方式——做游戏、合作、竞争以及追求文化兴趣和政治兴趣的方式，都是其在婴儿时

期与母亲的关系和情结的替代品。萨蒂说，通过这些替代品，我们用社会环境替代了母亲曾经的位置。

萨蒂与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存在分歧。他们认为人性就是谋求物质利益。相反，萨蒂和约翰·赫伊津哈等人则认为，做游戏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因为我们正是在游戏中学会了建立友谊、构建互信、锻炼想象力和培养创造力。做游戏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命中的孤独感，找回我们最初同生命中的原始玩伴（即我们的母亲）建立的那种友谊。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即“友谊与游戏对于婴儿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萨蒂指出：

> “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的这个时期被无穷无尽的社会需求主导着，并对游戏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些社会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温柔”是性冲动的一种轻微的升华，萨蒂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温柔是人类一出生就表现出来的一种特质，属于一种主要的人性力量。萨蒂的温柔观与科胡特的想法存在一定的交叉，因为科胡特认为温柔是同理心的一种表现，在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所有关系，甚至婴儿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控制对方。萨蒂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虽然一些婴儿成长为儿童之后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表现，但它只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关系，根源在于其第一个社会关系（即婴儿期同母亲的关系）缺乏温柔的情感交流。萨蒂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一个年龄非常小的婴儿在形成基本的自我意识之前，就能够在其同母亲的关系中觉察到权力的得与失，那简直是太荒谬了。这是因为：

> “婴儿最原始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是全能状态，也就是说，婴儿刚出生时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全能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婴儿能够将自己同母亲区别开来，而众所周知，在早期发育阶段，婴儿根本不具备这种区别能力。正如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婴儿在将自我同外界区别开之前，肯定不会产生权力意识，不会意识到利益、愿望的冲突，也不会意识到得失。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只会让婴儿产生愉悦感或不愉快，而不会让任何一方产生胜出或失败的

感觉。”

只有当母亲拒绝看护婴儿或拒绝婴儿表达情感或给予礼物时，婴儿才会产生焦虑和仇恨的情绪，并表现出进攻性（弗洛伊德错误地认为进攻性就是人类的主要本能），才会产生追求权力的欲望。

萨蒂认为，婴儿在之后的生活中会逐渐产生交换礼物的本能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还未完全成熟和确立。互惠是社交生活的核心，也是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互惠性遭遇障碍，那么自我意识和社会性的发展就会受阻，人们也会逐渐出现一些病态的表现。

最具社会性的动物

费尔贝恩、科胡特、温尼科特和萨蒂等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学家们认为，婴儿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是追求友谊和社会关系，而不是满足力比多。他们驳斥了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家们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也得出了与客体关系学派相同的结论。他们通常是独立开展研究的，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合作。他们在孤儿院或寄养家庭做了一系列对照实验，并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发现，印证了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

精神分析学家戴维·莱维对在母亲过分溺爱抚养下的婴儿很感兴趣。他做了一个对照实验，跟踪观察一批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亲关怀，后来又无法同养父母建立依恋纽带的孩子。这些孩子中，大多数在出生后的那几年里都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后来被人收养。这个对照组里的孩子很快吸引了莱维的注意，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令人惊恐的情况。这些孩子们由于在头几年没有同母亲建立亲密关系，长大之后往往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富有情感，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却非常冷漠，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真实情感可言。他们在性方面往往具有攻击性，经常会做出一些反社会性的举动，例如撒谎和偷窃。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与别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莱维认为这些孩子患上了“原始情感饥渴症”。由于没有与母亲形成有意义的关系，他们便无法表现出由这些关系催生出来的多种人类情感。因此，莱维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一个缺少情感生活的人，与一个正在发育但缺少关键营养元素的有机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

其他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在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构长大的孩子容易做出令人不安的举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洛蕾塔·本德发现这些孩子具有令人恐惧的反人类倾向。她写道：

> “他们不会做游戏，也无法与其他孩子一道做游戏，但却倾向于虐待其他孩子，喜欢紧紧地缠着成年人，与他人合作时经常发脾气。他们患有多动症，精力很容易分散，容易被人际关系彻底搞懵，在毁灭性的幻想世界里迷失自我。”

由于缺少母亲的关爱，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变态的人格。

这些公共机构实施的卫生标准也加剧了缺乏母性关怀所带来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卫生标准竟然声称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在第1章里讲过，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孤儿院为了避免疾病蔓延，对卫生状况的要求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为此，护士们不能触碰或拥抱婴儿，以免传播细菌或疾病。大多数婴儿的饮食都很好，护理员根本不需要触碰婴儿都能借助一些工具来喂养他们。但这些婴儿一个个无精打采。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孤儿院里，一两岁婴儿的死亡率居然从32%飙升到了75%。虽然饮食条件很好，环境也很清洁，但这些孩子们却大批大批地死去。他们往往被误诊为营养不良或医院内的交叉感染，结果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孩子是因为缺乏母亲的关怀，缺乏牢固的情感纽带，以至于失去了继续生活的意志力。

这些错误的喂养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机构的管理方式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却没有真正引起人们认真的反思。直到1931年，纽约贝尔维尤医院迎来了一位名叫哈里·巴克温的儿科主任，新生儿病房的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巴克温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的孤独》的论文，把婴儿死亡和情感饥渴联系到了一起。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描述特别生动，也特别令人伤感。他指出，这家医院对于隔离婴儿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了堪称悲剧的地步，甚至设计了一种具有进气阀和出气阀的育婴箱，还给护士们准备了套袖。婴儿被放在这个盒子里，护士几乎不需要接触婴儿就可以喂养和照顾他们。巴克温上任后，下令在儿科病房挂上这样的新标语，上面写着：“不抱孩子，就别进来。”此后，儿科病房的疾病感染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婴儿们开始茁壮地成长。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情感的缺失影响着孩子的智力发育及语言学习。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往往智商较低，甚至有些迟钝，而被人收养的孩子则智力水平正常。这些研究挑战了当时的正统观念，即“智商是遗传的”。

美国艾奥瓦大学儿童福利研究站的哈罗德·斯基尔斯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研究人员让弱智女童一对一地去看护13名来自孤儿院、年龄均不到两岁半的婴儿。19个月后，这些婴儿的平均智商从64提高到了92，这表明情感纽带在人类智商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比之前我们所想的还要大。此前，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认为个体的智商是遗传下来的，而现在这种观念似乎没有说服力了。儿童的智商是源于对情感、友谊和陪伴的内在需求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关于婴儿护理的研究越来越多，慢慢地改变了精神医学界对于人性的传统看法。但真正撼动这个领域根基的却是一部震撼人心、令人动情的影片。这部影片播出后，永远改变了人类对于护士应该如何护理婴儿以及父母应该如何养育子女的观念。

1947年，纽约医学院的一小部分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共同观看了一部简短的、制作业余的影片。这部影片的拍摄者是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施皮茨，影片名叫《悲伤：婴儿期的危险》。这是一部无声的黑白影片，片中多名婴儿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送到了育儿所和育婴之家这两种寄养机构。育儿所是一种隶属于刑事系统的特殊的婴儿照看场所，违法犯罪的妇女在这里生育孩子。在这里，所有的喂养、照看等任务都是由母亲自己完成。育婴之家则是一种普通的福利机构，主要是收养弃儿。育婴之家通常规定婴儿在刚到机构的3个月里需要母亲的照顾，3个月后，母亲便可以离开。离开母亲的婴儿们由护士照顾，平均每个护士要照顾7名甚至更多的婴儿。

影片中的第一名婴儿在母亲离开之后的3个月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名婴儿原本经常笑，咯咯地乐，还会与照顾她的成年人一起玩。但母亲离开后，仅仅过了7天，这名婴儿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孤苦伶仃，反应迟钝，时而莫名抽泣，时而还踢打护士，脸上写满了十足的恐惧。影片还展示了其他婴儿，他们看起来都茫然沮丧，完全没有精神。许多婴儿都表情憔悴，表现出一些模式化的行为，包括啃自己的手。有些孩子甚至不愿意坐或站，而是一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像一具空壳般完全没有精神。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字母卡片：“治疗办法：把妈

妈还给孩子。”

这部影片对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一些人当众落泪。随后的几年里，成千上万名专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医生和护士都会观看这部电影。有更多的人阅读施皮茨的著作《生命的第一年》。施皮茨改变了人们关于婴儿护理的长期争论，但是直到20多年以后，施皮茨那部影片的影响力才真正显现出来，儿科领域的绝大多数人才接受了他的育婴理念。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提出了一脉相承的“依恋理论”，并深入地解释了施皮茨等人的研究成果。1958～1960年，他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依恋理论”。其中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孩子与母亲关系的本质》，在精神分析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最终埋葬了弗洛伊德的人性观。

在客体关系理论，尤其是费尔贝恩的开拓性见解的基础上，鲍尔比提出，孩子出生之后与母亲建立的关系决定了他一生的情感和精神生活。跟费尔贝恩一样，鲍尔比也认为孩子的主要驱动力是寻求与他人建立关系。他在为爱因斯沃斯所著的《乌干达的婴儿：婴儿护理与爱的提升》一书作序时写道：

> “婴儿刚出生时，还无法分辨不同的人，事实上也几乎无法分辨人和物。然而，过一岁生日时，他很可能已经非常善于分辨人了，不仅能很快区分熟人和陌生人，而且也会选择一个或多个自己最喜欢的家人。当婴儿看到这些人时，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当他们离开时，婴儿会恋恋不舍地想追他们；而当他们不在身边时，婴儿会焦急地寻找他们。婴儿看不到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痛苦；当他们出现时，婴儿就会感到慰藉，具有安全感，似乎他的情感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他未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遭受风险。”

与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一样，鲍尔比也不赞成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动机的观点，人际关系相比对食物的渴望来说仅仅是次要的动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力比多。与其他理论家相比，鲍尔比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引入进化生物学来支撑客体关系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挑战和颠覆了当时仍然居于正统地位的弗洛伊德思想。

鲍尔比的理论受到了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的极大影响。早在1935年，洛伦茨就出版了关于鸟类社会行为的研究著作，总结了他对30多种鸟类的比较研究，阐述了“印刻作用”的概念。洛伦茨的观察为鲍尔比提出自己的人类依恋理论奠定了基础。洛伦茨在一篇题为《鸟类世界的伙伴》的文章中指出，在鸭子、天鹅等动物群体中，小鸭和幼鹅出生后会迅速地同它们的母亲建立情感纽带。鲍尔比对这个观点的印象非常深刻，并表示：

> “至少在某些鸟类和其他动物中，洛伦茨发现了动物在刚刚出生后就能同妈妈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与食物无关，只是简单地通过接触和逐渐熟悉建立。”

鲍尔比无意间发现，很多关于动物行为学的著作都证实了他对人类婴儿发育过程的观察。对于这些动物行为学家，他后来如此描述他的顿悟：

> “我突然顿悟到，他们都是一流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是出色的观察者，他们研究其他物种，这些物种的关系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显然十分相似。他们做得非常好。当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他们已经看到了灿烂的阳光。”

鲍尔比在1979年出版的《情感镣铐的形成与破坏》一书中坦诚地讲到了洛伦茨和其他动物学家对他的启发：

> “我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依恋理论，并指出如果从动物行为学模型去分析儿童与母亲情感关系发展的经验数据，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鲍尔比观察到，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存在依恋行为。一个不成熟的哺乳动物会依恋一个成熟的哺乳动物（往往是母亲），通常是为了获得保护，这与喂食行为和性行为有所不同。

虽然所有这一切似乎无可争议，但鲍尔比在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之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指出在哺乳动物中，依恋行为只是动物与母亲关系的一部分。除了依恋行为外，动物还会出现一个看似对立的行为。他

指出，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探索活动本身非常重要，能够使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对周围环境的特征获得一种连贯的了解，以后可能会对其延续生存起到重要作用。”鲍尔比指出：

> “儿童和其他幼小生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是出了名的，这往往导致他们离开自己依恋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活动与依恋行为是对立的。在健康的个体中，这两种行为通常交替发生。”

在动物世界中，那么多动物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依恋情结与探索欲望，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究竟是什么因素把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呢？对于这一点，鲍尔比提出了依恋与独立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了自己的人性理论。鲍尔比提出，足够好的父母会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基地”，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孩子去探索外部世界。

如果父母没有为孩子提供保护、关爱和情感，没有让孩子产生安全感，那么孩子就无法去独立地接触和探索外部世界，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与此同时，父母需要鼓励孩子接触和探索外部世界的内在欲望。正是这一微妙的过程决定了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和社交能力。鲍尔比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足够好的父母首先需要本能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孩子的依恋情结，并愿意去满足这种心理，只有这样，才能终结这种心理。其次，父母需要认识到，孩子产生愤怒情绪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渴求关爱的心理遭遇了挫败，孩子的焦虑反映出他们不确定父母是否会继续留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父母尊重孩子的依恋心理的同时，还要尊重孩子逐步探索如何与同龄人和其他成年人建立并拓展关系的欲望。依恋心理和探索欲望相互补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如果父母既能让孩子对自己形成“安全型依恋”，又能鼓励他独立地探索外部世界并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正确的平衡，那么孩子就能形成一种健康的自我意识，心理也会适度成熟，能够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关系。然而，如果父母既无法给孩子提供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也不能让孩子独立探索周围的世界，那么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就可能遭遇障碍，与他人的关系往往也会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

鲍尔比没有投入很多注意力去探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父母比

其他父母做得好。后来，对父母——子女关系动态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父母的同理心越强，他们越能从情感和认知角度对孩子产生认同感，越能读懂孩子的需要。反之，如果父母的同理心意识不成熟、不充分或存在缺陷，那么孩子的适应能力、信任能力与表达爱的能力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和独立意识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无法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心中没有一个连贯的父母形象或者根本没有父母形象，那么从生命伊始，孩子就无法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鲍尔比自己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和英国，超过1/2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父母的适当抚育，从而能够茁壮成长。然而，超过1/3的儿童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其成长过程中，父母无法及时回应他们渴望关爱的行为，或者经常贬低他们，或者完全拒绝他们的请求。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焦虑状态中。这就是鲍尔比所谓的“焦虑型依恋”，这一类型的依恋会引发一系列的病态行为——从神经质、恐惧症到精神错乱及反社会倾向。

孩子还会表现出鲍尔比所谓的“回避型依恋”，表现出强迫性的自我依赖行为倾向。这与焦虑型依恋恰恰相反。这类孩子不愿意追求难以捉摸的母爱，而是坚定沉着，竭力依赖自己，不需要别人的温暖和爱。这类孩子往往缺乏对密切关系的信任，在压力状态下容易走向崩溃，患抑郁症的概率很高。

鲍尔比强调说：“无论一个人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什么类型的依恋关系和自我意识，在其成年后都将保持相对稳定，并贯穿一生。”

换句话讲，孩子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的依恋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长大后的处世态度，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朋友、配偶和雇主。他们一生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与最初形成的依恋关系惊人的一致。

今天看来，鲍尔比的分析似乎相当普通，很好理解。但我们要知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儿科医生才开始注意到婴儿依恋类型的影响，并在育儿方式问题上改变给父母们的建议，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大陆的儿科医生才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改变了婴儿护理方式。

鲍尔比提出的理论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被接受的，也曾遭到了激烈的

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们都不愿放弃自己那种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人性观，坚持认为人类的驱动力就是满足物质追求和性欲。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依恋理论过度强调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对孩子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孩子天生的气质、性情与禀赋。

行为主义者同样不为所动，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婴儿在生理上存在渴望陪伴和友谊的基因。相反，他们是天生的白板，因为他们试图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来改变。因此，行为主义者对鲍尔比提出的依恋理论尤为不屑一顾。毕竟，他们坚信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过多的情感和照料会宠坏婴儿，削弱其未来行为的可塑性。华生给年轻母亲的建议是：

> “把他们（指婴儿）当作小大人来对待。在给他们穿衣服和洗澡时，要小心慎重。你的行为要保持客观中立，在温和中显示出威严。永远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如果一定要亲吻他们，那就在同他们说晚安时亲吻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要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困难的任务，只需轻轻地拍一下他们的头就可以了。”

即便一些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职业女性也很生气，认为鲍尔比企图将女性囚禁在“看孩子”的传统角色中。应该指出的是，鲍尔比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虽然他很快强调说，孩子在三岁之前需要得到稳定的照顾，但并没有说照顾孩子的人必须是母亲——也可以是父亲或其他亲戚，甚至可以是保姆。然而，他的这些告诫几乎无法压制他人的批评。

所有批评者都有一个共性。如果依恋心理果真如鲍尔比所说的那样，是先天决定的，那么他就要拿出基于科学实验的证据来证实其理论的有效性。这些批评者们在加拿大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科学证据。爱因斯沃斯与鲍尔比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爱因斯沃斯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起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严谨的实验数据，证明了鲍尔比的理论符合实际情况。爱因斯沃斯用4个尺度来评价母亲与孩子的相处方式，然后将母亲的行为方式与其孩子的反应进行对比分析。她预设的问题包括：母亲能敏锐地读懂孩子发出的信号吗？母亲接纳或拒绝婴儿吗？母亲在照顾孩子、陪孩子做游戏或喂孩子时，能满足孩子的愿

望和适应孩子的节奏吗？母亲是否愿意随时出现在孩子身边照顾孩子？还是说，母亲是否经常忽略孩子的需要呢？

爱因斯沃斯随后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来评估鲍尔比提出的观点。这就是她所说的“陌生情境”实验。她解释说，她的想法就是把母亲和孩子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里有玩具，以鼓励孩子的探索欲望。一个陌生人会进入这个环境，研究人员观察婴儿的反应。在某一个时间点，母亲会离开婴儿，留下婴儿和陌生人在一起。几分钟后，母亲再返回。研究人员观察婴儿对于母亲离开以及稍后归来的反应方式。然后，再设计第二个场景，让陌生人离开，让婴儿单独待在房间里，观察婴儿的压力在陌生人离开后是否会有所缓解。到最后，再设计一个让婴儿与其母亲再次团聚的情境，观察孩子的反应。爱因斯沃斯说她和她的同事们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体实验思路的设计。

这一系列研究支持了鲍尔比的观点，即安全依恋型的婴儿能够独立地探索世界，而非安全依恋型的婴儿在这方面则存在困难。爱因斯沃斯根据自己的观察，界定了三个迥然不同的亲子关系类型。第一类是安全依恋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母亲对婴儿关心、负责，婴儿也知道母亲的负责和亲切，视母亲为安全基地，在亲密关系中容易表现出快乐、自信和友善。当母亲在身边时，他会自行探索四周的环境，自己玩玩具，即便出现了陌生人，他也会表现出友善的态度。当母亲离开时可能会难过哭泣，当母亲回来时，孩子会很快地靠近母亲寻求安抚。第二类是回避依恋型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有时甚至会攻击母亲，尽管母亲离开时也会表现出伤心，但却对母亲的归来毫无兴趣。第三类是矛盾依恋型关系。在这类关系中，母亲对孩子的需要不是特别关心和敏感，孩子在家里比较黏人，总是提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且在妈妈离开后很焦虑，甚至开始大哭，别的成年人无法轻易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还害怕陌生环境，即便在母亲返回之后，也安慰不了他们。

在安全依恋型关系中，母亲更有可能经常抱孩子，抱的时间也更长，而且比较善于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对孩子的情感投入也更多。相反，在矛盾依恋型关系中，母亲更有可能经常拒绝孩子的需求，导致孩子形成比较任性和不可预期的行为习惯。

当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拥抱孩子，不应该给予孩子过多的照顾，以免他们变得太黏人、太依赖人而无法形成

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然而，爱因斯沃斯的研究给这种观念泼了一盆冷水，证明了真实情况与传统观念是截然相反的。越是安全依恋型的孩子，越是获得充分照顾、关注和情感投入的孩子，越有可能与母亲分开，独自去玩或去探索周围的世界。反之，那些安全依恋程度最低的孩子，反而最容易变得很黏人，或者最容易躲避别人、鼓励自己，无法形成独立意识。爱因斯沃斯强调，重要的不是母亲与孩子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相处的方式。理想的情况是，母亲在同孩子相处时，更多地展现自己的温柔和关爱，永远不要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当孩子希望得到拥抱时，母亲要深情地去拥抱孩子，这表明母亲注意到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心愿。

爱因斯沃斯后来又深入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增加了几个次级类别的亲子关系，进一步完善了她在安全依恋型关系、矛盾依恋型关系和回避依恋型关系上的理论体系。她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证明亲子关系的类型及其成因。

爱因斯沃斯所在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展了类似的陌生情境实验，进一步印证和加强了爱因斯沃斯最初的发现。明尼苏达大学的艾伦·索洛夫和拜伦·埃格兰对爱因斯沃斯陌生情境实验中的婴儿进行了持续跟踪，一直到成年期，结果发现，这些婴儿在多个人生阶段的行为方式与蹒跚学步时的初期评估具有高度一致性。（其实，鲍尔比的理论很早之前就做出了这种预测，而且多年之后爱因斯沃斯也通过对依恋类型的研究证实了鲍尔比的理论。）索洛夫与埃格兰的跟踪研究表明，安全依恋型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爱好社交，敏锐地体察他人需求，与同伴开展高度密切的合作以及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这些孩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度发达的同理心意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索洛夫的观点，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明白“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都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索洛夫无比动情地说：

> “如何让你的孩子具有同理心呢？不是通过教育和告诫，而是要用同理心去对待孩子。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只会来自于他经历过的关系。”

然而，尽管这些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却仍然有人始终不为所动。新兴的行为遗传学为批评者们提供了素材。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一对双胞胎进行了跟踪研究。这对双胞胎出生后不久便被分

开，在不同的家庭和环境中成长。研究结果似乎加强了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即在人类情绪的发展过程中，与环境因素相比，人类基因具有更大的作用。接连开展的一系列研究都发现，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情绪和行为模式上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这让鲍尔比的观点一时间疑云笼罩。但应该指出，鲍尔比和爱因斯沃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每个孩子都具有特定的内在规律和行为倾向，这些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依恋行为。比如，鲍尔比就曾经评论道：

> “一个容易相处的新生儿可以帮助一位性情不定的母亲形成良好的看护模式。相反，一个难以相处的、行为不可预测的新生儿也可能让一位性情稳定的母亲形成不良的看护模式。然而，所有证据都表明，一个容易相处的孩子如果得到了不良的照顾，依然有可能得不到良好的发展。反之，一个难以相处的孩子如果得到了母亲良好的照顾，是有可能得到良好发展的——这是比较幸运的情况。一个敏感的母亲能够适应一个难以相处的、行为不可预测的新生儿，从而使其得到良好发展，这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最令人振奋的发现。”

既然我们认识到了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都会影响到人类依恋行为和情绪发展状况，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其中一种因素比另一种的作用更大呢？阿姆斯特丹大学基础教育学教授迪芙·范·登·布姆就曾经开展过一项精妙的研究，以评估先天与后天因素在人类依恋行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当时，批评家们始终认为，出生后表现出易怒倾向的孩子在快满一岁时，不大可能与母亲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而更有可能形成焦虑依恋型关系。为了验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范·登·布姆研究了100名在出生时被诊断为存在易怒倾向的婴儿。这些婴儿不仅比那些爱笑的婴儿难以相处，而且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低，艰难的生活条件给他们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父母在照顾孩子时也不可能表现出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所需的那份耐心和冷静。

这100名婴儿和他们的母亲被平均分成了两组。在孩子出生后的第6~9个月，研究人员为其中一组的母亲们提供三次关于育儿方式的咨询会，每次2小时，目的是让这些母亲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需求，提高育儿效率。另外一组没有机会参加咨询会，也没有得到其他任

何形式的协助。咨询会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得到协助的那一组中，68%的孩子在满一岁时与母亲的关系被认定为“安全依恋型”，而在没有得到协助的对照组中，只有28%的孩子在满一岁时与母亲的关系被认定为“安全依恋型”。对照组的低成功率表明批评家们的观点具有正确性，易怒的孩子的确不大可能与母亲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然而，给母亲提供咨询机会却能将成功率提高到将近70%的水平，这凸显了后天因素对于儿童发育的重要意义。

《依恋》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伦指出，婴儿出生时，大脑还没有发育好，在前几个月会继续发育，婴儿与母亲的互动是影响其大脑发育的主要外部因素，婴儿的大脑环路就会形成固定的倾向，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下面这个结论：

> “婴儿的自我调节能力，尤其是在情绪方面的调节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同理心和情感协调。如果母亲无法与孩子形成情感共鸣，那么孩子大脑的生理机制可能会出现持久的缺陷。”

客体关系理论家为我们审视人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一种充满温情、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渴望陪伴与友谊，不喜欢被孤立，而且具有相互表达同理心的遗传倾向。

然而，在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中，只有人类能够对同类和异类表达同理心吗？在过去10年间，新的科学发现已经迫使我们彻底反思生物进化的本质。传统的进化论强调各个物种为了获得资源和繁衍后代而进行激烈竞争，而现在这种观点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至少它不符合哺乳动物的情况。新的研究发现，一些物种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除了体格健壮、竞争力强之外，高度的社会化以及同类之间的密切合作也同样十分重要。此外，人们已经发现，除了人类，至少还有其他几个物种也表现出了同理心，当它们发现同类遭遇不幸时，自身也会产生悲伤情绪。这一系列的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化行为的生物学根源，并开始影响我们对于周围生物世界以及人类在地球生命历史中的角色的看法。

这里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不仅仅是人类才具有表达同理心的能力。这一简单但却深刻的认识注定会改变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其他生物的看法，增强人类呵护地球这个共同家园的责任感。

第3章 从感知角度解读生物进化

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科学家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贾科莫·里佐拉蒂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猴子前额叶皮质F5区中的单神经元放电活动。该脑区内的部分神经元可以发出一些指令来控制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动作。结果他们发现，猴子捡花生的动作会引发其F5区内特定神经元的活动。让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有一天，当猴子看到一名研究人员做出捡花生的动作时，虽然它的肌肉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竟然也能够引发该特定神经元的活动。里佐拉蒂后来说：“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经过随后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当猴子剥开一个花生或听到其他人剥开花生的声音时，它的某些神经细胞就会“燃烧”。

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人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当人们观察他人的手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时，与猴子一样，包括前额叶皮质（类似于猴脑的F5区）在内的某个脑区的神经元就会产生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与他们本人做出手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时的活动一模一样。

直到几年后，研究人员才最终明白了他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让镜像神经元告诉你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1996年，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立即在全球科学界引发了海啸般的巨大轰动。他们把自己发现的那种特定的神经细胞命名为“镜像神经元”。之后，科学家在里佐拉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也存在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使人类与其他动物能够捕捉和理解其他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似乎这就是他们自身的想法和行为。一些大众科学刊物将镜像神经元称为“同理心神经元”。里佐拉蒂说：“最令人吃惊的是，镜像神经元使

我们能够通过直接模仿，而不是通过概念推理就能捕捉到他人的思想，也就是说，靠感觉，而不是靠思考。”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迫使生物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开始重新思考笛卡儿提出的身心关系理论，因为他的理论认为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意识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推理能力是一种独立的、无形的力量，有别于人体的感觉、情感和情绪。

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教授亚瑟·格伦伯格在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新发现“提供了一个可以取代笛卡儿二元论的选择”，暗示着重新反思人类意识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他指出，

>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神经机制，既能够解释心理学理论，也能够为认知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此有助于弥合认知科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鸿沟。”

我们早就知道，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属于“社会性动物”，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我们探索社会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第七感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临床精神医学教授丹尼尔·西格尔博士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其他脑区，如脑岛、颞上回、前额叶皮质中区共同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共鸣环路”。他指出：

> “共鸣环路已被证实不仅能控制人类意图，对同理心的形成起着基础作用，还会引起情感共鸣，这是个体之间情感协调一致的结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镜像神经元的主要研究人员马尔科·亚科博尼博士解释了这类神经元在我们解读他人思想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 “如果你看到我站在本垒处击球，因为三击不中、面临出局而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时，那么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就会模拟我的苦恼。你知道我的感觉，因为你几乎可以获得与我一模一样的感觉。”

亚科博尼和其他科学家想阐述的就是人类具有表达同理心的生理基

础，这是我们的天性，使我们具有社会性。

人们对镜像神经元在同理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实验性研究，结果令人振奋，改变了人类对生物进化的看法。

科学家们发现，不仅看到别人的动作和表情以及听觉上的刺激会激活镜像神经元，触觉上的刺激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为拓展同理心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看到一个蜘蛛或一条蛇爬到其他人身上时，自己也会吓得直打哆嗦，仿佛它们在自己身上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参与者脑部神经元的反应，结果发现，当参与者被触摸或者看到他人被触摸时，其脑部的次级体感皮质区会被激活。

其他的研究表明，当人们闻到臭味而产生厌恶感时，也会激活一些相同的皮质区，尤其是脑岛。当我们看到别人因为闻到臭味而出现厌恶表情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

同样地，当我们说“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时，实际上是某些镜像神经元在驱使我们那样做。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曾经发表了一份关于16对夫妻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确定这些夫妻的婚姻状况都是良好的。在这项研究中，妻子被放在核磁共振机器中，她们的丈夫站在机器附近。妻子们被告知她们和丈夫的手背将会受到短暂的、温和的电击。虽然妻子看不到自己的丈夫，却可以通过一个指示器了解到接下来谁会被电击以及电击强度如何。结果表明，无论是直接电击她们，还是她们想象着自己的丈夫被电击，她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内部可感知疼痛的区域（包括前扣带脑皮质、丘脑和脑岛）都会被反复激活，给她们带来痛苦。这个实验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证明了人类的确可以通过同理心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即便是更复杂的、社会化的情绪，比如羞愧、尴尬、内疚和骄傲，也都与大脑脑岛内部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有联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克里斯蒂安·凯泽斯博士曾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让参与者观察一个人伸出手去抚摸他人，后来却突然被另一个人粗暴地推开。有趣的是，参与者的镜像神经元也被激活了，他们也能体验到被拒绝的感觉。

在几乎所有镜像神经元的激活研究中，研究人员都发现，在同理心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参与者，其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这个发现很重要，

因为它表明虽然儿童的正常大脑活动具有同理心倾向，但镜像神经元被激活的程度则既取决于先天因素，也取决于后天因素。

相反，研究人员发现，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镜像神经元环路要么完全无法发挥作用，要么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已经崩溃了。自闭症儿童的特点是无法读懂他人的意图，无法表达情感，无法学习语言，无法做出亲社会行为，也无法表达同理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脑成像研究表明，一个孩子无法模仿别人的面部表情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缺乏活性具有明显联系。该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系副教授米雷拉·达普雷托在其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闭症患者之所以在模仿他人、理解他人情感方面存在障碍，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失调。"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其潜在影响同样也让那些处在认知科学前沿的研究人员兴奋不已。不过，他们却谨慎地提醒，这些新发现只是探索认知机制的开端。他们发现人体的生物环路会被社会经历激活。换句话讲，父母的养育方式和社区环境会激活孩子的镜像神经元环路，在他们的大脑内部建立同理心通路。这些发现让我们重新反思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使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长期以来，尽管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等人呼吁找到生物学与人类文化的共同之处并将其融合，但人们一直认为它们运行在不同的轨道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笛卡儿的二元论，还表明将生物学和文化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认为：

> "镜像神经元为文化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牢固的生物学基础。现在，我们看到镜像神经元直接吸收了文化，使一个人可以通过社群共享、模仿和观察将文化传授给下一代。"

我们曾经认为只有人类是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进化的，而其他动物都被其生物机理所束缚。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认为，人类通过教育下一代来传递文化资本，而其他动物也是通过精确严密的、预先确定的行为模式传播自己的文化资本。这些行为模式通常被

称为本能。即便近些年来，对于大多数生物学家而言，其他动物也会教育下一代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

如今我们知道，很多物种的行为既是继承下来的，也是后天习得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我们曾经认为大雁之所以每年都会迁徙到南方某个具体的目的地，是由它们的基因决定的。而现在我们知道，大雁必须把具体迁徙路线教给下一代。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的一份实验报告显示，黑猩猩将新学到的技能教给其他黑猩猩，实际上这就相当于通过文化传播确立了一套新的行为模式。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两种从容器中取食物的方法分别教给两只黑猩猩，之后让它们回到各自的群体，并开始使用新学到的本领。其他黑猩猩观察它们学到了什么，也开始纷纷尝试着使用了。2个月后，两组黑猩猩仍然使用着新本领。新本领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生物学家们发现，在动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具有社会性、能给幼体哺乳的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往往存在一套完整的、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式。这就意味着很多动物至少存在一种基本的文化模式。对于它们而言，在世界上的行为方式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下面，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几年前，动物学家们在南非一家动物园注意到，正处于青春期的大象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奇怪的改变——它们开始欺负犀牛和其他动物，甚至杀死它们，这种现象之前从未出现过。科学家们对这些大象的怪异行为感到非常困惑，却又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后来，一个动物学家回想起在几年之前，为了缓解动物园的拥挤状况，他们剔除了年长的雄性大象。他们推断这可能与大象目前的怪异行为有关，但不确定真实情况是否如此。然而，他们还是决定往动物园空运两头年龄较大的雄性成年大象。短短几周之内，那些处在青春期的大象便停止了反社会的行为，开始模仿年长的雄性大象的行为。动物学家观察到年轻的大象倾向于向年老的大象学习。在这一点上，年轻大象跟人类的孩子是一样的。年老的大象作为行为榜样，可以教年轻的大象学会得体的社会行为。如果失去榜样的力量，这些年轻的大象就会无所适从。

人类和灵长类动物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为我们了解生物学与心理

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称，镜像神经元系统使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成为可能，人类在发现这一生物机制以及激活镜像神经元的文化催化剂之后，就能够逐渐开始理解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的互动方式，理解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他指出，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心理学的思考方式，就像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生物学一样。

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相信，除了灵长类动物之外，其他许多动物可能也有基本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大象、海豚、狗和其他社会性动物很有可能具有这种生物机制，能够表达出一些原始的同理心。大象和海豚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它们像黑猩猩一样具有自我意识。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要读懂另一种生物的情感和意图，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是必需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识，它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科学家们为了检验动物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设计了“镜子测试”，而黑猩猩能顺利通过测试。例如，如果在黑猩猩的额头涂上一个口红印记，然后把它带到一面镜子前，那么它就会检查和触摸这个印记，并试图将其抹去——这表明它知道镜子中的那个黑猩猩就是自己。

最近，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和亚特兰大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实验表明，大象也能通过“镜子测试”。研究人员在一头名为“哈皮”的大象的左脸颊上涂了一个白色的X形标记。当这头大象站在镜子前面时，反复用自己的鼻子去蹭那个标记。这个动作需要大象明白那个白色标记不是在镜子中，而是在自己身上。另外一头名叫“玛克辛”的大象利用镜子来检查自己嘴巴和耳朵的内部。这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动物园的饲养员们在这个实验之前从没有目睹过此类举动。

大象也会表现出具有同理心的行为。杰弗里·马森在《哭泣的大象》一书中讲述了一头大象试图拯救一头小犀牛的故事。这头小犀牛被困在了盐碱地的泥沼里，一头成年大象走近这头小犀牛，轻轻地把鼻子伸向了它，然后，大象跪了下去，把长长的象牙放到犀牛腹部下面，试图把它从泥沼中拉出来。但小犀牛的妈妈看到这一幕后，向大象发起了攻击，大象不得不后撤。大象又反复尝试了几次，试图解救小犀牛，但都遭到了犀牛妈妈的拒绝，最后大象只能选择离开。对于大象的行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同理心意识。大象意识到小犀牛处于困境，便决定前去搭救。

科学家猜测海豚可能也具有自我意识，而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则无法识别自我。当它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图像就是自己。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种动物通过了“镜子测试”，人类也只在少数几种动物的大脑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大多数物种还没有被纳入研究范围，但许多动物的行为表明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懂得一些“心智理论”。

哈佛大学的布莱恩·黑尔和德国马普学会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迈克尔·托马塞洛联合开展的实验表明，当一个人指着某样东西时（如“食物在这下面！”），家犬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一个人指向一个物体时，另一个人知道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但对于犬类而言，要做同样的事情，就需要明白人类那个动作背后的真实意义，而不只是手与胳膊的动作。换句话讲，犬类需要读懂人类动作背后的真实意图。

有些动物甚至能理解“公平”的概念。要做到这一点，动物需要具有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能够辨别自己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埃默里大学人类学家莎拉·布罗斯南曾经协调开展过几个相关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教猴子用“代币”换食物。如果猴子看见其同伴用一个代币换到了令人垂涎的葡萄，而它自己只换到了一根普普通通的黄瓜，那么它往往会拒绝参与交换，因为它意识到了这种交易并不公平。

鲜为人知的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通过对动物的深入观察，预料到了认知科学近年来出现的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社会性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这部晚期著作中，他注意到了大多数动物的社会性，甚至它们的情感和道德责任感。关于它们的社会性质，达尔文写道：

> “每个人肯定都注意到了马、狗、羊被迫与它们的同伴分开时有多么痛苦，以及它们和同伴团聚时彼此之间表现出的情感有多么强烈。”

达尔文还注意到了动物之间的互助行为。他说，社会性动物会相互帮忙。马和牛会通过咬和舔的方式帮同类理毛，猴子会帮同类寻找身体上的寄生虫。

其他生物的幽默感尤其令达尔文惊讶。他观察到：

> “狗的某些表现或许应该被解释为幽默感，而不是单纯的玩耍。如果你给它扔过去一个木棍或其他东西，它就会先叼着走一段距离，然后蹲下来，把东西放到自己面前，等着主人过来。而当主人快走到它跟前时，它又会叼起来跑开，像个胜利者一样。它会重复这个动作，显然很喜欢这种恶作剧。”

达尔文认为人性是野蛮残忍的，大自然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战场。但其实这过于夸张。实际上，达尔文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温和、微妙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比较复杂的情绪往往常见于高等动物和人类自身”。（目前，人们之所以对达尔文的思想存在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错，因为斯宾塞为了适应自己的社会议题，大范围地扭曲了达尔文的理论，制造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晚年，达尔文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待物种进化，这与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许多高等动物是社会性动物，充满情感，而且天生就有能力和处于困境的同伴们守望相助。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尔文对于动物拓展同理心的评论。达尔文的生活经历中，有一只小狗和小猫是很好的朋友，小猫生病了躺在篮子里，小狗每次经过时都会用舌头轻轻地舔几下小猫，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善意。达尔文说，很多动物会对其他遭遇痛苦或危险的个体表示同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尔文花了更多的时间描述生物之间的社会性，甚至是深刻的情结。达尔文相信适者生存之道既需要竞争，同样也需要合作、共生和互利。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往往是最富有合作精神的物种。所有达尔文的观点可能会让那些传统进化论者感到非常惊讶。

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似乎为当时功利主义者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找到了生物学的解释，但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却挑战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当时其他一些功利主义思想家，指出人类的冲动并不仅仅来自于预期的快乐。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尔文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子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急急忙忙地拯救一位深陷

火灾的陌生人，却不计较任何功利的回报。达尔文说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更为深刻的人性冲动——人类的“社会本能”，而不是源自于追求快乐。

达尔文生活的那个年代，心理学意识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同理心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他却独具慧眼地预料到了同理心的重要性。在那个男子救人时，本能地感觉到了被困者的挣扎，仿佛自己被困一样，所以迫不及待地前去搭救。这就是达尔文说的“社会本能”。

《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有一段话很有先见之明——在未来某个时代，人类的社会本能和交感神经冲动会逐渐变得更温和，范围更广，最终覆盖所有具备感知能力的物种。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达尔文在深思后写道：

> “一旦这种美德得到少数人的尊重和践行，就会通过教导和榜样传给年轻人，最终会成为民意的一部分。”

游戏与人类进化

今天的认知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达尔文对人性的直觉看法，在此过程中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看法。他们发现，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某些方面，许多其他哺乳动物都表现出了与人类非常相似的行为方式。社会性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往往都能读懂后代及同伴的情感和意图，具备一些基本的同理心意识，从而能够哺育后代，与同伴建立情感。

现在，许多动物学家认为“游戏”在动物形成同理心以及建立亲社会行为模式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和人类是相似相通的。在共同游戏中，动物们会产生依恋感、专注力、信任、情感和社会联系，进入成年期之后，游戏也是维持社会性的一种手段。

如果失去了游戏的机会，幼小的动物们往往无法形成社交技能，长大以后也无法以合适的方式在群体中生活。比如，很多饲养员都发现，如果一匹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与同伴共同游戏过，那么它经常表现出不合适的社交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成年以后也无法得到马群的完全接纳。

马科动物繁殖专家卡伦·海耶斯博士指出，和人类婴儿一样，小马驹与它们的母亲建立依恋关系后，便开始同其他的马一起游戏。海耶斯说：“如果马没有学会社交技巧，它们未来的生活注定会充斥着困惑与压力。”

华盛顿州立大学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指出，所有幼小的动物都渴望游戏。他在《情感神经科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哺乳动物都存在如同人类那种能够产生游戏冲动、激发快乐的大脑回路。

游戏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鲜明特点。譬如，美国医生、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写道：“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游戏发挥着基础作用，其他任何行为都无法与之相比。”麦克莱恩认为，游戏有助于人们培养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并促进人类责任意识和亲善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协调，通过游戏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促进人类同理心的发展。

要理解游戏在同理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先退一步，看一看游戏过程的基本特征。首先，这个过程需要各方的深度参与，是一个身体体验的过程。如果我们认为游戏是一个人通过想象就能完成的，那么这纯属幻想。游戏在更大程度上是“众乐乐”，而不是“独乐乐”。游戏很少带有工具色彩，人们很少会带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去游戏，游戏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游戏环境的内在特征。在游戏过程中，虽然参与者的某些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但所有参与者都感觉轻松自在，愿意敞开心扉地袒露心声，整个过程弥漫着宽容的气氛。人们在一起游戏时，往往会为自己之前的伪装而坦白，可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游戏过程往往是开放的，没有限制。每一个曾全身心地投入游戏而忘记时间的人都知道，游戏过程往往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游戏的地点往往也不同于工具色彩明显的地方。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用来游戏的“操场”往往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安全场所——不是被某个人拥有或占有的，而是一个能够让人放下伪装的地方，一个让人暂时放松的地方。

因此，虽然游戏行为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但其给人们带来的体验却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这种体验能够超越人类的感觉和思考，既

有世俗性，又能带来超凡脱俗的感觉。

游戏环境为人类培养同理心提供了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锻炼想象力，去想象他人的性格、角色和处境，然后努力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感知、思考和行动。当小女孩和小男孩一起玩“过家家”时，有人当“妈妈”“爸爸”“哥哥”“姐姐”，有人模仿他们的老师，还有人模仿美国总统，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练习如何拓展自己的同理心。

如果没有游戏，很难想象人类如何才能形成同理心。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甚至将人类称为“游戏人”。赫伊津哈提出，所有文化都是在游戏中形成的，人类社会正是在游戏过程中，逐渐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解读。

20世纪早期，苏联伟大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曾提醒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创建虚构情境可以被视为发展抽象思维的一种手段。比如，当一个孩子想象自己骑着一匹马时，他会抓住一块木头，把它放在双腿中间，吆喝着在街上奔跑。木头变成了一匹虚构的马，为孩子创造了一种模拟体验。同样地，当孩子们扮演医生和护士，并把空心罐当成听诊器放到对方胸口上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让想象力为他们打开一扇探索他人状态的窗户。通过游戏，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形成和增强同理心意识。维果茨基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高水平的活动。可以说，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游戏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化的有力工具，根源就在于它释放了人类的想象力。在游戏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替代性的现实”，并沉浸其中。我们变成了探索者，去探索他人的状态。这些状态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将这些想象中的体验融入现实，构建起彼此之间的联系。

想象过程能够让我们将自己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抽象思维汇集成一个整体，即同理心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想象力既具有情感色彩，也具有认知功能，使我们能够同时表达情感和创造抽象思维。

许多哲学家认为游戏是人类发展的最高表现。在1795年出版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席勒认为，人生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游戏；

只有当人做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我们出于对人类交流的热爱而同其他人做游戏。游戏是需要深度参与的行为，需要集体信任。每个参与者都会暂时放下防御的面具，沉溺于游戏中，关心他人，从而体验沟通带来的喜悦。

自由和游戏也有共同点。真正的游戏往往是自愿参与的，一个人在被强迫的状态下不可能愉快地游戏。人们总是出于对游戏的热爱而自由地参与游戏。我们参与游戏的目标是获得快乐，并重申求生的本能。从文化范畴上讲，人类正是通过游戏体验才学会了与同伴平等开放地相处。我们陶醉其中，并彼此欣赏。人类如果无法完全自由地参与游戏，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说：“当人类理解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利用其自由时，他的活动是去做游戏。”难道还有比做游戏更让人感觉自由的事情吗？

因此，做游戏绝对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追求。通过游戏，我们能够拓展同理心意识，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

语言的同理心根源

人类对于镜像神经元和游戏在社会技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取得的新认识，引发了人们对于探索语言的由来与发展的兴趣。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一种内在的、自发的生物机制，近年来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也坚持这种观点。但现在，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新一代神经认知科学家的挑战。

南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阿尔比布提出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假说”，认为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灵长类祖先具有一种能够使其模拟手部动作的神经机制。他认为，人类语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最初只是手部动作，之后演变成较为复杂的哑剧，在哑剧中，人们不仅仅是在操纵一个物体，而是开始了真正的交流。之后，哑剧又进化成“原手语”。所有这些都提高了人类的交流能力，为“原话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动物行为学家为了弄明白语言的演变历程，开始研究我们的近亲——类人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这其中既有在野外环境中的研究，也有

在实验室环境中的研究。他们猜测语言实际上可能是用于表达同理心和相互交流的一种高级机制，灵长类动物通过做游戏和理毛行为促进了手部动作的演变，最终形成了这种机制。

从很多方面来讲，灵长类动物都与人类具有相似之处，只是生命形态较为原始。观察黑猩猩特别有趣，因为它们的行为与人类两三岁婴儿的行为非常相似。如同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黑猩猩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也具有等级制度的特征。虽然它们无法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概念表述，但它们的确具有一种基本的文化。它们教会年轻的黑猩猩使用工具，从事互利性的活动，在游戏中合作与竞争，学会相互容纳，表达多种情感，形成原始形态的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是，相互表达同理心。关于最后一点，在数十年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都认为，黑猩猩之所以更具社交属性，根源在于它们初步形成了同理心。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深刻地指出：

> “（灵长类动物的）同理心是语言产生之前，不同个体的原始联系方式，语言和文化产生后，才成为次要的联系方式。”

同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美国动物学家戴安·弗西等灵长类动物学家一样，德瓦尔博士也认为“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交流是情感驱动的结果”。

德瓦尔博士指出，自然选择所催生的机制一定是有利于个体读懂其他个体的情感和意图的，以便做出相应的回应，并建立合作关系，巩固社会团结。毕竟，交流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同理心就是这样一个交流机制。换句话讲，表达同理心是促进交流的生物学途径，对于一些进化程度较高的哺乳动物而言更是如此。

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其他动物，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同理心也是随着进化过程而缓慢发展的。比如，在半个世纪前开展的一项经典研究中，一只白鼠已经学会通过按压杠杆获得食物，但如果每按压一次，它视线内的一个同伴就遭到一次电击，那么它就会停止按压杠杆的动作，这是因为它具有同理心意识，能体验到同伴遭到电击时的痛苦，就像它自己遭到了电击一样。后来，研究人员对恒河猴开展的类似实验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只不过猴子的情感反应更为持久，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看

到同伴因为自己按压杠杆而遭到电击，一只猴子连续5天没有按压杠杆，另一只猴子则连续12天没有按压杠杆。这些猴子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不愿给同伴造成痛苦。如果说白鼠和恒河猴没有同理心，那么它们的行为就十分令人费解了。

人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动物对同类表现出同理心，但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无数只动物对其他种类的动物表现出同理心的案例，比如，我们在前面列举的那个大象拯救犀牛的故事。

德瓦尔博士讲述过一只名叫库尼的倭黑猩猩解救北椋鸟的案例。这只猩猩卷起北椋鸟，爬上一棵树，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的翅膀展开，将其抛向墙外。小鸟掉入了一个沟里，而猩猩则走过去守护它。德瓦尔指出，如果库尼无法从这只鸟的视角看问题，就无法理解小鸟的困境，也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德瓦尔解释说：

> “库尼的做法肯定不适用于同类。它曾经多次看到过鸟儿飞翔的情景，似乎知道怎么做才是对一只小鸟好，便表现出了如同类人猿那样的同理心。”

灵长类动物学家们还注意到，黑猩猩具有安慰的能力，这种情绪化的行为需要黑猩猩具有相当发达的同理心意识和交流能力。在黑猩猩群体中，两只黑猩猩发生冲突后，第三方介入调停、安慰受害方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恒河猴和其他种类的猴子则并没有这么发达的情感。虽然研究人员记录了多种动物在冲突后的和解案例，但安慰却不同于和解。德瓦尔指出，和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自我利益以及恢复社会和谐的愿望驱使的，而安慰则纯粹是一种同理心驱动的行为，只是认识到了其他个体的痛苦并加以安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图。科学家指出，黑猩猩之所以具备安慰能力，是因为它们能表现出自我意识，毕竟它们能轻而易举地通过“镜子测试”识别出自己，更能够将自己同其他个体区别开来。这就使它们能够安慰其他个体，意识到自己能根据其他个体的具体困境而表现出相应的情感。恒河猴在这方面的能力要逊色得多。

在黑猩猩的生活中，与安慰行为同样重要的是感激行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感激。黑猩猩往往将食物作为礼物赠送给帮助自己理毛的同伴。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理毛行为是黑猩猩群体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占据了黑猩猩大部分的清

醒时间。德瓦尔的一份实验报告指出，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黑猩猩群出现了数百次理毛行为。中午，每一只给予帮助的黑猩猩得到了两捆树叶和树枝——这是它们之前“服务”过的黑猩猩送来的食物。此后，研究人员记录了近7 000次食物交换行为。他们发现，黑猩猩更倾向于同那些帮助过它们的黑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德瓦尔强调说，从理毛行为到分享食物，中间隔了很长时间，这意味着黑猩猩会记住同伴给予的善意帮助，并通过分享食物来表达感激。感激行为将黑猩猩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社会关系。

理毛行为不仅仅对于诱发感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动物行为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相信，它对于在大脑中形成同理心回路以及手部动作、原手语，再到原始语言，最后到人类现在使用的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了沟通方式的演变，而沟通方式的演变又为个体读懂其他个体的情感，理解其他个体的意图以及在同理心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

如同做游戏一样，理毛行为也会催生社会情结，因为社会性动物所构建的社会制度安排往往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而游戏和理毛行为却为弱化个体差异、消除身份障碍创造了天时地利，使不同个体能够在更加密切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系。某些动物每天都会把20%以上的时间投入到理毛行为上。

游戏和理毛行为都有助于促进同理心的形成和更深层次的沟通。然而，游戏通常是一个集体行为，而理毛行为往往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在理毛过程中，两个参与者运用各种感官去探索对方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帮其他个体理毛时，理毛一方需要理解对方的需要和感受，必须明白什么样的动作会给对方造成痛苦以及什么样的动作会让对方感觉舒服。接受理毛服务的一方必须能够以理毛的一方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比如可以通过发出轻柔的声音、做出某个剧烈的动作、轻轻地推一下，或者依偎等方式。对于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而言，理毛行为是一种比性接触还要亲密的交流方式，也是动物们了解对方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途径。动物们对于理毛的体验最早来自父母的护理和喂养。与游戏一样，这也有助于让动物们学会相互交流。理毛行为会刺激动物机体分泌内啡肽，这种物质具有麻醉阵痛的作用，能够让动物放松下来，堪称“天然鸦片”。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理毛行为会促使动物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

如果理毛行为如同游戏一样，也是社会性动物之间最基本的交流形式，那么它和人类语言的起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生物进化领域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谜团。

英国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在1996年出版的《理毛、闲谈及语言演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但却颇具争议的观点。他首先提出，理毛行为是动物培养亲密关系、信任关系和社会技能的必要机制，然后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生物现象——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哺乳动物的大脑内新皮质的大小决定了动物群体的规模。新皮质是大脑的一部分，负责认知和有意识的思考等更高级的功能。他发现，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新皮质在脑容量中所占比重大约为30%～40%，而在灵长类动物中，这个比重则从50%（原猴亚目）上涨到80%（人类）。

事实证明，动物新皮质的大小与其群体规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种动物而言，新皮质在脑容量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类动物形成的群体往往也会越大。邓巴推测的原因是社会性动物需要不断地跟踪对方的情感，需要开展互动，以便适应彼此的需要和情绪，并保持适当的群体凝聚力。

动物的新皮质越大，就越有能力组织更多个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新皮质是最大的，相应地，人类群体的规模往往也是最大的。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氏族通常约为150人。比氏族大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牧群，通常约为500人。最大的组织形式——部落，人数通常为1 500～2 000人，部落成员通过统一的语言或方言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看看人类最亲密的“亲戚”——灵长类动物，再进一步看看其他哺乳动物，就会发现群体规模与动物用于理毛行为的时间直接相关，因为理毛行为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有助于动物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和团体凝聚力。如前所述，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每天将多达20%的时间用于理毛，而其所生活的群体只有大约40～50个成员。科学家们研究了当今人类社会一些依靠狩猎和采集谋生的社会群体，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每天平均将大约25%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这与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每天用于理毛的时间大致相当。但如果人类生活在成员多达150人的氏族，就意味着人们每天至少要将40%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才能维持社会的凝聚力。因此，邓巴推测，当人类群体的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类需要每天将30%多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时，狩猎、采集等生存

活动所需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这时，人类便自然而然地需要更加便捷的口头交流方式来维系扩大了的社会关系。邓巴认为语言开始于闲谈，这是人类以有声的方式进行社会交流、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

口头语言以及之后的文字传播、印刷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并生活在一种更加密集、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无论是猿类时期的理毛行为，还是现代社会的互联网闲聊——交流的首要任务都是扩大同理心发挥的作用范围，这样就可以表达我们的社会性，和对友谊的深切渴望。

理解游戏和理毛行为在人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反思人性的本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动物行为学家们曾经认为游戏的作用是为了增强雄性动物本能的竞争力，使其在狩猎和战斗中获得更大利益，以及为了增强雌性动物看护幼崽的能力。这类观点强调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功能。相似地，长期以来，动物学家们还猜测理毛行为主要是为了让动物个体和群体保持身体卫生与健康。今天，尽管动物行为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不否认这些实用功能，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理毛行为促使动物建立社会纽带的功能更为重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戏和理毛行为的首要功能，是帮助动物了解彼此的感受、情绪、意图和愿望，以及建立社会关系。这些新观念引发了人类对于语言起源的新辩论。研究人员指出，通过游戏和理毛行为，动物体验了身体上的交流，因此有理论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肢体动作。

阿尔比布认为，生物进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先天语言能力的大脑”，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个大脑，儿童才能在一种语言环境中逐渐掌握这门语言，但语言本身的发展是文化因素驱动的。换句话说，一个孩子之所以在两岁时就能开口说话，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掌握了语法，而是因为他经历了前几个阶段的肢体交流，同理心不断拓展。婴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掌握比前一个阶段更为复杂的肢体交流方式，这些新的交流方式刺激着婴儿的镜像神经元，逐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精密的共鸣环路，从而为婴儿掌握最复杂的交流方式——语言交流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同理心意识的成熟。这就是说，我们的说话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同理心拓展和文化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日益复杂的肢体交流而最终掌握的。

芝加哥大学的语言学和心理学教授戴维·麦克尼尔认为，手势和语言是共同发展的。他在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手与心》中提出，“如同单词、短语和句子一样，手势也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手势和语言是一个系统”。

我们仍然保留着早期的手势交流方式。在我们的一生中，语言交流往往伴随着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它们提供了视觉上的细微差别，丰富、制约并修饰着我们的话语。它们让我们的交流呈现出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帮助别人解读我们的真正意图。因此，在表达人类意图方面，这些非语言要素与语音、语调同样重要。

“语言源于手部动作”的说法似乎为“交流源于游戏和理毛行为”的说法平添了几分可信度。在理毛过程中，灵长类动物用双手探索其他个体的情感、情绪、需要和欲望，并做出相应的反应。理毛一方的双手变成了亲密的交流语言，不断感知对方的身体反应和面部动作，并不断地调整。也就是说，双手变成了一种感官，触摸变成了表达同理心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不难想象，为了表达身体的感觉和意图，并拓展同理心，理毛过程可能会逐渐演变成更抽象的哑剧，继而演变成使用符号的原手语。

迈克尔·阿尔比布等人认为，如果没有运行良好的镜像神经元系统，语言就不可能产生，我们将无法学会如何解读他人的思想，也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将无法沟通。对于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儿童来讲，镜像神经元系统往往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镜像神经元缺失，而镜像神经元又是形成完善的同理心所需的基本要素。因此，他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无法了解别人，也无法向他人学习。

阿尔比布关于人类语言演变以及其他生物学新发现、新观点的论述让我们从情感、认知，甚至交流的视角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人类的进化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人类与哺乳动物的共同历史比之前想象的还要丰富多彩。我们现在知道，哺乳动物有自己的感受，会做游戏，会教他们的下一代，会表达情感，而且至少部分哺乳动物具有基本的文化，会表达原始的同理心，能够感受到其他个体的痛苦。

我们还发现，某些动物竟然像人类那样具有“家族精神”。忽然之间，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孤独感不再如此极端强烈了。我们已经向遥远

的宇宙发送了无线电通信信号，以寻找某种有同情心的智能生命，结果却发现我们苦苦寻找的智能生命竟然与人类一样存在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一发现不仅催生了人类对这些同伴的新认识，还推动着人类形成“生物圈意识”。

研究人员近年来发现，许多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有同理心，也会感受到其他个体的痛苦，这就为探索先天与后天因素在“社会人”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他们对于儿童发育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于人之内涵的最基本思考。

第4章 成为人类

纵观历史，父母并不总是以同一种方式看待自己的孩子。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结束之际，或许会直视新生儿的眼睛，看看是否有魔鬼潜伏在深处，伺机缠住孩子。如今，在公元第三个千年伊始，父母更有可能去仔细观察孩子的内心，寻找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和社交性。这并不是说父母期望孩子成长为像圣雄甘地或者纳尔逊·曼德拉，再或者是马丁·路德·金那样的伟人。父母只是希望子女能更多地像他们自己，而不是长成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所有这一切都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大多数人既非圣贤也非魔鬼，但是我们期待彼此有亲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反社会的举动。这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情感和体贴，而不是疏远和憎恨。厌世者总归特例，在任何一种文化里都是如此。

如今，新一代的心理学家、发育生物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儿科研究人员正在深入探究人类发展的复杂路径，并准确描述了同理心表达在促使我们完全成长为人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类意识发展的六个层次

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斯坦利·格林斯潘博士给我们讲解了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而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丁·霍夫曼博士则解释了在通往人类自我意识、自我人格形成以及社会融合的每一步上同理心是如何以越发复杂和细微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格林斯潘指出，人类意识发展存在6个层次。在最初的发展层次，婴儿忙于组织触觉、嗅觉、听觉以及视觉等感觉，形成有组织的模式。与此同时，婴儿也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从而开始了在外界的活动。在这个早期阶段，婴儿对自我和外界并没有概念，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我”的感觉。婴儿自身和外界仍是无法分辨的，正如弗洛伊德提到的“像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威廉·詹姆斯将这一状态描述为“极度模糊、叽叽喳喳的混沌”。婴儿唯一有劲头的就是指挥自身的

感觉并控制身体的动作。在这一阶段，婴儿正在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这正是意识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先兆。

一旦婴儿能够控制注意力，他们就会注意到周围人的“语气、表情和行动”并且乐意给予“回应”。这是第二个层次的起点，即亲密行为的开始，亲密的对象通常是一个主要的成年看护者。尽管婴儿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力分辨自身和外界事物，但他们正在慢慢地学习将充满人类关系的生机勃勃的世界与自身周围无生气的世界区分开来。婴儿开始生存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们发觉，与主要看护者进行互动充满乐趣，也经历过要求无人回应的绝望。婴儿开始通过喔啊声、面部表情和类似的举动和看护者进行交流。当成年人按照他们的愿望和欲望行事，他们就开始有了自我和他人的意识。比如，如果婴儿故意向桌子上扔食物来表达不满，那么成年人的面部表情、听觉反应以及其他姿势和情感上的反应就开始在婴儿身上标记出“我是谁”和“我想要影响的他人”是不同的范畴，不过在这个阶段，自我和他人意识的区别十分有限。

如果婴儿能够表达自己愿望和需要，并得到了适当的回应，这就为婴儿意向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婴儿感觉到了自己的意愿，并且通过获得他人的适当反应强化了这一意愿。发展的第三个层次是婴儿开始试着对他人发出意向并接收反馈，这是人类关系真正的开端。此时，母亲或父亲和婴儿之间有了丰富的学语前的对话交流。婴儿开始感受到“我”和“你”的界限，也开始模糊地意识到，除了他的主要看护者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人，他可以与他们建立联系。

斯坦利·格林斯潘警告说，在这个阶段，如果看护者对婴儿武断蛮横或者置之不理，比如，当婴儿伸手要拥抱，你并不把孩子抱起来，或者婴儿通过喔啊声想引起妈妈注意，你却对此不予理睬，那么孩子的发展会受到严重的束缚，也会破坏其以后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

在第三个层次，婴儿变得任性起来，并开始表现得“既有来有往，又随性而为”。格林斯潘指出：

> “正是在这个时候，婴儿开始有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确切地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有组织的自我意识，而是一个不再区分不开自我和外界的意识。”

格林斯潘和其他研究者们的论述巩固了客体关系开拓者的理论和临床观察结果，该理论指出，每个个体都是在与其他人建立的关系中形成的，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关系是由已经形成的个体参与其中而形成的”。

在大约18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已经准备好发展到第四个层次。孩子能够指挥母亲，比如，领着母亲去打开电冰箱，然后指向一种特定的食物。这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的手势不断丰富起来。他开始看人们的脸色和身势语，并且区分喜悦与悲伤等情感。他开始能够“根据细微的行为线索来估计整个事态”。

孩子此时可以信心十足地离开他的父母一小会儿，去探索周围的情况，但也会时常确认父母就在不远处。小孩开始模仿他人的表情和手势，比如在一个玩具炉上学着妈妈的姿势对着玩具锅搅拌。小孩正在体验自己作为另一个人的感觉，而这正是发展同理心的重要体现。格林斯潘称，这个阶段打开了通向复杂人类情感的大门，涌出了许多像“愤怒、爱、亲密、自信、好奇，以及独立等的情感”。

在第二到第三年，幼儿发育迅速，到达第五个层次，开始形成意象和想法。他们开始具备将情感和感觉抽象成符号的能力。他可以玩过家家，让玩具娃娃们相互拥抱。孩子能用语言表达他的感觉。比如，他能告诉妈妈他感到悲伤或者高兴，再或者他想喝牛奶的时候说可以用言语表达，而不再是只能拉着妈妈的手走到电冰箱前面了。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思考自身的行为和情况。比如，幼儿可能表达出想上车的意愿，而父母会反过来问他为什么，这就促使孩子对自己的意向做出思考。在“过家家”游戏中，孩子已经能将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模仿他人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孩子需要具有“想象他人是什么样子”的能力。他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有关他人的想法，然后将自己的身份暂且搁置一旁，从而换上他人的身份。这种极为复杂的认知过程仅仅在成年黑猩猩中零星可见——当它们模仿另一种生物时，它们自己的意识水平相当于一个两岁半的人类，而这种意识现象在其他哺乳动物中却是罕见的。

当孩子3岁的时候，他已能够参与形式相当复杂的“过家家”游戏，扮演多种角色并表演有着基本情节和地点变化的短剧。

在3～4岁，孩子成长到第六个层次，开始将想法与情感联系起来。格林斯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孩子会说："我感到难过，因为我看不到祖母。"此时，孩子开始理解时间的概念，并能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这种新的时间导向性，孩子能够预先计划并制定目标。他开始理解现在的行为如何对未来产生影响——比如，现在调皮可能意味着被罚，看不了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在这个阶段，孩子开始区分近与远。他也开始理解幻想与现实是不一样的。他还能保持对他人的想法，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他的想象中都能做到。总之，孩子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并担起独立的个人身份。

格林斯潘很快指出，自我意识身份的发展完全取决于父母与孩子间的同理心关系。只有当父母能够持续、连贯且准确地读懂幼儿的情绪状态并有效地做出回应时，孩子才能学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这种同理心的联系拓展了孩子的心智，让他走进了围绕在他身边的情感和社交世界，给他温暖和喜悦——这正是他培养信任所需要的，同时也带给他自信，他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他的意向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得到积极的回应。

格林斯潘带领我们超越了先天与后天的二分法，提出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虽然婴儿的身体依靠感官从外界接收信息，但是成年看护者与婴儿自身形成的亲密关系和情感体验，会反过来通过婴儿的神经系统抽象成各种模式，对这些体验进行编码。换句话说："生物作用使体验系统化，体验又促进生物作用系统化，而意识正是在这种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

当我们使用"发展了的意识"这一术语时，格林斯潘说道：

> "我们指的是体验自身与他人的最基本情感的能力，并且在我们的家庭、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背景下思考这些情感。"

这只不过是"发展了的意识是成熟的同理心感受"的另一种说法。格林斯潘和之前的客体关系理论学家们一样，很清楚"孩子能够关切并同情地考虑他人的感受，是由于孩子自身拥有被爱与被关怀的感觉"。格林斯潘称，心理健康"需要一种人与人相连的感觉，"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发展良好的同理心"。

儿童同理心的发展

格林斯潘为按时间顺序记录儿童产生自我意识和人格的过程绘制了一幅“实用的地图”，而马丁·霍夫曼则解释了儿童天生的同理心活动倾向是如何在走向成熟的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为个体发展成完全成熟的社会人提供了情感和认知的基础。

霍夫曼指出，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5种同理心觉醒模式。前3种是学语前的、自动产生的，且绝大多数是无意识的：“运动神经模仿行为和传入反馈，经典条件反射，从受害者或其处境直接联想到自身过去的痛苦经历”。霍夫曼强调，正是这些学语前的行为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而且作用更为强大，因为它们证明了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人类在出生之时就具有了表达同理心并建立亲密关系和社交纽带的能力。

后两种高层次的认知模式是介导联想和角色替代。介导联想让观察者能够从受害者的痛苦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痛苦经历。角色替代能使观察者想象如果自己成为受害者，会有什么感觉。随着孩子从一个层次发展到另一个层次，他能够越来越熟练地进行同理心表达并掌控同理心感觉，反过来，这也使孩子的自我了解和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是最早认识到模仿行为对于人类情感的重要性的人之一。这位哲学家比启蒙时期任何人都成功地推广了下面这个理念：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是人的天性，然而，他也认识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尽管他从来没有充分地去发展这个见解，或者质疑该见解对他“人性本自私”的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这样写道：

> “当我们看到有人打出一拳，马上就要打在另一个人的腿上或者胳膊上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蜷起身体，把自己的胳膊往回撤。观众在盯着杂技演员走在松垮垮的绳索上时，自己也会下意识地扭动身体，像杂技演员那样保持平衡。”

研究人员注意到，婴儿在刚出生后就开始尝试着模仿面部表情。一个月大的婴儿“在看到其他人微笑、伸舌头、张嘴时也会学着模仿这些动作”。事实上，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婴儿识别人脸的视觉能力比其一生中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强。一个婴儿识别出一张他母亲的杂乱照片就像识别一张完好无损的照片那样快，而大一点儿的孩子就不擅长这个了。9个

月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模仿母亲对喜悦和悲伤的表达。母亲和其他成年人也往往不自觉地模仿幼儿的面部表情。对面部表情的模仿会持续一生。许多研究显示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观众会下意识地模仿电视里人物的表情。同样，这种模仿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运用肌电图技术来研究实验对象们在观察印有快乐和愤怒人脸的图片时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他们发现当实验对象们看到笑脸的照片时，会调动有关笑的肌肉，而当他们看到愤怒人脸的照片时，则会调动起关于皱眉动作的肌肉。

人类还会模仿口音、语调以及说话的节奏。比如，在某个针对20分钟对话的研究中，对话双方不仅彼此的谈话时间相匹配，谈话时间大体一致，而且彼此说话的节奏，甚至两句话之间的停顿和沉默时长也相匹配。同样，大部分这类匹配行为也是无意识和自发的，这暗示了人类具有社会性的深刻生物学根源。

人们也经常模仿他人的姿势。一个研究发现，学生经常模仿老师的姿势，而且模仿得越明显，学生和这个老师的关系就有可能越融洽。同样，有些研究显示，恋人间的动作越同步，两人的情感就越和谐。

情感的模仿也很常见，但我们往往没有发现，这既因为这种模仿是无意识和自发的，也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情感。当实验对象在一系列的体验中听到录有或欢喜或悲伤的讲话的磁带时，实验对象的情绪也会随之变化，反映出说话者的情绪，这种因果关系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能觉察。

在《新无意识论》的一个章节中，塔尼娅·沙特朗、威廉·马达克斯和杰西卡·拉金指出，无意识的模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沙特朗等人认为，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之所以具有自我适应功能，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具有模仿能力，因为“模仿将人们联系起来，推动了同理心的产生。”最近对猴子和人类大脑运动前区皮层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发现，也为模仿行为如何被激活这一问题提供了神经学上的线索。

心理学家罗伯特·利文森和安娜·吕夫解释称，生理同步和情感同步是双向的，即“情感同步能引起生理同步，生理同步也能引起情感同步”。尽管人们的确注意到了这种双向性，但霍夫曼认为生理成分的驱动作用比我们之前料想的更强。威廉·詹姆斯关注过生理因素对情绪状态的诱发作用，指出“我们因哭泣而感到难过，因打仗而感到生气，因发抖而觉得

恐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传入反馈。（“反馈”这一术语是由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推广的。）

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为詹姆斯的理论思考找到了科学依据。在实验中，实验对象的面部连上了电极，然后研究人员让实验对象的面部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微笑或者皱眉，而实验对象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仅仅是收到指令去收缩不同部位的肌肉。当实验对象处在微笑的状态下，他们比对照组感到更快乐，而当实验对象处在皱眉的状态下，他们比对照组感到更生气。在观看卡通图片的时候，处在微笑状态下的实验对象比处在皱眉状态下的实验对象觉得卡通图片更滑稽。更加有趣的是，处在微笑状态下的实验对象能更多地回忆起生命中快乐的事情，而处在皱眉状态下的实验对象则更容易记起过去的悲伤经历。一名实验对象后来叙述说，面部表情对她情感的影响之大令她吃惊：

> “当我咬紧牙关皱起眉头时，我试着不去生气，但是这个面部表情迫使我想起生气的事情。我当时本来并没有生气，但我的思绪不自觉地回到那些让我生气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挺荒唐的。我知道我正在接受一项实验，没理由生气，但我就是控制不了。”

传入反馈暗示了婴儿在自身体验某种情感之前就可以开始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这项关于面部表情及其所引发情绪的开创性实验是由克拉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詹姆斯·莱尔德开展的，他认为传入的和认知的推理都存在，并指出：

> “有些人感到开心是因为他们微笑，生气是因为他们怒容满面，难过是因为他们噘嘴绷脸；其他人则根据对情景的期待来定义他们的情感体验。”

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增强自己的同理心，一种是通过内化别人的情绪状态，另一种是拿别人的情绪状态和自己过去的情感体验做比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怀疑面部表情和情感是由社会因素造就的，而非生物因素所驱使。如今，我们得知某些面部表情在所有的文化中是相通的，对于每一个人都能引起同样的感受。人类

学家理查德·索伦森和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以及华莱士·弗里森观察了新几内亚的一个尚无文字的部落，发现他们的一些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感觉与情感与美国、巴西和日本人一模一样。不同的文化又将这些共同的面部表情和情绪塑造成流行的社会伦理。

霍夫曼称，这些科学证据“暗示了模仿可能是一个固化的以神经系统为基础的同理心唤醒机制，由模仿和反馈两个阶段组成，这两个阶段是由中枢神经系统指挥的”。

霍夫曼引用的多个研究表明，当人们模仿彼此时，表达的是团结一致。通过做出一个适合于他人情况的反应，模仿者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他意识到了（对方），进行了思考，进而表示他的支持和安慰。模仿行为需要模仿者“注意”被模仿的人，并且“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促进同理心表达以及社会联系的必要条件。

婴儿在一岁大的时候，开始能够读懂他人的面部表情并体察他们的情绪状态。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安德鲁·梅尔佐夫研究了成千上万个婴儿的凝视动作。梅尔佐夫博士和他的同事雷歇尔·布鲁克斯发现，如果婴儿在12个月大的时候凝视技巧很差，他们则有可能在两岁时语言技能发展欠佳。梅尔佐夫指出：

> “通过观察他们的眼神，你就可以判断出许多方面，判断出他们的兴趣，判断出他们接下来的意图。这个道理似乎孩子都明白，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掌握了人类文化。”

经典条件反射是同理心唤醒发展过程中的下一个层次。例如，如果一位母亲感到焦虑并且身体变得僵硬，她的焦虑则会传递并渗透给她怀中的婴儿。即使没有抱起婴儿，这位母亲在紧张状态下的面部表情和语言表达也能让孩子感到难过。婴儿每当看到他人表现出与母亲相同的面部表情，听到相同的语言表达时，就会有相同的难过感受。

当他人的痛苦引起观察者对自己过去痛苦经历的联想时，就发生了同理心唤醒的第三个层次——直接联想。霍夫曼举了一个小男孩的例子：当看到另一个孩子割伤了自己并哭泣时，这个小男孩想起了自己以前感受疼痛的经历。这与条件反射不同，条件反射时自己的痛苦与别人的痛苦是相当的，而直接联想则是观察者仅仅将他人某个非常具体的痛

苦经历与自己过去的类似经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由完全一样的情况来触发同理心反应。比如，正如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我们经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孩子试着安慰哭泣的玩伴时，即便是玩伴的母亲在场，孩子也会把他领到自己的妈妈面前。这个行为就表明了孩子正在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痛苦而经历同理心痛苦，但仍然没办法区分他自己的痛苦和玩伴的痛苦。这是因为，尽管孩子意识到玩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仍未意识到玩伴也有自己的感受。相反，孩子把自己的痛苦感受施加在玩伴的身上，于是带他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寻求安慰。

模仿、条件反射以及直接联想都是无意识的，是同理心唤醒的初级形式。但是，它们非常显著地展示了人类这种生物的同理心表达深刻的生物学根源。我们生来就能强烈地体验到他人的情感，犹如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般。

然而，为了描述成熟的同理心模式，需要在情感的方程式里增加语言和认知发展项。这些发展项出现时，孩子已准备好成长到第四和第五个层次，介导联想和角色替代。

在介导联想阶段，受害者的情绪状态是通过语言来传达的。观察者领会了受害者所说的话，例如，“我的母亲生命垂危，我吓坏了。”然后，观察者将这句话解码，对照着自己过去的情形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即认知评价，然后，产生了同理心反应。介导联想将情感功能和认知功能联结起来产生同理心反应。

角色替代是同理心唤醒的第五个层次，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角色替代需要更高层次的认知过程。一个人需要想象着自己处在别人的位置上会怎样。早期的有关“角色替代作为一种同理心唤醒机制”的研究是由以斯拉·斯塔特兰德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展的。实验对象通过单向镜看到某人正遭受痛苦的炙烤，然后他们被询问如果自己遭受同样的痛苦，会有怎样的感觉。这些实验对象比那些仅被要求仔细观察受害者举动的实验对象表现出了更多的同理心痛苦。他们也比那些仅被要求想象受害者感受的实验对象表现出了更多的同理心痛苦。换句话说，比起关注他人的模式，关注自身模式的角色替代会引发最大程度的同理心痛苦。

霍夫曼警告称，角色替代引起的同理心痛苦可能会导致他所谓的“自我漂移”。尽管这种条件下的同理心反应可能更强烈，但风险是这种同理心也有可能变得更加自我，变得偏离实际。

那么，儿童又是怎样将他们与生俱来的同理心表达转化为成熟的同理心意识呢？霍夫曼认为，儿童获得成熟的同理心意识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管教方式。正是接受管教的经历开发了孩子们同理心表达的敏锐感受。

尽管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内很少受到管教，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开始定期地接受管教——在婴儿出生后的2～15个月，频率大约是每隔11分钟进行一次管教。这时，孩子长到了父母们所称的“可怕的两岁”阶段，这时候的幼儿变得越来越任性，“2/3的亲子互动是管教与被管教，父母试图改变孩子的行为，不让他们任性”。在孩子2～10岁，父母试图改变孩子行为的频率加快到每6～9分钟一次，如同一场意志之战。很多情况下，父母之所以管教孩子，是因为孩子在情感上或者身体上对他人造成了伤害。

在孩子的成长中引入道德感并不容易。心理学教授威廉·阿塞尼奥和安东尼·洛弗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研究发现，当给8岁以下的孩子讲一些虚构的小孩偷东西或者拒绝轮流做某事的故事时，孩子会觉得故事中的人物这么做会很开心，而不会去考虑受害者的痛苦。将天生的同理心转化为成熟的同理心，关键在于管教模式的性质。

很显然，因为孩子闯祸而对其施加体罚可能会导致相反的后果，使孩子将来更没有同理心。相反，要将一个人的同理心潜质挖掘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诱导。“父母强调他人的视角，指出他人的痛苦，并且让孩子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这些痛苦。”当这种干预伴随着关心与培养，并且是公平的，孩子才会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给他人造成了痛苦，产生内疚感和懊悔，并诚心想要做出补救。比如，如果孩子拿了另一个孩子的玩具，父母可以让他坐下来，问问他如果是别人对他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父母可以让孩子想象另一个孩子会有多么难受。

所以，诱导不仅和其他形式的管教一样，能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反对态度，还是社会学习的机会。通过指出受害者的痛苦，并让孩子想象着自己遇到同样情况时的感受，父母正在触发孩子的同理心唤醒机制。比如，父母可以要求孩子转过身去看着另一个孩子的眼睛。那个孩子悲伤的表情和眼泪或许会触发闯祸的孩子自动的模仿反应——他自己也会哭起来。同样，要求孩子想象另一个孩子的感觉也可能引发介导联想。同理心痛苦的唤醒进而转变为一种愧疚感以及想要补偿受害者的想法。

霍夫曼称，诱导式管教如同剧本一样，其情节进展遵循着一条可预测的脉络。首先是孩子闯祸，紧接着父母进行诱导，然后孩子产生同理心痛苦和愧疚，最后父母提出一个补偿措施，比如道歉，拥抱或者亲吻受害者，从而让孩子体验到如释重负的感觉，消除愧疚感。这些剧本在记忆中形成，并成为大脑回路的一部分。每个剧本化的记忆都加深了孩子的同理心体验，为孩子未来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像图书馆一样丰富的、可借鉴的经历。

孩子通常在3岁的时候接受诱导式管教，因为此时父母的管教模式变得更加复杂，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互动程度更高。有趣的是，这个阶段的同理心发展通常开始于孩子能在镜子中辨认出自己，这是自我意识产生的信号。诱导式管教之所以能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是因为孩子能够意识到他人的内心状态——情感、欲望、思想往往与自己不同。这是自我反思的开始。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认识到他人是与自己不同的存在，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使孩子能够通过诱导式管教提高自己表达同理心的能力。

基于同理心的管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霍夫曼提醒我们，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是养育孩子的一方，是孩子接触世界的情感寄托，是个人的生命线。父母有能力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能撤回对孩子们的情感，这让他们在婴儿的生命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因如此，如果父母过于宽容，无法为孩子提供一个可预测的管教模式，孩子可能最终无视父母的意愿。相反，如果父母对孩子控制得过于严格，过于独断地打压孩子，孩子可能要么变得好斗易怒，要么变得沉默寡言。做得好的父母，正如温尼科特所言，在管教孩子时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压力，让孩子愿意倾听父母关于他的闯祸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教导。如果以关心而不是评判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闯祸行为，就可能触发孩子的同理心痛苦和愧疚感，进而引发孩子想要补偿受害者的意愿。

诱导式管教真正想要教给孩子的是人类道德的实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他人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和安慰他人，养成公平竞争和秉持正义的理念。同理心的成熟和道德感的发展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当我们谈起愧疚时，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不要将其和羞辱混淆起来。这两个词虽然实际上差别很大，但往往被混用。愧疚感可以触发同理心痛苦和弥补受害者的意愿，然而羞辱则贬低了一个人的存在，使其感到

没有价值，因此是很不人道的做法。遭到羞辱等于遭到拒绝。羞辱是将一个人从群体中孤立。被羞辱者成了外人，成了被排挤的人。羞辱的后果是打消了内在的同理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存在感，受到社会排挤，感觉不到自我价值，那么他就不可能运用自己的同理心去感受别人的痛苦。由于无法与他人情感相通，这个人要么保守自闭，要么将他被抛弃的感觉以对别人发火的方式表现出来。为什么是发火呢？因为这往往是他能与他人交流和交往的唯一方式。“孤独者”的想法——被社会孤立而又对他人充满愤怒，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现象。

当一个人感到愧疚时，是他人的人性呼唤促使其做出正确的事。与羞辱不同，愧疚是一种内在机制，提醒着人们去关注并修复社会关系。

应当小心翼翼地对待愧疚感。如果父母的诱导式管教给孩子带来太多的愧疚感，他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无论他做什么也无法充分弥补他造成的伤害或者重建一种社会关系。相反，如果父母的诱导式管教没能引起孩子的愧疚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愧疚感，那么他长大后就没办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无法触发足够的同理心痛苦来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做得好的父母让孩子知道他做错事了，但用的是一种关心的方式，让孩子知道他们依然爱他，尊重他的人格。通过解释他人的感受并询问孩子当他面临同样情况时的感受，父母让孩子明白他们相信孩子的内在是善良的，渴望与他人感同身受并做出弥补。同样重要的是，父母在教导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不会因为他做了错事而减少。人无完人。我们对彼此的最好期待，就是从过去的轻率行为中吸取教训，争取下一次做得更好。

然而，通过羞辱一个孩子，父母给孩子的信息是他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所以不配得到他们的关怀。这种管教关注的焦点是父母的期望，并不是孩子的人性。这种管教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他的存在本身就令人失望，他必须符合父母希望的“理想形象”，否则就会遭到拒绝。

愧疚文化塑造的人类与羞辱文化完全不同。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认为：

> “道德愧疚比羞辱要好得多，因为道德愧疚是可以弥补的，并不会玷污人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高贵的情感，隐含着对一个人的将来的乐观态度，而不是那种令人生畏、令人窒息的求全责备。在道德上包容孩子的缺点，告诉孩子世上存在着原谅和宽容，他是被人

爱着的，人们爱的不是别的，正是他本身。这样，孩子就没有必要害怕他人性上的缺点会导致世界毁灭，也正因为孩子没有遭到对他的缺点的摧毁性羞辱，他的嫉妒、猜忌以及想要完全控制好东西的情绪就会少一些。”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羞辱文化看似遵循道德完善的最高标准，实际上，羞辱行为导致了自我憎恨、嫉妒、猜忌和对他人的仇恨。纵观历史，羞辱文化是最有攻击性和暴力性的，因为它锁住了同理心，锁住了感受他人痛苦并做出同情反应的能力。当一个孩子在羞辱文化里长大，认为他必须符合某种完美的或者纯洁的形象，否则就要遭受社会的谴责，那他有可能会用同样刻板的标准去评价其他人，丝毫不让步。缺乏同理心的他并不能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所以有可能将他人的痛苦归结到他人自身，因为他们没能符合社会所期望他们达到的那种完美标准。

羞辱文化仍然存在于传统社会里。一个遭到轮奸的女人之所以会被自己的家人和邻居用乱石砸死，就因为她让自己和家人蒙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社会非但没有同情她的遭遇，反而对她施加更大的惩罚，夺走了她的生命。在传统社会，她身上带着被轮奸的耻辱，尽管她事实上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在她的邻居看来，这个女人永远是被玷污的、不纯洁的，因此是遭到厌恶的对象，应当被杀掉。羞辱文化的恐怖力量令人不敢直视，它摧毁了同理心并将人类转变成魔鬼。

应该强调的是，诱导式管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习工具，也可能是育儿行为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在此之前，父母对孩子做出无礼行为的惯常处理方式是体罚和羞辱。那时的父母还未适应有益健康的思考方式，无法通过诱导过程对孩子进行引导。要让孩子理解他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并理解如果他是受害者，面临同样的无礼行为时是什么感受，这些需要父母已经具备良好的心理意识。帮助一个孩子思考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和懊悔，并努力进行弥补，这是一个深刻的“治疗过程”。实际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治疗师，能帮助他建立适当的情感联结，从而发展亲社会的行为。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在心理意识时代来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弗洛伊德可能会认为诱导式管教的概念是错误的。尽管他相信愧疚感是形成道德感的关键，但他对于愧疚的观点恰恰与客体关系理论家和

依恋理论倡导者们的观点具有相反的前提。弗洛伊德认为激活愧疚感的是对父母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对他人痛苦的恐惧。婴儿生来就是自恋的，并且不断地与自己的父母进行意志上的较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弗洛伊德称，婴儿害怕父母的控制和权威，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又需要父母的保护。于是，父母和婴儿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是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孩子不断地采取各种方式以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总是害怕遭到报复和抛弃。弗洛伊德暗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婴儿才形成了愧疚感，逐渐变成有道德的人。

> “因此，我们得知了两种愧疚感的起源：一种来自对权威的恐惧，另一种产生于对超我的恐惧。前者坚持对本能满足的放弃；后者在这么做的同时，迫切地要求惩罚，因为持续拥有被禁止的愿望逃不过超我的监视。”

那么，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愧疚感产生于对父母惩罚的恐惧，愧疚感进而内化并促使孩子变得有道德，起先是害怕被父母责罚，后来是担心被社会惩罚。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感是被动产生的。尽管人的本能驱使他们追逐个人利益，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但人类是有道德的，而道德是用来逃避惩罚的。如同霍布斯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社会有计划地约束个人的私利，唯恐人类胡作非为，而道德行为则以法律的形式施加作用，以确保一定程度的社会凝聚力。

然而，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性的消极观点在当时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论。1919年，英国社会学家威尔弗雷德·特罗特提出了如下理论：人类是群居动物，本性驱使着人类保护彼此，这种行为不仅提高了个人存活率，还有利于整个群体的生存。根据特罗特的说法，利他行为是人类表达群居本能的一种方式，植根于人类这种生物体的核心。在弗洛伊德的时代，还有一种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自然选择观点。人类感到应当为彼此负责，守望相助。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应当对亲族以外的人负责，则会受到他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特罗特的理论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无异于一个诅咒，因为如果特罗特所言正确，那么弗洛伊德精心设计的故事则全成了虚构，没有任何可信的生物学基础。于是，弗洛伊德对特罗特提出了反对的论点：

> “让我们冒昧地更正一下特罗特的主张——人是群居动物，并宣

称人是一个部落动物，一个由酋长率领的部落中的生物个体。”

在部落中，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父亲是强大的、主导的、无情的权威人物，要求族人完全效忠。而对父亲满腔怒火的儿子们则永远都在密谋处置并杀死父亲，以便能享受和母亲的乱伦之乐并且统治部落。

过去半个世纪中，针对婴儿情感和认知发展的研究最终推翻了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性的匪夷所思的解释。特罗特的理论有一定道理，客体关系理论家和儿童发展研究人员证实了他的猜想。我们现在了解到，同理心痛苦是生物遗传而来的。当看到他人的痛苦而触发同理心痛苦，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应当为他人的处境负一些责任的时候，就会产生愧疚感以及想要弥补的意愿。

之前提到的一点值得强调，无论是同理心痛苦、愧疚感还是想要弥补的意愿，它们本身都受到自然选择的限制。同理心的表达既有最低门槛，也有上限。很多时候，他人的痛苦不足以引发同理心痛苦。这可能是因为他人是陌生人，或者他人属于受到限制或不被看好的群体，再或者他人的痛苦不是能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立即被看出来的。人们也可能遇到同理心被过度唤醒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霍夫曼做了如下定义：

> “当观察者的同理心痛苦变得太剧烈、太难以忍受时，就转化成了个人本身强烈的痛苦感受，这个下意识过程的发生会让观察者完全脱离同理心模式。”

看护者们，尤其是护士和医生，容易患上所谓的“同情疲劳”。同样特别容易患上该症状的是那些从事“帮助他人的职业”的人员——社会工作者、战地或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人员。持续的同理心过度唤醒可能导致情绪衰竭，同理心反应迟钝以及情绪萎缩。

如果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体验着同理心痛苦和利他行为，那他们就无法充分地关注自身的需求，来确保他们自己的情感、认知和身体健康。我们的生理机能似乎能“理解”这一点，并为我们的同理心唤醒设置了最低门槛和最高限度。

同理心的成熟过程在学龄前有所加快，孩子能够熟练地使用语言来表达情绪。他们也逐渐擅长读懂言外之意，并开始理解他人的外表和举

止可能掩盖着迥异的内心感受。

4～5岁时，孩子会形成一种互惠感。他开始理解如果另一个孩子对他做出友好提议和行动，什么是他所期待自己做出的合适的社会反应。如果他未能以互惠的方式同样友好地做出回应而伤害了那个孩子，他也会感到愧疚。比如，如果一个朋友跟孩子分享了他的玩具，然而孩子拒绝以互惠方式分享他的玩具给朋友，致使另一个孩子哭起来，那么一种愧疚感会触发同理心反应，让孩子努力做出某种弥补。

在儿童7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对他人痛苦的同理心反应。一项涉及5岁、7岁、8岁和13岁儿童的研究显示，7岁及7岁以上的儿童能够意识到他们有同理心反应，而年龄小一点儿的儿童则意识不到。实验的情境是给孩子们放映有关儿童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录影——比如，一个儿童受到父母不公正的惩罚、一个残疾儿童学习拄着手杖爬楼梯、一个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7岁和年龄更大的孩子表示，录影中儿童的遭遇让他们感到悲伤，这表明他们清楚自己的难过感受是对别的孩子的痛苦的反应，他们是在体验同理心。然而，年龄小一点儿的孩子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情感与别的孩子的处境有着因果关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达同理心。

儿童在6～8岁时对道德的理解增加了社会责任感。比如，他们学到了遵守诺言对于维持友谊来说至关重要，不遵守诺言会带给人背叛和伤害的感受。此外，如果这种行为带来了愧疚感和想要弥补的意愿，那么孩子正在学会如何成为有道德的人。

八九岁的孩子能够注意到他人的自尊程度。他们也能根据他人情有可原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同理心反应。比如，孩子们会被问到如果别的孩子偷了他们的猫，他们会有多生气。然后，会告诉孩子偷猫的小孩自己的猫跑掉了，而他的父母不会给他买新的宠物了。在得知这个意外的信息后，“8岁和年龄更大的孩子表示在听到另一个小孩犯错的缘由后，他们不会感到那么生气了”，这比起没有被告知这个信息的控制组的孩子们生气的程度有所降低。然而，7岁或者年龄更小的孩子却不为这个意外的信息所动摇，表明该年龄段的儿童尚未开始在自身的同理心反应中将他人的过往经历考虑进去，直到8岁左右，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10～12岁的孩子还能以抽象的方式从道德的角度思考他们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应当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他们会有一种关于道德义务和愧疚的

总体感受，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情况。他们开始思考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上正直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开始遵从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去进行生命中的各项活动，以便保持正轨。如今，他们的愧疚感也是抽象的。一旦无法遵从社会的道德标准，他们会感到痛苦，这表明他们的社会愧疚感逐渐开始内化。

孩子在10~11岁时，能够理解同时体验两种自相矛盾情感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对有一个残疾的兄弟姐妹感到尴尬，但同时对这个残疾的兄弟姐妹抱有同情。同样在这个年龄段，孩子能够意识到无论对记忆中的过往经历，还是对眼下他们周围发生的事件，都会产生同样多的负面情感。

在青春期初期，即12~13岁，青少年们对他人情感的反应更为敏锐。他们能够察觉他人情绪表现的多种层次，甚至感受到何时他人的情绪反应超过了在当前情况下应有的程度。比如，如果一个人的悲伤程度太深，不适于眼下的情况，那么这种悲伤可能反映出更深程度的抑郁。

当一个年轻人的同理心意识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能够从情感和认知角度注意到他人的整体存在，并且发展对他人经历和存在的整体上的同理心反应。比如，一个人可能同情他人的贫苦，或者他人严重的生理或心理残疾。甚至有可能对他人的境况产生同情，而被同情的人自己都未意识到痛苦。霍夫曼举了一个例子，某个学生对小孩的痛苦产生同理心反应，而小孩自身却浑然不觉：

> “我表弟的母亲去世了。他还太小，理解不了，只是忙着玩他的玩具。我试着对他微笑，陪他玩，但忍不住想到没有了母亲对他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他磕到了膝盖，不会有母亲抚慰的拥抱……我所有能想到的，就是他永远失去了母亲的温柔，他会想念这种温柔。但孩子自己意识不到这些，他觉得一切都棒极了。”

最后，同理心反应最成熟的形式是对整个群体的人们，甚至另一个物种的同理心，把他们的痛苦当作好像是自己的一样。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个人对某个体的痛苦产生同理心，而该个体的痛苦象征了他或她所属的整个群体的痛苦。比如，遭受虐待的妇女、某个宗教的少数群体或者男同性恋者，这些人都遭受着主流文化的压迫。将所有群体和物种包括在内的普世性的同理心接近了普世意识的概念。

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年青一代有同理心普世化的明显趋势，至少在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将在第11章对该调查加以探讨。父母教育和依恋行为的根本性变化，青春期的延长，对多样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接触，更密切的全球联系，不断增加的经济依存度，以及更加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促成了同理心意识的普世化。

利他与利己

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自然选择理论后不久，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说法，称生活是残酷的、充满竞争性的搏斗，以自我利益为主导，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而自然选择理论为此提供了科学依据。其他人则不敢肯定。俄国科学家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称，生存在本质上依靠合作和互惠。对人性的争论，在达尔文的理论一发表时就爆发了，科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理论学家对此分别展开研究，提出他们各自的看法，并且强调他们对此问题的解答对于人类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存在感的角度讲，我们渴望了解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且不说针对我们同类哺乳动物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实验数据，对儿童发展的新研究最终给了我们一些关于“人性意义”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的假设性答案。

人类既是一种合作的动物，也是一种竞争的动物，而正是前者融入了我们的生物体，设定了基本的规则。我们首先是社会动物。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有时候会通过竞争来谋求自身利益。然而，如果我们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纽带偏离太远，就会面临被放逐的风险。

然而，支持人性本自私的人们提出了反对意见，称人类参与的互惠性社会行为——合作——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协商行为，而不是真正怀有深深的安慰和帮助同类的情感。甚至对于同理心极致的表现——利他行为，那些愤世嫉俗者也会认为这种为他人牺牲的决定一定会有其他更狡猾的利己目的暗含其中。比如说，我们的利他行为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也可能是为了体验一种帮助别人的个人喜悦，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么做能给我们的道德表现加分，甚至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所以，那些看起来是利他的行为实际上掩盖了满足本能冲动和功

利目的更狡猾的利己行为。

利他是否真的是天生的、无私的，这一点很难评估。在过去，我们需要依靠逸事来判断，依靠那些看起来英勇的利他行为——普通人做出特别大的牺牲，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来帮助别人。当然，每个活在世上的人都能举出这样的例子。但是，如果纯粹的利他行为本身很常见，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近年来，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些独特的实验来测试纯粹的利他理论。实验结果越来越充分地证实了人类天生具有同理心，而利他行为是对他人最成熟的同理心表现。

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们做了一项针对6～10个月大的婴儿的实验，测试婴儿是否能够分辨乐善好施的人和不仁慈的人，并指出他们认为更有吸引力的人，该实验的结果发表在2007年的《自然》杂志上。实验结果让人很吃惊——甚至连幼小的婴儿在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发育以前，比起阻拦别人的人，也会更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研究人员做了两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婴儿看到一个登山者在山脚下一动不动，它的身体是木头做的，眼睛是黏上的。登山者开始两次试着向上攀登，但都失败了。在第三次向上攀登的时候，登山者“要么有一个帮助者从下往上推，要么有一个阻拦者从上往下推。”研究人员鼓励婴儿在帮助者和阻拦者之间做出选择，选谁就伸手指向谁。在16个10个月大的婴儿中，有14个婴儿选择了帮助者；而12个6个月大的婴儿中，全部都选择了帮助者。

在第二个实验中，登山者先接近帮助者，这并不令人奇怪，然后它又接近了阻拦者，这倒让人奇怪了。10个月大的婴儿们花了更长的时间观察这个情况，“说明了他们对登山者接近一个过去阻拦自己的人的行为感到奇怪”。对比之下，6个月大的婴儿观察前后两个情况的时间差不多，显示他们还不理解为什么登山者对待两人的态度可能会不同，即便他们仍然偏爱帮助者。研究人员声称，第二个实验结果可能表明“社会评价能力的发展早于对他人评价的推断能力”。

他们做出如下结论：

“通过他人社会行为来评价他人的能力，也是道德认知系统发展

的基础。坦率地说，充分发展的道德系统的许多方面都是学语前婴儿力所不能及的。然而，对于那些积极的与消极的社会行为进行区别评价的能力是形成任何系统的重要基础，这个系统最终会囊括更加抽象的是非概念。”

耶鲁的研究表明，1岁以下的婴儿能区分新社会的和善良的行为与反社会的或者不良的行为。其他一些新的研究显示，18个月的幼儿也能自己表现出利他行为。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心理学研究员菲利克斯·瓦内肯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幼儿表现出利他行为远远早于预期，这再一次证明了人类利他行为的生物学本性。

瓦内肯在孩子的眼皮底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把书摞起来，或者用衣夹把毛巾晾起来。有时他会遇到困难，要么衣夹掉了，要么把书弄倒了。24个幼儿全都爬过来帮他捡起衣夹或者书，但仅仅在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暗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孩子们才会来。瓦内肯小心翼翼地不去寻求帮助，也不对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努力不让小孩为了获得表扬而提供帮助，使实验不受到偏见的影响。瓦内肯强调在他故意从书堆里抽出书或者把一个衣夹扔到地上的时候，幼儿不会提供帮助，只有在他很明显需要帮助的时候，幼儿才会对他的困窘表现得很敏感并愿意帮助他。幼儿表现出了纯粹的利他意识——帮助他人不求回报。

尽管有很多实验证据显示人类天生有同理心，并经常通过利他行为表达出来，但反对者们坚持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从过去的经历和条件反射中学到，帮助他人能减轻自己的同理心痛苦，从而如释重负，有时甚至会得到快乐，因为他们是有道德义务的。霍夫曼指出，仅仅是某人因为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而感觉良好，并不意味着这是利他行为的唯一理由，甚至是最重要的理由。快乐可能是一个预想不到的副产品，但并不是首要的驱动因素，因为从事利他行为本身才是首要的。霍夫曼说：“没有证据证明人们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快乐，却有证据证明并非如此。”

霍夫曼给出的证据是有力的。查尔斯·丹尼尔·巴特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做了一系列实验，表明了“对他人痛苦的同理心反应以纯粹的利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很常见的。在初期的一组实验里，巴特森测试了关于“旁观者帮助他人的首要动力是减轻自身同理心痛苦”的假设。这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帮助，换句话说是为了自己。鉴于旁观者出于减轻自己的同理心痛苦的目的，只能选择要么帮助受苦的人，要么逃离现场，

为了评估利他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假设，实验设计了容易逃脱和不容易逃脱的情形。如果相对容易逃离的话，那些在之前的实验记录中表现得同理心比较少的实验对象倾向于逃离，而不是选择留下来提供帮助从而减轻同理心痛苦。然而，那些有高度同理心的实验对象即使在逃离相对容易的情况下，也会选择留下来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的首要动力是纯粹的利他——即关心他人，而不是为了减轻自身的同理心痛苦。

有些实验对象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提供帮助，那就要继续看工人受到电击的痛苦场面（不容易逃离的情形）。另一些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可以快速离开，不用继续看电击场面（容易逃离的情形）。结果显示，仅有那些自身感到特别痛苦而同理心程度比较低的观察者容易选择逃离。然而，那些同理心程度比较高的观察者则不会选择逃离来减轻痛苦。

第二组实验测试了如下的假设：有些人从事利他行为是因为害怕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受到旁人的冷眼，并且会在社会上失去道德地位。巴特森告诉实验对象，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需要帮助。为了探寻人们帮助别人的决定是否受到担心不作为而被指责的影响，巴特森引入了额外的信息来为不提供帮助进行辩护。

实验对象被告知其他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曾经拒绝帮助这位女士，这就给了新来的实验对象同样拒绝帮助的理由。同理心程度不同的人们都面临着“是否花时间帮助这位受苦的女士”的选择。实验还以承诺表的形式记录了之前实验对象的承诺回应。在一张承诺表上，实验对象被告知7位参与者中有5位承诺提供帮助（不提供帮助的理由弱），而在另一张表上，实验对象被告知7位参与者中仅有2位承诺提供帮助（不提供帮助的理由强）。结果不出所料，同理心程度低的人如果认为之前的参与者大都承诺花时间帮助这位女士，他们也会倾向于帮助她，如果他们认为其他人拒绝帮助这位女士的话，他们也可能会这么做。然而，同理心程度高的人，无论之前愿意提供帮助的参与者是多是少，他们都愿意帮助这位女士。

第三组实验测试的假设是：利他行为的动机是为了体验同理心快乐，而为受害者减轻痛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自己服务。相反地，怀有同理心的利他行为的假设认为，帮助者们获得的快乐是“帮助他人的一种结果，而不是目的”。

实验对象们被告知某个需要帮助的人的基本情况，并被要求选择是继续获得有关她的情况的新消息，还是听另一个人的情况。在做出选择之前，实验对象们会从专家那里得知在更新消息的时候，该人的情况有多大可能会显著好转。有些人会被告知可能性是20%，有些人被告知可能性是50%，还有些会达到80%。背后的推测是：如果对受害者的同理心感受是来自体验同理心快乐的需要，那么在受害者情况好转的可能性与是否选择继续听有关她情况的新消息之间会存在线性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情况好转的可能性只有20%，那么选择听她的新消息的实验对象会很少，当可能性上升到50%时，听的人数会增多，而当可能性达到80%时，听的人会更多。

然而，如果实验对象最关心的是这个受害者的健康状况，那么渴望听到她新消息的人的人数理应在她好转的可能性为50%的时候最多，这时候人们对她的情况是否能好转有着最多的疑问。换句话说，模式应当是曲线而不是线性的。而在可能性为20%或者80%时，实验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知悉了她的情况发展，想要了解她最新消息的可能性应当会有所降低。

实验结果显示，同理心程度高的人愿意听有关这位可怜女士的新消息，但他们的关注程度仅在她的好转可能性为50%时达到最高峰——这时对她的诊断尚不确定。这一点证实了他们的动机是关心女士本身，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获得同理心快乐。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实验对象应当在该女士好转可能性为20%的时候表现得不那么关心，而在好转可能性为80%的时候表现得更关心。相比之下，同理心程度较低的实验对象的确呈现出线性的反应模式，他们对受害者状况的关心程度是随着受害者情况好转可能性的提高而不断上升的，证实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听到好消息的愉悦，而不是关注受害者本人的痛苦。

巴特森对同理心利他行为理论做出了限定：如果帮助者因为帮助他人而受到的痛苦太深——比如，要接受虽然无害但极度痛苦的电击，那么即使那些对苦难者怀有高度同理心的人也可能会将自我意识放在首位。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然会为他人，有时甚至是陌生人，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纳粹恐怖统治时期，全欧洲被占领的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帮犹太人躲避追捕或帮他们逃脱，甚至不惜冒着被处决的风险。

同理心的文化差异

儿童发展研究人员越来越能熟练地识别认知发展以及同理心成熟的各个阶段。然而，他们很快注意到，尽管似乎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在起作用，但特定社会依恋类型以及文化制约作用却决定了这个发展进程是否会在各个阶段受到阻碍，或者走上不同的道路。换句话说，他们指的是在类似于“后鲍尔比依恋行为方法”的最佳条件下，人们可以对认知和同理心按计划的路线发展抱以期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父母育儿的“后鲍尔比依恋类型”正变得非常普遍，每个文化里的育儿活动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意味着它们正在对这个发展进程施加影响。

比如，在美国文化中，颂扬个人主义和自主性的传统由来已久，父母们更加注重强化孩子的自尊心。而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注重培养孩子成为能够适应复杂社会的和谐成员，而不是塑造自主的个体，在培养成熟的同理心情感时则强调鼓励孩子自我批评，而不是强化自尊心。北山忍等人在一篇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的文章中指出，在这些文化里，佛教强调同情心，儒学强调角色责任，父母的育儿方式更倾向于强调孩子“融入群体”，而不是“突显个体”。文化的不同影响了父母的育儿方式，之后还会影响教师诱导式管教孩子的方式。比如，在美国的学校里，强调孩子自尊心的教导比比皆是。如果某个孩子的行为伤害了另一个孩子，老师可能会要求他反思自己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另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并想想如果另一个孩子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他的自尊心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相反，在日本的某个学校，强调自我改进胜过自我提高，孩子们被要求在每天放学之前自我反省，反省“他们自己或者小组的表现没有达到班级目标的地方”。北山忍等人指出在日本文化中，“自我改进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象征了对自身所处关系的价值的肯定，从而满足了自己是一个完全相互依存的存在的感觉”。那么，如果一个日本孩子的行为伤害了另一个孩子，老师则会要求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如何造成了另一个孩子以及小组成员的痛苦，并且损害了班级的和谐关系。同样，这个孩子会被问到如果另一个孩子也这么对待他，损害班级的和谐关系，那么他和小组成员会做何感想。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可能触发同理心痛苦和愧疚感，

并激起孩子想要弥补的意愿。

尽管我们对人性的概念和父母育儿方式的看法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哲学和政治思考却远远地落后了。我们仍忍受着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所继承下来的陈词滥调。然而，对人性的重新思考，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发展历程的意义，以及我们最珍视的信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定义我们的愿望以及我们怎样选择生活。

第5章 重新思考人类之旅

2006年10月，哈佛大学负责审查通用教育课程设置的工作组提议：所有大学生都要修一门主题为“理性与信仰”的课程。该提议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全美议论的焦点。忽然间，人们对一个早已建立的毋庸置疑的知识再度产生了疑问，将学术界和宗教界再次分开。

宗教领袖和许多学者欣然抓住这一提议并表示，这所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学府终于意识到并承认了信仰在人类生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学新生中，有79%的人信奉上帝，69%的人祷告并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力量、支持和引导。

而哈佛大学偏世俗的教授们担心，要求学生在哈佛修这样一门课可能会为宗教在校园的复苏敞开大门，并且会促使其他宗教类课程的设立。他们不愿意重新开启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古老辩论——那场激辩几乎持续了两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一旦哈佛批准了该提议，便会开了先河，全美其他大学都会纷纷开设类似的课程。

就这样，一个单纯的学术提议逐步升级成了重大分歧，导致占主导地位的两个世界观再一次兵戎相见。该课程设置委员会试图做出解释，称他们的意图不是要引入宗教式教学，而是要帮助学生仔细观察“宗教与国家、社会及国际文化的相互作用”。他们称此举不是要让理性和信仰对立，而是要用理性的思维仔细观察信仰，以便更好地为学生参与深入的宗教探讨和思考做准备。然而，他们未能平息事态。专栏作家、政治权威，甚至电台脱口秀节目都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急于激发更深入的讨论，去探究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人类意识的方法孰优孰劣。

该课程设置的提议在提交数周后就仓促地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组建议将“理性与信仰”课程换成关于“做人意味着什么”的课程。

哈佛大学这场信仰与理性之争尽管持续时间不长，却让我们回忆起了前人为了调和理性与信仰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世纪晚期，圣·托马斯·阿奎那就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13世纪，由圣·奥古斯丁精心构造的基督教世界观在基督教时代初期就开始阐明该问题。市场经济开始从封建生活阴暗的深处萌生。新技术，尤其是水磨、风车以及新农具的

使用正在提升农作物产量，产生盈余产品，促进人口增长，带来城市生活——这是自罗马帝国沦亡以来的第一次。新的技术进步激发了人们对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组织生活的兴趣。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新发现——摩尔人通过征服西班牙将古代文字重新引入欧洲，激发了基督教学者对逻辑和理性思维模式的兴趣。

到了13世纪，理性秩序下的思考和行动获得了生命力，开始向以信仰为基础的教会准则发起挑战。初期是以实际的方法组织生活，从而帮助改善整个人类生活。不久之后，世俗理性就遭遇到了超世俗的慈悲与救赎。

托马斯·阿奎那是13世纪伟大的传教士和学者，他担起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调和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调节现实秩序的方式，希望既能保全信仰，也不谴责理性。在他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两部著作中，圣·托马斯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哲学同基督教神学进行协调，一些学者称之为“精致的组合”。圣·托马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宇宙是有序的，理性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圣·托马斯称这个仅仅是可能，因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个有序而理性的世界。人类有理性，这给了人们一扇仰望上帝的窗户。人们在理性的帮助下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进而接近了上帝。正如中世纪历史学家霍伊特指出，“在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的过程中，必须是“亚里士多德成分”去适应基督教体系，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理性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让人们从窥见神创造理性世界的大能中受到鼓舞，进而信仰神。然而，只有当世人获得“启示”，窥见上帝的伟大设计时，理性才有可能正确。因此，如果启示和理性两种真相并存，那么理性总是第二位的。如果理性与启示发生冲突，那么理性就会出错，必须用额外的推理加以纠正，直到排除错误。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也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他们向圣·托马斯提出的上帝创造了神奇的理性世界的概念表示敬意。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对上帝创造了理性世界这一点从来没有过质疑——与他同时期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然而，笛卡儿试图发现上帝对宇宙设定“自然法则”。他这么写道：

“当我仔细思考，就逐渐明白了所有物质本质上皆为数学运算，只不过研究秩序和计量方式不同罢了，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数字、

图表、星星、声音，还是可以测量的其他任何物体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认为一定存在某种科学通论可以从总体上解释物质元素，解释秩序和计量方式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称为普遍数学。这种科学应当包含对人类理性的最基本的知识，其领域应延伸到探究每个主题的真理。”

笛卡儿仰望上帝的创造，看到的是一个理性的、可以计算的领域。“放胆直言，我相信，比起上帝赐予人类的其他手段，它（数学）作为万物之源，是更为强大的一种了解知识的手段。”

这个重任落在了艾萨克·牛顿的肩上，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发现了笛卡儿梦寐以求的数学方法，来描述管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力学运动。他的物质和运动三定律正是试图解释上帝蓝图的工作方式。

人们赞美上帝是最伟大的缔造者，创造了一个合理的、计算精确而又和谐统一的力学世界。然而，不久以后，神灵的启示被淡化了，变得微不足道，因为随后世世代代的学者、商人和手艺人们更愿意利用自然法则为人类效力，而不是对“神”这位工程师表达敬意。中世纪基督教的造物主变成了远方神圣的钟表匠，转动宇宙的发条，然后静待其旁，让他的人类代理者照管机器。

而在遍地煤矿、炼钢炉和蒸汽机车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红红火火世界里，在这个看似拥有了预言中那样丰饶的物质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对那种此生受苦，期待上帝慈悲救赎，相信有来世的古老想法不再那么感兴趣了。

然而，尽管世俗论者与信教者之间不时会互相攻击，信仰与理性这两者仍然弹性十足。正如圣·托马斯以及其后的启蒙哲学家们试图调和这两派思想一样，一些其他的现代学者同样为此付出了勇敢的努力。

尽管这些努力看来令人钦佩，而且人们无疑是欢迎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的，但这些努力往往收效不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种叙述方式都未能深刻地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从而给我们的宇宙学仅仅留下了不完整的故事，也就是说，它们未能触及存在的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让信仰和理性的故事如此令人信服的关键因素，只是有些必要因素缺失了，缺失的就是“体验”。

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东方的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贬低肉体的存在，或是否认其重要性。现代科学和启蒙时期的理性哲学亦是如此。对于前者，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肉体是堕落的，是罪恶的源头之一。肉体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人性的堕落。而对于后者，肉体不过是装载思想的脚手架，一个必要但麻烦的提供感官知觉、营养和移动能力的物体，是思想用来在世上执行其意愿的一部机器。肉体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转瞬即逝。肉体充其量是一个可以忍受和操控的东西，但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东西。最差的情况是，不断地提醒着人类自己的弱小和必死的命运。肉体在年轻时被用作满足性欲的“对象”，到年老时则被嫌恶，因为它会衰弱，会在我们脚下腐朽。

最重要的是，肉体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和反应中产生的情感，则更不可信。无论是《圣经》还是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除了将情感贬低，认为其不但不可信，而且会成为对神的顺服或者对理性意愿的阻碍以外，都没有为人类的情感留下空间。

《圣经》中的一幕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上帝召唤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来表明他对上帝权威的坚定服从。亚伯拉罕极度的情感痛苦在统治宇宙的上帝的盛怒之下，并未得到关注。亚伯拉罕诸教信仰的是上帝的律法。而犹太民族正是《圣经》中所描述的民族。人类的感觉和情感往往是将人引入歧途的根源。甚至连《新约全书》的使徒和神学家们，尽管强调友爱，但也将肉体视为腐化堕落、令人厌恶的，提醒着人们一个转瞬即逝的堕入尘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身体体验以及其引发的劫难与痛苦被视为一种苦修，是为了来世得到永恒的救赎。

而在近代，人们强调理性、客观和超脱，人类的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不切实际的、无法客观体现、独立评估而又难以定量的。甚至在当今社会，不让情感阻碍合理的推理与判断也是常识。有多少次我们听到有人说，或者对别人说过，“不要那么情感用事，理智一点儿”。这传达出的清晰信息就是情感比不上理性。情感的肉欲太强，太接近我们的动物性冲动，而不值得人们认真地对待——更糟糕的是，它们玷污了推理的过程。

追溯感觉和情感的历史

无论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理性的意识，都以一种脱离实体的方式看待存在。然而，正是被他们所贬低的感觉和情感使人类能够发展同理心关系，进而成为完全成熟的社会人。没有了感觉和情感，同理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世界与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为大规模重新评估人类意识打下了基础。现代化之前的理念——如“信仰和上帝的慈悲是窥探真理的窗口”以及启蒙运动的观点（理性是现代意识的顶点），都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复杂的思维理论。

各领域与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同理心意识背景下，重新调整某些信仰和理性关键特征的优先次序。他们指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实体的体验，也就是与他人一起参与的活动，而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并做出反应，更是人类接触世界的关键方式，这不仅创建了个人身份，开发了语言能力，学会了推理，增强了社交能力，建立了文化叙事，而且定义了真实与存在。

身体体验的理念，对基于信仰和理性去看待意识的旧方式提出了直接挑战。尽管这个新的思维理论在一个更广阔的同理心框架下为前两种方式都留下了空间，但这两种方式已不再作为探究真实的独立方式而各自为政。身体体验的理念带我们走过信仰的时代和理性的时代，走进同理心的时代，却并没有摒弃过去这些世界观的特殊属性，这些特殊属性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类去信奉。

“我思故我在”或许是现代最重要的一句哲学话语。笛卡儿是在1637年的《方法论》一书中写下这句话的。这部学术著作成为我们此后思考人类意识的方式的基础。关于阐发这句名言的起因，笛卡儿是这么解释的：

> “如果我望向窗外，看到一些人穿过广场，正如我碰巧做的，我通常会说我看到了这些人。然而，我看到的不就是一些帽子和外套吗？下面或许隐藏了什么自动装置也说不定，而我却判断他们是人。所以，我觉得某些东西是我用眼睛看到的，但这些实际上仅仅是我的思想中的判断。”

笛卡儿将人类的构成看作由身体的机器发出感觉信号给脱离实体的

思想，然后思想用理性思维破译信息并形成判断。笛卡儿认为尽管身体和世界保持着联系，思维却是一个单独的领域，独立地起作用。他认为思维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并如此写道：

> “它不需要地点、不依赖任何理性，也不依赖任何物质化的东西；所以，这个‘我’，我称其为我的灵魂，是与肉体完全不同的。”

笛卡儿描述了无形的思想统治着肉体，引申开来则是自然之躯。他的观点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一直延续至今。当人们听到笛卡儿的学说，无不惊讶于他的思维过程与当今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认定的“高功能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性格是如此相似。笛卡儿想要除去他所认为的体验中不确定的成分——杂乱的、不可预测的、不由自主的感觉和情感因素，这些因素不断地爆发，中断了思维，表现出一个活跃的、有知觉的人的特征。他从纯思考的世界中寻求慰藉，深信数学证明提供了一种确定性，让人类的思维能够命令、控制和掌握物质世界。

笛卡儿眼中的人类是上帝派到世上的监督员。正如上帝是精神的本质，将这个无生命的世界安排得井然有序，用思维的力量控制世界的运转——上帝终究是宇宙思维的核心。人类，凭借天赐的理性，充当着上帝在世上的监督员，以同样的方式用意志力驱使着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肉体本身，使其运动并参与活动。

理性计算的敌人是情感。如果任由情感漫游，情感会分散甚至淹没理性思维。通过在人类“方程式”里除去情感因素，笛卡儿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感觉的、纯理性的、精于计算的生物，比起他所归类的本质上是机械的物质世界，这种生物反倒在很多方面都更像一个机器人或者如机器一般。笛卡儿对人类的这种观点被流行的电视剧《星际迷航》中史波克这个角色讽刺挖苦了一番。史波克是从瓦肯星来的理性生物，外形酷似地球人，但是缺乏表达人类感觉和情感的能力。他与非常情绪化的柯克船长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是这部电视剧主要的看点之一。在危急情况下，史波克的判断，尽管完全合理，但往往缺乏必要的同理心，无法恰当地处理眼下的社会现实情况。他的冷酷、超然以及空洞的人格使他无法理解情况背后的情感因素，结果，他的建议往往被驳回。

通过漠视体验的具体性，笛卡儿同追随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将人

类的死亡本身也一并排除了。活着就是有实体的，有限的，终有一死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的必然。活着就需要不断地奋斗，忍受疼痛、磨难与苦闷，以及拥有快乐的时光。如果世上没有了感觉和情感，人们如何庆祝生命的诞生，哀痛亲友的故去，或者拥有一段亲密的情感呢？

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他的《笛卡儿的错误》一书中，提醒我们如果接受了人性脱离实体之说，我们会放弃什么。他这么写道：

> “或许我们人类最不可或缺的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里，提醒我们自己和他人，我们人类是复杂的、脆弱的、有限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我们压抑实体的存在，剪断以实体方式联系人类与世界的情感纽带，我们将失去与他人产生同理心的能力，而这正是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本质所在。

达马西奥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情感在组织人类思维以及亲社会行为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为此，他研究了大脑部分受损对人类行为以及决策能力的影响。他就一个大脑部分受损的神经病患者的病例做了报告。这名患者从表面上看一直很正常。他表达清晰，注意力集中，保留着以前的记忆，也能进行计算，并能解决抽象的问题。然而，他的病损伤了大脑中能让他正常地体验感觉的部分。结果，他的推理过程是有缺陷的。他无法准确地解读情况并以恰当的方式做出反应。他缺少了一种“社会罗盘”。达马西奥的结论是，“情感与感觉过程的某些方面是理性必不可缺的”。

达马西奥和其他神经病学家观察了一些脑部受损，尤其大脑控制感觉、情感和推理部分受损的病人的一些奇怪行为。试想一下，有一种医生们称为疾病感缺失的情况，临床表现是无法认知疾病。比如，罹患致命性中风的患者，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感觉很好”。尽管意识到他们已局部瘫痪，但他们的大脑特定部分受损，使他们无法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情感表达。当得知自己的危险处境，以及即将面临的可怕后果时，他们的回答却是一片空白，令人奇怪。他们从来没有表达难过、焦虑、愤怒或者恐惧的情感。结果，他们缺失了针对病情治疗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同样缺失的是计划未来并做出适当的社会性决

定的能力，而这一切都与理性思维相关。

近来，神经病学家们集中关注了大脑中情感和理性相互作用的区域。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是前扣带脑皮质。达马西奥指出：

> “这一扇区的受损不仅会受损运动、情感和注意力，还会导致动作与思维程序实际停止，使理性不复存在。”

科学家们迅速指出，没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负责我们所谓的思考行为。相反，他们认识到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用达马西奥的术语，像一个“合奏组”。我们所谓的思想是一支复杂的管弦乐曲，由生物化学与神经系统的调节回路组成一个整体运作，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只有在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心理现象”。

换言之，思考行为以实体的方式将知觉、感觉、情感，以及抽象的推理结合起来。“我参与，故我在”——这与笛卡儿提出的思虑深远的、超然的自主思想完全不同，也并未体验到肉体的玷污。

对脱离实体的理性做重新评估的，不只是神经系统科学家们。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也开始投入这场大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实体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本性，这种方式正在重写人类故事并且为新兴的同理心时代奠定基础。将各学科研究成果联合起来的全是这样一个信条：我们每个人都仅仅存在于和他人的关系中。俄国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如下言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 “存在意味着交流。存在意味着为他人存在，并借由他人，为自己存在。一个人并没有内部的主权领土，他完全是而且总是站在边界上；观察自身内部，他观察的要么是另一个人的眼睛，要么是用另一个人的眼睛观察。”

这与笛卡儿描述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在笛卡儿的世界里，每个思维都是独立运作的，是脱离实体的，因此，没有必要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了解自己或者体验自身的存在。在这个脱离实体的纯理性世界里，只有先验的真理等待着每个人类独立地发现。真理的确定性已然以事实的形式事先存在，受数学证明的管制，只需要纯思想来使用它们，去理解、解读、归类以及评价我们的物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而身体体验的倡导者们对这一想法避而远之：知识、理性和思想的存在是先验的，只需要探求之心从苍茫宇宙中摘取它们并存储在意识里。这些倡导者也对信仰牛顿学说的人们提出的观点感到不快，该观点认为真理的组成是离散的，可以单独地衡量、归类，并遵循一种单调的因果联系。

相反，他们主张精神生活总是与人联系的，因为精神生活是基于我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以及我知道你所知道的观点——这就是思维理论的概念本身。因此，思维本身的发展需要与他人的关系。的确，我们只有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了解自己。正是通过不断地同他人接触，我们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所吸收的、同别人的经历的一种体现。而语言本身，即用言语构建思想的能力，也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仅仅由机器人带大的孩子，没有同人类的接触，如何能够开口说话，因为语言本来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关键在于，我们个人的身份和意识正是在我们同无数其他人独特的体验中形成的。没有一个单纯的独立的“我”，只有一大群独一无二的“我们”。

心理治疗师约翰·罗恩和米克·库珀发现：

> “我们‘内心’生活的内容并不是彻底地藏在个体的‘内部’；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与周边发生相互反应的一项项活动里。”

罗恩和库珀称，如果这一点是事实，那么“我们所有真正的精神活动首先是‘在外部’世界，在人与人之间发生——那就是精神活动产生之处，那也是精神生活最有意义的地方”。

伊曼纽尔·康德是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同勒内·笛卡儿一样，应该会认为体验知识是错误的。康德认为存在先验的、天生的归类，是认知的基础，这与柏拉图式的纯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高处，超越了尘世的喧嚣，存在于某个至高无上的领域。康德赞美这个永恒不变的领域的崇高秩序，与这个虚妄世界的日常体验有天壤之别。他沉思说：

> “我们如今不仅仅探索了纯粹的理解（先验范畴）并仔细地调查

了它的每一部分，而且还测量了它的范围，并合理地给万物分配其应有的地位。这个领域是一座岛屿，被自然本身不可改变的界限所环绕。这就是真理之岛——多么迷人的名字！被浩瀚而汹涌的海洋围绕，那是错觉的故乡，雾堤滚滚，迅速消融的冰川比比皆是，造成了彼岸的假象，一次又一次地迷惑着喜欢冒险的海员，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康德在动乱的世界里寻求确定性，并在纯粹思考的先验范畴中找到了它。然而，真实的世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甚至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在永远变化着。我们所认为的有身体的自我更像是一种活动形式，不断地与世界进行着索取与给予的交换。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延伸的生命，都生活在这股混乱的潮流中。因此，有形的“我”在每时每刻不断被重塑，然而我们的身份却看起来保持不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相信，或至少部分相信脱离实体的模式。比如，当一个人失去一只胳膊，他不会把这只胳膊当作自己的身份，而是会当作一个附属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一种指导性的意志，掌控着我们有形的身体。正如已故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巴雷拉指出：“我们并不说‘我是身体’，而说‘我有身体’。”

2008年，一位名叫玛丽亚·西姆诺维的波兰医生成功地为一个被严重毁容的女士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面容。公众对这个富有争议的过程非常感兴趣，想知道这名患者最终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脸孔时，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身份危机。西姆诺维随后称，这名女士对新面孔感觉舒适，并没有觉得它改变了她的身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接受了器官移植、整容，以及变性手术，获得了人造心脏、四肢以及类似器官，而这些人也有着相似的反应。

身体体验学派的倡导者们辩称，虽然人们感觉他们的自我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在体外的某个领域。相反，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谁，是与我们与他人的种种经历与关系的兴衰起伏紧密相连的，正是这些经历与关系给了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历史。尽管这些经历是具体的、有形的，而与另外一方——无论是人类，还是另一种有情感的生物，还是自然分享时光的“共享”意识是

无形的，它变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历史和身份。

认知语言学教授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巧妙地总结了脱离实体的与有实体的方式对于理性功能的不同影响。脱离实体的观点认为：

> “有形的身体在思维的内容，即实际概念的形成塑造方面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没有给予任何重要的推论。该观点认为概念是形式的，来自于产生形式结构的思维能力，来衍生更进一步的、推测出的形式结构。”

相比之下，体验的方式称每一个物种都具有其独特的感觉器官，设定了如何感知现实的限度。举某种动物为例，如海豚和鲸鱼，它们只能看到黑白两色，而永远无法得知人类眼中的丰富色彩。看到非黑即白的世界塑造了这种生物的心理与现实，与看到彩色世界的物种完全不同。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

> “概念本质属性的创造取决于大脑与身体的组成结构，以及它们在人际关系和在物质世界中起作用的方式。”

老鹰能从一英里[1]外的高空看到兔子。老鹰在高空的定向体验与海豚在海洋上的浮沉是完全不同的。莱考夫和约翰逊写道：

> “传统观点认为，理性不是脱离实体的，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体验。使我们能够感知和走动的同一种神经和认知机能，也创造了我们的概念体系和推理模式。从任何角度而言，理性既不是宇宙的超验特性，也不是脱离实体的思想。相反，对理性的塑造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类身体的特性，是人类大脑神经结构令人赞叹的细节，是我们在世上每天具体的生活。”

例如，人类是唯一的完全用双足直立行走的高级哺乳动物。在世界上直立行走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时空定位，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真实感。尽管你的宠物狗也许特别地通人性擅表达，但是四条腿的参照系使它对于它必须行走在并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性质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弗洛伊德指出，人类与自然很深的疏离感源于“采用了直立的姿势，以及嗅

觉的退化”。一个主要依赖嗅觉的物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显然与以视觉为主导的物种完全不同。

现实靠我们自己理解

不同物种对现实的认知很明显是完全不同的，但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人类的身体体验。我们是唯一可以将身体的认知转化成语言的物种，语言可以用来创造初级的隐喻，进而创造更加抽象的隐喻。

当我们不再去想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有多少关于身体的隐喻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身体体验对于思维过程有多么重要。很多与身体体验有关的词语都变成了人类思维的组成部分。我们“抓住”一个想法，与现实失去“接触”，“延伸”我们的思想，“抓住”一个可能性，“走”过一个问题，“感觉”某人的痛苦，“嗅到”老鼠的味道，“看透”别人对我们说的话，“败退”，“站起来”拥护我们的信念，“跑”单，在一段关系中“失足”等。

莱考夫提醒我们，我们正是通过使用隐喻，想象并建构了我们大部分的现实。使用隐喻是丰富我们身体体验的一种方式，并且给了我们一条让他人能和我们产生同感的故事线索，因为他人的体验也是基于共同的身体、空间与时间定位，这是全人类所共通的。

隐喻的使用为两个人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载体。在符合人类每个成员共同经历的简单的初级隐喻上建构更为复杂的隐喻，是人类想象彼此“现实”的关键所在。比如，当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大头朝下“坠入”爱河里，我们必然会“抓住”这种感觉：他想表达的是自己已失去理智的“落脚点”，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感觉，感到既兴奋又危险，以及将全部的自己托付于人的脆弱感。

身体体验的理念为同理心时代提供了严谨的知识结构，正如笛卡儿先验的脱离实体的真理和圣·奥古斯丁对启示录和上帝慈悲的解读一样，为理性时代和信仰时代分别提供了知识基础。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参与，故我在”的伟大转变，将同理心推到人类故事的中心——这个中心一直被占据着，但从来没有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和认可。波兰哲学家享里克·斯科利莫夫斯基写道：“成为参与式社

会的一员就需要承认参与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了这种关系，事实上我们就承认了同理心。”

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参与式的世界里，而我们的身体体验恰恰是我们同他人不断接触的活动之一，那么同理心就变成了我们更深一步地走入彼此生活的途径。同理心也是我们相互理解并塑造共同现实的途径。然而，我们中仍有许多人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现实是我们凭借彼此结交的关系而创造的对周围的世界的集体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科学方法”，它告诉我们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能够变成外在的观察者来了解现实——这恰恰与身体体验之于现实的方式截然相反。

启蒙运动之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杰作《新工具论》中谈到一种理解和控制现实的新方法。培根概述的方法后来被称为科学方法。不满于古希腊对于科学事事强调问“为什么”的方式，培根将注意力转向了“怎么做”。他写道，古希腊人没有“举出一个倾向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并造福世人的实验”。培根对“如何利用自然进行生产”比仅仅思考人类为什么存在感兴趣得多。

培根的方法深受来自革命性的艺术界“视角”的新观念影响——了解现实的唯一方法是抛开自我，创造一个中立的界限，从而使脱离实体的思想可以对作品进行观察并做出价值中立的判断。培根相信科学方法是一个强大的新思想工具，使人类思想能够“战胜并征服”自然，并且使自然恐惧。培根说，新科学的目的，就是“建立并拓展人类主宰宇宙的力量”。

培根和追随他的理性哲学家们相信，自然只不过是一个装满宝贵资源的仓库，与我们唯一起作用的关系就是对其的控制。对培根而言，现实是客观的，是通过人类的利用表现出来的。我们通过操控自然来了解自然。

相反，研究身体体验的哲学家们暗示，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不是靠从外在施加影响力，而是来自内在参与和同理心共享。人类彼此间的同理心程度越深，参与的程度越强烈，生活的现实领域则越丰富。我们参与的密切程度定义了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程度。我们的体验也变得越来越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我们完全变成了见多识广的人，沉浸在全球事务中。这就是生物圈意识形成的开端。

真理、自由与平等的彻底重塑

以参与的或者身体体验的方式来了解人性的本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思想最基础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还包括对真理构成以及如何定义自由与平等的概念。

当我们谈起“真理”的概念，我们通常指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与其相反的概念是“虚构的”。获得真理往往与现实是同义词。我们常常用“区分事实与虚构”这个短语，事实就是存在于现实中。但是，什么是“真实的”？在笛卡儿的哲学体系中，现实是由事实组成的，存在一种先验，并且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可以发现真理，但不能创造真理。

在体验哲学的框架中，真理存在于别处。这些新一派的哲学家们认为如果现实是我们借由分享的体验而共同构造的，那么真理则不是客观的、自主的现象，而更像是我们对彼此分享的共同体验的解释和说明。当我们说“寻求终极的真理”，我们真正表达的是：想充分地了解我们的关系是如何适应大体系的。我们所追求的真理就是探索我们是如何属于这个全局的，以及为何如此。

当有信仰的人们称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们指的是上帝知悉组成这个参与式的、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所有关系。有实体的人类体验是朝着建立所有联系努力的途径，这些联系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实。同样重要的是，仅仅凭借参与的过程，我们也创造了一部分新的现实。我们的身体体验和相互关系越广阔，我们创造的现实就越多，我们就越接近包容一切的现实以及存在的真理——至少是反映人类参照系的真理。

总而言之，如果现实是体验，而体验永远是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关系越广，我们就能越深入地洞察现实的诸多层面，更进一步地去理解存在的意义。

因此，真理是关于万事万物彼此如何联系的解释和说明。真理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存在于“我”与“你”共建的共同体验的间隙中。这就是“创造现实”。

我们所谓的真理仅仅是对我们现存关系和普遍共识的一种组织。人类存在的真理是：存在离不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体验的哲学方法与信仰和理性完全相悖，后两者忽视了我们体验性的存在。

当我们开始思索生存的意义这个问题时，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生存是否存在某种目的或者方向，如果有的话，每个人该如何适应它。经院哲学家们会辩称，生存的最终目的是热衷于信仰上帝的慈悲，顺从上帝的意志，以求得天堂的某一席位。理性主义者会称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追求物质进步来获得最大的快乐。进化论者的答案是为了生存和繁育后代。然而，身体体验哲学家们认为生存的意义是与他人建立关系，从而尽可能深入地体验生存的现实。生存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地活得充实，活得精彩。

我们在如何思考生存意义这一点上有着根本区别，这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由的概念。自由是理性时代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者称，要自由，就是要自主，不依赖于他人，也不对他人感恩戴德。自由在现代被紧密地联系到“控制自己的劳动以及保护自己的财产”的能力上，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快乐的方法。自由也被紧密地联系到政治领域的代表制，以及市场领域的选择上。法国革命者们高呼每个人在公共领域中都是有主权的个体。古典经济学家们称每个个体在物质世界中追求自我利益的程度是自由的。两者都被视作保护个人自主权的方式。在理性的模式下，自由是被动的——自由地排外，独立于他人，成为孤立的个体。要自由，就是要“自我控制”，自给自足。

自由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个人生命中的潜力，而且真正自由的生活充满了友谊、爱与归属感，这些情感在每一次更加深入且有意义的个人体验，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完善。因此，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在充满“同理心机会”的社会里成长。

检验自由的哪一种定义更为出众的试金石，是临终之时的判断。当一个人回顾自己的一生，很少有人会以累积金钱的多少或是获得多大的自主权来衡量其生存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财富越多，自主权越大，往往人越孤立，无法与他人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我们生活的现实会变得越来越封闭，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孤独。临终之际，多数人会回忆起与他人有着深深羁绊的经历——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同事。只有充满同理心的时刻，才是人生中最强烈的记忆，正是这些体验给人以安慰，给人一种互联的、参与的感觉，给人在世间的停留赋予意义。

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由观点相伴的是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力量与勇敢的观点。当我们想到自由，通常联想到的是独立与勇敢。美国

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最后一句唱道："自由的土地，勇敢的故乡。"在那个将自由视为财富，需要奋斗去争取的年代，勇敢变成了一种符号，象征了我们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决心，要做"命运航船的船长，自己灵魂的主人"。我们认为自由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自由战士"甚至将自由等同于刀枪不入——美国开疆扩土的英勇事迹所歌颂的是完全的自给自足的人。那些先驱者、开山者、牛仔们独自动身驯服荒野的事迹被传颂成拥有真正自由精神的传奇故事。

先驱者的精神确实值得赞赏，但体验学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主张真正的自由需要人们表现出弱点，而不是"刀枪不入"。如果自由是充分发挥潜力的能力，如果衡量人生的标准是关系的亲密程度、范围及多样性，那么人越多地示弱，他或她就越开放，进而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示弱并不是指虚弱，或者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或猎物，相反，示弱是愿意进行人与人之间深层次交流的开放心态。

体验倡导者们认为，真正的勇敢是勇于展露自己，毫不掩饰地为他人展现自己，愿意将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告诉他人。示弱是信任他人的表现。信任，就是相信他人会将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你不会被他人出于私利去利用或操控来实现其应急目的，而是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存在。当一个人被他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对待的时候，这个人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一个人人彼此猜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在这样的世界里，自由即刻沦为消极的、对他人关闭心门、封闭自我的能力。独裁社会里偏执与猜忌盛行，人与人之间针锋相对，自由精神受到了压制。

因此，自由的根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开放。自由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像理性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约翰·韦恩独自在边境，而是一种深刻的公共体验。只有当我们彼此信任，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分享他人的奋斗与蓬勃发展，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信任反过来也为将同理心意识延伸到新的、更加亲密的领域提供了可能。

纳尔逊·曼德拉是体验自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入狱23年多的时间里，在常常被独自监禁的环境中，他选择对狱卒以朋友相待。他以一个自我挣扎的独特人物形象主动地接触他们。曼德拉并没有试图表现得无坚不摧或是坚韧不拔，而是表现得很亲切。狱卒开始感受到他的人情味。先前的偏见逐渐消融，他们开始钦佩曼德拉，并最终信任他，相信

他与普通人一样，有着和他们同样的烦恼。

体验性自由的概念之所以能与大部分人产生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吸收了人类组成的深层意义。而那种刀枪不入的模式——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独狼性人类很罕见，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没见过。表现得毫无弱点就是不需要他人，能够孤立地生活。尽管有些苦行者和遁世者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完整。他们关闭了情感通道，而正是情感通道使人类成为最具社会性的动物。

“刀枪不入”使人联想到了超人，不受种种弱点和缺陷的妨碍。然而，正是这些弱点和缺陷让我们不够完美，需要彼此帮助，因此更有人情味。心理学家迅速指出，如果一个人假装“刀枪不入”，并且表现出对个人权利极高的自由精神，缺乏情感与同情心，那么这种人其实往往对自己的弱点极度恐惧，而他所展现的大男子主义就成了一个掩盖恐惧的面具。

除非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有着同样的弱点和挣扎，则他无法真正地对他人的弱点和痛苦生同理心。倘若一个人锁住了他所有的情感，那么他是完全不自由的，因为他禁锢了自己的灵魂，封锁了他独特的存在，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表达，也无法与世界接触。他变成了禁锢自己人格的狱卒。永远没有人可以了解“真正的他”并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他是真正孤独的，与被排斥或被流放的人无异。

自由与平等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行的。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们认为两者密不可分。它们成了时代新秩序的全部。在理性主义模式下，平等是一个可估量的法律现象。法律的颁布是为了保障政治主权、个人民主权利，以及市场准入。

体验哲学家们用偏心理学的方式去定义平等。他们询问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是平等或不平等的。他们视同理心的拓展为伟大的“调平器”，这种力量扫除了将人们分成主体与客体的种种形式的地位区别。他们提醒我们，只要平等还是以物质的狭隘形式来衡量——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即便是按功绩而不是世袭财富论——最终也总是免不了以“我的”和“你的”这些词语来定义。财富、专业以及学术方面的不同将继续带来地位的差异，将人与人划分开来。

同理心拓展是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真正平等的唯一表现形式。当一个

人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彼此的区别就开始消融。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本身就是平等意识的终极表现。一个人无法产生真正的同理心，除非与他人有同样的情感。如果某人觉得地位比他人优越或是不及他人，因而产生差别与嫌隙，再想设身处地去体验他人的痛苦或喜悦就变得困难了。一个人也许会同情或怜悯他人，或者为他人感到遗憾，然而，要想真正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则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并产生反应。在产生同理心的那一刻，并不存在“我的”和“你的”之分，仅仅是“我”和“你”。同理心是一种志趣相投的共通情感，它产生的时空超越了社会地位的差别。

这并不意味着同理心产生的那一刻就消除了地位和差别。这仅仅意味着在同理心拓展的那一刻，其他的社会壁垒——财富、教育以及专业地位，在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苦痛，提供安慰以及支持的过程中暂时中止作用。平等所表示出的含义并不是有关平等的法定权利，或者经济利益，而是一种观念：他人如同我们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凡人，值得拥有成功的权利。

毫无疑问，地位等级旨在造就不平等。地位就是有关排名以及要求获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每个社会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排外的圈子。一个高度等级分化的社会通常同理心意识很低，因为这样的社会划分了太多的地位等级，要想在自己所属的圈子以外拓展同理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是有限的。

另外，如果一个社会较为复杂，差异化和人格的发展良好，大部分居民生活舒适，且收入差距不大的话，人们往往更快乐，更宽容，更少嫉妒他人，更能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想想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

无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哲学家，还是崇尚世界性身体体验的热心人士，都会认同自由是建立平等的必要前提。然而，他们对自由的哪种定义会更好地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推进平等却意见不一。现代主义者会继续视自由为保障政治上的公民权，保护个人财产权，保障个人获得市场的机会，而世界主义者们则更进一步地视自由为使社会权利最大化，建立、培养和鼓励同理心拓展的环境，进而凭借它撼动传统的社会层级，并缩小社会差异。

由人识己，由己识人的能力是一种深刻的民主化体验。同理心是民

主的灵魂。同理心承认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剥夺的，值得公众平等看待。同理心的进化与平等的进化在整个历史上是并肩前行的。一个文化的同理心越多，其价值观和统治机构就越民主。一个文化的同理心越少，其价值观和统治机构就越极权。尽管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针对历史和统治形式进化的研究对同理心拓展和民主的拓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居然关注得这么少。

向死亡妥协

如果现实是身体体验的反映，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脱离实体体验的迷惑下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有形体验究竟有哪一点，让世上伟大的宗教和理性时代的哲学家们感到如此厌烦？那就是，身体体验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

在史前的采集狩猎文化，甚至早期的园艺社会中，死亡在人们的心里并没有那么严重。尽管意识到了死亡，但在当时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由死亡联想到恐惧的情况。直到人类远古的祖先打破了自然界的循环，一点点儿产生历史意识，对死亡的恐惧才开始笼罩他们的生命。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人们过着群居生活。自我意识模糊，个体的概念并未完全形成。史前意识无异于婴儿和五六岁小孩的意识，对史前人类而言，对死亡的概念和他们自身死亡是意识模糊的。古代的男女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季节的更替记录了时间的流逝。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命，认为生命像季节更替一样，每年周而复始地出生、死亡和重生。而死亡本身甚至被认为仅仅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死去的人们进入了某种冬眠或沉睡状态。

我们曾在第1章里提到，自我意识和初期的个体概念是在伟大的水利农业帝国时代开始产生的，与之相伴的是原始的同理心向更加成熟的同理心意识的过渡。然而，只有当人对自己独特的生命和肉身的存在有了高度的意识，同理心的表达和拓展才有可能。毕竟同理心是能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只有当人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能力。其他的哺乳动物体验原始的同理心，类似于人类的婴儿，对其他动物的痛苦表现出悲伤，甚至前去安慰它们。而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死亡，则产生了更加成熟的同理心。

有趣的是，同理心意识是和脱离实体的信仰相伴发展起来的。伴随信仰时代和理性时代同理心意识大爆发的是宇宙哲学的论调，宣称决心抹杀一切对肉体存在的有限性的承认——要么通过信仰来世，要么通过物质进步的理性化，以及创建未来的永恒的人间理想国。

西方文化已经通过宗教和政治的方式使永生的形象成为惯例。上帝和伟大的领袖被奉为我们的保护神，使我们免受时间的摧残。布兰登在他的主要著作《历史、时间和神》中研究了世界历史上各大宗教信仰，并得出结论，“许多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实践，有着共同的潜在动机——想要打败或逃避时间流逝所必然导致的衰退和死亡过程”。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避难所，以对抗人在世上生命的终结。每个宗教都承诺要么打败时间，要么逃避时间、克服时间、重设时间，或者完全否认时间。我们将宗教作为载体来进入涅槃，进入天国，或者许诺之地。我们开始相信轮回、重生和复活，以期逃避必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

我们精神上对永生的追求在现代早期开始让位于世俗的追求。启蒙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支持人类进步的激进思想，集体声援这个西方文明中全新的世间永生的思想。

进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新观念。在这个新的思想格局中，时间不再用来准备基督的再次降临，而是作为一种途径来推动进步的新表象。相信进步，就是相信未来总会更美好、更广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更长久。进步是没有终点、不可阻挡、毫不间断的。进步将我们加速带进了一个无边无界的未来，一个无限拓展的“永恒的”未来。这种未来的新形象充满了物质主义——物质进步是我们通往永生的入场券，是我们欺骗死亡，克服短暂生命的方式。

科学与技术成了获得救赎的新手段。在危机时刻，我们仰仗科学和技术产品来从混沌势力中拯救失足的人类，这些混沌势力常常干涉我们竭力维持一个安全领域的努力。现代科学技术是物质世界的现世救世主。它们保障我们的安全，并最终保障我们的永生。通过科学技术，我们将延伸对未来，对自然力量，以及对我们自身寿命的掌控。我们将活得更好，活得更久，享受好生活，并进入我们自己创造的人间“伊甸园”，那里物质丰富，将成为我们对抗时间摧残和死亡宰割的堡垒。

这种对未来新形象的理论似乎所向披靡。人类如今相信，他们积聚

的物质财富越多，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刀枪不入”。在他们眼中，到处都有人类不断进步的证明。

现代社会初期，当这个新发现的关于进步的未来形象，以其繁盛的姿态首次给欧洲意识留下深刻印象之际，法国贵族孔多塞抓住了横扫知识界的欢欣鼓舞之感，写下了后世不朽的文字：

> “人类能力的改善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人类的完善是绝无止境的。因此，这种完善的进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大自然将我们置身于地球上，地球能存在多久，人类就能存在多久，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限制。”

组成信仰时代和之后理性时代的脱离实体的宇宙哲学，投下了对死亡极大恐惧的阴影，与成熟阶段颂扬生活的体验性同理心意识截然不同。

当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同理心，这种体验就是对其存在的肯定，是对其生活的颂扬。同理心时刻是我们最生动的体验。我们感到充满活力，因为同理心行为始于身体体验，在这种行为中，我们“超越”了身体的局限，在短时间内活在共享的脱离肉体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将我们自己同周围的生命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相互联系，嵌入了由我们的关系所创造的现实。我们的同理心意识越成熟，我们参与生活就越密切和普遍，我们对现实层次的理解就越深。颂扬生活意味着与他人一起坚定地生活。同理心浅薄、体验有限的人，活得并不彻底。独居的生活永远活得不丰富多彩。

设想存在永恒的天堂和人间的理想国，两者都有着对追求完美的迷恋。追求完美，就要超越人类身体受到的时空限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完善人的技能或手艺，而是完善人的存在本身。在定义一个完美的人类概念时，我们会想到某人不受厄运和灾难打击，不受压力和悲伤影响——而凡人往往被这些困扰。完美的人类是没有缺点的，与生活中乱糟糟的部分一刀两断，不受衰退的摧残和岁月流逝的影响。追求完美就是要赶走死亡。

在宗教体系中，完美意味着过禁欲的生活，不受肉体存在的种种污点的损伤。独身者是脱离世界最高程度的表现。顺从的基督徒被指示要时刻仰望神的慈悲，拯救人舍弃肉身进入天国，人的灵魂居于最崇高的

完美境界。奥古斯丁告诫信徒们，现世的生命仅仅是救赎路上的一个小站："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理性时代，完美的概念有了现世的时间维度。超越了肉体的局限，这是宗教意识的标志，逐渐让位于对人的寿命的逃避。效率代替禁欲成为完善自我，阻挡死亡的手段。

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曙光来临之前，"效率"一词有着神学上的隐含意义。上帝是高效的。《创世记》，即《圣经》新约部分的第一部书，并没有以"很久很久以前"为开头，而是讲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使上帝成为最高效的创造者。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波及欧美，"效率"一词在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手中变形了。热力学定律的引入激起了人们对机器内部能量流动实验的浓厚兴趣。效率发生大转变。在新的工业化社会里，效率被重新定义为以投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劳动、精力和金钱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工程师们梦想着拥有永动机的完美效率，希望能够克服热力学第二定律。追求完美的效率就是要尽可能地产出最优产量，而不需要花费任何时间、劳动、精力和金钱。上帝创造整个世界时仅仅思考一下，世间万物就诞生了，这就是完美的效率。

效率变成了现世的一种争取永生的手段。一个人的效率越高，产出就越多，积聚的财富就越多，损失的时间就越少，就越接近一种超越热力学定律和令人恐惧的熵的状态。效率开始意味着"争取时间"。

效率的概念快速地进入工业领域，并由提出了科学管理原则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各大工厂和管理部门加以普及。从此以后，效率又进入了学校、公共生活，甚至涉足家庭关系。追求效率成为现代人的最高美德。在这股狂热之下，有一种潜意识或至少是一种没有明说的感觉——效率越高，人就能从某种意义上节省时间，从而逃脱死亡。

在这种现世的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下重建经济和社会关系，会产生一种让所有关系为产量服务的效应。所有的事物和人类活动都变成了一种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的手段。然而，我们会以一种注重效率的方式对待我们真正关心的人吗？我们会以花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劳动、经历和金钱来获得最大产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爱与情感，展现我们的热情与关注吗？一个人能高效地体验真正的亲密或者快乐吗？我们可能以

高效的方式深刻地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吗？将关系变为追求效率以获得产出的手段只会使同理心精神遭到破坏。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将“珍贵时间”的理念引入了家庭关系中，要求父母在超负荷忙碌的一天中保留一小段时间来和孩子们“接触”。而这种有组织的亲密行为强迫出来的效率往往难以奏效，深厚的关系需要花时间来培养。

现代对效率的近乎病态的痴迷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希望能够通过节省时间让人在世上生存的时间无限地向未来延伸。任何人如果曾经接触过某个效率极高的人，都能察觉到这种恐惧。想要接近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同理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超越了死亡——不是抑制身体体验的短暂性，而是承认它，无论它有多么脆弱，然后最充分地享受生活。追求完美逐渐让位于寻求自我实现。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试着将生活发挥到极致。诗人赖纳·里尔克写道：“正确地理解和颂扬死亡，就同时赞美了生存。”黑格尔提醒我们，所有的生命“在存在的那一刻就撒下了死亡的种子：诞生之时即是死亡之时”。承认了死，我们就肯定了生。

我们对他人跟死亡做斗争，努力求生的行为感同身受。从他人的虚弱无力中我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没有人能对一个完美的人产生同理心。对他人的支持，安慰和帮助正是对他人活着的肯定与赞颂。这种共通的纽带强化了我们自身活着的感觉。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满怀同理心的拥抱更让人感到充满生机？

成熟的同理心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只有活着的、有血肉的人类才能体验。这就是为什么教徒能够服从和侍奉上帝，却不可能对他的灵魂产生同理心，因为教徒认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永生的，与凡人不同，因此无法体会他们独特的痛苦与挣扎。我们没有办法对神有同理心，当然，上帝也没有办法对人有同理心。

使徒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试图理解神，名为耶稣的人类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成千上万的人类可以对耶稣早年的苦难和因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早逝产生同理心。然而，耶稣复活成了不死之身——这个2 000多年来争议的焦点削弱了原本人能感受到的强有力的同理心纽带，本来耶稣的故事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如果历史上的耶稣知道自己是上

帝之子，派到人间去拯救人类，而上帝必然会使他复活，让他进入天堂，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赴死的故事就没有那么令人叹服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不会真正地死亡。

同理心意识无论是与天堂还是理想国，都毫不相称。没有凡人的痛苦，就没有同理心的纽带。

还应注意到的是，同理心意识旺盛之处，对死亡的恐惧便消退了，追求来世救赎或人间理想国的悔恨也消失了。年轻的后物质一代，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和精神追求，不再那么迷信宗教，对来世或者理想国也不那么感兴趣，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如果人此时此地能过着充满体验，充满深入参与的生活，他或她就不太可能梦想着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完美状态下找到安慰了。

同理心时代的信仰和理性

如果同理心意识由身体体验产生，是对生命的颂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信仰和理性？信仰和理性是脱离实体地看待现实，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的两种方式。正如我们以同理心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真理、自由、勇敢、平等、民主以及死亡的概念，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定义它们的方式，这对信仰和理性同样适用。

当我们对信仰的概念进行解构，会发现在核心处有三个基本支柱：敬畏、信任和超越。信仰宗教的冲动始于敬畏，对生存的奇妙感觉，既神秘又神圣。敬畏是对生命的最深刻的赞美。我们对大自然的一切感到惊奇，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我们所惊叹的奇妙世界。当我们伸出手，去亲身体验，去拥抱“他人”，让生存变得完整，就会发现我们自身与这个宏大的自然框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理心是我们通过探索自己同令人敬畏的自然的关系来超越自我的途径。亚瑟·乔拉米卡利和凯瑟琳·柯茜在他们合著的《你的感觉，我懂！》一书中写道，这种超越的冲动来自“对建立联系的渴望，渴望与某种比我们自身更大、更强的东西建立关系”。那个更大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敬畏的生存的秘密。

虽然敬畏能通向超越，但也可能通向绝望。如果人不能领悟生存的意义，敬畏会很容易地变成恐惧。那时，我们就面临着一种个人意义的危机，也就是信仰危机。毕竟，信仰是相信生存是有一定意义的。

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就和我们大部分人曾经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过的那样，经历了信仰危机。他这么写道：

> “我感到我的体内有某种东西破碎了，那是我的生命赖以栖息之地，我失去了我所坚持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害怕活着，我想要逃离，尽管如此，我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

两年来，托尔斯泰为他在世上存在的孤独与放纵痛苦不已。而后有一天，当他在树林里散步，突然间领悟了信仰。他意识到信仰是相信人的生命是值得活着的，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生命在大的自然框架里就有了意义，因此需要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关系以便活得充实。托尔斯泰得出如下结论，

> “信仰就是生命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人就不会毁掉自己，而会继续活下去。信仰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力量。如果人类不相信自己必须为某事而活，那他根本就无法活下去。”

尽管信仰由敬畏产生，要相信人的生命在更宏大而普遍的意义上是有意义的，但信仰也可能被偷换概念并塞进某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强迫人顺从，助长对死亡的恐惧，采取脱离实体的方式，建立严格的边界来区分哪些是被拯救的，哪些是被诅咒的。大部分有组织的宗教就是这么做的。

利用敬畏和信仰在生存意义上的作用，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实体体验得到发展，让同理心意识得到壮大。

同理心意识始于敬畏，当我们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时，我们亲眼见证了我们自身神奇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将我们与其他的生命联系起来。同理心是我们对所谓的生存这个模糊的词的深深敬意。即使我们并不确定生存到底是什么，解释起来也很困难，但“当我们体验了就能明白”。它激发了敬畏，因为它是如此的强大与神秘。它到底来自哪里？它是怎么到那里的？我们为什么是它的一部分？它有什么意义？它有目的吗？

正是敬畏激发了人类所有的想象。没有敬畏，我们将不再惊奇，没有惊奇，我们将无法进行想象，也因此无法将别人的生活“想象”成自己的。我们知道同理心不能没有想象。而想象不能没有惊奇，惊奇也不能没有敬畏。同理心代表了敬畏最深刻的表现，当然，同理心也被视为最神圣的人类品质。

而同理心也需要信任——愿意将自己屈服于生存的神秘，无论是上至宇宙，还是下至与他人的日常生活。信任是同理心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反过来能让我们探索存在于万物中的神的影子。同理心成了仰望神的窗口。我们正是通过同理心的拓展来超越自我，并开始与生存的神秘联系起来。我们的同理心体验越深刻、越普遍，我们就越能体验生命的完整性，我们变得更能参与一切、知道一切，并且属于一切。

倘若仔细观察世界上有组织的宗教，就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用这种体验的方式在字里行间探寻神的踪影。神学家称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

万有在神论作为一种认识上帝的方式既肯定了上帝的超越性，又肯定了上帝的内在性。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并不是“外在”的某个存在。希腊语词根指出了它的意思：pan意味着“一切”，en意味着“在……之内”，而theis意味着“上帝”。上帝不只是一切（因此，上帝是超越的），而万物皆在上帝中（因此，上帝是内在的）。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就在这里”，正如上帝也不只“在这里”。

而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核心教义大部分仍然是脱离实体和现世的，切断了同理心的拓展以及对上帝的内在性探寻。

在同理心时代，精神性将不可避免地代替宗教性。精神性是一个深层次的个人发现之旅，而身体体验一般情况下会成为建立联系的指南，同理心会成为促进超越的途径。世界价值观调查同其他无数的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人对神的态度有了转变，工业化国家里的年青一代逐渐对有组织的宗教感到厌倦，转向对个人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在自然中得以体现，并以同理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同样也可以将理性从脱离实体的启蒙运动的根源中提取出来，在体验的同理心框架里重铸并加以利用。尽管理性一词往往被联想到合

理化——将现象抽象化并加以分类，通常需要可量化的度量工具，然而理性的含义不只是如此。理性包含了留心、反思、反省、沉思、冥想，以及揣摩，还包括修辞和文学上的思考方式。理性包含了这一切，甚至包含更多。我们想到理性时，通常想到的是从直接的体验中后退一步，在我们的记忆中探寻是否存在类似的体验，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恰当的判断或者决策，从而做出最佳的反应。

关键的问题是，理性是从哪里来的？笛卡儿哲学和康德哲学认为理性的存在是一个先验的现象，独立于体验之外，静待人类获取，而这并不符合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运用理性的方式。理性是一种组织体验的方式，依赖多种精神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绝不是脱离于体验之外的，而是一种理解和管理体验的手段。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的那样，体验始于与他人接触产生的感知与感觉，并在理性的帮助下迅速地转化为情绪，然后再次在理性的帮助下转化成有目的的行为。体验并不总是有序地进行的。人的感觉仍可能是不成熟的，未成形的。人有时甚至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同样，我们的情感也可能走向极端，给我们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

同理心将感知、感觉、情绪，以及理性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联系起来，为了达到与我们自身之外的芸芸众生共享的目的。如果同理心不存在，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有情绪和可以理性地思考。许多学者错误地将同理心仅仅联想为感觉和情绪。如果这就是同理心的全部，那么同理心意识就不可能存在了。

我们开始了解到同理心不仅需要亲密接触，还需要一定的超脱。如果我们把情感完全宣泄在他人身上，或者他人的情感淹没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会失去自我和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他人境遇的能力。同理心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人要怀着开放的心态体会他人的痛苦，就好像自己的经历一样，但不能被痛苦吞没，牺牲自己作为独特的独立生命的自我意识。同理心需要一个我和你之间可以互相渗透的界限，让我们两个生命可以在一个共享的精神空间里融为一体。

尽管感知和感觉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初步建立联系，但它们会迅速地被我们过去的记忆过滤，并且被我们运用各种理性的力量加以组织，从而建立一种恰当的情绪和认知，并做出反应。整个过程就组成了同理心意识。正如在第1章里提到的，同理心既是一种情感体验，也是一种认

知体验。

那么，理性就是我们控制情感世界的过程，来创造心理学家所谓的亲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交智力。同理心是这个过程的实质。随着社会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差异越来越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样，理性也变得越来越老练。与他人接触得越多，需要组织的情感就越多。理性变得更加擅长将涌动的体验情感抽象并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具世界性。这并不是说理性就不能用来开发其他的东西，比如达到自恋的目的，或者在人群中制造恐慌。

通过重新塑造作为同理心意识亲密伙伴的信仰和理性，我们创造了一股新的历史合力，将信仰时代和理性时代的许多最有力的、令人叹服的特征包含其中，而将动摇对生命的颂扬的脱离实体的故事情节，则抛在身后。

缩小“实然—应然”鸿沟

将敬畏和理性这样的核心特征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同理心意识，让我们超越了身体体验与规定行为之间自古以来的分歧——长久以来困扰着神学与哲学的所谓的“实然”与“应然”的鸿沟。

因为无论是基于信仰的意识还是理性的意识，大部分都贬低身体体验，认为人类的肉体和动机在宗教里是堕落和不纯洁的，在世俗哲学中是寻欢作乐和功利主义的，总是需要自上而下地施加道德规范来确保亲社会的行为。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肉体的感觉、情感和热情是邪恶的、不可理喻的，或者有可能是病态的，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不断地加以控制。亚伯拉罕诸教依靠上帝的权威，以遵守十诫为准则，不断保持道德上适当的行为。而犹太人引入了黄金律作为一种最高道德，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律最初常常用于否定意义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亚洲的宗教和思想流派，包括印度教、佛教、儒家哲学以及道教，也阐述了它们各自不同形式的黄金律。

我们将在第6章看到，古时对黄金律的广泛宣传是一个强有力的同理心激增的表现，也是人类意识的一个质变，然而它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与之相伴的假设都是脱离实体的。虔诚的信徒，尤其是

亚伯拉罕诸教的信徒，必须遵守黄金律，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感受，而是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律法需要服从，以免激怒上帝遭到惩罚。

甚至连《圣经》新约部分中《路加福音》里慈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也认同这个观念，即注重对上帝的义务，而不是对一个陌生人产生同理心。在这个寓言中，一个法律学者问耶稣："我必须做什么才能继承永恒的生命？"耶稣回答说："你应当爱主，你的上帝，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待邻如己。"如果一个人同情陌生人并且爱上帝，那么他必将获得永恒的救赎。安慰陌生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与争取天堂的席位联系在一起，因此将其归于功利行为也无可非议。

康德在他的绝对命令中阐明了黄金律在现代的理性作用。康德的命令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只按照能够变成普遍法则的箴言行事。"其次，"要如此待人，不管是对待自己还是他人，总是作为一种目的，而从不简单地作为一种手段。"尽管康德除去了大部分宗教体验中包含的做善事出于私利的方面，他也除去了"感受的"体验，这个让同情心如此强大和令人赞叹的成分。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康德称感觉并不是可靠的道德行为指南。感觉、情绪以及热情都太主观，太随意，无法建立普遍的道德标准。相反，他认为他的绝对命令是对普遍的道德准则的阐发，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不依赖于实证情况。换言之，纯理性超越了情绪的主观性，规定着人的道德义务。有道德的人是冷酷的、超然的、无私的，受理性和道德义务的驱动而不是情绪与热情的驱使。

甚至连弗洛伊德在他对理性意识强势的正面进攻中，也感到不得不引入一个脱离实体的道德机制，来监督他所认为的无理性的性冲动。"潜意识"这个观念的引入严重破坏了一个旧观点，即认为一个理性的头脑做事冷静，统治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他暗示，人类充满了原始的性冲动——这就是本我的领域，受唯乐原则的支配。

尽管弗洛伊德认为现实原则和自我形成在婴儿早期就被迅速引入，控制了这些强大的力量，但他仍然感到不得不引入第三个结构——超我，作为一个脱离实体的道德权威来统治社会行为。超我作为思想的道德权威，独立于身体体验之外而存在，并作为道德指南针的作用，很像

康德的绝对命令。

在这三个阶段的人类意识中——神学的、思想的以及早期心理的，道德权威是脱离实体的，至少主流的正统说法是这样。这是因为身体体验被认为是堕落的，无理性的或者是病态的。结果纵观历史，人的身体体验与我们的道德规定之间存在着鸿沟。似乎我们的身体体验需要被强迫、被定型、被诱导来遵守道德准则。换言之，隐含的猜测是人性与符合道德的行为相抵触，需要“用鞭子引导其走上正轨”，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事实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时常暗示的实然—应然鸿沟，即无法缩小人类“实际的”和“应该的”两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差距。只要身体体验被认为与道德律法不相关，或者相抵触，那么在人类现有的行为与人类应有的行为之间就永远存在差距。

同理心意识克服了实然—应然鸿沟。同理心行为是实体的体验，是充满了敬畏的，并且依赖情感和理性。同样重要的是，同理心意识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规定性的。在“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之间并不存在分界线，它们完全是一回事儿。当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人的痛苦，通过安慰和支持他人来赞美他们的生命，这个人就活得真实，活得完整。他的自我放大了，拓展了，满溢了，进入了更广阔、更宽容的，富有同情心的群体。产生同理心的过程拓展了道德的领域。

任何体验过同理心的人都知道，同理心不可能出于“是人的道德义务，因此是一种普遍义务”的理由而被命令感受到或者追求到。同理心能够同时被感觉和理性捕捉到，是一种重大的体验。

因此，同理心意识并不依赖一个外部强加的道德准则，而是存在于一个培养的环境里。一个人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人自婴儿时期起，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提供适当的社会和公共语境，社会能呈现出这样的环境。尽管原始的同理心潜质也存在于某些哺乳动物的大脑中，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但是要达到人类那样的成熟表现则需要学习和实践，以及一个良好的环境。写在法律和社会政策里的道德准则可以作为学习指南和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倘若一个人行善是被迫而为的，或是不做会遭受惩罚，或是做了会获得回报，那么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善良，真正的善良源于人有同理心的本性。我们并不是因为命令或者承诺而将道德上适当的行为内在化，而是通过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将道德行为具体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就是要有普遍的同理心，因此，人的身体体验在道德上应适当。

同理心近来已变成了公共讨论的一个流行词，成了政策领域、专业群体和民间团体争论的焦点。这个词近来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词的支持。奥巴马将同理心作为他个人政治哲学的核心以及政治决策的中心，从实行外交政策到选择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能恰当地理解同理心在人类历史上的演变，那么我们就会冒着将这个词泯然于众的风险，甚至使其沦为嘲笑与讽刺的对象。正如在一个媒介驱动的社会里所常见的，这种社会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从一个儿童时期的小毛病突变为整个社会的流行病。因此，肩负着重新思考人类同理心性质的机会很有可能变成短时的媒体炒作，导致这个词沦为死气沉沉的陈词滥调。在人类历史的紧要关头，没有什么比进行一场关于“同理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和经营上的作用”的有意义的文化辩论更重要了。

这样的一场辩论不再是某个小圈子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必要行为。我们日益复杂的、高耗能的全球文明正逐步将人类推向灭绝的边缘。倘若科学家说的是真的，那么不用一个世纪，人类就有可能从这个星球上销声匿迹。尽管我们正迅速地进化为同理人，然而我们欠下的熵账单还是为我们接近世界意识顶峰的努力蒙上了阴影。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回顾我们的脚步，来了解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从而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更加安全的前进路线，让我们从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繁荣地发展，同时又减少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与人类同胞和孕育生命的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仅有几年的时间来为人类文明寻找一个新的经济路线图——它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能源机制，更加可持续，并且能给高烧不退的生物圈降温。

人类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要违背历史并创造一个新的、更加相互依存的文明，消耗的能源更少而不是更多，而同理心要继续发展成熟，全球意识要进一步拓展，直到我们将同情心与慈悲心充满整个地球，而不是耗尽地球的能源。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了解，随着人类文明一代代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耗能越来越高，人类的意识是怎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起来的。通过对人类过去的重新发现，我们找到了重要线索为有意识的未来改变方向。随着自身的生存陷入危机，我们无法再漫不经心地面对同理心意识如何在整个历史上进

化，以及我们居住的地球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回顾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能源通信体系、同理心的提升和与之相伴的人类意识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熵，将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人类社会地图，能了解人类从何而来，也希望这个地图会成为一个指南，纠正我们的前进方向，帮助我们驶向同理心时代。

---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二部分 同理心与文明

第6章 古代的神学意识与父权经济

在历史上，人类意识发生了多次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人类意识的变化总是伴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能源利用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生活在狩猎和采集时代的人类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人类肯定具有不同的意识，而生活在工业时代的人类与生活在农业时代的人类肯定也具有不同的意识。这是因为能源利用机制的质变往往伴随着人类通信方式的变化，而通信方式的变化重塑了人类大脑理解现实、组织现实的方式。

在所有以狩猎与采集为基础的社会中，文化都是以口述的方式表现，而口述文化根本创造不出文字。相似地，几乎所有农耕文化都创造出某种形式的文字和计算体系，以便安排粮食作物的种植、储藏和分配。如果没有书面交流方式的出现，人类就无法在19世纪安排和管理好煤炭、蒸汽机和铁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第一代电子通信产品的出现，尤其是电话和之后的收音机、电视机的出现，变成了人类主要的管理和营销工具，它们的出现推动了以内燃机与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形成。

通信机制反过来改变了人类意识。口述文化充满了神话意识，书写文化催生了神学意识，印刷文化伴随着思想意识，第一代电子文化催生了心理意识的全面勃兴。

当然，一切并不是都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进行。这些阶段的意识并不是像变魔术一样，在适当的时间节点突然跳出来组织新的能源和通信机制。一般来讲，旧意识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新兴的能源和通信革命早期。然而，旧的能源和通信技术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孕育了新意识。

不同阶段的意识是人类精神世界对观察视角的重新定位，当新的能源与通信革命催生了新的社会制度时，这种重新定位就会发生。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集体拓展到了新范围和新领域，经历了心理学家们所说的“格式塔转变”，借用机械学的一个简单术语来讲，就是人类意识的时

空维度经历了“再校准”。我们看事情的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在重新解读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人类会努力寻找自己在新环境中的地位和目标。这个重新解读的过程会受到人类与周围环境的新关系的制约。换句话讲，我们当前同自然界、世界和宇宙发生互动的方式，会直接影响我们看待和解读它们的方式，甚至是我们在描述对自我和现实的感觉时所用的隐喻，也是从这些关系中借用的。在农耕文明中，人类用农耕方面的隐喻来描述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的思想意识是围绕着机械学领域的隐喻展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则使用与电力有关的术语来重新解读宇宙。

不同阶段的人类意识划定了现实世界的外部界限。它们捕捉并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时空维度，反映了人类集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当前文明状态下的拓展范围。神话意识、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和心理意识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时空维度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后起的社会秩序都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架构更为复杂，时空维度更为广阔，还有可能促进人类同理心的拓展，并提高地球生物圈的熵的总体水平。

不同阶段的人类意识还重新划定了“我们”与“它们”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就像一堵墙，墙的一边居住着“我们”人类，另一边则是居住着“它们”异类的无人地带。对于神话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非人类的事物，或者说恶魔、怪物。对于神学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异族人或异教徒。对于思想意识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野蛮者。对于心理学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具有病态心理者。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能源与通信革命都扩大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它们”纳入人类熟悉的范围。今天，全球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和空中旅行将接近2/3的人类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每个星期7天、每天24个小时的连续反馈回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同理心作用范围的拓展到了地球的整个生物圈，异类的范围正在缩小。然而，人类同理心拓展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熵账单增加的速度。

每个阶段的人类意识都是一部逐渐展开的伟大戏剧的组成元素。这部戏剧位于人类发展历程的中心，就是同理心表达方式的演变及其造成的阴影——人类造成的熵账单。

但是，人们如何验证同理心表达方式这种没有固定形态的事物呢？

幸运的是，我们记录了同理心与人类意识的演变过程，证据就存在于人类的对话中。人类正是在历史中通过对话讲述了关于自身的故事，它存在于我们留下的叙事中。

首先产生了文字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科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一生致力于揭示光和颜色的奥秘。他为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歌德童话：青蛇和美丽的百合花》中，歌德写道："国王问青蛇：'比黄金更美好的是什么？'青蛇回答说：'是光。'国王又问：'什么比光更令人舒畅？'青蛇回答说：'对话。'"据我们所知，在各种动物中，唯独人类才会讲故事，即只有人类才有叙事能力。叙事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每当人类意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叙事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核心主题。我们之所以能彼此沟通，倾听彼此的故事，是因为我们在寻求彼此的陪伴，希望同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和情感，提高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人类的会话与交流，无论是语言表达、文字表达，还是互联网媒介表达，都是我们向他人展现自我、了解他人真实情况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人面临的现实因素融入我们自己的现实状况中。美国耶鲁大学宗教哲学教授路易斯·杜普雷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文化的知识基础》一书中指出：

> "对话需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己的立场，了解他人的真实情况。我越是向他人袒露自己，我越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并获得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感。"

因此，对话成为人类相互交流情感的必要工具。正是通过对话，我们建立了关系，这些关系塑造了我们独特的个人故事和身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和传播学教授佩吉·米勒进行了一组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些生活在巴尔的摩蓝领工人聚居区的年轻母亲和儿童，研究目的是评估叙事在日常社交过程中的作用。米勒用录音机录下了他所听到的成年人与孩子的对话，结果发现，在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大约出现了8.5次叙事，或者说，每7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叙事，而75%的叙事都是由母亲完成的，孩子的角色只是倾听者。叙事过程都是从一个突发事件开始的，涉及主角、原因、受害者以及同谋者。所有叙事都是线性叙事。换句话

说，从一开始，成年人就让孩子明白生活是一场逐渐展开的戏剧，以故事的形式被人讲述。通过讲故事，人类得以梳理和回顾自身的经历，并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

为了促进儿童语言能力与社交能力的发展，人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童话故事。孩子一边听到父母读童话故事或其他故事，一边看着书上的图片和书页上的字。童话故事都是构思简单的戏剧性叙事，让孩子对社会关系形成初步的了解。这些故事具有世俗性，内容往往都是人类的历史经历，所以讲故事的一个隐含目的就在于提供一些可能对未来有用的启示和指导。当父母给孩子读一篇童话故事并让他们进行反思，或者当父母让孩子反思刚刚经历过的一个事件时，孩子就会在反思的过程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自己的认识。反思就是思考一件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以便从中汲取对于未来行为的重要借鉴价值。

第4章中提到的介导联想就是父母试图用叙事帮助孩子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孩子通过“内化”事件，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在之后的游戏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将戏剧性叙事演绎出来。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叙事过程的一部分。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以及冲突解决方式都是通过叙事过程介绍给孩子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在《有意义的行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感召力的观点：“叙事能力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形式之一。”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和戏剧化，能够让人们退后一步，全面地审视这一事件。叙事需要叙事者具有真正的思考精神和思考能力，同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叙事者才能缓和局面，甚至能够从多个视角进行讲述，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潜在冲突。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冲突发生后，观察者让当事人冷静和放松下来，叙述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叙事者在重新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时，如果能远离自己所叙述的事，保持一定的客观与理性的态度，就能够将所有发生的事情联系一起进行分析，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能够重新控制事件的进程。

在日常交谈中，同一个事件通常由几个人讲述，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解读。孩子们倾听了多人从多个视角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后，就会逐渐明白每个人的社会互动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逐渐认识到别人的感觉可能和自己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在倾听他人对某一事件的解读时，孩子们不仅会识别出不同的观点，还会试图寻找共同的情感。这是孩子们在形成自我意识阶段的一种必要的学习体验。自我意识形成后，

孩子们就有能力将他人视为一个具有独特情感、视角和故事的个体，并能够寻找与他人共同的情感基础。叙事在将同理心痛苦转变为同理心参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叙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生活体验。辛辛那提大学麦克密根文理学院院长瓦莱丽·格雷·哈德卡斯尔为我们揭示了所有人类交流对情感的重要影响。她在《自我的发展》一文中写道：

>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故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遗忘，但有些会被讲述一遍又一遍，最后构成一个核心，影响着周围的其他事件。但所有故事的核心是讲话人所表达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叙事是我们整合与巩固对周围事件的情绪化反应的一种方式，是让生活故事对我们和他人产生意义的一种方式。叙事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

通过复述和重塑自己的生活故事，我们不断地磨炼自我意识，以便适应不同的人生阶段，适应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经历。无论是我们自己讲述的故事，还是别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

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多次通信方式的革命，无论是口头语言、书写文字、印刷技术还是电子技术，每一次革命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先进的交流途径，便于我们分享个人和集体的故事，并将同理心的适用范围拓展到更多的人和动物。通信技术革命跨越时空界限，以更快的速度将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使人类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享我们的故事，也推动了同理心的普及。

从宏观视角分析能源与通信范式，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同理心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并评估它们对于拓展人类同理心意识所做的贡献。

神话意识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活中超过93%的时间都在采集，只是偶尔会打猎。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我们古老的祖先也是依靠土地生活，他们每天、每年的劳作安排与季节的变化保持着同样的节奏。

当时，基本的社会单元是只有数十人到百余人的氏族，比这更大的社会单元几乎不存在。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但不具备内省和反思能力。自我意识不得不等到文明的曙光和更复杂的社会制度出现之后，才得以逐渐形成。当时的人类社会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几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劳动产品也没有盈余，因此也几乎无法将氏族成员的地位区别开来。同我们的“亲戚”大猩猩一样，当时的人类社会尽管也存在着原始形态的“啄序”，占据优势的通常是阿尔法男和老人——他们是氏族集体记忆的传承者和智慧的储备者，但当时的社会比之后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平等。不过，不要与现在的民主社会混为一谈。

通过研究现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时代的部落遗址，我们发现，早期的人类必须善于探索周围环境，并且具有良好的记忆力，能记住哪些植物、昆虫和小动物能吃，哪些不能吃，还必须谙熟季节的变化，因为谙熟只有在顺应季节变化的前提下，他们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达尔文对原始社会人类敏锐的模仿意识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不断地观察，并模仿其他动物的行为，强烈地希望把这些行为变成自己的。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模仿可能是早期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它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周围环境的资源，以确保自己的生存。他在《技术与人类发展》一书中写道：

> “原始人类充满了模仿欲和好奇心，可能从蜘蛛那里学会了诱捕，从小鸟的巢穴那里学会了编制箩筐，从海狸那里学会了修建堤坝，从兔子那里学会了挖洞，从蛇那里学会了使用毒药。与大多数物种不同的是，人类会毫不犹豫地学习其他生物，效仿它们的方法。人类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和获取食物的方式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概率。”

同黑猩猩一样，古代人类的绝大部分食物都是水果和蔬菜。偶尔的狩猎会让他们尝到肉的味道，但这无疑也会触发他们原始状态下的同理心意识，给他们带来痛苦，尤其是在这些早期人类还并未明确地将自己同动物世界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分散和渗透的，人类、动物和植物相互存在，并不断地互动和融合。举行仪式时，人类普遍穿戴着鹿角、毛皮、羽毛和动物身体的其他部分，并在舞蹈中模仿动物的动作。当他们杀了野兽，他们会哀悼一会儿，请求动物的理解——这只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生存而迫不得已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仅会表现出一种亏欠感，还会表现出原始的同理心痛苦。

远古时代的人类无法区分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想象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以及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他们只经历了有限的过去，对未来几乎没有感觉。他们的生活经常遭到自然力量的影响，需要立即做出回应。每个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力量——风、雨、落石、太阳、月亮和其他生物，都代表着一种神灵或恶魔，被他们视为朋友或敌人。如果石头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砸伤了他们，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巫师向石头施法来伤害他们，或者把石头看作石人，是石人在伤害他们。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将“原始思维”称为“前逻辑思维”，因为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神话和神秘的世界中，虽然他们深度参与了这个社会，但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原始人类认为老虎和大象都是人类，像人类一样生活，只不过具体的表象变成了老虎和大象而已。

最重要的是，同小孩子一样，原始人类没有一个清晰的个体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区分开。布吕尔指出，原始人的思维中没有“我”，只有“我们”。虽然可能存在一点儿“我”的意识，但原始人显然不理解这种意识的内涵。原始人只有在伤害到其他人、杀死一只动物或砍倒一棵树时，这种“我”的意识才是最明显的。因为原始人将动物和树木视为具有另一种表象的人类，而且他们没有个体意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攻击行为针对的是对方的整个氏族。因此，被伤害者在采取报复措施时也会针对施暴者所在氏族的任一成员或全部成员。由于不存在个体意识，伤害和反击往往针对的是一个集体。任何一个人都是他所在集体的代表。氏族和部落的仇杀和复仇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模糊的个体意识。

因为同理心的表达需要人类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能够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将其他人视为一个不同于自己的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原始人的同理心只是停留在基本阶段的同理心痛苦而已，和六七岁的儿童差不多。

如果说在这种模糊的、没有身份差异的生存状态下还有一丝希望的话，那就是远古人类并没有死亡的概念，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终究会死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所有的原始社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人们不会死，只是睡着了，进入了另外一个与当前世界同时存在的世界，还是会偶尔以其他的状态回到当前这个“凡人的”世界。

原始人既没有“死”的概念，也没有“生”的概念。“生”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圣灵感孕”之类的事情，一个神灵进入了女孩的身体，然后她就生下了婴儿。原始人对婴儿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理解，他们认为婴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一半属性是人类，另一半属性是神灵，并且婴儿出生后与出生前的那个世界仍然保持着联系。这种混合性质的婴儿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经过多个仪式，逐渐变成了人类社区的一分子。人类世界与神灵的世界就像一道旋转门，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居住一段时间之后，终究要回到神灵的世界，然后再偶尔转世到现实世界。前世可能是老虎、植物、岩石甚至星星。原始人的转世观念将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永恒地、完美无缝地对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空间。

由于原始人没有明确的生死观，生死界限极其模糊，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死没有形成独特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同理心一直停留在原始形态，只是对其他人的苦难感到痛苦，而不会跟自己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产生认同感。在原始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成熟的同理心去看待他人的痛苦，他们的同理心跟今天五六岁的儿童处于同一水平。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死亡”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意义。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生”的意义，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动植物的驯化与人类的进化

随着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能源消耗机制也发生了过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我意识的曙光冉冉升起，而且在之后的数千年间，同理心意识逐渐形成和深化。

新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当时，新能源机制的基础是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这种新机制磨炼了人类的驯化能力。当时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大部分男性则放牛牧羊。驯化动物和植物都需要人类具有持续不断的专注力，注意观察它们的自然繁殖规律。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意味着人类的生存范围变狭窄了，居住地更稳定，粮食供给更可靠，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在中东、印度河谷、中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村落。

在第1章里，我们提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一项关键的发明——容器。人类开始用罐子、篮子和箱子等容器储存粮食。人类能够储存过剩的粮食后，便能够提前规划农业生产活动，修建堤坝，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粮食出现剩余后，经济学问题便随之而来。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大家庭，即谁生产了粮食、谁储存、分配给谁以及分配比例是多少。

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如同牛一样储存的粮食，是形式最古老的资本。他提醒我们，在货币出现之前，商业交易几乎一直是以粮食作为衡量尺度的。

把容器比作人类子宫，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而言很恰当。子宫可以保护和孕育胎儿，而人类发明的密封容器可以保护和储存粮食。二者均可储存能量，都是受到保护的空间，需要持续的照看。虽然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后往往更重视驱逐、砍倒、切碎、杀死或移动物品的工具，但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人工子宫”——容器的发明，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出现。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一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武器。那个时代可能是唯一一个符合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理念的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是一个主要动力。关于当时人类对植物的保护，芒福德写道：

> “人类保护自己喜欢的植物，有利于保护、培育和理解生命的力量。如果顾名思义地说狩猎是一种掠夺性的做法，那么驯化植物则是一种共生性的做法。在早期阶段的生态模式中，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显而易见，而人的直接参与则是实现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人类保护、照顾与驯化动植物不仅推动了人类育儿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其他一些附带的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促进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剩余食物和固定住所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使父母能够更加专注地照顾婴儿，同婴儿产生情感依恋。关于这一点，芒福德指出：

> “由于村落能够更好地保护人类，使人类生活方式更有连续性，

父母们便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去专心地守护和教育孩子们，对孩子们的兴趣越来越大。孩子们现在可以得到更多的关爱，就像宠物狗和宠物猫得到我们的关爱一样。”

人类文明的破晓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的同理心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发展势头不断加快。然而，只有在文明的曙光出现后，人类才开始形成完善的自我意识，同理心才开始超越最基础的“同理心痛苦”阶段，除了对其他个体的不幸遭遇感到痛苦之外，逐渐开始做出一些相关的反应。

在公元前4000年，中东地区以及亚洲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大河谷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基于农耕文明的城市。人类通过建立复杂而精致的运河、堤坝“驯服”了时常泛滥的河流，从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易于操作的水利设施系统，为灌溉土地和种植谷物创造了条件。

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聚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建立的。以良好的水利设施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提高了人类利用太阳能的效率，作为之后出现的城市工业文明的前驱，为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契约的束缚下修建和维护堤坝与运河。要完成这些工程，以及组织粮食的生产、储藏和分配，劳动者必须具备专业化的工艺技术。建筑师、工程师、矿工、冶金家、簿记员等人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专业化的劳动力队伍。苏美尔人在拉格什、尼普尔、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城邦，并建立了多处神庙来祭祀神灵。

最重要的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文字系统的出现帮助苏美尔人实现了对于农业生产体系和社会运作体系的管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中东国家、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只要存在大规模的、复杂的农耕文明，人们都会创造出某种独立的文字系统去组织生产、储存、分配和运输等流程。

苏美尔人最早的手稿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的文字系统不仅用来管理商贸、行政和宗教事务，还用来从事文学创作，使文字成为艺术的载体。黏土板、羊皮纸、莎草纸和蜡板成了书写载体，笔是鹅毛笔，“墨水”则用各种菜汁调成。

早期的文字是铭刻在黏土板上的象形符号，之后出现了语音。苏美尔人设立了一种被称为“泥板书舍”的特殊教学机构来训练寺庙的书吏学习文字与符号。有限的读写能力保证了至少熟练工匠、商人、政府官员和神职人员能够相互交流。后来，泥板书舍逐渐演变成了学校，成为苏美尔人学习的中心。尽管苏美尔城邦里估计只有不到1%的人口能够识字，但这依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学校课程还包括了数学、天文学、魔术和哲学。

文字催生了法典的编纂与法令的公开宣布，使司法更具系统性。后来，使用闪米特族语言的阿卡得人征服了苏美尔人，将之前半独立的、有围墙的城市合并成一个巴比伦帝国，并进一步完善了司法体系。将来自多个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汇集到一起，就需要一部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确保所有人获得正义的法典。以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旨在保护个人有限权利的成文法典，尤其是在获取、持有和继承私有财产方面的权利。阿卡得人对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系统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符合闪米特族语言的特点。巴比伦帝国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上理应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的社会。

《汉谟拉比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促进自我意识的发展，为人们判断自己与他人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公共的参照标准。这部法典在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多个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的各类不公现象，并开出了纠正不公的“处方”，最终形成了一部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典。这就会激发人们反思和解读，以便弄明白自己遭遇的事情是否符合当前这些盛行的、超越部落界限的准则。与法典相比，在单一部落文化中，禁忌是清晰、明确的，几乎不需要反思和解读。人们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只要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祖先留下的关于“合适”的准则就行了。这种墨守成规的口头文化会造成僵化的情感与行为反应方式。相反，书面文化则会激发个体在新的、独特的情形下根据法律体系中的多种抽象准则做出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抽象的法典创造的一套法律条文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要求所有社会成员予以遵守，削弱了传统的部落权威，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之前对部落的从属关系。《汉谟拉比法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个体的独立地位。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粮食产量的激增，使人口大大增加，继而催生了最早的城市聚集区，居民多达数万人。一些面粉厂、窑厂以及作坊等生产活动的中心雇用的人数超过1 000人，这标志着城市开始出现了雇用劳动力。

在整个河谷从事规模庞大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一种新形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体系。伟大的农耕文明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府机构。在官僚机构中，一切权力被集中到一个统治者手中，统治者被宣传成神的后代，像神一样被崇拜，在被统治者面前享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埃及法老的权力范围覆盖着广阔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在被罗马帝国征服前，一直是无法超越的。官僚机构在其所辖地区内监督着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在某个时节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疏通河道，运输、存储和分配粮食，管理与附近地区的商业活动，向人们征税，以及组建军队保卫边境。

社会的组织结构具有等级色彩，统治者凌驾于政府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之上，这些专业人士包括神职人员、文人、熟练工匠和士兵。在等级阶梯的底端是普通劳动者和耕地的农民。

虽然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但这一小部分人代表着文明生活的发端。

人类为了走向文明付出了多重代价。一方面，人类常常受到无情的纪律约束和严格的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和享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控制。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出现了专业技能和需要利用专业技能才能完成的劳动任务，出现了形式有限的个人财产与货币交换，也出现了工资，这些都促使个人远离了史前社会集体意识中的“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自我意识的形成。

苏美尔的商人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熟练工匠。虽然他们也被要求对统治者唯命是从，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人成为历史上最早的“私营企业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个体摆脱了对于部落的从属关系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并且独特的个体，开始迎来了自我意识的微弱曙光。

苏美尔人的城市生活与自我意识的诞生

所有主要的农耕文明都建立了复杂的道路和水运系统，用来运输劳动力和动物，从事商贸活动，交换粮食和其他商品。除了轮式战车和帆船之外，“国道”也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大发明。作为一个帝国的交通干线，国道除了具有运输功能之外，还可以用来维持整个帝国的通信。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建立了“国道”。除了苏美尔人之外，希腊人、印度人、罗马人以及中国人也修建并拓展了国道的延伸范围。印度的国道遍布全国。公元前221年，中国也修建了庞大的国道系统。这些国道的出现，为城市生活提供了可能。

苏美尔农耕文明以及之后其他的农耕文明，都形成了丰富的城市文化。国道促进了人员流动，为城市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城市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城市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接触新事物往往会带来冲突，但却扩大了人们的接触面，接触到了一些之前被视为“异类”的人。此前，人类表达同理心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少数的近亲和孤立存在的氏族。城市的出现给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异类”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加强和深化了同理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促使同理心的范围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界限。

这样一来，一方面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接触了之前被视为“异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趋势的汇合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时刻，接触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增强人类的自我意识。虽然人们常说城市生活让人感觉孤立和孤独，但它也促使人们产生独特的自我意识，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并通过同理心与其他独特的个体产生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集体的隶属关系之后，人类开始同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个单独的人，这样一来，便进一步促进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们还远远没有形成面向全体人类的同理心，但这标志着人类同理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类的祖先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自我意识，但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是否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穿越到4 500年前乌鲁克的街头，与一位有文化的居民聊天，那么作为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们相互理解对方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肯定这样的对话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窥探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对于自身以及人际关系的想

法。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听起来具有现代感。

1844年，一个名叫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英国人正在研究摩苏尔的（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土丘，结果把尼尼微宫殿遗址发掘了出来。其中一个宫室是亚述帝国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627年在位）的藏书室。莱亚德发现了两万多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这些泥板后来被运送到了大英博物馆，但当时人们忽略了它们的价值。直到1857年，考古学家才意识到泥板上的文字是闪米特族语言，即巴比伦帝国的文字。1872年，博物馆馆长发现一块泥板上的文字讲述了一位苏美尔国王的生平和不寻常的经历。这位国王就是吉尔伽美什。他在约公元前2750年曾经统治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乌鲁克城。事实证明，这位馆长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叙事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诗人赖纳·里尔克曾经对这部史诗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太了不起了！我认为它是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最伟大的事情。我已经完全被它吸引住了，在这些伟大的片段中，我看到了具有魔力的文字勾勒出的无与伦比的作品。”

这是关于一位统治着乌鲁克城的伟大国王的故事。英雄吉尔伽美什被描绘成一个错综复杂和困惑不安的灵魂，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悲伤。在这部史诗的开头，旁白说：“他见过一切，经历过所有的情绪。”他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傲慢的暴君在经历严重的悲伤和绝望之后，变成了一位仁慈和善良的统治者。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自我意识在城市文明萌芽时期的发展状态。从表面上看，吉尔伽美什似乎拥有超人的特质，但在战无不胜的外表下，他却是一个心理存在严重缺陷和非常脆弱的人，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不遗余力地寻求长生不老之道。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也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爱情故事。有趣的是，这里讲的是同性恋的故事，是两个巨人的故事——吉尔迦美什和恩奇都，两人从敌人变成亲密的伙伴。（至于两人是否真的是情人关系，则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吉尔伽美什说服他的朋友恩奇都出征雪松林，杀死危害人间的护林怪兽洪巴巴。虽然表面上的任务是清除世界上的邪恶，但吉尔伽美什私下里对恩奇都说，他真正的潜在动机是通过杀死怪兽获得名声，并被人永远铭记。

事实证明，洪巴巴并不代表邪恶。恰恰相反，他是奉神灵之命来守护这座森林的。当吉尔伽美什拿着刀抵着怪兽的喉咙时，战斗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洪巴巴恳求宽恕。于是，吉尔伽美什犹豫了。但恩奇都不理会怪兽的请求，竭力主张吉尔伽美什杀死怪兽洪巴巴。恩奇都渴望吉尔伽美什成功获得名誉和荣耀，这种渴望超过了他对洪巴巴的同理心。

最后，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理心，没有宽恕洪巴巴。吉尔伽美什明显感到困惑不安，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懊悔感，他的朋友恩奇都却没有这种感觉。由于恩奇都冷漠麻木，没有同情心，便被众神惩罚，病重而死。恩奇都死去，吉尔迦美什十分悲伤。

由于太过悲伤而难以自制，他便放弃了王位，穿上兽皮，离开了乌鲁克城。他的悲伤很像是今天的儿童看到他人遭遇痛苦时，在同理心作用下体验到的那种悲伤。

尽管朋友之死令他难以自制，但他的悲伤主要是因为自己。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死亡，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便问道：“我也会死吗？”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他踏上了漫漫的探索旅程——首先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死亡，然后是问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死，最后是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曾经骄奢淫逸、力大无穷、狂妄自大的国王，如今变成了一个谦卑而脆弱的人，他孤独、恐惧、无法理解生命的奥秘。

吉尔伽美什走遍天涯海角去追寻答案。最后，无尽的探索使他实现了精神的蜕变，意识到死亡是不可能避免的，开始形成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如同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那个老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吉尔伽美什也意识到生活应该在与他人的友谊中度过。慈悲的行为最让人感觉有活力。吉尔伽美什回到了乌鲁克城，给居民带去了礼物。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的统治中没有暴力和自私。他接受了生命有限、自己终将死亡的事实，同自己的子民形成了牢固的团结关系。他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

虽然吉尔伽美什不能完全理解或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也不能感同

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痛苦，但他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和他人建立适当的关系。他的故事标志着自我意识的开端。

神学意识的黎明

人类普遍的同理心最初是以神学意识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中东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多神论，后来演变成一神论。众多具有人类特质的神涌现出来，对旧石器时代的“精神世界”和新石器时代的“生育女神”构成了挑战。

应该指出的是，旧石器时代，甚至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并不会感觉到自己优于其他生物或自然力量。他们也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恰恰相反，他们有时觉得低人一等，对其他生物表示出尊重，或者供奉半人半兽的神像。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神话意识。远古时代的人类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怀有感恩之情，因为正是这些事物维持了他们的生存。出于这个原因，每一种力量和现象都可能被精神化，这也反映了当时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性。

当人类变得更善于为了自身目的而操纵、征用、捕获和改造自然力量时，就开始缓慢地同其他生物分离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也开始出现界限。

随着伟大的农耕文明的出现，人类能够将多种自然力量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而分散的农耕社会分布在中东国家、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河谷地带，但通过武力和征服，它们逐渐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庞大的王国。如前所述，权力集中到了统治阶层的手中。在社会结构的顶部，只有一个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能指挥洪水，决定水的流向以浇灌庄稼。他的祭司观察天空中行星和恒星的运动，描绘它们的运动轨迹，以便更好地预测季节的变化，进而做出灌溉、播种、收获的决定。得益于天文学、数学以及后来的气象学知识，人类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创建复杂的历法，可以非常精准地规定什么时候应该开展什么活动，确保能够获得好收成。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十分宝贵的能力就是破解大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规律，并将其应用到现实中，管理王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新石器时代向农耕文明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对动植物之神的崇拜变为了对天神的崇拜，崇拜的对象包括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等。刘易斯·芒福德指出，之前的神灵显得脆弱和软弱无力，而天神显得比较强大、遥远和无情，与统治农耕社会的国王非常相似。阿图姆、恩利尔和马杜克都是“宇宙力量的化身”。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埃及法老建造庞大的金字塔，将死去的法老安葬在里面，就是为了表明他们与诸神和宇宙的联系。

在所有伟大的农耕文明中，国王的神圣属性越来越强，并最终把自己视为神的儿子。埃及、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的农耕社会都是神权政治。芒福德总结了当时的社会史，他写道：

> “神权统治的主要领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以及权力和秩序上。月亮和太阳的周期性变化，或伟大的自然力量的展现，比如洪水、风暴和地震等，都给人类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少数统治者心中激起了模仿诸神行使自身权力的兴趣。”

国王们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理念，将自己同超越人力的、无所不能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了其在地球上统治王国的合法性和权力的稳定。据说，苏美尔国王尚在母体里就获得了神的特质，出生之后便由神灵抚育。他的登基加冕将其提升到了神的高度。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奉神之命来统治地球。

埃及人认为宇宙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太阳神，在其他王国备受崇拜的诸神逐渐让位于太阳神。在第五王朝期间，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太阳神。公元前18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宣布太阳神是埃及唯一的神，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关闭祭祀其他神灵的庙宇，废除相关的神职人员，消除其最高权威面临的挑战。虽然他掌权时间不长，但一神论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之后，埃及征服和占领了其他国家的疆土，埃及的最高神灵——太阳神也成了“宇宙之神”。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令人惊讶地提出了“一神论是宗教领域的帝国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周朝以及之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自称“天子”，虽然他们也被视为人，但同时也被视为宇宙之神派往人间的特使。随着地球上的农耕社会之间不断兼并融合，统治权力逐渐呈现出集中态势。与此同时，宗教领域的各种神灵也呈现出集中的态势，这不足为奇。人类历史上的每个社会、每个文明都构造出了错综复杂的神学理论，以反映其错综复杂

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学理论为既定的秩序提供了合理存在的理由，因为统治者根据神学理论，宣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宇宙规律和天道，以此为权力的合法性寻找依据。

神话意识向神学意识的转变，以及多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变，堪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宇宙学理论日益呈现出显著的人性色彩，标志着人类认识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诚然，在伟大的农耕文明中，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如同神灵一样的国王，才具有真正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个体。自由对于人类心灵会产生深刻的震撼，所以国王会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将自由封闭在自己的神袍里。在之后的数千年里，虽然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加独立，但他们仍然被禁锢在神学意识中，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仍然不可挑战。直到近代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自我意识才真正变成被人普遍接受的理念。但在古代的苏美尔和其他农耕文明中，通往自我意识的道路是从国王开始的。国王创造了一套神学理论来为自己的自由与权力进行辩护，宣称自己受到了神灵的委派，或者宣称自己与神灵具有某些血缘联系，这样一来，国王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

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几个重要的农耕文明信奉的神灵日趋呈现出人性化和单一化特征，为一神论的形成以及为世界几个主要宗教的出现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中东国家的犹太教及其分支、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印度的佛教都是在农耕文明期间或农耕文明前后形成的。

书的民族

早期的神话意识反映了采集者、狩猎者以及小规模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口头方式传播的。与神话意识不同的是，神学意识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产物，是通过书面方式传播的。即便在今天，犹太族仍然被称作“书的民族”。犹太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已经非常高了，而其他文明在进入近代以前，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构成神学意识的故事是书面的，而不是口头的。人类叙事方式由口头到书面的转变，催生了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

一神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书面交流（或书面认知）与口头交流（或口头认知）的差异。两种交流方式都能让人类讲述故事，但交流方式会给叙事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记，因为交流方式在传播人类意识的同时，也会塑造人类意识。已故的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概括，指出媒介即信息。

口头传播的意识依赖听觉，而书面传播的意识依赖视觉。仅仅这一项差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会导致人类意识出现深刻变化。听觉是内化作用最强的一种感觉。虽然触觉、嗅觉和味觉也会触动人的内心世界，也具有一定的内化作用，但听觉的作用更强。对于这一点，善于欣赏音乐的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如果依靠听觉来交流，就需要交流者深度参与，交流者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交流过程，沉浸在声音之中。

与听觉相比，视觉则是亲密感最低、抽象性最强的感觉。如果依靠视觉进行交流，也就是通过书面形式来交流，人们就不必聚在一起，可以相互分开，也有时间去分析交流的内容。正如圣路易斯大学荣誉教授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理想化的视觉是清晰、明确，具有离散性的，理想化的听觉则是协调一致，具有聚合性的。"

口头文化具有深度参与性。如果一个人来自书面文化较为发达的社会，那么当他来到一个书面文化不发达的社会时，往往会对当地社会话语的属性感到惊讶，甚至反感，因为在口头文化中，人们在说话时往往会挤成一团，而且常常是一群人同时说话，几乎没有"人际边界"的概念。有时候，客人会认为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交谈是对人际边界的一种侵犯。虽然参与者能跟上谈话的节奏，但往往无法分清谈话对象。在一个口头文化较为发达的社会里，维持社会凝聚力比能否听清楚更重要。人们通过对话表达社会性，但这种对话不是一对一的，不是一个人说而另一个人听。相反，他们的对话是集体性的，往往是很多人同时说。个人所说的话并不会被视为独立的话语，而是被视为集体对话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每个人听懂了什么，而是集体对话产生的社会意义。

然而，视觉体验往往是一对一的个性化体验。当一个人借助视觉去看某个物体时，人与物体的界限非常清楚。视觉会促使人们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思考问题。

声音环绕在对话者的周围，而视线则会向远方延伸。借助口头方式交流会束缚人的意识，而借助书面方式交流则会拓展人的探索意识。在口头文化中，人类过着群体生活，不存在隐私概念，不会将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也不会在对话过程中突然离开，不然就会招来质疑的目光。法国历史学家的乔治·迪比指出，直到中世纪时期，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意识仍然主要依靠口头方式来表达，孤独地徘徊被视为精神错乱的表现，只有特立独行的或愚蠢疯狂的人敢去冒险这么做。退出小组活动会招致他人不满，甚至公开指责。

由于在口头文化中，人类过的是公共生活，隐私被视为一种奇怪的事物，所以对于自我观念的形成和同理心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的隐私观念也几乎不存在。在集体主义至上、依靠口头方式来交流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总是聚在一起，挤在一起睡觉，甚至连性行为也几乎不加掩饰。

写作则会催生隐私概念。在创作一个语句的过程中，人们会独自思考，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即便在早期的书面文化中，人们仍然会经常聚在一起大声阅读手稿，最终阅读变成了一种个人的、孤立的行为。但即便在独自阅读时，人们也总是大声读出来，这再一次说明听觉比视觉更便于记忆，更具有内化作用。

在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漫长过渡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手稿在讲话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认为手稿是一种不太可靠的交流媒介。在中世纪，连账簿也要大声读出来，以便让大家相信上面写的账目是可信的。在人类社会由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过渡期间，“audit”一词保存了下来，从而印证了人类过去对口头交流的重视和对书面交流的质疑。公元4世纪基督教最著名的拉丁教父之一、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在评论《路加福音》时也认为，“视觉往往被欺骗，听到才有保障。”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成千上万种语言，但能产生书面文学的也只有106种语言。已故的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门罗·埃蒙森提醒我们，在今天仍然存在的3 000种语言中，只有78种产生了书面文学。

口头语言通常只包含几千或几万个单词，但书面语言通常包含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个单词，英语有超过150万个单词。这意味着书面语言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广泛的词汇选择空间，让我们描述现实情况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感觉、意识状态和人际关系。书面语言包含大量的隐喻和

术语，人们可以借助它们解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

当人们能够使用语言来描述感受、讲述故事、分享经历时，就会增强和深化表达同理心的能力。人们用来描述感受的词汇越是具有微妙的意义，人们就越能对自己面临的情况做出深刻描述，并促使他人产生强烈的反应。如果不能向别人描述自己的感受，就会弱化自己表达同理心的能力，也会弱化他人的同理心反应。因此，如果一篇故事对某位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动情，即便这个主人公是虚构的，或者读者从没有见过这位主人公，那么读者往往也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同理心反应。

口头文化依赖公式化的表达方式，以确保记忆的可靠性。助记符和重复是人们传播集体知识的基本方式。只有通过一遍遍地重复标准化的思想表达方式，才能保证社会交往的可预测性，但公式化的反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一般性，适用于普遍存在的语境，因此往往无法深刻地触及独特情况的核心之处，不能充分地描述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然而，书面语言打破了公式化交流方式的禁锢。每个语句都具有独特的构思，来阐述某个情形的特殊之处，也就是说，沟通具有了个性化特征。

如果孩子们在书面文化中长大，他们在与别人交谈时，也会逐渐使用非公式化的话语。获得读写能力之后，每一个生动的语句，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会被视为一个构造独特的话语——一个由独特个体针对某个独特经历而形成的话语。沟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话语越来越微妙，个体真正认识到其他独特个体的想法和感觉。换句话说，在公式化的口头文化中，人们往往使用一般性的重复语句相互交谈，还是集体对话，并没有深刻地触动对方。与口头文化不同的是，书面文化会推动语言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体现在写作和社会话语中，这样一来，就会提升人们的个体意识，进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同理心的深化和普遍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个性化。因此，书面文化的出现成为人类同理心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苏联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在1931～1932年研究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偏远地区没有文字的社会。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中的人类意识，尤其在情商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卢里亚试图引导那些没有文字的研究对象进行自我分析。沃尔特·翁指出，一个人若要具备自我分析能力，需要将自我同集体分离开来，以便于反省和描述自我。在口头文化中，集体性质的“我们”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几乎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无法进行自我分析。

卢里亚在报告中提到了居住在山区牧场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卢里亚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性格怎么样？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你会如何描述自己？”这位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牧民回答说：“我来自乌赫库尔干，我很穷，现在我结婚了，有孩子。”卢里亚问道：“你对自己满意吗？你想改变自己吗？”对方回答说：“如果我的土地多一点儿就好了，我可以种小麦。”卢里亚又问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今年播种了一普特[1]的小麦，我们正在逐渐解决缺点。”

卢里亚发现，受访者无法分析自己的感受，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感，缺乏自省意识，只能用最具体的、最肤浅的方法来描述自己和他人的人际关系。卢里亚的研究对象也无法抽象思考或创造符号。例如，当卢里亚向他们展示一个几何图形时，他们无法识别出这是符号，只会将其视为具体的事物，给他们展示一个圆圈时，他们会称之为一个盘子、月亮或手表；他们把一个正方形称为镜子或房子。他们也没有能力对事物进行分类。例如，卢里亚为他们展示了锤子、锯、原木和短柄小斧，要求按照功能进行分组，功能相似的物品分在一组。结果，受访者只知道根据自己运用这些物体的情境去思考问题，而不会根据它们的实际用途进行分类，所以最后没有将锤子、锯和短柄小斧划分到“工具”类别。一位受访者说：“它们都是一样的，锯会把木头锯开，斧子会把木头砍成小木头，如果非让我放弃一个，那就不要斧子了，因为它没有锯用着方便。”

翁深刻地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我分析思维和分类思维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阅读行为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在阅读过程中，人们摆脱了集体性的对话，可以独自一个人去阅读他人的思想，即便他人距离自己很远也无妨。虽然阅读过程中没有了口头文化中那种深度参与的亲密感，但人们在阅读中会有所反思，可以独自一个人去理解他人的想法，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阅读为人类提高内省能力——吸收领会自己阅读到的内容创造了条件。

翁对埃里克·哈夫洛克在《柏拉图导论》一书中的分析表示了认同，指出：

“文字写作导致了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内省能力，人类心灵第一次开始认识外部客观世界，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翁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出现、文字对内省能力的促进作用与世界几大宗教的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得出结论：

“文字写作使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内省传统成为可能。这些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

根据《出埃及记》的记录，最初的文字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亲自用指头将十诫写在石板上，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让他传播开来。这意味着人类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转变。

当摩西领受十诫之后下山时，发现了希伯来人的背叛。原来，在他离开期间，人们担心他不再回来，便背弃了上帝，制造了一尊金牛犊来做礼拜。于是，摩西便告诫人们从此只可遵循十诫。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文化和意识的冲突。一些希伯来人没有遵循摩西的告诫，倒退回之前远古时代的意识水平，宁愿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大地之神，也不寄托给上帝。然而，摩西最后还是占据了上风。他的子民永远地成为“书的民族”，成为上帝的子民。全能的上帝将自己的谕旨传递给地球上那些先知和牧师，形成书面记录之后进行传播，通过这种方式与众生交流。这样一来，人们对上帝就产生了一个抽象认识。上帝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世界，具有超验性。上帝选择一个抽象的媒介来传达他的思想，与他所选择的人进行对话。

在上帝开始感化人类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一直信奉的是世俗的神灵和宇宙力量。之后，人类开始同上帝交流。上帝是抽象的，人类不得直接呼喊上帝的名字，以免亵渎上帝的威严。

希伯来人的故事始于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父亲——他拉，离开了长期生活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迦勒底的城邦——乌尔城。亚伯拉罕出埃及的历程讲述了人类逐渐摆脱原始的部落文明并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的故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从多神论到一神

论，从口头文化到几乎人人都能识字的书面文化。

在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中，希伯来人最早通过书面文字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单纯用作书写的文字约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是由居住在迦南地区的闪米特人发明的。希伯来人使用的就是这种音标。在此之前，所有农耕文明的文字体系都只是停留在表意文字的阶段。希伯来人率先利用书面语言记录历史事件。在这种历史中，具有真实姓名的人做真实的事，希伯来人将这些事件定格在了“过去”。与希伯来人相比，虽然其他有文字的民族，比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也先后开始利用文字来记录历史事件，但他们的记录是由松散片段组成的，不同片段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只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层面上。

文字使希伯来人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记录自己的历史。音标字母的运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万能的写作工具，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更好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说明与解释。

历史观念的形成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讲，神学意识一个关键的潜台词就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与神学意识不同。在神学意识中，人类没有“过去”的概念，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是永远存在于现实中并不断被人讲述的。然而，在历史意识中，人类认识到每一个事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以及受到特定条件限制的。历史意识让人们认识到了社会个体的重要性，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度过的时间。能够反思个人的独特历史，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变。正如我们在第4章里所了解到的那样，三四岁的孩子开始理解自己的过去，既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区分开，也能将它们联系起来。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人历史，才能最终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如前所述，在神学文化中，人们没有“过去”的概念，以至于认识不到过去，永远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现在”中，不存在个人历史和生活，生活的时间维度非常狭窄，只有出生、死亡和重生。美国人类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将这种永不停止的、重复循环的认识状态称为“永恒回归”。

自我意识与个人历史紧密相连，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人类向历史意识的飞跃促进了对个人历史的反思，进而促进了人类同理心意识

的提升。当他人遭遇不幸时，如果人们不只是感同身受地体验到痛苦，还要更进一步地表达自己的同理心，那就需要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活都是独特和有限的，将自己和他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产生情感共鸣。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理心，主要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他们同我们自己一样，也终将走向死亡，也希望长久地活下去，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脆弱，认识到自己只有一次生命，而且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帮助他人。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他人的历史存在相同之处时，我们就会对他人的痛苦挣扎产生更加深切的体验，似乎这就是自己的痛苦挣扎。这种情结促使我们对他人的心理状态产生认同感，在同理心的作用下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如果历史会催生社会成员产生差异性更为显著的自我意识，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被所有人接受的万能的上帝就会进一步推动个体与集体的分离。

在神话时代的人类意识中，人类个体与神灵的联系受到空间范围的限制，那时人类认为神灵生活在人类的周围，各自负责看管具体的地方。换言之，神灵都是本地的，负责照顾整个集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个体，人类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没有自我意识。

然而，伟大的农耕文明加强了多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联系，催生了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控制力大为拓展，神灵负责看管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之前的统治者只崇拜看管某种动物、植物的自然之神，后来逐渐过渡到了崇拜宇宙之神，甚至只崇拜太阳神，这就扩大了神灵影响的地理范围，但这种扩大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然而，即便古埃及王国信奉的太阳神——阿托恩的控制范围也只限于整个王国之内，它的影响力无法延伸到这个王国以外的地域。

希伯来人最初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神。这个神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神，而是一个普适性的神。神的统治范围涵盖了所有希伯来族人的生活，主导着希伯来族的整个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个神后来逐渐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信仰者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耶和华告诉希伯来人他们是上帝所选的子民，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谕旨传播给所有人。

个体意识的产生

希伯来人为人类意识发展过程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促使人类意识逐渐脱离了神话意识，并过渡到神学意识。在神话意识中，神灵只会同人类集体讲话，人类只有“我们”的概念。相反，在神学意识中，单一的、普适的、全能的神主宰着一切，会同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进行对话。希伯来族的每一个男性都会努力阅读“摩西五经”，这样他就可以了解上帝的思想，使自己与上帝建立起个人关系。在希伯来传说中，上帝之所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上帝希望与他人建立友谊和对话。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人，就要不停地同万能的耶和华进行个人对话。但这种对话不只局限于希伯来人与上帝之间。上帝的存在是普遍的，是每个人的神，是每个人的知己、导师和领路人。

这种新的神学意识的出现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个体，而不是集体，第一次被告知宇宙中只存在一个神，而且这个神试图同每个个体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每个人，无论地位如何，都能够与耶和华建立个人联系。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神灵观和宇宙观将人类个体的地位提升到如此高度。现在，每个个体独立于集体之外，各自负责各自的生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并且有权同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虽然个体与上帝的关系是家长式的，个体应该顺从上帝的谕旨，但一些希伯来人也提出了末世论，引发了关于个人与上帝关系的讨论，甚至有些人不再信仰上帝。

在从神话意识到神学意识，希伯来人也形成了新的叙事方式，他们在叙事和讲故事过程中的视角发生了变化，集体意识逐渐变为自我意识，多神论逐渐变为一神论。

虽然耶和华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神，神的律法中充满了关于神报复背叛者的故事，但也同样充满了个人与上帝建立高尚关系之后得到安慰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出现，识字率的提高，一神论的形成，抽象的、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灵观的形成，以及个体与造物主建立的完整关系，都是这一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必要组成元素。希伯来人的宇宙学体现了个体从迷雾般的集体中脱胎而出的历程。觉醒的自我意识又推动人类同理心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发展。

与印度、中国等地的宗教相比，虽然犹太教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

这些宗教形成的时代背景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当地社会进入农耕文明前后形成，而且出现了文字，诞生的地点都是人口较多的城镇地区。

进入农耕文明后，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商业和贸易的拓展以及不同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从而形成了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单元，对传统的部落亲缘关系构成了威胁。人类被迫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和重新定居，宗教和政治战争引发了动荡，人类开始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建立了不同的王国和帝国，这也给人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经历这些深深的痛苦之际，人类也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之后，同理心也开始迅速提升。

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在压迫中形成的。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长期忍受着埃及法老对他们的奴隶般的统治。最终，他们选择离开埃及，进入了一种流亡状态。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沙漠中寻找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寻找既是一种地理上的探索，也是精神上的磨炼与升华。他们孤苦无依，无家可归，没有传统地标的引导，他们开始绝望，思考存在的意义。当他们来到西奈山脚下时，终于遇到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摩西，摩西刚刚在山上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两个写有十诫的石板，欲将上帝的谕旨传递给世人。

十诫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德国作家、《德意志人》一书的作者埃里希·卡勒提醒我们说，十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道德准则”。如果说十诫中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的主题，那就是“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对伟大的希伯来学者拉比·希勒尔说，如果拉比把犹太教的整套律法教给他，他将信奉犹太教。希勒尔的回答既迅速又中肯。他告诉那个人：“凡是对你自己有害的，亦不要施诸你的同胞，这就是全部的律法，其余则不过是它的注解，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一些人认为犹太教的这条黄金律只适用于邻居和血亲，但《圣经》清楚地申明这是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正如《利未记》所写的那样：

> “与你同住的陌生人如同出生在你们中间，你要爱他如己，因为在埃及的土地上，你也是陌生人。”

虽然希伯来族最初是一个战士部落，不断从事军事活动，有些是进攻性的，有些是防御性的，但这个民族却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民族精神，他们承认人类遭遇的痛苦和压迫，也意识到了人类需要超越仇恨，像兄弟一样和自己的同胞生活在一起。这种救世主般的精神是犹太族神学意识的核心，这种精神体现在犹太人对于未来状态的设想——每个人都可以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犹太教的使命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全人类团结在一起，凝结成兄弟般的情谊。这个使命之所以颇具挑战性，是因为它的履行者是每一位信徒。耶和华让这些信徒作为自己的使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传播犹太教的教义。犹太教并不强迫异教徒皈依，皈依与否是自愿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对耶和华负责，是否为人类同胞负责。犹太教第一次提出了人类个体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在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圣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简要地记录了无数个普通人试图履行个人道德责任的故事。这种新的道德责任不仅仅意味着人类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善意行为。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成书的《申命记》讲述了每一个犹太人都应该具备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犹太教的教义严厉禁止经济压迫行为，并要求土地所有者为贫穷者捐出一部分收成，债主每7年要免除欠债者无力偿还的债务。

世界各地的黄金律

犹太人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可以说，无论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还是整个民族的历史，苦难都贯穿始终，所以，他们理解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和生存的艰难。但犹太教的黄金律却是“爱人如己”。这一准则表明犹太人理解人类为了实现繁荣发展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挣扎。无论是在宁静的还是黑暗的日子里，无论是傲慢情绪盛行还是绝望情绪弥漫时，希伯来族的先知们总会走出来，告诫和提醒犹太人说，作为“人类”一员，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广泛地让更多的人具有爱人如己的情怀，换言之，就是具有同理心意识。

具有这种情怀的不只是犹太人。从约旦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再到长江流域，那些出现了文字的农耕文明中，同理心意识也逐渐觉醒。轴心时代是人类同理心意识的第一个萌芽期。在每一个文明中，社会动乱都会推动人类同理心意识和人类精神文明实现快速发展。英国作家凯伦·

阿姆斯特朗指出：

> “中国的‘轴心时代’开始于周朝的分崩离析，在秦朝实现统一后结束。印度的‘轴心时代’于哈拉帕文明结束后开始，于孔雀王朝建立后结束。”

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其著作中为我们描述了“轴心时代”的各种元素，突出同理心意识的增强改变了人类历史。她首先讲到了孔子。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到公元前47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他反对传统的宗教仪式，反对以取悦神灵为目的的祭祀。所以，孔子提出了一套务实的思想体系，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相处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曾经有一个弟子问他关于神灵的事情，根据记录，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孔子看来，学会如何做一个成熟的人——君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同希伯来人一样，孔子也比较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到今生，而不是来世。孔子相信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追寻不是进入天堂，而是懂得他所说的“道”。他的意思就是，人们应该超越个人界限的制约，放下个人的自我意识，以爱人的情怀去对待他人，与他人建立充满仁义道德的关系。孔子曾经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认为，君子的仁义之举应该始于自己的家人，然后拓展到邻居和所有人。有人问孔子能否提供一个可以终生践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答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发现，虽然中国与以色列相隔8000公里，文化完全不同，但这位中国学者却提出了与犹太教黄金律非常类似的行为准则。同摩西和希伯来族的其他先知一样，孔子也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长生不老、永垂不朽之人，只宣称自己是一名普通教师，但之后历代人都将他们提升到了一个几乎类似于神灵的地位。在其他人看来，一个开明睿智的人与神灵之间几乎没什么区别。

在孔子之后，也出现了一大批尊贵的圣人和教师。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孟子对中国文化影响力仅次于孔子。同希伯来人一样，孟子也认为同理心不仅仅是个人的善举，还是社会的黏合剂，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因此，孟子认为政府有责任、有必要施行善政，展示出政府的同理心和怜悯，特别是对受压迫的贫穷者。当时，虽然根本不存在“同理

心”一词，但孟子已经具有了同理心的思想。直到2 300多年后，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认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才了解同理心的生理学与心理学基础。孟子曾说：

>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印度的情况和中东国家、中国一样，农耕文明的出现也促进了同理心意识的发展。然而，印度的情况存在一些特殊之处。到公元前5世纪，因果报应的思想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亚伯拉罕诸教认为人类只有一次生命，最终会走向死亡，没有转世的说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获得永恒。然而，印度吠陀教却强调转世。每个生物都是陷入无穷无尽的、永恒回归的循环之中。在每个生命周期，一个人的业力、态度和行为决定他来世的福报。例如，一个人在现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决定着他转世为一棵青草或一位国王。

到了公元前6世纪，同中东地区一样，印度部分地区也经历了从小规模农业到大规模农耕文明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兴起、民族的融合，以及更大的社会组织单元的出现。传统的部落附属关系被打破，形成了规模更大的王国，劳动力结构越来越分化。工匠、制造商、店主和商人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社会成员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不断上升，起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产生了个体意识。古老的吠陀教过于强调因果报应和宿命论，在农村地区那些较为传统的、人员流动性较差的部落社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认可度，但对于新兴的、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城市居民而言，吸引力则大为降低，对商人阶层尤其没有吸引力，因为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和辛劳不断改善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状况，对宿命论似乎是一种否定。

然而，在城市生活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印度人越来越担忧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担心商人阶层日益严重的贪婪，担心令人震惊的放荡和道德沦丧。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呼吁人们采取第三条道路，即放弃俗世的各种欲望，修正自己的行为，砥砺自己的心灵，达到开悟的境界，从而将自己从沉闷的死亡与转世循环中解放出来。但这些苦行僧与希伯来先知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因为希伯来先知呼吁人们改革已经制度化的社会

行为，而印度的苦行僧则呼吁人们抑制世俗生活中的欲望，过一种禁欲和冥想的生活。于是，新的精神领袖——古鲁便开始大量涌现，每个古鲁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旨在让人们摆脱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的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

一个著名的苦行僧叫末伽梨瞿舍梨，他生活在公元前497～公元前425年，是摩诃毗罗的弟子。摩诃毗罗在恒河流域广泛游历，过着一种极端严酷的禁欲生活。他不穿任何衣服，风餐露宿，从不躲避风雨，以最少的食物维持生存。摩诃毗罗认为开悟之路需要放弃身体欲望，即便走在地上时也要小心翼翼，不能伤害任何微小的生命。他崇尚这样的观点——每个人、每个物体，甚至包括水、岩石、火和空气等无生命的物体在内，都有一个神圣的灵魂，他们之所以会呈现出当前的状态，是由他们前世的行为决定的。由于一切人和事物都有神圣的灵魂，所以应该用同样的尊重和情感去对待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摩诃毗罗教导他的门徒帮助一切众生，从不伤害任何事物，无论其他事物的地位多么低，都应该给予尊重。如果他们遵循这些原则和并付诸实践，便可以成为一个“耆那”，即一个胜利者和精神领袖。他的门徒被称为耆那教徒，他们的精神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至今依然存在。耆那教徒都致力于践行非暴力理念。耆那教的教义认为：

> “所有呼吸的、现存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生物都不应该被伤害，也不应该受到暴力对待、虐待、折磨和驱赶。这是纯粹的、不变的、永恒的法则，开悟的人都明白这些道理。”

要做到不杀生，不伤害任何事物，需要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警觉。在生活中的每个动作和每个活动都要小心翼翼，以免伤害到其他事物。即便走路时，也要谨小慎微，以防不慎踩到小昆虫。耆那教鼓励教徒们将自己的活动量减少到最低水平，以避免伤害到其他生物。

耆那教徒致力于同一切生物建立友谊，以慈悲的胸怀帮助众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为了表达同理心，为了表达慈悲，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要做到这些，他们自己的生活就会受到极端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就会减少与外界的接触，进而限制了自己表达同理心的能力。

我们要对他人表达自己的同理心，表达自己的慈悲心，就需要充分

融入社会，接触他人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如何能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呢？在公元5世纪，印度一位29岁的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后来被世人尊称为“佛陀”）离开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孩子和舒适的家，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由于他观察到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严重，众生之间弱肉强食，尤其有感于生老病死的逼迫和生命的无常，便决定通过出家修道寻求解脱。

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天，乔达摩忽然回想起了童年时期经历过的一件事。当时，他坐在树荫下，在他旁边，有农夫正在犁地。他注意到农夫的犁杀死了几只昆虫。他走到近处，仔细瞧了瞧死去的昆虫，突然产生了一种悲伤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人被杀了一样。这表明他对死去的昆虫产生了同理心，这种同理心竟然能让他产生一种奇怪的、纯粹的感觉。他本能地闭目盘膝而坐，进入了一种神思恍惚的冥思状态，使内心豁然。

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感，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意识到自己在那一刻超越了世俗的欲望。虽然直到19世纪晚期才能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说明究竟什么是同理心，但年轻的乔达摩已经知道了同理心的重要性，他猜测或许这种无私的爱心会引领人类走上开悟之路。

在此之前，传统的修行原则是放弃生活，消极避世，远离周围的受苦受难者，过一种禁欲的苦行者的生活。乔达摩认为这种传统的修行方式是错误的，应该被修正，相反，人类应该关注别人的痛苦，帮别人缓解痛苦，产生一种独特的慈悲感，这样才能找到开悟之道。他认为，人类不应该压抑和放弃社会，不应该遁世修行，需要积极拥抱生活，通过与他人的普遍联系和对他人的深刻情感找到生命的意义。

他的修行冥思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会同每个人建立友谊；第二阶段，学会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的苦难和疼痛；第三阶段，看到他人的幸福时，在同理心作用下使内心豁然；第四阶段，以慈悲的胸怀对待所有生物，超越生命的快乐和痛苦，始终维持一种平静平和的感觉，这是一种普遍的、无私的慈悲。

同现代的客体关系理论和经验哲学理论一样，佛陀创立的理论也认为个体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的，独立的个体只是一种虚幻的设想，脱离社会后，个体的欲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他认为我们每个个体都是社会性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身份。因此，“爱人如

己”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和描述性的词语，而不是一种规定和命令。达到开悟境界的关键是消除狭隘的自我意识，认识到社会是由很多独特个体构成的一个集体，并以慈悲心对待这个集体，在认识到“我”的存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我们”的存在。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自我意识和个体身份的本质，顿悟到个体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那么自我意识驱动下的本能欲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完整的生命体验中，甚至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熵与农耕文明的陨落

中东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促进了人类意识的飞跃和同理心的普及，但最终这些帝国无法逃避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约束。大量关于农耕文明兴衰的研究表明，虽然其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土壤盐碱化和土壤沉降带来的熵账单。

南伊拉克（苏美尔）的土壤是肥沃的冲积黏土，宜于谷物种植。但气候干旱少雨，灌溉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然而，土壤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通常，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就不能危害农田。但古苏美尔人只知浇灌而不知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当地地下水层的盐分逐年加重。当过度的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水位就会上升，在土壤毛细管作用的帮助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壤盐碱化，形成盐渍土，以至于水分几乎无法流动，妨碍种子的发芽过程，也不利于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养分。

考古学证据表明，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经历过严重的土壤盐碱化问题，伊拉克中部地区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900年之间也经历了类似的危机。土壤盐度的增加迫使当地种植的作物从小麦变成了大麦。在公元前3500年，小麦和大麦产出的比例大致相同，过了不到1 000年的时间，耐盐性较差的小麦在农业产量中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1/6的水平。到公元前2100年，小麦在同一地区的农业产品总量中所占比重仅为2%。公元前1700年，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地区由于盐碱化程度过高而无法种植小麦。

土地盐碱化不仅改变了作物种植结构，还明显降低了土壤肥力。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吉尔苏城的大麦的产量是2 537公升/公顷，到公元前2100年，降至1 460公升。到公元前1700年，其邻近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然而，在当时的城市地区生活着大量的牧师、政府官员、商人、工匠和士兵，城市生活都要依靠剩余的农业产品来维持。因此，农业产出的减少对城市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曾经蓬勃发展的苏美尔城邦饱受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摧残，精心设计的、宏伟的基础设施逐渐失修，人口数量减少，住地逐渐被废弃，这些城邦退化成勉强运转的村落。苏美尔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极大地拓展自己的同理心，使人类意识实现飞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灌溉技术的进步。然而，由于他们只知道浇灌而不知道如何排除土壤中的盐分，结果导致了土地盐碱化，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最终丧失了业已实现的文明成果，整个文明和整个环境走向了衰落和退化。半个世纪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托基尔·雅各布森和罗伯特·亚当斯曾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指出：

> “对于任何一个严重的历史事件，恐怕都不是一个因素能解释清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土壤盐碱化这一因素足以解释苏美尔文明的陨落。”

应该指出的是，4 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也遭遇了土壤盐碱化不断加剧的问题，人类给周围环境造成的熵账单越来越大。中美洲地区的古代玛雅农耕文明也遭遇了类似的现象，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土壤盐碱化引发了灾难性的作物歉收，大批领地纷纷废弃。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土壤盐碱化和熵账单的增加一直都是复杂的农耕文明走向衰败与陨落的诱发因素，这再次印证了人类能源使用量的提升与熵账单的增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犹太教、印度教、儒家思想等几大宗教都一致强调“爱人如己”这条黄金律的重要性，但直到罗马城市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基督教，这条准则的影响力才真正显现出来。早期的基督教末世论既代表着具有神学色彩的同理心意识的最后一次繁荣发展，也代表着近代人文主义和具有世俗色彩的同理心意识的萌芽。

---

[1] 普特是沙皇时期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译者注

第7章 世界主义罗马与基督教的崛起

罗马帝国代表了古代农耕文明的“高水准”。虽然罗马帝国地理位置横跨欧亚大陆，处于农耕文明的边缘，但罗马帝国却占领并统治了地中海周围和中东地区大片农业发达的区域，罗马帝国的公民、奴隶和士兵赖以维持生计的粮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占领区的剩余农产品。同样重要的是，罗马的统治者从东方伟大的农耕文明那里借鉴了很多管理知识和统治经验，对自己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改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延伸到地中海南部、中东、西亚、北非，向北到达了英国，为了加强控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借鉴了农耕文明在长达3 000年的时间里逐步完善的普通税制度和官员俸禄制度。在公元二三世纪，罗马帝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运作着无数个矿山、采石场和农田，各行各业的商人利用空前复杂的水路和公路系统进行商贸活动。罗马是一个由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的、典型的集权国家，其合法化的根源是君权神授理论。在整个帝国，统治者的触角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条条大路通罗马。”要理解帝国的威严，只需看看发达的道路系统。这些道路把帝国的每个地区同罗马的城门联系在了一起。罗马的道路系统无与伦比，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中枢神经系统，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机体。罗马道路系统空前壮观，恐怕也只有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才有这般景象。

罗马帝国对道路系统的管理堪称奇迹。奥古斯都创建了一个由无数条道路和无数个驿站组成的庞大的交通网。每个驿站都有专门的文书抄写员，驿站还驻扎着军队，确保旅客安全和邮政通畅，并打击走私和刑事犯罪。庞大的交通网使罗马的统治者们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监督各个殖民地。

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旅行是非常安全和便捷的，这就提升了人员的流动性，凝聚了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道路系统上的旅客包括政府人员、商人、工匠、季节性的农场工人、石匠、艺术家和表演者、教师和学生、清教徒、牧师、游客、求医的病人以及无数其他的人。沿

途有酒店、旅馆、铁匠和商贩为成千上万的旅客提供服务。如果骑马的话，每天可以走40～50千米。如果是徒步旅行，每天能走32千米。当时的罗马城堪称“世界之窗”，每月都有数千人涌入罗马，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台伯河与其他河道在整个交通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罗马城的人口日益增加，所需的粮食也与日俱增。当时，罗马帝国各地的粮食先由驳船集中运送到奥斯提亚港，之后经由台伯河运到罗马。到公元1世纪，北非地区每年为罗马帝国提供3 000万罗马斗[1]的粮食。罗马消耗的粮食中，将近1/3都是由埃及提供的。

城市基督教与同理心大潮

罗马帝国时期，同理心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折磨致死，但在罗马帝国的城市地区，耶稣却成为一个新兴宗教派别的精神领袖。这个宗教派别就是基督教，其教旨在某种程度上是传播耶稣的教义和在全世界普及同理心。使徒保罗在其一生中几乎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基督信仰传遍了罗马帝国，在罗马的道路上走了近16 000千米，在众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传播福音，无数个迫切希望重塑生活、改变命运的城市居民皈依了基督教。在罗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以及其他众多小城市，内省、宽容、同情、友情和救赎成为受到普遍尊重的价值观，为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罗马城的人口一度超过100万，无异于一个大熔炉，汇聚了来自多元文化的移民，其中有些移民甚至来自东部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南部的非洲以及北部的高卢和西班牙。大部分人口都是来自殖民地的奴隶和自由民（曾经的奴隶）。事实上，奴隶制对罗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维系作用。奴隶和自由民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罗马城赖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动力之源。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贡献，罗马才得以从一个小规模的城市聚落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变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为日益显著的劳动分工、人口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日益扩大的商业往来提供了支撑。

从一开始，罗马就戴着两副面具。一方面，罗马征服了世界，奴役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占领了其他土地，以残酷地对待他人为乐，并建造

了一个能够容纳50　000名观众的体育馆——罗马圆形竞技场，当基督徒、奴隶和罪犯死于狮子之口时，这些观众会欢呼雀跃。但另一方面，在罗马，自我意识开始增强，个性开始发展，对其他宗教的宽容也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罗马帝国的奴隶政策造成的。在公元28年，罗马帝国共有300万名奴隶和400万名自由民，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为缔造伟大的罗马文明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

奴隶最初只是为主人打理家务，但随着罗马军团的规模迅速扩大，大批农民被强征入伍，农田逐渐荒废，最后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变成了大农场。农场主强迫奴隶耕作土地，管理羊群和森林。奴隶贸易的猖獗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公元前209年，罗马帝国征服他林敦后，13万名当地居民被当作奴隶贩卖。公元前177年，撒丁岛起义遭到镇压后，8万名撒丁岛居民被当作奴隶押解到了罗马。仅仅在提洛岛港一处，每天都有一万名奴隶经过。

奴隶经济使罗马的城市社会实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但国际性大都市得到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沉重的人力资源代价。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因过劳而疲惫不堪，直至死亡。他们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能源。古罗马作家、哲学家卢西乌斯·阿普列乌斯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

> “我开始研究这个致命工厂的内部纪律。哦，天啊！里面的工人一个个弯腰弓背，连路都走不稳，他们的皮肤是铅灰色的，上面还赫然留着遭到鞭打的痕迹！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刻着字，脚踝上戴着镣铐，眼睑因长期饱受滚烫的水蒸气和烟雾的侵蚀已经退化，几乎完全丧失了视力。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看到这群‘幽灵’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吗？”

奴隶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罗马帝国的政策也有其开明的一面，比如，奴隶有可能被释放，并获得公民权。这些曾经做过奴隶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可以从事各种手工业和贸易活动，在西塞罗生活的那个年代，平民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这类人构成的。

随着罗马帝国的日渐崛起，对地方各个行省的控制也逐渐得到巩

固，从而催生了新的商业机遇，引发了新一轮的移民大潮。外国商人、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员纷纷涌向罗马，或从事商业贸易，或到政府部门找工作，再或者从事其他行当。他们都是自由民，或者是之前做过奴隶但被释放并获得公民权的人。

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罗马的旧贵族趋于没落，影响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富裕的商人、银行家、零售商以及地方各省的大地主对罗马的政治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则大为提升。

在耶稣遇难后的半个世纪里，也就是基督教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段时间，罗马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大都市，多元文化与各个种族的人们能够自由融合。恺撒的一个决定就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国际性：罗马民众的所有节日不仅要翻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要翻译成一些其他语言，包括希伯来语、腓尼基语和叙利亚语。

罗马帝国不仅竭力协调内部不同地区的语言，还不辞辛劳地将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根据西塞罗所说，统治者此举旨在探寻一套具有普遍吸引力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以便找到全体人类的共性。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讲，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融合多元文化，建立统一的国家，营造各方都能接受的社会现实。

罗马统治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理念，所有殖民地的自由民都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包括来自高卢、叙利亚、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自由民。这样一来，他们就取得了与罗马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罗马帝国之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

赋予公民权的政策促进了社会成员的流动，使社会成员普遍形成了一种集体精神，有助于打破他们狭隘的思维和对固有文化环境的从属关系。公民权是一种政治权利。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就与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于一个部落或种族传统的忠诚度就会弱化，个体意识增强。成为一个公民意味着成为无数个平等个体中的一员，所有个体都对法律管辖产生认同感，而法律管辖与传统的血缘关系是背道而驰的。

在政治学领域内，这种新的个人自由感引起了广泛讨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对罗马予以赞扬，认为罗马对外来人口较为宽

容，并且着力拓宽人类的视野。公元3世纪，一位希腊观察家曾经写道：

> “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随处都有港口可用，旅行者可以在所有山峦中安全地旅行，城市中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安全地生活，所有的困境似乎都不存在。现在，所有人似乎都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虽然罗马帝国的奴隶以及殖民地的自由民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并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罗马公民一样形成自我意识，但这远远无法推动人类意识实现质变的飞跃，因为大批人在失去同传统部落的联系之后，被投进了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忽然感觉自己迷失在了人口密集的城市丛林中，没有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罗马帝国产生了大规模的认同危机。罗马帝国缺失的是一种能够贴切地描述出人类的出生、苦难、抉择与救赎，从而重塑人类存在的意义。虽然罗马帝国为这种新型叙事方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环境，但直到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宗教派别——基督教，这种叙事方式才真正形成。基督教很快风靡整个罗马，通过自己的教义和故事重塑世界。

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重要的是要了解罗马帝国在基督教出现时的社会状态，以及究竟是哪些人变成了基督教徒。

虽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禁止基于政治目的的联盟，但他们允许外国人建立贸易性质的社团和行会，外国人在那里可以继续信奉原有的宗教和举办原有的丧葬仪式。他们崇拜的都是从原来的居住地带来的与植物、生殖力有关的神灵，因此，在罗马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中，这些神灵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很多新移民被夹在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罗马的城市生活之间，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而很多神秘的宗教社团注重帮助个体实现救赎，这就驱使他们加入了这些社团。虽然神秘的宗教社团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挣脱固有宗教隶属关系的机会——原有的宗教将个人捆缚在集体中，将集体捆缚在农业生活方式上——但这些社团并不愿意提出一个共同的宗教主张，也不情愿为所有外来者打开大门。已故的基督教史学家乔治·拉皮亚纳指出：“罗马地区神秘的宗教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承受着来自两个对立趋势的压力，一种趋势试图保持原有的民族或种族特性，另一种趋势是试图变成真正的、普遍性的宗教。”

地方性的宗教为了实现复兴而强调个人救赎的重要性，但各种宗教并存导致人们的思想处于破碎的、不统一的状态，这种大杂烩式的宗教现状无法满足人们在“后集体认同”时代对安全感的需求。此外，居住在罗马的外国人，个体意识日益强烈，并且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也无法从罗马的宗教现状中获得安全感。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这些移居罗马的人放弃在故土时崇拜的与农业有关的神灵，并找到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个人救赎神学理论。由于人们不愿意完成最后一次飞跃，导致宗教信仰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夹在旧的神话意识和新的神学意识之间。

事实是，这些地方性的宗教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如果它们声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就会与罗马的官方宗教发生直接冲突。拉皮亚纳描述了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为了征服罗马人的世界，它们不得不先同罗马官方宗教达成妥协，相互并存，并最终将其取代，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将它们自己的事业作为帝国的事业。它们就是在这里失败了，最终走向了消亡。”

如果那些被征服者公开表示信奉罗马官方认同的神灵，那么罗马帝国则不会阻止这些人在私下里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毕竟，罗马统治者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征服了其他地方的人，就表明自己信奉的宗教比被征服者的宗教优越。只要其他宗教的信奉者认识到了自己的宗教没有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那么重要，那么罗马官方宗教就会对这些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

唯一有能力挑战罗马统治者的种族就是犹太族。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占据着很大比重。仅居住在罗马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就有5万多人，另外还有五六百万犹太人分散居住在罗马帝国其他的城市。更重要的是，犹太人信奉的神灵是普遍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超验的，犹太教的故事更具有普遍性，更容易让其他种族的人产生认同感，每一个犹太教徒都能与神灵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因此，犹太教完全有能力融合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然而，虽然犹太教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犹太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子民，是上帝任命的特使。因此，尽管他们的故事更有包容性，

能够吸引越来越个性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民众，他们的排外思想却把他们与罗马人隔离开了。虽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要求居住在帝国的其他种族也参与官方宗教活动，但犹太人却不参与。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和社会活动规则让他们远离了城市生活。犹太教为人们提供了普遍的精神追求，但仅仅局限于犹太族的成员。相比之下，罗马人则提供了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但他们信奉的神灵太冷漠、太遥远，当个体意识日益显著的罗马人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追求个人认同感时，难免会产生焦虑，而他们的宗教无法消除这种焦虑。

无论是犹太教的神灵，还是罗马万神殿里的其他神灵，都无法为罗马帝国无数新增的城市人口提供他们急需的精神慰藉。在此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形成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里希·卡勒雄辩地总结了公元1～3世纪罗马基督教兴起的历史意义：

> “在这个时代，根本的创新是个体的出现，这些孤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脱离了与祖先和部落的联系，世俗化的个体在更平等的广阔天空下站了起来。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类进入基督教时代，未来的一切事件都可以归因于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新的发展趋势是世俗个体的社区化，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

最早的基督教徒都是哪些人呢？考古证据表明，早期的基督徒既不是乡绅，也不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而是自由民和被释放的奴隶。虽然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技能、教育和新获得的财富，在整个社会等级结构中具有向上移动的趋势，在罗马的商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构成了新贵阶层，但他们往往会遭到传统贵族阶层的蔑视和鄙夷，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使他们无法跻身上流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贵族精英们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权力。

在早期的基督徒中，有一些是自由民以及他们的儿女。很多人在做奴隶期间掌握了娴熟的手工艺技能和高超的贸易能力，有些人甚至在艺术与文学领域取得了深厚造诣。摆脱奴隶身份后，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积累财富，提高了社会地位。很多富人会把作坊或企业交给奴隶或自由民去打理。很多奴隶在帮奴隶主实现商业利益的过程中也变得富裕起来。

恺撒家里的奴隶和自由民在某种意义上行使着官员的职能，他们与女性自由民结婚的情况很常见，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据估计，恺撒家里2/3的男性奴隶和自由民都娶了女性自由民为妻。奴隶出身的女性会选择同男性自由民结婚，这会使她们获得释放，将她们的身份提升为自由民。考古文献研究表明，29%的女性奴隶嫁给了她们的主人。

为了纪念使徒保罗对基督教的重大贡献，早期的基督教运动通常被称为“保罗的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商人和手工艺者居住的城市地区。除了罗马之外，腓利比、佩特拉、杰拉什、贝罗埃亚、波斯特拉、艾菲索斯、科林斯，以及美洲的费城等城市都出现了早期基督教会。虽然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这些城市的规模很小，但它们的生活空间紧凑，人口密集，与19~20世纪伦敦、纽约的公寓和贫民窟比较相似。

大量的证据表明，早期基督教徒是少数地位不断上升的商人和手工艺者以及一部分奴隶，这些奴隶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普通罗马人。男性在早期的保罗基督教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女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比之下，女性在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中起到的作用则要小得多。

如果说早期的基督教社团具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就是基督教徒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凝聚力，彼此之间具有特别浓厚的情感和善意。一方面，他们渴望和期待基督再临给他们带来集体救赎，这种共同的情感基础将他们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建立了平等密切的、几乎是家庭成员般的守望互助关系。他们将自己视为基督的儿女，将彼此视为兄弟姐妹。

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充满温情的语言俯拾即是。忠诚的基督徒被称为“亲爱的教友”。他们认为保罗“对你们心存温柔，如同在照料自己的孩子”。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个人流露出如此丰富的情感是非同寻常的，也没有历史先例。基督徒们被鼓励用“爱”去接近当地的基督教牧师，并且“以圣洁之吻向众弟兄问安”。这些新兴的基督教社区无异于重构了基督徒的家庭关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成员都致力于个人救赎和集体救赎。这是一种新型的家庭，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神学信仰，而非血缘关系和地理位置。在《第一批城市基督徒》一书中，基督教史学家韦恩·米克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总结了这些新型大家庭的重要影响：

“无论其他影响如何，刚皈依基督教的人就被接纳为上帝的儿

女，并融入一个由兄弟姐妹组成的新家庭，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当今社会学家所说的皈依基督教能让个体实现再社会化。之前，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但皈依基督教后，却被一种新型的关系取代了。”

那些曾经饱受压迫的自由民和获得释放的奴隶失去了传统的部族关系，孤独地面对今世、思考来生，因此很容易对基督的故事产生情感共鸣。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夫——都是普通人。耶稣30岁以前是一个木匠，过着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他与各行各业的人自由地相处在一起，指责那些有钱有势的压迫者。他说，在耶和华的眼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坚持自己的信仰，站起来反对暴君，遭受了残酷和痛苦的折磨。但通过这一切，他宣扬了仁慈的理念，甚至对敌人也要有仁慈之心。他的力量并非来自施加暴力，而是来自开放的胸襟和仁慈的心灵。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人类同胞怀有普遍的同情意识的人，不是只同情自己的亲属，而是同情每一个人。耶稣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关于平等的故事，这是首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

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远远超越了当时广为接受的行为准则。他的同情对象甚至包括他的敌人。他永远会慷慨地帮助他人，而且会向他人展现出自己的薄弱之处。耶稣的山上宝训就体现了这一点：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耶稣还让其信徒做了一些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热爱自己的仇敌，这是普遍性的同理心的终极体现。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在因为失血过多而即将死亡之际，耶稣还在祈祷上帝原谅刽子手，

他说："父亲呀，请原谅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为。"最后，对于那些在今生默默地忍受痛苦，并且因为前途未卜而痛苦的人，耶稣为他们提供了最后一线希望——在来世获得永恒的救赎。

通过了解上帝之子出生、生活、死亡和重生的非凡故事，成千上万名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罗马中产阶级就可以实现精神的飞跃，摆脱矛盾的社会地位带来的苦恼，接受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叙事方式，即基督教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力量甚至超越了恺撒大帝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中产阶级试图在一个高度分化的、人际关系日益疏远的城市环境中寻找爱情、情感、亲密关系与友谊，在此过程中对耶稣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因为耶稣能明白他们的脆弱性，能明白他们遭到的压迫，能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们的痛苦。耶稣给予别人的那种同情是无私的、普遍性的和无条件的，堪称人类的楷模。耶稣也是脆弱的，饱受压迫，但最终获胜了，复活升入天堂，因此，如果其他人也走他的道路，接受他为救世主，最终也会升入天堂。

在基督教的故事中，脆弱性的问题尤其重要。耶稣的身体，即他的肉体存在，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被置于基督教叙事方式的核心位置。《耶稣受难记》描绘了耶稣这个脆弱的个体遭受的苦难。他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蹒跚地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走向将被处死的山上。在漫长而蜿蜒曲折的路上，他不时地遭到他人的殴打，不时地摔倒在地。耶稣饱受磨难，凡是听过耶稣故事而且自己也在承受苦难的人，同情感会油然而生。如同耶稣能理解他们承受的苦难一样，他们也能理解耶稣的苦难。这激发了一种普遍性的同理心，因为人们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意识到了生命终将消亡，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在反抗压迫和不公。脆弱性是伟大的平衡器。虽然人们的社会地位存在差别，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导致了人类的分化，但我们都是凡人，每个人的生命最终都会终结，这是我们共同的脆弱性。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性和有限性，是我们对人类同胞产生同理心的必要基础。

不幸的是，对全体人类表达同理心原本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但在之后几个世纪里，随着魔鬼撒旦为世界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同理心便被套上了条条框框，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行为。在犹太教中，撒旦几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耶稣遇难后不久，撒旦就以魔鬼的形象出现在一些犹太族群体中，但无足轻重。充满罪恶的撒旦是基督教的产物。在基督教中，撒旦反对耶稣和上帝，具有很强的欺骗能力，播下了混乱的

种子，甚至挑战上帝的权力。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撒旦一直以一个恶魔的形象存在，基督教利用撒旦来妖魔化那些非基督徒、犹太人、异教徒等。不信仰基督教就被指责为受到了撒旦的蛊惑，是在助长撒旦的邪恶力量，帮助撒旦公然反对上帝。在基督教的末世论中，出于种种意图和目的，撒旦已经变成了“另类”的代名词，撒旦隐藏在阴暗处，随时准备引诱忠诚的基督徒放弃信仰，然后将其转变为邪恶的化身。

虽然人类从一开始就会区分“我们”与“他们”，但基督教却让这种区别变得更加普遍化。基督教徒认为任何不接受基督的人，注定要永远坠入撒旦的地狱之火。他们的眼中只有三类人：真正的信徒、不忠诚的信徒和不信教的人。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教授伊莱恩·帕格尔斯指出：

> “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新现象是使用撒旦来表示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对冲突做出了解释：‘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在西方历史中，这种解释已被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巩固基督教群体的身份认同感，此外，还能够为仇恨，甚至大规模屠杀找到合理理由。”

基督徒的另类声音

除了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那一类基督徒之外，还存在另一类基督徒。耶稣遇难数十年后，人类进入了公元2世纪，基督教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对耶稣的故事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解读。1945年12月，一个埃及农夫在挖土施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密封陶罐，里面装的是以皮革装订的纸莎草古卷，共有13册，其中包括了《多马福音》。《多马福音》里面有很多令人震惊的话语，其开篇说道：“这些是秘密的话语，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所说的，由其孪生兄弟犹大·多马所记录。”当时，基督教的很多观念受到了大量批判，其中包括童贞女之子和耶稣身体复活。除了《多马福音》之外，这个陶罐里还包括《腓力福音》、《真理福音》、《埃及人福音》等。

这些古卷可以追溯到公元350～400年，内容可能是从希腊原文翻译而来。希腊原文可能完成于公元140年左右。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古卷的原文完成于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即公元50～100年之间，可能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形成于同一时

代，甚至更早。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4篇福音对耶稣的故事所做的解读是正统的。这些福音代表着早期基督徒的思想，他们自称“灵知”，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知识”。灵知派运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一种更特殊的含义——“自察”，即了解自己。他们认为，“了解自己就是了解人性以及人类命运。”

灵知派认为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位开明的先知和精神领袖。灵知派福音书里的很多章节读起来更像是现代社会中的励志书，而不是神学典籍。耶稣被视为一位精神导师，帮助我们摆脱幻想，启迪我们的心智。灵知派基督徒认为保罗派基督徒在耶稣遇难后所宣传的人类原罪、忏悔和来世救赎的想法是幼稚的，是对耶稣故事本意的错误解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一些学者注意到，《多马福音》所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与同一时期的印度教教义，及佛教教义具有相似之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孔兹指出：“佛教徒在印度南部地区与传播《多马福音》的基督徒曾有过接触。”佛教徒甚至在亚历山大港传播佛教，而在公元80～200年之间，这座城市也存在灵知派基督教的信奉者。

关于基督徒与佛教徒有过接触的证据，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伊莱恩·帕格尔斯指出，类似的思想完全可以相互独立地出现在印度与西方国家。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普遍经历着一种深刻的疏离感，因为当时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从部落依附关系向自我意识觉醒的转变，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转变。在这样一个处于过渡期的世界中，往往难以探寻个人存在的意义。在迷茫的精神状态下，一部分人接受了保罗派基督徒通过解读耶稣的故事而宣扬的原罪、忏悔、来世救赎等理念，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选择通过个人心智的启迪获得超验感。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认为，后者最早体验到了存在感危机。现在，我们一般将存在感危机同20世纪思潮联系在一起。荷兰神学家希勒斯·基斯佩尔等人认为灵知派的思想起源于日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但嫁接在了宗教框架之上。

显然，灵知派将耶稣视为一位达到开悟境界的人，而不是神，没有提到与耶稣有关的种种奇迹，也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帮助堕落

的人类实现救赎而受难。

关于天堂救赎的问题，《多马福音》不屑一顾，甚至持有讽刺的态度。《多马福音》中有这样一段话：

> 耶稣说："若你的导师告诉你，'看！天国就在天上'，那么小鸟便该比你早登上天国了；若他们告诉你，'天国在海里'，那么鱼儿就比你早登上天国了。然而，天国既是在你心中，又是在身外。"

《多马福音》完全摒弃了关于来世的观念。当门徒问耶稣，天国什么时候能到来？耶稣说："父的国在地上是展开着的，只是人看不见。"

灵知派基督徒甚至不认可保罗派基督徒宣扬的耶稣为了救赎人类而降临世间的观念。在《多马福音》中，耶稣告诉门徒，如果要实现个人救赎，不应该指望耶稣，而应该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多马福音》中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那么你的力量将会救你。如果你没有力量，那么你就会毁灭。"

灵知派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神性之光"，可以让人们发现"天国"，并且认为虽然上帝之国看似宏大威严，但也是具体的、创造出来的。

早在人类意识由神学意识过渡到心理意识的2　000年前，灵知派就对人类未来的人文主义具有了模糊的认识。《圣经》新约部分中的福音书将耶稣颂扬为全知全能的神和救世主，而灵知派基督徒则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善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耶稣的生命也是由对他人的同理心驱动的，而且耶稣的同情对象包括一切生物。

在《圣经》新约部分的福音书中，耶稣问门徒认为他是谁，彼得回答说："您是救世主。"相比之下，在《马多福音》中，耶稣对其门徒说："当认识了你自己，你也就被认识，并且明白你就是那位永活的父亲的孩子，和耶稣一样。"

对于灵知派而言，不了解真实的自我是人类苦难的内在原因。因此，要释放人性中的神性之光，就需要先通过内省来自察。伊莱恩·帕格尔斯认为，对于灵知派而言，天国是一种"被转变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当灵知派谈到“罪恶”这个概念时，并不是指道德上的罪恶，而在更大程度上指能造成情感伤害的因素。灵知派认为恐惧、痛苦与困惑是造成人类苦难的核心因素。自我发现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内心世界神性之光的过程，开始于对死亡恐惧感的体验，结束于人性的发现。然而，自我发现之旅要求，先放下各种忧虑，包括对死亡的恐惧，集中精力去思考个人存在状态中的非物质层面，即精神层面。发现神性之光的旅途必然是一场孤独之旅。每个人必须找到“正道”。

《圣经》新约部分提出了复活永生的理念，灵知派则提出了通过开悟实现精神转化的理念。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考虑到身体体验。保罗派认为身体是沉沦的、堕落的，灵知派认为身体是造成痛苦的根源，是对达到开悟境界的障碍。帕格尔斯认为，“灵知派教徒倾向于不信任身体的作用，认为身体是导致耶稣受苦受难的根源。”

由于灵知派没有全面认识到身体体验是人类体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身体存在的脆弱性使人类的同理心变得更强烈、更普遍，所以他们无法成功地将耶稣传递出来的谕旨融入自己世俗的行为中。在达到开悟境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实现方式的问题，是完全融入我们周围这个脆弱的、物质的世界，还是逃避世界、关注内心呢？历史上的耶稣并不避世，而是积极地融入世界。

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派基督徒和灵知派基督徒都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皈依基督教的人体验到了存在的孤独感带来的痛苦，需要在血缘和地理联系之外寻找新的生命意义。在耶稣的故事中，他们发现了新的生命意义。耶稣是神的儿子，简单地讲，也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导师，具有脆弱性和同理心，向所有人表达无条件的爱，甚至为了人类的救赎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深刻地触动人的心灵，使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耶稣的生命故事鼓励和启发其他人展现自己的弱点，同情他们的同伴，过着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生活。

新的育儿方式

基督教的故事促使人类同理心实现了大幅提升，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同理心意识的提升对育儿方式有影响吗？换言之，更具同理心的成年人是否变成了更具同理心的父母，并养育了更具同理心的孩

子呢？因为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对于儿女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同理心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父母同理心的提升肯定也会带来育儿方式的改变。这并不奇怪，有各种证据可以证明。虽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当时育儿方式的变化可能比较微小，但在当时，已算得上十分明显的变化。

我们之前讲过，农耕文明的兴起催生了父权制。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出生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城邦——乌鲁克城。如第5章中所述，上帝是让亚伯拉罕拿自己的儿子当祭品，用火烧，借以试探他是否敬畏上帝。亚伯拉罕将以撒带上山，准备杀死他，上帝在最后时刻赐予了缓刑。这则故事的意义就是基督门徒要服从上帝，就像妻子和儿女服从父亲一样，这就是父权制社会关系的体现。父权制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每个家庭。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以色列众人说：“你当心里想，你的神耶和华管教你，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

《圣经》旧约部分充满了关于合理抚养孩子的建议。体罚和教育孩子服从父权制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不服从者的惩罚是很严重的，甚至到了处死的极端地步。根据《申命记》的记载，摩西在告诫以色列人如何应对忤逆的儿子时，讲了下面一番令人恐惧的话：

>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的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邪恶从你们之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并害怕。”

在所有伟大的农耕文明及其周边地区，体罚孩子是常见的。然而，在罗马帝国，育儿方式却逐渐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罗马之前，孩子们被视为“小大人”，“儿童”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人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儿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儿童的世界与成年人的世界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然而，在城市文明较为发达的罗马城，多种力量和因素逐渐汇聚在一起，推动了育儿方式和育儿观念的改变。

首先，经济财富积累较多、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人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和培养下一代，可以多陪孩子一起玩，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人们社会接触面的扩大，人们也逐

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在同理心提升的过程中，孩子们成了受益者。尽管父权制和体罚仍是常态，但育儿方式也已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内省能力的提高。在早期的基督徒中（除了灵知派之外），大多数人都相信婴儿是作为一个堕落的罪人来到世界的，因此，需要采取严厉措施消除他们的罪恶。然而，当时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体罚可能使受苦的孩子更加叛逆。虽然传统的育儿观念认为，体罚是让儿童摆脱罪恶本性的必要方式，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持有反对态度。他指出："用石头伤害孩子的习俗会破坏友好的情感，就像一个走在两个成年人中间的孩子突然遭到了拳击一样，是不受欢迎的做法。"

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禁止虐童行为。在当时来讲，这些法律如同人类在21世纪通过立法禁止虐待动物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当时杀婴、贩婴和虐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教会的神父们则振聋发聩地指出儿童也有灵魂和灵性，也是上帝的儿女。当时的教会组织甚至开始为流浪的儿童提供救助服务。

但当人们读《圣经》新约部分时，尤其是耶稣提到孩子时，人们就会发现当时的人类对于儿童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变化很微小。当门徒问耶稣："天国中谁最大？"时，耶稣唤来一个孩子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对门徒说：

>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些小子里失丧一个。"

《圣经》旧约部分强调给予孩子"严厉的爱"，《圣经》新约部分则与之不同，里面没有提到耶稣主张将体罚作为惩戒孩子的工具。虽然使徒保罗吩咐孩子"凡事服从父母，因为这是耶和华喜欢的"，但他很快澄清了他的言论，对父亲们说："不要惹儿女生气，免得他们灰心。"使徒保罗所说的这番话，无异于从当代的精神分析法角度分析了虐待行为对儿童发育的影响。父亲们要明白，自己的育儿方式与孩子未来的情感发展状态之间具有因果联系。首先要具有自我意识，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情感的影响，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特存在的个体。只有这样，当父母对一个无助的孩子施加情绪和身体上的伤害时，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内

疚感。至于众多的父亲是否能完全理解保罗所说的话，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此前的历史资料中几乎没有这类闪烁着同理心光芒的心理描写。

历史学家小理查德·莱曼指出，在罗马时代，虽然杀婴、贩婴、弃婴、虐童之类的行为仍然猖獗，但母亲的抚育角色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到公元7世纪，父母的爱通常被描述为自然的、和蔼的。

莱曼和其他学者认为，之前的母亲（或父亲）并非不爱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的爱不成熟，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投射。他们那种不成熟的爱，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在一些父母那里看出来。莱曼并不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现代这种成熟的同理心，认为“当时的父母还不具备同理心这一素质”。

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塞编著的《儿童的历史：未曾讲述的虐童案例》一书讲述了从农耕文明的兴起到18世纪之间发生的一些不人道的虐童案例，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关于罗马帝国晚期育儿方式的进步，他还是给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评价。他指出，当时其他国家还处在为了祭祀神灵而牺牲子女的蒙昧状态，罗马人试图阻止这种行为，但徒劳无功，在一片由蒙昧国家组成的茫茫大海中，罗马就是一座文明开化的孤岛。不可否认的是，罗马法律从公元374年开始便将杀婴认定为谋杀罪。至少在一部分罗马人中间，育儿变得更加温情。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微小却显而易见的改变。

莱曼总结了早期基督教对父母及其育儿方式的影响。他写道：“虽然基督教的到来肯定不会预示着儿童的‘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但意味着儿童即将迎来一个不那么可怕的前景。”

基督教同理心的提升仅仅持续了三个世纪，却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印记。到公元250年，罗马基督徒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5万人。到公元4世纪初，罗马的1/3的人口是基督徒，使他们在整个帝国的运作过程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既无法欺负基督徒，也无法让他们保持沉默，而且越来越担心帝国走向瓦解，担心自己的统治会丧失合法性，担心自己会丧失控制权，最终他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

通过这一举动，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这个宣扬普世价值的宗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为教会领导者们提供了其渴望的合法性和政

府保护，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基督教来增强国民的凝聚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帝国的团结。在此过程中，耶稣自身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改造过程：

> “之前，基督主要是卑微者的神，是奇迹的创造者和救世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一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往地球的牧师，所以上帝越来越被视为‘天上的皇帝’。”

教会的领导者们宣布自己是使徒保罗的直接继承者和神灵派往地球的使者。他们还保留了接受忏悔、赦免罪恶等权力。之后，主教们被视为普通人和上帝之间的沟通者，关于救赎的所有事情，都要向主教们请教，请求主教赐予恩典。教会被认为是不会犯错的，是神灵在地球上的载体。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天主教教会应运而生。皇帝为教会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主教宣称自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其他的基督教派别，特别是灵知派的基督徒，则逐渐湮没了。任何反对教义的神职人员都会被视为异教徒而逐出教会。宗教领域的变化也影响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历程。从耶稣在地球出生开始，人类同理心开始提升。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类同理心的提升一直延续到了公元4世纪初期。然而，教会的“帝国化”却削弱了人类的同理心。到公元6世纪，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城市生活的解体，同理心也随之大大削弱。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基督教在罗马勃兴之际，人类意识的确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圣·奥古斯丁所著的《忏悔录》中看得真真切切。这部著作集中了基督教会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智慧。他也是第一个用深刻的叙事来描写自我意识觉醒的人。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多人纷纷效仿，撰写自传，对自我意识进行剖析。他们的自传具有日益显著的内省、自我剖析和自我意识特征，这反映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然而，奥古斯丁是第一个站在自我意识的角度剖析自己生命历程的人，他剖析了自己的自我意识，但在更大程度上，也剖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自我意识。

圣·奥古斯丁将他的著作题为“忏悔录”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在早期基督教修道院的生活中，公开忏悔是一个关键部分。作为对公开忏悔的补充，还有私下忏悔，忏悔行为从修道院扩展到了世俗生活中。信徒

们被鼓励公开表达出自己的罪行和邪恶的想法及意图。私下忏悔行为会迫使人们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便发现真实的自己。内省并向神职人员袒露内心深处的邪恶感觉及想法的人，得到的奖励便是祭司的赦免和上帝的恩典。这给内心不安的人带来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20世纪，精神病治疗领域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忏悔仪式是最早的精神治疗行为。通过忏悔来治疗精神疾病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

通过《忏悔录》一书，奥古斯丁非常公开地剖析了他的私密的内心世界，里面充斥着不纯洁的想法、矛盾和忏悔，从头到尾都是忏悔。他所著的《上帝之城》在长达1 50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奉为天主教神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皈依基督教后，认为必须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自己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的故事也是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故事。

《忏悔录》完成于公元397～401年，开始写作时，奥古斯丁刚就任北非城市——希波城的主教一职，而就在10年前，他改信了基督教。这本书具有自我质疑的风格，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试图弄明白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究竟哪些因素促使他选择了皈依基督教，同样重要的是，弄明白皈依基督教对其自我意识变化产生的影响。

奥古斯丁渴望心态平和与幸福。在一个深刻自我剖析的段落中，他因为自己的堕落而深感痛苦，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堕落，却再也无法逃避。他悲哀地写道：

> “主啊！在他谈话时，你在我背后拉着我，使我转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背着自己，不愿正视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委琐龌龊，遍体疮痍。我见了骇极，却又无处躲藏。”

奥古斯丁只有在放弃了自我的欲求，并将自己完全托付给慈爱的上帝时，才能感觉自己是完整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

奥古斯丁非常认真地思考并践行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腊名言——认识自己，给未来追随他的基督徒树立了一个榜样。虽然《忏悔录》里几乎没有任何字眼提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了他的同理心，但奥古斯丁却将内省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内省的行为符合教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促使人们对自己提出质疑，形成成熟的个性和同理心，最终推动人类意识的发展。

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罗马帝国的陨落

和东方那些伟大的农耕文明一样，罗马帝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欠下了巨额的熵账单，制约了同理心的提升，并最终加快了帝国的陨灭。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非常辽阔，罗马等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不得不从奴隶劳动和土地中吸收更多能量。帝国的城市化为同理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推动了基督教的形成。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在表象的背后，罗马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其发展造成的熵账单不断增加。最后，即便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无法逃避热力学定律以及熵账单的影响。

罗马帝国的辽阔疆域，可以归因于它的军事征服。公元前167年，罗马军队征服了马其顿，兼并了马其顿的土地，抢走了马其顿国王的财富。罗马帝国的财政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政府最后停止了对自己公民的征税。此后不久，罗马并吞了帕加马王国，罗马国家的财富，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征服了叙利亚，之后又征服了高卢，攫取了大量黄金和财富。从经济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军事征服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攻城略地带来的收入除了支付军事行动的成本外，还有大量的盈余，从而为未来的军事冒险提供了物质基础。奴隶劳动、矿产资源、林地和农田为加速扩张的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奥古斯都征服埃及后，罗马帝国连战连胜的扩张期也结束了。在长期军事征服过程中，罗马积累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作为庆祝，奥古斯都将大量钱币赠送给了平民。

由于在征服日耳曼民族的过程中多次失利，罗马帝国便转攻为守，利用其资源修建基础设施，守卫庞大的帝国。然而，事实证明，转攻为守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由于再也无法通过攻城略地攫取新的财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供基本的服务。为了筹措军费并给军人发放退休金，奥古斯都对帝国的公民开征了5%的遗产税，结果引起了普遍不满。要知道，在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根本没有缴过税。

维持庞大军团的耗费特别繁重。帝国的常备军耗费了巨大的能量，抢走了罗马人之前享有的福利。军人工资、军粮、军营和武器装备的费用不断上升，维护众多的公共工程和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也需要付出巨额成本。

在如日中天的扩张时期，罗马民众的公共救济实现了大幅增长，但随着扩张期的终结，罗马帝国不得不用日益减少的收入来维持庞大的救济金支出。在恺撒时期，将近1/3的公民都会从政府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救济。

维持庞大帝国的后勤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在地中海和欧洲驻扎军队、维护道路、管理并吞的领土等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能量，而罗马帝国可以获得的能量持续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罗马从殖民地获得的收益还不足以支付管理这些殖民地所需的成本，比如，西班牙和英格兰就属于这类殖民地，它们消耗的成本远大于给罗马帝国提供的财富。

由于再也不能通过新的征服与掠夺来维持庞大的帝国，罗马统治者被迫开始考虑通过农业来获得财富。此时，农业成为罗马唯一可用的能源来源。罗马的衰落与农业生产力的下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目前流行的观点是统治阶级的堕落、领导者的腐败、对仆人和奴隶的剥削，以及频繁的军事侵略活动。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罗马崩溃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土地肥力的下降和农业产出的减少。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能为维持基础设施和公民福利提供足够的能源。罗马帝国耗尽了农业这个唯一可用的能源来源，而目前我们的工业社会长期依赖廉价的化石燃料，因此，罗马帝国的历史应当为我们提供一个警示，今天的人们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罗马统治刚开始之际，意大利境内森林茂密。到罗马帝国行将崩溃之际，意大利及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木材被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土地被用来种植农作物和放牧。清理出来的土壤富含矿物质和营养元素，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产出。不幸的是，滥伐森林也对土壤造成了破坏，因为裸露的土壤容易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风吹过裸露的地表，从山上流下的水冲走了土壤，土壤肥力逐渐丧失。此外，过度放牧也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土壤肥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罗马帝国也开始在对外侵略过程中接连失利，依靠攻城略地攫取的财富逐渐减少，不得不把农业作为替代性能源来源。在罗马帝国晚期，90%的政府收入都来自农业。粮食产量对罗马帝国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人口日益增长，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给农业造成的压力日益增大。罗马帝国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农业产出，以便满足城市人口和军队的粮食需求。

从公元前58年开始，奥古斯都将免费发放谷物定为一种救济制度。在奥古斯都统治下，超过20万人可以免费获得政府提供的粮食。后来，又出现了免费的面包、猪肉和盐。奥古斯都之后，对于粮食和面包，有时会收取象征性的低价，有时则免费提供。

过度耕作进一步降低了土壤肥力，进而导致人们加大力度去开发原本已经日益贫瘠的土壤。小农场主们无法利用已被侵蚀的土地生产足够的粮食，甚至每年的产出还不够缴税（罗马帝国的土地税率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收成如何）。农民不得不依靠借款来维持生存。他们欠下的债务都用于缴税，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资金用于改进农业生产。由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农民无法长时间休耕以使土壤恢复肥力，他们不得不继续开发原本已经十分贫瘠的土地，从而陷入了产量不断降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恶性循环。小农的土地通过抵押、出售、偿债等途径集中到了少数人和机构手中。在整个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大地主购买小农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庄园。大部分土地已经不再适合种植粮食了，不得不被转用作牧场。在意大利，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不得不迁移到城市地区，依靠政府救济生存。

在4世纪，仅在罗马这一座城市，就有30多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公共救济。城市需要不断地从农村吸收更多的资源来满足富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给穷人提供福利，维持公共工程和官僚机构，修建纪念碑、公共建筑和露天剧场，举办公共赛事和展览。这超出了农业的承受极限。罗马帝国的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到3世纪，在非洲北部和地中海周围的省份，多达一半的耕地都抛荒了。

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土地无人耕作后便长期荒废，导致更加严重的侵蚀，肥力进一步下降。农村人口大规模减少对低地的影响尤其严重。在早春时节，地势较低的土地往往容易积水，由于无人排水，便形成了沼泽地。不断扩大的沼泽地滋生了大量的蚊子，疟疾开始传播，导致那些原本就已心神沮丧、饱受饥饿折磨的罗马人变得更加虚弱，进一步削弱了可用的人力资源。

在公元二三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多次暴发瘟疫，导致多达1/3

的人口死亡。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从事农业劳动、补充政府和军队空缺的人更少了。帝国的形势变得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政府被迫再度出台征兵制度，通过强制方式确保兵源。313年，皇帝君士坦丁颁布法令，要求士兵的儿子要继续服役，从而建立一个世袭服役制度。4世纪初，君士坦丁通过颁布类似的法令把公共服务部门的职位也变成了世袭制。更具争议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颁布了一道禁止佃农离开祖种土地的法令，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无异于建立了农奴制度。即便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这道法令依旧存在，直到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颁布《圈地法案》，才将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部法令来得太迟了，作用微乎其微。到4世纪，农村人口已经减少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仅有的那些农村人口虽然被法令捆缚到了肥力耗费殆尽的土地上，也根本无力将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到能够满足帝国需求的程度。

尽管农业产量在下降，罗马却继续扩大军队规模，竭尽全力维持这个正在走向崩溃的帝国。在4世纪，罗马常备军规模多达65万人，驻扎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他们需要大量的口粮。如果一支军队的驻地距离罗马城太远，便不得不从驻地采购粮食，这给当地的粮食生产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罗马帝国所经历的严酷现实正是热力学定律导致的。在一种非平衡状态下维护基础设施和供养庞大人口需要大量的能量。然而，其能源来源——农业，早已耗费殆尽。没有其他替代性的能源来源，罗马只得继续加大农业开发力度。到5世纪，政府机构和军队的规模翻了一番。为了供养这些人，统治者不得不增税，导致人口更加贫困，尤其是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正如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的皇帝开始毁灭土地和农民这两类资本，无异于杀鸡取卵。

由于能源耗竭，罗马帝国开始走向瓦解。基本的公共服务逐渐减少，庞大的基础设施失修，军队再也无力击退掠夺成性的侵略者，蛮族开始大肆蚕食罗马帝国的土地。到5世纪，侵略者已经进攻到了罗马城下。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崩溃。到6世纪，罗马城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从辉煌时期的100多万减少到了不足10万，整座城市几乎变成了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能量定律是多么无情。除了罗马城之外，其

他大城市也遭到了遗弃，人们为了生存，纷纷逃到了农村。他们被束缚在封建贵族统治的庄园里从事农业劳动。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城市一度为世界主义的形成、基督教的兴起和人类同理心意识的增强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此时却湮没在历史中。

熵账单是非常庞大的。地中海、北非、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北至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免费能源都被吸收进罗马帝国这个庞大的机器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到侵蚀，贫病交加的人分散在整个帝国。欧洲直到500年后才开始复苏。

罗马帝国的兴衰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一个伟大的政治现象。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罗马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印证了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新能源和通信机制产生的协同效应催生更复杂的社会安排，进而推动了人类意识的质变。人类意识的变化是在熵账单不断增加和同理心不断提升的辩证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辩证过程中，社会的能源消耗量达到最高水平之际，一般也是人类同理心发展状况最好之时，随着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和熵账单的增加，同理心的发展势头也趋于衰减。当熵带来的负外部性超过能源供给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产生的正面支撑作用时，人类文明就会衰落，有时甚至消失。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政治动荡加剧，社会绝望情绪蔓延，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势头有可能放缓甚至逆转，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趋于削弱，社会成员表达同理心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较小的圈子里。

同理心与熵账单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但不总是导致文明衰落或崩溃，之前形成的人类新意识并不会完全消亡，残留下来的意识之光虽然非常微弱，但会继续发展壮大，借助新的能源和通信手段发生质变，形成另一种新的人类意识。

人类同理心在古罗马时代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出现，为人类意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涓涓细流般的新意识终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同理心也开始增强，为近代的到来做好了铺垫。

---

[1]　罗马斗，modus，罗马的量具，1罗马斗约等于8.75公升。——译者注

第8章 中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和人文主义的诞生

7世纪时，罗马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度繁华的大都市已经沦为废墟，港口空泊，道路年久失修，行人寥寥无几，商业与贸易一片萧条，曾经管理着庞大帝国的官僚机构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辉煌。天主教会虽然仍在名义上主导着残余的罗马世界，而此时所谓的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一种地方性的政权。

新的权力中心分散在成千上万个封建领地上，商业活动让位于自给农业。欧洲生活的重心再次回到了农村。封建领主统治着各自的领地，在其庄园辛勤耕作的是无数个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奴。城市生活的瓦解导致了识字率和文化水平的下降。

到9世纪，欧洲人口减少到了新低。在许多地区，只有寺院的僧侣保持着基本的文化水平。曾经通用于整个罗马帝国的语言被众多地方性的语言和习语所取代，所有人倒退回了口头文化与意识的阶段。人们普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生活在成千上万个小山谷和山间城堡中。除了商人和流放的犯人之外，人们普遍停止了旅行。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几乎所有的对外通信都中断了，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居住地附近的森林或山峦。人们几乎无法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也不会向外流动，社会趋于停滞。日常生活和季节变化塑造着世俗生活。曾经塑造了城市生活和庞大帝国，并且被之前的人们以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逐渐被遗忘。没有人关心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报告，也几乎没有陌生人来报告。

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几乎谈不上快乐，也不存在个人发展机遇。然而，即便在“黑暗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存在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每个人，不论其身份多么卑微、命运多么坎坷，都生活在教会的荫庇下，教会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对封建领主、对耶稣基督和教会神父们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诚，那么来生就会获得永恒的救赎，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对宗教的忠诚变成了社会的黏合剂，确保每个人都在存在巨链上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后来伏尔泰将这个时代的欧洲社会讽刺为“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

当时的社会几乎没有流动性，甚至连历史记录也很少，劳动分化程度明显下降。欧洲的封建社会，除了占据统治地位的领主、负责祈祷的神职人员和负责战斗的骑士之外，其他人都是农奴和隶农，在领主的封建庄园内辛勤耕作，以换取领主的保护。

基督教最初是一个发端于城市环境、由那些掌握了书面文化的人推动的宗教运动，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变化，开始适应那些基本上没有文化素养的农村居民。最早一批的基督徒注重根据教义的启发进行内省和冥思，而到了中世纪，信仰基督教的方式则变成了死记硬背，只注重背诵教义而不注重思考，甚至还夹杂着基督教产生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神秘仪式和迷信活动。

在罗马时代，国际性大都市的环境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同理心的提升，而现在，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人们逐渐形成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排外情绪。每个村庄和山谷都变成了故步自封的堡垒，每一座山峦都变成了谁也不愿探索的无人之地，人们将自己所熟悉的、已经接受的世界与陌生世界分割开来。

这种扭曲的断层状态持续了几百年。可以准确地说，在这期间，世上没有任何新鲜事。然而，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并没有18、19世纪一些历史学家最初设想的那么久，持续时间只是从5世纪末延续到了10世纪，还不到500年的时间。

中世纪后期的经济革命

从10世纪初开始，一种新的能源机制慢慢开始在欧洲大地上确立。马力、水力、风力的运用推动欧洲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城市生活开始恢复活力，商贸领域重新焕发了生机，社会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再次提升。13~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这项运动也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标志着人类文化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冬眠后开始苏醒。15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新的通信革命，与新能源汇聚在一起，催生出第二波文艺复兴，人类由此迎来了人文主义时代。新能源和通信革命催生了新的、更复杂的城市环境，更密集的生活安排，更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及更频繁的社会交流，人类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化也出现了质的飞跃。

历史学家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在《近代思想的构成》一书中指出，当时人口重新从农村返回到新兴城镇，这对欧洲未来的整个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说：

> “城市文明最初主要是商业文明，后来越来越多的是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兴起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力量，催生了中世纪以后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推动了近代文明的到来。”

新的城市文明带动了同理心的提升，促使欧洲社会的人类意识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中世纪后期，同理心的提升始于农业领域的技术革命，人类开始能够利用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获取能量。

马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虽然人类早在古代就开始利用马，但用途非常有限，只限于拖拉重物。到中世纪晚期，人类先后发明了肩带、马蹄铁、挽具等，能够有效地利用马来耕地和做其他劳动。事实证明，在从事农业劳动方面，马比牛或人类优秀得多。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带有犁头和犁刀的铧式犁，帮助农民开垦了北欧地区的黏重土壤，新开辟了大量土地用于种植农作物，实现了二区轮作制向三区轮作制的转变，大大地增加了农业产出。这些新发明汇集在一起，使农业产出规模在13～14世纪出现了大幅提升。这种耕作方式的优越性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很多地区的农业产出规模增加了1/3，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

新的耕作方式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出规模，还实现了作物类别的多元化，尤其是豆类的出现，让人类的饮食变得更加平衡。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农业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他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书中指出：

> “改良的农业耕作方法不仅增加了食物的数量，还增加了食物的种类，至少在北欧地区是这样的。正是得益于这些进步，人口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城市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工业产出持续增长，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人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随之到来。”

在中世纪的新能源机制中，农业创新构成了一个关键环节，但同样

重要的是人类从10世纪开始大规模利用水力和风力。法国历史学家让·然佩尔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中世纪的工业革命”。虽然水磨早在罗马时代就得到运用，但即便到了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它的用途仍然非常有限，因为罗马人更喜欢用“血磨”，即利用奴隶的劳动。762年，欧洲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水力驱动的谷物磨粉机。到1086年，仅仅在英格兰一地，水磨的数量就多达5 600多台，分散在3 000个社区。到了11世纪晚期，水磨已经盛行于欧洲各地。

水磨的用途从碾磨谷物扩大到了洗衣、制革、锯切、粉碎橄榄和矿石、为高炉操作风箱、抛光武器、减少油漆过程中所需的染料或造纸过程中所需的纸浆。

在各大河流沿岸的城市里，都建立了大量水磨。到11世纪，法国已经超过两万台可以正常运转的水磨，每台水磨可供250人使用。一台水磨可以取代10~20人的劳动力，这就使人类的生产力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升。如果把所有水磨的劳动力加在一起，相当于25%的成年劳动力的劳动力。

整个欧洲的河流和小溪沿岸都有大量的水磨可用，所以人们就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风力，希望能像利用水力一样利用风力。1185年，欧洲的第一座风车出现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风车遍布欧洲北部大平原，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别样景观。风车也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数量较少，因为那里的河流和小溪非常多，水磨已经足以提供大量的能量。

风车技术的吸引力，在于风力利用起来比较自由。一般而言，领主的庄园都必须建立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领主对庄园内的水资源拥有财产权，而风车可以建在任何地方，而且风力利用起来基本上是自由的，不像水资源那样存在产权。风车通常建立在城市附近，给当地的市政府提供了一种新能源，这种新能源不受封建领主的控制，因此，风力资源被称为“平民的资源”。

历史学家往往容易忽略那些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技术创新，其实，正是这些技术创新给欧洲人带来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事实上，到18世纪晚期，欧洲已经处于“准工业革命”的阶段，之后便迎来了以煤炭和蒸汽为动力的工业革命。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水磨超过了50万台，同时开动的话，能产生相当于225万马力的能量，为早期资本主义

经济中大多数关键商品和产品的生产提供能量。每台风车平均能提供30马力的能量，按照之前的标准来看，这足以标志着生产力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

如果没有一些小部件的发明，中世纪的能源革命就无法成为现实。小林恩·怀特指出，欧洲不仅创造了多种新的能源来源，还发明了关键的工程构件，以便将这些能源有效地运用到不同的行业。11～12世纪，凸轮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在13世纪，工匠们发明了弹簧和踏板。14世纪，欧洲人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齿轮装置。15世纪，他们改善了曲柄、连杆和调速器，实现了由往复式运动到连续旋转运动的转变。

> 怀特详细地阐述了新能源机制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在15世纪后半叶，欧洲不仅具备了更加多元化的能量来源，远远超越了之前任何一种文明，还掌握了多种获取、引导和利用这些能量的技术手段，比之前任何一个文明的技术都要多样化和熟练，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先进——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世界。欧洲从1492年开始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欧洲对能源的高消耗量为基础的，这种能源消耗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水磨和风车引发的能源革命还产生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在中世纪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帝国赖以运行的能源机制都高度集中，要获得足够的能源，必须签订合同来雇用大量的劳动力，或者剥削大量的奴隶。与这种能源机制不同的是，利用风车和水磨获取能量的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分散性和便捷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比较少。封建领主与新兴资产阶级（以城市商人和手工艺者为代表）为了争夺对这些新能源的控制权而开展了长期的斗争，而技术偏爱了后者。可以说，能源利用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活跃在城市地区的大量熟练的手工艺者和商人能够自由便捷地利用这些能源，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

在这些更为分散的新型能源技术推动下，成千上万个城镇和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整个欧洲大陆，其经济和政治状况在新能源的影响下日渐变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与地位牢固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最终导致了封建秩序的终结。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从萌芽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逐渐演变成重商主义，在随后的几个世

纪里又演变成工业资本主义。

新能源机制的分散性使能源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普通大众手中，这就有可能打破少数人对能源的垄断，增强能源利用过程的“民主性”。人们不需要依附他人就能使用这种新能源，从而有可能形成“个人自治”的观念。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以手工艺者和商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新能源机制的帮助下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日益呈现出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的色彩。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形成与新能源机制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或许不是巧合。

15世纪中期之后，欧洲出现了印刷技术的革命，与新能源技术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为人类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创造了环境和框架，并推动了人类同理心的提升。在整个近代，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势头都在不断加剧，几乎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刷术革命

1436年，德国工匠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西方社会的铅活字印刷术，这一新的通信技术迅速传播开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个城市都出现了专业性的印刷工厂，大批量地印刷用欧洲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印刷术革命对知识的搜集、储存和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不亚于互联网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学院高级讲师迈克尔·克拉彭在《印刷技术史》一文中指出：

> “如果一个人出生于1453年，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一年，那么在他15岁那年，当他回望自己的人生时，就会发现在这些年间有800万本书被印刷出来，这或许比欧洲所有抄写员在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建立该城以来完成的书还要多。”

识字曾经是一小群精英的特权，但在印刷革命后，书籍的普及提高了欧洲社会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同能源利用过程一样，学习过程也摆

脱了少数人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了民主化特性。据估计到16世纪末，在欧洲城市里，50%以上的人口能够识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农村和落后地区，这个比例要低一些。

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凸显了印刷技术对于促进人类交流的重要性。印刷技术为马丁·路德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利用这种交流媒介来公开宣扬自己与教会的决裂，并号召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宗教改革运动。印刷媒介推动了基督教的革命。仅在1517～1520年，马丁·路德撰写的30部作品便得到了大批量印刷，销量超过30万本。即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圣经》从拉丁语译成德语等语言后，得到了大批量印刷，正是由于每个人都能得到容易读懂的《圣经》，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强调“每个教徒都是神父”。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必须与上帝建立独立的联系。在拿到《圣经》之后，每一个真正的教徒都要对上帝传递的信息做出自己的解读，而不必非要依靠神职人员去帮自己解读。在新教时代，宗教机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性，但根据新教的要求，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个教徒都要深入思考自己的灵魂和意识，反思自己的感觉、意图和想法是符合上帝的要求和《圣经》的经文。

新教徒的家变成了教堂和圣殿，批量生产的“自助类”宗教书籍和小册子在家庭祷告中变成了必备之物，并成为16世纪的人们进行自我分析的工具，只是这个分析过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而是看看自己的想法究竟是符合上帝的谕旨，还是符合异端邪说。印刷品为人类与上帝开展深刻的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

美国作家、教育家路易斯·布克·赖特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一书中指出了书籍对于普及新教的影响：

> “纺织品商、肉商……能在许多书籍中找到祈祷和冥想的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很快地学会了如何在没有教会的帮助下走近上帝。伦敦市民学会了在自己家里做礼拜，普通公民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新教强调每一位信徒都能与上帝建立个人的联系，而不需要将神职人员作为中间人。这种观点产生了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它将个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教徒逐渐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有个性

的灵魂，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那里也占有一席之地。上帝对每个人的想法和故事都感兴趣，即便地位最低的人也同样享有接近上帝的权利。

基督教的分裂迫使数百万基督徒开始反思自己对上帝的情感和信仰。一千多年来，教会只有一个，人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成为信徒，要么成为异教徒。宗教改革运动拉开帷幕后，出现了对上帝谕旨的多种解读，尤其是新教本身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派别和组织，这样一来，人们在决定自己的信仰时就有了多种选择。

宗教改革运动迫使人们不仅去质疑自己的信仰，还质疑自己能否获得救赎。天主教会关于救赎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人们接受基督为救世主，忏悔，接受圣餐，在去世前就能得到赦免，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救赎。忏悔和做善事能够为获得永生铺平道路。

然而，新教关于救赎的观点则比较复杂，获得救赎之路也比较曲折。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在来世究竟是获得救赎，还是注定进入地狱，在出生时就已经被上帝确定了下来，人的命运也是上帝注定的，忏悔和做善事不可能扭转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如何才能知道上帝给予自己的安排呢？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认为，有些线索可以给人们提供启发，其中一个就是看一个人在其生命中能否提升自己的个人成就。尽管个人成就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可以透露出上帝对这个人的安排，如果一个人能提升自己的成就，就表示他注定会在来世得到救赎，反之则不会得到救赎。

由于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救赎，清教徒花费了无数时间来反思自己内心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看看自己究竟是善还是恶，究竟是忠诚的教徒还是亵渎了上帝，以便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寻找到能够揭示自己命运的蛛丝马迹。清教徒们永远都在自我分析，但在封建时代，早期的基督徒不需要像这样不断地自我质疑，不需要仔细考虑每一个想法，以便评估它对于来世获得救赎的影响。基督教没有给他们提供这么做的理由，他们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倾向。当他们深入探索自己的心理时，就会问自己一些关于自己思维的微妙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动机。例如，当一个人表现出一种善良的行为时，他会问自己的动机是否为了得到上帝的青睐以便获得救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自我欺骗。

早期的清教徒利用自己新掌握的文化知识写日记，记录下他们所有

的日常行动，梳理和检查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是否属于那类被上帝选中而注定能得到救赎的人。

印刷革命还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了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比如它催生了“作者”这一概念。虽然之前也有个别作者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这种作者非常少。稿件写作往往是匿名的，是多名抄写员作为一个集体在长时间内努力的结果。作者的概念将个体提升到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将作者的声音与集体的声音区别开了。

“作者”这一概念让个体变成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之前的时代不会产生个体创造性的概念。在书面文化中，虽然写作过程仍然是孤独的，但是成书需要成百上千的抄写员轮流从手抄本上抄录下来，这是集体劳动的过程。抄写员最多只是在旁白处添加一些注释或做出轻微的修订，但工作本身是复制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如果数以百计的抄写员去共同完成一本书的抄录工作，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偏好，最终可能会改变原文的意思，但没有一个抄写员将自己视为一名“作者”。他们只是扮演着一个类似于复印机的角色。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有灵感的、能给人带来启发的作者，我们也可以回忆起来他们的名字，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但他们的灵感往往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心世界，只是被一个主意或想法打动了内心。然而，个人的创造力是源自内心世界。只有在一个自我意识发达的文化中，个人创造性才能变成心理状态的一部分。

“个人创造性”与“个人成就”这两个概念存在相同的时间维度。在一个注重“作者”观念的文化中，每个作者都会将自己的著作视为自己的成就。在封建时代，评判一个人生命的标准是对领主、教会以及上帝的忠诚，而到了近代，这个标准则变成了个人成就。马丁·路德以及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理论都强调通过提高个人成就去确认自己是否得到了上帝的青睐，以及能否在来世得到救赎。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思想日趋世俗化，人们日益注重自己在商业领域的个人成就。19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新教强调的个人成就称为新教的“工作伦理”，认为这种伦理奠定了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心理基础。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将市场资本主义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作者”的概念逐渐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文字拥有“所有权”。版权法律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变成了一种商品。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对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拥有所有权，其他人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才能倾听，这标

志着人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往往面对面地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口头方式分享自己的想法。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即使手稿被大声朗读，也是为了让人听到，而不是看到。印刷革命催生了一种更适合进行冥想的环境。书籍适合一个人默默地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种个人隐私感，进行自我反思和内省，最终调整自己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看法。

印刷术也让人类心灵呈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完整性和封闭性。在口语文化中，人们在相互交流时没有界限感，不是一个人停止说话后，另一个人再开始说，而是同时进行，毫无逻辑地在不同话题和故事间转换。所以，口头表达与倾听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人们的交流内容往往相互脱节、支离破碎。然而，当想法与故事被浓缩到一本书里后，就固定了下来。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封闭性。每本书在讲述故事时，都会讲述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些故事被固定在了封面和封底之间。

正如沃尔特·翁所说，书页上的故事不会因为人们的讨论而改变。读者只能去读，而不能立即和作者争论、反驳作者或表达异议，但是他们可以给作者写信或公开发表自己的反驳意见。然而，每一个反驳意见本身的属性都要受到交流介质属性的限制。每个作者都知道，一旦自己的观点被印刷出来，形成了书页，就意味着这是最终版本。一旦进行大批量印刷并公开发行，自己就再也无法改变了，因为文本是无法更改的。

这样一来，印刷文本就会催生出自治感和封闭感。书面交流在本质上就是自治性的，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人，也会形成自治感。毕竟，阅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需要全神贯注。外界会干扰一个人的注意力，而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时，往往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当阅读时，人们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阅读体验本身是封闭的、有界限的。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从本质上来讲，经常阅读的人比只听不读的人更具有个人主义和个性化的倾向。她认为，“经常阅读的人比只听不读的人更能够接受社会是一群离散个体构成的，或者说个体比社会群体更重要”。

印刷传播加强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而代价是之前那种牢固的集体关系开始变得松散。印刷传播还能帮助人们跨越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去构建

新的关系和联系。在欧洲国家、美国，甚至更远的地方，新的、日益复杂的城市商业文化对印刷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印刷技术为这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能量来源，并且成为一种控制机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印刷技术为近代世界的诞生所做的多重贡献。

首先，印刷品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介质，重新定义了人类组织知识的方式。用口头交流方式来记忆和组织知识，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随着知识量的增加，口头交流方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中世纪的抄写员传播知识，会夹杂着自己的主观偏好，导致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扭曲。相比之下，通过印刷品来传播知识，则显得比较合理、明智，人们也可以进行更好的分析。印刷品一般含有目录、页码、脚注和索引，这是超出人类记忆力的地方。有了印刷品，人类再也不用不停地回忆过去，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未来。意识的转变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刷技术带来了各种地图、图表和列表。事实证明，这些工具对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描述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刷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制作标准化的、易于复制的地图，令航海和陆地旅行变得更容易预测、更加便捷。众多航道和陆地通道的开辟扩大了商业市场和贸易范围。印刷出来的时间表不断更新，能够大规模印刷和广泛流传，促进了铁路运输和航海的发展。

印刷技术还促进了以“合约”为基础的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商人和资本家能够更好地协调日益复杂的市场活动，跟踪了解范围与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交易。近代簿记、时间表、提单、发票、支票和本票都成为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管理工具。印刷技术也实现了定价体系的统一，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定价体系，近代的商品交换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印刷技术还催生了组装的思想。组装是工业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将字母表拆分，形成一个个标准化的金属字母，再将这些字母排列成印刷的书页，固定在活字版上。这些字母具有相同的规格，可以互换位置和反复使用，从而使印刷技术成为近代工业第一个出现组装理念的领域。组装、标准化和能够互换的零件、物体空间排列的可预测性，以及大规模生产都构成了工业生活方式的基石。

印刷技术还使人类能够以有序的、理性的和客观的方式去梳理纷繁

复杂的现象，进而促使人类形成线性逻辑、时序逻辑和因果逻辑。人们经常说的“组织”一下自己的思维，就是指将各种思考成熟的想法以线性方式排列起来，先行后续的排列方式体现了显著的逻辑关系。这种思维模式与口语文化中的思维截然不同，因为口语文化中的人们表达出来的思维往往具有重复性、冗余性和非连续性。

印刷技术消除了口头语言的冗余性和重复性，使精确测量和描述成为可能，为近代人类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以一种严格和缜密的方式去检查、观测和描述纷繁复杂的现象，能够用精细的标准去重复性地做实验，这在之前依靠口头或抄写来传播知识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印刷技术普遍提高了人类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让一代又一代人掌握了有效的交流工具和新的工作及社交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简而言之，印刷技术为工业生活方式创造了适当的思维和世界观。

人文主义的诞生

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交流方式的变革。在交流方式变革与能源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人类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诞生，为人类进入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文主义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同理心的大幅提升，即便今天，人们也能感受到由此产生的影响。

新的意识以一系列有趣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欧洲各地羽翼渐丰的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祖先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文主义是在16世纪开始的。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世纪，世纪初有科学与艺术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世纪末有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当我们思考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意味着什么时，我们所指的就是16世纪人类在文学、艺术、建筑、科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人。那个时期的人类精神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状态，通常被称为“北方文艺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我们通常将其同人类再度燃起的对古代哲学、政治和文学作品的兴趣，以及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的艺术领

域在13世纪晚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和唯情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基于现代视角来看，16世纪晚期北欧的文艺复兴或许更令人感兴趣。当时，在中世纪后期形成的新能源与通信机制加速发展，一座座新兴城市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的中心，开始形成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

16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那种教条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当时许多重要人物仍然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他们更愿意挑战陈旧的正统思想，并接受新思想。文学和艺术精英们在与自己周围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怀有更多的好奇心和幽默感，甚至愿意揭露中世纪那个充满矛盾和讽刺的世界。

伊拉斯谟经常取笑传统教会那些僵化的教条，从而为一个开放的新时代奠定了基调，但他并没有那些传统教条。“心存疑虑却暂可容忍”成为当时的一条普遍准则。在这个世纪中，经常出现深刻的对话，有的对话会探索古希腊、古罗马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意义，有的则会探讨未来世界出现的一些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既是一个新生事物萌芽的世纪，也是旧事物获得重生的世纪。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探索和庆祝人类生命丰富性与多样性的世纪。

与其他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愿意揭开虔诚的表象，揭露背后的虚伪。虚伪的人一方面注重高尚的美德，而另一方面又指责人类的肉体存在是腐败堕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雅士非常热衷于探索那些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因素，也不害怕探索人类肉体存在状态下的脆弱、缺陷与罪恶，正是这些负面因素给人类生命带来了各种问题和挑战。

中世纪的神职人员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而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类应该拥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呼吁神职人员多倾听公众的声音。

如果莎士比亚早出现几个世纪，可能会被绑在火刑柱上。但在16世纪，兴高采烈的普通民众却如泉水般涌向了剧院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他笔下的一众人物——朱丽叶、哈姆雷特、夏洛克——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时，台下的观众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尽情地嬉笑怒骂，剧中人物的苦难会博来同情，胜利会引来欢呼，卑劣行为则会招来怒骂。

从许多方面来讲，16世纪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伟大的西班牙、葡萄

牙和英国探险家们航行到全球各地，发现了新的土地，接触了异国文化。虽然在接下来的17世纪，欧洲的教会神职人员、重商主义者和王室成员认为这些刚刚被发现的民族是野蛮落后的，并要求他们立即皈依基督教（他们持有这种观点的部分目的是为奴役和殖民寻找合理理由），但人文主义者们却对这些民族比较感兴趣，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将他们的经验和自己的故事相比较。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认为：

> “人文主义者在论证人性和人类生命的过程中选择将这些新鲜的、奇异的发现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以便扩大我们的同情心，让固有的认知框架适应多元化的民族。”

到17世纪，在一个帝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世界中，人文主义的观念逐渐被丢在一旁。

图尔敏为了研究世界上新出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以法国思想家蒙田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蒙田几乎没有任何叛逆精神，他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绝对可以被称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人，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就能体现出来。图尔敏指出，蒙田在其随笔中坦率地讨论了自己的坏习惯，比如吃饭时有多么贪婪，以至于咬到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但蒙田与奥古斯丁不同，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描述了人性的弱点给他带来了诸多折磨，为此饱受痛苦，迫不及待地需要向上帝忏悔，承认自己的罪，但蒙田只是简单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他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难免存在不完美之处。

当正统基督教试图把人类思维与身体分离开时，蒙田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剖析。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对教会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讽刺，指出了思维与人体的密切关系：

> “人的思想与躯体如兄弟般亲密相连，每每在需要时抛下我而追随躯体。我有心满足它，吸引它，都是枉然。我试图把它从它与躯体的联盟中解脱出来，并向它展示塞内加和卡图鲁斯，以及贵妇和宫廷舞蹈，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倘若它的伙伴患腹痛，似乎它也患腹痛。连它所独有和特有的活动也不能激起它的活力，它显得迟钝麻木，像一个冻僵的人。没有轻松活泼的躯体，就没有轻松活泼的精神产品。”

蒙田对那些憎恨肉体的哲学家的讽刺态度尤其强烈：

> “在所有哲学主张里我乐意选择最实在的，即最富人情味、最适合我们的：我讲话符合我的习惯，既是低调的，也是朴实的，有人张牙舞爪地教训我们说，让神圣的同世俗的，让有理性的同无理性的，严厉的同仁慈的，老实的同不老实的结合，那是粗暴的联姻；还说快感是兽性的，不值得圣贤品尝。”

蒙田的思想远远超越了罗马时代早期的基督徒，因为他愿意接受人类经验的完整性，并认为身体、思维和精神不可分离。早期的基督徒虽然也会谈到人与人之间会形成兄弟般的情谊，但认为人的肉体存在是沉沦堕落的，因此倡导地球上的人们要过一种苦修生活，以消除自己的罪恶，以免罪恶渗入身体，进而污染精神追求。

然而，蒙田凭借自己的直觉认为苦修的生活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对肉体的仇恨会阻止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身体体验为人们表达同理心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感同身受地体验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抗争，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人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生命，我们自身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人性，也能更加真实而深刻地理解生命的真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同理心建立在肉体存在的基础上，是对生命的赞颂，是我们超越自身的方式。对于这一点，蒙田是理解的。

在16世纪晚期，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开始消退，个人生活越来越成为心灵慰藉之源。而在个人生活日益重要的同时，个人的公众形象就会变得模糊而难以处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转换，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焦虑。关于婚姻和育儿的态度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人类意识方面的变化既反映了同理心的提升，也反过来促进了同理心的提升。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一个关于自我身份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变成了公众讨论的话题。

之前的几代人更关心个人虔诚和荣耀的问题，这反映出教会和封建秩序完全控制了他们的生活。然而，新兴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变化，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务实的精神，开始注重探索自己真实的一面。他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真的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吗？人们的公众形象是不是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呢？到了16世纪，自我意识的出现

催生了自我怀疑的意识，不仅怀疑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还怀疑其他人的。在人们开始尝试性地构建自己的自我形象和公众形象时（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他们也开始质疑其他人的公众形象，想知道在表象之下那个隐藏起来的、尚未表现出来的内在的自我。

探寻真实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想法。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观察到，我们以前从不会问犹太族长亚伯拉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不会问阿喀琉斯或贝奥武甫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无所谓真实，也无所谓不真实。然而，到了简·奥斯丁写书时，她的读者们非常关注真实性的问题，纷纷质疑她笔下的主人公是否真实存在。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给他的儿子雷欧提斯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首先对你自己忠实，犹如先有白昼后有黑夜，这样才不会对别人虚情假意。"当时那些去剧院观看戏剧的观众们几乎不会对这条建议感到任何惊奇，但如果在几个世纪前，这必然会被认为是荒谬的。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在信件结尾处写上"您真诚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最初，"真诚"这个词是用来表示"干净"、"纯净"或"贞操"。比如，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修饰葡萄酒，表示酒的纯度。当用来修饰人的时候，这个词隐含着"真诚"或"贞洁"的意义。到了16世纪，它被用来比较"虚假"和"真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教导人们如何构建一个真诚的公共形象，并以此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操纵工具。这本书一夜成名，引起了巨大轰动。

特里林提醒我们说，在1550年，伦敦只是一个拥有6万人的小城市，但仅过了100年，伦敦的人口就增加到了35万。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变迫使人们扩大了自己的自我意识，甚至在不同的情况下，在面对不同的人时承担不同的角色。农村生活具有显著的"同质性"，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是明确的，生活状态相对简单，不需要伪装出各种"公众面孔"，在所有场合都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如果一个人突然改变自己的性格，就会立即显得很突兀，别人甚至会担心这个人被"附身"了。

城市生活不仅需要人们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塑造出不同的外在形象，也会不断促使人们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在人群中，个体具有相对匿名性，使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同的一面。甚至一个人适当地改变一下装束、态度和言谈举止，就能掩盖自己的阶级背景和家族情况，即便只是掩盖一时。这在之前的时代是闻所未

闻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质疑别人表现出来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一面，这不足为奇。特里林告诉我们，在16世纪，城市居民极度热衷于伪装、掩饰和虚伪。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人物就很善于伪装自己，形成了错误的自我认知，以至于卷入了种种骗局，演绎了一幕幕滑稽的闹剧。

虽然我们往往非常推崇“真诚”这个概念，但如果人类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自己接触的多样化人群来调整自己的角色，就能推动人类意识的发展，拓展人类的同理心。虽然面具可以用来欺骗别人，掩盖真实的自我，但也能让人们尝试其他角色，体验他人的感受并接触不同的人群。如果人们仍然被等级制度或种姓制度所束缚，这些变化就无法实现。

在不同角色间自由转换的能力使人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困境，深化自己的同理心。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角色中，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感到应对自如，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主义”这一理念的内涵。这种行为方式有助于扩大我们的接触面，丰富我们的阅历，有利于促进我们与他人建立新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从而丰富我们的身份认同感，超越个人边界的制约，而不仅仅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行为。

自我意识与疏离感的产生

到16世纪，人们对个性的重视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看法的一个重大变化。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认同感，开始让位于基于个人终生成就的认同感。

欧洲各种语言中涌现的众多新词汇体现了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自我”一词刚刚出现时是一个代词，意为“自己的”、“相同的”。直到中世纪，大约公元1400年，它才变成了一个名词，但在早期用法中具有负面内涵。比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在《身份：文化变革与追求自我》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应否定我们的自我，跟随无所不能的上帝。”

在16世纪，“自我”变成了一个积极词，开始用于复合词中。“自我表扬”出现于1549年，不久之后，又出现了“自爱”、“自尊”和“自重”等词语。在17世纪早期，“自我”一词与很多单词联用，几乎每天都能在一些新语境中听到“自我”一词。“自我利益”“自我保护”“自制”“自信”“自悯”“自怜”和“自知”都成了流行的词语，广泛应用于普通的语境中。

1620年，英语中最先出现了对于“意识”一词的定义。“意识”这个名词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678年才出现。1690年，“自我”与“意识”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我意识”，成为用来描述近代人类心态的关键词语。

具有自我意识就意味着首先要具有疏离感。中世纪之后，人类重新燃起了对于追求自我意识和个人自治的兴趣，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化也反映了这一点。在中世纪早期及中世纪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到了中世纪晚期及之后，人们的自闭意识逐渐强化，群居生活也逐渐让位于个体的隐私生活，社会流动性大大弱化。在中世纪，“隐私”这个词语并不具备任何存在论方面的意义，即人类并不会将自身存在同隐私联系在一起。但到了18世纪，随着城市生活的再度兴起，“隐私”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城市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提出隐私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于隐私的追求表明人们已经具备了疏离感，即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人、与周围世界的区别。

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在催生隐私意识、形成具有自治意识的个体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封建领主和市民的家都是公共性非常显著的地方。无论何时，家里都住满了自己的亲戚和佣人，甚至还有朋友和熟人，有时一个家里住了数十人。当时的房间非常大，也没有被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寄居的亲戚和宾客们通常都是在一个房间里社交、吃饭和睡觉。

穷人的家往往是一个脏乱的小屋。20个甚至更多的家庭成员同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是很常见的情景，而且他们的房子几乎不会超过17平方米。三代人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的穷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享受过单独居住的时刻。在拿破仑时代之前，超过3/4的欧洲人居住在这类糟糕的环境中。

然而，到了18世纪，至少富裕群体形成了隐私的概念。房子被分割为不同的隐私空间，每个空间都有特定的功能，比如会客室、正式的餐

厅、私人卧室、储藏室和仆人居住区。在这种新型的家庭里，每个人都会占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财产，这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私人空间的分割让每个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权。隐私的概念迅速成为新自治个体的标志。自从人类出现伊始，大家庭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单元，而享有隐私空间就意味着能够排除他人的干扰，标志着人们开始重视个人生活，认为个人生活优先于大家庭关系。

空间的私有化催生了更多的隐私和自我反思。这些感觉在中世纪后期那种公共性较为显著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会形成的。即便穷人也获得了一点儿隐私。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超过半数的劳动者家庭拥有了三个或更多的房间。

人们对于自我意识和个人自治的强调，尤其体现在家具风格的变化上。大约在1490年，佛罗伦萨市诗特洛齐宫展出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坐在沿着墙根排列的木凳或有三条凳腿的凳子上，或是一起挤在一张铺在地板上的垫子上。在中世纪的宫殿里，唯一的椅子是皇帝的宝座，以此彰显他高高在上的地位。

当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如火如荼之际，椅子在法国变得尤为流行，反映出个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椅子代表着一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想法，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是自治的，是自我控制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指出："房子内部的家具和心灵世界的改变一起出现。"随着椅子在欧洲的广泛应用，近代的个体自治时代也随之到来。

随着人类生活从公共生活转变到私人生活，以及个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卧室内部的家具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中世纪，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睡觉的地方往往是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床板，而且是很多同性的人共用的。米开朗琪罗就曾经和他的三名工人同睡在一个床板上。

直到16世纪才出现固定的床。在17世纪，四柱大篷床在贵族和市民阶级当中是很普遍的。有些床上还有床帘，拉起来之后可以营造出一点儿隐私的空间。不过，男女在床帘后面温存时，他们的亲朋好友可能就在几米远的地方进行社交活动，这是常有的事。

渐渐地，关起门来独自睡在一张床上成了更为普遍的睡眠方式。在

中世纪晚期，仍然非常普遍的多人同睡的做法已经开始让人感觉羞愧了。公开的性行为在中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如今在家境较好的人家成为禁忌。性关系的隐私性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关上门温存。

亲属认同感的弱化以及自我认同感的加强，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16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仇杀行为几乎消失了，之后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消失。在一个围绕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则任何家族成员都有可能遭到受害者家族的惩罚，甚至杀害。近代法学与这种古老形式的正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它规定只针对犯罪者施予惩罚。罪者当罚，不可波及无辜的思想在一个基于自我认同感的社会行得通，在一个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则行不通。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理念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也许是婚姻和育儿理念的变化。历史上，婚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被父母和亲属预先安排好的。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这种婚姻。在16世纪，包办婚姻制度开始瓦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血缘关系的地位下降，而社会个体的地位上升。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神学家们也提出了新的婚姻理念，开始强调夫妻情感的作用，认为充满情感的夫妻关系是维持神圣婚姻的纽带。在英国，大主教克兰麦在一本出版于1549年的祈祷书中表示，婚姻制度应该确保婚姻关系如同一个互助协会，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夫妻二人都应相互帮助和安慰。”为此，新教长老们强调丈夫和妻子之间需要拥有情感。对婚姻关系的重视进一步削弱了亲属关系的作用。人们慢慢地形成了“核心家庭”的概念，这种小家庭以亲密的情感为基础，对之前那种包含亲属在内的大家庭关系构成了挑战，最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衰落，至少在城市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中情况如此。

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全新婚姻理念不是很快就形成并深入人心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比较缓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神学理论传递出来的复杂矛盾的信息。这些理论一方面鼓励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培养亲密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强调父权，认为与天主教堂相比，父亲应该对家庭关系享有更大的控制权。

情感是自愿的，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表达情感。情感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平等为前提，需要两人自愿和热情地建立关系。因此，一方面强调严格的父权制，强调父亲对家庭成员拥有严格的控制权以及妻子具有顺从丈夫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希望夫妻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情感，即便这两个方面存在兼顾的可能性，但难度也比较大。严格服从别人的命令会妨碍独立的、自愿的情感的形成，而这种情感对于自我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仍然希望女性是软弱的和顺从的。1537年发行的《马太圣经》在指导男主人处理夫妻关系时指出，“如果妻子不顺从、不协助丈夫，那丈夫就让她的头脑中产生对上帝的敬畏，这样她就会了解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方法肯定不利于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

然而，经过漫长的时间，爱和情感还是占据了上风，压倒了父权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经济和社会力量推动了这个过程。从一开始，那种基于亲属关系的婚姻主要由经济利益驱动。后来，随着核心家庭观念的形成，家族关系逐渐淡化。此外，劳动分工不断深化，这种趋势最初出现在手工艺者和商人群体中，后来又出现在了被解放的农奴群体中。英国都铎王朝在16世纪颁布的《圈地法案》将农奴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这些获得解放的农奴开始从事多样化的劳动。家族关系淡化，劳动分工深化，这两种力量合并在一起，极大地催生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他们迫切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新教所强调的父权制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在19世纪仍然十分强大，但早在16世纪末，随着劳动分工日趋显著、个人身份认同日趋个性化的城市人口的兴起，这种父权制就开始引起了激烈争论。

到1600年，人们再次开始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导致父权制家庭关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年轻的男性和女性被允许拒绝父母指定的一个潜在的婚姻伴侣，但皇室和贵族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包办婚姻仍然是无法动摇的规则。孩子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婚姻关系几乎没有发言权。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孩子们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情感因素，但如果他们选择的配偶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无法满足父母的愿望，那么父母仍然保留否决权。就这样，在决定是否建立婚姻关系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依旧如此），但未来伴侣之间的情感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至少在市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是这样。

1560～1640年，英国家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英国正在从一个“血统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关键社会领域的控制，这些领域包括司法、军事安全、财产关系管理和商业活动等。在传统上，人们的义务一直是针对家族以及对当地的郡和教区的，而此时却变成了对国家的忠诚。在新形势下，忠诚是由“个体”，而不是由以血缘为基础的整个家族来表现的。缓慢解体的亲属关系与核心家庭观念的形成适应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英国人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劳动市场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16～17世纪，随着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逐渐获得了一点儿个人权利，他们逐渐认为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自己也应该行使“自主裁量权”。

面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批评态度，开始回归到新教神学家们倡导的父权制。1634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在《父权制》一书中提出，王权和父权都根源于《十诫》，因为上面写着“尊敬你的父亲”。不幸的是，菲尔默先生似乎忘了上面还写着“尊敬你的母亲”。约翰·洛克却不赞成菲尔默的说法。他反对将一个国家的君主同一个家庭的父亲进行类比，认为这是一种一知半解的做法。在发表于1689年的《政府论》中洛克解释说，婚姻是在共同利益和财产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上帝授予了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控制权。洛克说，父亲只是暂时对孩子行使监护职责，其中包括养育孩子的职责，但这种职责在孩子成年时就终止了。洛克还提醒他的同胞们说，即使是国王，也不喜欢对他的臣民行使无限的权威。相反，只要君主的行为方式代表了人们的利益，成年人就会自愿服从统治，从而与之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

17～18世纪，“契约义务”这个新词逐渐渗透到了英国人的思维中。在家庭关系中，契约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爱、情感和财产关系。1705年，弗利特伍德主教指出了建立和判断家庭关系的前提。他指出：

> “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关系而言，无论是自然形成的关系，还是民事的和约定的关系，有关各方都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我提这一点只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即孩子对于父母的爱、孝敬、尊重和服从最初是建立在父母的关爱和照顾之上的。”

类似地，虽然人们仍然希望妻子顺从和服从自己的丈夫，但丈夫“也应该履行爱妻子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情感、忠诚和照顾。”

虽然我们难以量化适当的养育和情感究竟包括什么，但在17世纪的英国，法律的确开始改变了，授予妻子更多的财产控制权，这个信号虽然很小，但它标志着女性地位的变化。

18世纪晚期，在英国社会的中上层当中，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关系已经成了一条普遍准则，而不是少数的例外。据估计，当时“3/4的婚姻是以情感为基础的”。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体验到了这种婚姻带来的幸福。威尔克斯在1740年所著的《给一位年轻女子关乎教养与道德忠告的信札》一书中，思考了理想的婚姻关系：

> “有情感的婚姻是我们今生收获的最完美无缺的、如天堂印象般美好的婚姻，我们在地球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知心朋友自由地对话……双方在茫茫人海中选择对方，就是为了增添相互之间的慰藉和欢乐。有了另一方的参与后，双方的满足感定会提升一倍。”

关于婚姻理念的变化，从许多小事中也能看出来。丈夫和妻子不再把对方正式地称为“女士”或“先生”，而是直接叫对方的名字，甚至采用深情的称呼，如“亲爱的”和“宝贝儿”等，正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样。

当时社会对夫妻情感和友谊的强调，也促进了中上层社会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样一来，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才更有可能与丈夫成为真正的同伴。《女子月刊》甚至宣称，“当时很多女性比莎士比亚接受的教育还要好”。

新的婚姻准则改变了人际关系。把婚姻建立在情感和友谊的基础之上，为人类同理心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本质。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知冷知热的伴侣就等于成为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伴侣。如果没有同理心，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说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期望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

17世纪，人类在婚姻思维方面的变化，对育儿方式也产生了同样显

著的影响。

童年意识的形成

一些证据表明，在16世纪初，少数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城市居民的育儿方式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以托马斯·莫尔爵士为例。他笃信天主教，但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魔鬼力量控制的邪恶之人，而在中世纪早期，父母将孩子视为邪恶者是再正常不过的。即便到了500年后的今天，莫尔那种充满了同理心的观念仍然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在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莫尔告诉他们说：

> “我永远不忍心听到你们哭泣。比如，我经常亲吻你们，很少拿鞭子打你们，你们都是知道的。即便偶尔打你们，我的鞭子也仿佛孔雀的尾巴那样柔软。挥动的时候我总是犹豫不决，心里满怀歉意，用力很轻，这样不会伤害你们那柔软的屁股。如果孩子的哭泣无法引起父亲的伤感，那么这个父亲就是残忍的，不值得被称为父亲。”

遗憾的是，在16世纪上半叶，这种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芒的思想很少，而且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新教急于在家庭里实行父权制，并打破孩子们的自由意志，以确保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孩子们之所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对待，部分原因在于新教认为孩子们被恶魔力量所控制，但每个灵魂都是值得挽救的，所以家长有责任引导孩子成长。换句话说，严厉对待孩子并不是因为对孩子重视不足，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新教过于重视孩子，所以将拯救其灵魂提高到一个道德使命的高度，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通过这种做法消除孩子的邪恶本性，使其忠于新教，和上帝站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但也遭到了无情的体罚，哪怕违反了一丁点儿礼仪规范，或者表现不佳，都难逃一顿鞭打。劳伦斯·斯通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16～17世纪早期，被体罚的孩子更多，年龄跨度也更大。”

由于担心孩子们容易受魔鬼驱使，所以，即便最有爱心的父母也有可能野蛮地打孩子，因为他们相信鞭打虽然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但有助于他们的身体摆脱恶魔的力量。父母们将体罚视为拯救孩子的必由之

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摆脱魔鬼和地狱。这种父母行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父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父母们一般认为他们的孩子是纯洁的、无罪的和未堕落的。劳伦斯·斯通说，当时的父母之所以会做出这等残忍之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当时混乱的环境。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三十年战争导致清教徒和天主教徒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状态，以至于邻居之间时常也会因为宗教问题而爆发冲突，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这就使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很多神学家们相信，要恢复社会秩序，必须从“正确地训诫和教育孩子”开始。

斯通总结了清教徒父母同孩子相处时的复杂心理：

> “清教徒尤其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孩子，爱他们，珍惜他们，为他们祈祷，没完没了地给他们施加道德压力。同时，在家庭内部，他们担心甚至痛恨孩子，认为孩子是罪恶的象征，所以会无情地打孩子。”

17世纪60年代，当婚姻制度逐渐变化之际，育儿方式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约翰·洛克于1692年出版的《教育片论》一书提出了一种对待孩子的新态度，在改变当时育儿方式的过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洛克相信孩子出生时的心灵如同白板一样，意识都是空白的，只是通过社会经验的塑造，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因此，经验是观念的唯一来源。这就等于说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心灵。他一方面告诫父母不要过分顺从孩子，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或采取过于严重的惩罚措施。他呼吁父母更多地从心理角度切入，通过心理感化手段帮助孩子形成个体意愿和良心。洛克的书一出版，便立即风靡英国的资产阶级，不久之后，畅销欧洲大陆。

18世纪，儿童书籍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开始流行起来。与之前的儿童教育类书籍不同的是，这些新书并不是为了教训孩子，给孩子们灌输什么道德理念，而是为了教导父母如何逗孩子，如何照顾好孩子，这表明当时的父母希望能够让孩子快乐起来，让孩子在童年时代收获幸福的体验。儿童玩具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欧洲各个城镇。父母开始给孩子购买布娃娃、木偶屋、拼图玩具、骰子以及其他游戏用品，斯通指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以孩子为导向的家庭模式。

在17世纪的清教徒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影响下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矜持的状态，但随着育儿方式的改变，这种矜持关系逐渐变成更亲密、更深情的关系，更接近于今天孩子的体验。孩子们对父母的称呼也从“先生”和“女士”变成了“爸爸”和“妈妈”。

关于育儿方式的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或许就是抛弃了残忍的传统婴儿包裹方式。在17世纪，至少在婴儿出生后的前4个月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婴儿从颈部到脚部依然被紧紧地缠上了绷带，无法动弹，不得不在很长时间里保持同一个姿势。这种残酷的婴儿包裹方式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婴儿经常被视为一个小包裹，被父母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甚至挂在墙上的挂钩上，终日被折磨得没有一丝活力。

婴儿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浑身缠着绷带，而且父母很少拥抱或亲吻他们。婴儿在出生后至关重要的那几个月里没有得到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情感和关注。到18世纪，绷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曾经对这一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当时的哲学、文学等领域，以及在政府管理和市场活动中，个人自由主义精神都成为一种新风尚。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卢梭以哀叹的语调指出了下面的事实：

> “孩子几乎等于没有离开母亲的子宫，他还没有来得及动弹，没有伸展腿脚，就被剥夺了自由。他被包裹在绷带里，只得一动不动地躺着，头部被固定住了，双腿被伸开，胳膊被伸直固定住，浑身缠满各种各样的绷带和布条，这样他就不能活动了。”

到1785年，紧紧包裹住婴儿的做法在英国已经被淘汰了，半个世纪之后，在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也淘汰了。

对孩子的关爱还体现在母乳喂养上，很多女性对母乳喂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家境较为优越的女性中间，母乳喂养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任务，最好留给奶妈。婴儿出生后立即就被送给奶妈喂养，这些奶妈通常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婴儿经常被虐待和忽视，许多婴儿最后夭折了。然而，当时的年轻女性为了保持身材，满足丈夫的性欲，并维持不间断的社交生活，十分愿意将喂养孩子这个最基本的职责“外包”给奶妈，这对婴儿的身体健康产生了潜在的后果，也阻碍了孩子的心理发育过程。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年轻妈妈们越来越多地关爱和抚育自己的孩子，奶妈在英国逐渐没有了市场。在法国，奶妈曾经极度盛行于社会中上层，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晚期才结束。

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确保了那个时期的同理心能够传给孩子，孩子在母亲的爱与呵护中成长，逐渐形成对他人表达同理心的能力，正如当初父母对他们所做的那样。

新的育儿方式逐渐影响到了儿童教育领域。对于之前那种通过殴打逼迫孩子去学习的教育方式，英国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人士开始报以惊恐的眼神。到了1798年，母亲们受到的教导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培养与孩子的情感，第二个目标是培养孩子的信心，最有可能拓展孩子幼稚心灵的方法是赞美。"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校园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自尊运动"极为相似。

在曾经充满了恐怖氛围的英国教室里，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推崇情感在教育年轻人过程中的作用，惩罚性的教育手段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1769年，托马斯·谢里登呼吁精英学校废除体罚。他主张教育工作者们扔掉棍棒，不要痛打学生，而要用快乐去引导和引诱充满创意的年轻人进入科学的迷宫。对于这个建议，一个世纪前的教师和启蒙时代的新教师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鞭打学生的做法已几乎绝迹。

人际关系发生这些变化的时代背景，就是充满剧变的欧洲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由于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大量的非生物类新能源，而且印刷革命又提高了人类对这些新能源的管理能力，结果使经济与政治格局，以及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封建时代的长时间休眠后，世界缓缓地苏醒了。一个新世界即将应运而生，而且将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变革，所以，从一个人最深处的心理世界到高高在上的王权阶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新机遇。"伟大的存在巨链"曾经巍峨地支撑起了沉睡的黑暗时代，为每个有信仰的人创造了秩序和确定性，现在却被撕裂了，看上去很可笑。欧洲人在商业和城市生活中遭遇了新的现象，而对于这些新现象，基督教宇宙学无力解释，甚至不愿意接纳。

自由市场应运而生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近代早期，欧洲涌现了大量的新技术，提高了旅行的便捷度，推动了人们的相互交流，缩短了交易时间，从而使更大的市场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封建统治机构太小，也太狭隘，无力管理新的、潜在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将更大的市场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要努力采取措施来阻碍这个市场的形成。

中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了1 000多个城镇。这些城镇有粮仓、商店和旅馆，当地的工匠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许多大庄园都无法提供这些服务。石匠、织布工、染色工、金属加工工人和兵器制造者，以及后来的刺绣工人、手套制造工人、文件代书人、家具制造工人和帽子制造工人汇聚在这些处于雏形状态的城市地区，建立了“自由城市”——不受当地封建领主控制的地区。如果一个农奴逃离了封建领主的控制，来到一座城市，并在那里待上一年零一天，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自由的，从封建领主的管辖下逃到了城市市民的管辖下。

每个手工业都建立了一个行会来调节其成员的活动。行会负责维护行业质量标准，确定产品的制造量和销售量，决定产品与服务的公平价格。行会经济的驱动力是固有的习惯，而不是市场力量。行会的意义不是获得盈利，恰恰相反，而是维持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行会反对开放的市场、免费的劳动力、土地的商业化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而所有这些元素都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

在16世纪的英国，独立的商人阶级开始挑战行会对商品与服务的控制。英国与欧洲大陆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行会体系越来越站不住脚。圈地运动解放了大批农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以用来压榨的劳动力。英国交通设施不断进步，比如，铺设了更好的道路，内河航运条件不断改善等。这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在农村和城镇之间运输原材料和制成品。日益增加的人口也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商品。

面对各种新的市场力量，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纺织业的行会。一些商人开始绕过行会和城市管理者的控制，向分散在农村地区的、更廉价的小手工业者贷放或供应原材料，甚至工具，让他们加工制造，并给予一

定的酬金和工钱，然后收取成品转向市场销售。这种家庭工业制度被称为“散工制”。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的新突破带来了劳动分工，大幅降低了生产商品所需的成本和时间，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急剧上升的消费者需求。

通过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并控制城乡之间的物资运输，新兴的商人阶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劳动成本。由于那些农民原本就已经穷困潦倒，绝望无助，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羽翼渐丰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苛刻的雇用条件。无论是从生产速度、生产规模还是产品价格上看，传统的行会都无法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竞争。

欧洲出现的手工工场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手工业者及其行会的力量。16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手工业逐渐进入了工场模式。造纸工场、铁器工场、火炮工场以及后来的纺织工场，在同一个屋檐下利用同一种能源完成所有生产任务。最初的能源来源是水磨和风车，后来逐渐采用了以煤炭和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开办工场需要大量的资本——几千磅或更多，所以，即便那些最富有的手工艺者也远远无力承担这笔开支。只有那些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才有能力承担这种新型制造模式的成本。历史学家莫理斯·多布指出：

> “生产从属于资产，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这种新型关系的出现，被视为旧生产模式与新生产模式之间关键的分水岭。”

欧洲经历了一种新的商业秩序和一种旧的经济体制相互交锋所带来的阵痛。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时间与空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旧的社会经济模式赖以维系的前提是控制生产、操纵价格以及排斥外来竞争，这种模式过于狭隘。而新技术则会推动更多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与服务交易，因此，旧的社会经济模式不会欣然接纳新技术。新兴的资产阶级尽最大可能开发新技术的潜力。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上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然而，他们却缺少一个新的、更加广阔和灵活的政治架构，这种架构能够将其意志强加给成千上万个地方性的市政府，以强有力的方式取消多如牛毛的税赋、费用以及其他无数个法律法规。正是这些法律法规维持着日渐腐朽的中世纪经济模式。此外，新兴资产阶级还需要形成一

种共同的语言、一套统一的教育系统、一支统一的警察队伍以及其他集权机制。只有这样，资产阶级才能构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贸易市场。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指出，“正是这些需求导致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用以建立全国性市场、发展国内商业的工具。”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逐渐建立了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这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就是民族国家。历史证明，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间接影响，促使之前处于分散状态的人们逐渐习惯了全国性的市场。国家的边界拓展到哪里，民族主义情绪就能将国民的同理心拓展到哪里。

民族国家的出现

民族国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人类社会管理形式。一些学者将其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更进一步地将其追溯到12～13世纪的英国。当前，关于民族国家，人们的普遍看法认为其植根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风俗，这些因素经过漫长的演变，自然而然地催生了近代国家形式。这种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在现实中，民族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培育更加广阔的全国性贸易市场、获得海外殖民地而人为地建立的一个政治架构。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在东欧剧变之后，中欧和东欧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展了民族斗争，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扩大市场，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民族身份认同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和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是同时出现的，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民族国家创造并维持了一套能够确保商品在一个统一的、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高效流动的规章制度。全国市场的形成使商品交换的速度、范围、规模和密度都大为改观。

拥有自由和自主意识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建立了一个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保护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民族国家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能够为这些人提供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的手段就是建立了一个能够促进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让每个市场参与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每一位自治个体都会主张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一样，每一个自治的民族国家也会主张对自己的领土享有主权。此外，如同它的公民一样，民族国家要求在各国间作为一个

平等国家而自治，捍卫自己保护管辖范围内的财产的权利，并为了争议地区而同其他民族国家相角逐——通过贸易或战争。

对于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民族国家而言，一个艰巨的挑战就是如何消除在建立全国市场、发展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遭遇的国内阻力，并在完成社会的集体任务时得到其臣民——后来是公民——的情感支持。一个社会的集体任务包括税收以及通过征兵来保护国家利益。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形成的独立、自治、自私的个体在做事过程中总是思考着自己的利益，一心想让自己持有的财产实现最大化，这似乎与民族国家让集体形成共同的使命感与身份认同感的努力存在冲突。那么，民族国家如何才能说服数百万名新解放的个体为了国家而放弃他们的一些自主和自由呢？

答案就是谱写一篇有关共同历史的有说服力的故事，一定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满足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相信自己与其他国民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据说，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统一后，皮埃蒙特地区的前首相马西莫达阿泽利奥曾评论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如今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

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话，其中包含男女英雄、过去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时刻，这些都常常用繁缛的仪式进行纪念。在日益清醒的世俗世界里，民族国家不得不建立一幅强有力的新图景——一个民族共享着高贵的过去，并注定将走向伟大的未来。同时，民族国家也必须创造一片足以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前景，以求赢得它的臣民——后来是公民——的忠诚。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依赖接受基督作为救世主，那么至少可以通过财产积累和交换的形式，在对无限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中获得。为了回报人们奉献给国家的忠诚——其决定性的检验标准在于公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国家将遵守自己的约定，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和交换私有财产的权利。

创造共享的身份对不受阻碍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同样关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之前，1 000种不同的故事和传统，它们存活在遍布大陆的山谷里和山麓上小小的部落。每个故事的流传都是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是用一种特殊的方言。

对于开展商业活动来说，若要在广阔的地域里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这无数种的方言、习俗和规则将使交易成本变得十分高昂。

为了创造高效率、无缝隙的全国性市场，压制甚至消灭这些文化多样的小地区就成为关键的第一步。要创造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神话，就需要——常常是无情地——毁灭或征服欧洲历史多少世纪以来存在着的地方故事和传统。

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性程序的采用，它能够整合枝节蔓生的活动。西方的分裂传统仰仗的是武力。未来人类的文明统一，这种对抗或矛盾，将在共识和信仰、自由和理性、分工和协作、自治和联邦的格局中得到妥善的解决。此外，还有世界性语言的问题，这种语言的形成能够提供一个全球通用的交流媒介。首先，每个国家都必须确立单一的主导语言，以便人们彼此交流、理解共同的意思。人们常常认为，共享一种普通语言对于把人们带向民族国家的庇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情况通常却并非如此。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只有不到50%的人说法语，而且只有12%～13%的人能说正确的法语。当时，在法国北部和南部，几乎不可能找到会说法语的人。在意大利1861年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人口使用意大利语进行日常交流。在18世纪的德国，只有不到50万人使用后来演变成德语的方言进行阅读和口头交流，其中还有很多人是在舞台上表演新作品的演员或者精英知识分子。

创造民族语言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并非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是关系到早期印刷业面临的人口统计学。15～16世纪的出版商迫切地想要拓展书籍市场。尽管拉丁语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并且为欧洲学者和宫廷里的政府官员所用，但它对于这场新的通信革命来说只代表了太狭小的阅读市场。另外，整个欧洲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就商业可行性而言，都是太狭小的市场。多数国家的做法通常是选择在某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单一俗语，把它确立为印刷用的语言——首先用于《圣经》，然后是其他文学和科学著作。

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最终变成标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被发明的。它们通常是某个地区多种方言的要素相结合，并将语法标准化的结果。然而，某种普通语言一旦被接受，它就创造出自己永恒的神秘感。人们开始把它看作自己祖先的语言，以及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文化纽带。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读、能说这种新的本国语言，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单独的教育体系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都制定

了稳定且可靠的标准。标准化的国民教育乃是近代的崭新现象，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形成。每一代学生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语言学习同样的科目，不久之后人们便开始相信他们的确分享着某种共同的经验和命运。一位法国教育部部长在思考法国公共教育的成功经验时说，他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只要看看表，就可以说出法国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在做长除法，还是在读剧作家高乃依的著作，抑或在学习动词变位。

随着普通语言和普遍教育系统的建立，民族国家才开始干涉公民的事务。现代国家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完全理性化的环境，能够尽可能地完善市场经济中财产交换的自由运转，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公民进行记录。出生证明、学校注册表、结婚证、死亡证明还有护照，所有这些都要签发。公民要缴税，政府的收入也需要进行分配。职业军队需要进行训练、获得装备、编制，然后被送去战斗。标准必须建立起来，以管理从食品和药品质量到环境质量的一切事务，甚至文化本身的再生产也不再是依靠机缘巧合或是当地社区的突发奇想。博物馆必须建立，纪念馆必须拨给资金，历史纪念日必须被认可、庆祝，公园则留给人们休闲和娱乐。这张清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国际法中首次正式承认地域性国家拥有主权，是以1648年一项和平条约的签署为标志的，这项条约结束了路德信徒、加尔文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不可妥协的差异，并且赋予地域统治者以主权，允许它们在自己的领土内决定宗教事务，此后，干涉别国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将被限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核心要点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有所修改，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基本维持着原貌。

和约承认世界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对其固定疆界里的内部事务享有主权。此外，每个国家都和其他国家平等，它们之上再无更高权威。最后，每个国家都理应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尽管它们彼此之间能够自由地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但它们同样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解决争端。

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君主国统治者、新兴资本家及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曾一度彼此相一致。新的国家强权急于巩固它们的统治，因此需要创收。统治者要养活军队，建造船舶，制造武器，建立管理性的官僚机构来控制本国并殖民海外的新领土。因此，刺激国内经济活动就成了君主国的利益所在。

就商人和制造商而言，他们渴求改革，以加快向全国性市场的自由贸易过渡。他们试图消灭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和习俗限制，争取以国家的警察力量作为后盾对商业合同进行法律强制执行，并迫切要求改善道路、航道和通信，以加快速度，拓展贸易的地理范围。他们同样希望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能够将重量和长度单位标准化，创造单一的货币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使商业活动更加便利。国家同样十分乐于推动并动用全部强制力量来支持这些改革，因为为国内市场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

但是，新政权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最终还是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打下了一根不可调和的楔子。国家一心一意要聚敛贵金属金和银来为它们本土的支出和国外的冒险提供资金。它们推断，增加所持有货币量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视对外贸易甚于国内贸易，其策略就是大力控制国内生产，使它们能够保障以低价购入高质量的商品，然后在国外以高价售出，并得到贵金属。

在这种机制下，海外的殖民地只能生产运回母国的廉价原材料，然后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母国购买制成品。殖民地制造自己商品的任何尝试都是被禁止的，不论是为本土需要还是对外贸易，一旦违反，严惩不贷。

重视对外贸易对出口商来说是大为有利的，但却让本土的制造商付出了代价。虽然最初对外贸易的增长帮助拓展了制成品的国内市场，但是，像英国政府这样逐渐限制本土产品产量，以求人为地保持高昂的出口价格，这就对制造商相当不利了。

年轻的资产阶级钟爱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成员们相信这是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盈余和提高利润的最佳方式。农民、城市贫穷劳动者和上升的中产阶级都感觉到了国内产品价格过高的蜇痛。同样令他们负担沉重的是水涨船高的捐税，这是政府为了支付军队、武器和战争的费用而征收的。

到了18世纪晚期，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之间的决裂已成不可逆之势。1789年6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公然反抗路易十六，召开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大会，并要求制定法国宪法。数月之后，激进派发表了《人权宣言》，其中特别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在以笔为枪的一击之下，通过神圣权威统治、依照皇室血统传承的政府被赶下了宝座。从今而后，主权将归民族。谁构成了民族？是公民。谁又是公民？是那些分享着共同的生活体验，通过共同的过去和未来命运而紧密相连的人们。有史以来，公民、民族和国家首次联合成单一的统治实体。此后，政府将归民有、民治、民享。

法国大革命受到了美国的重要影响，后者已经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而战斗并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从事着一项激进的新型政治实验，此前几乎还没有先例。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写道：

> “之前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动员人们参与到政治的中心，也不曾需要男人更不用说女人成为具有政治意识和积极性的公民。因此，也就不会有人想提供这样一种组织基础和公共机构，它们投合的是公民的需要和趣味。”

在宣告君主垮台的一阵欣喜后，法国人决定给公民下一个更具限制性的定义：政治权利将仅限于拥有财产、接受过教育的男性。美国、英国和其他18～19世纪新生的民族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被假定为保护其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选举权只被赋予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产的男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转型始于英格兰、美国和法国，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迅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通过在一个广泛的地理区域内创建共同的叙事方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感，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心理上的重新定位，拓展了同理心的范围，使其突破了地方性亲属关系的制约，让之前众多分散的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同理心。每个人都逐渐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并开始接受自己与同胞们在情感上的共同点。英国人同情英国人，法国人同情法国人，美国人同情美国人。无论民族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最后都在无意之间拓展了人类的同理心情感。虽然爱国主义号召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也促使国界内部的公民产生了志趣相投的感觉，现在他们开始相信，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命运，从而拓展了自己的同理心。

近代早期的意识革命

相对于整个地质史的时间跨度而言，甚至相对于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而言，从中世纪结束到近代伊始的500年无异于弹指一挥间。然而，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不到25代人的时间内，人类意识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人类的一小部分，即少数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主要是向上移动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用完全现代的方式进行思考。人类精神状态从听话的仆人变成了具有独立和自治精神的个人：前者不加区分地服从于集体意志，被牢牢地禁锢在“伟大的存在巨链”之中，这条巨链从天堂之门延伸到地狱深处，人类被预先固定在了其中一环，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后者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进行互动，彼此建立了友爱的关系，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断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尽管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很少写到那些改变了人类意识的心理变化，而是更多地关注伟人事迹、武力征服、经济进步和政治重组，但幸运的是，文学叙事却一直小心翼翼地记载和保存着人类经历的另一面——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同理心表达范围的拓展。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自传体的撰写的一些微妙变化为我们探索自我意识的变化和人类意识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窗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人类自传体的第一次真正尝试，撰写的内容是自己的所感所想，这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他开创的这种文学体裁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兴趣。500～1400年，目前只发现了10部知名的自传作品。后来，在城市文明中，随着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和文化的普及，自传文学也首次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城市社会的陨落，这种环境催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和内省意识也开始陨落。后来，到了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世界观也阻碍了人类的自我表达，抑制了自传文学的发展，因为基督教的宇宙观基于僵化的“伟大的存在巨链”，将封建领主、神职人员、骑士、市民和农奴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人的角色和职责都是预先确定好的。仅有的几部自传描写的也是高尚的宗教人物，因为作为基督徒，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但这些人物都很僵化，是为了迎合上帝对于地球上信徒的理想要求而刻意打造出来的。

然而，到18世纪中期，自传体裁的作品出现了爆炸式的增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卡尔·温特劳布在《个人的价值：自传中的自我和环境》一书中列举了意大利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英国历史学家

爱德华·吉本、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德国诗人歌德等人的自传，从而描绘了人类自我意识和同理心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这一时期之后，便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人类逐渐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意大利学者维科在1728年出版的自传中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信念，即人性不是由上帝或宿命论决定的，恰恰相反，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现实世界，将自己学到的经验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在此基础上塑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我们必须记住这一观点，因为对于他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科的见解是人类进化理念的先兆。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贵族孔多塞以雄辩有力的方式一遍遍地重申了这一观点。

维科在其自传中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想法，即要理解过去，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伟大思想家的精神世界，想象着他们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与个人生活中的感受和思维。在这里，维科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同理心”一词（这个词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才被创造出来），但他无异于已经理解这个词的内涵，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对于历史岁月的想象中，我们都可以进入他人的生活环境，与他人进行思想上的互动与交流。在同理心的作用下，我们能够理解别人撰写的自传，因此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的代表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看待历史的视角与看待自己生活的视角一样，毕竟，在将个人生活与历史融合在一起进行考虑时，人类的集体历史正是由个人生活构成的。同维科一样，吉本对于宿命论的观点几乎也没有任何耐心，而是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一个更加私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个人特质、偶然情况和意外邂逅，同时，个人与不断变化的周围条件和社会环境进行互动。人们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集体历史感。我们创造了个人的故事和宏观的宇宙观，每个人都与他人在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进行互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内涵所在，对于吉本那个时代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

然而，在众多自传中，只有让–雅克·卢梭的自传算得上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自传。他才华横溢，不知疲倦，是一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思想家。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于1764～1770年间所写的

《忏悔录》与奥古斯丁所著的《忏悔录》是截然相反的。奥古斯丁的动机是向上帝忏悔，以获得救赎，而卢梭的动机完全是世俗的。他的目的是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希望别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从而能够爱他。关于自己与神的关系，卢梭始终坚定如一，不为外界所动。他相信自己的本性是好的，因为他一直忠于他“自然状态的自我”，他还不加掩饰地写道：“我相信，而且一直相信，从整体上来讲，我是最好的人。”

卢梭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出生之际都具有好的本性，但后来被文明引入歧途。有趣的是，卢梭在《忏悔录》中反复使用这个观点来为自己道德上的不当行为开脱，认为自己的本意一直忠于自己内心最深的自然本能。别人给他带来的任何不公，他都认为是由他所生活的腐败社会造成的。

卢梭在《忏悔录》中强调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人们至少能有一次机会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甚至自豪地说，他对自己的揭露程度比之前任何人都要大。卢梭一直相信，如果别人能知道他的善良本性，他们就会爱他。

一方面，卢梭本人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只有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对于自我的过分关注才能催生出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尽管卢梭可能会说自己忠于真实的自我，但他的自我意识似乎是无限强烈的。他曾经说：“我没有见过任何像我的人，我甚至敢说整个世界上都没有像我的人。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与众不同的。”他还写道：“我宁愿被全人类遗忘，也不愿被视为一个普通人。”在一封写给密友的信函中，他哀叹道：“上帝肯定出错了，为什么让我与这么多普通人为伍呢？”当代精神分析师们可能会把卢梭视为一个自恋狂，对自己形成了严重的错觉。

另一方面，在阅读卢梭的《忏悔录》时，人们也能体验到他那令人绝望的孤独感，他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形成深刻的依恋感。卢梭告诉他的读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别人接近并喜欢我。”

卢梭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可能与他母亲死于分娩有关。他的生命必须具备一些独特的元素，才能弥补这种失落感。他刚刚出生之际，母亲就去世了，导致母爱的缺失，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

与他人建立一种充满爱和情感的关系来弥补这种缺失。

卢梭是一个聪明的、困惑的、复杂的人物。由于他对自己揭露得非常深刻，所以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卢梭的内心情感，之前的那些自传都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读者不喜欢他的自命不凡和自我意识，但对于他所生活的那种腐败环境，读者仍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

在一段深刻揭露内心情感的段落中，卢梭回忆了他所经历的一个“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卢梭年轻时，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里逗留期间，被朋塔尔小姐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迷住了，便将其偷走，结果还没藏好就被人发现，他一口咬定是一位名叫玛丽永的女仆送给他的。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诬陷他人。

哪一个孩子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呢？后来，卢梭对这一事件做了轻描淡写的解释。他解释说自己的本意是好的，想将这条丝带作为礼物送给那个被他诬陷的姑娘。“在那个残酷的时刻，故意作恶偏离善良本意的距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远。”他不愿意忍受承认这个淘气行为带来的耻辱，所以，宁愿把责任转嫁给别人。读到这里时，我们肯定能够理解卢梭当时面临的情景，似乎我们就在现场一样。卢梭在《忏悔录》中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反思这件事情时，一再为自己的淘气行为开脱，以至于读者逐渐丧失了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提出了下面的辩解理由：

> “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

也许，在当代读者看来，卢梭的这件事情似乎是两次转移责任的经典案例，第一次是转嫁给那个无辜的女仆，第二次是成年后进行辩解时又转嫁给社会。

最终导致卢梭失去信誉，失去读者的同情和情感的是他对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的辩解。虽然他写的《爱弥儿》一书提出以富有同情心的方法来教育孩子，震惊了整个欧洲，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承认在年轻时曾经遗弃了自己的5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立即被送到了育婴堂。他为自己每一次的遗弃行为都找到了巧妙的借口。对于第一次遗弃孩子的行为，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辩解说：

> “谁最能帮育婴堂添丁，谁就最受人喝彩。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那么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这样做。”

后来，随着遗弃行为的增多，卢梭提升了辩解的高度，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把孩子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是因为这种做法符合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受到情感和自然本能驱动的人，但他无法理解，即便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父母也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如果说存在什么自然本能的话，那么第一个自然本能肯定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保护。然而，卢梭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想法令人不寒而栗。他宣称：

> “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

他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吗？他的读者被欺骗了吗？他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是在欺骗自己吗？通过这些自我辩解式的心理回放，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迫不及待地需要爱别人，也需要被别人爱，需要与人类建立友爱的关系。

卢梭的《忏悔录》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虽然卢梭人生的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同理心的要求，但他却在不停地寻求一种如海洋般浩渺的同理心感受。温特劳布对卢梭的总结听起来像是描写一个既理解同理心的重要性，却又无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表达同理心的人：

> “卢梭希望自己能够读懂其他人的心思。反过来，他想把自己的灵魂透明地展现给读者。一个人应该像展现脸庞一样将自己的内心展现给别人。他渴望与别人进行直接的、当面的、不受干扰的交流，想体验这个过程带来的喜悦。有时，他也会与自然交流。在这些时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完整的，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和谐的成员融入了更大的集体。他表达内心喜悦的方式只是简单的惊呼‘哦！哦！自然啊！’、‘哦，我的母亲！’”

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笛卡儿、牛顿等人大力倡导机械式宇宙学和理性主义思想，而到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卢梭等人则大

力倡导浪漫主义思想。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在人类文明刚刚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之际，只有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科学家歌德的自传《诗与真》最好地调和了这两类思想之间的矛盾。这部自传发表于1808年，之后一直更新到1831年。如果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同时体现出全球化的世界观和普遍化的同理心的人，那么歌德就是最佳人选。歌德的思想与当代处于认知心理学前沿的客体关系理论家、精神病学家和依恋理论家的思想非常相似。

200多年前的歌德在看待世界、自然和人类意识演变轨迹时所采取的视角与高度全球化的21世纪的人们采取的视角具有高度相似性，所以，如果将歌德称为“跨时代的人”，他应是当之无愧的。

歌德认为，一个人的独特性来自他与周围的关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但独特性不应等同于自主性，人们无法脱离周围环境而独立生存。相反，我们之所以具有独特性，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及社会建立了非常特殊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这些关系开始于我们同自然之间那种深刻的、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来自自然，最终也会回归自然。在生与死之间，我们不断地利用自然，然后再以其他方式将其释放出来。他写道：“我们受到了它（指大自然）的包围和拥抱，无法逃离它。”

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但彼此之间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对于这个事实，歌德感到十分惊讶。他说：“大自然创造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特性，而所有个体却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

笛卡儿、牛顿等启蒙思想家们的宇宙学模型描绘了一个纯粹的世界，认为固定的数学公式和严格的机械原理主导着世界的变化。而歌德则认为自然处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令他感到敬畏的不是大自然的固定性，而是其新奇性。他认为大自然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元素，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虽然生物体的生命受到物理学和生物学规则的制约，但生命不是预先注定的，我们不是机器，而是行使着多种层面的自由。在反思他所知道的大自然时，歌德产生了下面的想法：

> “它（指大自然）厌恶一成不变，对一切静止的事物下了诅咒。它创造了生物，但不告诉它们何时产生、何时离去。它让生物奔跑，但只有它知道跑道。”

歌德认为生命的目的是为了丰富生活，人类对生命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即意识。人类意识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使人类能够管理一切生命体。他认识到，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由于他深爱大自然，而且大自然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所以他并不是从评判性的视角去看待生命。他眼中的大自然不是沉沦的、堕落的，也不仅仅是供人类利用和剥削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呼吸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各种生物在互惠规则下共同生存。吸收自然能量，然后将其释放出去，是我们利用自然、与整个生物圈保持联系的途径。

要加深我们同整个生物圈的联系，需要的不仅仅是容忍和接受彼此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其他人对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对于他人的认知。我们要通过他人的眼睛了解自己。歌德认为：

> “如果我们的同胞能根据自己的视角把我们同世界进行比较，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从而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成年后，我就认真关注他人对我的看法，其他人就像镜子一样，通过他们，我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外在和内在。”

歌德认为，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应该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他人的生活环境，理解人类存在的具体方式，并带着喜悦感融入其中。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持续性的同理心过程去传递对他人的看法，从而也根据他人的认知了解自己，形成自我意识，也塑造他人的意识。在此过程中，通过内省吸收外界对于自己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也会让人们更好地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

因此，歌德丝毫不赞成人们“自我关注”，即一心只盯着自己，而不关注外界看法，这不会带来超验，只会导致倒退。他选择充分融入世界。歌德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认识世界并和世界对话，那么他就是一位诗人。”

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歌德总结了自己的生命，并道出了对生命的思考：

> “只有与他人相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只有敢于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的人才是幸福愉快的人。”

在歌德身上，我们看到人类同理心摆脱了宗教的神学色彩，开始以身体体验为基础，走向了世俗化。他的同理心作用对象不仅仅包括人类社会，还包括大自然。因此，他的同理心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同理心。

自传文学为我们观察人类意识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伊始这段时间内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其他形式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也能深刻地揭露出人类意识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催生了现代思维，促进了同理心的增长。

德国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尔正确地指出，叙事的历史是一个“内化过程”，“叙事对象逐渐转移到了地球上，人类将其融入自己的灵魂”。人类最早的叙事对象是宇宙和神灵，后来逐渐转移到了地球上切实发生的事件。

神话讲述的是部落的故事，充满了灵魂与神灵一类的素材。早期的史诗，如《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属于具有过渡性的故事，开始塑造一些具有神性的英雄，但这些英雄终归属于人类。它们以理想化的形式记录过去的重要事件，通常会包含一些与神学有关的说法。《圣经》里面的故事通常也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但同样糅合了神学主题。

叙事的人性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意识日益觉醒，逐渐摆脱了之前那种无差别的集体意识的迷雾。早期的史诗作品只是零星地提到了地球上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比如很多作品提到了一些战争的名字，《圣经》提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家谱，《伊利亚特》提到了人类战争中使用的战船。希腊悲剧引入了人类情感，成为观众发泄情感的途径，因为观众在逐渐展开的情节中对主人公的困境产生了同情感和同理心，并在最后的场景中与演员实现了情感共鸣。希腊悲剧是最早为人类集体表达同理心提供空间的文学形式。基督教时代那些文学作品传递出来的训诫信息旨在让人们皈依基督教，并加强那些已皈依者的信仰。

直到中世纪后期骑士文学的形成，我们才看到纯粹以个人娱乐为导向的叙事模式。此时，虽然那种在神学意识中非常普遍的道德说教性质的叙事模式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不得不与骑士的冒险和浪漫故事进行竞争。骑士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新欧洲逐渐抛

弃了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这类文学对于处在上升过程中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就像20世纪，当荒蛮的西部成为遥远的记忆时，牛仔的故事对美国人产生的吸引力一样。骑士文学与牛仔文学都反映了人类渴望挣脱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体验对自己的束缚，以理想化的笔触大胆地渲染过去的激情与豪迈。

卡勒尔指出，叙事方式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一事实比故事的主题更为重要。在特定故事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将另一个时代同自己所处的时代加以对比，了解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思想与行为，认识到人类体验的多样性和相对性，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拓展自己的视野。

骑士传奇文学为小说这一伟大的现代文学题材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的小说《堂吉诃德》。有趣的是，塞万提斯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是讥讽或模仿骑士的浪漫行为，但它产生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故事的主角、一位破落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堂吉诃德原名）对骑士文学十分痴迷，时常幻想自己是一位中世纪骑士，进而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查”（意为“德·拉–曼查地区的守护者”），行侠仗义，游走天下，拯救世界，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包括把风车视为怪物而与之搏斗，非常有趣和滑稽。但是，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读者慢慢地领会到堂吉诃德不只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他还具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产生一定的价值。

这部小说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来表达人文主义思想，使小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堂吉诃德》以及之后几个世纪里的小说之所以非常吸引人，就是因为故事人物是虚构的，而他们所处的环境、面临的状况以及生活的状态都极其真实，这些人物具有丰富的情感，能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影响，使读者感同身受地体验到故事人物的感受，似乎自己亲身经历了小说中的那些事件。

这些小说对英雄人物的描写集中在他们的行为上，对内心活动的描写则非常少，或是完全没有。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展现自我。虽然他们的行为和动作是英勇的，也体现了某种美德，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几乎读不到他们的内心感受。这些英雄人物都很简单纯粹、不复杂、没有什

么缺陷，形象和性格也十分明确。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无法从他人的行为中体察到细微的内心活动，因为他们即便对于自己也没有内省能力。

相比之下，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20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人物形象越来越真实，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样。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努力和挣扎。这个时期的小说重新引导读者关注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为我们介绍了故事人物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似乎我们就是故事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小说这种叙事方式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娱乐，在更大程度上第一次为人类探索普遍情感提供了一种工具。

在过去4个世纪中，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断深入发展，同时，这也是人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非常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描写则十分细致微妙。故事角色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真实和复杂，这反映出读者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小说使读者深刻地体验到故事人物的生活，这有利于增强自我意识。

小说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创造了更加复杂的、难以理解的和情感丰富的人物，读者能够对这些人物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也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因此，可以说小说打开了人类情感的闸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探索全新的、真实的情感世界，人类同理心的普及程度远远超出了之前几代人。

小说在转变人类意识方面的作用，直到近些年来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杜克大学的英语教授、作家南希·阿姆斯特朗等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小说“将个人主义概念转变成一种叙事方式，从而促进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形成和迅速传播”。

早期小说中的人物都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对他人表达情感，这些小说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在探索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困惑。那个时期，人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像伟大的探险家航行到世界各地探索新世界一样。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古典喜剧作家马里沃从1731年开始陆续发表《玛

丽安娜的生活》。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诸多篇幅深入细致地刻画主人公玛丽安娜对其生命中两个重要女性的心理活动，一个是多尔辛女士，另一位是德米兰女士。即便如此，玛丽安娜仍然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够深刻，觉得非常苦恼。她感到自己无法深入探索对这两位女士的真实想法，至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她哀叹道：

> “寥寥数语便可描绘出大概，但要描绘出细节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任务。当我说我将为您描绘一下这两位女士时，我的意思是为您展示一下她们的一些特征。我不知道如何完整地展现一个人，至少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了解这两位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我不会描绘她们，她们身上有一些我无法挑出来进行准确描绘的元素。如果我描绘她们的话，这种描绘往往是不充分的。有一些与内心感觉有关的事情总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们，你就会感到困惑不已。所以，虽然我能看出来，但就是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说起。”

《玛丽安娜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主人公第一次试图准确地描绘他人微妙的心理活动，却为自己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而感到苦恼失望。

玛丽安娜努力想弄明白自己的情感从何而来，以及如何用语言去捕捉和表达它们，并在社会话语中加以运用，这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忧。人类社会在从神学意识向思想意识和心理意识转变的过程中，人类思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随着神学意识的淡化，人类不再借助超脱世外的神灵来解释自己的存在。相反，人类开始借助自己的力量来解释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以及生命的意义。人类意识的世俗化伴随着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的兴起。因此，人类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意识同自己进行对话，利用集体意识与社会开展对话，并在这些对话中重新思考人性的内涵。

第9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意识

近代早期，众多的学派对人性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每个学派都拼命争取大众的关注和认可，希望自己的理论能成为新宇宙哲学的首要框架。人类由此进入了“思想意识”时代。霍布斯说人性是贪婪的，需要社会契约的制约。约翰·洛克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块白板，但人爱财，追逐财富，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成为有德行的人。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但却面临被社会腐化的危险。杰里米·边沁暗示人是功利主义的生物，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人们创建的社会架构是为了满足欲望，减少遗憾。托马斯·杰斐逊引入了一个新的理念——人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安全、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而建立了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生物这一理念。

所有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都想当然地把人看成基本参考点。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意识。

说到意识本身，人们不禁会想到人类不仅是情感动物，同时也是理性动物的这一事实。所以，当今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情感还是理性，哪一个才能更好地定义“人性”？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哪一个能更好地衡量人类的意识？思想意识时代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哪种心理活动是“灵魂”最真切的窗口，哪种心理活动不过是辅助角色，或者更糟，是一种干扰或障碍。

这一问题，启蒙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约翰·洛克认为肉体感知会传到大脑，由大脑将肉体感知转化成思想和理性的行为模式。换言之，人类的思维主宰感知。然而，休谟不赞成这种说法。他反驳说，人类的感知创造了思维。我们首先要感知周围的事情，然后才能把事情抽象化，归为不同的类别——喜、爱、恨、欲，再用这些类别阐释人类的思维活动。

现代早期的哲学家（除了少数例外）倾向于认为人性中理性的成分要多一些。但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更喜欢探究人类心灵和精神深处的情感，并为他们的故事搜寻大量素材。他们就像新兴资产阶级一样为自己的个性着迷，对人类情感的运作好奇不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情感表达兴趣渐浓是对严苛的禁欲主义（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抗议，也是对冷漠的理性主义（启蒙时期哲学）的反击。禁欲的加尔文主义改革家和理性的启蒙时期哲学家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两派都致力于发现宇宙中的真理——新教改革者在上帝的“选拔”和神的恩典中找到了真理；启蒙时期哲学家在支配宇宙运动的物理定律中找到了真理。两派对待情感与情绪也是一致抵制——宗教改革者视其为堕落的表现，启蒙哲学家视其为非理性的流露。

禁欲的卡尔文主义者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使命感。同样，启蒙时期哲学家致力于将理性组织原则落实于羽翼未丰的资本主义市场和日益细化的国家官僚机构中。两派对宇宙哲学的最新阐释，成为19世纪欧洲、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流思想。新时代的新“人类”，与上帝独处，在市场上，在新的城市化文化中独立。他们用理性武装自己，以便能在理性的物理定律支配的机械世界不会迷失方向。他们笃信会在来世得到永恒的救赎，或者至少能在此生找到世俗的乌托邦。

理智和情感

严苛的禁欲主义和朴素的理性主义，并非不受质疑。一场强大的反向运动在18世纪初露端倪，历史学家称之为“感伤主义时代”，随后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显露锋芒。反向运动以情感和情绪的释放为基础，对人性做了不同于以往的阐释。反向运动所体现的同情心孕育了近代初期的第二波同理心大潮，深化和推进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掀起的第一波同理心大潮。

人们对情感这一话题重新产生兴趣，可以从人们对“理智”的不同定义中看出。“理智”原指人们的洞察力和思考力。到了18世纪，“理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用来指代情感以及表达细腻情感的能力，近似于“感性”。

尽管老师告诉学生，欧洲和美国的18世纪是理性时代，但这种说法并不全对。18世纪远非如此。这一时期，理智和情感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展开了声势浩荡的拉锯战，争相成为世俗时代的最强音。作家路易斯·布雷沃尔德这样证明自己的观点：

> “我们不再认为18世纪是散文和理性的时代，我们很清楚18世纪也是一个感性的时代。这一时期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中流下的泪水比19世纪还要多。”

已故的英国律师和哲学家欧文·巴菲尔德认为，这一时期的人们过着“富有想象力的双重生活”。一方面陷入“道德和物质世界的秩序和理性”中无法解脱，一方面困在“自我世界的感性”中难以自拔。

理智的客观分析逻辑刚刚让人们对世界不抱幻想，社会学家科林·坎贝尔却当面灌输“经验复魅”的理念。作家埃莉诺·西克尔斯将感伤主义定义为“自发培养和表达情感的理论或实践”。

尽管情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感伤主义者们更多是将情感狭义地与温柔、体贴和同情等同起来。加尔文主义的禁欲者和骑士文学中的英雄们因沉着勇敢面对灾祸而受人赞赏，新兴资产阶级感伤主义者们却因其泪水说来就来，向世人尽情展示内心的脆弱而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和尊敬。法国剧作家路易·梅西耶戏谑地说：“要评判一个人的灵魂，就看他在舞台上演绎情感的程度。”

对于情感脆弱的赞颂美化变成一种全民潮流，形成文化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西克尔斯这样描述新感性人类的极致敏感：

> “一丝一毫的快乐或痛苦都搅动他的心绪，无论事情是否关乎自己。他会快乐地昏过去，也会心碎得要死。他会为对手的好运由衷地感到高兴，也会为地球另一端的一个悲伤故事或是一只宠物鼠的死亡而哭泣。如果他有诗人的潜质——他往往都有，他会写下爱情挽歌，写给他不了解的黑奴，甚至写给心碎而死的斑鸠和那丧失爱侣的夜莺。”

一个成年男性前一秒还泪流满面，下一秒就欢欣雀跃，这不免惹人嘲笑。但是在情感冲动的暗流下，人类灵魂深处正发生着难以置信的心理变化，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脆弱性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德高望重，这一事实成为历史上极不寻常的转折。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宣泄，无论表现在社会舆论还是当时的文学中，主要都源于对他人困境的关切。英国学者布莱恩·维克斯爵士这样形容感性：

“对正面情感体察入微的感知和自然流露。不是审慎的思维逻辑，而是一个敞开心扉的人的怜悯、同情、慈悲、坦率。”

当然，新的感性也有自己的情感包袱。当感伤运动成为时尚，很多人开始过度担心自己没有表现得足够感性，开始怀疑自己是情感缺失。情况严重的人还会装得极度敏感，担心被社会排斥。路易莎·斯图尔特夫人在读完亨利·麦肯齐的《性情中人》后吐露，她“暗自担心哭得不够悲痛，别人会说她太冷血”。坎贝尔指出，对一些人来说，情感宣泄本身就是快乐的来源，是一种自我沉醉的体验。

不过，想要夸大公众情感宣泄的重要性也很难。在社交场合将情感正当化，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心领神会，知道该如何举止得体并付诸实践。他们开始探索内心深处的感受，同时，对别人的事情也更能感同身受。结果就引发了一波影响深远的同理心大潮。

18世纪的最后25年，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宏伟的新叙事正在酝酿着——它将用思想意识取代神学意识，奠定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新的叙事用强有力的逻辑论证将理智和情感拼凑起来，不过两者间的战争将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直至今日，美国人还常常在理智和情感间画出经典的分界线。市场保守派指责进步派是“假惺惺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唇相讥，指责保守派是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者，只关注个人物质利益的积累，以追求功利为目的。

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写于18世纪90年代，但是直到1811年（感伤时代末期、浪漫主义初期）才出版。《理智与情感》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讲述了埃莉诺和玛丽安娜这对姐妹的情感历程。两人的性格代表了那一时代的两种主要思潮。姐姐埃莉诺是理智的缩影，妹妹玛丽安娜则是情感的典型。埃莉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她竭力压制自己的情感，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她为人可靠、循规蹈矩，非常通情达理。而妹妹玛丽安娜比较情绪化，率性而为，甚至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她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做事全凭热情和感觉。

虽然这部小说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它熟练地挖掘出伴随每个女人一生的性格优点和缺点。在故事的结局中，两姐妹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理性的埃莉诺历经多年的坎坷嫁给了她的真爱，而感性的玛丽安娜在一位一见并未钟情的理性男人身上找到了幸福。这个男人最终向她证

明自己会是一个好丈夫、好伴侣。她们最终都得到了幸福——埃莉诺正视自己内心的情感，跟随内心的感觉；玛丽安娜学会运用理智，不再情感用事。

奥斯汀的小说主要探讨如何在理智和情感、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渐成雏形的思想意识需要适应当时的主流思想，所以新兴事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找到这一平衡点。首先，理性的微积分对宇宙的形成原因做了许多数学和机械假设，为管理新兴的工业生活方式提供了知识基础。其次，情感上的慷慨援助，让越来越多迥然不同、个性十足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融合。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我们都能看到理智与情感的相互磨合，但磨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人们常常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似乎两者是一回事儿。然而，两者在一些关键层面截然不同。虽然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要求结束君主独裁，建立有限民主，并且都坚信平等原则——他们未必都坚信现实中人人平等，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注重市场上人人机会的均等以及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法国革命强调的则是友爱互助。美法两国的知识领袖大多是自然神论者和理性时代的拥护者，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并不一致。法国人更喜欢卢梭慷慨激昂、感性十足的文风。美国人则更喜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温和的理性主义思想，洛克坚信，渴望获得私有财产乃人之本性。

理性和感性持续交战，在英国和法国争夺大众的认可。而在美国，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火药味就没那么浓了，因为清教伦理观仍然起着强大的作用。最终，英国人代表理智，法国人则代表了感性。

但这并不是说法国人只会为情所动。相反，他们既过分夸大了理智，也过分夸大了情感，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法国人对理智和情感的矛盾心理可以从很多事情中看出来。不过，最鲜明的例子要数针对法国民众生活秩序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了。

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旨在剔除西方文明中的“宗教迷信”、残酷、无知，结束宗教压迫，推翻上个时代的国家统治。他们构想了未来的崭新蓝图，理智和自然情感作为最基本的美德，让他们的乌托邦愿景不再缥缈难寻。为了推进这个革命目标，新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社会、经

济和政治生活层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并试图通过转变法国人的整个时间观念将这些改革制度化。

1793年11月2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推行了激进的新历法系统。新历法系统反映了新革命政权的理念和原则。他们的政治动机很明显。他们意识到，只要基督教日历还是主要的历法参考，教会在大革命前的影响力就无法从法国文化中消除。

在某种程度上，实施新历法是为了去除基督教色彩，去除教会对法国民众时间观念的影响。新历法也旨在灌输新的时间意识——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将决定时间定序、持续时间、时序安排、协调以及新时期法国人对时间的看法。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这样总结新历法法令的革命意图：

> “废除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剥夺教会在社会调控和社交生活规范上的支配权。”

新历法用共和纪元取代了基督纪元。耶稣诞生日不再是古代与近代的分隔点，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时间成为共和元年。自此，1792年被历法创建者视为历史上的新纪元。

新一届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将新历法编制得尽可能理性、科学。他们重新设计了符合十进制系统的日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日历，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有30天。在每个月中，10天为一旬，分成上中下旬。每天有10个小时，每个小时有100分钟，每分钟有100秒。

一个星期的几天用纯数字重命名：第1天，第2天，第3天，以此类推。设计者注意到传统的名字都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用纯数字重命名后，设计者相信理性就会压倒宗教迷信。

日历代表了绝对极端的理性精神状态，让社会服从于精确的、客观的、超然的时间顺序，这样就有可能抹去人们所有的记忆和经验痕迹。然而，历法创建者同时也试着唤起人类经历中的天性和社会友爱，给新历法注入情感。所有旧基督日历中的圣徒日和宗教节日都被废除，换之以纪念自然现象的节日。新历法不再尊崇圣徒，转而纪念树、植物、动物或鲜花。连月份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顺应自然规律的琼浆、雾、霜、雪、雨、风、种子、花卉、草地、丰收、热和水果。

取消宗教节日，法国民众并不乐意。旧的基督教日历有52个星期天，90个休息日，还有38个节假日。新日历取消了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使法国民众除了无休止的工作，没有其他盼头。新历法创建者引入了有限的几个特殊休息日作为对法国民众的补偿，如人类日、自由平等日、友谊日、伴侣忠贞日、孝心日等。这些休息日的名称都反映出革命对人文的关注和认同。通过将休息日从180多天减到36天，法兰西共和国毫无疑问地激起了民众的敌意。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法只持续了13年。1806年，拿破仑恢复了格列高利历法（公历）。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安抚法国民众对新日历自始至终的抵制情绪，另一方面是为了拉拢教皇，和教皇重修旧好。新历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夭折。新历法的创建者企图抹去法国人生命中的所有传统基准，为反动、倒退以及必然的决裂搭建了理想的温床。

将理智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尝试失败了。革命遭到了理智和情感的无情嘲讽。人们是那么迫切地想达到完全的理性和超然，那么执着于卢梭自然纯真的愿景。然而，这一切难以调和，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革命孤立无援，在绝对的理性权威和慷慨激昂的情感释放间剧烈摇摆，最终从内部自我瓦解。

同理心的大潮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中兴于北欧文艺复兴晚期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时代，在18世纪的感性时代持续升温，将由来已久的惯例习俗抛掷一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同理心大潮起起伏伏、一波三折，却从未停滞或大逆转，重现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惨淡局面。在这几个关键世纪，人类意识的蜕变深刻地影响了对婚姻、育儿以及上帝和人性的概念。

到1776年美国殖民地开拓者发表《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欧洲格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封建生活，至少在西欧，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资产阶级的新男性和女性与他们中世纪的祖先几乎没有了相似之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对13世纪的地主和农奴的印象，以至于人们觉得他们完全是族谱上的两个分支。

中世纪后期熵危机

18世纪的最后25年见证了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成立，也见证了中世纪能源机制的消亡和新能源机制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技术革命使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陷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阵痛中。

回顾历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能源革命带来了自然能源的广泛使用——水磨和风车。印刷革命和新能源的开发导致了准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人口激增，城市化加深，个性化趋势和人们自我意识加强。现代的第一波同理心大潮伴随着新能源和通信革命而来。

正如罗马和早期的水利文明，新能源与通信革命使同理心意识迅速增强，同样迅速飙升的还有熵账单上的数字。18世纪晚期，熵账单要结算了。

中世纪，欧洲主要的能源是木材。茂密的森林覆盖整个欧洲西部和北部，提供了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源。然而到了14世纪，木材已日渐稀缺。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新的排水技术、十字犁、三区轮作以及用马匹犁地，大大地提高了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粮食过剩带来的人口增长，反过来促使农民过度利用现有的农田并垦林开荒。14世纪，欧洲面临的熵危机和罗马在2～4世纪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日益增多的人口所消耗的能源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更替补充的量。大面积砍伐森林和土壤流失造成了能源危机。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写道：

> “14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大部分地方已经人口饱和。约在900年兴起的声势浩大的边疆繁荣使庄园和农田遍布所有地方。至少在人群居住最密集的地方，很少有林地存在。我们知道，林地是至关重要的燃料来源和建筑材料来源，森林的短缺给人口密集的地区带来了严重问题。”

中世纪后期，木材的短缺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如同当今社会的化石能源危机一样。和石油一样，木材是万能的能源，有101种用途。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列举了当时木材的一些用途：

> “木工的工具大多都是木制的，除了末端的刀片：耙子、牛轭、二轮运货马车、四轮马车、浴室中的澡盆、木桶、扫把、欧洲一些地区的穷人穿的鞋子也是木制的。木材还为农民和纺织工人提供织布机和纺车、榨油机和葡萄榨汁机，甚至在印刷机诞生100年后，木版印刷还在使用。城市间运输水的管道是树干，气缸的泵也是树干

做的。工业上的主要机械同样也是木制的。”

芒福德总结了木材对中世纪人们生活难以超越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原材料、工具、机器、生活用具、能源。成品木材还是主要的工业资源”。

15世纪，砍伐树木主要是为了扩大耕地。16～17世纪，人们砍伐树木主要是为农村手工业，如玻璃厂和肥皂厂提供木灰。在英国，森林最大的威胁源于英国海军对木材日益增加的需求量。因为建造舰船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尽管国家多次试图规范滥伐森林的行为，但是都无济于事。到1630年，木材的价格已涨到15世纪晚期的2.5倍。

18世纪，由于滥伐森林，欧洲陷入了危机。城市和公司不得不为更少的热源支付更高的费用，以保持机器和工厂的正常运转、生意的正常进行和家庭日常热源供应。

光是玻璃加工工厂就可以使全部森林化为乌有。这里，我们看下关于同理心/熵难题最典型的例子。13世纪，玻璃制造工业随着镜子和光学镜片的生产开始起步。中世纪的欧洲在玻璃工业发展上一直领先。镜子的大规模生产关注的是自我映像。在没有广泛使用镜子时，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映像。“自我映像”这个词间接地指出了镜子的重要性，即反射面能反射映像。镜子大规模生产前，人们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模样，因此也就不太关心自己的个体性，把自己当作独特的可辨识的个体自省。中世纪后期，镜子的大规模生产对自我意识革命绝对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样地，光学镜片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使艺术家能够聚焦远处的物体，延长了他们的视线，打磨出不一样的艺术视角。光学镜片——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成为科学家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著名科学家探索自然的研究中，光学镜片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艾伦·麦克法兰和格里·马丁在他们所著的《玻璃：世界历史》一书中认为，玻璃的发明在推进理性科学的世界观起了关键作用，将西欧带入了近代工业时代。

尽管玻璃产品有助于自我意识的加深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拓展，并且创造了更为复杂的文明，但是熵账单却大得惊人。为了给玻璃制造工业提供燃料，欧洲西部和北部的所有森林被砍伐一空。

19世纪上半叶，对日渐短缺的森林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欧洲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木材制品用于建筑、供暖和原始工业制造。迅速增长的冶铁和皮革制造工业也需要大量的木炭用于锻造生铁、熏黑橡树树皮。葡萄酒酿造工业对木材的需求量也在增加，他们需要木桩来支撑葡萄藤，需要木桶储存酒。在普鲁士，政府和政府最尖刻的批评家——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也都认同森林资源使用权的冲突是当时最重大的政治辩题之一。传统的食物采集和狩猎对土地的使用与工业和城市发展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产生矛盾。农民和封建领主，共享一片森林的不同村落，以及农村人和城里人都因争夺森林资源而相互对立。

作家让·克洛德·德贝尔、让·保罗·德莱亚热和达尼埃尔·埃默里都认为：

> “原始工业化作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忙于‘挖空’森林资源；森林资源同后来的煤矿和石油一样，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不受限制地挥霍。而现在，人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木材危机在欧洲持续了800年，开始于11世纪变林地为耕地牧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树木被用来建造农用设备，搭建水磨和风车，为工厂窑炉供能，建造船舶，为日益发展的城市文明提供能源。欧洲大多数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消失了，留下光秃秃的空地。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散文家阿瑟·扬在目睹比利牛斯山发生的大规模森林滥伐后，写下了自己的绝望：“我震惊”于人们对森林的滥砍滥伐。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

罗马的熵账单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瓦解，也将欧洲带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木材危机带来的损失却被降到了最低。因为欧洲找到了代替木材的新能源——煤炭和蒸汽机，扭转了欧洲文明将要全崩的局面。这一新能源机制所存储和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以前的水磨和风车技术。

应该指出的是，向煤炭资源转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当时的人认为煤炭是一种劣质能源：开采、运输、储藏都不容易，使用

起来脏兮兮的，燃烧时又会带来污染。埃德蒙·豪斯遗憾地说："平民不得不使用煤粉或烟煤，即使是体面的名人，在屋里也得用。"尽管如此，到了1700年，煤炭开始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的首要能源资源。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也开始转烧煤炭了。

煤炭开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土壤表层的可用煤炭开采完之后，矿工们必须下矿井挖煤。在地下的水平面深度，排水成为挖煤最大的障碍。1698年，托马斯·萨弗里取得了蒸汽泵的专利，使矿工能将水抽到地表，这样就能把更深层的煤开采出来。

较之木材，煤炭质量更重、体积更大，更难运输。马车在未铺就的道路上很难拉得动，尤其在雨天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上，马车基本寸步难行。随着耕地越来越少，在宝贵的农田上放牧马匹要花很大一笔钱。用马车运输的费用也变得越来越昂贵。而有轨蒸汽火车的出现，适时地解决了这一运输难题。蒸汽火车是化石能源时代的第一辆能源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交流的节奏、频度和深度，也推进了新农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创造了自罗马灭亡后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城市生活方式，并引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产品生产和服务模式。

这一切的经济和商业发展促进了个性化的发展，加深了自我意识，并为19世纪同理心意识的拓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历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80年代。那时，基本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在英格兰有明显的起色。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正在酝酿中。要知道，直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一词才出现。部分原因是革命总让人觉得应该有一个顿悟的时刻，而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发觉。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煤炭视为工业革命的典型能源，把蒸汽机看作关键技术。现实却并不契合历史学家的这一定义。18世纪60年代，煤炭已经广泛作为热源造福于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到1776美国独立战争的曙光到来之际，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现代蒸汽机并注册了专利。即使煤炭和蒸汽动力早在18世纪最后25年就已经出现，大多数工厂还在用水力和风力发电。纺织工业率先转换成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工厂运营模式，由工人在机器上工作，1787年工业产出是1760年的10倍，但是工厂还是采用水力发电。

第一台煤炭驱动的蒸汽机应用于18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英国棉花产业。生产力获得显著提高。1787～1840年，英国棉花产能“从2 200万磅跃升至3.66亿磅”，而且生产成本也大幅度降低。

1830年之后，燃煤蒸汽技术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被广泛地推广运用。1830～1838年，比利时蒸汽机的使用量翻了一番。到1850年，这个国家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2 300台蒸汽机，功率达到66 000马力。1835年，蒸汽机被引入德国。

虽然燃煤蒸汽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实际上，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法国水力发电还是蒸汽发电的2.5倍以上。1845年法国钢铁工业的784家公司中，有672家仍采用水力发电。甚至在同时期的法国纺织业，利用水力发电的工厂还是比燃煤的蒸汽发电的工厂多。

接下来的20年，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开始转向蒸汽发电。蒸汽发电总功率提高了4.5倍，在短短20年间，从1850年的400万马力上升到1 850万马力。

国家丰富的煤炭资源对加快向完全整合的工业经济过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一开始就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英国国内可用的煤炭资源丰富。而同样具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德国和美国很快赶上。到1914年，这三个国家都成了当之无愧的工业强国。

在各大洲、各个国家，蒸汽火车得到了迅速推广和应用，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技术都更能抓住公众的眼球。人们为蒸汽火车的速度所着迷。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火车时速可以达到96千米，成为新能源时代的即时象征。各个国家争先恐后地筹集大量资金，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铺设路基，在工业国家中争夺一席之地。

蒸汽火车大大改变了物流和供应链，缩短了供应商和生产商，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交期，并降低了成本。德贝尔等人这样估算了一下：

> “1850年，100马力的蒸汽火车可以拉动14辆卡车，运输大约90吨货物，等于取代了18辆驿站马车，18名马车夫和144匹马。”

到1845年，每年有4 800万英国旅客乘坐火车。在19世纪50年代，

美国新修的铁路总长超过3.4万千米，建成一个完整的密西西比河东部铁路网。10年前，从纽约到芝加哥要花3个星期时间，到1857年仅仅3天就够了，这是人们从未想过的。

除了速度上的优势，蒸汽火车还有另外一个长处——能适应各种天气环境。运河运输会受夏季旱灾、冬季水面结冰、春季洪灾的影响，而蒸汽火车一年四季无论风霜雨雪都运行无阻。此外，运河驳船来回一次的时间，蒸汽火车可以跑几个来回。运费也明显降低了，蒸汽火车的运费仅为运河驳船的1/3。

19世纪，燃煤驱动的轮船也取代了帆船。轮船公司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运营，几乎和铁路运营处在同一时期。轮船的运营成本比帆船低了15%～20%。到1900年，蒸汽轮船载重量占全世界的75%。轮船廉价的运费使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到美洲定居。

19世纪完全可以被称作加速革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快了节奏。蒸汽火车闪电般的在乡间穿梭，将旅客和货物运送到大陆的另一边，人口也以破纪录的速度增长。新的生产力带来了新的繁荣。中产阶级过着一个世纪前只有国王才能享受的生活。生活上的富足反过来带来了人口出生率的激增。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到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有4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还有6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普鲁士和俄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其他欧洲国家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

1848年的革命震荡着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日益增长的人口填满了最后的蛮荒之地，并向边疆扩散。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希望找到可以自由呼吸和发挥才能的新大陆。铁路和蒸汽轮船将新大陆连在一起，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工厂以创纪录的速度大量生产制成品。19世纪上半叶，世界贸易几乎翻了一番。1848年革命之后的20年，世界贸易增长了260%。

新的燃煤蒸汽技术革命让大量的原始资源转化为成品，拉近了人们、社区和市场的距离。然而，技术革命需要引入通信革命来监督和管理工业生活。

1814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的蒸汽辊筒印刷机开始应用于《泰晤士报》的批量印刷。老式的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250份，而新印刷机则可

以印1 000份。未来70年出现了一系列的印刷技术创新，包括1846年引进轮转印刷机，1886年引进整行铸排机，不仅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生产速度，为大众提供更便宜的印刷出版物。

廉价的印刷品——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提高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读写能力。1830~1880年，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引进公立学校，在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全民教育。

国家资助的公立教育起初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很快就成为欧洲和北美的标准。1833~1847年法国的学校数量翻了一倍，学生入学率增长了两倍，达到360万人。学生升高中的比率从1842年的1/35上升到1864年的1/20。1840~1880年间，整个欧洲上小学的人数大幅度飙升。虽然人口的增长率为33%，学生的入学率却增长了145%。

在19世纪中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联邦，75%的成年人都受过教育。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意大利北部人们受教育的比率为40%~60%。在东部和南部国家，受教育的比率更低，仅有5%~10%的成年人能够读写。

在印刷品普及的时代，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监管和运营都离不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正如第1章中提到的那样，仅仅靠手抄本和口头文化是无法应对工业时代技术上和社会上错综复杂的事情。

学校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像工厂，这也绝非偶然。学生不是学会最基本的知识就行了。他们要适应学校的各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他们得做到不迟到早退，学习要注重效率，要能长时间在座位上集中精力学习。新的日常安排让学生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这就为以后到工厂和办公室等新环境工作打下了基础。学校也会让学生明白，学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人们在市场追求个人利益的筹码或资本。

人文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哲学和神学问题，教育的使命却完全不同。在近代的公共教育中，国家教育工作者的目标是为新兴的国家经济生产一批批的“有用的公民”。

新的通信和能源革命相互作用，建成了最复杂、最高效的社会架构，将地球的原始资源转化为历史上人类的有用之物。

随着工业化节奏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家政府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权，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继续保持同一步调。1790～1850年间，在更加理性化、整合化的社会，人们不再被视为有机的整体。功利主义思潮成为当时的工作准则。人与人的日渐疏离（法国人称为失范）在浪漫主义运动（伤感主义时代的继任者）中找到了新的声音。

浪漫主义时代

作为对启蒙时期过分强调理性的回应，浪漫主义运动成为深刻影响社会传统和制度的强大反作用力。从婚姻关系到子女教育，再到公平和管理观念，浪漫主义运动涉及方方面面。在1848年的革命，也称“人民之春”，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低谷。亚瑟·叔本华在1839年发表的论文《论道德的基础》中第一次提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同理心意识，同理心潮流达到高潮。

没有什么能比法国的模范市民“玛丽安娜”更能抓住浪漫主义时期的精髓，“玛丽安娜”是法国大革命最狂热时同情和同理心的象征。她的身体体现了革命者对“孕育新生活”的美好希望。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著作《肉体与石头》中描述了玛丽安娜在帮助法国民众发出自己的同理情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玛丽安娜的原型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子。1792年，法国革命主义艺术家克莱芒将其塑造成女神形象。她饱满笔挺的乳头和全裸的胸部，充满肉欲，却没有性诱惑。克莱芒将这幅作品题为“共和体制的法国，向所有法国人敞开胸怀”。

玛丽安娜的开放大胆，表达了“平等关爱众人”的理念。桑内特提醒我们，直到18世纪30年代，法国的女性雇用奶妈照顾小孩。随着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尤其是女性对照顾小孩重新燃起了兴趣，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渐渐不时兴雇用奶妈了。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玛丽安娜是对当时家庭主妇的嘲讽，有点儿像世俗版的圣母玛利亚。因为中世纪时期的圣母玛利亚和玛丽安娜起到的作用没什么不同。玛利亚和卢梭文学作品《爱弥儿》中的索菲就更像了。索菲的胸部寓意着人类天性中的善良和母性。用桑内特的话说，玛丽安娜是和索菲一

样，“不受束缚地爱孩子……却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在公共假日，玛丽安娜的雕像成了公众聚会点。公共美德的新仪式在她的见证下举行。她体现了博爱的、有同情心的革命秩序。在她的雕像前，人们感受到母性和友爱。玛丽安娜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触摸和被触摸”的渴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桑内特指出，玛丽安娜“是悲悯世人，慰藉苦难民众的象征。”对失去神学信仰的新兴都市人和细化的法国民众，玛丽安娜成了象征友爱的桥梁，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创建了一个以同理心为根基的新共同体。

此外，玛丽安娜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感觉——开放的、流动的、自在移动的、与人身自由相关的潮流。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决心打破所有对人类身心自由的束缚。无论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封闭的公共空间都能得到解放。玛丽安娜一直被放置在大的露天场地中央。所有信众都可以在露天场地呼吸自由的气息，享受没有束缚的自由和亲如一家的和睦。她当之无愧是自由和解放的代名词。

革命的空想主义最终也没能将象征亲密的玛丽安娜和象征自由的玛丽安娜调和在一起。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对玛丽安娜的形象定位很是犹豫，就像对女性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也含糊其辞一样。男性希望女性变得有母性、无私，甚至是亲密的伴侣。可是，他们不愿意帮助女性获得自由和解放。

桑内特记录过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大革命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人们对玛丽安娜的狂热冷却下来，而希腊勇士赫拉克勒斯成了人们的新偶像。玛丽安娜的形象也被人们改造了。她的嗓音柔和了许多，不再有之前的高亢洪亮，神情温顺，身形也单薄柔弱。玛丽安娜的遭遇反映出当时法国女性的命运。她们曾是革命初期的领导者，但是男性激进分子一直担心女性的权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地排挤和打压女性。

“玛丽安娜时刻”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场。浪漫主义将挑战理性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念。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浪漫主义时代的总趋势是“同理心的世俗化”。这句话一语道出了浪漫主义时代（1789~1848年）的精髓。像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运动既是对极其单调乏味的权威的反击，也是对人类精神的再次肯定。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6世纪末期的人文主义时代，曾试图通过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唤

醒人们的激情和情感，让人回归到感性、朴实的生活。要知道，教会推崇禁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到来世寻求解脱，人们的精神情感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浪漫主义和文艺复兴有着相似的目标。唯一不同的是，浪漫主义坚持启蒙时期哲学所推崇的唯物主义观，旨在达到冷静客观和超然理性的状态。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机械的，人性是贪婪的，进步只是物质上的进步。相比之下，浪漫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有机的，人是重情感的社会人，进步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解放人类的想象力，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培养人的群居意识。尽管浪漫主义运动已经蔓延到中欧和美国，运动的中心还是在不列颠群岛、法国和德国。当时的知识领袖有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弗里德里希·谢林、约翰·赫尔德、塞缪尔·柯尔律治、威廉·华兹华斯、埃德加·爱伦·坡、亚瑟·叔本华、纳撒尼尔·霍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威廉·布莱克。

浪漫主义既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哲学。它在自然界，而不是在数学中找到了灵感，而且避开了启蒙哲学家所描述的上帝——上帝上好宇宙的发条，拨动指针，然后站在远处不再过问。浪漫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和自然世界的感知拴在一起，甚至觉得自己是泛神论者。许多人相信自然中万事万物都散发着圣洁之光。

浪漫主义者的宇宙观认为，大自然的创造者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上帝之灵。和哲学家巴吕赫·斯宾诺莎一样，浪漫主义者将上帝和自然视为一体。小约翰·兰德尔解释说，对浪漫主义者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随着自然的发展而成长，是认识上帝并感到自己是上帝之灵的一部分的途径”。

因此，浪漫主义者欣喜于人性深深植根于自然，并用极大的热情拥抱自然，而新教的禁欲主义者和启蒙时期哲学家却选择了否定和批判自然。新教的神学家认为，自然是从天堂堕落的，是低等的。启蒙哲学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自然当成有用的资源。而浪漫主义者认为自然是善意的，而且是所有创造力的基础。浪漫主义者不是提升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而是提升自然的地位，赋予它超自然的特征。

浪漫主义者相信自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超越自己的一种新生的创造力。卢梭提倡，遵循自然的规律，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

力，借着自然无与伦比的力量不断进步。

像新教改革者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或在市场上追求自我利益时常胜不败。浪漫主义者对个人主义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拥有创造的潜力，真正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自我。

如果基督徒的自我超越离不开信仰，启蒙时期哲学家离不开理性，那么浪漫主义者就离不开想象。在历史上，人类的想象第一次成了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标志着人类在意识上的转变。想象力让每个人去挖掘大自然的创造力，让人类和自然成为世界的共同创造者，共同分享圣洁之光。

新浪漫主义的人我概念是无畏。自然存在于人的思想里，就像人的思想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解放人类的想象力，每个人会重新认识自己的天性，以及在自然格局中的位置。

而对基督徒来说，成为世界的共同创造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上帝卑微的仆人。启蒙哲学则关注物质进步，服从预想的机械宇宙真理。

那么，怎样才能解放人类的想象力呢？浪漫主义之父卢梭认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腐朽的文明阻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可能性，遏制了自然倾向和各种可能性的发展。想要解放人类的想象力，就要重塑文明，使其符合人类的真实本性。法国大革命曾尝试这样做，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一问题，正如卢梭自己的生活和《忏悔录》中痛苦揭露的那样——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特质和潜力，可以很容易就走上极端自私自利的道路，也可以达到忘我的自我超越。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人类选择如何使用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想象力。当时的人们谈论新现象时总爱说“创造性天才”。纵观历史，虽然有很多创造性天才，但以前的人相信是灵感“垂青于人”，而非源于人。如果相信创造性天才是从人类的内心泉涌出来，那么社会就要把个体看成具有神一样的特质、与众不同、令人敬畏。既然创造性天才那么独特，他们就不应受制于普通人之间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和约定。对“天

才”的崇拜成为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小专题。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类潜能运动的前卫的外圈人在论及“宝瓶同谋”时重提这一话题，之后在千禧年讨论“文化创意者”时又一次兴起。

然而，浪漫主义的主流思想家对解放人类的想象力有不同的见解。他们相信人性本善、重情感、喜社交，但是如何能回归人类原始的状态却是一个问题。通过设身处地为他人想办法，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并给予帮助和安慰，每个人就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加清楚在自然的不断进化过程中人类作为共同的创造者的作用。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这样说过：

>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必须有强烈而周全的想象力，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要能感同身受。伟大的德行离不开想象力，诗歌的作用就是发挥想象力的最大作用。”

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对他人产生认同感，是浪漫主义对同理心的阐释。一个人如果无法想象他人的感受，他就无法产生同理心，也难以实现浪漫主义者对世俗的超越。约翰·拉斯金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人们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那么他们就会像爱自己那样爱别人。”通过强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浪漫主义运动在同理心意识的历史演化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诗人在推进同理心精神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他们用诗歌做武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的同理心得以释放。他们的诗歌写出了自然之美，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他们的诗歌也讲述了生命的脆弱、生存的艰难、成长中的挣扎、分享的快乐。他们的诗歌在历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当时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和作曲家，比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欧仁·德拉克鲁瓦、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弗雷德里克·肖邦——用他们的艺术和音乐来传达情感。

然而，浪漫主义运动却存在一个明显的内在矛盾。浪漫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都市现象。它吸引着曾被冷落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以及资产阶级中的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浪漫主义运动想把卢梭的原始自然观理想化，把自然变成美德的代名词。浪漫主义作家最

喜爱的主角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的作品中描写早期农村社会的民间习俗都带有一种怀旧色彩，甚至天真纯朴的卡尔·马克思也被浪漫主义的激情冲昏了头脑，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甚至封建生活的美好时光归为需要重新找回的某种感知。和当时的人一样，马克思对理想化的过去的定位反映了一种日渐加深的疏离感。当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在高速工业化的社会阵痛中挣扎，将生命用于攫取自私自利的物质财富时，过去的理想化生活就变得遥不可及了。《共产党宣言》有一段话这样评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理由：

>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激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不合理的唯一的自由——自由贸易代替了无数不可剥夺的自由特权。”

高度城市化、精于世故的公众竟然会认同早期的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浪漫主义运动的严肃性。复古也显示出人们对同理心的演化过程缺乏客观的理解。自我意识缺失、毫无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示了原始同理心的困境，却无法表达浪漫主义者推崇的那种成熟的同理心情感。原因很简单，感同身受这种能力不存在于原始社会，而存在于更为复杂的都市环境。浪漫主义者身处这样的都市环境却对此持批评与否决的态度。

如果不谈缺点，浪漫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复杂反宇宙观念，这与勒内·笛卡儿和艾萨克·牛顿提倡的数学和机械宇宙观不同。笛卡儿在数学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性，牛顿在万有引力定律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规律，而浪漫主义者在所有生物的内在关联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浪漫主义者的观念预料到了20世纪生态学的科学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写道：

> “花呀，你长在墙缝里，我把你摘出了墙缝，在这儿连根带叶地拿在手中，小小的花呀要是我能够弄懂，你根茎枝叶和你的全部含义，就懂得了上帝和人。”

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者一样，浪漫主义者也相信社会在进步。但这种进步和财富的积累无关，而与自然智慧的积累密不可分。

兰德尔很好地概括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人之本性以及人类在历史

长河中的作用。他写道，

> “浪漫主义者相信活着就要成长，就要吸收与同化，就要在人生的画布上抛洒人类生来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这样我们才能日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无限关联，而这些关联证明了宇宙中存在最强大、最神圣的力量——总而言之，活着就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精力用于创造一个更高、更好、更富足的世界，在宇宙中完成神赋予众生的使命。”

法国大革命时期宣扬友爱团结，把人类看成宇宙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持好人际关系。而浪漫主义者超越团结友爱的观念，把人类和自然万物置于更大、更多元化的群体，完全依赖人和自然间的关系。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置身于各种关系，并从中受益。所以，团结友爱不仅仅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而应扩大到自然中的万事万物。这种观点远比法国革命者举起自由、友爱、平等的大旗时激进得多。法国革命者的团结止步于拥有财富的男性世界的外墙。

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重新定位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弥合与自然的裂痕。当神学家通过上帝的恩典，在来世得到救赎时，当启蒙时期哲学家用理智在现世建立理性的唯物主义乌托邦，达到自我救赎时，如柯尔律治的浪漫主义者通过普及同理心意识“和大自然和解，冰释前嫌”，实现自我救赎。

浪漫主义者认为进步有时带点儿寻求永生的疯狂。尽管大自然的进步是一个持续努力没有尽头的演化过程，但当人们读过浪漫主义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后，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欲说还休的渴望，渴望着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这种想要不朽的心愿却与浪漫主义者的观念相抵触。浪漫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终有一死，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潜能。要知道，自我实现让人想到的是终结和圆满。

对永生的渴望也与浪漫主义对人性弱点的强调背道而驰。同理心从侧面认可了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倍加珍贵。所有的生命都是脆弱的，要忍受很多苦难，都渴望出人头地。同理心有点儿终归一死的味道，圆满结束此生，拥抱另一种人生。对死亡的接纳让人们在看到别人为生存而努力挣扎时，内心充满同情。正如我们在前面第5章提到

的，同情心并不存在于乌托邦世界，因为那里没有痛苦和死亡。

在某种程度上，浪漫主义者把大自然过于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了。他们削弱了人与自然在演化过程中更深层次上的本质联系。我们在天地间的存在不过一瞬，每一个小支流的意识都汇集到大自然的宏观意识中。我们的贡献让自然的路程多了一道风景，却并不能让自己青史留名。

玛莎·努斯鲍姆发现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的浪漫叙事表达了一种很古怪的想法。《草叶集》发表于1855年，残酷但诚实地评价了人类对感官享受的恐惧心理，特别是人类对性欲的态度。惠特曼认为欲望和渴求体现了人类彻底的脆弱性，也体现了一个人必死的命运。充满渴望是因为人们知道生命不过是白驹过隙。性体验是一种屈从、一种放手、一种失控、一种把自己交付给别人的体验。没有什么比性爱更真实，更朴实粗俗。这是两个生命的礼赞，将人类赤裸裸的脆弱性表露无遗。

虽然惠特曼的诗急切地呼吁人们接受终将死去的命运，无所畏惧地去爱，过好每一天。但是，他对终归一死和畏惧死亡的矛盾态度还是深入了诗歌的字里行间。努斯鲍姆洞察出惠特曼的矛盾心理，她写道：

>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惠特曼的成就大打折扣，因为他不断地强调自然万物间的神秘统一，万物生生不息，因此得以永生。”

和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惠特曼似乎相信，当你把生命融入大自然的浪潮时，就能在生命终结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朽。他写道：

> “我知道我是不死的，我知道我不会像一个孩子在夜间点燃一根火柴棍所画出的花体字那样转瞬消失。”

努斯鲍姆表示：“教导别人死亡不完全是一种损失，也算不上终结，而是否定诗中一直推崇的性爱和失落感。”

叔本华的代表作

如果浪漫主义运动也有顿悟的时刻，也有捕捉到时代最强音的那一

时刻，那么亚瑟·叔本华发表的一篇论述道德的文章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1837年，丹麦皇家科学院赞助了一个征文比赛，获奖作品要能完美回答如下问题，即“道德的基础可否由所谓的良心这一理念及对由此产生的其他基本道德概念的分析直接得到，还是存在于完全不一样的知识背景下？”叔本华的这篇文章就是参赛作品。

1839年，叔本华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他是唯一的入选者，但却没有获奖。丹麦皇家科学院认为叔本华没有理解比赛题目。不过，这只是托词，科学院后来解释说，真正的原因是叔本华竟敢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并且提出道德的基础是同情而非纯理性，情感让人类本能的同情心更加强烈。这种理论简直是纯粹的异端思想。在最后但能说明问题的评语中，审稿人对叔本华恶言攻击“当时的几位杰出哲学家”的行为大为不满。尽管丹麦皇家科学院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们暗指的就是伊曼努尔·康德。叔本华猛烈抨击康德，将他的纯理性基础和规范性道德贬低为文人的幻想，并和道德行为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形式严重脱节。和休谟的观念一样，叔本华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回顾一下第5章中提到的康德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要按照大家都能接受的行为准则去行动，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目的。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初看上去，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世俗版的黄金律，与同理心紧密相连。实际上，绝对命令和早期的宗教哲学格言都有相同的道德硬伤。它们都认为人类情感不足以成为道德的基础。人们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服从，二是出于理性的责任，三是对他人困境发自内心的同情，共同的人性让他们不自主地想去安慰他人。

康德认为道德准则是原本就存在的，独立于所有身体内部和外部的体验，因此是可知的，但叔本华发现康德的观点纯粹依赖推理，而没有任何实证基础。他指出，康德反对道德和意识以及“人类特有的”自然情感紧密相连，尽管这一观念让道德有了实证基础。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 “道德法则不存在于人性（主体）中，也不存于世界环境（客体）中……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借用和人类有关的知识（即人类学）……事实上我们不能凭空从个别的人性组成中获得道德原则的真相。”

叔本华认为，人类的道德存于先验的人类经验中，是“完全抽象、完全脆弱的，像完全飘浮在空中一样。”

所以，如果道德不存在于人性中，反而存在于一种先验，和人类的本性无关，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有道德呢？康德说，人们做事遵循道德是因为“遵守道德法则是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于责任感，而不是自发自愿。”康德明确地把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想法排除在外。

> “同情怜悯在那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看来非常讨厌，因为这会动摇他们深思熟虑的格言，让他们有情感冲动的欲望，而不能只遵从立法理性。”

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没有说服力。仅仅因为觉得有责任捍卫先验的道德准则，人类是不会本能地去做无私的、有道德的事的。除非做某些事会得到奖励或免去惩罚，不然人类不会去做。在深入研究康德的绝对命令后，叔本华总结道，这一切听起来像神学伦理没有神的存在一样荒谬。要知道，亚伯拉罕诸教都是基于上帝的十诫。上帝定下的先验道德准则，并没有考虑人类的本性。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人们就要遵守。

叔本华认为，伴随着神学意识的道德准则的是纯粹的规定。如果像亚伯拉罕诸教所暗示的那样，人性是“堕落的”，那么人就没有做善事的道德基础。因此，上帝的十诫是一种规定性的指示，告诉人们若要得到神的恩典，不想激怒上帝而受罚，就要按照十诫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如果人类的生物本能并没有为善的倾向，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康德所暗示的那样，觉得自己有责任遵从先验的既有道德准则，尤其是当这样做没有奖励，不这样做也不会受罚的时候。

叔本华真正想说是，康德尝试借用“信仰时代”的规范来为“理性时代”进行道德辩护。叔本华最后总结道，康德未能说明为什么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理性可以作为道德伦理的基础。

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身是否有其他因素可作为道德的基础。人类行为品质中是否有些使人向善，让我们免于陷入著名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找不到人性深处的这种品质，那么拯救道德的唯一方法就是折回到早期的神学意识，认为道德永远是规范性

的、描述性的。

在解构康德的绝对命令之后，叔本华详尽地描述了道德行为。他认为道德行为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需要社会的激发和孕育才能完全体现其品质。他认为，“同情”是人性的核心。如下是他对这种现象的描述：

> “在同情别人时，我与他同时受苦，我感觉他的悲哀就像我自己的那样切肤地痛；同样的，我渴望他能幸福，就像我自己真切地渴望幸福……每时每刻，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在受苦，不是我们；让我们悲痛和哀伤的是，我们难过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他。我们陪他受苦，为他难过；我们明白到他的痛苦只能他自己承受，不再想象他的痛苦是我们的痛苦。”

在这段陈述里，叔本华成为历史上清楚地定义同理心过程的第一人。定义的唯一不足是术语本身。但他更进一步，不仅描述了同理心拓展时心理的微妙变化，也记述了由此产生的自然行为——换言之，即道德成分。当看到他人眼前的困难，同情心便泛滥开来，引起不顾可能的后果，直接参与，主要是分担他人的痛苦，从而避免或消除它，因为所有人的满意、健康和幸福都基于此。

叔本华对同情的描述比当时定义的范围更广。他实际描述的是同理心的过程，同情心在其中是一种行为成分。叔本华认为同情是所有道德的基础，虽然他承认自己不能解释其心理根源。他把同情心称为“伟大的道德之谜”。在20世纪心理意识诞生前，生理和心理基础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

对叔本华来说，虽然人的同理心能力的起源是一个谜，但目的论是再清楚不过的。通过感受他人的困境，对有困难的人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获得成功，我们认识到冥冥之中有条线将自己、他人和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叔本华写道：

> “最后，人们呼吁的不是公平正义，而是温柔、仁慈、慈爱、宽容。这种呼吁让大家形成一个认识，提醒我们是一体的。”

浪漫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文学和艺术上的运动。它的理念

影响深远。1790～1848年，社会行动主义在各个方面展开。新的激进主义远远超出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活动范畴，延伸到新兴的公民社会的社交，包括社会应酬。

到了1848年，浪漫主义已经在欧洲达到顶峰，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穷人解决问题，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互助会应运而生。合作化运动拉开帷幕，提供了一种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商业模式。抗议虐待动物的第一个社会组织也形成了。

浪漫关系

浪漫主义运动对浪漫爱情的影响最为持久。在17世纪，基于爱情的试婚观念流行起来，其影响越来越大，拓展到浪漫的爱情领域。伴侣选择出现了激进的新趋势，基于新题材的浪漫小说得到了广泛普及。这些爱情小说极大地改变了年轻人对爱情的预期。婚姻，长久以来是一种经济事业，前两个世纪成为伙伴事业，转而成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情感企业”。

男女进入“亲密”关系的理念是革命性的。在人际关系的最初阶段，民主精神开始发挥作用。要知道，恋爱是一种自愿选择，需要双方你情我愿，一方没法勉强另一方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两性平等。公平地说，性别平等的观念始于恋爱的发明。恋爱中的两性平等为19世纪下半叶女性要求平等的参政权打下了基础。

吉登斯指出，浪漫的爱情在本质上就是“女性化的爱”。尽管女性没有最基本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她们却可以凭借高度发达的教养能力，高男性一等。1839年，有一篇文章指出：

> “丈夫影响妻子的性格和行为，妻子影响丈夫的爱好，男人用法律治理天下，女人用劝说支配男人。女人的帝国是柔情帝国，她用爱抚来指挥，用眼泪做武器。”

女人教会男人如何去爱和表达亲密。吉登斯注意到了男女关系的转变。传统上，男人用武力征服女人。在恋爱模式中——爱情小说中不乏类似的情节——征服的角色刚好调换过来。久经沙场和感觉迟钝的男人

被女人的教养和柔情所吸引。女人感受到男人长埋于心底的温柔和体贴，用信任和爱情融化和俘获男人的心。

吉登斯指出，“爱情小说和现实生活中一样，得到对方的心，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吐露心声的过程。女主人公驯服、融化和改变爱人那看似桀骜不驯的男子气概，让彼此的爱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主线。”

浪漫的爱情是同理心意识巨大的训练场。女性和男性都很在意对方的内心、本性和灵魂。他们不断地问彼此，你觉得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同时，他们也不断问自己，我觉得对方怎么样，她觉得我怎么样？通过不断从自己和对方身上找答案，他们在情感上慢慢合拍，可以感受对方的处境，就像自己身临其境——“心灵伴侣”代表的爱情精髓就是，能和对方抱头痛哭，能相携相扶，也能为对方的胜利欢呼雀跃，为对方的成功额手称庆。

浪漫小说的影响在于将爱情故事引入个人生活。一位作家于1773年在英国的《女性杂志》上打趣说，“在这个国家，没有如饥似渴地读过大量爱情小说的年轻小姐，可真是屈指可数。”个人生活也日益成为一个围绕爱和亲密关系的“小说”故事，而不再单纯地履行宗教义务或家庭责任。爱和亲密的伴侣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核心。直至今日，亦是如此。

浪漫主义时期后的一代代人用爱情关系的牢固程度以及和爱人的亲密关系来评判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可能是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馈赠。

童年的理想化

浪漫主义对爱情关系的影响也推动了育儿方式的转变。玛丽·瑞恩指出，20世纪，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已越过了“从严父到慈母”的模式。

1808年，法国中部内陆城市利摩日的一位退休的自然史老师回忆了他那一代经历过的那种充满暴力的童年，并对比了现在孩子完全不同的童年。他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恐惧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准则，教他念书的人会一把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揪起来，然后一手拿书，一手拿棍。孩子有丝毫差错，棍棒就会如雨点般落下。”

对比自己年少时可怕的阴影，如今孩子的童年真的是太幸福了。

> “孩子每天都兴高采烈的，有不间断地拥抱，从来不知道恶意为何物。他们裹着干净的被单，可以自由伸展四肢，他们被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美丽的小身体成长得很快。他们只要心情好、身体健康，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对孩子的关心照顾反映在婴儿卫生学文献的激增以及父母对孩子健康快乐的热切关注上。一时间，医生的诊所挤满了心急如焚的父母，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孩子的轻微感冒有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

在浪漫主义时期，卢梭的思想对育儿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针对父母育儿方式的“自助”书籍《爱弥儿》出版于1762年，但在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初期更加受欢迎。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浪漫主义者，是因为卢梭注重培养孩子的天性。洛克认为，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像一张白纸一样纯洁质朴。卢梭则不以为然，觉得孩子本性向善，父母有责任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卢梭认为孩子应当好好享受童年，童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孩子需要尊重和浇灌，才能让天性得以发展。卢梭提醒父母要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才符合孩子的自然状态。

卢梭认为育儿建议太古板，太急于让孩子变成“小大人”。他宣称，童年“是理性的蛰伏”。他敦促父母不要和孩子讲大道理，让他们享受纯粹的快乐的童年。他认为：

> “要喜欢童年。那时有无尽的嬉戏耍闹，欢声笑语，乐天的本能。谁不曾遗憾童年没有笑声，谁不曾后悔那时心里充满忐忑惶恐？童年稍纵即逝，已经错失童年的人为什么忍心剥夺那份纯真快乐的珍贵礼物？为什么当童年飞逝而过，不为任何人止步时，心中填满了酸涩？”

卢梭的劝告很激进，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他的想法是，孩子天性本善，品行端正。如果让其顺着自然天性发展，他们会成为有道德的人。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不受新教欢迎。因为新教认为孩子的本性是邪恶的，需要将天性中的邪恶驱逐出来。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也相信孩子需要摈弃自然的情感——快乐和热情的情绪——让他们尽快断奶，成长为理性、有责任感的人。

浪漫主义者将童年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初为父母的人相信在孩子中没有大人的影子，但在大人中常常可以看到孩子的影子。威廉·华兹华斯在他非常有名的诗中写道："儿童是成人之父；愿自然虔诚的意念，将我生涯的每个日子连串起来，自幼至老，深信不疑。"

他的童年礼赞影响了一代人去重新思考他们对孩子和童年的看法。一些人开始把孩子理想化，认为孩子更接近自然，更率性而为。他们甚至希望自己和孩子共同的喜好能影响他们，让他们找回久违的童真。华兹华斯曾经犀利地阐释了对孩子的新态度："并非前缘淡忘无余，并非赤条条身无寸缕，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

婴儿一度被视为邪恶的魔鬼，而现在婴儿却成了自然美德之源，成为父母学习的对象，甚至一些天主教神学家也被打动了。

在成人看待童年的问题上，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父母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有谁没听过"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吗？

有一段时间，浪漫主义者对童年的看法，甚至影响了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式。孩子本性都很善良，不分男女。这一观点对消除角色差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父母认为他们有责任按照老一套的方法培养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式要区分开来。浪漫主义者认为性别差异远没有孩子共有的美德重要——他们本性善良。因此，浪漫主义者注重保护孩子的天性，采取同样的教育方式。例如，19世纪20～40年代，育儿书籍强调"男孩女孩都应该避免生气。"19世纪30年代，提倡父母给男孩和女孩统一着装，都穿齐膝长裙、白色长裤，留短发，试图模糊性别差异——这种做法一直到"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才重新流行，那时的时髦女郎穿长裤，并将头发剪到贴着头皮。

华兹华斯在写到孩子时，总结了在浪漫主义时代，人类关于童年本质和人类本性的看法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改变，认为人类终于找到了真理。他说："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真理就在你心头栖止，为寻求真理，我们辛劳了一世。"

浪漫主义运动对童年的反思为20世纪的客体关系理论和依恋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费尔贝恩、科胡特、萨蒂、温尼

科特、鲍尔比、爱因斯沃斯等。浪漫主义者把童年塑造成一个特殊的时期，父母表达对子女的慈爱，儿童本能的依恋情感得到释放。这就为整整一代人养成同理心意识，并贯彻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人性本善，只是被文明腐蚀才误入歧途，那么改革社会就能让社会公民重新找回内心深处的童真和善良的本性，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很快，确保儿童享受到童年的权利成为首要任务。

孩子们被迫进入可怕的工场与作坊，在新一代的工场老板手下像奴隶一般工作，工作环境差、时间长、生产指标高。看到这一切，慈善家们感到出奇地愤怒。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童年，失去了天生的美德和纯真。他们的情感被消磨掉，无精打采得像一副空壳，感受不到童年的嬉闹玩乐和无忧无虑。

同理心与社会改革

柯尔律治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开始努力争取童工改革。19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了第一部童工法。法律规定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工作，年纪大一些的童工也要将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8个小时，直到年满14岁。很快，法国也进行了童工法改革。

1842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歌《孩子们的哭声》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 羔羊在牧场咩咩呼应，
> 雏鸟在窝巢啁啾和鸣，
> 幼鹿追逐自己的身影，
> 花儿被风吹倒向西方：
> 但是，我的兄弟，那稚嫩的孩童，
> 却在痛哭流涕！
> 这自由的国度，
> 同龄人在玩耍，他们却在悲恸！

社会改革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工厂大门。浪漫主义时期见证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和欧洲、美国废奴运动的开始。1787年5月，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尽管不同的宗教派别——卫理会、贵格会、浸信会——是废奴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但是，很多民众都被卷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斗争之中，发声支援。浪漫主义艺术家用画笔描绘出奴隶制的残酷景象，影响了很多民众。当时的艺术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被活活绞死的黑人》让英国民众惊骇不已。

1807年，英国议会颁布《奴隶贸易法案》，在大英帝国境内将贩奴定为非法。1834年，在整个大英帝国，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贸易与浪漫主义的愿景背道而驰，因为后者强调性善论，提倡同胞之爱和一生常怀悲悯之心。

英国还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即互助会，致力于减轻穷人的负担。教会长久以来也一直在做救济穷人的事情，只是人们往往觉察不到。当政府管理各种救济穷人的项目时，互助会展开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受基督教博爱、友好团结观念的启发，互助会秉承同情怜悯的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会员。1815年，已经有超过92.5万人加入它的行列。互助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互帮互助的“共济”组织。

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变革是关于残暴行为的问题。奇怪的是，残暴行为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公共讨论或在制定公共政策中受到关注。生活中的残暴行为太过常见，人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在18世纪下半叶，公开的严刑逼供很常见。“罪犯”被鞭子抽、烙铁烙、被五马分尸、被绑在火刑柱上在邻里面前活活烧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类事件经常是在喜庆的场合以示庆祝。公众将怒火发泄在被认为魔鬼附体的罪人身上。18世纪60～90年代，反对这些野蛮的古老行径的潮流在中产阶级中兴起。中产阶级认为犯罪行为是人性弱点的体现，而不是魔鬼附体的迹象。

公众渐渐相信人的身体是脆弱的，都不愿遭受折磨和痛苦，内心都向善。对人类情感的新的重视以及观念的转变激发了人们对改革和社会复原的兴趣，因而反对传统的司法酷刑惩戒。这种新观念很激进极端。公众开始把罪犯看成他们中间的一员，有着同样的人性弱点。只因命运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他们才走上了歧途。

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同情罪犯的处境，哪怕只有些许的怜悯。1754年，普鲁士废除重法酷刑；1772年，瑞典废除了酷刑；1789年，新革命政权下的法国也紧跟着效仿。有趣的是，一直很积极争取个人权利的英国直到1790年才禁止将妇女钉到火刑柱上烧死的酷刑。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拉什医生抓住了那个时代日益高涨的公众情绪。在对罪犯的评论中，他说到，罪犯和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灵魂和身体，和我们的朋友、亲人没什么不同。”

浪漫主义运动废除公共酷刑，禁止虐待儿童，取缔奴隶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社会改革远不止如此。其他形式的残酷行为很快成为社会取缔的对象。

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780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第一个提出以怜悯之心对待动物的问题。边沁表示，“问题不是‘它们能思考吗？’，也不是‘它们会说话吗？’，而是‘它们也能感到疼痛吗？’”边沁把家养动物的处境类比为奴隶的生活，他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生物都将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暴政将它们无情地夺去。”

边沁的话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早期空想家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24年，英国成立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之后，其他反对虐待动物的组织也开始在英国大地上出现。这些组织开始教导公众关注和同情野生动物及家养动物，并为建立反虐待的动物保护法律而四处游说。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其他组织开办了第一批动物医院和动物收容所，用来照顾被遗弃和走失的动物。1842年，“素食者”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1847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素食者协会。类似的组织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和北美。

很难夸大同情动物的观念在当时有多么离经叛道。除了阿西西的圣方济教会在中世纪时代表达过这种见解外，还从没有过人类以其他动物的名义发动过一场运动。许多早期的动物保护倡导者为反奴隶制、早期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童工改革而四处奔走。在美国，许多人都是素食主义者，都敢于为保护动物仗义执言，比如反对奴隶制度的倡导者霍勒斯·格里利、杰出的女权倡导者露西·斯通、苏珊·安东尼、阿米莉亚·布鲁默，以及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这些人是同理心普及过程中的先驱者。到了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同理心运动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开始感受到工业新秩序带

来的痛苦，他们对别人以及其他生物的痛苦挣扎更加敏感。我们必须记住，在动物保护组织出现以前，虐待和折磨动物是很常见的。猫常被浇上汽油放火烧，狗、公鸡和其他动物被人们拉到竞技场上打斗致死，马也遭受过野蛮地鞭打。

《迪克·马丁法案》是以一名英国议员的名字命名的。这名议员提出了第一条反虐待动物条例，于1822年获得议会通过，并在1833年和1835年进行修订。这一条例禁止饿死或鞭打牛，禁止给狗、牛、熊和公鸡下药或让动物斗架，而且限定了屠宰场的场地大小。1829年和1836年，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分别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浪漫主义运动对公众意识的巨大影响，在动物保护运动中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历史上可能再不会有这样的时期，同理心情感在人类的心灵上产生了跨越性的飞跃，在改变私人生活、社会习俗和公共政策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

在同理心意识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中，使浪漫主义时期独树一帜的是这一时期对“人的情感”（卢梭以及后来的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所提出的）的极大关注。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的核心是真实的自我和纯洁的本性，尽管会受社会的腐蚀。莱昂内尔·特里林提出真实并不会和真诚相混淆。真诚忠实于社会中的自我。真实则更进一步——用特里林的话说，真实是与社会不断妥协的“原始”力量。对卢梭和浪漫主义者来说，维持一个人最核心的真实，需要的不仅是承受个人的苦难，而且要持续关注和同情他人的苦难和境遇。只有保持疏离才可能融入这个世界。20世纪中期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将人的情感定义为这样一方天地，

> “每个人在这方天地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他人。寻常之物属于每个人，也属于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能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情感的本质是普遍性，欣赏它，就要行动起来，摆脱个人的特殊性来顺应普遍性，成为普遍性。最后，不像任何人，但又的的确确是每个人的化身。”

浪漫主义者认为情感的敌人是占有欲。20世纪高产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专门写了《占有还是生存》一书来阐释这一主题。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财富包围，财富成了我们的标签，我们和真实的自己失去了联系，任凭真实的自己渐渐消失。

工业化的强大冲击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让他们感到一种疏离感。卡尔·马克思揭示了这种疏离感的本质。他写道：“经济学家从你的生活方式和人性中拿走的一切东西，都会以金钱和财富的方式来补偿。”

浪漫主义者行进在发现人性根源的旅途上。他们将人类的情感和人性紧密联系起来，并将情感定义为联系所有生命的凝聚力。他们寻找到的其实是同理心。正如前面提到的，浪漫主义者错在相信同理心和文明越少联系，越能保留那种冲动。卢梭明确声称，“凡是出自自然之手的都是好的、善的，凡是出自人类之手的都是堕落的、腐化的。”浪漫主义者未能把握同理心意识成长的辩证过程。同理心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虽然人类生来都有体验同理心痛苦的倾向，但人类存在的核心层面只会在不断对抗文明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发展成真正的同理心意识。人类根本不需要克制同理心，相反正是文明演化的动力为同理心的发展和人类的自我超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然状态下未分化的人类集体主义很可能朝着同理心发展，但是也很可能不按照浪漫主义者所构想的普及化方式表现出来。浪漫主义者过于接近自己的时代，以至于没法退后一步反思：他们正在批判的社会也为同理心的完美呈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48年革命：人民的春天

1848年的春天，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横扫了欧洲各国的首都，浪漫主义时期就此达到了巅峰。1848年年初，法国贵族和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警告他在下议院的政治同僚“我们睡在火山上”。几周后，火山在巴黎爆发，革命狂热的火焰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1848年革命在短短几周内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被称为“人民的春天”。连续数年粮食歉收，欧洲大陆经济全面衰退，银行恐慌，引发了人民暴动。但革命的爆发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追溯到11世纪的原始工业期，欧洲的能源机制向水能、风能过渡。刚刚起飞的煤炭、电力和蒸汽技术革命催生出工业时代，而1848年正处于新旧时代的过渡期。旧的政治制度和过时的商业贸易思想无法跟上新技术创新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新崛起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强硬对手——新的无产阶级，都让旧体制、旧思想无法招架。

当日益加重的经济困境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时，革命也吸引了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1848年革命被称为“人民的春天”是因为浪漫主义情感的热情流露，希冀着在人性本善和在社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848年春，日益加重的经济矛盾和压抑良久的对灵魂重生的渴望汇集到一起，两股力量引发了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治轰动。

政治轰动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快。震中在巴黎。2月24日，暴动者占领了首都，宣布共和国成立。同一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3月，革命扩散到巴伐利亚、柏林、维也纳、匈牙利和米兰。春末，欧洲大部分的政府都已沦陷。

18个月之后，除法国以外，所有被推翻的政府都重新掌权。但即使是在法国，大部分的旧政权也恢复了以前的影响力。这是欧洲历史上唯一一次横跨整个大洲的革命。虽然它在短期内失败了，但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对话和议程，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将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改造得更适应工业生活方式。

浪漫主义运动是人类意识发展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1848年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发生的一切，强烈表达了浪漫主义运动的诉求。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年轻的革命者为之战斗的浪漫主义愿景就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大街上。然而，支撑这一愿景的情感却被收集了起来，留存在集体记忆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1968年，婴儿潮一代的年轻革命者来到巴黎、华盛顿特区、柏林和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发出他们的呼声，回应120年前那些同伴的诉求。

第10章 后现代存在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

从多方面来看，1848年革命都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在廉价印刷技术和蒸汽机的推动下，迅速覆盖了整个欧洲，并开始拓展到北美洲。随着水、电和煤炭这些非人力资源的发展，思想意识也不断发展成熟。现在，理智和情感的界限变得日益清晰。文艺复兴时期、情感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都见证了人类同理心意识的迅速发展，这改变了人们对人性和人类进步之意义的看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思想意识继续曲折前进之际，另一场能源/通信革命的种子已经撒下——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对人类意识和同理心演进的影响和前期同样巨大。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的第11年，萨缪尔·摩尔斯获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新专利，他将自己的发明命名为“电报”。不久之后，人们在电报的帮助下，瞬间就可以给千里之外的人发送信息，公众对此惊叹不已。

1859年，即欧洲革命爆发后的第11年，一位名为埃德温·德雷克的退休列车员利用一个临时钻井机器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附近成功地钻探出了石油。钻出的石油每天有20桶。1879年，卡尔·本茨发明了由汽油驱动的内燃机，并于1886年开始生产汽车。

电力革命和由汽油驱动的内燃机的发明创造了一个新的通信和能源机制，并使人类认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全球即将迈入心理意识时代，该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最后10年。在此期间，虽然早期的意识形态，如神话意识，神学意识和思想意识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但是新的心理意识将主导20世纪，并影响人际互动的方方面面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习俗。有了心理意识，人们开始用以往从不曾想象的方式思考自己和别人的感觉和想法。人们成为心灵的探索者和思维的分析师。新的思考方式使更多人开始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意识，并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反主流文化和社会行动主义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电力与心理意识的萌芽

新的心理意识始于19世纪初期，追随着电的脚步而生。这种新的交流媒介对于人们思考方式的重要影响力，可以与400多年前的印刷革命相媲美。

1850年，几位来自美国参议院的“杰出议员”邀请一位名叫约翰·博韦·多兹的人针对电力心理学发表演讲。早期关于电力的实验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了有一种呼唤人们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神秘而无形的媒介，人们对它充满了敬畏。多兹大力宣讲该主题，他所写的《电力心理的哲学》一书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

多兹推广的理念是“电是连接人类思想和惰性物质的载体”，以及“电是造物主派来移动和掌管宇宙的一位伟大的代理人”，他是率先提出该理念的人物之一。

科学实验最早始于1786年，由意大利解剖学家路易吉·加尔瓦尼开展的，实验结果显示电在生理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尔瓦尼用解剖过的青蛙腿接触电流，发现蛙腿会颤动，便由此推测动物之所以会动，是因为在其肌肉和神经中本身就存在着电。1838年，另一位意大利人，来自比萨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卡洛·马泰乌奇指出，“每一次电流都会伴随一次心跳。”1843年，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成功地检测出静止的肌肉中存在电压。

在电力的早期发展阶段，生理学家研究了电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工作原理，他们的发现帮助工程师创建了第一批实用的电力设备。该成果也为揭示中枢神经系统的运作原理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例如，神经系统为电报的创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同时，电鱼也启发了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如何制作一块电池。杜波依斯–雷蒙德于1848年创作了一本关于神经和肌肉电磁的书《生物电》来纪念迈克尔·法拉第，他说法拉第对“电路中电磁感应的描述为描述神经的兴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杜波依斯–雷蒙德于1851年发表公开演讲，解释了电报和其他电力技术的工作原理与动物构造的相似之处。他写道：

> “电报是我们时代的奇迹，是很早之前仿造动物构造进行发明创造的产物。但是，神经系统和电报之间的相似性有着更深层的基

础。它们不仅彼此相似，两者之间更有着亲属关系，产生的来源是一样的。”

多兹领悟了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的精髓，并大胆宣称“大脑通过电才可以表达感想和情绪，并通过电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全部印象。”他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电是抒发情感和情绪的媒介。他甚至认为所有疾病发生的原因在于机体系统中的电失去了平衡。他认为这种失衡源于“精神印象”或是“对于外部自然界的物理印象”。

多兹的一部分观察结果是正确的，而另一部分观察结果则大错特错。他曾预想利用电击法来治疗抑郁症。他是最早相信精神疗法的人之一，精神疗法是由之后的威廉·詹姆斯命名得来。罗伯特·里伯和达格诺·斯科格在介绍多兹的工作时说道：“多兹在电力革命早期所做的先驱性努力和其他人的工作为精神分析的传入美国奠定了基础。”

多兹认为，“永恒的物质是电，电包含了所有事物的所有原始特性，人类和所有生物都需要遵守遍及整个宇宙的同一个伟大的电力法则”。多兹不经意间提供了一套描述自然、人类和文明的方法。与电力有关的隐喻将会代替早期农业文明出现的与水力有关的隐喻，也会代替影响中世纪水力革命、风能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与机械有关的隐喻。

浪漫主义学者、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对于电这种能源和相关的隐喻表达很感兴趣，他们很快学会了运用与电相关的语言并将电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中。与电相关的隐喻在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后依然存在，并成为浪漫主义时期和心理意识时期之间的桥梁。心理意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并驾齐驱。

纳撒尼尔·霍桑预见20世纪末期，世界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即心理意识时期——这个理念被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网络一代的通信理论家大肆宣扬。霍桑问自己：

“通过电，物质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在瞬间便可以颤动上千公里，这是一个事实，还是我所幻想的？这个圆形地球就像一个大脑，一个与生俱来就充满智慧的大脑。噢，或者我们可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而且只是一种思维，而不再是我们曾经所认为的物质！”

与电有关的隐喻对浪漫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电创造了一个同步互动的领域。这是电的基本特质。浪漫主义者凭借直觉认为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领域，电貌似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证据。

浪漫主义者不必再使用与机械有关的隐喻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强调世界是静止的，并充满了固体物质，而这些物质在一个永恒的真空中无休止地相互碰撞。电不仅提出了联系性，而且使我们联想到有机增长、创造性和变化性的概念。“场”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将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整体。保罗·吉尔摩在《美国文学》期刊中写道：“将世界想象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浪漫主义理论为进行电力实验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

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的魅力在于把电看作既非物质也非精神。因为人们无法看见电，所以电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人类的思想是由电产生的，因此也同样存在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在这个新的系统中，灵感与应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突然之间，物质世界不再那么物质化，而精神世界也没有那么虚无缥缈。

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影响了对社会的认识，开始认识到社会的流动性。人体不再将自己束缚在肉体之内。如果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那么区分人的明确界限就不再是一个科学事实，而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沃尔特·惠特曼通常会参照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来创造有关性欲体验的新概念。在性关系中，我们放弃自我，与他人紧密相连，这样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的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即自然“场”的一部分。

在20世纪早期，“思想具有无限性”的观点促使精神病学领域形成了“集体无意识”的新理念，还促使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开始探索同理心赖以形成的大脑回路，并探究同理心是如何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而传播的。毕竟，从一定程度来说，共鸣的本质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同理心的体验既是实体的，又是精神的。一个人通过思想这个无形的媒介可以切实了解到他人的想法。

电的动态——即使这个术语使我们联想到发电机——也说明了电具有创造性。浪漫主义者，特别是美国诗人，很快就抓住了电的这个特征并将其和一些流行的、创造性的概念联系起来。爱默生认为电力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和隐私的力量，而人类在整个电力发展历史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电力精神”不仅与创造力相关联，而且与一种高度发达的意识相关联。浪漫主义者把未来想象成一个由电联系起来的世界，并促进了人类的一体化。惠特曼于1865年发表了《近代的岁月》一诗，思考电报是如何联系人类商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并提出电报最终会促进“种族团结”。他问道：“是否所有的民族都在融合？世界是否将仅有一个首都？人类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同一的整体？”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此说法。亨利·戴维·梭罗指出，电报使居住在缅因州的人可以和得克萨斯州的人进行交谈，但他也半开玩笑地问道：缅因州的人是否真的有重要的事要对他们说呢？

浪漫主义者也认为，电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于意识本身的理解。电力提供了一些新的宝贵的心理学术语，帮助人们重新定义自己，而与水力和机械有关的隐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例如，“提振精神”“领会概念”“拓展思维”“否决想法”“放下情绪”等一些与水力和机械有关的比喻都太过拘泥，而无法用来形容意识。他们遏制了思想的自由变化。相反，与电相关的比喻表达看起来是开放的、连接的、微妙的，因而也是无拘无束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个表演非常令人吃惊，我们往往使用“通了电的”一词。这样一来，我们会想到一种强有力的、可以唤起情感的体验，它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将表演者和观众联系和融合在一起。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整体。个人意识融汇成一个单一的、有规律震动的情感体验。当世界变成无限的统一体时，我们便不会再意识到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限制。很多与电力有关的词语逐渐用来表达人类的意识，比如“一道灵光”“兴奋”“冲击疗法”“把插头插进插座”“精力充沛的”“触电般的感觉”“极”“短路”“超负荷”“精疲力竭”“想象的火花”“电路的”“脾气暴躁”“精力充沛之人”“生龙活虎的人”“情感宣泄出口”，以及“情感脱节”等。这些心理意识方面的词汇，使人联想起无形的情感和思想。这些从电的世界衍生出的词语既是短暂的，又是有形的。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探索各自的精神世界所需的语言。

究其本质，电所具有的特质使其更像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1848年发表在《美国民主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写道，电更像是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清楚地比较了用电报信号进行的思想交流和用语言表达的思想交流：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如同电报线路上闪过的无形的信息一样，疾驰而过而且瞬间产生作用。电报越是能够按照思维的方式进行运作，就越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吉尔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像所有学科的专家一样，作家们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领悟，并使用了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这类语言使社会成为一个无限的、有形的、集体的概念。

电气化、石油和汽车

电力革命在19世纪下半叶迅猛发展。用西联公司总裁威廉·奥顿的话来讲，电报就是“商业体系的神经系统”。萨缪尔·摩尔斯解释说，电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启发了他的思考，他准备创造一个仿造人类身体交流的通信系统。他相信电报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将经济和国家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独立有机体。他向既是同事又是合作伙伴的史密斯透露道：“整个国家很快就会布满‘神经’，实现相互连通。”

美国政府同意拨款3万美元，建立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第一条电报线。该电报线于1844年开始运行。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电报线已经快速覆盖了北美和欧洲。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布坎南总统可以通过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线互发信息。这个新的通信联络线似乎再次印证了摩尔斯的话，他相信随着电报的发明，“空间将不复存在”。

对于勇于跨越大西洋到达遥远的美洲海岸的欧洲移民者来说，可以像光一样瞬间给家人传送信息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就是一种魔法。曾有一位观察者夸张地说，“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线是联通人类家族各个分支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纽带。”

1851年，保罗·路透创立了路透社。到19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通过电报传播“新闻”。上千万人可以拿到晨报，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新闻，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此时却几乎是一夜成为现实。

铁路是第一个从电报中获益的行业，它利用电报安排路线、追踪货物、协调两辆相向行驶在同一轨道上的火车。到1866年，西联公司控制了电报行业。从那时起，西联公司就相当于“电报”的同义词。

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决定了美国铁路和电报的发展。铁路和电报线的建设与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高度集中的指挥和控制功能也必不可少，用来协调日趋活跃、流动性强、发展迅速和日益频繁的商业活动。经济学家过去常认为市场就是小型的、独立的卖家和买家进行很简单的货物和服务交易，而现在却开始谈论“自然垄断”的好处。

铁路和电报除了为商业活动提供新的组织模式外，也为现代工厂体系的出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快速、可靠、全年运作的交通和即时通信使公司可以不间断地接触到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零售市场。在此之前，工业一直是季节性运作的，而现在可以全年运作。煤炭以及之后的石油为工厂照明和供热提供了电力，也为设备供电。用于维修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能源基础设施的资金，更倾向于流入大型工厂而非小型商店。大型工厂进而需要集中的指挥和控制机制来协调其运作。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在管理高昂、灵活和复杂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通信媒介。

现代经济体制是化石燃料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熟。现代经济的重心从煤炭转向石油，从蒸汽发电转向电气工厂。虽然之前的文明社会存在不同类型的体制，但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展望这种体制的未来。该体质有很多重要的特点，包括对决策权预先设定的规则，自上而下的职权，对每一阶层工作明确的、有条理的描述，衡量工作表现和进步的客观标准，特定任务和运作的分工。韦伯谈及“这种合理化的管理过程使我们可以监管大型的、复杂的组织机构，同时经营多个活动并更快地提高生产率”。

很多其他合理化机制是在过渡时期形成的，这些机制又共同催生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例如，由铁路发展而来的标准化时区方便我们更好地掌控交通流量。1870年，一位乘客乘坐由华盛顿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在整个旅程中他需要调200多次手表以保证和不同地方的时间一致。地方时区的巨大差异给铁路安排列车时间和按规定路线发送货物带来了麻烦。1884年，以英国的格林尼治为地球的零度经线，设置了世界标准时区。

其他的合理化机制也都相继形成，为新组织结构的建立提供了帮助，提高了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包括标准商品评级、标准机械包装以及商品标准零售定价。第一批自动化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商品，包

括香烟、火柴、香皂以及面粉。国际收割机公司、胜家缝纫机公司和汽车行业先后引入了新的营销手段，包括邮购目录、产品品牌以及包括特许经销权在内的零售机制，这些使商业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质量稳定的、标准化的商品。

商业电话服务紧跟着电报的脚步而生。1876年，只有3 000部电话可供使用。到1899年，可供使用的电话数量超过了100万部。

电话和电报不同，因为电报需要一个专业的调度员来代替发送者传送一条消息，而电话可以在千百万人之间进行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话对社会话语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电话扩大并巩固了人类的联系网。人们可以和远方的亲属和朋友保持联系，特别是那些通过日常业务结识的新朋友。在互联网出现很久之前，电话推翻了隔离墙，使人们可以相互接触。

人们对电话这个新发明充满了敬畏，同时也有所怀疑。只听见几百千米以外的声音，而看不见说话者本人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需要时间来适应。霍勒斯·杜瓦尔曾说："当一个人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他可以看见你脸上的表情，如果他懂一丁点儿相面的话，他就会知道你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如何……"起初，人们并不相信他们在电话中听到的内容，因为他们看不见说话者的表情。"虚假"一词就在此时被创造出来，用来形容不相信电话另一头声音的体验。

在电报和电话之后出现了用来连接城市中心商业区和偏远住宅区的有轨电车。闪闪发光的电灯从早亮到晚，照亮了整个街区。1878年，费城的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成为美国一个使用电灯来吸引顾客和延长营业时间的百货公司。1895年，广告灯牌照亮了已入夜的大半个纽约。新的照明装置使各个行业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使家庭可以在天黑之后继续熬夜进行社交和阅读。白天的时间变长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同时，夜晚的时间加长改变了求爱仪式和家庭互动等社交活动。到1896年，仅仅美国就有2 500个电灯公司，有投资高达3亿美元的近200个发电厂，这在当时看来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另外，还有投资金额达2亿美元的7 500个独立发电厂。

在短短的40年里，电力革命就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国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铺设了通信基础设施。据估计，1890年有25万人在电力行业工作，或是"靠电力行业糊口"。

1910年，有10%的美国家庭通了电。到1929年，多数城市家庭都接入了电网。电气化工厂实现得略晚。1900年，尽管工厂消耗了50%以上的电力，但只有5%的工厂实现了电气化。

电气化工厂使流水线生产切实可行，成本低且效率高。工厂从蒸汽到电力的彻底转变，将1890～1940年间的生产率提高了300%。

亨利·福特的目标是使每个美国成年人都可以拥有一辆福特T型汽车，而这个梦想达成的前提是实现工厂电气化和引入电机。他写道：

> “为电力时代全新体系所做的准备工作，使工厂不再依靠皮质传送带和总轴，因为每一个器械都可以安装电机。电机使机器可以按照工作程序进行排列，并将效率提高一倍……没有高速运转的器械，就不会有我们所称的现代工业。”

作为通信媒介，电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在20世纪进入了石油和汽车时代，即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化被逐步引入美国和欧洲的工厂、家庭及社区。戴姆勒、本茨、杜里埃、福特以及奥尔兹等发明家开始对内燃机进行改进。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在为社会迈进石油时代而努力奋战。

1868年，来自克利夫兰的约翰·洛克菲勒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他之前是一名售货员和会计。洛克菲勒认识到石油行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井口，而且在于拥有炼油厂，控制物流和成品油的销售。他开始涉足与铁路相关的商业领域，之后还收购了输油管道。到1879年，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近95%的炼油厂。同时，其他石油公司也跟随标准石油公司的步伐相继成立，每家都是综合性石油公司，拥有油田、管道和炼油厂，控制了产品的运输和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甚至还控制了当地的加油站。

到20世纪30年代，大型石油公司成为世界最大行业的典型代表。它们包括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汉伯尔石油公司、大西洋炼油公司、辛克莱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太阳石油公司、联盟76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总共26家公司占据了该行业2/3的资产，拥有60%的钻井、90%的管道、70%的炼油业务，以及80%的销售市场。

由石油提炼而成的汽油先后使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开上了汽车。石油也为商用卡车、公交车、火车和飞机提供燃料，为全球化经济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物流体系和供应链。

美国第一个加油站于1911年在底特律开始营业。汽车的大批量生产令石油行业措手不及。为了满足对汽油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能源公司加强了石油勘探，几乎每周都有新油田被勘探出来。到1916年，已经有340万辆汽车飞奔在美国的道路上。仅仅14年之后，美国就有超过2 310万辆汽车。

在20世纪的其余时间里，汽车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其他许多重要行业的命运都与汽车息息相关。汽车消耗了全美20%的钢铁、12%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和60%的橡胶。

实业家对于汽车所带来的商机赞不绝口。一位分析师在1932年这样写道："想想将汽车放入市场所带来的效果，可锻铸铁的消费量扩大了一倍，平板玻璃的消费量增至3倍，橡胶的使用量增至4倍……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汽车这种原材料消耗者相匹敌了。"

汽车使成百上千万的人可以开车上路。它连接了城里城外，在创造了郊区文化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街区和社区概念。与20世纪的其他发明相比，汽车加快了生活的步伐，使速度和效率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点。

美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因为汽车生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石油。英国政治家欧内斯特·贝文曾经评论道："天堂也许是靠正义来运行，而地球则是靠石油而运转。"

如果说汽车提高了交通的速度和效率，那么它也使人们彼此建立了更加亲密的联系，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亲属、朋友和不同的人进行社交。在汽车诞生之前，人们所见的人数都是有限的，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们。和电话一样，汽车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们关系网的扩大成为可能。日常生活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密集的社交互动。

对时空的再思考

新的通信/能源革命和之前的革命一样，促使人类意识发生了改变，成百上千万人都在努力适应一个在短短数十年中时空巨变的新世界。

历史学家斯蒂芬·克恩在他的《时间和空间文化》一书中研究了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从1880~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观念。克恩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技术，例如电报、电话、电影、汽车、飞机等，为人类意识的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克恩提到："包括意识流小说、立体派、相对论和精神分析在内的文化变迁都是独立发展的，直接影响了人类意识，结果改变了生活和思想的维度。然而，我则认为科技变化和文化发展这两种力量从最开始就是一种共生关系，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最初的心理意识，并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成熟。早期的同理心伴随着新能源和通信革命的进步而迅速发展，现在心理意识则将同理心推向了高潮。"

克恩观察到，在19世纪人们的历史感有所增强，并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将生物世界置身于一个历史框架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用他们的辩证法理论将历史构建成一个进化过程。从人文科学到社会和自然科学，基本上每一门学科都重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历史情境中。斯蒂芬·图尔敏和琼·古德菲尔德将这一新的关注点置于历史框架中进行了总结：

> "无论从地质学、动物学、政治哲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上来看，19世纪就是历史的年代——这个年代的世界是全新的、动态的。"

然而，在19世纪末，对于宏大历史主题的兴趣让位于另一个新的兴趣，即个人历史的研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都对这一领域充满了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个人历史的关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

新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继续推动劳动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经济和社会变得更加复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烈地体验自我，并认识到自身独特的天赋和创造力是个人历史的基础，他们开始质疑启

蒙思想家提出的观点，即世界上只存在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解读。

当然，浪漫主义者早已质疑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元叙事，决定用其他事物取而代之。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不同之处就在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质疑元叙事这一观念本身，比如元叙事不断强调提高理智或情感。在新时代，每个人的历史都将承载个人独特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多样化与历史的民主化共存。随着中产阶级逐步接受心理意识，他们审视世界的角度也变得多样化。在治愈时期，人们很小就被告知自己的现实状况或许与别人不同，应该允许他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现实状况。

对于个人历史独特性的新强调，以及相信人们拥有不同的视角扩大了人们的容忍限度。愿意承认他人的观点，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是需要被尊重的独特个体。对他人独特历史特点和有限性的认识，也使人们产生了更广泛的同理心。新的多重视角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道德相对论带来的风险。如果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真实有据的，那我们如何区分行为的恰当与否？

然而，19世纪末期，允许人们可以持有不同意见的做法犹如一股新鲜的空气，使人们在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时代可以有所释放。尼采就是这股新潮流的带头人。他抨击启蒙时期观念关于“客观”事实的观念，反驳说世界只存在观点。他鼓励其他哲学家“在汲取知识时采用多样的视角和富有情感的解读”。他将这个新的方法称作哲学“透视主义”，并于1887年提出其方法论。

尼采既追随神学家，又追随理性主义者的脚步，他认为已经到了该放弃只存在“绝对精神”和“纯粹理性”幻想的时候了：

> “只存在一种观点，一种‘认知’，我们越用丰富的情感去描述一件事情，我们便会从更多的视角去观察一件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概念’就会越全面，形成我们对这个事情‘客观’的认识。”

在奥尔特加·加赛特之后，很多人也宣称“所谓永恒的独特现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现实”。奥尔特加·加赛特的这个观点和尼采的观点是一致的。

奥尔特加利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多样性的论断。

他指出爱因斯坦没有考虑一个唯一的、可知的、客观的现实存在。爱因斯坦拒绝接受绝对时间的概念，认为时间本身具有透视效果，该效果取决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然而，正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对于透视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和改变。艺术透视画法的发明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中世纪的画法是将世界勾勒成一个从尘世漂浮上升到天堂的图景，而现在，艺术家们摆脱了这种画法。透视画法的应用使人们的目光从关注天堂转向关注由主体和客体组成的尘世平面图。目光不再只专注于从尘世到天堂的上升，而是更加客观地理解整个世界。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方法，以及之后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艺复兴艺术家对于油布所做出的新的时空定位。

保罗·塞尚是第一个不再使用传统的单一透视法来看待艺术的人，他在《静物苹果篮子》一画中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一张桌子。他痴迷于从多个视角来进行绘画。他在1906年给他儿子的信中表达了他激动的心情：

> “在河边有很多的图案，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个事物使我们的研究主体极为有趣，主体如此变化多端，使我可以几个月来都从事这个工作，并在我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只是简单地左右移动身体。”

巴勃罗·毕加索在《亚维农的少女》一画中引入了立体主义这一新理念。在画中，两个人物面朝前，“但是鼻子的轮廓十分鲜明。坐着的人背对着观众，但是面朝前”。

立体主义是一个格调高雅的艺术表达形式，深深地吸引了来自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先锋派艺术家。然而，克恩注意到，时空定位通过一种通俗的艺术媒介被人们所熟知——电影。电影利用了梦境无意识及相似的时空定位。每天线性的生活经历被大屏幕轻而易举地切割成过去和将来，切割成了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迫使观众重新适应错乱的时空信息。画面切割使一个人可以看见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事情。通过画面定格，导演给观众一种时间缓慢停止的感觉。喜剧的放映过程通常是加速运动，变成一种荒诞不经的闹剧或是反向运动。例如，拍摄一个潜水员先从水里出来，再跳到跳水板上，从而让观众爆发出阵阵笑声。

对于时空定位的操控使看电影的人脱离了现实的时空顺序，而进入一个不同于现实的虚幻世界。所以，好莱坞成为“梦工厂”绝非偶然。电影和梦一样，都不存在时空界限，一个人的思维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游离。当弗洛伊德开始阐明其理论中关于梦境和无意识作用的重要性时，他的想法对于某一代人来讲并非难以置信，因为这一代人早已耗费了无数时间来观看电影并以梦境的方式重新思考。

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时空和多重视角，科恩说“该效果和塞尚、毕加索以及立体派画家在画布上产生的效果很相似”。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卢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和事件中窜来窜去，他的思维也在整个宇宙间游离——思考遥远的星系和最小的分子——而这些仅仅发生在都柏林平凡的一天之中。因为乔伊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意识流，在每一个清醒或是睡觉的时刻都会对此有所体验，我们的思绪会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和遥远的空间里漫步，而我们经常对此都无法控制。乔伊斯指出，“每一个人在一天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视觉和现实，并且在脑海中会出现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就像布卢姆一样。”我们的大脑不会轻易让我们只停留在一种视角上，这使我们可以接受一连串的客观现实。埃德蒙·威尔逊认识到乔伊斯的伟大功绩，他写道：

> “乔伊斯确实是人类意识新时期的伟大诗人。像普鲁斯特，怀特海和爱因斯坦的世界一样，他的世界也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观察着的，他的世界也是经常变换的。”

虽然乔伊斯和浪漫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意识是一种身体体验，爱与同情的表达是一种本性，但他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脆弱性和不完美。虽然像惠特曼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赞扬人类的脆弱性，并对性充满敬意，认为它是接触一个人自然生命力的一种途径，但是仍有人希望通过塑造一个无人可及的理想自我把人类的潜力浪漫化。

乔伊斯的主人公警醒了我们。利奥波德和莫莉希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雄心壮志被生活中的难事磨灭了。生活是混乱的，平淡无味的，有些发展成歇斯底里的搞笑桥段，而不是上升到和宇宙一样的高度。我们依然顽强地坚持，即便我们有超越的欲望，我们仍需要抽出时间去卫生间或者用5分钟的时间进行自慰来释放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生活像溜溜球，时起时落。我们有高瞻远瞩的时刻，也有极

度绝望的瞬间。

乔伊斯和努斯鲍姆认为，正是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平凡中——包括它所有的不完美和贫瘠——我们才找到了共同的人性和同情他人的情感资本。浪漫主义者过分强调超越，给人们留下一种很微妙的印象，即人类的不完美是无法忍受的，甚至是令人作呕的。乔伊斯说得再好不过了："我们必须完全接受我们所见到的生活，接受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遇见的人们，而不能把他们放置于仙境中去理解。"

当我们对别人表达同理心时，我们就是在认可他们每天的努力，并称赞他们对于成功和超越自我的追求。不仅如此，我们也认识到别人和我们有相同难处，即我们作为人类，虽然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并为之忧心忡忡，但依然在试图攀登高峰。我们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不足而指责他们，反而对他们更加宽宏大量。我们知道，克服阻碍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是很困难的。乔伊斯的性格和我们这些真实的人的性格是相似的，充满了矛盾，使读者对我们充满了并不伤感的同理心。

从188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看似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登上世界舞台和心理意识正式拉开帷幕的彩排阶段。克恩指出，过去的建筑中充满了沉闷的格调，强调使用隔离墙，偏爱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封闭空间，而现在的建筑风格则变得开放和透明。第一个采用钢梁的摩天大厦拆除了支撑墙。采用玻璃来放大室内的空间，给人一种内外之间有无限空间的感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注重中产阶级的隐私，房间有非常多的角落和缝隙，以至于需要拿一张地图才不会迷路。然而，新式的建筑削弱了墙壁的限制，扩大了人们的空间感，甚至将房间的内部结构展示于人，而之前房间的内部结构都是用墙壁遮蔽起来的。

德国表现主义派作家保罗·舍尔巴特写道："砖头的文化令人心情抑郁。"在短短的几年内，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光芒照耀潜意识的深处，试图揭开笼罩在人们心理上的面纱。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告诫他们的病人不要封闭自我、与世隔绝，而鼓励他们去了解自身的感觉，敞开心扉，分享内心的想法。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最好地诠释了这种新的感觉，他解释说，他的建筑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无缝隙融合——也就是他所说的"内部"变成了"外部"——这正合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家之意，他们希望对潜意识进行一览无遗地探索，将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融

入一体，并以此治愈病人。

克恩总结说：“在这一段时间内——不到1/3世纪的时间——人类意识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新的科技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冲破了长期隔离人们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等级，丰富了接触和控制时空的方式。电话、电影、收音机、汽车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使普通男女同样可以像富人一样获得速度、流动性和不同的空间现实。此外，正如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肯尼斯·格根指出的那样：“新的技术不断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建立了一连串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的关系。”

传统社会等级的摧毁，多重视角的引入，人类经历的多样化以及与不同人的频繁接触为心理意识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同理心的提升和行动、衣着不受拘束的女子在“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迅速流行。

所有社会关系的改变也影响了妇女的地位。爱迪生预言电力会把女人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她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这最终会改变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虽然电会帮助女人获得解放，但并非是因为日用电器减轻了她们的工作量，因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上阶层妇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妇女身上。即便在那时，花费在做家务上的时间也并没有减少很多。当工厂和管理部门实现电气化，工作重心从生产转向服务，妇女们才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做打字员、秘书和服务员。职业女性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一个典型的新形象。妇女获得的经济独立使她们更有勇气迈上政治舞台。

这段时间妇女们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她们要求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来管理整个国家。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才最终赋予她们相同的权利——此时距美国宪法的签署通过已经过了130年。

全球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对妇女地位的改变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至少在中学获得了相同的受教育权——而且因为他们和男人共享了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青春期，这个时期之前并不存在。

青春期的新概念

青春期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前30年。青年男女都同样拥有这个特别的时间段。社会开始认为童年时期延长了，超过青春期，止于青少年晚期。在此之前，一个人只有在性成熟之后才会进入成年，并会有相应的责任。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工作期限被延长，孩子们也受到父母更长时间的照顾。

一方面，年轻人变得更加依赖他人，甚至被当作幼儿来对待，因为他们的童年时代被延长了。另一方面，他们变得更耽于自省，甚至更加世故。延长的童年时代并不是用于玩耍。人们希望年轻人在青春期内承担起一种不同的责任，那就是塑造自己的身份。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想法。青春期是用来培养一个人的个性，发现自己的兴趣，甚至对某些人来讲，需要对有关生命意义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发问。虽然只有中产阶级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今也大概如此——但是，这些改变对青年男女的作用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带来的影响也将改变他们的意识。

成年人在职业生活上有太多时间上的制约和困境，这往往使他们无法进行任何反思和内省，而青少年不同，他们没有这些阻碍，而且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由的社交和自省，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沉浸于一种思想游戏。他们有时间体验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思考“职业生涯”和他们想要的生活——甚至思考他们愿意和哪种人共度余生——在此之前的几代人，都不曾拥有这样的情感和心理体验，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奢侈品。越来越多的男孩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对他们来讲，青春期可以延续到21岁甚至更久。延长的社交时间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与同龄人建立更多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包括同性和异性，他们也可以和不同的人进行更长时间的交往。

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埃里克·埃里克森才创造了“身份危机”一词，但是这个心理现象从一开始就与新的青春期并存。青春期不仅存在身份危机，同样也需要身份形成，两者无法孤立地存在。“疏远”这个概念也是如此。这个概念从1900年左右到现在一直备受文学主题的青睐。杰罗姆·戴维·塞林格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描写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年轻人逃离的故事，这本书依然是21世纪美国大多数青少年在校期间的必读书。

塑造个人身份需要对流行正统思想的大量质疑，并摆脱父母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并适应社会。詹姆斯·迪恩在

《无因的反叛》影片中出演了主角，扮演了一位疏远他人的青年，塑造了青少年婴儿潮一代人的典型形象，这一代人已经为接受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做好了准备。

青春期被视为长时间的情感乐园，它将帮助年轻人适应以心理意识为特点的20世纪。

从拥有好品质到好个性的转变

随着青春期的延长，年轻人在探索身份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疏离感，与此密切关联的是自我意识的变化。19世纪90年代是心理意识的萌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种全新的、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取代了拥有“好品质”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新概念就是要发展自己的“个性”。

“好品质”的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起源于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世界观。

在神学意识时期，虔诚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让别人、教堂和上帝来评判此人是否严格遵守了十诫，是否以上帝谦卑仆人的身份过着苦行者的生活。人们需要抵抗住来自充满欲望的世俗世界的诱惑。

从神学意识到思想意识的转变也见证了自我认知的转变，从要成为一个虔诚的人转变成要成为一个有好品质的人。好品质实际上就是虔诚的世俗化。它们的特点一样，都需要抵抗住世俗的诱惑，过着与亚伯拉罕的道德标准严格一致的生活，只不过好的品质以世俗化的形式表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拥有好的品质是全世界统一且唯一的标准。因此，社会上只有两种人——有好品质和有坏品质的人。好品质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认为世界按照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机械的模式运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一种客观现实。拥有好的品质就是要符合掌管宇宙和自然的更大的统一原则。

个性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出现了一个彻底的突破。个人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是更加关心别人是否喜欢自己。能够影响同龄人也是一种优秀品质。品貌兼优就是要彰显超凡的个人魅力，鹤立鸡群，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和官僚机构化的社会

里，人们越需要解放和彰显自己的个性，特别是当一切都需要遵照工业效率的要求并力争成为受人敬仰的人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被人认可变得和道德高尚同等重要。

强调彰显个性和要求被人喜欢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有哪些个性是人们不喜欢的？社会冷漠产生的心理孤立使个人的不安全感更加严重，年轻人不禁开始琢磨：我是否讨人喜欢？

培养个性所产生的自恋心态，促进了早期广告业的发展。它利用人的不安全感和极度渴望被人喜欢的心理来销售产品。如果你买了该产品，你就会脱颖而出，备受欣赏和喜爱，甚至被人疼爱。

约翰·华生是精神病学领域的开拓者，也是行为主义新领域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向广告这一新行业进军。他利用自己在行为矫正方法上积累的经验来向第一代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人推销产品，这些人都在设法塑造一个迷人的个性。

从拥有好品质到好个性的转变，也有其他更多的积极影响。人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关心别人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自然地会把他人看作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并且会体恤他人的弱点和期望。在一个只有好品质和坏品质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去理解他人。给人分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种评价，会使人们减少对他人情感和心理弱点的同情。在一个以是否被人喜欢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里，人们更容易认同别人存在的孤独感，以及追求喜爱和友谊的渴望。

心理意识时代

对心理学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它是哲学的衍生物，但它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传统观念认为，心理学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和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的著作。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在同一时期，又有一批受电力和神经心理学新发现影响的人——他们大多是非学术派的学者，认为嵌入在人类和动物组织中的电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类思维隐蔽的运作原理。

康德仍然坚信对人类思维的研究应该永远处在“科学探究”领域之

外，因为思想是灵魂的一个机能，一个非物质的中介，因此不会受制于严格的可量化的计量标准。多兹和其他很多早期的心理学家都相信思想来自灵魂，灵魂又指导我们的身体。19世纪的神经心理学家还没准备好为人类思想的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唯物的和世俗的解释。然而，多兹和其他人相信电力——介于无形的精神世界和有形的尘世生活之间的灰色地带——是上帝用来连接不朽灵魂与肉身的通信网络。

瑞士哲学家爱德华·里德指出，直到19世纪9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仍然试图将心理学放到精神领域来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对电力在生理学上的作用的新发现，使他们可以更好地领悟上帝神圣的计划。但是，他们对电在心理学领域中的作用的推测使人们开始研究心理学对于疾病的影响——这种新的关注将会改变心理学的本质，使它从一种精神探索转变为一门医学学科。

威廉·劳伦斯是一位知名的英国外科医生和《柳叶刀》医学期刊的编辑。他是第一位研究医学心理学的人。他认为，对于电生理学的研究可以揭示出精神失常和其他精神障碍并非是一个颓废心灵的表现，而是源自生理失调，通过医学可以调节甚至得到治愈。医疗机构强烈谴责他的假说，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的说法，劳伦斯被迫不能出版他关于该主题所著的一本书，还不得不放弃他的讲师职位。

19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乔治·比尔德的美国人开始利用“电气补药”来治疗一些在当时患有所谓的精神衰退症的病人——之后，这个病在临床上又被定义为“抑郁症”。虽然当时欧洲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症状其实是劣质本性或不良品行的暴露，但是比尔德相信这种病其实是源于身体疲惫或身体电能的消耗。他从理论上说明“脑力工作”，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脑力工作”所产生的压力消耗了人们的能量，就如同电灯泡的消耗一样。他的疗法依靠一系列的方法，如休息、电刺激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心理咨询。比尔德的方法就是将电荷直接“充进”已筋疲力尽的肌肉中以恢复病人的自然能量。

实验心理学的第一个实验室于1879年由公认的该领域的鼻祖威廉·冯特创建于德国的莱比锡。他致力于找到一种科学的、严格的、内省的方式来探究人类的思维，这种方法在实施中可以媲美弗朗西斯·培根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方法。到19世纪90年代，此类实验室开始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出现。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关于实验心理学的系统概论。詹姆斯关注内省，将其视为一种揭示意识内部工作原理的恰当方法论——“审视我们自己的想法，并说明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詹姆斯的出名，也许是因为他提出了“意识流”概念。所谓“意识流”，是指意识的内容不会终止、没有裂痕或是分割。虽然他承认在起初看来，睡觉过程中的无意识可能会打断意识流，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一种意识都对另一种意识不断产生影响。和当时其他的心理学家一样，詹姆斯依靠和电有关的隐喻来形容意识和非意识的相互联系。

> “当彼得和保罗从同一张床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刚才睡着了，他们开始各自回想自己在睡之前或睡之后的一种意识，犹如埋在地下的电极，无论路面上有多少障碍物，它都可以正确无误地向相似的电极传送电流，彼得现在的思绪也可以找到他过去的思绪，并正确无误地与保罗的思绪紧密结合。”

詹姆斯相信正确地使用隐喻，对于理解和探究意识工作原理至关重要。他反对使用诸如“思绪的链条”或是“一连串思路”等说法，因为这些说法都暗示意识被分解为一系列线性排列的独立事件，相互联系。与电相关的隐喻强调连接是不间断的，这在詹姆斯看来能更好地解释意识的运作。

詹姆斯对于身份的看法反映出强调多重视角的艺术新观念，也反映出人们对涵盖多种身份的个性的新关注。他写道：“有多少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

詹姆斯也是率先使用心理学术语定义精神自我的人之一。他反对用灵魂来定义精神自我的一种，偏向世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彰显个人生存意义的意识经历的总和。他写道：“一个人的精神自我存在于我们对别人说话内容同意与否的点头或是摇头之时。”

詹姆斯甚至是第一个提出“自尊”一词的人——他将“自尊”定义为对自我充满自信。他说自尊可以通过以下的公式计算得出：自尊＝成功/抱负。詹姆斯认为：“这个分数可以通过缩小分母或扩大分子来变大，自尊可以通过放弃抱负或增加成功来扩大。”

自尊成为20世纪6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运动的主要部分，之后被纳入到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学校课程之中，用来教授学生如何培养他们的自尊。相比个人担当和责任感，自尊在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到了20世纪末，拥有自尊比品貌兼优，比深受数百万美国儿童喜爱更重要。

最后，詹姆斯向20世纪30～50年代客体关系学派的心理学家介绍了身体体验这个感念，并提出独立存在的纯粹自我只不过是一个虚构之物。詹姆斯说："我们所声称的个人身份其实就是组成我们个人历史的相关经验的合成体。"

詹姆斯提出用自省方法论来探究人类思维，他对意识流、身份形成中多重角色扮演、世俗和精神自我、自尊价值的敏锐洞见为心理意识时代奠定了智力基础。随着每个理念逐步渗入20世纪的心理思维之中，并在治疗病人、辅导学生、训练工人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表达同理心的途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开始关注别人的情感，因此，他们更加能够理解别人的情绪和情感，并对他们的困境做出适当的反映。

多兹、冯特、詹姆斯等人为心理意识时代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仍需要一个卓越的人才将一门学术学科转变成为一个为普通人服务的新方法，人们可以利用该方法来思考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弗洛伊德带着有关无意识的理论于19世纪90年代登上世界舞台。他开创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全新理论，将其与欲望驱使和社会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系起来。自我和超我的概念被纳入同一个精神领域。弗洛伊德提出，社会文明制约了充满情欲的物种，这种说法在20世纪相当流行，至少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革命"和妇女运动，才开始要求性解放。

弗洛伊德又重写了关于人类旅程一书。他对人类历史开端的描述完全是全新的。之前所有人都认为恋母情结只不过是一种神秘的隐喻。弗洛伊德将人类对人性的认识推到了新的高度，他生动地描述了儿子嫉妒父亲对母亲的性控制，希望杀掉父亲，取代他成为母亲爱人的欲望。弗洛伊德对原始人类的描述与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神话故事截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将人类历史的起源简单地描写成一种性病理学。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改写了神话意识的故事，将其根源追溯到同一种性病理学中，他认为这种性病理学是人类历史的起源。他又创作了《摩西与一神论》一书，将神学意识的开端改写成性欲和社会限制之间的斗争。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历史的改写触动了大众的神经，使人们对人类本性的激烈争辩持续了100年之久。他是第一位将性作为史实记录的人，赋予其新的重要意义，使其成为心理意识时期的时代精神。

和很多之前的心理意识先驱者一样，弗洛伊德也曾考虑利用电来解释人类思维、意识和性欲释放的运作原理。他认为大脑的传导路径与电话线非常相似，“电话线中存在固定的动电电流，如果电流没有了，那么电话线也不会发挥作用”。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将会成为心理术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直接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利用与电相关的术语来描述人类思维。

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了解到的，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尽管有很多人依然相信口欲期、肛欲期、恋母情结、阴茎嫉妒、死亡本能和其他奇怪的想法，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抨击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性堕落本质的观点。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虽然谈不上彻头彻尾地荒唐无稽，但也算是滑稽可笑的。然而，我们仍然会使用口欲期性格和肛欲期性格来描述人类主要的身份和行为，貌似这些词汇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科学事实。

为了证明人们在20世纪确实开始进行合理的思考，我们可以看看弗洛伊德的信徒和追随者所提出的几个术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向一代代美国人说明，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自卑感，而非被压抑的性欲。提及他人的“自卑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中十分流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提出了一些新的复杂术语来形容不同的人类行为，包括防卫机制、文饰作用、情感投射、情感移位等。卡尔·荣格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性格外向者就是性格内向者，我们既有一个公众形象，又拥有一个隐蔽的个人形象。尽管这些心理学词汇一直都是永无休止的争论主题，但它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词汇来探索意识思维和非意识思维的深处。

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意识相比，心理意识最能够促使人类反思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与思想。在弗洛伊德为自己做精神分析后的100年里，世界上有数千万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个人心理咨询。弗洛伊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心理分析师。

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是新思维创始人的人，往往在事后都会被看作挑战传统观点的改革家，而不是革命性新想法的开路先锋。回想起来，弗洛伊德更像是一位重建主义者而非一位革命者。和启蒙运动中的理性

主义者一样，弗洛伊德相信作为肉体存在主要形式的性是我们的原始欲望，是不可预测、易爆发、富有攻击性的有毒欲望的混合体，需要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中得以克制。然而，通过让公众审视性，让个人对性进行自省，弗洛伊德无意中提升了纵欲、情感、喜爱、培养和亲密这些词汇的地位——它们都和性存在关联。这也为客体关系理论家和依恋理论家提供了重新解释人性的机会——这个解释强调我们寻求交往的本性，特别是同理心，而非被压抑的性暴力，这是推动婴儿和孩童发展的主要力量。

客体关系理论家和依恋理论家将心理学理论和实践转变为另一种对人性的具体看法，即人性来源于同理心。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转变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有另一种和客体关系、依恋学派相似的观点，持有该观点的很多重要人物不是受到有关人类本性、儿童发展，和成人治疗核心理论的影响，就是受到其次要原则的影响。

团体治疗和自助小组

当弗洛伊德的信徒们——特别是阿德勒、兰克、荣格和莱希——在争相修改他的理论甚至质疑他的主要原则之时，像华生这样的行为主义者开始利用自己的观点质疑弗洛伊德学派，一场不同风格的运动在心理学领域开始萌发。这场运动的主要设想和依恋主义一样，是说个人的身份是组成人类独特生活经历的关系总合。换句话说，我们和这个人或那个人都存在联系。戴维·W·约翰逊和罗杰·T·约翰逊在《竞争与合作：理论与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

> “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关系一直都是我们存在的中心。我们在关系中得以孕育，在关系中出生，在关系中生存。”

从我们的本质上来看，我们是群居动物，主要欲望是在社会中寻求友谊、归属感和感情等，因此，治疗精神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与他人隔绝起来，自己坐着沙发上，或是待在实验室里，而是加入到亲密的群体互动或是治疗团体中。

有趣的是，团体治疗不是由心理学家或是精神病学家发明创造的，

而是在1935年由一位来自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外科医生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偶遇中创造的。比尔·威尔逊是一位正在康复的酒鬼，鲍勃·史密斯医生是一个酒鬼。和当时其他的酒鬼一样，鲍勃相信酗酒实际上是道德堕落的表现。然而，比尔让他相信酗酒其实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疾病，是可以被治愈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帮助鲍勃走向康复之路。

这种见解推动了第一个自助小组"匿名戒酒会"的创建。匿名戒酒会成立的理念认为，治疗康复中酗酒者和酗酒者的最好方式是使他们加入到具有亲密氛围的小组中，分享他们的故事，帮助别人走向康复。虽然康复过程最终涵盖了12个步骤，但最重要的步骤是在康复中，酗酒者和酗酒者之间建立一种可以产生同理心的互动。通过毫无保留地分享困境，这些人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社会信任感，使成员们愿意去询问和关心他人，从而加快康复进程。随着匿名戒酒会声名远播，自助小组和团体治疗也广为人知。到1955年，已经有200万名成员加入到该运动中。

匿名戒酒会承认健康关系和情感对社会幸福的重要性以及同理心在康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缩短了客体关系理论家和行为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同时，匿名戒酒会创立了包括行为调试在内的12步康复疗法。

匿名戒酒会进展顺利，与此同时，心理学家开始在心理疗法中采用集体心理干预策略。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大量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

大批心理学家，包括美国的卡尔·罗杰斯，约翰·罗林斯和威廉·萨金特和英国的埃里克·特里斯特，开始以团体小组的形式接待病人。他们的工作是在20世纪20年代团体治疗的基础上展开的。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他开始在儿童指导诊所采用"集体治疗"方法帮助成年人和儿童。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创始人之一特里甘特·伯罗开始将病人和家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他的"团体分析"实验疗法。虽然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病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疾病——虽然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伯罗认为，精神疾病与一个人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联，因此，通过团体治疗可以得到康复。

最具有创新性的团体疗法当属雅各布·莫雷诺创建的心理剧疗法。它是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团体疗法，与弗洛伊德学说的世界观极为不同。然而，莫雷诺对20世纪心理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既是一名心理学

家，又是一名社会学家。与浪漫主义者一样，他相信人类的本性就是勇于创新，具有创造性的生活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关键。但是，他也认为创新是独立存在的，但创新在社交过程中产生。他十分依赖戏剧技巧来发展创新和产生社会信任，包括角色扮演和即兴创作。他最重要的戏剧手法就是角色颠倒——要求参加者扮演其他的角色。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产生同理心，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莫雷诺认为可以产生同理心的互动，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通过想象与经历别人的情感和想法可以释放个人的创造力。但是，他没有把同理心简单看作推进个人创新精神的工具。相反，他相信同理心是使人类具有充分意识和责任感的基础。同理心可以刺激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越能产生同理心，自我发展就越成熟。

莫雷诺坚持认为戏剧情境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扩大容忍限度，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探索人类情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帮助人们内省并更加善于沉思，发展更加复杂的认知能力。在心理剧疗法的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尽情地想象各种场景，检验全新的同理心途径。莫雷诺将这个衍生的宇宙称为“附加现实”。

莫雷诺相信，通过心理剧疗法可以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肢体运动、感受、情绪和认知反应，从而拥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更好地融入社会关系之中。它的效果要比简单地躺在沙发上给精神病医生讲述自己的童年要好得多。

他也不认同“控制自己的情绪比表达更重要”这一正统观念。尽管弗洛伊德学派治疗师对情绪爆发抱以警觉，称这类行为是“见诸行动”，但莫雷诺却选择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利用情感潜能。他的心理剧尤为注重“情感宣泄”，认为这些时刻可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解决长期以来让人倍感折磨的冲突。同时，也至少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短暂的超越感和连通感。

最后，莫雷诺对角色扮演体验做了微调，让参与者有机会将他们的情感和认知反应带入解决问题的更高阶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莫雷诺让参与者们进行三个层次的角色扮演：想象自己是一名戏剧演员；仍清醒地意识到，在治疗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他有着另一番别样的人生；听取心理咨询师和其他扮演者关于如何提高其角色扮演水平的意见。通过将注意力分割至三种现实情境中，参与者可以不断强化自身的

反思能力，获得反馈，并更准确地调整自身认知反应，从而营造出想要的情绪状态。

莫雷诺坚信，心理剧可作为一种教学法，应用于每一种人类情境，如能应用得当并广泛加以采用，不仅可以帮助个人恢复心理健康，同时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精神科医生亚当·布莱特纳博士认为，心理剧所教授的“沟通技能、人际问题解决方法和自我意识”是“心理素养”的基础，并认为：

> “要想适应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熟练掌握这类技能就显得越发必要，如同在20世纪，基本识字——知道如何读和写——是一种必要的技能一样。”

莫雷诺的想法将在20世纪人类头脑的“放飞”和心理意识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延伸，影响到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前10年期间从心理意识到拟剧意识的转变（拟剧意识将在第14章中加以探讨）。

在莫雷诺不断推进其关于人性的革命性新理念和开展心理治疗学和社会心理学新的教学法实验的同时，马克斯·韦特海默——流亡美国的捷克人——开始挑战两大心理学思想流派的核心理念。他对于以自省和行为主义为精神工具来了解潜意识和意识的方法持批判态度。韦特海默认为，这两种探索人类头脑运作的方法在本质上都属于还原主义——即试图通过分析各组成部分的总和来认识整体。它们先是记录关于感觉和刺激等基本单位的数据，然后试图通过组装构成生理的所有单个组件来构建一个人类头脑运作的模型，这种方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新的观点是：“万事万物都有整体和部分之分，整体的行为并非是由其单个组成要素的行为决定，但组成部分本身的行为却取决于所属整体的内在性质。”

韦特海默使用德语单词Gestalt（格式塔）——可大致翻译为“统一为整体”——来解释采用这一新方法研究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在新的方法中，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而非自下而上的构建。韦特海默认为，他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生理学和心理学。他说，举例而言，构成有机体的细胞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细胞活力的激发只有在整个有机体

和统一系统的运作中才有意义。

格式塔心理学进一步强化了莫雷诺的想法，同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哲学参考框架。韦特海默提出的观点是：

> “当一群人一起工作时，几乎不存在他们仅仅是一定数量的独立自我的情况。相反，一起共事的项目往往会成为他们共同的关切，每个人都是整体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一部分。”

心理剧是基于有关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一组类似假设。它默认每一名扮演者都是一个更大故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故事中，扮演者和已经展开的故事情节相互影响——其道理就如同孤立的音符无法称为音乐，只有作为已谱成的乐谱的一部分方可成为音乐。毕竟，角色始终是一种公开表达，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完全凭借他人的应对来呈现某种意义并得到检验。

20世纪40年代，莫雷诺的理念被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同事们重新拾起，他们开创了敏感性培训的新领域——群体疗法，这种方法最终将触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交友小组疗法和意识提升小组疗法，让心理意识之花盛开怒放。

勒温是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1910年获得柏林心理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凭借其格式塔心理学背景，勒温完善了如下学说：试图改变个体的做法，如不能让该个体所在的群体发生改变，将徒劳无功。他的理由是，由于“个人之于群体，如同部分之于整体”，那么，“群体动态的变化会（毫不例外地）改变”个体在群体中的举止和行事方式。这一认识让勒温开启了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和心理–社会互动新模式的实验，他将此称为敏感性训练，或T小组训练法。

1947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缅因州贝塞尔设立了一个组织，成立了国家训练实验室。T小组将少量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目标是教他们如何在群体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参与者会在一起共度两三个星期，在回归所属社区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固化自己新的心理。

T小组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反馈——当时，这个概念才刚刚因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这一新领域中的著作而普及开来。敏感性训练的一个模块

是每名参与者都要分享他或她对于小组中其他每个人的看法。在此过程中，个人往往会尽可能多地透露出关于他本人的一些信息——他的态度、偏见、情感上的顾虑，以及他对于人性和关系先入为主的想法和观点等，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将成为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反馈的对象。在T小组中，鼓励个人不断地相互给出反馈意见，说明他们如何看待对方在群体中的行为，特别是其行为对于小组中其他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这些模块往往都是高度紧张的情绪体验，个人会得到负面的反馈，也会获得正面的反馈。“从他人的眼中看自己”会带来情绪压力，特别在身处陌生人中间的公共场合。当群体反馈集中火力攻击负面行为时，这些体验可能会给人以无法承受的痛苦。然而，经过训练有素的心理咨询师适当的专业指导，这些强烈的情感遭遇会让参与者获得改变他们一生的洞察力，看清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他人。该项训练的目的是增强个人对他人感受和态度的敏感度，为在群体中以人性化和周到的方式进行合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T小组训练法是一种有组织的治疗方法，可在短时间内增强同理心意识和反应。

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学校、工作场所或所在社区内定期参加某种形式的敏感性训练。训练会广泛涉及一系列敏感的文化问题和以前属于禁忌的话题，包括性别和种族偏见、多元文化敏感度以及对残疾人的态度，在此仅举几例以示说明。T小组体验本身已在整个社会内实现民主化和非正式化。现在，围绕任何一个话题或顾虑展开小组讨论，并邀请参与者分享他们对于期望和结果的感受，他们对于小组中其他人的态度和感受，以及群体动态应如何展开的关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被称为“进程问题”，涉及群体的情绪和行为动态。通常情况下，进程问题可能要比商议式问题花费更多时间，并能够真切地影响到小组要共同解决的任务的性质和最终的结果。

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聊一聊彼此的行为和态度对团队其他成员和群体动力产生的影响，即便在小的、受到控制的环境下，仍然具有革命意义。

敏感性训练与群体心理具有一些共同点，因为敏感性训练也非常关注个体情绪和人际关系，并注重通过后天学习提升内省能力。但是，敏感性训练不同于群体治疗。群体治疗侧重于帮助个体参与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去和潜意识的动机，而敏感性训练则侧重于帮助个体参与者提升必要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以便在群体环境下成为更好的倾听者，并更

加敏感地察觉到他人的所思所想。

因为敏感性训练的内容都是关于群体动力的，所以，小组成员讨论的内容往往都是不同的参与者对群体的看法，讨论的内容涉及歧视、服从、领导权争夺、控制群体议程、推卸责任、忽视较为被动或没有吸引力的成员、发泄压抑的情绪，以及攻击他人等反社会的行为方式。纠正这些消极的行为方式成为讨论的要点。

非常有趣的是，关于群体动力的问题，一个关键的假定条件就是人类的天性是热爱社交、充满感情、努力与他人开展合作，并表达出自己的同理心，削弱这些天然倾向的行为都是有害的，最终会适得其反。敏感性训练的确能够印证人类天生具有同理心的内在假定。

在学校教育和人力资源管理中，敏感性训练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训练孩子、员工与他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变成了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事实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敏感性训练都是推动个体成功融入社会的有效方式。这并不是说敏感性训练完全没有招致批评。批评者通常认为敏感性训练强迫参与者遵守已经先入为主的社会期望，将符合群体思维和政治标准的想法灌输给参与者。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即便开展了敏感性训练，参与者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了敏感性，但这种表象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私下里仍然抱着由来已久的偏见与不健康的态度。换句话讲，这种训练只是让那些组织者看到了他们试图寻找的社交信号，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批评者认为，更糟的是，这些敏感性训练都是在他人操纵之下进行的，可能严重伤害参与者的情感。虽然多年来的大量数据表明上述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敏感性训练有助于让参与者变得更敏感，更有同理心，由此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偶然出现的毁灭性的消极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敏感性训练开始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侧重于组织技能，另一个方向侧重于个体成长。当时，工业领域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个方向的训练，培训对象为工人，为工人提供必要的情感和认知技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的、多样化的商业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迅猛发展，因为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一起生活和工作。在种族、民族、宗教、性别、代际差异、性取向、残疾、外貌，以及生活方式偏好等问题上，要敏感地关注、理解和认可他人的想法，着实是一件令很多人头痛的事。因此，有必要对个人和集体的心理模式进行重新调整。敏感性

训练是一个群体通过亲身经历对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反思。

工业领域逐渐把敏感性训练视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培训工具，认为这种训练有助于人们在工作场所培养多元文化视角。罗斯·温特灵等人在《人力资源开发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解释了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全球化公司如何才能赢得激烈竞争：

> “如果劳动力队伍发生的这些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能够得到高效的管理，那么将会对公司的竞争结果和经济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有那些支持多元文化的公司才能留得住提升竞争力所需的人才。”

虽然很多公司的敏感性训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增加公司利润，但这个训练过程会对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产生持久的影响，提升他们的同理心意识，使他们能够敏感地察觉到同事、供应商、客户的独特情况，形成一种更国际化的宽容心和同理心。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雇主表示，他们计划增加或维持在敏感性训练项目上的开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文心理学与反主流文化运动

我们所说的，侧重于个人成长方向的敏感性训练主要是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完成的。他们逐渐建立了新兴的人文心理学。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和约翰·华生，以及伯尔赫斯·斯金纳的行为学派之外，人文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上的“第三势力”。

人文心理学家把敏感性训练从一项由专业人员在预先控制的环境下开展的活动转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着成千上万的“邂逅小组”和“意识提升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通过自我表达、肢体接触等行为来培养自我意识和相互理解的精神，从而取得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精神病集体疗法。这种治疗经验已经彻底变得大众化了——在客厅、酒店会议室、社区活动中心等人们聚集的场所，思想意识都在让位于心理意识。

我记得，1970年的夏天，我当时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那里经历

了一场思维方式的转变。格林尼治村里倡导社会变革的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极端主义者，他们为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和反越南战争运动而积极呐喊，另一类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根源在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垮掉的一代”，他们尝试着肆无忌惮的性解放、迷幻药和摇滚，并涉足东方的宗教和灵修。这两个运动也有交汇点，比如雅皮士们既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又是政治极端主义者，彼得、保罗和玛丽等音乐团体也同时具有这两个类别的特征。如果非要在这两类人之间划一条分界线的话，那就是方兴未艾的女性意识运动。

女性意识运动爆发于一个名为“鼠族”的小型反主流文化政治团体之中。该团体发行着一份名为《老鼠》的报纸。在该团体内部，女性指责男性在与女性打交道时存在家长式的态度，就像政府与商界对待美国人民、穷人和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一样。她们要求男性终结这种家长式态度和性别歧视。当她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时，她们上演了一场“政变”，把自己的男人锁在门外，夺取了“鼠族”这个团体和《老鼠》这份报纸的控制权。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促使政治极端主义者和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些女性声称一切政治都是为了个人目的，指责男性虚伪，指责男性炮制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又对女性抱有特别严重的性别歧视。一时间，旨在提升女性意识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思想意识逐渐让位于心理意识。年轻的反主流文化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激进主义者纷纷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探索内心世界，探索心灵的深处，从更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找到个人存在的意义。

人文心理学家的主要代表包括罗洛·梅、亚伯拉罕·马斯洛，以及卡尔·罗杰斯。他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为人类探索内在的心灵世界和人文精神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他们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堪称志同道合。

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存在主义哲学家首先假定一切人类个体在宇宙中都是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享有绝对的自由，每个人类个体都对自己的生命富有全部责任。因此，人类对神灵不负有任何义务，也不必为了任何宏大的计划而牺牲自我，人类完全享有按照自我意志选择生

活的自由。

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普遍持有一种相当黯淡悲观的观念，比如，尼采和萨特认为人类是宇宙中的孤独个体，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相比之下，美国心理学家显得有些另类，他们拒绝了这些观念。比如，马斯洛就抱怨欧洲存在主义哲学过于黯淡，称其为“高智商在宇宙中啜泣”。

得益于美国的乐观主义和“无所不能”的心态，美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更为乐观，认为人类在宇宙中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富有意义，认为人类心灵的核心必定是“意向性”。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存在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认为人类内在的性欲会产生毁灭性的冲动，巴甫洛夫认为人类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机器。美国人文哲学家夏洛特·比勒对人的描述则表现出了另类的乐观，认为“人类具有意向性，而意向性意味着目的。这种目的就是通过在更大的环境中解读生命，从而使生命有意义。在这个更大的环境中，人类想要创造价值”。

尼采认为，人性中唯一具有意向性的部分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和人类行为的唯一绝对动因，人生就是权力意志的追求。与尼采不同的是，罗洛·梅认为，从本质上来讲，每个个体都深切地关心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性质，因此，会故意拥抱生命，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当这种关心不存在时，人类就会变得冷漠，并失去生存的意志。罗洛·梅认为最根本的关心是为生命注入爱。他写道：“我们用意志力创造了世界，用自己的决策、法令和选择创造了世界，我们爱它，为它付出了感情和精力，我们具有爱和改变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马斯洛在著名心理学家哈洛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哈洛的著名研究是恒河猴幼崽对于代母的依赖性），并于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马斯洛最著名的成就是“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5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根据马斯洛的观点，只有当人从生理需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当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渴望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从这种关系中获取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以此确认自己值得拥有他人的关注和感情。只有在获得尊重后，才有可能上升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潜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另

一个角度描述了一个人追求自我成长的过程，描述了同理心走向成熟所经历的阶段。

卡尔·罗杰斯是人文心理学运动中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提出了富有争议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理念，认为心理治疗师需要进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并愿意通过自己的双眼去体验当事人经历的现实，并感悟这种现实带给他的心理意义。治疗师对当事人越有同理心，当事人就越有可能敞开心扉，学会信任，根据现实和自身需要进行自我重构。

人文心理学家认为敏感性训练是一种理想的工具，能够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采取一种更具同理心的生活方式，更深切地渴望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更热衷于追求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敏感性训练小组逐渐演变成了“邂逅小组”和“意识提升小组”。与传统的T小组相比，这些小组的结构化特征较弱，非正式性更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某种形式的邂逅小组，这种大潮流被称为“人类潜能运动”。

试想一下，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无数个正式机构中或非正式环境下公开向陌生人分享内心情感、情绪和想法时，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呢？卡尔·罗杰斯认为邂逅小组“也许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社会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缺乏人性。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这些新兴的、令人心理上感觉有些不自然的邂逅小组为婴儿潮一代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消除内心的隔离感，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更加多元化的人群建立更深刻、更具有同理心的人际关系。

每个人的自助小组

在邂逅小组蓬勃发展的同时，自助小组也大量涌现。匿名戒酒会运动的早期成功激发了大量的自助小组，这些小组主要是处理对赌博、毒品和性上瘾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解决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自助小组，这些自助小组针对的疾病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心脏病、强迫性精神障碍和自闭症等。有些颇受欢迎的自助小组还会处理其他问题，包括子女监护权、收养儿童、离婚、照顾家人、悲伤、丧亲之痛、健康、

变性、强奸、性虐待、自杀、减肥等。

自助小组一般是小规模的、具有志愿性质的团体，组织者一般面临着共同的困境，通常通过情感支持和信息共享达到相互帮助的目标。有些自助团体侧重于促进个人成长，而另一些团体则追求另类的生活方式。许多组织也会出面，通过一些干预措施帮助自己的成员维护权益。

大多数自助小组处理的都是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邂逅小组相似的是，自助小组也帮助参与者说出个人的痛苦，讲述自己为了克服或解决问题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因为参与者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或情形，他们会鼓励志趣相投的成员以同理心对待彼此，并拥抱对方，使自助小组就像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区一样，让参与者产生一种归属感。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处境和情感状态而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是让成员之间产生亲密感、慰藉感和接纳感的有力途径。参与者感受到了无偏见的和无条件的支持。在大多数自助小组的活动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同理心的拓展。

还应该强调一点，即自助小组的活动是名副其实的自助性质。每个成员都以同理心待人，都形成了守望相助的意识，从而使每个成员都获得了自尊，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再也不是孤单无助了，再也不是社会的底层民众或怪人。相互帮助有助于每个成员改变对自己形象的认知，之前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以受害者的心态自居，而现在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力量，从而积极地改变现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在美国，超过7%的成年人每年都会参加自助小组。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曾经参加过某种自助小组。近年来，在美国，自助小组的受欢迎程度几乎接近于主日学校和《圣经》学习小组。目前，美国的自助小组有超过50万个，成为塑造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支强大力量。

此外，在历代人之间，参加自助小组的人数都在增加。例如，1997年的一项调查估计，25～34岁的美国人中，超过1/4的人会在35岁之前参加某种自助小组，35～44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10的人在35岁之前参加过这种小组，在年龄更大的美国人中间，这个比例甚至还不到1/20。

自助小组蓬勃发展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比如，德国有300万人参

加了7万多个自助小组。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神学意识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表达方式，在中等发达国家，思想意识是最普遍的公共表达形式，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心理意识已经占了上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有的意识进行了解构和再造。宗教和政治在精神治疗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且治疗效果越来越显著。心理学领域的一些隐喻、术语和做法日益深刻地渗透到了神学和思想意识领域，甚至用来描述其他两种意识的语言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色彩。200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的美国成年人在其一生中参加过某种心理治疗或咨询活动。此外，目前，仅仅在美国，就有33 000多名精神科医生，15万名心理咨询师和超过59.5万名社会工作者。除此之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参与自助小组。综合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就能对心理意识的巨大转变有所了解。为了理解心理治疗理念对人类心灵的渗透程度，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三个美国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相信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其儿童时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只有极少数学者具有这样的想法。

心理意识的兴起导致了人类同理心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拓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达到高峰之际，同理心也在全世界得到了拓展。反殖民主义斗争、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残疾人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和动物权利保护运动都见证了人们日益注重与他人和自然建立亲密的关系，日益注重自省，日益注重多元文化视角和无条件接纳别人。

随着第一代接受心理意识的人开始与亲戚、朋友、邻居，甚至是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脆弱、希望和抱负，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革。

这些社会运动的扩散表明人们开始重新热衷于政治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沉寂多年的思想意识似乎再一次得到了唤醒。然而，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一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正是心理意识的到来促使这些运动向前发展。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殖民主义运动或许是一个例外），即人是宝贵的、独特的、终有一死的和最有价值的，人控制着生产方式，人应该超越阶级观念中抽象的思想意识。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扎克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代际转变，描述了初次接受治疗式思维的那一代人与之前那几代

接受思想意识的人之间的区别：

> “年青一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叛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这种反叛超越了思想意识的桎梏，触动了人的心理意识，试图改变我们内心最深处对于自我、他人和环境的认知。”

意识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最能体现出美国意识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主要是大学适龄青年）试图与他们眼中的“老左派”划清界限。他们所说的“老左派”是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党，这些政党较为关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权力斗争和机构变革等。相比之下，那些年轻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政治运动则更加关注个人的意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1962年，美国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的组织，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发表《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年轻学生的意图。虽然他们表达了希望纠正不公平的、官僚主义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们还努力解释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改善这个社会中的机构或技术，而是改善人类自身的条件：

> “今天，孤独、疏远和孤立成为形容人与人之间距离遥远的词汇。这种主导性的趋势，无法通过更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来克服，也无法通过改善机械设备来克服，只有当人类对自己的爱超过了对物的崇拜时，才能克服。”

“新左派活动”人士还提到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这些先驱与那些当权者一样，以革命的名义，呼吁人们为了遥不可及的、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做出了非人道的行为。他们写道：

> “我们视人为无限珍贵的，他们拥有还未完全实现的，追求理性自由和爱的能力……我们反对任何把人类低下地看作物的去人性化。20世纪的残忍告诫我们，手段与结果是密切相关的，向子孙后代的模糊呼吁也不能为当下的毁损辩护。”

法国的“新左派运动”则以更简单的方式描述了手段、目的和后代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期待你牺牲自我的革命是父辈的革命。”

“一个人，一个灵魂”是“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组织的宣传口号。这个口号道出了“新左派”的思想精髓，即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内在的价值，都要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负责。换句话讲，社会的政治学是由个人的政治学构成的。

“老左派”较为关注一个社会的机构是否接受了社会的严格审查，而“新左派”则反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机构，较为关注一个人是否反省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对自己的选择负责。1967年，科林·麦金尼斯指出，不同于“老左派”的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年轻人“比之前历代年轻人拥有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指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或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是对自己应尽的义务。我认为他们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动机和行为。”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虽然行为古怪，特立独行，但他准确地捕捉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潮流，或许比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人把握得都要准确。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意识形态的政治已经让位于“神经系统的政治”。

西奥多·罗扎克对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透彻分析依然堪称对那个时代的最好描述。他这样总结那个时代的意识演变：“作为一种基本原则，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方式让位于以心理意识为基础的意识方式。”接着，他揭示了这在20世纪60年代意味着什么：

> “我们发现，社会学稳步地让位于心理学，政治集体稳步让位于个体……‘旅程’是内向的，通向更深层次的自我反省……‘新左派’的一个美好之处就在于它渴望用人类的温和情感去影响政治尊严，在于它愿意去讨论爱、非暴力和怜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不少人在那些崇尚自由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不是同理心水平的提升，而是猖狂的、肆无忌惮的自恋。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是这项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谴责这一代的年轻人过于注重追求个人的愉悦，他们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就是获取个人幸福感。在比较了神学意识与新的

心理意识之后，里夫轻蔑地指出，“宗教学意义上的人，生来是为了得到救赎，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生来是为了追求愉悦。”他描绘了一幅狄俄尼索斯式的寻欢作乐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唤起快感变成了终极的追求，人们不再努力做一个具有优良品格的人，不再努力追求不变的真理，而是成了一个演员，一边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一边做着令自己愉悦的心理游戏。

其实，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难。看一看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年轻人，他们自由恋爱、即兴表演、醉心于古老的部落仪式、追求超越人类所有隔阂的狂欢；他们身着奇装异服，佩戴花朵，来到五角大楼周围，参加反战聚会，将花朵插到炮筒里（第一朵花被插进炮筒时，我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数十万名年轻的美国人涌向纽约州的一个牧场，建立了一个伍德斯托克国，我当时也在那里。

尽管这些评论有些道理，但一味地冷嘲热讽容易导致我们匆忙地做出判断，从而忽略了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更深层次的转变。罗扎克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如是总结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抗议活动提出过具有哲学深度的问题，引发我们探索现实、理智和人类目标的意义。那些年轻人提出的异议导致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这种评估力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罕见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质疑，包括家庭、工作、教育、成功标准、抚养孩子、两性关系、性行为、都市生活、科学、技术与进步等。财富的意义、爱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意义也成为需要审视的问题。”

在一个经济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而人际关系却日渐疏远的全球经济体中，心理意识使个性日益鲜明的人们开放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覆盖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同理心，适应并拥抱日益兴起的全球文明。

第三部分 同理心时代

第11章 全球同理心来临

现在大多数人已经离不开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种强烈的依赖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当然，很少一部分人还过着没有电的生活，脱离了全球化的进程，不过仍然受到全球化的活动和外部效应的影响）。

全球资本市场每天以3.2万亿美元的光速流通。每天4.9万架飞机在天空来回航行，几个小时内就能将旅客和货物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 500多个卫星环绕并监测着地球，为40多亿人提供信息。地理定位卫星跟踪记录各个大陆的情况，密切关注天气状况、高速视频、音频以及数十亿人互发的短信，暗中监视恐怖活动并为数以百万计的司机提供导航服务。

现代商贸物流设施渐渐趋于无缝式的连接。水果、蔬菜、谷物和肉类可能在很远的距离之外生产加工，然后每天及时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超市。产品的每个部件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运送到国内市场进行组装。一辆普通的汽车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配件，每个配件都由不同的国家或大洲生产。全球汽车和全球之家的时代到来了。

我们使用的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越来越多的是在本土外加工后重新进口，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例如，在1950年，美国的能源需求100%自给自足；而今天，仅能供给不到71%的能源。能源净进口从1950年的零BTU（英热单位）上升到2007年的29 200万亿BTU。

仅仅半个世纪前，传统的全球资本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多于跨国投资。现在已经转化成无国界投资。2008年，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以8亿美元购入了著名的纽约克莱斯勒大厦75%的股份。甚至连我们的港口设施也越来越多地由其他外国公司来远程运营。

劳动力已经跨过国界（有些合法，很多是非法的）散播到世界各地。虽然人群迁移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初期，但是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这还是第一次。当今，数以百万计的人拥有护照，在几个国家之间来回穿梭，可能为了商业贸易，也可能是走亲探友。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在全球网络空间里人们几乎是面对面联系。在全球化时代，距离越来越不是问题。我们现在的虚拟地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真实地址的重要性。时间段压缩到了几乎同步的地步，多任务处理已经成为常态，时间本身也成为稀缺物品。

300年前，普通的欧洲农民只能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接触到有限的知识——其中大部分或者是由教区牧师传授，或者是彩色玻璃（当地教堂用于装饰）上面记述的故事，再或者是来源于民间传说。今天，数十亿人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到数以亿计的各种信息。很快，世界图书馆中几乎所有书本上的集体知识和智慧都可以在分秒中搜索到。

流感病毒现在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2008年，在墨西哥一个偏远村庄，猪流感病毒小规模爆发，引发了世界卫生警报。短短几周，流感在世界范围大肆流行。通过空中旅行，病毒和人类具有了同样的流动性。

全球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众多的全球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政治空间，如欧盟、联合国；全球监测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司法组织，如国际刑事法庭。

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监督着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人类文明。整个系统由数十亿人管理和维护。他们被细分为成千上万的专业才能和职业技能，在相互依存的全球迷宫中完成特定的任务。

全球化过程充满着机会主义和颠覆性。数以百万计的人出人头地，坐享巨大财富。随着人类集体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笼罩大地，更多的人则是一败涂地。

心理影响和经济影响同样重要。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渐渐地以前所未有的各种方式暴露在他人面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全球化引起的反弹——仇外情绪、政治民粹主义和恐怖活动——被大量报道出来，导致同理心的普及趋势得不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全球市场几乎没有国界，社会空间更是通畅，没有边界。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全球性的移民大潮中，世界也变成一个全球平台。

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香消玉殒，让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悲痛不已。人们同情戴安娜王妃的遭遇，深切关注她的两个小儿子。这一现象

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星球已经缩小成了每个人的“后院”。

190多个国家的25亿人通过44种语言的全球卫星直播关注着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使这场葬礼成了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事件。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互联网聊天室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互相寻求慰藉。

这次事件前后，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很理解戴安娜，因为他们也过着和她相似的生活，觉得她就是他们生活中很熟悉的一部分。心理学家将这种感受称为“准社会关系”——人们认同名人，甚至荧屏上的角色，觉得他们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戴安娜的际遇感同身受——她的婚礼、她孩子的出生、她与饮食失调的抗争、她破裂的婚姻、她的慈善活动，还有当她尝试一段新情感，想重新开始生活时，英国王室对她的不公待遇。尽管一些学者用怀疑甚至鄙视的眼光看待准社会关系，暗示准社会关系说好听些是太肤浅，说难听些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媒体体验宣泄，但是其他人却认为，准社会关系是人们表达情感和同理心的强有力的新形式，就像祖辈诉诸其他媒体形式一样。

女人对戴安娜的遭遇尤为同情。她们感觉到自身与戴安娜有一种密切的同理心情结，对她的个人痛苦和努力以积极的心态开始新生活时的内心挣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以后的随访调查中，女性和男性都说他们理解戴安娜的抑郁和自杀企图，理解她经常反复无常和绝望的行为，也理解她对爱情和友谊的渴望。戴安娜的痛苦成为他们的痛苦。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很赞赏她坚持不懈的精神、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以及摆脱困境的心态。

戴安娜王妃的死讯和葬礼把世界上40%的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人们为她默哀，唏嘘她的命运，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转述加拿大已故传播学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话，全球范围内，数十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被电子设备激活了，并连接在了一起，至少在短时间内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同理心的拓展能力是巨大的，可以跨越民族文化、大陆、海洋和其他传统分歧，对人类的人性化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启示。

互联网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对他人的困境产生认同感和同理心，并做出积极的回应。2004年12月26日，致命的海啸横扫亚洲和东非海岸，超过22.5万人丧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连基本的生存物资都无法保证。致命的海啸造成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海啸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在海啸灾难中，当事人录制了成千上万的实时家庭录像，并把视频放到了个人社交网络上，通过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澳大利亚的一个博主在他的网页上搜集并发布了超过25段海啸浪潮的业余视频，不到5天就有682 366条访客记录。

个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了全球聊天室。受害者家属在网上查询他们亲人的最新消息，其他人也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悲痛和同情。

个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也成为支援和安排救灾任务的全球组织网站。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和婴儿丧生，孩子们被深深地触动了，数千所学校都开展了筹款活动。

受害者和旁观者拍摄的未经删减的个人视频实录将这一悲剧事件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特写镜头和关于具体个体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巨大的情感反应。研究表明，人们几乎总是同情个人悲剧，在认同感的驱使下更有可能在整个救援工作中伸出援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他人困境无休止的曝光也会变成一种窥阴癖的娱乐。过度的曝光让人变得麻木甚至感到无聊——“我去过，也见过”综合征。在这个话题上，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人类的世界主义化

如果我们用相机记录下人类过去70 000年的迁移和定居过程——从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大裂谷算起，那么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过去300年间发生的巨变。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30～150人的部落横穿整个大陆，建立一块块定居区。采集者和狩猎者随季节迁徙，搭建临时住所，随着赖以生存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周期性消长继续迁徙。

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欧洲出现了小规模的园艺社会，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形成原始的村落。水利文明的到来催生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住区和拥有成千上万居民的小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伟大帝国的都城，人口都在5万～10万之间。古代耶路撒冷的人口最多时达到6万。希腊古城雅典和斯巴达约有10万人。唯一超过100万居民的古城是罗马，在公元一二世纪，罗马的影响力达到了巅

峰。

直到两个世纪前，人类聚居区转变成了高度复杂、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人口达到100万或更多。人类城市化的实现得益于储存了太阳能的新能源的发现，先是煤炭，之后是石油，再之后是天然气。这些能源从侏罗纪时代就深埋在地下。在蒸汽机和之后的内燃机的作用下，巨大的化石能源宝藏转化成了电能，然后通过输电线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让人类更好地开采地球上的资源。在化石能源的推动下，经济活动以惊人的节奏和速度进行着。此外，农业生产也大幅度提高。新型的经济活动——大规模产品生产——让新兴资产阶级过上了比几个世纪前的皇室还优裕的生活。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升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世界人口在10亿左右徘徊，到1900年，世界人口已上升到16.5亿。仅仅60年后，世界人口接近30亿，而现在的世界人口就快迈过70亿大关了。

工业革命需要集中式的生产设施和大批工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城市人口在1820年就达到100万，当之无愧为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1900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11个，1950年有75个，1976年有191个，现在，有414个。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着，城市化的进程丝毫没有放缓的趋势。地球上每天有34万人出生。到2042年，人口预计将增加到90亿，而且大部分人将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

2007年是人类聚居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临界点，其影响堪比农业时代。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历史上第一次，大多数人生活在巨大的城市——许多人生活在大都市和城郊——一些城市的人口超过1 000万。我们已成为“城市人类”。

世界的城市化离不开熵账单的巨大增长。城市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多的地球可用能源和物资从各种要道输送给人类，在基础设施的核心地带上维持着人类更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向非主体部分和外部环境中倾倒更多的熵废料。这就使人类生活严重失衡。从另外的角度看，芝加哥威利斯大厦（以前的西尔斯大厦），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每天消耗的电比一个35 000人的小镇还要多。

城市化的熵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据联合国估算，生活在城市的近35亿人，每3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民窟那样的条件下，饱受空气污染、饮

用水污染和露天污水沟的困扰。许多人生活在受污染的土地上或住在垃圾填埋场附近。贫民窟是城市熵的污水坑，能量流动产生的废物泛滥成灾，这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城市贫民窟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死于疟疾、腹泻、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化学废料和有毒废料接触。

与此同时，人类生活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和运作的复杂化，增加了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增强了人们的自我意识，让人们更频繁地接触到其他人，也加强了人类的同理心纽带。

城市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这种温文尔雅让人联想到世界主义。尽管不是每个都市人都有世界主义情怀，但是几乎每个都市人都有一种都市情结。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英文cosmopolitanism一词来源于希腊语kosmospolis。kosmos意思是“世界”，polis意思是“城市”。文化社会学教授约翰·汤姆林森认为，成为世界主义者就是做“世界公民”。

人们常用世界主义来指代开明和对人类多样性的接纳。当城市社会结构参与远距离商贸和企业帝国建设时，人们往往能感受到世界主义。历史上伟大的商贸城市——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罗马等，一直是同理心潮流蓬勃发展的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商贸活动汇聚到一起，面对面地体验“他者”。这种接触既深化了商业关系，也加固了同理心纽带。

商业和同理心纽带间的密切关系看似有点儿矛盾，但却存在共生关系。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货币哲学》中讲道，货币是一种本票，是一个人基于建立互信的假设向另一个人匿名签发，保证在可以确定的将来的某一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书面承诺。

要注意的是，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交流的历史时发现，社会交换几乎总是先于商业交易。比如，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居民会进行精心设计的“贝壳”社会交换。他们通常划很长时间的独木舟在各个群岛间互换贝壳代币，以此加强社会信任。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商业交换总是晚于社会交换，再次佐证了一条古老的智慧：文化资本先于商业资本，商业是文化关系的延伸，因此商业不是人类事务的首要制度。

同理心和商业盟约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脆弱。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因为对他人的同情是一种无条件的馈赠，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不求回报，不考虑是否双赢。没有在同理心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信任，就没有商业交易的进行。商业交易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剥削性有可能耗尽维持商业运作的社会资本。这正是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和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

世界主义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时刻兼顾着同理心和商业敏感性。世界主义就是对“他者”持开放态度，在多元文化中游刃有余。一个世界主义者通常是具有多重身份和关系，高度分化和个性化的人。因为频繁地和各种人打交道、处关系，他们被打磨得世故圆滑和自我。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像在家一样自在。

今天庞大的城市环境就像1 000个古罗马——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巨大的公共广场上聚集，进行社交活动、商业活动和交流，彼此惺惺相惜。我们必须指出，在那些学历不高、没有技能，也没有社会背景的“不幸儿”看来，城市广场往往没有家一般的自在和包容，而有一种狄更斯式的不祥预感。

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创建一个新的大都会，一个多重身份和关系布满全球的都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世界主义者是新兴生物圈意识的先遣队。问题在于，越国际化的人，越有可能成为分配失衡的地球能源和资源的受益者。大家可以想想，全球的商务旅行者或做交易，或度假旅游，或逃到地球的另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体验异域风情和探险。也许这种表述有些夸大其词，但我很确信，如果对国际化态度进行一项调查，就会发现最国际化的态度会留下最大的熵足迹。

不过，如果说新的世界主义只存在于全球精英中，那是错误的。全世界的大都市越来越国际化——只要有移民社区存在的都市，人们就能感受到那种国际化的氛围。我所在的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郊区在短短30年间已转变成全球公共广场。

1960年，华盛顿大都会区还是一个小城，大部分是黑人社区，小部分是白人社区，人与人之间很少互动。今天，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少数民族社区的人定居在此。他们经营企业，在当地公司上班。他们的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他们将本国食品、时尚、音乐和其他文化饮食融合到该地区中，将这里的大部分地方变成多元文化带。在社区超市的收银

台听到三四种语言是很寻常的事。虽然第一代移民只在自己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活动，但是他们的儿孙辈却很自如地与不同种族背景的年轻人交往，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氛围。

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本土世界主义”。本土世界主义产生于人们在学校、娱乐场所、公司以及居住区的日常接触。这种频繁的接触，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创造了社会学家安尼克·热尔曼和朱莉·加尼翁所说的“好客文化”。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生群体，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在教室和课外活动，如体育队），所以，有更多一对一的机会去体验彼此的生活，跨过文化边界找到相通之处。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国贲发现，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是这样发展的：“日常生活融合……当一群人住在同一个社区，一起生活，一起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些相似的经历和记忆就能超越群体认同。”

加拿大地理学家丹尼尔·希伯特解释了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雪松屋（他生活的社区），世界主义是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发展的。雪松屋是一个移民社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非常类似于曼哈顿的下东区。英国、中欧和东欧早期的一波波移民现在仍然在那里居住。新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希伯特的社区里，72%的居民是移民，其中近20%是过去10年里移民到此的。

希伯特指出，在跨文化接触中，最强大的媒介之一就是当地的园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后院的篱笆边，人们大多都是在分享园艺技巧，讨论不同文化中的园艺发展。许多移民将本国的种子偷带到移民国，可以说是顺便将本国的文化根须扎在了新的土地上。希伯特认为，他的社区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生态系统，里面有卡拉布里亚的西红柿、越南的薄荷、中国的白菜和葡萄牙的蚕豆。园丁们分享他们的种子和收获的果实，也分享食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分享更多的本国文化和个人故事。希伯特说，“邻里间的日常活动”在社区创造了“一个新的微生态，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生态系统”。希伯特把这一现象称为“世界性生态”。

在地方层面上，世界主义往往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陈国贲说：“当一种文化‘潜入’另一种文化后，一半文化被遗忘，一半被改变。”

新的全球移民

随着空前的全球移民浪潮，每天有无数微观世界主义的事例呈现在人们眼前，日益彰显其重要性。相比20世纪初期全球移民的高峰，当代的移民量已经增至3倍。尽管世界人口的迁徙比例和20世纪早期相差不大，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飙升，移民量已经上升到历史最高值。在20世纪90年代，8 000多万人迁移到新大陆——算上非法移民的话，数目还要更大。

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标志，两者相互影响。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一样，今天的移民也是跟着钱流动的。为了寻找新的经济机遇，人们大规模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迁徙定居。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急剧上升。1970~2000年，国际移民人数从8 200万攀升至1.75亿，短短30年里增长超过一倍。目前世界上每35人中就有1人是国际移民。

大部分的移民在发达世界中最富裕的国家重新安家。这和早前移民大多定居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1970~2000年，迁移到北美的人数从1 300万陡升至4 100万，增加了2倍还多。迁移到欧盟国家的人数也很可观，从1970年的1 900万上升到2000年的3 300万。国际移民最大的聚居地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100万的合法移民。据估算，美国在2000年的非法移民人数约为7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墨西哥。自1990年起，80%以上的美国移民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目前，美国共接纳了全世界20%的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浪潮不断高涨，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迁徙，尤其是非法移民。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气候变化对上百万人生存的威胁，国际移民很可能会像洪水般泛滥。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早期预警信号，移民的细流变成难民的洪流，跨过大陆和海洋向西部和北部奔流而去，或是挤在卡车拖车里，或是蜷缩在货舱船舱里，在绝望的长途跋涉中寻求生机。然而，前景一片惨淡。

因为气候变化不断影响着地球，这些移民受到的不公待遇特别严重。化石燃料和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受益地区是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它们能依赖地球上的碳资本大大提升生活水平。现在能源废气二氧化碳正

转移到大气中，把地球变成温室。但是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显著影响的是南半球——世界最贫困的人所生活的地区。那是被工业时代绕开和遗忘的角落。

气候变化已经对南半球贫困地区的农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引起的旱灾、洪涝和其他极端天气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2005~2008年，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更加重了这次危机，并导致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在食品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现代农业生产都依赖石油和化石燃料的衍生产品。石油化工产品被用于化肥、农药和包装，而汽油被用于驱动农用设备，以及将粮食运输到遥远的市场。结果就是，飞涨的油价提高了世界粮食生产的成本。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了54%，谷物价格在同期上涨了92%。2006~2008年，大米价格上涨217%，小麦价格上涨了136%。

对于每天收入在2美元左右的26亿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涨价足以让他们从温饱跌至饥饿甚至死亡。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称，地球上现在有8~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

2007~2008年，街头暴乱蔓延近30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现在担心，食品价格的进一步增长，公众不断加深的愤怒和绝望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推翻政府的浪潮。

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下放正在加快人们向北半球迁移的进度。尽管封锁边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建一道围墙，把数百万贫困人口封锁在外，根本没法实施。

新国际移民在某些方面和早期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在不久之前，早期移民有时要花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去跨越大洲和大洋。而且，一旦到了新大陆，他们和祖国的亲人间的联系就少之又少。在电力、蒸汽火车、铁轨以及电报电话出现之前，相隔千里的亲人不得不依赖偶尔用马车或者帆船寄来的信，以及更原始的流动商人或其他移民带来的零星消息得知彼此的情况。遥远的距离和联系的中断使与故土的家或文化关系很快消退成遥远的记忆。移民重新开始生活，不受过往的牵绊。

今天，航空旅行变得越来越快捷，价格也相对低廉，话费和互联网服务越来越便宜，环球电视越来越普及。国际移民可以与祖国保持不间

断的联系，故土和新家的兼顾成为可能。这些离散的公共领域形成了文化的新维度。不再受地域的严格局限，文化正日益变得去地域化，且更具有流动性。一个人的存在感是一种地域归属感，但更是一种心态。文化和商业、政治活动一样，跨越了国界，变得更具全球性。

全球文化移民越来越多。新移民在虚拟的流动性和现实的流动性间游刃有余，自得其乐。他们在多元环境中进行商业活动，掌握社会话语。

对移民的陈旧看法——我们通常联想到流浪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流动的劳动力，现在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国际移民拥有多重身份，并忠实于多种文化，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许多人将钱寄回给祖国的亲人。

移民可以通过卫星收听故乡的体育和新闻广播，收看电视节目。视频、音频和文本在几秒内就能在祖国和新居住地发送传递。打折机票使移民能偶尔回家探亲，或让家里的亲人到国外来看望他们。许多移民在新大陆工作一段时间后，余下的时间就回到故乡和大家庭的亲友待在一起。

现在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承认多重国籍，这让一些人觉得很惊讶，很难以理解。事实上，每年迁移到美国的100多万人，其中有90%都来自承认多重公民身份的国家。大约有4 000万美国人合法地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多重身份和多元文化背景孕育了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和同理心的普及。通过融入多元文化，个人的自我定位更具跨文化性，因此对周围的多元化环境更具包容性和开放的态度。多元文化认同也丰富了个人的人生阅历，对他人的际遇也多了一份理解和同理心。

新的全球互动开始把世界变成一个全球公共平台，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也促进了同理心的普及。而国际移民只捕捉到了新的全球互动的一部分。

人人都是旅行者

全球旅行和旅游业是目前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单一行业，占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的10%以上，并为世界提供了8.3%的就业机会。2007年，2.31亿人受雇于该行业。也就是说，世界上每12个职位中就有1个是旅游行业的。

旅行和旅游的概念有着古老的根源。富有的罗马家庭和政府官员经常去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的海滨度假胜地避暑。但对从古至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纯玩型旅游几乎不感兴趣。“旅行”一词源于单词“辛勤工作”。以前的旅行极其艰苦，而且危险重重。直到工业革命和快捷铁路运输的出现，人们大规模的纯玩旅游才开始在英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大陆和北美普及开来。

20世纪中叶，旅游行业稳步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廉价航空的发展，旅游行业正式起飞。1950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2 500万。1980年，该数字已经飙升至2.86亿。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06亿。欧盟成为最大的旅游经济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5%。

同全球电子媒介和全球移民一样，全球旅行和旅游拓展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让成百上千万的人彼此接触。这种接触和互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概括地说，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接触中，人们渐渐了解彼此，即便这种了解只是最浅层次的。人们之间的接触越频繁，互动越深入，同理心普及的可能也就越大。

后现代主义批评者认为，旅行和旅游往往也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把一种体验变成可供利用的商业事件——一种偷窥形式的娱乐。在这种娱乐中，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和文化都成了可供买卖的商品。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恶化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体验式商业”，变成一种付费体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成为戏剧化的舞台背景，一小拨儿当地人成为有偿表演者，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游客提供观剧娱乐。本土文化变得无关紧要，只要愿意，就会降格出卖自己，去娱乐那些消费得起的人。

在一些旅游景点，本地人口甚至被排除在外，无法享受自己国家的宝藏。例如，自然栖息地——海滩、山脉、森林日益私有化，变成度假村，为有钱的游客服务，而当地居民却生活在狭小的边缘空间，几乎没有乐趣可言。旅游管理教授布莱恩·阿彻和克里斯·库珀引用地中海大片海滨的例子，“几乎一半的海岸线被酒店收购，为自己的游客服务，而拒当地居民于门外”。怀疑论者很适时地问，游客和当地人真正的互动有多

少，他们真的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但即使接受反对者提出的所有关于合法保留的观点，事实仍然是：即便是对其他文化蜻蜓点水般的接触，也往往是一次极有启发性的体验——一种让游客接触到不同人和不同文化馈赠的体验。大多数游客，甚至是享乐主义者和消极厌世者，也不禁为其他文化中的体验和互动所感动。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跨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封闭的酒店度假村和特别指定的主题景点和旅游空间，与当地居民待在一起，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刻地对他们产生同理心。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一个人一直把自己封闭在熟悉的面孔和千篇一律的生活体验中，从来没有旅行过，那么他有多大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有新的发现，又如何积累足够的新体验去提升自己的同理心呢？要体验未知，了解并熟悉他人，提升对他人的同理心，护照就是一张最好的入场券。

针对现代旅行和旅游优缺点的争辩，在这一行业刚萌芽时就没停止过。现代旅游之父托马斯·库克提出了随团旅游的想法。尽管旅游是一种商业冒险活动，但库克想通过推广人们负担得起的国外度假游，达到拓宽19世纪专业人士和英国中产阶级的眼界的目的。即便如此，某些地区对库克的欧洲大陆游还是嗤之以鼻。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库克的英国同胞从“盯着我们看，还嘲笑我们”中得到快感，而库克还可以从中收费。

尽管有很多商业批评，但人类对旅行和旅游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对探索和冒险的强烈渴望。越来越多的人想体验未知和陌生的异域风情，希望新的体验会扩大他们的视野。抱着新的开放心态接触“他者”，有一丝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气息。新兴资产阶级厌倦了工业禁欲主义那种几乎病态的不间歇工作和生产，在更多的情感邂逅中寻求片刻放松。诗人和小说家也迎合了人们对“真实性”的渴望。“真实”就是活得充实，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能与自然和周围的人良好地交流沟通。那一时期的写作强调的是旅行和探索其他地方后的“升华”、“狂喜”的感觉和情感流露。例如，曾经被视为危险禁地的阿尔卑斯山，因为华兹华斯在勃朗峰上的沉思中转换了形象。当时的旅游广告呼吁人们去“冒险”，去体验属于他们的更大的世界。威尼斯的魔力、巴黎的艺术、罗马的庄严，以及普罗旺斯的农艺乐趣让人们感觉与丰富而多元化的人类旅程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渴望与他人交流，赞美彼此的文化，为周围的自然

奇观欢欣鼓舞。这就促进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喜欢旅游，大抵出于这些考虑。

旅游也是有利有弊的。对当地人来说，旅游业创作了就业机会。除了金钱的考量外，和游客接触也让他们看到了彼此习惯上的差异。例如，当非常传统的文化对外国游客开放后，人们第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外国男女间的关系，尤其是已婚男女间的关系。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和共同参与彼此的生活，常常让当地人，尤其是当地的女性大开眼界。和外国游客的接触，不仅会导致与外国人发生摩擦，而且会引发家庭冲突，特别是在当地的母女将自己的处境与外国女游客做公开的对比时，尤其如此。当然，这种差异也会促进男女间的沟通，在彼此间引发同理心，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和游客的进一步接触和互动也会让当地人更加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文化，对游客独特的文化方式也能持有更加开放和理解的态度。与此同时，人类对友谊的渴望也促使他们努力找寻共同点，同理心也就随之产生。通常，游客从国外旅游归来，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在和当地人的短暂接触中，一次偶然的交谈或者相同的经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加固了同理心纽带。

虽然传统的主流观念认为，旅行和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但是世界各地庞大的移民社区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前面提到的，移民社区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航空、铁路和汽车在他们的出生地和现居地来回穿梭。（能源成本的上升和各种商务旅行费用的大幅增长在未来几年可能开始扭转这一趋势。）移民的旅行不仅仅是在出生地和现居地间往来，还包括定期探望亲友，以及和全球侨民网络中的大家族聚会。与传统的旅游不同，移民游客通常和亲朋待很长时间——往往一待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全球移民网中的定期旅行，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纽带。但它也有另一个目的。当移民地的成员被新大陆文化部分同化后，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新国家的文化规范和态度，并拥有了多重身份。他们的生活被打上了文化大融合的烙印，在全球的移民网中旅行时不经意地反映出来。他们走向了国际化。他们分享多元文化中的自我，既丰富了移民圈子的信息量，也加深了同理心的普及程度。因此，移民成员身上的文化多样性让移民圈子不再那么狭隘、与世隔绝，而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全球通信网络以光速将大多数人联系起来，促进了人们生活的都市化。人们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全球移民激增，多重身份和双重国籍渐成趋势，全球旅行和旅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都以不同的形式空前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虽然转型融入新的社会生活形式会有成长的烦恼，但是全球公共平台仍在迅速成为现实。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我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尽管无须赘述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以及形成生物圈意识的渺茫可能性。

同一种语言

在21世纪和如今这几代人的有生之年，我们可能会形成生物圈意识。随着席卷全球的另一种现象渐渐展开，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强。人类开始讲同一种语言，既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人际关系面，深化了人与人间的相互关联度，构建了更复杂的社会经济网，而且在全球舞台上促进了个性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的交融。

在过去的50年里，英语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语言。现在说英语的人的数量超过15亿，占全球人口近1/4，预计到21世纪中叶，说英语的人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2。英语的全球化为同理心意识的指数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有许多原因。首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媒体之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产业控制了世界电影市场85%的份额。好莱坞电影娱乐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总能学到几句英语。美国电视——尤其是情景喜剧、动作片和戏剧节目，垄断全球近半个世纪。在许多国家，电视播放的都是英语原版节目。

美国统治了流行音乐和唱片业近半个世纪。大部分全球领先的唱片公司在美国兴起。戴维·克里斯特尔在他的书《英语帝国》中指出，过去半个世纪的几乎所有大的流行音乐组织都来自两个英语国家——美国和英国。许多年轻人都是听着比尔·里利与彗星合唱团、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披头士和滚石乐队学习英语的。在1990年流行音乐的企鹅流行音乐百科全书的一项调查发现，99%的流行乐团和95%的独唱歌手完全或主要用英语演唱。

克里斯特尔指出，旅游景点的标语把英语作为通用语。为了迎合旅游业，零售店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大部分的产品说明书也采用英语版本。传统观念中，英语一直作为海上和空中运输的国际语言，分别被称为“航海用语”和“航空用语”。国际航班和游轮上的安全须知以及酒店和公共场所的应急指南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英语。到1980年，超过85%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专业论文是用英文撰写，73%的医学论文，69%的数学论文，67%的化学论文也用英语撰写的。

在许多非英语国家，英语也已成为大学和研究生院公认的教学语言——特别是在科学和商务课程中。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时代的核心媒介中，英语已经成为互联网的通用语言。“世界上所有电子存储的信息，大约80%都是英语”。

语言障碍一直阻碍同理心意识的普及进程。当然，通过眼神、肢体语言和语调，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感。人们也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感受他人的尴尬、屈辱、沮丧、悲伤、恐惧、焦虑、快乐和高兴，并做出同理心回应。

但是，语言识别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在情感和认知上理解他人困境的能力。语言加强了对他人故事的“倾听”能力，对他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手势和语调也能更精准地理解，所以更能激发人们的同理心。语言包含各种隐喻，带有人们过去的情感、情绪和经历。当听到他人用特定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状态，这些词就会勾起听者类似的记忆，激发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强烈地回应说话者。

相反，如果没办法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情况、需求或难处，不仅自己觉得郁闷，听者也会感到挫败。这是因为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可与个人的表达能力密不可分。当人们感到不被倾听，不被理解时，一种不被重视的愤怒感和渺小感便会油然而生。

知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要知道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要了解他独特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通用语言互相沟通的人越多，同理心意识普及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像部分消除经济、社会和政治障碍一样，消除语言障碍不仅让人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加依赖彼此，感受更多相同的语境，也让同理心的前景更具普遍性，让生物圈意

识更加触手可及。

虽然上述现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和令人敬畏的，但是这些现象能表明同理心的普及出现了质的飞跃吗？在21世纪，同理心也会被全球化吗？

全球同理心趋势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传统观念中，民意调查就是问选民什么品质会造就最强的领导者、最好的总司令以及最能改善经济的好手等。而在2008年，民意调查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民主党选民被问到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时，很多人没有选择“最大获胜机会”，而是选择了“同理心”。让人不解的是，将“同理心”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项特质并没有在政治专家中引起轰动。显然，政治家、民意调查机构和公众都认为同理心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质，使其可以领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再必要且正当不过的了。但是，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阿德莱·史蒂文森角逐美国总统时，这样的问题甚至都不会有人提出。

美国总统大选民调的同理心问题，反映了过去50年全世界的人类价值观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全球民意调查中历历可见。最详细的研究当属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年，研究人员开始跟踪能代表世界85%人口的80个国家的民意转变。最新的调查是在2005年进行的。在过去近1/4个世纪的跟踪调查中，英格尔哈特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意识转变。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动摇了一直以来以传统的父权为基础的世界观。

工业革命推进了公共教育和大众文化，教会人们新经济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这些新的工业技能将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旧的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以合同的形式付给人们工资，让人们变得更加独立。技能和雇佣劳动的日益分化孕育出新的个人自由和自我意识。

随着个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变得更高效，更富有，也更独立，他们的价值观取向从生存价值观转向物质主义价值观，最后转向后

物质主义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

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生存是最重要的问题，等级社会制度和专制统治制度支配一切。集体主义盛行，个人表达还处于未开发或受压抑状态。在工业社会，劳动合同保障了人们的生计，让他们不再那么依赖大家庭和政府。可以理解的是，物质资料和财富积累有利于抢占先机，而机会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当工业社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知识产业以及体验型商业发展时，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以满足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转向非物质考量——所有考量构成对“生活质量”的渴望。紧绷的共同体纽带日渐让位于更宽松的社团关系。

从传统价值观到理性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再到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这三个发展阶段反映出，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体的转型，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三个意识阶段之间，人们的价值观取向有着很大差异。在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以确定他们的价值观类型。如果他们回答“是”，他们就属于传统型，否则就被归类为世俗–理智型。受访者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1. 清晰地表达个人偏好比理解他人的偏好更加重要。
2. 如果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他们之间几乎一定会出问题。
3. 人必须永远敬爱自己的父母，不论他们的品行如何。
4. 比较倾向于赞成让军队统治国家。
5. 赞成多生孩子。

第二项调查对比了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如果受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就说明他们认同生存价值观，否则就属于自我表达价值观。

1. 在需要教给孩子的事情里，对他人有耐心和尊重他人并不是最重要的。
2. 休闲在生活中不是很重要。
3. 朋友在生活中不是很重要。
4. 拥有一位强势的领导，不受议会和选举的干扰，是一种很好

的政体。

5. 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政体。

6. 反对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有人可能认为，在比较贫穷的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生存价值观盛行，宗教关系和家族纽带在组织社会生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

更有趣的一点是，价值观从理智和物质主义到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转换十分迅速，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一进程不到40年就已完成。

1971年，在研究人员进行数据收集的6个西方国家中，物质主义者大大超过后物质主义者，人数比为4：1。但到了2005年，在全部6个国家中，后物质主义者同物质主义者的人数相当——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人们的态度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改变。

在生存型社会中，人们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生活是按照严格的独裁主义管理体系进行组织的，从配偶和子女对男性权威的绝对服从，到所有臣民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再到人类对天国上帝矢志不渝的奉献。在传统型社会中，由于受到经济困难和不安全感的威胁，人们倾向于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而坚定地支持男权思想。绝大多数人信奉宗教和民族主义，他们相信政府权威的强硬手段，强调统一顺从，个人自我表达水平很低。因为自我表达水平低，同理心拓展的范围很小，几乎很少延伸至家庭纽带和亲属关系之外。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英语中经济一词“economy”来源于希腊语单词“oikos”，意思是家庭），因此繁育后代极受重视。孩子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工作，也就能确保家庭中有更多的人可以存活。创造家庭利益对于确保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存活至关重要。与家庭生存可能发生冲突的自我表达会受到严厉的处理。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强调家庭生存，人们不能接受流产、同性恋和离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处于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世俗–理智主义型社会中，等级制度被重新配置，秩序的创造者由上帝变为巨头公司和政府官僚机构。存在巨链被公司的指挥体系所替代。个人财富的累积使人们不再靠天吃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在这一进程中，个人作为各有特色、有自制力的个体，开始从集体的迷雾中浮现出来，但仍然受制于等级制度的安排。但是，自我表达的发展推动了同理心意识的进步。

在知识型社会中，高度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展现了最高水平的同理心拓展。自我意识有助于给予他人更多的信任和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也更宽容。如果一个人自身有安全感，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就不太会畏惧他人，也不太可能将自己直系亲属圈之外的人视为威胁。事实上，当个人从紧密的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当他与社团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却越来越广泛时，他就会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社交网络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这种情况会反过来增强其信任感和开放度，同时为同理心意识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近30年对全世界公众态度和价值观的追踪调查，英格尔哈特和助手推断出一些毋庸置疑的结论。他们观察到：

> 当生存都是未知数时，文化多样性似乎是个威胁。当人们没钱到处旅行时，就会把外国人看作危险的外来者，可能抢走他们的饭碗。人们墨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道德，试图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将可预测性最大化。相反地，当人们将生存视为理所应当，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就会因其趣味性和刺激性而得到积极的评价。

据研究人员称，最关键的发现是“个人安全感能增强同理心”。

但是，英格尔哈特及其同事指出，如果增强经济保障会促进同理心的表达，那么他们的结论岂不是公然藐视了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人类境况的本质呢？如果对情感、友谊和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那么为何众多传统文化均强调物质生存，却似乎并没有准备向他人表达同理心？

实际上，在每种文化中，从最贫穷的人到最富有的人，对情感、友谊和归属感的追求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个社会都演变出繁复的仪式来建立亲朋好友的纽带，并且使用流放和充军来惩罚犯罪者。同理心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问题在于同理心得到了多大拓展或者受到了多少限制。在生存型社会中，同理心纽带比较狭隘、欠发达，只局限于非常狭小的亲属关系范围内。在传统型文化中，同理心的拓展一般只局限于父母和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其他近亲、远亲和同龄人团体成员。共同体纽带和呈等级制度的权力链条给同理心意识的横向拓展留下了极小的回旋空间。

能源/通信革命建立起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新的宇宙学理论为同理心这条想象中的纽带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巨大框架，使其能够不断拓展。神学意识使个人能够认同没有血缘关系和并不相识的他人，通过宗教关系将他们纳入其同理心所涵盖的范围内。犹太教徒之间互有同理心，天主教徒之间、穆斯林之间和其他信奉同一宗教的教徒之间也是这样。身份意识在地理上将同理心的范围拓展到国家。美国人和其美国同胞互有同理心，德国人和其德国同胞、日本人和其日本同胞，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和自己本国的同胞也是这样。于是，在每种文化中，同理心都拓展至其组织领域的边界之外。在围墙内部，同理心是存在的，只是其形式有限。而在组织边界的外部则是无人之境——那里的情况超越了同理心想象。

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同理心提升。然而，这次同理心的提升大都局限于发达国家的富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同样，同理心意识的提升是因为人类大量使用地球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经济条件的提高，人类的价值观从关注生存到物质主义，最终到注重生活质量。经济条件的提升使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更信任同伴，更关注自然世界。不幸的是，同理心意识的发展借力于熵的不断增加，而熵的增加使地球变为荒原，也使大部分人类变得更加贫穷。

调查显示，有83%高收入国家已经过渡到后物质主义文化，而74%的贫穷国家却又倒退到生存价值观文化。所以，尽管世界上少数国家和人群的价值观越来越世界主义，大部分人却与之相反。

人类已经为同理心提升付出代价——地球资源枯竭，大部分人类更加贫穷。问题在于少部分人所经历的同理心提升，是否能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为一种可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计划，带领自身和他们的群体走向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避免跌入深渊。

再无异族

尽管从宗教信仰和国家忠诚角度来讲，“异族”的范围已经缩小，同理心的范围得到拓展，但直到最近，许多群体仍属于异族。不管在何处，只要是父权社会占主流，女性、同性恋者、残疾人以及宗教信仰相

异、民族和种族不同者，仍会被视为异族。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

一项全球性的调查表明，过去40年间，人类对上述群体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中对女性态度的改观最为显著。长久以来一直到工业时代，女性都被视为一种财产。在我的母亲还是一个孩子时，美国的女性仍没有投票权。

现如今，绝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性别差异已经显著变小，女权运动也拓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对当地传统的两性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了避孕措施，接触全球性媒体，这些都促成了这种观念的改变。

在性别问题上，两性关系最平等的社会大多是富裕的国家。芬兰、瑞典、加拿大和德国在性别平等上都名列前茅。像巴西和墨西哥这种发展中的工业国家，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也有所改观。一些贫穷的农业国家，诸如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摩洛哥，人均收入低，仍维持着传统的父权文化。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女性运动也逐渐深入开展起来，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的转变，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2008年，在一项涉及16个国家的投票中显示，“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是重要的”。86%的成年人认为，“女性享有平等是重要的”。59%的人认为，女性享有平等“非常重要”。令人惊讶的是，较为贫穷、传统的国家强烈支持性别权利——这个结果似乎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大相径庭，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来看，较为贫困、传统的国家并不太支持性别权利。

根据最新的全球调查，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尽管不如多数先进工业国家那么强烈地支持性别平等，但其态度也是相当支持的。71%的印度尼西亚公众认为，性别平等非常重要或者比较重要；在中国，这一比例是76%；土耳其的比例是80%；墨西哥的比例是89%。即便是在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支持率也很高。伊朗（78%）、阿塞拜疆（85%）、埃及（90%）、巴勒斯坦（93%）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大部分人认为，在他

们的生活中，“和男性相比，女性已经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

2003年，一份涉及44个国家的38 000人的皮尤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女性似乎比男性对生活更加满意”。较男性而言，女性似乎对最近几年取得的进步更加满意。在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包括尼日利亚这种较为传统的社会，相比男性，更多女性认为“自己比5年前过得好”。

皮尤调查了14个国家的男性与女性对民主的看法，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占大多数或者穆斯林属于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马里、塞内加尔、乌兹别克斯坦、巴勒斯坦、摩洛哥、科威特，以及在加纳、象牙海滩、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少数民族穆斯林也接受了此次调查。调查表明，“不论男女，大部分人都认为民主在自己的国家是可行的”。在6个国家中，大部分人说：“在所居住的国家，可以公开表达你的意见，批评政府，有新闻自由以及公平诚实的选举，这些很重要。”

然而，女性和男性在“是否应允许女性外出工作”的问题上观点相左。在孟加拉国，57%的女性赞成这个观点，但只有36%的男性赞成这个观点。在巴基斯坦，41%的女性强烈赞成，但只有24%的男性赞成。

大多数传统国家赞成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全球对性别问题的态度转变不容小觑。这代表了与父权观念和态度的决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种想法一直阻碍女性被认可为一个完整的人。工业国家发生这种转变还不到100年，现在世界上更为贫困的国家也在发生这种转变。承认女性和男性一样，是拥有同样的自我价值的人，使同理心意识有可能拓展到人类1/2的人口，这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最近几十年来，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电影《断背山》讲述了两个牛仔间困扰的爱情，25年前，上映这种电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尽管时至今日，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冒犯无礼，令人作呕，但是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电影爱好者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对这对爱人的困境和挣扎感同身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八大浪漫电影之一。

电影和电视对同性恋做出正面描绘，在向公众展示同性恋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电视喜剧《威尔和格蕾丝》的主角是同性恋者，连续8季这部喜剧都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数百万美国人惊讶地得知，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兼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在一次参加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时宣告了自己的性取向，后来又在电视喜剧《艾伦》中扮演艾伦·摩根这一虚构的角色。尽管有少数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指责了她，但是，美国多数公众赞赏艾伦坦白性取向的决定，仍是她的忠实粉丝。正是她的公开宣布性取向的行为鼓励许多普通人公开性取向，全美上下，人们在餐桌前纷纷讨论家里的同性恋亲属。

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大多数州仍将同性恋性行为写入法律，同性恋性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这样的法律令人发指。目前，接近一半的美国人（47%）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有89%的人认为，同性恋在劳动待遇上应享受同等权利。在争议性更大的问题，即同性恋是否能够在学校教书上，接近2/3的多数人（62%）认可这一观点。

对同性恋观点的转变在一个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同性恋婚姻或民事结合是否应该合法。可能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令人烦恼，更能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了，因为异性恋家庭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一点是以神学意识为基础的。

在2000年，佛蒙特州成为美国第一个赋予同性恋者民事结合权利的州，后来又有几个州效仿。尽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但根据2009年“福克斯新闻/观点动态投票”结果显示，33%的人认可同性恋婚姻，另有33%的人认可同性民事结合。

2005年，加拿大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欧盟的人们似乎对同性婚姻最为宽容。荷兰已经规定同性婚姻为合法，82%的人认可这种结合。瑞典、英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也已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欧洲东部和中部的民众对这项提议似乎没那么支持。

即便是在南美更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同性结合合法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2007年，哥伦比亚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颁布法律认可这种结合的国家。

就全球范围而言，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千差万别。皮尤调查中心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中表明，在44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西欧国家对同性恋问题持最为开放的态度。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有3/4的人认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然而，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却对同性恋持压倒性的否定态度。

即便是在同性恋是否能在军中服役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上，也有60%的美国人赞成这一惯例。

在所有国家，残疾人向来被视作一个被抛弃的团体。在中世纪的欧洲，精神病人以及身体残疾者饱受癫痫折磨，无法控制的肌肉和身体动作，经济被视为被魔鬼和恶魔的附身。残疾人一直以来都被虐待和忽略，常常被锁在偏远的地方，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危害或传染公众。尽管人们也可怜残疾人，但他们通常认为残疾人低人一等。人们很少认为残疾人有和“正常”人同样的价值。

在大多数国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残疾人一直处在这种困境中。因为他们被社会排斥，大部分人和残疾人的接触有限，也无法和残疾人发展感情，产生同理性纽带。尽管很多家庭都有身患残疾的亲戚，但是这个污点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尴尬，是一个避讳的话题，特别是和邻居和同事一起时尤其如此。

人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就和对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态度一样，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众的观点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父母和残疾人活动人士开始要求让残疾学生进入公共学校教堂学习。此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有残疾孩子都在为“残疾人”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中接受教育。残疾孩子的父母和进步主义教育者认为，把残疾孩子同普通孩子和普通社会生活分离开来，会使残疾孩子受到侮辱。继续隔离残疾孩子意味着其他孩子无法接触他们，也不太可能和他们发展友谊并建立同理心纽带。他们认为，特殊教育加深了畏惧残疾人的传统观点，并把残疾人长期归于被遗弃的群体。

今天，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数残疾儿童（除了那种有严重缺陷的）都到公共学校学习，尽管他们在上学时可能也会参加特殊教育课程。此前，特殊教育教师担心让残疾孩子接受普通学校的环境，可能使他们受到同学的戏弄、嘲笑和欺负。随后的研究显示，如果学生事前有所准备，并且老师在对待残疾学生和非残疾学生上，行为举

止得当，做出表率，残疾同学通常会被欢迎、被接受，并融合到同龄人当中。

和全纳教育一样，国家在确保残疾人平等权利和残疾人能平等地获得服务的立法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使残疾人融入更大的群体中去。原来的残疾人与世隔绝，现在许多国家，都可以在购物中心、电影院、饭店和其他地方看到残疾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保护残疾人在劳工问题上不受歧视，许多残疾人也有了工作。

残疾人和健全人一起工作，破除了一些由来已久的讹传和谬见。雇员有机会和残疾人共事，从而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了解。残疾人也会经历各种生活故事和情感起伏，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有缺点、恐惧、偏见、渴望和期望，和所有人一样。这种社会交往可以把同理心纽带拓展到这个之前曾被孤立并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群体。

这种转变不是随便发生的。与近期历史上其他社会运动一样，残疾人激进分子和相关组织迫使公众关注残疾人的困境和要求。“被遗弃”的群体对社会来说正是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这些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近乎是透明人的。尽管从物理上而言，他们是存在的，并从事着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但人们并未关注和聆听残疾人。他们的生活对别人而言，多是一种干扰，甚至更差，简直是不存在的，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生活，思考他们的生活。我记得残疾人激进分子坐在轮椅上，到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游行，他们堵住路口，挡住高峰时期的车辆，公开抗议残疾人无法使用公共交通，以及公共建筑等地缺少缘石和通道，轮椅无法通过。在早期的抗议开始时，人们从未意识到公共广场上很少有残疾人的身影。这些残疾人先是取得了我们的关注，接着又和我们互动，最后获得我们的喜爱和陪伴。他们的行动主义改变了社会等式。

对同性恋看法的转变以及对残疾人的重新诠释——反映出他们和其他人所共有的人性，使大众更明白，更清楚，更理解，也更愿意设身处地的感受残疾人的困境，这是通过打破固有形象实现的。

在唤醒公众对残疾人困境的关注上，电影和电视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年前，我曾坐在一家满座的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面纱》，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洛基·丹尼斯的青少年，他的面部严重残疾，和妈妈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守旧习的人，由雪儿扮演。长期以来，人们都觉得这位年轻人呆呆的，会取笑他，歧视他，但是他却尽自己所

能，克服困难，用自己的人性之光温暖别人。其中一个场景是，他和一位美丽的盲女坠入爱河，这个女孩“看到”了他的温暖和细腻。他们的爱却被女孩的父母阻挠，因为他们憎恶洛基是一个残疾人。

洛基死于残疾，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人性光辉却感动了无数的人，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同理心纽带。电影结尾时，观众的心情非常激动，他们泪眼婆娑，起立向电影致敬。这个故事激起了强烈的同理心回应，并感动了每一位观众。

其他票房大片，像讲述自闭症患者的电影《雨人》，关于智力障碍者的电影《阿甘正传》，关于一所聋人学校的电影《悲怜上帝的女儿》，根据约翰·福布斯·纳什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美丽心灵》。纳什患有偏执型分裂症，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部电影曾感动了全世界数百万的观众，并改变了大众对残疾人的态度。

全球媒体已成为一个有力的交流工具，以积极的话语，重新诠释此前“被抛弃”的群体，为数百万人打开了通往同理心的大门。

宗教的衰退

对被抛弃的群体更为宽容，同理心纽带拓展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伴随这种转变的是在这个相互联系愈发紧密，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个人意识和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数以亿计的人在各种紧密相连的网络——社交网、经济网和政治网中互动，这种复杂的全球化文明需要开放的精神，不加偏见的观点，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欣赏和对在其他人身上找寻共同之处的不断渴望。拓展同理心纽带是建立一个千百万人的全球网络的社会黏合剂。

这可能并不奇怪。在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非常常见，而古老的神学意识正在失去掌控优势。神学意识强调严苛的外部规范，共同的联系，以及有组织、等级森严的指挥控制。宗教等级在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世界中越来越没有意义。

过去30年中世界范围的调查表明，在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传统宗教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农业社会中，44%的公众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仪式，而在工业国家中，不到1/4的人每周参加宗教仪式，在后工业社

会只有1/5的人每周参加宗教仪式。同样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超过半数的人定期祈祷，在工业国家只有1/3的人定期祈祷，在后工业社会是1/4。更重要的是，贫困国家2/3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工业国家中只有1/3的人同意这个观点，后工业国家中只有1/5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

在这些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年纪稍长的美国人仍持有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但年青一代的美国人显然没有那么传统。一些分析师提出，美国青年和其他世俗国家的青年越来越像。

所有有关全球民众观点的调查都表明，在年青一代中，宗教都在衰退。尽管所有科技发达国家的传统宗教都在衰退，精神性却在上升。精神性是指个人在广阔宇宙中对个人意义的探求。自1981年起，全球价值观调查一直在跟踪这种向精神性的转变。那些接受调查的人被问道：“你是否思考过，以及一般多久思考一次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常常、偶尔或者从未思考过？”回答“常常”的人的比例在显著上升。1981年，加拿大有37%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2%的人回答“常常”；在意大利，1981年有37%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0%的人回答“常常”。即便是在中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在上升。在南非，1981年有39%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4%的人回答“常常”。自1999年以来，称自己“有精神上的思考，但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增长了10%，2006年，美国有40%的成年人自认“有精神上思考，但无宗教信仰”。

精神性思考的发展和宗教的日渐式微，暗示了向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转变。年青一代对于不加质疑地忠于古老的宗教教条越来越不满，他们更愿意思考自身的精神之旅。

从宗教到精神的转变表明，一个古老的藩篱正在崩溃，这个藩篱曾将“真正的信仰者”和“异教徒”分开。数百万的人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不太会被传统的宗教和排他性的偏见所困，对于其他人对生命意义和生存目的的追寻更能产生同理心。

但是，在我们急着宣布大同时代的来临之前，必须记住，人口统计学的现实正在干预甚至抑制日益流行的世界主义意识。有一个古老说法是，人口统计学的结果是天命。这对于生物圈意识的建立可能是一个决定因素。

尽管在科技发达的工业国家，年青一代的自我表达和精神性增强，世界主义流行，人们对他人更为宽容，同理心纽带加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却在迅速下降。尽管全世界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发达工业国家的生育率是在“跳水”。这些国家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1.8个孩子，在那些更为贫穷，更为传统，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女性平均每人生育2.8个孩子。

目前，有20亿人生活在世俗社会中，17亿人生活在更传统的宗教社会中。这些世俗国家在过去30年间人口增幅仅为41%，而那些更为贫穷，更为传统的国家人口却增长了82%。这种人口变化趋势表明，除非未来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生育率发生显著转变，不然在21世纪中叶，宗教社会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世俗社会。

最关键的变量是，贫穷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与富裕国家学会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是否能同时实现。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实现的话，出生率可能会稳定下来。贫穷国家的经济改善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上的两性平等——尽管在波斯湾少数富裕的石油产出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人口统计学数据清楚地显示，向工业社会生活的稳步迈进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与此同时，女性有更好的工作前景和独立性，这些都意味着她们会生更少的孩子。

家庭全球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种疆界将不同背景的人分离开，现在这种疆界已经开始消失，而排他性最后的堡垒——家庭，也正在经历同样狂风骤雨似的变化。

如同学校、工作场所一样，家庭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宽容。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更为开放，互动性更强，这势必会影响到生活中最为私密的方面。新的家庭身份在宗教、文化和种族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并且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小型移民社群。

在我父母生活的年代，如果一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将被视为一种耻辱。这样的结合不被赞同，夫妻双方的家庭可能都会和他们断绝关系。今天，年龄在55岁以上的犹太人中，超过20%的人和非犹太人结婚。35～54岁的犹太人有37%和非犹太人结婚，而年龄在35岁以下的犹

太人中，和非犹太人结婚的人的比例超过41%。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结合也在迅速上升。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种结合少之又少，在美国南部尤是如此，因为南部浸礼会教徒和天主教徒摩擦不断，对天主教徒的歧视也很平常。如今，有50%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结婚。

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22%的夫妻或同居伴侣持不同的宗教信仰。

跨民族的婚姻也在迅速上升，这种趋势和现在这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保持同步。举例而言，奥地利在传统上是个十分偏狭保守的国家——除了维也纳，但2002年的一项报告显示，有24%的婚姻涉及异国伴侣。2001年，近14%的法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同年，瑞典人中有20%的人和外国人结婚。

在婚姻模式上，德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1960年，几乎每对伴侣都是德国人，每25对夫妻中，只有1人是在外国出生的德国籍。到了1994年，7对夫妻中，1位或1对夫妻出生在外国。同样，1960年，只有1.3%的新生儿家长是外国人，到1994年，18.8%的新生儿有一位在外国出生的父亲、母亲或一对父母。从传统上说，德国是一个一元国家，而现在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文化多元性的国家。文化之墙的倒坍与民族身份的融合，使先前相互分离的个人，相互疏离的文化融到一起，缩小了“他者”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那种——拓展的家庭中的范围。这种情况发生时，越来越有理由用同理心意识去解释。

甚至在日本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排外、最封闭的国家，2004年，每15对夫妻中就有一个外国人。大部分的涉外婚姻都是一个日本男性和一个外国女性，她们多为中国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的后代。

在美国，2/3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结婚。

说到“异族”通婚，在美国最后一种禁忌的婚姻关系可能是白人和黑人的结合。1967年，好莱坞发行了一部名为《猜猜谁来吃晚餐》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黑人男孩受邀到白人女朋友家吃饭的故事。影片的关键之处在于，女孩并未告诉父母，自己的男朋友是黑人。这部电影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年，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废除异族通婚法，这条法律曾禁止异族通婚。41个州曾一度将禁止异族通婚写入法律。

若想了解这项法庭决定的重要性，请想象一下，仅在9年之前，195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两个黑人男孩，一个7岁，另一个9岁，只因一个白人女孩亲了他们中的一个，两个男孩便被逮捕，定罪并判处入狱12～1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出面干预，确保释放两个孩子。

在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上，公众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87年，只有48%的美国人同意“我认为黑人和白人约会没有问题”的说法，25%的美国人认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到了2003年，7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黑人和白人约会没有问题”。而对于异族通婚这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观点上的改变则更为显著。1958年，只有4%的白人同意黑人和白人的异族通婚，到1997年，这一比例增至67%。

今天，10个美国人中有4人曾和异族人约会，有3人和异族人有过恋爱关系。

异族间约会，对出生于1976年后（Y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多达91%的Y世代年轻人认为“可以接受和异族约会”，而长辈一代中只有50%的人这么认为。

这种观点上的转变在美国异族婚姻的数量上有所体现。1970年，只有不到1%的婚姻是异族结合。到2000年，异族婚姻的数量上涨到5%，到2005年，在美国5 900万对夫妻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与此同时，50%的35岁以下已婚亚裔有异族伴侣。

2008年，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在自传中透露，在20世纪70年代，她曾和马萨诸塞州黑人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有过一段情。当时她被警告，不要把这段恋情公之于众，否则可能遭到强烈反对，影响两人的职业生涯。现在，大多数美国年轻人都会认为这种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美国名人的婚姻都是黑人与白人的结合，包括前美国参议员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民权运动领袖朱莉安·邦德、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科恩、演员罗伯特·德尼罗。

异族通婚生育出的孩子也越来越常见，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贝拉克·奥巴马和泰格·伍兹。美国有超过300万的异族混血儿。

异族通婚使同理心纽带得以拓展到30年前无法想象的领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麦克尔·罗森菲尔德通过观察发现，“种族上的分隔是一种根本性的分隔，但是当你的家庭里有‘异族’时，你就很难把他们当作‘异

族'了"。超过1/5的美国成年人（22%）表示他们有亲戚和异族人结婚。当两个不同种族的人，或者说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结婚，他们把两个人的亲戚，以及亲戚的朋友都联系起来了。"我们"的范围拓展了，人们得以和更多的人接触。随着人口在文化上、种族上更加多元化，家庭变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家庭中探索共通的人性。

对其他物种心怀同理心

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对女性、同性恋和残疾人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跨宗教、跨民族和跨种族的约会及婚姻显著增加，这些都充分表明原来将人们分隔开来的传统边界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具世界主义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同理心意识得以拓展到崭新的领域。

同理心意识的拓展并未在人类思维的最后一个据点前停下脚步。现在有一个运动正在兴起，可能将人类的同理心延伸到人类自身之外，对其他地球生物也怀有同理心。对其他生物怀有同理心这个理念非常具有争议性，一些人觉得这是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很荒谬。充分运用想象力，将其他物种视为我们的同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我们人类和其他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是何种关系。

19世纪，随着英国和美国相继成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人们也开始注重动物福利及动物保护事业。现代世界的环保运动正是发生在20世纪早期。在进步时代，保护自然栖息地和珍贵物种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部分，目的在于以更有效、更合理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然而，时至今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主流的环保运动仍然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它们主要是为人类利益而考虑的，是为了给人类留下适量的自然资源。地役权和一些保护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

黄石公园、约塞米蒂公园、阿卡迪亚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等美国大型国家公园都是在19世纪末期以及20世纪初期建立的，政府希望借此保护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建立的理由也包括审美的需要——要保护美国天然遗迹的雄美，使人们可以享受这种美景。

现代生态运动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末。1970年“世界地球日”设立后，这项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人们不仅承认物种的功利价值，还承认物种具有内在价值，应该受到人类的尊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应该优先保护自然珍稀物种还是优先发展经济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过。西北太平洋沿岸树木砍伐情况严重，是否要保护濒于灭绝的北方斑点猫头鹰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讨论，人们纷纷讨论是否应该为了拯救一个物种而让数千名伐木工人失业。同样，捕鲸活动威胁到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哺乳生物，来自挪威和日本的捕鲸人与环保激进分子势不两立，这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公共讨论。

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辩论的焦点问题是生态系统的变化态势和保护物种栖息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因为保护动物栖息地也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即使关于物种根本价值的讨论，更多的也是关于它们在各种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而非关于它们自身存在的权利。这并不是说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不是激励人们的一个重要主题。年青一代的环保主义者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深深的亲近感，爱德华·威尔逊称之为亲生命性，他们心怀热情想要和他们的同类生命密切交流。但是，在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中，理性功利主义的观点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动物权益运动突然而有力的兴起算得上是最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进展了—40年前这股力量几乎不存在。

我的妻子卡萝尔·格鲁内瓦尔德很久之前就是一名动物权益保护者，她提出的论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她认为，传统环境保护组织的参照标准都比较抽象，关心的是所有物种的福祉，而动物权益保护运动则不同，其出发点是一种深刻的情感承诺，希望能减轻个体生命所遭受的痛苦，认为所有生命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以各自的生命形式生存和繁衍。虽然动物权益保护者承认其他生物的权利在程度和种类上同人类的权利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坚定地相信，每个个体的生命旅程都和人类个体的生命旅程同样重要、意义非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项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就像两艘在黑夜里航行的船只一样没有任何交集。即便到了今天，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微乎其微。虽然在事实上，动物权益运动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更为广泛的环境问题，因为动物权益保护者们不断意识到，动物个体所遭受的痛苦和影响它们生活的宏观环境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而环保主义者们也开始对个体生物的权利给予某些程度的承认。一些国际组织，比如

绿色和平组织，也开始抗议对个别动物造成的伤害，他们参与到反捕鲸运动中，也对加拿大每年惨无人道地大规模屠杀海豹幼仔进行抗议。

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益保护者之间的分歧就像旧的思想意识和新兴的生物圈意识之间的分歧一样，前者强调理性、实用和效率，而后者则是基于个体参与、情绪认同和同理心的拓展。

人类同动物在情感上的亲近由来已久。不过直到20世纪，作为新兴媒介的电影才让数百万人同动物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虽然这种情感是间接性的。于1938年出版并在次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鹿苑长春》，在1946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大荧屏，向全世界的观众放映。

故事所围绕的主线，是一名生活在美国偏远农村的少年和一头失去母亲的小鹿之间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而当时美国西部边疆地区残酷的生存现实逼迫着少年在家庭的安全和小鹿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数百万电影观众泪洒影院，因为他们对少年的困境和其动物伙伴的命运产生了同理心。一大群人在公共场合分享这样的经历，帮助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发现的、对其他生命的同理心是合情合理的。

沃尔特·迪士尼的作品大都也采用相似的主题，尤其是动画电影《小鹿斑比》。这些作品帮助几代青少年习惯于间接性地体验同其他生命之间的同理心纽带。

评论家们称，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纽带情感化和人格化，不仅是对其他生命的不准确描绘，同样也弱化了将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分离开的残酷现实，这是对自然的“迪士尼化”，将其变为童话。的确如此！但是，电影中的此类描绘同样唤醒了数百万青少年和成年人，启发他们富有同理心地想象其他生物的生存困境，从而为人类意识开启了新的同理心领域。

事后看来，人们发现迪士尼对动物的刻画比当时很多科学专家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相信动物不仅仅只是拥有机械性的刺激–反应系统，受困于本能的行为规律，以及不能够从行为中学习或者体验情感。

20世纪90年代，一种全新类型的动物电影，比如《小猪宝贝》，以及电视频道，比如动物星球和流行的电视节目，比如《鳄鱼猎手》，都唤醒了数百万人内心热爱生命的本性。

媒体对动物的热衷反映出当时人类与作为其伙伴的动物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互动。仅仅在美国，宠物行业的规模已经暴涨至每年380亿美元。有63%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只狗、一只猫或者其他非人类的家庭伙伴。根据一份最近的调查，在69%以上的美国家庭中，狗和猫每天晚上都和主人一起在床上睡觉。

媒体的宣传以及人们在家中同其他动物重新建立的亲近关系，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其他物种所处困境的认识和敏感度，同样也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保护其他物种。根据2008年盖洛普关于如何处理动物的调查，公众中64%的受访者赞成“在如何处理农场动物方面制定严格的法律”，38%的受访者同意“禁止包含动物竞争的体育运动，比如赛马或者赛狗”，3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禁止“在实验动物身上进行一切医学研究”。对于动物权利这一中心问题，25%的美国人相信“动物应该拥有和人类完全一样的权利以免遭受伤害和利用”，而72%的人相信“动物应该受到一定的保护以免遭受伤害和利用，但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它们仍然是恰当的”。

保护动物权利的情感在欧盟国家更为高涨，导致欧盟在立法上有里程碑式的进展。欧盟在保护农场动物方面拥有全世界最严格的法律，并且在世界上首次发布政府指令规定“必须努力研究能够代替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法”。

这并非只是出现在美国或者欧洲的现象。2005年，有人在中国、韩国和越南进行了一项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在这几个国家中，人们对动物的态度应该不如美国和欧洲，但调查结果显示，这几个国家有90%的公众相信，“我们有道德责任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动物的痛苦”，而且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支持立法保护动物。

我们必须记住，仅仅在50年前，这些关于其他生物权利的观点在公众意识里几乎完全不存在。当一小部分美国人表示支持为动物福利保护设立最低标准时，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动物也有情感和权利”的想法纯粹是疯言疯语。

近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其他88所美国法学院都已经开设了关于动物权利的法律课程。欧盟已经在法律上认可动物是能够感知的生物，拥有情感和意识。2002年，德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确保动物权利写入宪法的国家。2008年，西班牙议会成为世界上首

个准备立法授予类人猿一定的法律权利的立法机构，这些类人猿包括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

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衡量儿童同理心的研究发现，跟宠物情感更深并对动物有更高同理心水平的儿童，在对其他儿童的同理心方面得分也比较高。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如果儿童早年就接触动物并担负起照顾动物的部分责任，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以友好亲切的态度和行为来对待同龄人。

治疗师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动物同伴来帮助唤醒问题儿童的同理心意识。少管所已经同当地的人道主义组织一起开展项目，让监狱里的青少年罪犯帮助训练流浪狗，让它们做好被收养的准备。和动物培养亲密的关系能够让青少年，特别是男性青少年表达温柔、传递关心和同理心，而当他们在大街上和同龄人在一起时，这样的表达和传递方式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这种新发现的情感表达常常能够极大地影响具有暴力和攻击性行为的年轻人，使其行为向更亲近社会的方向转变。

将同理心拓展到全部生命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动物权益运动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它可能预示着同理心时代的到来。

全球同理心的六度分隔

如果人类和动物之间建立起了强烈的同理心纽带，这种纽带是否有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拓展到全世界，并在发展过程中势头渐猛，甚至有潜力改变整个人类的意识呢？就在几年前，仅仅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就会遭人嘲笑，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禁忌。但现在，虽然在这一方面持怀疑态度者的数量仍然大大超过持乐观态度者——我也不确定自己支持哪一方，但全球网络联系取得的新发展表明，我们已经可以设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人类思维模式会发生变化，全球意识也会达到一个转折点。

信息技术研究者们也在社交网络理论这一前沿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像聚友网和脸谱网之类的社交网络、维基百科之类的教育性网络和Linux之类的商业网络都已经开始体现出了人们所说的“六度分隔理

论”。他们所探索的东西从其寓意上来说完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六度分隔理论，亦称“六度空间理论”，认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5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5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换句话讲，六度分隔理论认为地球上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只有“六度分隔”，即如果一个人距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有一步之隔，距自己认识的人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有两步之隔的话，那么他或她距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平均只有6步之隔。也就是说，今天地球上活着的所有68亿人都可以通过6个左右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

作为已流行了80年的民间说法的一部分，六度分隔理论是在1929年由一位匈牙利作家弗里吉斯·考林蒂在其短篇小说集《万物皆不同》中提出的。他在其中的一篇小说《链接》中提出，得益于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科技发展，空间距离被压缩，时间被缩短，人们也可以通过更加密集的社交网络进行交流。因此，整个世界在缩小。所以，其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认为世界上的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可以通过5个左右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人物还继续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他们的设想：

> “我们中的一个人提出进行以下这个实验，来证明地球上人们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我们要在全世界的15亿人中任意选一个——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他跟我们打赌，通过不到5个人，其中一个是他自己的熟人，他就可以与那个被选中的人联系起来。除了那个熟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他无须借助任何工具或手段。”

考林蒂的设想激发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对社交网络的研究热情。迈克尔·古尔维奇在其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做了一项关于社交网络的实证研究。之后，奥地利数学家曼弗莱德·柯赫尔继续发展了古尔维奇的研究，在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一项六度分隔理论的数学外推法。柯赫尔总结道，在一个人口规模与美国相仿的国家内，如果没有任何的社会限制，“基本上可以肯定，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可以通过至少两个中间人取得联系”。

纽约城市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哈佛大学的杰弗里·特拉弗斯在20世纪60年代跟进了古尔维奇对“社交网络”理论的研究。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表明，人们平均通过比5个人多一点儿的熟人关系就

可以相互联系起来，至少在美国是这样。1978年，米尔格拉姆在《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帮助创立了现在关于这个理论的流行说法。

六度分隔理论成为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主题。1993年发行的电影《六度分隔》便是票房大片，而最近的一部电影《通天塔》同样也十分卖座。美剧《六度空间》也同样运用这个理论作为剧集的背景和情节主线。

然而在科学界，这个理论却已经声名狼藉，一些批评家们嘲讽其为“学术上的都市传说”。这种不信任在2007年遭到了由计算机科学家尤雷·莱斯科韦茨和微软研发员埃里克·霍维茨共同合作的一项研究的迎面一击。他们分析了全球1.8亿人的300亿段对话的即时电子信息，证实了地球上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只有6.6度分隔，从而证实了六度分隔理论。霍维茨说道：“这令我十分震惊。我们所看到的结果表明，人类当中可能真的存在一个社交联系常数。”研究者们总结道：“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通过全球范围的社交网络来证实特拉弗斯和米尔格拉姆提出的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

信息科技领域、通信领域和社交网络理论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因这一发现而倍受鼓舞，他们表示可以对六度分隔现象加以运用，以便在自然灾害援救或在实现一些政治、社会目的时能够快速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霍维茨也设想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通过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空间创造一个巨大的、由人组成的关系网络，仅仅按一下回车键，这些人就都可以被调动起来”。

忽然之间，快速飞跃到生物圈意识的潜在性，也变得似乎没有那么不切实际或遥不可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同性恋者、残疾人以及其他之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其他物种的加入，以及跨宗教、跨文化、跨种族的恋爱和婚姻的增加，使这些群体快速扩大，从而在未来囊括更大一部分人群，尽管同理心意识已经因此得以拓展。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科技空前发达，而且文化、社会、经济和交流网络日益全球化，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同理心意识迎来了新的发展。

当前，新的通信手段和信息技术使六度分隔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成为可能。全球通信网络使我们可以设想“同理心加倍效应”的出现，在此

效应下，同理心的每一次大幅提升都使人类更有能力超越那些导致他们相互分离的传统界限，扩散并影响到无数其他人的生命，并迅速影响到全人类。

即便生物圈意识不是即将实现，那也离我们只有六度之遥了。这六度分隔也使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显得没有那么令人望而却步，但我们能否及时实现这种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与地球生物圈建立一种更可持续的关系呢？然而，当人类的生物圈意识逐渐形成之际，气候变化似乎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加剧，这不禁令我们感到困惑。我们能否早日实现生物圈意识，以避免全球变暖带来的更多极端影响呢？

第12章 地球之熵的深渊

21世纪上半叶，人类的石油时代已日薄西山。全球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持续大幅波动，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石油行业将会迎来巅峰时刻。今天，煤、石油、天然气仍然是世界上的主要能源，但人们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识到了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阻力。与此同时，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造成全球气温上升，可能带来前所未见的全球气候变化，这对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未来都是不祥的信号。

以化石燃料为能源的代价越来越大，地球的气候和生态遭受愈加严重的破坏，两者将影响和制约人类在下半个世纪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每个国家和行业都必须扪心自问的一个经济问题是：随着化石燃料的外部性和缺陷性日益显现，逐渐超过了其潜在利益，固有的能源机制日趋式微，在未来数十年间，如何打造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呢？

生态系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加快了人类进行超大规模迁徙的步伐，这些“环境难民”逃离生态脆弱的地区，寻找食物、水和新的居住地。据估计，目前他们的数量大约在2　500万，到21世纪中叶，环境问题预计将导致多达2亿或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2007年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终于发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第4次评估报告。这要归功于来自130多个国家、横跨各个学科的2　500位科学家。多年来，他们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运行电脑仿真模型、发表研究成果，最终汇集成这个有关地球生物圈的最详尽的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正在影响地球本身的气候和化学反应，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物种构成威胁。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表示：“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百万分之280上升到2005年的百万分之379。”如今，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远远超过了过去65万年的自然变化范围，科学家研究南极冰芯样本后发现，过去65万年间，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处于百万分之180到百万分之300之间。”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还多，其在大气中的浓度“已从工业化前的约10亿分之715增加到2005年的10亿分之1 774”。跟二氧化碳一样，今天大气中甲烷的浓度“远远超过过去65万年间甲烷的自然变化幅度”。

第三种主要的温室气体是一氧化二氮，其浓度由工业化前的10亿分之270增加到了2005年的10亿分之319。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近300倍。

这三种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越来越高，使太阳辐射达到地球后产生的热量滞留在地球的大气层中，无法返回太空，导致地球大气层迅速升温。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提供的数据，自1850年开始对气温进行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年份中，1995～2006年的12年中就有11年上榜。

工业时代的熵账单

全球变暖是为工业革命付出的昂贵账单。为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我们燃烧了大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热力系统中的熵）在大气中增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无形的玻璃罩，使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向外层空间发散，其结果是地球表面变热。

碳基燃料的首要消耗者是建筑，主要以用电的形式。在美国，建筑大约消耗了36%的总能量和65%的电能，向大气中排放了30%的温室气体。

化石燃料时代同样也带来了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还有意义深远的人类饮食结构变化，因为饮食中更普遍地出现了用谷物饲养的肉类。现代畜牧业，尤其是牛的饲养，除了产生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还制造了大量的甲烷，已经成为全球变暖的第二大“凶手”，仅次于建筑业。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获得者拉金德拉·帕乔里呼吁消费者减少肉类食品的摄入，并以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了。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牲畜排放了18%的温室气体，比交通运输领域产生的温室气体还要多。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有9%是由牲畜（主要是牛）产生的。此外，它们还产生了比例更大的、温室效应更强的温室气体，如65%的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一氧化二氮，其主要来源便是这些牲畜的粪肥，37%的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甲烷也来自牲畜。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21世纪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会翻一番，将很可能导致地表温度升高2～4.5摄氏度（最可能上升3摄氏度）。然而，科学家们依据一些预测模型提出警告，地球升温可能“远远高于”4.5摄氏度。

其他的一些气候变化模型预测的情景比这更可怕。来自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麦尔斯·艾伦与英国其他几所大学以及著名的哈德利气候预测与研究中心合作，首次开展分布式计算气候变化模拟项目，利用9万台个人电脑对全球气候未来的变化进行了2 000个以上不同的模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气候模拟研究。在此之前，使用超级计算机进行的械模拟从来没有超过128个。这次大型研究的结果刊登在2005年的《自然》杂志上。在受到诸多争议的同时，他们模拟的结果，用艾伦的话说，“非常令人担忧”。虽然这次大多数的模拟结果预测地球平均升温3.4摄氏度，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间值相近，但在最糟糕的时候，所得数字却远远高于此前的全部预测结果——到21世纪末，气温预计将升高11.5摄氏度。如此大幅的升温意味着地球上大多数物种实际上都将灭绝。

一些科学家认为，3摄氏度已经是极度保守的了，因为潜在的正反馈效应还有待考虑。但是即便地球只升温3摄氏度，也将把人类带回到300万年前上新世时期的温度。那个世界与如今我们熟知的截然不同。

更可怕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测，如果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气温上升1.5～3.5摄氏度或更高，20%～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要记住，自地球生命诞生以来的38亿年间，总共发生过3次大型生物灭绝，而恢复生物多样性需要将近1 000万年的时间。

事实上，人类还没有意识到气温不断上升将带来多么恶劣的变化。设想一下，如果加拿大中部有着现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气候，或者纽约

有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气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虽然人类可以往北迁徙，但动植物可能没法迅速迁徙到适合自己的温度带。许多无法调整和适应的生态系统将灭绝或被取代。

曾经担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1998~2002）和英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主席（1992~1998）的约翰·霍顿爵士指出，全球的微生物和动植物通过进化，已经适应了某些特定的气候区。他说：

> “气候变化将改变一个地区环境与不同物种间的相适性，改变这些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力，所以即便气候发生相对细微的变化，也会逐渐导致生态系统的组成发生根本变化。”

霍顿所指的气温变化是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发生的，然而，全球变暖可能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改变气候状况。“大多数生态系统无法迅速回应或迁移。”霍顿说道。当生态系统与气候越来越不协调，生态系统便会变得更加容易受到疾病、虫害和其他灾害的侵扰。

由于树木的寿命很长，再生所需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当气温急剧变化时，森林系统尤其容易崩溃失衡，树木回枯。森林覆盖着地球1/4的陆地表面，是许多生物的家园，所以全球气温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将对地球的其他物种产生巨大的影响。

过去16年间驻扎在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们的记录表明，随着当地地表持续升温，雨林的树木生长率在不断下降。密苏里大学研究员德博拉·克拉克的报告指出，“夜间气温升高给热带雨林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夜间气温升高还会使树木进行更多的呼吸活动，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些发现令科学家们担忧。研究升温与树木生长率下降关系的调查员们注意到，热带雨林吸收的二氧化碳占“陆地上以光合作用形式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的1/3。如果树木继续在呼吸作用过程中释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从本质上改变二氧化碳的吸收和释放平衡，那么大气中大量增加的二氧化碳可能会使全球升温幅度超过当前预测。

布拉克内尔英国气象局的彼得·柯克斯说，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将会看到亚马孙大量的森林回枯，其原因是森林无法承受升温带来的热量，以及被排放到大气层中的数十亿吨二氧化碳。据同样来自英国气象

局的约翰·米切尔所说，亚马孙雨林是陆地上二氧化碳最大的消耗体，如果它与其他森林灭绝，全球气温将在21世纪被推高6~8摄氏度。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所述，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地球水循环的影响。水循环发生变化，将反过来大面积摧毁地球的生态系统。

75%以上地球表面被水覆盖。这也是为什么地球常被称为“水的星球”。不幸的是，全部水资源中只有2.5%是淡水，其中75%储藏在冰川与积雪中。只有不到0.3%的淡水资源在河流湖泊里，可以取而用之。

尽管有些地区可利用的淡水资源缺乏，造成当地生态系统连同居住其中的人类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甚至面临崩溃瓦解，但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说地球上的水资源是足以维持整个人类的生存的（人身体的2/3由水组成）。目前，地球水循环可能会发生全球性的变化，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

气温升高使蒸发的水更多，向大气排放更多的水蒸气。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层的储水能力便增加7%。大气层储水能力的变化影响水循环，尤其是降水的“量、频率、强度、时长和类型”。大气层中水蒸气增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降水更猛烈，但降水时间缩短和/或降水频率减小”，造成每年发生更加严重的洪涝灾害。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已经开始表现出对地球水循环的“实时”影响，导致季节性降水发生变化，使广大地表更易遭受灾害的侵袭，如干旱和沙漠化、更猛烈的洪水，以及其他更强烈的气象活动，包括飓风、龙卷风和野火。

气候变化速度之快，使科学界为之震惊。事实上，联合国之前的3份评估报告都极大地低估了地球天气形态变化的速度，以及升温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后果。

例如，2001年发布的上一份联合国报告注意到世界各地高山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然而，在当前的这份报告里，科学家们注意到某些地区的积雪和冰层退化的速度比之前预想的还要快。预计到2050年，一些地区的冰川面积将缩小60%以上。

同样的，早期的报告警告人们，在22世纪我们将遭受更加猛烈的飓风。而2007年的报告指出，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飓风已经变得更加强

烈，四五级飓风的数量剧增。一项于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与20世纪70年代比，四五级飓风的数量已然翻了一番。

最后，早期的报告虽已承认北极冰川已经开始融化，但2007年的报告预测北冰洋大部分区域的夏冰可能减少75%，到21世纪中叶，北冰洋可能对商业交通开放。

预测值偏低的原因是当前气候变化预测模式无法预料到每个潜在的正反馈回路，其可能在整个生物圈系统中引发一个转折点，造成温度进一步升高。例如，目前这份联合国报告提到了西伯利亚北极地带和亚寒带的永久冻土层融化现象，也注意到了该现象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永久冻土层融化现象很可能导致地球气温发生质变，这一点却没有在报告中得到全面的叙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西伯利亚亚寒带地区的近期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极大的正反馈回路，引发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造成灾难性后果，使地球加速升温，超过目前的预测范围。

西伯利亚亚寒带地区覆盖着广袤的冰冻泥炭沼泽，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总和。在上个冰川时代到来之前，这片土地大多还是草原，上面的野生动物生机勃勃。从远处漂来的冰川将所有有机物埋藏在永久冻土层下，直至今日。如今，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地方寸草不生，但其实永久冻土层下埋藏的有机物质跟世界上所有雨林所含有机物一样多。

现在，随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地球日益升温，陆地上和沿着海床的永久冻土层开始融化。如果解冻发生在陆地上，有氧气存在，那么有机物分解将产生二氧化碳。如果解冻沿着湖架发生在水中，没有氧气存在，那么分解产生的就是甲烷。正如前文所说，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

研究员们开始提醒我们，21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可能产生转折，那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产生的回馈效应将变得失控，导致大气急剧升温。一旦到达那个临界点，地球气温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急剧上升，那样的话，人类将束手无策，任何技术或政治手段都无法阻止失控的反馈效应。

在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和2007年5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

哲学学报》上的文章中，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凯蒂·沃尔特博士和她的研究小组认为，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科学家们注意到，在介于冰川期和间冰期之间的远古时代，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02年发布了一份令人忧心的报告，其中科学家们提醒我们，原本预测将发生在未来100年内的全球变暖趋势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在几年的时间里加快脚步，彻底改变地球的气候体系，破坏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聚居点，使动物、植物和人类猝不及防，根本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气候体系可能使地球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后果将影响未来数千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指出，气候突变的影响是长期的，在过去10万年间也曾反复发生过。比如新仙女木事件[1]。

该研究还表明，“当一个气候体系跨越某个临界点，气候便会发生突变，引发气候体系向新的状态过渡，过渡的速度由这个气候体系本身决定，并快于引起过渡的原因”。再有，古气候纪录显示，“气候变化最剧烈之时正是决定气候体系的各种因素变化之时”。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预计将在21世纪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翻番，全球气候激变的条件可能即将成熟，也许就在几年之内。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写道：

> “目前的趋势和对22世纪的预测都表明气候的平均值和变量非常可能达到仪表纪录数据或近期地质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水平。这种趋势可能使当前的气候体系跨越临界点，到达一个新的状态。”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专家指出：“当气候体系接近临界点时”，只要临界条件发生一个小小的偏差或气候体系中随机出现细微的波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变化”。

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就如新仙女木强降温时期发生的那样，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新仙女木强降温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云杉、冷杉和纸皮桦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遭遇了大规模灭绝。“马、乳齿象、长毛象、剑齿虎和其他多种动物遭受的灭绝之惨烈，几百万年以来无出其右者。”

美国国家科学院展示的是一幅如梦魇般可怕的图景：气候因随机事件跨过临界点，达到新的状态，造成大范围的灾害与毁灭。生态系统可能突然崩溃，森林被野火毁尽，草地完全退化，变成风沙区。野生动物可能会消失，饮水传染的疾病，如霍乱，以及传病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和黄热病可能大肆蔓延到寄主活动范围以外的地区，威胁人类健康。

报告在结尾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

> “从古气候纪录可以推断出，我们现在预测的气候变化可能不会与温室气体的浓度成比例，逐步发生，而是通过在次大陆或更大的区域内，气候体系不断发生突变来实现……否认这种可能，或对过去突然发生过的变化与将来的联系轻描淡写，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球变暖是工业时代红利背后的肮脏一面。过去几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人类燃烧大量“储存太阳能”的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气，以获取工业化生活方式赖以实现的能量和物质。人类消耗的能源已经积累在地球的大气层中，并反作用于地球的气候和地球上诸多的生态系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评估报告的最后，急迫地警告人类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制定一个更一致、统一、系统的长期规划，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球将走上一条不归路，人类文明、人类这个物种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都将被摧毁。

尽管人们正在逐步关注全球变暖的反馈回路及其对生物圈潜在的影响，但有一类反馈变量在预测模型中很少被提及。气候变化造成的失衡日趋严重，已经威胁到了上亿人的安全，很快便会威胁到几十亿人的安全，这是前所未有的。陆地和海洋将出现更多严酷的天气，如飓风、洪水、干旱、野火和升温，导致世界各地地域冲突频发。人们为了水资源、石油、陆地、矿产和数不胜数的其他资源大打出手，争夺生存必需的资源。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争先恐后地赶在能源价格升高和气候变化之前跨过边境线，邻国之间由此发生分歧。

石油短缺造成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为政治动乱煽风点火，加快三大洲的武装冲突和内战。当前，正在进行的内战有1/3是在

石油产出国进行的。全球石油产量即将到达峰值，意味着世界一半可开采的石油储量已经被消耗殆尽，气候变化速度加快、生态系统遭受实时破坏，经济、社会空间都是暴力升级的导火索。

核武器与世界末日

人类很可能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在这种情况下，核原料的扩散和相对容易获取的致命转基因病原体更显可怖。关于如何制造小型原子弹或威力更强的转基因病原体的知识越来越容易获取。曾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也日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相信，如今甚至都无法封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避免流氓政府、恐怖组织或精神失常的个人染指。一些政府分析人士认为，最差的情况是能源价格上涨、气候变化加速与冲突升级同时发生，几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促进，人类为了在环境恶化的地球上争得一席之地而互相残杀。不管是因为气候变化，还是因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类的末日是毋庸置疑的。目前的事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实非乐观。

核武器俱乐部近年来更加得寸进尺。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达到9个。更让人不安的是，还有另外40个国家拥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其中许多国家还能获取必需的原料。

最近，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对建设核反应堆产生兴趣，使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更加现实。垂死挣扎的核工业成功复辟，用某些手段搭上了气候变化的末班车，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黑色幽默。全球的核工业游说团争辩说，在支持传统发电方式的资源中，唯有核能不排放有害的二氧化碳，因此能够将功补过，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能量，帮助减缓全球变暖。它们的说辞完全罔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和潮汐能，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核能根本无法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相反，核能可能使全世界横冲直撞地进入新的核武器竞赛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核战争。

要想让核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哪怕些许有益的“边际影响”，核能就必须至少提供世界所需能量的20%。这就要求用核电站取代443座目前还在服役的老化电厂，还要另外建造1 500座发电站，使核电站总数达到2

000座左右，造价大概要5万亿美元。实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意味着在未来60年中，每30天就要建设3座核电站，就连电力公司和公共事业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白日梦。

在一个充满地域冲突的世界里建造几百甚至几千座核电站的想法，简直是疯狂。一方面，美国、欧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害怕在建造核电站的过程中，个别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浓缩铀，用来制造原子弹。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急切地想把更多的核电站建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意味着铀和用过的核废弃物将在各个地方进行运输，并堆放在各种临时场所，这些地方常常靠近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

能够利用核能进行铀浓缩并从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钚，加深了人们对安全的顾虑。一想到钚可能落入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手中，安全事务分析人士们便不寒而栗。核电站是恐怖分子袭击的最终目标。2005年11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逮捕了18名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他们宣称自己密谋炸毁澳大利亚唯一一座核电站。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澳大利亚将遭受与因“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全城瘫痪的纽约同样的命运。

人们对核能重新产生的兴趣已经引发了一场“铀竞赛”。几年前，勘探铀的公司只有几十家，如今有上百家公司在地壳中寻找新的铀矿。更让人忧虑的是，包括南非、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准备进行铀浓缩工作，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紧随其后。

由于担心核复辟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核武器竞赛，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06年召开了一次政府首脑紧急峰会，讨论在允许一国生产核燃料的同时，应该对其采取更严格的限制。美国前参议员山姆·纳恩是核扩散方面的领军专家，他严厉警告道：“这些危险是急迫的，我们正在合作与灾祸之间摇摆，而现在的结果还不确定。”

问题的关键是并没有一个故障安全的防火墙，能够区分核原料到底是被用在发电的和平用途上，还是同样的原料和技术被用来制造原子弹。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指出，除了最初拥有核武器的3个国家，核弹俱乐部的后来者中的一部分，利用民用核能知识，将铀浓缩到核力发电所不需要达到的高浓度，或从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中提取钚。

安全事务专家最担心的是如何组装和引爆核武器的知识得到广泛扩

散。W·J·布劳德与D·E·桑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该话题的详尽的文章，其中对此问题做了归纳，文章说道：

> “经过数十载的学术挖掘、政府解密、关于铀和钚冶炼方法的公开研究和互联网的兴起，此类信息大都可以被恣意获取。”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道出了对于核裁军的悲观情绪，他说道，“国际社会几乎是在梦游”，丝毫不考虑核能产业复苏的逻辑和后果，而是不知不觉地一步步走向核扩散的道路。

致命病原体的扩散

一个人口日益密集、联系日益密切、日益复杂的文明，其弱点是更容易全面崩溃毁灭。美国人民意识到这个道理还是在2001年，当时，带着致命炭疽病孢子的信封通过邮寄到达美国各地似乎是被随机选中的个人手上，造成6人死于炭疽病。美国人心惶惶，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致命的新式生物制剂是否会像核武器一样，对国家安全造成同等规模的威胁。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迅速发展的生物技术改革和即将到来的基因工程技术时代。

专家们注意到，正如隐藏着原子弹威胁的“原子为和平服务”倡议一样，生物技术也存在同样的隐患。用于各种商业途径的遗传学信息和知识数据库，其用途包括从修改农作物和动物的基因到创造新型疫苗和药物，也可以转而为制造更强效的转基因病原体服务，其潜在的致命性堪与原子弹比肩。

人造基因武器常被称作廉价的原子弹，它只需要一个最低只要1万美元、可以安装在地下室里的现成实验室。世界上很多最危险的病原体都可以被培育出来，或者通过商业渠道获得。限制性酶和其他的生物技术材料同样可以弄到，且往往对获取者的背景几乎不做安全筛查。

制造重组DNA人造武器的方法有很多种。新的生物技术可以将基因嵌入具有感染性的微生物中，以增强它们对抗生素的抵抗力、毒性和在不同环境下的稳定性；也可以将致命的基因嵌入无害的微生物中，伪装成对人体友好的生物制剂，从而不引起人体排斥。甚至还可以将基因嵌

入能够影响人体调节功能的有机体内，这些调节功能可以控制情绪、行为和体温。科学家们认为甚至有可能克隆选择性毒素，消灭某些因为遗传特性而更容易受到特定疾病攻击的种族或民族。基因工程也可以被用来摧毁农作物或家畜中特定的品种或物种，以达到使一国经济崩溃的目的。

大多数的政府宣称自己的生物战措施本质上仅仅具有防御功能。然而，人们普遍承认该领域的研究实在无法分清到底是防御还是进攻性质的，因为在制造只是“病原体的弱化版”的疫苗时，也有必要制造有毒的病原体本身。在其1983年11月发表于《原子科学家公报》上的文章中，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前校长罗伯特·辛西默评论说，由于这类实验的性质，目前并没有哪种方法可以明确地区分致命毒素是被用于和平用途还是军事用途。

直到20世纪80年代，致命病原体还无法成功地以工业规模进行培育，从而限制了其潜在的影响力。但是，生物技术革命打破了这一平衡。1986年美国国防部向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

> “在此之前，只能少量获取且无法与大量的生物材料一起获得的强劲毒素，现在能在相对较短的培育期后，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培育过程包括鉴别基因、目标分子加密、将得到的序列转移到受体微生物，使微生物能够复制目标分子。这种重组有机体可以以任何规模进行培殖。以前只能少量获得的复合物因此变得容易大量获得且价格相对低廉。”

致命病原体真的能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原子弹相提并论吗？1993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空用飞机投放220磅[2]的炭疽病孢子，便可以使300多万人丧命。

由于担心未来出现生物战，美国政府从联邦基金中抽出将近500亿美元，用于建造安全性能高的新实验室，研发新疫苗，储存药品。

仅在美国，就有分布在400多个实验室的超过14　000人被允许从事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病原体实验。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商业和学术实验室的数千名基因工程研究人员，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基因武

器。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大学实验室、相关材料和设备。所以，现在人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批评者因所谓的“生物知识全民化”现象而震惊，这种全民化提高了新一代大规模杀伤性转基因生物武器诞生的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技术和生物技术越来越有能力摧毁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努力预测人类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方式可能遭受的所有威胁。这也正是我们的政治领袖所希望的。可是，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因而也是易于解决的，而这些核技术和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那些利用这些技术作恶的人，他们的想象力有多少种可能，他们制造的威胁就有多少种可能。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观念，这样人类才能开始学着如何在一个星球上和平共处。

这个未来图景看上去很难想象，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一群人开始呈现出全球性的世界主义意识，他们的同理心拓展到了人类和各种动物。现在，轮到坏消息了。新的全球意识的产生应归功于复杂度更高、人口更密集、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依赖更多的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来支撑，维持其供应链、后勤保障和服务。需要的能源和资源越多，要支付的熵账单就越高昂，就是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使地球生态系统紊乱，而世界也因化石燃料时代的式微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以获取能源，由此造成各地社会与政治动荡不安，发生公开冲突、内战和边境对峙。冲突由局部升级到全球范围内，使人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追求更为迫切。

但是如果直到现在为止，人类的进步都需要靠熵的不断增加，以产生更多的同理心，那么人类的命运是否要以这种终极悲剧结束——在文明灭亡的最后时日，人类才开始建立生物圈意识？换句话说，如果同理心意识和全球性的世界主义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那么前者的好处不是被后者抵消了吗？人们只能守着苦乐参半的世俗智慧，跌进历史的尘埃里。如果你的直觉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那么你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想法的人。这可能真的会是人类最后的印记了。

打破人类历史谬论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漫长阶段将要走到尽头，新的旅程即将开始。在一系列探讨人类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的新研究中，人们发现，几千年前第一批大河文明诞生以来便伴随着人类传奇故事的历史辩证法可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为了避免从一开始就让怀疑情绪占了上风，有必要引用一下生态系统动力学作为类比，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进化过程可能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生物圈时代。

生态学家习惯将生态系统的进化消长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先锋阶段和顶极阶段。在先锋阶段，各个植物群和动物群繁殖扩散，消耗所能获得的所有能量。先锋活动改变了栖息地的物质层，产生新的食物来源，反过来改变了后续阶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植物群和动物群发展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物质和能量的消耗也达到了平衡。著名的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指出：

> “顶极群落是自我延续的，与栖息地处于平衡状态。与还处于发展阶段或不稳定阶段的先锋群落不同，在一个顶极群落里，有机物的年净积累量为零。也就是说，群落的年产出和输入被年消耗和输出中和。”

亚马孙雨林是顶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顶极群落远比先锋群落更稳定，其生物群之间达成了平衡关系。先锋群落的超额产出已被可持续产出取代，从而保护了栖息地以及居住于其中的生物群。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即使是顶极群落也非处于静态，而是受制于各种情况：新物种的引进、反馈效应、不断影响群落内部关系的滞后和干扰、动力学、分布区和熵流。

顶极生态系统成为探索可持续发展深层含义的指南和隐喻，可持续发展是国际政治对话中常被挂在嘴边的术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因布伦特兰报告得到推广，是以成熟的顶极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为蓝图而设计的。问题是，既然人类已几乎入侵并占领了生物圈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否已经完成先锋阶段？如果已经完成，那么是否准备好进入顶极的发展阶段，与生物圈正面相对？

所有这一切将我们带回到一个问题：什么让人幸福？正如第9章指出，托马斯·杰斐逊将幸福这个词添加到《独立宣言》中，宣称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且这种权利不可剥夺。然而，他所说的幸福需要加以限定。在杰斐逊那个年代，幸福常常是跟财产挂钩的。例如，《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宣称：

> “所有人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

黑格尔试图厘清幸福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他争辩道，财产是人的个性的延伸。他指出，财产使个人能够将自己的意愿赋予一样“事物”。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征用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使之融入他的延伸人格。这样，财产便成为他延伸的自我的一部分，一种投射自身存在和与人相处的方法。他写道：

> “人格努力寻求现实表现，或者换句话说，将外部的世界占为己有。要想将外部世界占有为自己的人格，需要通过获得财产来实现。”

他人是通过一个人拥有的实物来认识，并认同他的人格。对黑格尔来说，财产和人格几乎是同义反复的两个词。一个词蕴含着另一个词。其中隐含的假设是，一个人聚集的财产越多，他的人格得到的发展就越大。而一个更充分发展的人格又铸造了一个更幸福的自我。

私有财产的积累在极大程度上被等同于一个人的幸福状态。功利主义哲学家拿起了自然法理论的旗帜，认为“当社会确保每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最大份额时，便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幸福感”。

功利主义哲学家把人的幸福与私有财产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私有财产植入个人本质，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是贪得无厌的动物，他们不断攫取更多的财富是本性使然。

甚嚣尘上的“金钱可以买到幸福”的世俗观念，虽然时不时地遭到批评人士的质疑，但是传统智慧认为通往财富和幸福的道路是同一条。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摆脱历史铁腕的希望就渺茫了，在历史

规律中，人类意识的觉醒从来都是依托于财富的，而积累财富需要通过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而这反过来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增加环境中的熵。

但是，大量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挑战“增加财富即可提高幸福指数”这一基本命题了。我们开始发现那些在公众对话中相对显而易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内容。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穷到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不幸福的。出乎意料的是，同样的研究也表明，一旦人们达到已经能够充分生存和发展的最低生活水平，额外的财富积累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反而会使他们更加不幸福，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其他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疾病，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更加不满。

心理学教授蒂姆·卡塞尔列举了一长串的研究，其结果均表明：“对财富和财产具有强烈追求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比不上那些对这类目标的兴趣不那么强烈的人。”

在他自己进行的调查中，卡塞尔发现，学生和年轻的成年人中那些以追求“金钱、形象、名气”为主要目标的人，比那些不以这些价值为主要目标的人更容易抑郁和患病。另外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物质滥用高度相关。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追求的年轻人，和不那么物欲横流的年轻人相比，积极的情绪更少。他们也更容易出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强迫症，更容易疏离同伴，有更强的占有欲，更斤斤计较、嫉妒、多疑，更难控制自己的冲动，更容易逃避或过度依赖他人，并且更容易对他人态度消极或具有攻击性。在德国、丹麦、英国、印度、俄罗斯、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韩国所做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一个又一个研究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是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生活质量就越是下降”。研究还表明，世界上那些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50年前更幸福，尽管他们的平均工资相比50年前已经翻番。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他的《幸福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人均年收入超过20 000美元的国家，额外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当收入达到了使人感到“经济舒适”的最低水平，平均幸福指数实际上会随着财富积累而下降。美国人今天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但感觉“非常快乐”的人口比例从35%下降到了29%。

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结果对社会和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比不那么富有的人幸福感略高一点儿，甚至越变得富有，越不幸福，那么当人们获得一定的经济安全，同理心的发展便不仅仅依赖经济水平的持续提高，或由此产生的螺旋式上升的能源消耗和巨大浪费。事实恰恰相反。同样的研究表明，随着个人财富积累超出满足他基本要求的最低水平，越沉迷于对财富的追求，就越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最终会支配这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

由于我们不断地受到训诫：财富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大，于是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财富，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幸福，最终只是徒增失望。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从前的幸福感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富裕，于是我们排除万难，一心一意更加积极地追求财富，却只是南辕北辙，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商业市场在广告、营销和形象塑造上投入数十亿美元，帮助巩固我们的财富欲望，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随着痴迷财富的现象蔚然成风，大家开始采取对自己更有利的措施，将一切人和物转变成可以满足自己增加财富、获取幸福的野心的手段。我们不再把他人当作独特的个体。通过贬低他人，我们变得更加孤立，身边不再围绕着亲密的朋友。唯一增加的就是我们的疏离感。

贬低他人对自身的心理有诸多影响。物质主义者考虑的是自己，便认为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标杆上所处的位置越高，就变得越不信任他人。在美国，物质主义已经像全国性的流行病一般，在过去的25年里滋生蔓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一落千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56%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如今，只有不到1/3的人这样认为。相比之下，在物质主义不那么泛滥的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信任度提升，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至少没有降低。一些研究也表明，一个人越看重物质，对他人就越吝啬。自私打败了无私。

与此类似，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那些更专注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学生更不愿意“换位思考”，对别人的意见更缺乏尊重。物质主义者赢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最深刻的动力——同理心。

关于幸福的新研究也表明，幸福感不断流失不仅与财富的积累超出

舒适度所需有关，还与你周围的人的富裕程度有关。莱亚德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做了一项研究，要求学生在两种世界中做出选择：“在第一个世界里，你每年会得到5万美元，而其他人会得到约2.5万美元。在第二个世界里，你每年会得到10万美元，而其他人每年大约会得到25万美元。”大部分学生选择了第一个世界。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当社会把创造个人财富等同于幸福，追求幸福本身就成了一项竞争激烈的事业。人们衡量自己幸福的方式，不是绝对的，而是通过与其他人比较。假设更高的社会地位将带来更多的快乐，但相反，它通常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嫉妒和恶意，因为有人感到被超越，落在人后了。我们开始以相对财富作为评判彼此的唯一标准，这几乎完全挤占了同理心的生存空间。

最后，研究还发现一旦我们拥有了更多，就会觉得如果拥有的东西变少了，我们就可能会活不下去。年轻的时候，我有过这样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经历。当时我在一个扶贫项目里工作，被分配到纽约一个富裕的郊区，我的任务是在市中心平民区的年轻人中开展文化交流项目。一天晚上，当我拜访一个富裕家庭时，一家之主将我请到一旁，坦言道，当他每年赚10万美元时（相当于今天的60多万美元），他几乎快入不敷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我们不断地去适应新的收入水平，过去的奢侈品如今迅速变成了必需品。

莱亚德对幸福综合征做了一个总结，他写道：

> “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跟酒精或毒品一样。一旦你有了一番新体验，就不得不为了保持幸福感而不断继续。就像是站在跑步机上，一个‘快乐的’跑步机上，只有不停地跑，幸福感才不会下降。”

幸福综合征将人们禁锢在一场注定要绝望的比赛中。没有超过其他选手并找到真正幸福的办法。当然，解决方法清晰明了，但它与启蒙思想背道而驰，启蒙思想告诉我们不断地汲取财富使一个人更加自主和自由，使人愉快，使人更幸福。

有关幸福综合征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能够获得令生活舒适的必需品，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时，这样的社会最有可能产生最幸福的公民，尽管这样的结论有人可能会认为不合常理。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

1960年，美国称得上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今天，美国在工业国家收入差距排行榜上排名第27位，这个差距是指非常富裕和非常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比美国收入差距还大的国家只有国墨西哥、土耳其和葡萄牙。欧盟成员国的相对收入差距普遍小得多。调查发现许多国家的公民觉得“幸福感有些许上升趋势”，而美国人表现出下降趋势，这并不奇怪。这要部分归咎于哲学观上的差异。美国梦一直强调“个人成功的机会”，通常是以金钱论成败。然而，欧洲梦更注重生活质量，从社会标准去评判成功与否，如提供全民医疗、优质教育、休闲、安全的社区和一个良好的环境。

欧洲人在强调社区生活质量的过程中，有一点似乎非常重要，这也正是莱亚德和其他学者各自研究的发现。莱亚德写道：

> “这种心理现实产生的结果是，如果把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里，穷人得到的幸福要大于富人失去的幸福。所以平均起来，幸福感就增加了。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其人均幸福感也会更高——在其他的一切也处于平等的条件下。”

欧洲人均收入比美国低29.3%，欧洲人的房子面积、汽车尺寸、衣柜面积更小，电子产品也更少。此外，他们收入的更大比例被用来缴税，为一系列旨在提高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埋单。跟美国强调市场模式相反，欧洲人更加注重社会模式，这样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毕竟，当财富通过税收被重新分配到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公共服务当中后，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便缩小了，尽管并不可能完全消除。

欧洲的社会模式和美国的市场模式的差异在用来维系各自社会的能耗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人口超过5亿，而美国50个州的人口只有3亿，但后者人均耗能更多，维持经济和社会结构所耗费的能源总量也更多。其结果是，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8%，而欧洲的排放量占13%。

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欧盟仍然以最坚定的信念通过社会/市场模式追求生活质量。为了达成此目的，欧盟成员国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放在长期经济愿景的核心位置。但是即便是欧盟，想打破历史的辩证法，也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适当疗法，才能摆脱财富/幸福成瘾？

过去15年来的一些研究结果均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孩子长大后是否迷恋物质上的成功密切相关。如果父母是热心、深情、积极响应的，能够关爱婴儿，平衡其在安全和自我表达两方面上的需求，那么长大后的孩子很可能会信任他人，并有信心发展自己的自我意识。然而，如果孩子的主要看护人是冷冰冰、喜怒无常、喜好惩罚、行为缓慢和脾气急躁的，那么，孩子不太可能建立稳定的情感依恋并拥有创造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核心身份所需的自信。这些孩子往往更容易专注于物质上的成功、名气和形象，作为获取认可、接纳和归属感的替代方式。不消说，全球的广告和营销队伍通过承诺更多的财富、财产以及更高的地位和社会等级可以买来他们渴求的亲情、温暖和接纳，猎获了他们情感上的不安全感。

卡塞尔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以确定在婴儿早期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否影响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实验发现，比起那些更重视结交朋友、为社会做贡献的年轻人，那些强烈推崇在金钱上获得成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位不那么热衷于养育孩子的母亲。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卡塞尔的调查结果。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夏·科恩和雅各布·科恩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要么对孩子有强烈的占有欲或控制欲，孩子出错便施加严厉的惩罚，要么就是无法为孩子做出恰当的榜样，常常行为武断，反复无常。

卡塞尔表示，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可能特别容易沦为消费信息的猎物，这些消费信息利用孩子的不安全感，将消费和幸福、安全捆绑在一起”。缺乏安全感的青少年也有可能转向他人，寻求他们在父母那里无法得到的认可，通过获得名气和财富等物质价值来获取他人的关注和陪伴。

在可能跨越到生物圈意识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研究尤其有趣的地方是，表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不太可能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不太宽容别人，而且不关心其他人是否幸福。换句话说，他们远远缺乏同情心。

其他研究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对环境缺乏关注或完全忽视环境高度相关。就像是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他们与其他生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纯粹的利用，是为自己服务、出于自身利益的。

研究人员肯·谢尔登和霍利·麦格雷戈测试了罗切斯特大学的150名学

生，以评估他们的价值观取向。他们被按照或高或低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排序，然后分为3组来玩一个游戏：4个物质主义者；2个物质主义者和2个非物质主义者；4个非物质主义者。游戏假设他们是一家木材公司的总裁，与其他3家公司一起竞标200公顷国家森林伐木项目。“每家公司每年都可以砍伐最多1 000英亩森林”，而“剩下的森林将以每年10%的速度恢复。”因此，如果公司每年只砍伐几英亩森林，所得利润会很低，但如果砍伐过多，就会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耗尽森林资源。结果，物质主义小组的砍伐速度远远高于非物质主义小组，因此快速获利，但导致森林迅速枯竭。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学生总是将短期的金钱效益置于长期的保护措施之上。实际上，从长期看，非物质主义小组获利更丰，因为森林存活的时间更长久。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后物质主义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成长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友爱、物质更丰富的环境里，但商业市场中的物质主义利益驱动是一股强劲的阻力。所以，社会从先锋阶段过渡到顶极阶段，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需依靠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自觉地培养青少年的亲社会价值观，以便产生对他人的同理心，在面对市场的诱惑时能够自制。

尽管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启蒙时期和浪漫主义时代早期，培养方法发生质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其影响延续至今。

婴儿潮一代打破了过去思想意识时代特有的阶级政治，强调以正当的方式取得物质成功和幸福。正如第10章提到的，1968年的学生革命实际上是人们从思想意识向心理意识的一种转变，活跃分子开始把眼光投向所谓的个人政治。他们的重点不再仅仅围绕谁应该控制生产方式和如何最有效地确保社会经济成果得到公平的分配。与此相反，反文化的一代开始向内审视内心的情感，并向外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同理心纽带。

20世纪6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开始飙升。年青一代开始质疑他们父母猖獗的物质主义。从巴黎到旧金山，激进的活动分子走上街头，举着横幅，高喊打倒消费社会。随着婴儿潮一代为人父母，他们把自己新发现的价值带入养儿育女的过程中，比以前更关爱儿童养育风格更激进。这种趋势一部分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更加宽容开放的一代。随后，这种趋势势头大增，进入千禧一代。然而，其势头已经受到了大规模广告和营销的遏制，它们针对的是年龄更小的孩子，现

在就连蹒跚学步的幼儿也成了目标群体，使年青一代浸淫在物欲横流的风气中。

广告行业常常把6～12岁的孩子称为“大孩子”，希望把他们变成一辈子的习惯性消费者，所以他们是广告的最大目标群。现在小到两岁的幼儿都能辨认品牌标识。在美国，1/4学龄前儿童的房间里放有电视机，他们连续不断地接受商业信息的轰炸。等到他们读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辨别出200个品牌，每年拥有超过70个新玩具。

年轻人平均每天有3.5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每年被持续灌输40 000个商业广告。据估计，美国公司每年在针对儿童的广告上总共投入150亿美元，颇有成效。儿童每年要求购买特定的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次数高达3 000次。

儿童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1989年，针对4～12岁儿童的市场销售额是61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增长了400%。十几岁青少年的支出更为庞大，达到了每年令人诧异的1 700亿美元。折算下来就是每人每周100美元以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儿童消费上能与美国匹敌。经济学家、社会学教授朱丽叶·肖尔在她的书《为买而生》中指出，虽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5%，但美国儿童却消费了全球45%的玩具。

如果说还有谁对消费文化在美国年轻人中产生的影响心存疑虑的话，肖尔拿出了让人心服口服的事实：到1997年，儿童花费在购物上的时间跟访友一样多，是阅读或做礼拜的2倍，是进行户外活动的5倍。

肖尔指出将消费文化贩卖给年青一代是“物质主义价值观横行”的结果。美国44%的四年级到八年级生“常常”梦想变得富有，2/3的家长说：“我的孩子用自己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我价值，他们的衣服比我在这个年龄时要多得多。”9～14岁的美国青少年中所做的调查发现，最让人难过的是有超过1/3的人“宁可花时间购物，也不愿做其他任何事情”，而超过1/2的人则认为“等你长大以后，你越有钱，就越幸福”。

对青少年进行狂轰滥炸的广告和市场营销在美国、日本和英国更是无孔不入，而在欧洲大陆要稍微收敛一些。一方面是家长的育儿指南，另一方面是针对年轻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市场营销，两者并行，使亲子教育革命无法发挥潜力，甚至有时还造就了被过度溺爱、过度放纵、

过分随心所欲的孩子——我一代。

儿童成长专家担心青少年一直在接受混杂的信号。由于常听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受宠爱、最特殊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成了父母世界的中心，被“宠坏”，结果往往在关爱中自我陶醉，即使父母再用心良苦，也于事无补。过度放纵可能产生新的不安全感，使这些年轻人再次轻易地沦为市场营销手段的猎物。

也许建立生物圈意识的最大障碍是面向青少年的商业广告，它利用这群最年轻、最脆弱的人缺乏安全感的事实，不断地破坏亲子教育，从而让物欲横流的消费文化仍然生机勃勃。

在富人社会，幸福感原地踏步，不再上升，甚至随着收入超过生活所需的最低门槛，反而有所下降。同时，对相对财富的痴迷更是加重了人们对利益的孜孜追求，而无法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建立社区意识以及拓展同理心。

但是，那些占总人口40%、每天收入只有2美元或更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活着的穷人呢？研究表明，对他们来说，收入增加，幸福感便增加。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除了对最亲近的家人，很难再对别人有什么同理心，因为他们醒着的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活下去。他们很少有情感或时间来留意或关心那些身处困境的毫无瓜葛的人。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大部分非常贫困的人来说，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优先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

获得基本的舒适是全球几乎50%人口的当务之急，这也意味着人们将征用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在熵账单上再添上几笔。积极的一面是，发展会带来更大的个性化，出现自我意识，拓展同理心意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世界主义的态度。不好的一面是更多的能源需求会进一步耗尽地球的剩余资源，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

一场全球性的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对立双方各占全球总人口的1/2，一方已经跨过最低舒适度的门槛，而另一方还没有。随着气候变化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后物质主义国家认为每个社会都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中国家也合理地认为他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比起美国等富裕国家，根本无足轻

重，失去发展经济的机会无疑会把他们永远地困在贫穷和绝望的泥沼之中。

富裕国家的一些人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然而他们指出，如果每天生活成本在2美元或以下的近30亿人口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熵账单就会使目前的生物圈进入全新的温度状态，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灭绝。

这是双方争执不下的僵局。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引发前所未见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冲突。这是因为我们的化石燃料储备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以维持和发展工业化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碳基燃料不够了。

目前全球石油储备下降，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却在增加，尤其是在拥有20多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1/3以上的新兴国家——印度和中国。于是，人们更加急切地辩论起对全球石油峰值来临的担心。一旦石油峰值到来，石油时代基本就要宣告结束，因为钟形曲线下降的时候，能源价格将变得令人几乎无力承担。

尽管没人能确切知道石油峰值什么时候会到来，但能源危机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小。前者认为，全球可能在2030~2035年达到石油峰值，后者相信峰值可能出现在2010~2020年间。少数领先的石油专家认为石油峰值已经到来。北海油田已于2000年达到了峰值。作为世界七大石油产出国的墨西哥很可能将在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俄罗斯也将紧随其后。

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一直处于每发现1桶油的同时会消耗3桶油的供需失衡状态。尽管可能发现一些大型油田，但是世界上大多数潜在的油田已经被定位且处于产油阶段了，而且多数快要达到峰值或几近枯竭。问题是，整个全球经济依赖于化石燃料。我们的食物需要石化化肥和农药，我们使用的塑料、包装、建材、合成纤维和面料、大部分药物，以及为建筑供暖降温、为社区照明、为经济提供动力的电力，它们的主要来源都是化石燃料。如今，人口占世界总数1/2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竭尽全力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增加着石油、煤和天然气的消耗，剩余的资源就更少了。情况已经岌岌可危，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以确保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和公司能优先满足自己，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黑金”来推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

全球石油需求上升，供给下降，192个国家为了石油展开竞争，冲突规模前所未有。如果各国领导人现在担心的是石油生产国正在升级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公开的武装冲突，那么想象一下到了2015年、2020年和2025年，那时我们的石油时代已经步入黄昏期。这么一想，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恐惧就会更加严重了。

石油和其他的化石燃料属于“精英”能源。它们分布不广，而且只存在于世界某些地区。化石燃料需要巨额的军事投入来保障，不懈的地缘政治管理来维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开采、加工和运输。而且，即使化石燃料仍然又丰富又便宜，也是很大一部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虽然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无法想象，但是地球上1/4的人还从来没有用过电，另外的1/3的人只是偶尔才能用上电，因此处于贫困状态。重点是，即便是在石油、天然气和煤资源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时候，我们都无法使相当一部分人用上电，那么当石油、天然气和煤变得稀缺，石油价格继续处在每桶50美元或以上的价格上居高不下时，我们还能想到什么办法将电送到需要的人身边呢？

底线是这样的：一半人口比另一半人口使用了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和自然资源，远远超过舒适生活所需，并随着财富额外增加日益变得不满。另一半人口为了摆脱贫困而汲汲营营，他们越接近舒适生活的最低水平，就会越幸福。但是，我们已没有足够的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或是核能发电所需的铀，来维持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或让30亿穷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我们也知道，同理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至少在达到舒适度阈值前是这样。达到阈值之后，财富积累往往将人禁锢在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里，使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功利，更加无视他人的苦难，这一切都阻碍或破坏了同理心意识的发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组织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稍微减轻“富人”对环境的掠夺，让“穷人”与环境建立更坚实的关系，让彼此都能舒适地生活呢？只有达到这个阈值，我们才能将同理心意识最大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设想这样一个能源机制和经济变革：我们使用的各种能源都可以在自家后院找到，它们在地球上的分布相对平衡，免

费且易得，还能随着季节更替和生物圈的循环而再生。实现这样的能源机制和经济变革的前提条件，至少是在不损害生物圈健康的同时，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过上基本的舒适生活，这样，地球上的生命就能继续蓬勃发展。

---

[1] 新仙女木事件是发生在末次冰期向全新世转换期间的一次非轨道气候事件，以最初在丹麦阿勒罗德冰缘沉积物中发现的北极苔原植物仙女木命名。——编者注

[2]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第13章 分布式资本主义的兴起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该法案经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之后成为法律，并拨款250亿美元，在30年内建设65 600公里的州际公路。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公共工程项目。建成的州际公路系统连接了美国大陆的各个部分，并为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公路基础设施。以石油为动力的内燃机是20世纪的经济引擎，为从钢铁生产到旅游业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业提供了动力。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州际公路系统作为基础设施，起到连通作用，促进了郊区商业和住房建设的繁荣，美国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和社会，美国人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式微

尽管当时美国正在欢庆其在商业领域的空前成功，一些不祥的“乌云”正在酝酿，但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乌云”才聚拢起来，催生了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将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推向崩溃边缘。

当美国正在建设州际公路时，科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二氧化碳这一地球大气层成分的浓度正在升高。科学家推测化石燃料的燃烧和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使地球大气变暖，并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到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模型预测在一个世纪内，地球大气温度可能会上升几摄氏度。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有关全球变暖的第一次初步报告，暗示人类引发的活动可能对地球温度产生不利影响。该发现从本质上来讲是实验性的，具有高度的猜测性，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虽然美国石油资源丰富（别忘了，美国在20世纪中期是世界上领先的石油生产国），而且对前景充满自信，但其他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开始显现。1973年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实施的石油禁运和随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让公众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们

是否会用尽石油？但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石油禁运并不是因为供应问题，而是因为石油生产国想通过施展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市场上获利，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赢得尊重和关注。

当时，没人知道世界人均可用石油量将在1979年达到峰值。尽管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石油被勘探出来，但日益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如果现在把石油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能用的石油就变少了。仅这一事实将在2008年7月带来恶果，因为当时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47美元，创下了纪录。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在20世纪下半叶不可阻挡地“越积越厚”，但却被人们抛在脑后，因为当时世界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达到成熟阶段。郊区建设潮（曾带来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经济扩张）开始冷却。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郊区建设萎靡，造成了1989～1991年的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当时无人认识到其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及21世纪的头6年，美国又经历了一股建设热潮。然而，这主要是由抵押贷款工具不负责任的扩张和荒唐的投机行为所致，而不是因为科技推动生产力提高，并产生新的“实际”财富。现实情况是，建立州际公路网的乘数效应在完成这项基础设施以及郊区的建设后就已发挥得差不多了。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8年经济崩溃期间的经济增长并不在于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精明，尽管这是对经济新繁荣的官方解释。这并不是说新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复苏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远远没有媒体、商界和政客们让公众所相信的那么重要。现实情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从那以后开始放缓。

美国的薪资水平已经停滞了将近10个年头，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现在也已成熟，甚至进入了衰老期。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其他国家。“信用卡文化”提高了购买力，让美国公司和员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生产所有用信用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18年中，美国消费者提振了全球经济，主要

是由信贷消费来提振。然而，美国消费者增加债务来维持全球经济的代价是耗尽美国家庭的存款。1991年，美国家庭平均存款率大约为8%，到2006年，已成负数。许多家庭入不敷出，在术语上被称为“负收入”，这一矛盾修辞法表明该方式未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由于家庭存款变成负数，住房抵押贷款和银行业创造了第二种信贷方式，让没什么钱的美国人购房，短期利率低，甚至无利率，这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数百万美国人上了钩，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买房，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支付，这就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房主缺钱，就把房子作为自动取款机，抵押再融资，有时进行两三次融资从而获得需要的现金。房地产泡沫现已破裂，数百万美国人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银行面临崩溃。

18年来，由于美国经济过于依赖扩大信贷规模，结果导致了现在的经济崩溃。1980年，美国金融业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在过去27年间，总负债稳步增长，到2007年已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16%，令人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累积家庭消费债务如今已超过13.9万亿美元。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及金融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信贷危机已经席卷出美国并吞噬全球经济。

美国从始于“二战”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历经40年的储蓄增长期，并持续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而过去20年全球经济之所以不断增长，就是因为消耗了美国的已有储蓄。

更糟糕的是，因为油价飙升，2008年7月全球市场油价达到每桶147美元，全球信贷危机在过去两年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削弱消费者购买力，减缓生产，增加失业率，使本已债务累累的经济雪上加霜。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叫作“全球化峰值”，出现在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7美元左右时。超过这一峰值，通货膨胀便会阻碍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全球经济长期陷入零增长的状态。只有全球经济紧缩，使用较少的能源，能源价格才能下降。

“全球化峰值”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是大量便宜的石油可以让公司把资本用于雇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以最低的成本将食品和制成品生产出来，然后运往国外市场，从而赚取高额

的利润。然而，这一前提条件已经无法实现了。

要明白如何得出这一结论，我们需要回到1979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人均可用石油量在1979年达到峰值。当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现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时，它们对石油的需求飞涨，石油开始供不应求，导致油价上涨。因为每个人可以使用的石油量在减少，所以，当全人类1/3的人口（即中国与印度的总人口）也融入以石油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时，遭遇了石油供应短缺的局面。换言之，人口日益增长，而石油储备有限，这种需求压力必然会推动石油价格上涨。而当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7美元，严重的通货膨胀便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引发全球经济的萎缩。

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这些成本被分摊到了企业制造的每件产品中。因此，能源价格的增长影响着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那些需要长途运输（空运、水运）的货物变得越来越昂贵，令人难以承受。之前，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因而享受到边际价值，可是现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能源成本日益增加。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的转折点，并且早在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前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在进一步侵蚀许多地区的经济。仅因“卡特里娜”“丽塔”“艾克”和“古斯塔夫”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1 000亿美元。洪水、干旱、火灾、龙卷风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摧毁了各个大陆的生态系统，降低了农业产出，破坏了农业基础设施，减缓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全球信贷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在21世纪的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逐渐减少。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迈向化石燃料终结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各国正在努力确保其剩余的化石燃料储备可以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并且尝试使用清洁能源，从而限制常规燃料燃烧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欧盟还规定其成员国到2020年的能源效率提高20%，碳排放减少20%（相比1990年的水平）。

要彻底解决全球石油峰值、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这些空前的危

机，仅仅依靠更加高效地使用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够的。展望未来，每个政府都需要探索新的能源机制，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尽可能地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尾声时，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在过去200年间，人类经历了化石燃料时代，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经济活动给地球生物圈带来了巨大的熵账单，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能够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呢？目前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章提到，新的通信革命与新的能源机制共同催生了全新的生活环境和重大的经济变革。现在，我们再次迎来了这种历史性机遇，因为一方面，在过去20年里出现了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经济体系内发挥着指挥与控制的作用，人类可以利用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来组织和管理分布式能源，从而迈入影响力巨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由此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会持续到21世纪下半叶以及更加遥远的未来。

分布式能源是那些可以在自家后院发现的能源。太阳普照全世界，风每天吹拂着地球，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垃圾。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在利用农林资源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料，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可以利用潮汐能。地热能藏在地表下，水能发电。我们称这些能源为分布式能源，因为不像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铀这样的常规“精英”能源，它们只能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找到，而可再生能源无处不在，储量各异。

今天，催生了互联网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被用于重构整个世界的电力供应网络，让数百万人可以在家里、办公室、零售店、工厂和技术园区里收集、生产他们自己的可再生能源，还可以通过智能电网与其他人分享，就像他们现在在网络空间创作和分享他们的信息一样。企业开始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和市场雏形，这就是商业领袖所称的“分布式资本主义”。

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潮汐能，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四大支柱中的第一个支柱。虽然这些朝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各国政府设定了相关的目标和标准，将这些能源广泛推向市场，而且这些能源的获取成本较低，所以，它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实现了迅速发展。由于企业和房主努力减少碳排放，更注重能效，进一步追求能源的独立性，所以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涌入研发和开拓市场。

虽然可再生能源无处不在，新技术也允许我们更廉价、更高效地利用这些能源，但是我们需要基础设施来承载它们。这就需要建筑业发挥重要作用，来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支柱。

如前所述，建筑是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的主要“肇事者”，消耗了30%～40%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30%～40%。现在，新的技术突破可以改造现有建筑，设计新建筑（新建筑可部分甚至全部利用当地可用的可再生能源），从而塑造了这样一个新理念——未来的建筑是“发电厂”。这个新理念将对房地产业乃至全世界的商业和建筑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未来的25年里，数百万建筑——住宅、办公室、大商场、工厂、工业技术园区——将会被改造或建造成“发电厂”，同时也是人们的生活场所。这些建筑将会就地取材，利用太阳光、风、各类垃圾、农林废料、海浪、潮汐、水和地热产生人类经济活动所需的能源，同时多余的能源也可与其他建筑共享。

在西班牙的阿拉贡，通用公司生产设备的顶端装有一个1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机，产生出可以供4 600个家庭使用的电量。最初7 800万美元的投资将会在10年内收回成本，在这之后，发电的成本将几乎为零（除了用在维护太阳能发电装置上的费用以外）。

在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集团在巴黎郊区创建了一个先进的综合商业办公区，从这个地区收集的电能不仅能供自己使用，甚至还有节余，出售给主电网。

沃尔卡科技园位于西班牙韦斯卡，坐落在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山谷里，是一座新型的技术园区，就地生产可再生能源，为几乎所有的运作供电。目前园区有12座办公楼，并计划再建40座。该园区的运转几乎全

靠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水电和太阳能。园区里还坐落着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微软以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公司。

我们介绍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两大支柱，即可再生能源和“作为发电厂的建筑”，同时也需要介绍第三个支柱。为了最大化利用可再生能源和使成本最小化，我们需要开发储存方法，把间断的能源供应转化成可靠的资产。电池、水泵以及其他媒介的储存功能有限，而现在有一种储存媒介到处都可以找到，而且相对高效。这就是氢，它是储存各种可再生能源形式的普遍媒介，可以确保稳定、可靠地发电和运输。

氢是宇宙最轻、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作为能源资源，它唯一的副产品就是纯水和热量。我们的宇宙飞船使用氢燃料电池作为动力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氢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海浪）用来发电，而电反过来可通过电解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氢气也可直接从能源作物、动物粪便和林业废料、有机垃圾（生物质能）中提取，无须经过电解。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社会，部分可再生能源需要以氢气的形式储存起来。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不是一直都有：太阳不会总是闪耀；风不会总吹；如果干旱，水就不会一直流；农业收成也视情况而定。如果无法供应可再生能源，就没有电，那么经济活动就会中止。但是当可再生能源充足时，产生的电可用来从水中提取氢气，然后把氢气储存起来，之后再转换成电，这样社会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了。

2008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联合技术计划》，这是一项有雄心壮志的公私合作项目，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推动氢经济的商业用途，主要重心在于从可再生能源中提取氢气。

通过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广把建筑作为发电厂的理念并给氢气燃料电池技术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欧盟已经建立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三大支柱。第四大支柱，即重新配置电网——让企业和房主自己生产能源并与彼此分享——正在经受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力公司的检验。

智能电网由3个关键部分组成。迷你电网可让房主、中小企业和大

型企业在当地通过太阳能电池、风能、小型水电、动物粪便、农林废料和垃圾生产出可再生能源，满足自身的电力需要。智能电表技术让当地生产商能够更有效地把能源卖回主电网，也可从主电网接收电，使电双向流动。

智能电网技术的下一阶段是在整个电网系统内嵌入传感器和芯片，连接每个电气设备。软件可让整个电网知道每时每刻在电网上用了多少能源。这种互联性可重新调配高峰期和间歇期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流向，甚至可以随时调整电价。

在未来，智能公共事业网络也将会越来越与即时天气变化相连——记录风力变化、太阳通量、周围温度，使电力网络持续调整电流，既适应外部天气状况，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如果电网因为需求过大而造成能源使用高峰，并有可能超负荷的话，软件可以使住户的洗衣机少转一圈，或者把空调调高1摄氏度。愿意轻微调整用电量的消费者可以在账单上获得积分。因为在任意24个小时内，电网的真正电价有所变化，所以即时的能源信息向“动态定价”敞开大门，这样消费者就可根据输电网电价自动增加或减少能源使用。实时更新的计价可让当地迷你电网把能源卖回给电网，或者干脆不用电网。智能电网不仅加强了终端用户能源选择的权利，而且在电力分配方面提高了效率。

智能电网使重新广泛分配电力成为可能。当前这种集中的、自上而下的能源流动越来越过时了。在新时代，企业、城市及房主既是能源生产者又是能源消费者，他们被称为“分布的一代”。

分布式智能电网也为汽车动力源的转变提供了根本的基础设施：之前是燃油内燃机，现在是以电和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电动插电式汽车和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汽车也是“车轮上的发电站”，发电量可达到20千瓦或者更多。既然普通的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大多数时候都是停着的，那么在它们不行驶时，可以利用它们发电，为家庭、办公室供电，或者将电力输送回主要的智能电网。

如同19世纪蒸汽机、火车头以及铁路基础设施的出现标志着煤炭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一样，20世纪内燃机和汽车公路基础设施的出现标志着石油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交通运输的革命往往发端于更广泛的基础设施革命。燃煤蒸汽机革

命要求基础设施方面实现重大变革，包括运输方式的转变（从水路到铁路），以及为了关键铁路线上和铁路枢纽处新城镇的发展而转让公共用地。同样，汽油内燃机要求在州际公路体系外建立全美公路体系，铺设石油管道，在郊区建立新的商业和住宅区。

从内燃机转变到以电和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同样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新的改进。

2008年，德国第二大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莱茵集团和戴姆勒公司在柏林发起一个项目，为在德国首都周边的梅赛德斯旗下的Smart微型电动车和梅赛德斯汽车建立充电站。雷诺–日产正筹备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以色列、丹麦和葡萄牙提供充电站网络。分布式的电动车充电站将为雷诺的纯电动梅甘娜轿车提供服务。到2030年，给可充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汽车充电的充电站将会随处可见，在路上、在家里、商业大楼、工厂、停车场以及车库都可见到，这样的基础设施可以把电无缝分配到各处，既可把电送到主电网，又能从主电网收到电。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通用电气、西门子以及其他全球信息技术公司现在正涉足智能电力市场，与公用事业公司合作，把电网转变成智能电网，使建筑物的所有者们也能够生产能源并与他人共享。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CPS能源公司、位于休斯敦的CenterPoint公共事业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波德的Xcel能源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的Sempra能源公司和Southern Cal Edison电力公用事业公司正着手铺设智能电网的部件，可以连接数千家住宅和商业大楼。

人们常常会问，可再生能源能否长期提供足够的电力以支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第二代信息系统电网技术让企业连接数千台台式电脑，由此产生的分布式计算能力比最强大的集中式超级电脑还要厉害得多。同样，数百万当地可再生能源生产商可接触到智能公共事业网络，他们生产、分享的分布式电力远比我们当前依赖的集中式能源形式（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核能）要多得多。

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需要大规模重新布局每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基础设施，创造数百万工作岗位以及无数新的产品和服务。各国将需要大规模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改造数百万幢建筑，把它们变成发电厂，在美国基础设施中融入氢气储存技术和其他储存技术，把汽车从内燃机发动的汽车转变成以电和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铺设智能公共事

业网络。

基础设施需要重造，各产业需要重组，这将要求各国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再培训，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开始就进行的职业和专业培训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新技术劳动力将需要熟练掌握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环保建筑、信息技术、嵌入式计算、纳米技术、绿色化学、燃料电池开发、数字电网管理、混合动力和氢动力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数百个技术领域。

企业家和管理者也需要接受教育，学习如何利用前沿的商业模式，包括开源式、连接式商业，分布式、协作式研发战略，可持续低碳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次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管理风格将会从本质上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能水平和管理风格迥异。

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智能电网可让每个国家既生产自己的能源，又以“网络”方式与周边国家共享多余的能源，从而确保全球能源安全。当任何一个地区出现可再生能源短期激增或剩余，那么正遭受可再生能源短期缺乏或不足的地区就可以分享那些能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愿景，电力本身得以广泛分配，鼓励在人们和国家之间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将合作推向新水平。正如过去10年分布式通信革命催生了网络式的思考方式，开源分享，以及通信的民主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将效仿，进行能源民主化。我们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上亿人被“赋权”[1]（不论是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的社会愿景

能源民主化推动我们建立新的分布式社会。获得电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不可被剥夺的社会权利。20世纪见证了全世界数百万人享受政治投票权，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21世纪，个人享受能源也将成为一项社会权利和人权。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利、有机会在当地生产自己的能源，并与其他人在地区、国内和大陆的智能电网上分享。对于年青一代人而言，他们成长环境的等级制度不那么森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广泛，能够在开放的智能电网上分享并生产自己的能源，这将被

视作一项基本的权利和责任。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半个世纪，将大大地改变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为明显。电的使用是永久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相反，能够获得能源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机会。如果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能够自己生产能源，那么在电力配置方面将会有显著变化。当地人不再那么受制于偏远的电力中心的影响。各个社区将会在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并向全球销售。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再全球化”政治的核心。发达国家与各行业及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合作，通过重新审视发展援助，影响宏观和微观融资信贷，提供最惠国贸易地位，从而促进可持续的全球化进入下一阶段，帮助发展中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化石燃料和以铀为基础的能源转变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需要全球跳出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20世纪的特点），转而进入21世纪的生物圈政治。20世纪大多数地缘政治的争斗集中于以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铀矿。因为各国竞相争夺化石燃料和铀，人们打仗，无数的人失去生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任重道远，化石燃料和铀越来越有限，我们需要缓解这种因获取它们而日益紧张的态势，基于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集体责任感，我们需要促进生物圈政治。

分布式资本主义

数百万人共享能源，最终数十亿人共享能源，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等级化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将逐渐瓦解，大规模协作下的分布式网络将得到广泛应用。更加分布式和合作化的全球经济正开始彻底改变人类的时空感：技能差别化更加显著，自我意识更强烈，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理心和自我意识增强，从而与地球生物圈实现密切融合。

要了解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的潜在影响，我们有必要理解影响着分布式能源社会的分布式通信的力量。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分布式计算（又叫网格计算）是席卷全球商界的第二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推动了新型全球社会网络的建立和

教育体系的改革。

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最先是由软件设计师大卫·戈迪和曾为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大卫·安德森共同提出的。他们对是否能在宇宙中发现外星人感兴趣。他们发现扫描宇宙无线电波寻找是否有人在广播星际通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们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利用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天文望远镜全天候观测星空，同时收集无线电频率。分析大量信息需要使用世界上最大的模拟器。因为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超级计算机，所以他们想到征用数百万台个人电脑，并与网络连接，快速处理信息。鉴于个人电脑在大多时候处于闲置状态，即便在使用时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分布式计算机足够强大的能力评估输入的数据流。到2001年，有100多万台人电脑加入这个项目。尽管外星智能探索计划（SETI）仍未收到来自银河系的任何消息，但它为下一场信息技术大革命——分布式计算提供了模型。

分布式计算可用来解决一些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例如，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服了来自150个国家的10万人捐赠其电脑的部分使用时间来分析气候变化数据并创建预测模型。分布式计算能力是世界上一些最快的电脑的2倍。

分布式计算机项目正在拓展。数百万台计算机被用来为一系列项目收集和分析数据，包括寻找新蛋白质结构，发现引力波，研究纳米系统，搜寻质数，以及开发新药物等等。

为什么人们愿意把他们的电脑借给这些项目使用呢？尽管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在分布式计算机社区里，大多数人给出的理由是“利他主义”，他们被友爱地称为“处理信息者”。数百万人渴望贡献自己的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诸如气候变化，治愈疾病等。

捐赠电脑时间只不过是利用新的分布式方法进行人类合作的一小部分。企业和学术界也正在积极招募数百万人来分享他们的学识和创意。“维基经济”这一术语是用来形容一种新型的收集数据、分享知识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大规模协作模式的，已在各个领域显现成效，让同领域专业人士已知的知识和解决方案相形见绌。“维基工作站”指的是一个合作项目，由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有一些专家和其他业余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与传统等级式组织的企业学习环境相比，这种新型扁平化的合作环

境调动了人们的集体智慧，使他们取得了出色的业绩。

这一被称为集体智慧的现象，并不是在有了分布式计算技术后才出现的新事物。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以拥护人类优生学而著称，也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亲，他是第一个领悟集体智慧重要性的人。1906年，他在家乡英国普利茅斯的集市上，碰巧赶上一场猜重量的比赛。一头强壮的公牛被带上来，赶集的人排队下注，猜牛被屠杀加工后有多重。有800人下了赌注，其中包括屠夫、农民、办公室职员以及其他没有什么专门技能的人。比赛结束后，高尔顿收集了所有800张记录条，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好并置于钟形曲线上，然后算出所有估计值的总数，估算出估计值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代表了所有人的集体智慧。人们的平均估计值是1 197磅，仅比公牛重量少1磅。高尔顿随后在英国《自然》期刊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但是直到100年后，新型分布式计算技术才让数百万人汇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开展合作学习项目。

最先利用集体智慧和合作学习的公司是一家位于多伦多的名叫Goldcorp的小型金矿开采公司。由于生产成本变高，债务堆积，劳动力躁动不安，加上找到新金矿的前景黯淡，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当时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麦克尤恩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一场研讨会，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当时研讨会讨论到Linux，即开源代码共享网络，数千名程序员免费贡献自己的时间，帮助改正软件代码中的问题。麦克尤恩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即把公司1948年在红湖的地质数据放到网上，向全球提问，在哪儿有可能找到金矿。为加大吸引力，公司还拿出57.5万美元作为奖励，奖给想出发现和估计金矿地点最佳方法的人。来自50个国家1 000多名网络“探矿者”开始分析数据。地质学家、数学家、军事人员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研究生一起加入了比赛。

麦克尤恩发现，有意思的是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跨度如此之广，包括高级物理、应用数学和智能系统，都被全力应用到“搜矿”上。他写道：“我看到了在这一行业从未看到过的能力。”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麦克尤恩说：“当我看到计算机制图时，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参赛者在公司地产范围内明确找出了110个位置，其中有一半是公司地质学家从未指出的。令人惊讶的是，在80%新发现的地方都产出了大量金矿，总量超过800万盎司[2]。

“协同生产”现正成为一些世界级大公司的标准运作程序，尤其是在制药业和化工业。大规模协作也已帮助像宝洁这样的公司重新思考其研

发模式。宝洁重新设计了研发项目，内部研究人员与外部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宝洁用InnoCentive这家网络市场公司，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数千名科学家与像宝洁这样的公司牵线，进行项目协作。宝洁把产品和服务进行外包，预期将从这类外包协作中获得50%的创意。

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已将一家世界上领先的高科技信息通信技术公司改造成协作式工作环境，如今正将这种模式向客户推销。公司技术通信总监迈克·米切尔表示："在思科，我们想要的文化氛围是，不与他人分享你所知道的东西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公司鼓励所有员工在社交网络上交流，推行内部博客，以便各部门、各个职位的人都可以分享思想和创意。据分析人士估计，"协作市场"将很快变成价值340亿美元的商机，钱伯斯渴望思科能够成为这种新型商业模式的主要助推器。

钱伯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正在崛起的分布式能源特别感兴趣。因为思科75%的收入来自路由器、转换器和高级网络技术，钱伯斯利用公司一流技术与欧洲客户合作，他们已经开始把智能电网技术用于实际。钱伯斯说："通过处理峰值负荷，转而使用其他能源，我们可以大大降低用电成本，减少碳排放。于我们而言，这将会是个10亿或100亿的生意。"像聚友网、第二人生以及InnoCentive这样的网络公司都是协作平台。

唐·塔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他们的著作《维基经济学》中指出，人类协作潜能与分布式计算技术的结合将使经济跳出传统商业运行模式，进入以"开放、对等、共享和全球运作"为基础的新领域。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对等技术催生了"分布式资本主义"，在此过程中，许多有关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假说显得过时、毫不相干。例如，亚当·斯密坚信在市场中，人类本性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尽管将信将疑，亚当·斯密还是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人们心中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但这么做的同时也有利于公共利益。

分布式模式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人性的对立面，基于与人类本性相左的假定，那就是，如有机会，人们常常是自愿地与他人协作，而这仅仅是为了给公众带来了好处而享受到的无比喜悦之情。此外，通过提升大众的福祉，人们能更好地优化自身利益。换言之，分布式协作的拥护者为他们所称的"数字公地"欢呼，而不是哀叹"公地悲剧"。生态学家加勒

特·哈丁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文中提出，因为追逐第一是人类的本性，自我利益会导致经济企业衰落。

那如何解释Linux和维基百科呢？就Linux而言，数千名程序员自由自愿地奉献专业知识，协助修改、完善数百万人使用的软件代码。代码本身是开源的，任何对软件做出贡献的人都不会享有该代码的知识产权。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沃顿商学院的管理课程项目中，如果我教授这种商业模式理论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这样的活动，完全有悖于人类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本性，因而会对这种理论嗤之以鼻。然而，Linux现在是全球重要的公司，并且向同领域如微软这样的传统公司发出挑战。

我们再来看维基百科。它是一个开源的网上百科全书，只有5名全职员工，但是其规模却是《大英百科全书》的10倍，英文词条超过280万条。所有的词条都是免费的。人人都可以添加词条，对任一词条可以添加自己的观点，由于这一过程需要协作，维基百科的错误率只比靠专家审定的《大英百科全书》略微高一点。

就Linux和维基百科而言，参与者为日益扩大的协作网络贡献力量，体验到发挥自身创造力去服务他人的喜悦，并从自由访问不断改进的网络中获益。

经济活动也不再是处境艰难的卖家和买家之间对抗性的竞赛。相反，经济活动是企业与志趣相投的人进行合作的事业。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他人获利是以自己的损失为代价的。提升他人的福祉会造福自己取而代之。零和博弈让位于双赢局面。

在商业领域，从古代开始一直流传着“买主自行小心”的说法，意思就是，商品一旦售出概不负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在传统的交易中，一方绝不会泄露内部数据，因为那有可能会违背原则，失去对供应商、竞争对手、顾客或甚至是同事的优势或先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协作的情景下，只有公开与他人分享数据，参与者才能将他们的合作最优化，在网络上为大家创造额外的价值。比如，像Linux这样的企业，只有在网络上与大家公开分享软件、代码和新应用，才能够运作下去。

从财产权到享用权

提到知识产权的持有，过去的古典经济范式和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冲突最为显著。专利和版权在传统商业计划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协作式经济中，对关键信息开源成为协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占有和控制知识阻碍协作。

生命科学领域围绕着基因专利权的争夺表明了传统市场型资本主义和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的差别。近30年来，生命科学企业一直试图争夺基因序列、基因混合嵌合以及克隆器官的专利权，同时也在争夺人造器官流程的专利权。然而，近年来，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青一代研究人员开始发出挑战，他们认为公然将知识藏起来是起抑制作用的，相反，如果能够公开自由地分享知识，可能会推动拯救生命的新医学发现，促进农业发展，在可替代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突破，也为新一代绿色建材铺平道路。

有人担心，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会控制全球的农民和消费者，因为它们掌控着全球所有生殖质的基因专利。CAMBIA生物科技研究院的生物学家已经开始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上（这是一个开源授权代理，这种授权代理与Linux和其他开源软件公司使用的授权代理类似）公开发表自己发现的基因。

一些全球制药公司开始纷纷效仿，但方式十分有限，比如把一些研究放入公开的数据库，鼓励更多的协作研究。尽管做了这些尝试性的努力，但生命科学公司仍然不肯放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愈加清晰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下，分布式协作将带来不断的突破和新发现，而在创造附加值方面，专利机制已日益过时。

专利法的渊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颁布的早期专利，那是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玻璃吹制术和拥有其他手艺的当地工匠。现在，一个工序或产品的专利时效是20年，而产品寿命周期往往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这样看来，专利时效似乎显得不太适当。

同样，版权法也遭遇了文件共享、博客、开源协作式公司（它们的工作方法是“信息喜欢自由驰骋”[3]）的挑战。在网上和博客圈上，大量的信息总是免费提供，想想维基百科、YouTube网站、聚友网和Flickr

网站。抓住版权不放意味着限制而不是扩大人们的商业服务范围。

知识产权面临的挑战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古典经济理论根基的产权关系理念本身则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回想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以及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他们相信获得产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市场提供了自我调节机制，确保买卖双方能够持续购买和交换财物。

有财产的自主人这一观念是启蒙思想的基石，也是现代个人自由理念的主题。对于18～19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而言，自由被定义为将他人排除在外的权利，是一个负面的术语。让私有财产权变得高尚，使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创了另外一种合法堡垒，拒绝对教会和封建领地履行的古老义务，抵制手工业行会制定的种种限制，以及许多其他将他们禁锢在旧秩序里的规定。不难理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将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自由的象征。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受人欺压或是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进一步积累财产并控制财产用途，确保了进一步的自治和流动性，反过来，也确保了个人自由。如果人们有财产安全感的话，那么其他所有权利（隐私权、不受挟制的权利，尤其是幸福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当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开始建立资本市场的基本元素，在全球拓展殖民地，推行重商政策，从而进一步控制土地、资源、人力以及市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贪婪，渴望获得财产，因而他们确信这些政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社会反映。

人们对财产性质的看法发生了蜕变，同时还有其他变化：欧洲大陆从封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王朝统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治理。对欧洲人而言，财产的新理念可以重塑人们与时空的关系。新技术开启了巨大的新空间，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节奏。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空间是隐蔽而垂直的，现在突然之间变成平行的，直到地平线的尽头。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时间是周期循环且相对封闭的，现在突然之间变成线性且开阔的。当过去受到时空限制的封建制度面临无限的时空时，瞬间就土崩瓦解。私有财产理念的发展成为培育新时空观的重要精神工具。

世界上的一切可以重新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我的与你的”。欧洲人曾经秉持这一原则，将所有空间开拓为殖民地。在即将到来的未来，每个人将成为自己的神，其神性在于积累财产，扩充自身，对存在和存在持续的时间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更关注“我的”，少管“你

的”。那些有才能且狡黠的人可获取最多的财产，并将其转化为资本，用资本控制其他人的本性和生活。他们叫作“资本家”。

反过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成为制度机制，加速了新世界的重组。市场作为公正的平台，使每个资本家可以与其他“战士”争斗，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获取空间和时间。同样，初期的民族国家通过建立法典和执法机制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这样做也能保护人们的自由。

私有财产关系深入人心是一把双刃剑。确保人人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阻碍封建秩序以及之后的君主制获取特权，这加深了区别化、个体化和自我化的进程。每个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成为自己领地的主导者。随着自治个体在西方史上的出现，私有财产关系理论的自然法则进一步向前发展。

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加强，有助于人们在大千世界中认识到个人生活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但人们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存在的孤独感。这些心理变化推动了人们的同理心，因为人们越来越关注彼此的独特性，努力克服孤立感，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找到生活的意义并进一步繁荣发展。

然而，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追求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甚至认为追求私有财产是人性的主要追求，这对建立“我的与你的”界限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人与人之间以新的方式彼此隔离：在特权阶层和不幸之人中间树起新的社会屏障。将私有财产关系置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可使人类关系变得扁平化：一方面，每个有财产的人是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建立“我的与你的”这一排他性原则，并将其作为管理人与人之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基础，这对同理心的拓展来说，既是推动又是阻碍。

然而，在新技术的洪流下，催生了私有财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开始式微，新技术再一次改变着我们的时空感。通过网络和其他新通信技术，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快，推动我们进入全球空间，同时也进入了新的时间领域。这带来的结果是21世纪在美国市场上进行财产交换将越来越没有生存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在广大的全球网络下连通人们的关系。

不再依附私有财产体制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无论是对全球商业的未来还是全体人类的心理都是如此。如果对私有财产的商业、心理和思想依附都继续减弱的话，那么市场的最终命运将会是什么？同样重要的

是，这样的改变对意识和人性的概念也有潜在的影响。

软件和通信革命加快了速度和生产潜力，然而市场经济却远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潜力。因此，我们正在见证与市场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经济体系的诞生，正如市场资本主义与更早时候的封建经济之间的差异一样。

这也不仅仅是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新的组织方式以提升商业行为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市场交易机制本身变得过时了。

市场的运作方式是线性的、互不相连的、断断续续的。买卖双方聚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他们交换商品和服务，然后各奔东西。完成一场交易与开始下一场交易中间有时间间隔，这意味着生产力的丧失和做生意成本的增加，市场最终因此成为“弃儿”。

相比之下，新信息通信技术是控制性的而非线性的，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持续的活动。这意味着市场交易的启动和停止机制可以被取代，在各方之间建立持续的商业关系。

例如，想想卖光盘的传统方式，再想一下新的音乐公司是如何销售音乐的。在传统的市场交易关系中，买方给零售商付一张光盘的钱。相比之下，像狂想曲这样的音乐公司使用新的网络模式，用户只需每月支付订阅费，便可无限使用公司的音乐库。过去的模式是买卖双方交换实体光盘和钱，而在新网络模式下，用户购买的是自己享受音乐的时间。

在纯网络条件下，实物光盘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制作人手上，用户以时间段的形式进行使用。订阅、会员制、出租、分时共享、预付费、租赁、授权协议成为交易的新媒介。音乐公司与客户建立全天候的商业化关系，客户也成为音乐网络的一员。现在用户是为听音乐而付费，无论是在睡觉、醒着、工作还是在听音乐时。音乐公司倾向于和用户在一段时间内建立持续的商业关系，而不是把每张光盘的出售作为单独的市场交易，因为这事关时间和成本问题。

音乐公司与客户保持高速、高效、平稳、持续的关系，而实体零售店则举步维艰地协商每笔交易（交易过程是独立的、封闭式的）。在人人都由网络而联系起来的世界中，信息以光速进行交换，时间成为最稀有、最宝贵的资源。在纯网络条件下，供应商和用户取代卖方和买方，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使用商品代替了商品的实体交易。

交易成本和利润也促进了从市场交易模式转变为网络模式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中，卖方靠利润率获利，而利润率则依赖看交易成本。但在大多数行业，利润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新信息、通信、生产技术、新节能技术的出现，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型组织方式的出现。交易成本趋近于零时，利润实际上就没有了，市场交易也不再是做生意的可行方式了。

图书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市场上，我把书卖给出版商，出版商再把它给印刷公司。这相当于把书先交给批发商，然后再给零售商，而客户从零售商那买书。这其中的每个阶段，卖方把上涨的成本价格加在买方身上，从而反映交易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尤其是卖教材和研究书籍（二者都需要不断更新）的出版商，正在绕过出版纸质书需要的中间步骤，也绕过每一阶段交易成本所需的中间步骤。虽然《大英百科全书》32卷的售价为1 395美元，出版商卖的纸质书少得多。相反，出版商把书的内容放在互联网上，信息可以持续更新和访问。现在只要用户付订阅费，便可长期访问信息。《大英百科全书》几乎消除了所有剩余交易成本（向订阅用户提供信息的成本）。出版商实现了从卖实体产品给买家到让用户在一段时间内享受服务的过渡。未来，纸质书如何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的网上书籍竞争呢？其他许多行业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况。

对大多数人而言，买一辆车标志着进入了需要处理财产关系的成人世界，也标志着我们愿意承担作为有财产一族的责任。当今，标志着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通过仪式很少见，但拥有一辆车还是从青年到成人的标志。

我们从财产交换时代进入路径时代，和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产品一样，汽车也从一件商品转变成一种服务，从人们拥有之物变成人们租赁之物。非商用汽车租赁起初无人知晓，到1999年，美国道路上近40%的汽车和卡车是租赁的。汽车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和个人身份认同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时代，从拥有汽车到享受汽车服务的转变将引领重建财产关系的巨大变革。

从所有权到享用权的转变将对企业如何处理其与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市场型商业模式的性质是关注买卖双方交换财产，因而没有什么激励措施去提高能源效率，减缓熵流。不去提高能源效率，不管熵流反倒常常得到好处。直到最近，能源成本开始上涨，碳

排放上限和交易计划以及碳循环法才开始由政府实施。这是因为，一旦产品交换到买方手中，生产商便再也不管产品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了。

而现在，像飞利浦这样的照明公司开始将部分产品转化成服务。飞利浦涉足所谓的“绩效合约”。举例而言，在新型商业模式下，飞利浦与一个城市签约，为市区提供新一代更加节能的小型日光灯和室外发光二极管（LED）照明灯。飞利浦给这个项目出资，包括提供照明设备和安装。而该城市则把在合约所议定的时间内因节能而获得的收益付给飞利浦。连一个灯泡都没有卖掉，飞利浦还是赚到了钱，从供货商变为服务供应商。

绩效合约现已在有节能意识的市场中成为一种规范。在新型商业模式下，像飞利浦这样的供应商正在继续寻找新的方式，最小化地使用能源，提供高效、可持续的服务，从而将利润最大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卖产品过渡到提供服务，提高能效以及更严格的资源管理将会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熵流将成为每个公司在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私有到共享

正如近代早期那样，现在我们对人与财产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人类的状况。之前，对封建公地要履行所有权义务，后来，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财产交易，这一“巨大转变”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人们对人类交往的本质和目的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现在从市场财产交易到网络路径关系的过渡，再次改变着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在分布式的全球化经济下，很少有人去讨论如何重建财产关系的理论，使之符合网络商业的现实情况。

我们总是认为财产是将他人拒之门外的权利，不让他人使用或获益，而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财产也被定义为在使用或享受某种东西时，不被排除在外的权利。已故的多伦多大学教授克劳福德·麦克弗森重振了过去对财产的看法：有权利享用公共财产——有权在

水道上航行，有权在公用的农村小路上行走，有权进入公共广场。

尽管财产的双重理念仍然存在，大众享用权和包容性变得越来越边缘化，19~20世纪，由于市场经济开始统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私有权和排他性盛行。

麦克弗森表示，至少对发达国家而言，收入变成范围更广、意义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实现“生活质量”。麦克弗森提出，财产反过来需要被重新定义，包括“有无形收入，即享受生活质量的权利”。他表示，“这样的收入只能算是有参与一系列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的权利”。

在协作式经济中，与排他性相比，包容性在建立经济社会关系方面日益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财产权是以知识产权和不动产形式存在的，阻碍了商业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基础设施的新型分布式通信技术和能源为商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协作式的社会，无形价值更加重要，尤其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变革方面更是如此。不被“充实的生活”排除在外的权利——有享用机会的权利——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财产价值。麦克弗森指出：“新时代下的财产权需要让人们有权参与到各种力量关系中，让人们可以过得充实。”

正如19~20世纪人们努力获取财产权一样，21世纪个人和集体努力获取“享用权”也同样重要。

充满协作与关怀的世界

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分布式的信息、通信、能源以及对等协作，在一体化程度更高，更加复杂的人类组织中进一步推进个人化进程，同时使管理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等级形态更加扁平化。

网络正在把世界改变成一个巨大的全球公共场所，数十亿人可以真正地同时联系、协作并创作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难怪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称，“让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用户自发地集思广益，表明大规模协作正在将新的网络活脱脱变成一个全球大脑”，这或许并非轻描淡写。他们表示，网络一代超过20亿的年轻人就是伴随着使用网络作为协作的媒介而长大的。

千禧一代与彼此和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是没有等级观念的，他们相互协作，关注自己的享用权，有包容性，而不仅仅是关注自治，排斥他人，对人类多样化更敏感，因而他们成为史上最具同理心的一代人。一个分布式、协作式、没有等级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更加具有同理心的社会。

第11章概述的数据趋势显示，互联网一代在承认性别平等，拥护种族多样性，尊重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利，接受性别差异方面比老一代人表现得更突出，他们对不同族裔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通婚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关心其他生物的权利。

年青一代的思维方式是非等级制、协作式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全球公司的内部组织以及管理方式。尽管还没有什么确凿翔实的证据证明管理方式从等级制转变成网络型，但思科公司似乎并非孤军奋战，还有其他公司也鼓励更加透明、等级制度不那么森严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抛弃20世纪倍受青睐的金字塔式管理方式以及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架构。它们转而正在建立网络关系和协作协议，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潜力和市场机会，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适应已成长起来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适应透明的、非等级制的、协作的沟通方式。

40多年以前，当我还是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时，决策制定等级分明，强调下级无条件接受上层的指令并做机械式的反馈，被看作理所当然的。现在这种管理风格的问题日益突显：效率低下，笨重累赘，与新型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相左。新型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采用更加扁平化的协作方式，在收集信息、解决问题和执行市场操作方面更加高效。

同理心情感是新型管理风格的核心。丹尼尔·戈尔曼、理查德·伯亚斯和安妮·麦基在他们合著的《新领导者》一书中指出，新的管理方式——同理心管理方式，正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在全球资本经济遭受重创和几近崩溃之后，全球商业界不得不重新思考经营商业的方式。事实就是，分布式信息技术、分布式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正带动分布式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需要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新型管理方式。

戈尔曼等人以在每层管理层建立透明性为着眼点。说到透明性，他们认为不仅仅是分享信息，同时也是“对他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信仰和行动”。情感的透明性可在员工之间建立信任，培养同事情

谊，促进合作。反过来，更加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增进同理心，促进彼此的关系。

戈尔曼明确地表示，“同理心是工作中一切社会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21世纪分布式资本主义经济协作式管理风格的关键。他写道：

> “有同理心的人在察觉和满足客户、顾客或下属需求方面表现卓越。他们仔细聆听，领会人们真正的关切，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在逐渐发展的全球经济下，同理心是与不同的同事相处，并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谈业务的关键技能。”

根据戈尔曼的看法，同理心情感成为管理新兴协作式工作环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写道：

> “由于领导者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进一步的合作，人际关系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机构认识到陈旧的功能法——这边做营销，那边做战略，这边又做赔偿——必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领导者经常与跨部门的团队合作，这意味着需要建立紧密和谐的关系，从而人人可以分享信息、高效协调。”

戈尔曼等人将这种新型同理心管理风格看作“紧密联系”，并认为这“体现了实际行动中的协作能力”。

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将社交商教学直接引入MBA课程。社交商项目“以在与他人合作、激励他人、领导他人方面的心理能力为核心”，心理学系和商学院的教师一道，在课堂上、社区里为大家提供机会，培养同理心技能。

虽然古典经济理论称个人会合理出卖劳动力，将收入和利润最大化，但实际上大多数员工更看重有关怀心的老板，这表明新的同理心管理风格值得信赖。对200多万员工进行研究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员工将“有关怀心的老板”置于更多钱和福利之上。同样地，一系列研究表明，如果同事之间感情良好，那么生产力会提高，即二者呈正相关。

生活质量的新梦想

新的同理心精神凸显在个人梦想的转变上。长久以来，“美国梦”强调个人机遇和物质成功，世界大部分地方以此作为标准，寻求灵感和指引。21世纪崛起的欧洲梦——生活质量，开始吸引网络一代。虽然美国梦仍是许多人的追求标准，但是由于年轻人将目光转向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恢复生物圈健康、保护地球其他物种、维持安全社区、普及卫生保健服务、确保普及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教育、倡导更加经验式的而非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创造文化多样性丰富的社区，“美国梦”失去了一些权威。生活质量是只有大家一起协作才能够实现的共同梦想。虽然生活质量还只是少数人的愿景，主要来自年青一代中产阶级，但生活质量之梦正在全球年轻人中间得到普遍认可。

从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可以看出，人们过去强调个人福祉，现在强调社区福祉。虽然奥巴马的个人生活经历是“美国梦”的缩影，但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做出了早年生活的一个关键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黑人主编。他本可以像他之前历代美国人那样追求个人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他却选择在芝加哥南部（这里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最贫穷的地方做草根活动家，改善该社区的状况。

老的“美国梦”和新的“欧洲梦”反映出对人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梦”重视个人自治和个人机遇，强调实现物质上的自我利益，获得个人自由和幸福。而“欧洲梦”既认为个人能动性和经济机会很重要，同时也同样重视推动全社会的生活质量。“欧洲梦”认为人不能独善其身，相反，在共同的社会空间里，人与人关系深厚，这样才能繁荣发展。生活质量强调共同利益，这是社区中每个人获得幸福的重要方式。

最近，生活质量成为反思20世纪许多主要经济理论假设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近乎狂热地记录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直是判断美国及其他国家福祉的指南。

国内生产总值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商务部首创，是衡量自大萧条以后美国经济复苏状况的标准。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在于它只计算12个月内全部经济商品和服务创造的价值，并不区分哪些经济活动真正提高社会的生活质量，哪些消极的经济活动降低了生活质量。每一种经济活动都被算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包括建造更多监狱、扩大警力、军费开支、清理污染的花费，由于吸烟、喝酒和肥胖导致的卫生保健成本上升，以及让人们吸更多的烟、喝更多的酒、吃经过加工的含脂肪的快餐

所用的广告开支。

西蒙·库兹涅茨发明了GDP，他在1934年向美国国会的首次报告中提醒道："一个国家的福祉几乎不能从国民收入的衡量方式看出来。"30年后，库兹涅茨再一次强烈指出GDP内在局限性，写道："我们必须牢记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别……'更多的'增长目标应当明确增长什么，为什么增长。"

多年来，人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希望提出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流行的指标包括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标（GPI）、福特汉姆社会健康指数（FISH）、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经济福利指数（IEWB）。每一个指数都试图测定提升人类福祉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

最早尝试建立的另一个指数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由当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神学家约翰·科布在1989年提出。该指数先是计算个人消费开支，再加上无偿的家务劳动的价值，然后减去那些主要为了减少损失（比如花在治理犯罪、污染和事故上的钱）的支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还考虑收入差距和自然资源损耗。真实发展指标包括很多同样的标准，但还加上了社区志愿活动的价值，减去娱乐时间的损失。福特汉姆社会健康指数衡量16项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虐待儿童、幼年贫困、青少年自杀、滥用毒品、高中辍学率、每周平均收入、失业、医疗保险覆盖率、老年人贫困、杀人、住房以及收入不均。经济福利指数将家庭储蓄率、有形资本积累（比如住宅存量）考虑进去，后者衡量人们对未来的安全感。

法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都致力于进行高级别研究，建立生活质量指数，评价经济健康状况和公民福祉。因为生活质量在评估经济表现的重要性现在可以与生产量评估的重要性相匹敌，各国政府正在寻求衡量经济成功的另一种方式，这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良好风向标。

社会和公共资本的作用

推动建立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要求人们在两个层面共同合作：参加社区活动以及愿意将税款用于推动人们福祉的公共倡议和服务上。重

振公民社会的社会资本以及管理部门的公共资本，是每个国家实现生活质量之梦的关键所在。

在公民社会里，我们建立兄弟情谊，建立相互关爱的关系，创造文化，为社区社会资本出力。在这里，我们一起玩耍，有轻松愉快的游戏，也有意义深刻的活动，仅仅是因为彼此陪伴而感到十分快乐。在这里，我们也渴望给他人的生活和社区的福祉带来积极影响。我们积极自愿地拿出自己的时间，得到的回报是彼此更加亲密。参加体育俱乐部、追求艺术、帮助有需要的人、保护自然环境、辅导年轻人、照顾老年人、推动公共工程项目和计划，这些都是我们参加社区公共和文化生活的方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代人的去世，居民参加传统的兄弟会俱乐部，比如狮子俱乐部、基瓦尼俱乐部、鲁里坦俱乐部、麋鹿俱乐部的热情渐渐消逝，但居民参加自助团体和网上合作活动的热情骤增。

虽然公民社会有时被称作第三部门，好像其重要性没有市场或政府那么重要，但事实上，公民社会是重要的部门。在这里，人们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人们创造文化共同点，相互喜欢，相互信任，这正是同理心拓展的源泉。

没有文化，无论是开展商业贸易还是进行治理，都是无稽之谈。另两个领域（市场和政府）要求不断注入社会信任感，才能开展工作。的确，市场和政府领域依靠社会信任才能运转，如果没有社会信任，市场和政府将会被削弱甚至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史上没有任何例子证明市场或政府能够先于文化存在，或是在没有文化的背景下独立存在。市场和政府是文化的延伸，反之，则永远行不通。市场和政府一直是，也将是在人类事务中起从属作用的机构，而非起到首要作用，因为文化创造了社交活动的同理心氛围，人们可在市场或政府中自信地与彼此沟通。

公民社会组织，又名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正在各个大陆不断涌现。在发达国家，后物质主义自我表现价值正成为更加主导的生活方式，公民社会组织呼吁年青一代致力于推动社区生活质量。但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新一代活跃分子正在创建公民社会组织，进一步推动实现生活质量社会的梦想。过去充满理想的青年蜂拥向政党靠拢，现在他们更能在公民社会组织中找到方向，相信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描述

集体共同同理心的另一种说法）应先于建立政治资本。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遥遥领先，因为美国的教育体系实行了一个关键的改革，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让后代承担创造社会资本的责任。

在过去15年中，美国中学和大学已经在学校课程里引入服务学习项目，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数百万年轻人的教育体验。该项目是毕业的一个要求，要求学生自愿参加附近的非营利组织和社区计划，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增进他们所在社区的福祉。

与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接触，激发了美国年轻人的同理心。研究表明，很多（但不是所有）学生的同理心情感进一步加深，因为被推到陌生的环境下，要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人。这些经历是改变人生的经历，影响学生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服务学习让学生参与旨在增进他人和社区福祉的社会活动，因此服务学习本质上需要人们合作，加强并强化合作情感和认知技能，这些技能是年轻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在培养和使用的技能。

服务学习集教学和实践为一体，才刚刚开始传播到其他国家，它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影响数百万年轻人的情商和社交商。

创建生活质量不仅要求致力于推动社会资本，还要求致力于投入公共资本去推动公共利益。欧洲人早就愿意征收个人所得税（在一些国家税率达到45%～50%），推动社区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卫生保健是公共事业，因而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婴儿死亡率更低，预期寿命更长。欧洲国家将更多公共资金用于帮助贫困人口，儿童贫困率比美国低，欧洲的社区也更安全，杀人率远低于美国，监禁的人也远少于美国。欧洲公共交通体系跻身世界前列，欧洲人在环保方面也有最严格的规章制度。

直到最近，美国人还未表达同样的意愿，将税款用于推动社会公共事业。而最近的经济低迷挫伤公众对商业界的信心，人们开启了新的讨论，讨论政府在为每个美国人创造一个生活质量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贝拉克·奥巴马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时强调普及卫生保健，将更多的公共资金用于推动公共教育，更积极地保护环境等其他有益于公众的事业。

奥巴马总统也呼吁美国青年一生致力于社区服务，开启了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新纪元。奥巴马似乎明白要想振兴政府，首先要重振公民社会。很显然，更乐于协作、习惯于社交的一代人在公民社会组织中更加如鱼得水，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推崇合作，接近平民，也比较有趣，因此比政党和统治机构更有吸引力，而政党和统治机构倾向于集中全力，本质上更有竞争性，在人际互动上发挥重要作用。子孙后代更加娴熟地创造社会资本，将同理心拓展到更多领域，政党和政府有可能被“改造”，反映出公民社会新的合作思维方式。

生活质量社会一方面重视个人经济机遇，另一方面共同努力为每个公民创建可持续社会，因此生活质量社会既推动市场发展，同时又促进社会模式的进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分布力”是技术手段，一方面大大提高创业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以协作式方式谋求社会福祉，让数亿人乃至最终数十亿人生产自己的能源，让人人在极大拓展的全球市场上成为潜在的企业家。但这一次，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进行的重新布局。数百万家中小企业和生产合作企业将在前所未有的水平范围内扩大商业机会。

让数十亿人共享能源，需要制定地方、地区、国家和跨国的治理新政策，确保普及发电、配电以及公平分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商业果实。在分布式能源市场上鼓励个人创业，同时在邻里、社区、城市、地区和国家之间进行无缝合作，统筹、储存和提供能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2世纪建立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因为各国政府正迈向一个新的梦想——在生物圈世界建立生活质量社会。所以，各国政府下半个世纪亟待商讨的政治议程是：精简市场和社会模式去适应分布式、协作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分布式资本主义经济里，合作胜于竞争，享用权变得和财产权一样重要，生活质量和渴望获得个人经济成功一样举足轻重，同理心获得呼吸和繁荣发展的空间，不再受制于等级制度、不再受到排挤，人们不再认为人性就是充满占有欲、关注自我利益和功利性，这些不应当成为人生体验的核心部分。

---

[1] 赋权，英文为“empower”，其中的“power”也可指电力。——编者注

[2] 1盎司≈28.35克。——编者注

[3] 自由驰骋，英文“run free”，其中free也有免费之意。——编者注

第14章 即兴社会的戏剧自我

千禧一代的青年是第一代成长于网络环境之下的人，他们生活在与互联网相随的协作式社交空间里，新拟剧意识正在他们之中兴起。这种新意识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布式通信和能源机制如影相随，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分别由心理意识和思想意识相随一样。

新拟剧意识推动了年青一代拥护世界主义，普遍具备同理心情感。但问题在于为全球意识铺路的通信技术革命也有不足之处，即让网络一代偏离轨道，进入一个死胡同：他们会自恋泛滥、窥探成性、无聊至极。

拟剧意识直接由心理意识而来，体现角色扮演实验的普遍性。角色扮演实验源于莫雷诺的心理剧疗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下半叶应用于T小组、邂逅小组和自助团体上。婴儿潮一代尝试用角色扮演作为治疗技术，成年后，他们将这种方法融入育儿当中，在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代有拟剧心态的人。角色扮演不再是一种治疗技术，而成为X一代和千禧一代的意识。

意识的转变反映了通信的转变：从第一代集中用电转变为第二代分布式用电。全世界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舞台，但是20世纪大多数人还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而在21世纪，由于有了YouTube网站、聚友网、脸谱网、博客等，人人都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出现创造了史上第一批大众观众。数百万人涌进电影院，或者聚在家里听家庭电台、看电视，他们可以观看、倾听精心编排的虚构故事，种类从悲剧到闹剧数不胜数，故事深入人类情感。通信频道是集中控制的，剧情是演员演给观众看的。数百万人成为被动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们没有办法与银屏上或者录音室里的人直接互动。

但人们还不是完全被动的。虽然他们不能与演员交流，影响演员，但他们的确与演员形成了一种准社会交往关系。在伍迪·艾伦的影片《开罗的紫罗兰》中，演员走下银幕，走进观众当中，而一些观众走到银幕上，与演员进行交流。

准社会交往关系最早由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提出。他们于1956年在《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并在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广播和电视“让人们形成一种假象，观众以为与表演者形成了面对面的关系”。广播和电视演员不断调整他们的表演，适应“观众应有的反应，那么观众更有可能会做出预期反应”。虽然观众不能真正与表演者对话，但是观众的确会自行构建假想的对话。

早期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如戴夫·加洛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主持人）和史蒂夫·艾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夜秀》节目主持人）与观众聊天，看特写镜头，好像他们真的在直接与电视机另一头的观众聊天。

加洛维后来表示，当他在节目上时，他经常会“想到什么说什么。我是个内省的人，我试着假装好像在和朋友聊天。我有意识地与听众聊天，让每位听众感受到我们彼此认识。这似乎挺有效……现在经常有陌生人在街上拦下我，好像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一样跟我打招呼”。

广播听众和后来的电视观众开始与广播、电视主持人形成虚拟的关系。广播电视上的名人成为听众和观众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在节目里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

霍顿和沃尔推测，数百万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与节目形成的准社会关系可以当作先验，人们可以间接地在正常生活领域外探索新的关系。

例如，数百万女性过去和现在都热衷于多集连续剧，她们关注其他人是如何处理日常的爱情和家庭关系的。霍顿和沃尔表示：

> “在这种文化下，很显然，要想时刻能够应对变化万千的社会环境下所有紧迫关头的话，我们可以，也确实需要一系列剧、故事、答读者问专栏和教人们如何社交的书籍。毕竟连续剧只不过是不断探索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应对偶发事件罢了。”

当今，准社会交往关系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聊自己最喜爱的演员、电视主持人以及其他名人，好像他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他们的生活与我们有交集似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应当被视作一种病态的行为，甚至是妄想症，但我们已经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电影、广播、电视比18、19世纪的小说更

具影响力：电影、广播、电视让数百万人对一切暂不置疑，融入角色中去，感受全新的人物假象。尤其是年轻人会模仿最钟爱的表演者的个性——模仿发型、穿衣风格、语言，甚至是得意忘形的样子，他们甚至表现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表演者，或者用想象中银幕男女主角会接受或喜欢的一些方式来表现自己。观众这样模仿表演者，与他们建立间接的亲密感，这是他们跳过传统社会障碍、获得新的社会流动感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是，准社会交往关系让数百万人体验各种独特环境下不同人（即便这些人物是虚构的）的故事。实际上，准社会交往关系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看看人们在面对他人的困境或境遇时，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也可以拓展人们的同理心。

网络革命将准社会交往关系变成对等关系。之前是集中式、自上而下、一对多的关系，现在变成扁平式、开源式、多对多的关系。这让新一代人可以成为自己剧本的演员，与其他20亿志同道合的演员共享全球舞台，所有人都为他人而演、和他人一起演。现在世界真的是一个舞台，人人都是演员。安迪·沃霍尔的妙语，即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应该要改改了。现在，数百万人终其一生在互联网上进行角色扮演，并为彼此表演。数亿年轻人用网络摄像头、Skype即时通信软件、手机摄像头、摄像机等为他人表演自己的生活，尝试新的角色和人物性格，上演史上最大的持续性表演。

现在的年轻人在现实世界里，只要醒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屏幕前，或者在屏幕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写着大量的剧本，自己导演、编排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其他数百万人能登录观看并跟进。至少对于千禧一代而言，“大众亲密”这种说法不再是一种矛盾修辞法了。

真人秀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新拟剧意识：真人秀虽然需要充分的编排，确保吸引观众眼球，但普通人还是走出了他们的生活。即便在真人秀里，电视媒介自上而下的传统通信流通特点，也让位于高度的互动性和反馈性。在广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中，电视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发挥他们的作用，引导节目方向和内容。拟剧时代正在到来。

莫雷诺绝想不到心理剧疗法的应用范围会如此之广。早期拟剧意识的理论家也不会猜到有一天，拟剧心态竟会如此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在绝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里把自己当作演员，进行表演。

电视成熟的时候，拟剧视野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推进。许多早期理

论家（如肯尼斯·伯克、欧文·戈夫曼、罗伯特·佩林巴拿亚干）是研究社会学的。他们观察社会环境下的人类行为，观察得越多，他们就越清晰地发现，剧院使用的许多传统手法和技巧有意无意地被应用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下。换言之，艺术模仿生活，只不过艺术经过更加精心地安排，是剧本浓缩的表现。

肯尼斯·伯克引入戏剧主义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基于戏剧和剧场的原则去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

然而，欧文·戈夫曼首先将戏剧修辞法科学严谨地应用于人类行为上。在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指出，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现实，实际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戏剧表演一样。他援引怀特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娴熟的女服务生是怎样赢得一位顾客并掌控局面的。当大幕升起，她要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要掌控现场，确保遵守剧本，同时在大幕落下时，还要获得顾客的感激。

戈夫曼称社会情境为“相遇”，这一术语后来很快被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所用。戈夫曼继续研究“戏剧性相遇”的关键特点。首先，他将表演本身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下，某个参与者的所有活动在任何一方面影响其他参与者”。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展现的固定行为模式是一个角色。说到角色，戈夫曼是指传达一种印象，表演者“体现了他想体现的特质，表演者的表演要达到潜在的预期效果”。换言之，表演者的角色需要有可信度，他需要表现得真诚。

戈夫曼观察到，每种职业，包括医生、律师、科学家、会计，更不用说销售员、秘书、职员等，都戴着一副假面具，别人期望自己该怎么做，自己就表现出那副样子。他们的表现是职业风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与既定“剧本”偏离太远的话，很有可能失去可信度、失去客户、顾客或丢掉工作。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时刻：在社会情境下，年轻人如果遇到一位行为不合常规的老师，会大吃一惊，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威廉·詹姆斯早在拟剧意识理论家出现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人类行为的拟剧本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社会自我，因为我们会在乎不同群体的观点。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每个群体表现出自己不同的一面。许多青年在家长老师面前，表现很得体，而在‘强硬的’年轻朋友面前则像一个海盗一样骂骂咧咧、神气活现。我们不会把在俱乐部成

员面前的表现带到孩子面前，我们对待员工的表现与对待顾客的表现相异，对待亲密朋友与对待雇主的表现也不一样”。

戈夫曼认为，所有有意的社会行为本质上是具有戏剧表演性的。他指出，在每场表演中，演员在“后台”排练（通常是在脑海中进行），然后在台上表演，说出台词。我们想想自己一天的社交互动，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对要说什么，以及怎样说进行排练。我们在想下一句要说什么，要配合什么样合适的动作和肢体语言，即便只是想了一瞬间，那也是花了时间的。

拟剧意识几乎成为复杂、相互联系、高速发展的文明的必需品。如果说人生是将无数个人和集体的社会戏剧演出来的话，那么人们所在的经济社会网络越复杂，每个人要演的角色就越多样化。

从拟剧方式看人类行为，自我不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约翰·洛克让我们相信自我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戈夫曼认为：“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感受与他希望分享的人共享。”丹尼斯·布里塞特和查尔斯·埃奇利在《人生如戏》一书中表示：“自我不是实体，而是一种虚构、构建好的、一致同意的特质。”这源于人们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若真如此，那么人存在于世上便要依靠在舞台上与其他演员一起演出剧本，体现自我。这种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截然不同。黑格尔认为每个人的独特自我既植根于人一生所获的财产，又通过这些财产来体现。

显然，剧作家没有将他们的方法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社会学的唯一隐喻。他们相信人生本身就颇具拟剧色彩。罗伯特·佩林巴拿亚干认为“现实并非是戏剧性的，而社会所认为的现实或者部分现实是有戏剧色彩的”。至于原因何在，佩林巴拿亚干写道：

> “戏剧性成立的前提是，一方面人类情不自禁地与符号沟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觉地意识到周围的人在理解周围的世界。世界由值得沟通的社会事实或社会客体组成，戏剧性地发展、呈现一个主题。戏剧并非是脱离社会的东西，相反，戏剧是社会百态的精华和浓缩，或者可以更尖锐地说，它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关系。”

佩林巴拿亚干指出，连我们的财产都变成戏剧的一部分。我们周围到处是实物，我们用各种方式重新整理它们。佩林巴拿亚干表示：“把这些东西转化成符号，从而从他人那里获取特别的反应。”这些实物成为戈

夫曼所说的“自我呈现”的一部分。

拟剧视角将沟通交流置于人类活动的中心，在相关术语中重新定义自我，将经历本身看布戏剧，把财产转化成符号，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的生活经历中转换，演出许多戏剧角色，每个人代表各自生活的不同方面。归根到底，拟剧视角生动地描述了一代人的心境，他们不断地转变身份、角色、剧本以及舞台背景，这种心境无论是在虚拟还是真实的空间里，都不断在社会和商业网络中切换。

这种解释人类本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绝大多数人同意把戏剧手法和技巧引入到专业演员的培训和学习中，而演员的事业发展离不开这些戏剧手法和技巧。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几年前，《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文章指出，医生每次与患者接触时像演戏一样，既然这样的话，如果医生要适当地履行职责，就像他们在医疗培训时那样，他们也应很精通合适的戏剧手法。西安大略大学的两位医生希勒尔·范思通和戴维·康特评论道：

> “如果一位医生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去评估病人的情感需求，不能清晰、有效地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的话，那么医生就没有完成工作。所以，我们认为医疗培训应当囊括表演课程，强调对这些情感需求做出合适有益的回应。”

现在导演和演员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运用适当的戏剧技巧提高专业人士的工作“表现”。

提倡拟剧培训的人表示，在有组织的情境下理解人类行为的传统方式过于依赖机械的隐喻，顽固地认为人性是理智的、功利的、自私自利的。这种方式忽视了人类互动的社会性。人们喜欢讲故事，用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表演生活，而这些可以用戏剧技巧和手法进行分析、理解和修饰。

像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样一流的商学院，已经把拟剧原则引入到它们的高级管理项目中。专业演员和导演指导企业管理人员，教他们戏剧表现艺术，让他们进行角色扮演的强化练习，将戏剧技巧熟稔于心并应用到实际环境中，从同事和客户那里获得理想的反应。

戏剧培训并不止步于毕业。各公司已将拟剧技巧推广到每个运营部门，从人力资源管理到营销都是如此。请专业演员照着剧本表演的方式可让员工就某个问题（比如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参与表演。公司也鼓励员工一起创作剧本，从不同的视角和角度演出各种各样的情景。即兴表演越来越多，尤其是碰到从未在培训手册或案例研究中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情况，帮助员工“尝试成功的‘演出’方式”。集体创作剧本和即兴表演都是高度协作性的活动，有助于培养新的协作工作方式，这正是分布式网络世界的常态。

班夫中心领导力发展项目的执行官尼克·尼斯利强调了在所有戏剧表演中常常未言明却十分重要的特点。任何表演过、执导过、做过舞台监制或参与过戏剧表演的人都知道，他们总是进行合作。在戏剧制作中，人们形成了亲密关系，结下了友情，有集体创造力，正是这一切吸引了那么多人加入到戏剧经历中去。尼斯利等人写道：

> “因此，没有人能彻底掌控专业戏剧表演，按释义，戏剧表演就是合作。剧作家只能有一定的控制权，而尽管演员可以把剧本表演得鲜活起来，但他们没有无限的选择，必须在剧本范围内创造现实。观众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表演。对于有组织的戏剧干预和培训，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表演的意义是共同构建的，也将反映各种利益。”

戏剧原则以及拟剧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在各个领域无处不在。企业家为了激发投资者和客户的想象力，需要讲述一个并不存在的事情，但又必须听上去确有其事，这时候就需要自由发挥艺术想象力来说明这个问题。观众需要“对一切暂不置疑”，这也是戏剧的精髓所在，观众将自己置身于企业家创造的虚构情境中，好像真的感受到有那么一个项目。

展现真实的自我

拟剧意识提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真实性。一提到表演，难免就会提到假装与可信的问题。

在神话意识时代，英勇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神学意识时代要求人们虔诚，在注重思想意识的时代，要求友善的人真诚、品质好，在心

理意识时代，讨人喜欢成为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而对于成长在拟剧意识下的一代人而言，真实则成为检验人们的标准。

如果人性本就有拟剧表演的特质，那我们如何构建真实性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的舞台根据不同的剧本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在所有这些面具背后，我们如何辨别这个人真实的一面呢？

真实性这一问题在专业领域提得越来越多。举例而言，虽然神职人员早就意识到牧师对教徒的关怀有表演性，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进行热烈的讨论：拟剧手法如何教我们辨别虚假与真实。教牧心理学教授雷纳尔·诺塔就神职人员的表演和真实性这一关键问题发表看法：

> “虚假与真实的两难境地可通过以下方法得以解决：人们对他人的表演信以为真。这样做的话，人们可以看到信以为真的表演所呈现的现实。”

诺塔观察到，很多戏剧类型的目标是在观众中达到情感宣泄，同样，人们也是这么理解牧师对于教徒的作用的。“在舞台上，把个人问题用非写实的、易于辨识的、可替代的方式表演出来，演员之间产生共鸣，戏剧中的情感可以宣泄出来，否则难以找到宣泄口。”

牧师使用的各种戏剧手段“承载了教徒的理想、幻想、欲望和担忧”，成为“他人情感的承载物”。

然而，要让教徒展现他们的情感，反思他们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并对情感宣泄做出适当的反应，牧师需要使用戏剧手段才能达到效果。这成为促使教徒做出真实反应的妙计。换言之，牧师的表演，即便是假装的，也对获得真实反应起到重要作用。诺塔表示：“假装表演和戏剧是任何开放沟通的基础，即便对于想表现出真实的牧师也同样适用。”

只要用拟剧理论描述人们在社会情境下有意识的行为，就会提到真实性这一问题。人们总是不安地认为，如果人类行为真是充满拟剧色彩的话，那么就不是很真实。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诡计的戏剧是不可能的事。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不同的情境下戴上不同的假面具，可能会真实地反映人们身份的某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实际上都将不同个性集于一身，那么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某一刻扮演的某一角色是否是真实的。

戏剧可以让人们区分纯粹的诡计和积极的想象。虽然人人贬低诡计，但积极的想象则被誉为是创造自我感、世界感以及形成成熟同理心纽带的关键。像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的戏剧理论家提出了戏剧分为表现派和体验派。表现派依赖于诡计艺术，而体验派则靠想象力。表现派形式重于实质，而体验派源于表演者心灵深处的潜意识。

在表现派中，表演者使用做作的手势、调整好的声调以及夸张的动作“刻画”一个人物，一点儿也没有把个人生活的感受带入到角色中。这纯粹是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表现派“其形式比内容更有趣。这种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视听冲击，但不会触及观众的灵魂。因此，这样的表演让你高兴但不会让你感动。这种表演的局限性在于通过出人意料的戏剧美或生动的感染力而达到表演效果。但是人类细腻深沉的情感不会受到此种技巧的影响。这样的情感需要展现自然的情感，需要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换言之，在表现派中，演员表演表现出好像有某种情感，但实际并没有。而真正的体验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为“方法演技”）应当是这样的：演员从潜意识或半意识的记忆中，寻找过去类似的可取而用之的情感经历，用到饰演角色中，体会那种情感历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醒演员不要只是再次唤起情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不是这样产生的。他写道：“在舞台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能为了激发某种情感而马上去激发某种情感，绝不要试图表现得在嫉妒，表现得充满爱，或是为了遭罪而遭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所有的情感都是有历史渊源的，它们是过去经历的体现。因此，体验派要求演员激发自己的潜意识，记住在类似情境下自己的感受和情感。“演员准备的目的是跨过潜意识的门槛，事先需要有‘看上去真实的情感’，事后需要有‘真诚的情感’。”

记住情感经历的重要意义在于今后可以派上用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他的演员训练自己，去想想他们的情感（既是目标也是经历），希望可在未来回想起这些情感并派上用场。

然而，只有当演员通过想象回想起过去情感，在表演的时候，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初的情感，过去的情感记忆对演员才有价值。演员必须要将饰演的角色和自己合二为一。

在体验派中，演员短时间内好像变了一个人，在情感上变成了戏中人。但是，表演结束后，那种角色体验也随之消逝。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都在运用体验派表演，影响与他人关系的现实状况，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罢了。现实生活中，体验派会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社会学家阿尔伯特·科恩组织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大学生，他们被训练成为营地负责人，帮助情绪失常的孩子。研究显示，当把体验派方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真的会产生同理心影响。

首先，资深负责人会向培训生简单地介绍需要照顾的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们会因一时冲动做出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这就要求培训生把孩子们看作受害者，因为他们的举动多少和他们艰苦贫困的背景有关。他们需要极大的关怀和宠爱，这样才能打破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成见，他们认为成人世界是充满憎恶和敌意的。”

在提供相关背景后，要告诉培训生如何对待孩子。“临床医生虽然有时要制止孩子，甚至把孩子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以免他们自残或是伤害他人，但绝不能生气或打算惩罚孩子。毕竟，工作人员应该热情，充满爱心，总是用‘临床态度’作为指导思想。”

在和孩子打交道的时候，要提醒年轻负责人不要勾起过去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情感，因为你在面对某个特别困难的孩子时，可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比如，“汤米让我想起13岁时照看的一个小顽童，如果汤米像那个小孩一样的话，我就会讨厌汤米。”相反，我们鼓励新负责人想想其他过去的感受，可能会对现在的情况在情感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汤米很像我14岁时照看的一个小孩，他很难哄，但是我喜欢他，虽然汤米很怀疑地推开我，我还是希望会喜欢汤米。”

体验派的实验非常成功。科恩的报告显示：“很大程度上，他们实现了这些期望。我相信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感受到了同情心、体现出温柔关怀他人的一面。这些大学生如此快地学会用这种方式做事，这很难用‘内化’这种缓慢的学习方式来解释。”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管理心理学》一书中有一项关于达美航空公司乘务员培训课程的研究。在培训过程中，工作人员学习应当与乘客进行适当的情感沟通。虽然飞机乘务员培训完全从教学角度出发，没有涉及体验派表演方法，但是乘务员却表示，他们在工作时经常这么

做。

飞机乘务员回想过去令自己开心的经历，然后把开心的感受带到工作中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笑容满面”地面对乘客。一位飞机乘务员告诉霍克希尔德说，回忆快乐的情感，行为举止也快乐，总会带来积极反馈。这位乘务员说道：“如果我假装自己好像很开心，有时候真的会开心起来。乘客会觉得我很友好，那我也会更开心地回应乘客。”

另外一位飞机乘务员说，当她面对一位酗酒或者令人讨厌的乘客时，“我试着这么去想，如果他喝了太多酒，可能是因为害怕飞行。我这么告诉自己：‘他像一个小孩子。’真的，他就是那样。如果我把他当作孩子来看，他对我吼叫，我就不生气了。接着，他就像孩子一样对我大吼大叫。”

霍克希尔德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关切：表演被当作一种培训技巧用得越来越多，用在服务行业，指导服务行业如何在体验型经济中掌控情感，将商业关系最优化。这的确如此，但同样正确的是体验派的理论和技巧训练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牢记这些感受，提高从潜意识中勾起这些回忆的能力，当有情况发生时，可以通过想象与当事者感同身受。当体验派用于适当的亲社会目的时，是激发同理心的强大精神工具。我们已在第5章讨论过同理心，我们通过同理心参与到更深层次的现实领域，因为现实是我们凭借各种关系对世界的共同理解。

体验派可让人们强化同理心纽带，通过同理心纽带加深人们的现实感。体验派与表现派迥然不同，表现派仅仅体现形式上的外在，表演充斥着诡计。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现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女演员，也是体验派大师。她曾经说过：“人类最美好的天资是我们有同理心。”

互联世界中的关系自我

拟剧意识是如何解释千禧一代的心理呢？许多心理学家，甚至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在一个复杂多样、相互联系、充满新奇、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孩子同时成长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平行时间和线性时间

中，多角色扮演和无数的身份认知成为常态。而心理学家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是，拟剧意识是否一定会导致意识的进步或是瓦解。

肯尼斯·格根认为，在一个以光速相互连接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处于更多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比以往的形式更多，也更紧张”。我们被淹没在虚虚实实的关系之中。把自由定义为自治性和排他性的资产阶级最渴求的价值是隐私，而把自由定义为个人关系深度和广度的千禧一代最渴求的价值却是连接。包容性变得比排他性更重要，而竞争风气也开始受到合作意识试探性的挑战。

在拟剧意识时代，一个人的身份认知是关系性的，并且只存在于这个人连接到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中时，如果不能连接就意味着孤立和消亡。在这个全天候连接不断的世界里，虽然人们可能依旧孤独，但独处的时间已经趋近为零。在这个时间宝贵的社会里，任何时间空隙都成了发展“另一个连接”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吸引他人注意力为最高准则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关乎我们的存亡。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名言“我参与，故我在”已经被替换成新的格言——“我连接，故我存在”。

旧时“我的与你的”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一维自我”正让位于新的包容以及“多维自我”观念。格根观察到：

> “传统文化中相对连贯完整的自我内在观念让位给更多维，更具竞争力的观念。在这个不断变化，相互连接，充满争议的世界里，人们会处于心理多维化的状态之中。”

就像即兴表演艺术家要抓住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快速前进的故事脉络，每时每刻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一样，我们被迫不断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和剧本之间切换，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在迷宫般短暂易变的连接和经历的网络中迷失了自己。格根提醒道：

> “这种自我认识的破碎，对应了多种断裂的不连续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把我们引入无数的方向，使我们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因此也和‘真正的自己’渐行渐远。完全沉浸在各种关系中的自我也就不是真正的自我了。”

格根担心，随着新世界的展开，自我概念会完全消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人们不再相信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独立性。因此，几百年来，关系首次取代了独立自我，站在西方历史的中心。

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欢迎关系型自我的概念，认为通过打破“我的与你的”的观念，我们可以在21世纪拥有一个更加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比如，让·鲍德里亚认为在这个正在到来的全球化社会，“我们那充斥着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纷争的私人领域舞台已经谢幕了”。我们不再以主观自我的形态存在，如鲍德里亚所言，而是以“多重网络的终端”存在。

罗伯特·利夫顿指出了意识的另一个变化。他认为，拟剧意识（有多个面具角色）是一个应对机制，反映了人们适应这个超现实全球社会的需要。利夫顿称，扮演不同角色和拥有多个角色面具，与其说代表了自我的消亡，不如说是意识的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应对世事的复杂和模棱两可以及利害冲突。利夫顿认为能够经历各种不同的现实，甚至在同一时刻经历，需要不断变化的意识。

格根似乎同意利夫顿的一些想法，但是也有所保留。这并不是说格根对于人类意识的发展方向感到悲观。格根赞同哲学家马丁·布伯对于人性的分析。布伯认为，“刚开始就是关系”。格根看到，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人类正日益嵌入各种各样的关系中。他担心的是，我们对于关系的关注和心理依赖会淹没我们的个人意识，使认知变得混乱。

格根指出了一条拟剧理论学家经常忽略或是绕开的限定性条件。那就是，拟剧形式的思考方法只适用于现代。他提出，“扮演角色”的意识是基于同真实自我的可触知性对比而来，如果没有“真实自我”的意识，那么“扮演角色”的概念也就没了意义。

当莎士比亚写下“世界就像一个大舞台，所有人都只是演员”的时候，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能够扮演角色了。意识能够把自我分割开来，从而戴上面具扮演其他角色。现在，人们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并且在角色之间快速转换，很容易造成这些角色的共同毁灭。

随着戏剧自我变得更加可塑化和悲剧化，真实性这个概念变得不再重要。“真实”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不变且完整的自我，以及心理上的自治。然而在拟剧意识时代，人们模仿复制的个性就像社会中的一条“变色龙”，不断地从各种来源吸取不同的身份，并在特定的场合加以利用。

戏剧自我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路易斯·泽克认为当人们摒弃自我作为一个“客体”的概念，而认为它是一个“过程”的时候，那自我就真正的世界化了，并包含最为宽广丰富的经历。

但是泽克也提醒到，易变的自我容易导致极度的自恋情结，随着可依靠的真实自我的消亡，人们会陷入充满谎言的困境，如同马基雅维利式的谋权世界，在这里角色扮演成为人们达到自我满足的工具。

格根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于人类意识的未来是谨慎而乐观的。他相信在这个相互联系不断加深的世界里，不断加深的各种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我的与你的”的相处模式，“从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信念变成了与他人不可分割的关系意识”。这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能够保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让同理心不断成长。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关系的集合，而这些不同的关系成了区别人与人的独特特征。相信自我是由个人在一生中的经历组成的观点，与相信人们的各种关系和经历正是使人变得与众不同的观点是不矛盾的。人们只有意识到这种不同，同理心意识才能够继续成长，并且成为全球意识的心理及社会黏合剂。

如果没有自我作为独特一个的关系集合体的概念，那个人就成了“我们”，同理心会消失，而通向全球意识的历史进程也会消亡。这是因为同理心意识是建立在人们认为他人和自己一样，是独特而鲜活的存在的基础上的。我们对他人表达同理心，因为我们承认她易碎而有限的生命，她的脆弱，以及她仅有一次的生命。我们可以感受她的孤独、她的困境、她的挣扎、她的成功。我们的同理心使我们能够站在她的角度去感受她的生活。

如果我们陷入未分化的全球“我们”的困境，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在那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未分化的神话迷雾中，自我的意义不大，只有生理上非常基础的同理心痛苦。维护差异愈加明显的自我意识和它所处的更加紧密的关系网之间的逻辑平衡，很可能成为决定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未来前景的关键。

社交网络上更紧密的联系

有证据表明，新的拟剧意识产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早期，新形成的分布式资本主义既加强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化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也使人类变得更加自恋，自我意识更加脆弱。

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新的分布式通信技术是否能够使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多年来，批评者都警告说，人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意味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令人担心的是，虽然互联网使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和传统上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比起来，新的社会关系还是显得冷漠和肤浅。然而，近年来积累的数据表明，这些担忧总体而言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

“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和社区意识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只不过是以非传统的方式加强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正越来越多地从大家庭和社区组织转向互联网世界中的“社交网络”，志趣相投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这种汇集超越了地域的界限。

> “因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体，而非家庭，所以互联网与手机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转变成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

“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在调查过程中会询问人们互联网对其“核心关系”和“重要关系”的影响。核心关系指的是那些极其密切和亲近的关系，重要关系指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对自身某种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密切关系。

调查发现，与批评人士的担忧恰恰相反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接触得越多，通过电话联系和面对面接触的次数也就越多，这就表明美国人同其社区和社交网络成员的接触可能比互联网出现之前更频繁。在这次调查中，有31%的美国受访者说，在互联网上的接触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只有2%的人表示互联网缩小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总的来说，互联网用户的社交网络比非互联网用户的社交网络要大一些。

这项调查还包括了在线社交关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将其同之前的教堂和慈善互助会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做了一个对比。换句话讲，在线社交网络出现之后，公民参与程度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呢？调查结果发

现，公民参与程度仍然很高，但更多地发生在网络空间里，而非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里。在线自助网络、支持团体、聊天室和讨论小组日益成为新的公共广场，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加强联系，相互扶助。

增加互联网的使用往往有助于用户维护和加强现有的社会关系，帮助用户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曾经警告的那样，减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没有牺牲人们的核心关系和重要关系。相反，在线交流时间的增加反而减少了人们用于非社交活动（如看电视和睡觉）的时间。

一个相关的调查表明，通过互联网进行更加频繁的文本信息交流会激发人们花更多时间进行面对面交流。研究人员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保持联系的频率，而且在于交流介质的性质和使用它的方式。文本信息交流需要人们拿出更加谨慎的态度，写信息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撰写公报的过程，与电话交流或面对面沟通存在很大的差异。文本信息交流会催生更多的亲密交流，因为互联网上信息交流通常是在家里完成的，而且经常是在深夜，这就使人们比在公共场合更加倾向于分享个人隐私。“30%的青少年说他们在线交流时可以与朋友分享更多，29%的人说他们在网上与朋友交谈时更诚实。”

关于互联网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或许就是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在线交流更容易发现“真实自我”。心理学家将人类的自我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现实自我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给别人的一面，理想自我是我们向往的一面，而真实自我是我们自己视野中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愿意向他人展现真实自我，因为我们担心自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或者担心遭到他人的拒绝。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根据自己连续多年的研究指出，长期沉溺于社交网络或者依赖科技产品与外界联系，非但不能使人摆脱孤独，反而会让人更孤单。更可怕的是，网络空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匿名性，会刺激人们尝试着通过类似于角色扮演之类的游戏展现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展现的一面，这种做法无异于通过一种拟剧手段展现了之前不为人知的人格。

更多地披露真实自我对于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和同理心纽带来说，至关重要。只有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袒露自己的脆弱，分享我们内心世界的情感、困境和挣扎，我们才能与别人建立同理心纽带。如果说互

联网这一媒介有助于促使个人袒露真实自我，推动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和同理心纽带，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即互联网这种新型交流媒介能够推动人类同理心达到新的高度。

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互联网的相对匿名性极大地减少了披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尤其是自我隐秘的一面，因为在网络中，人们在分享内心想法和情绪的过程中可以不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害怕遭到反对和惩罚。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互联网上的初步接触会鼓励人们进行“较大程度的自我披露”。外表缺陷、口齿不清、害羞、焦虑和其他可察觉到的不利因素可能会妨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密切关系，但在互联网上不会成为交流的绊脚石。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这些“第一印象”，当事人能够向对方展示自己，并开始同对方建立关系。

最后，互联网可以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更容易地发现对方。具有共同爱好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切入点，有助于开启了解彼此、建立关系的过程。互联网确实让数以亿计的人通过前所未有的方法，迅速和轻松地找到了具有类似兴趣的人，打开了拓展社交网络的窗户。如果没有互联网，而是在正常的社会话语中，那么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能发现对方，并建立关系。互联网也让那些忙于工作、照顾孩子等日常事务的人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特琳·麦肯纳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越是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展现自己在其他生活情景中不能或不愿展示的一面，就越有可能与他们在网上认识的人建立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

此外，与非在线关系相比，他们在网络上形成的关系发展速度更快。他们往往也会通过电话交谈、交换信件和照片、线下会面等方式相互接触。因为在网上披露个人的真实自我有助于培养更为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线建立的关系往往容易转变成更浪漫的现实关系，包括婚姻。

在凯特琳·麦肯纳的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与他们在网上认识的人进行过电话交流，56%的人交换了照片，54%的人写过信，54%的人线下面对面地见过网友，平均每个人见过8次。

在长达两年的调查中，与传统上那种面对面的关系相比，在线关系往往比较牢固，其中，71%的始于互联网的爱情关系（75%的始于互联

网的所有类型的关系）在两年之后仍然完好无损，大部分甚至变得更加牢固和紧密。此外，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网络关系与非网络关系同样真实、重要和密切。

最后，当被问及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孤独感的影响时，47%的人说没有影响，但是另外47%的人表示互联网帮助他们减少了孤独感。大多数（68%）的受访者表示互联网扩大了他们的社交圈。

虽然很多人认为网络空间会进一步孤立个体，但麦肯纳的调查、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和其他无数个研究都揭示了恰恰相反的情况，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最不符合直觉的一个发现，就是人们在虚拟现实中更加倾向于向别人展示他们的真实自我，比在面对面的现实中更有可能形成牢固的和亲密的个人关系。

互联网为个人展现“真实自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而也为人类拟剧意识的发展搭建了一个独特的舞台。有时候，真实自我不适合在现实空间中展现，反而适合在虚拟空间中展现，这的确也够奇怪的，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要知道，在18～19世纪，虚拟的小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找到并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并形成更加强烈的同理心情感。这次，在互联网时代，不同的是互联网的影响范围比小说的影响范围广泛得多，搭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平台，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进行密切的交流。现在，人类终于有可能将同理心普及到全球范围内。

名声因素：一切围着我转

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搭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交流平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于兴奋，因为有一个负面作用也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即互联网能够激发和放大个人对于获得外界认可的欲望——名声因素，这种力量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互联网是一个分享和协作的工具，它也是一个能够激发无限的自我表现欲和自恋情结的平台。互联网这一媒介能够为向他人展现自己的“真实自我”、培养更加牢固和密切的关系提供可能，同时也会把地球上的每个人置于这个公共交流平台的中央，而平台下面的观众数量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对于那些具有自恋倾向的人而言，互联网提供的自我展示机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像具有

偷窥欲望的人终于得到了偷窥的机会一样。在当前这个商业化的世界中，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商业媒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商品化了，为人类释放自恋和偷窥倾向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目前，对从蹒跚学步的儿童到3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的批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娇生惯养和过度关注，被告知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也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围着我转”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固执己见，自尊心膨胀。然而，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与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相比，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更加开放和包容，偏见更少，更善于接纳多元文化，热心公益事业，热心帮助别人，而且更有合作精神。当然，美国社会的观察者肯定发现了上述正反倾向是同时存在的，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也都是如此，只是可能不像在美国那么明显。

今天的年轻人有可能被夹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些方法——更不用说商业因素的影响——是否催生了一代摇摆不定的儿童呢？是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一切围着我转”的思想逐渐淡化了，年青的千禧一代更加注重团队精神以及更具协作性的关系。

这两种同时存在于具有拟剧意识的两代人中间的思想倾向差异显著。2004年，一项美国全国性调查发现，只有5%的大学生希望成为一个演员、艺术家或音乐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一项调查询问了美国人是愿意出名还是满足现状，结果有29%的年轻人表示希望出名。

电视真人秀节目就抓住了年青一代内心深处对于渴望被发现、渴望成名，甚至是能一夜成名的愿望。很多年轻人看到荧屏上的成功人士后，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那个人，结果就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着自己有一些好运气，不需要有什么天资才能就可以成名，受到数百万人的崇拜。目前美国有500多种真人秀节目，包括《美国偶像》《老大哥》和《幸存者》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排队等着参加这类节目的选拔。

即使他们吃了闭门羹，没机会参加试镜，也没机会在真人秀节目中获得一个角色，互联网仍然为他们提供了无数个其他类型的社交媒介，像YouTube视频网站、聚友网、脸谱网、Flickr网站等。这些媒介的用

户多达数亿，遍布世界各地，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制作自己的视频，为别人表演，希望引起关注，并成为明星。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博主在博客里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他们的个人故事，并与他人分享，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生活对他人产生意义，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很多年轻人都痴迷于获得个人名声，这个现象已经引发了很多严肃的探讨、辩论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媒体是部分原因。利用互联网来获取关注的能力是诱人的。

但研究者还认为，年轻人对名声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的孤独感，渴望得到外界认可。一些研究者指出，人们对于名声的追求有时起源于对于死亡的恐惧，而获得名利至少能保证人们获得短暂的不朽感，或者至少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认可，得到了数百万人的钦佩和羡慕。名声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与核武器威胁，可能会遭遇世界末日，这就导致很多人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下意识地促使很多人产生了追求名声和不朽的欲望。

并非只有美国人热衷于追求名声。在中国和德国的城市也开展过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30%的成年人“经常梦想着出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超过40%的成年人认为在有限的生命中，名声总有到来的一天。在青少年群体之间，持有这些想法的人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

心理学家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追求名声，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长期遭到忽视、排斥或怀疑造成的。离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成长于破碎的家庭或者单亲家庭。这类现象很容易让孩子产生被遗弃的感觉。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再一次追溯到如何抚养孩子。

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当代美国的年轻人之所以非常痴迷于追求名声，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校园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自尊运动”。这项运动使自尊感和自我意识深深地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更重要的是，在父母在抚育子女以及学校的教育课程中也格外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尊感。

在《我一代》这本书中，简·腾格博士汇总了涉及12项研究、150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人的代际行为差异。她发现，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人的自恋倾向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她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学校开展的自尊运动。她说，年轻人被一遍遍地告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应该首先爱自己，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世界将会逐渐认识到他们非常特殊的才能和贡献，并且赞美他们。虽然这种关于自尊运动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老师和家长开始格外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尊感，表扬他们的独特存在。2006年，用谷歌搜索“小学、使命宣言、自尊”词语，出现的网页数量竟然达到了令人惊讶的30.8万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9 000本关于自尊和儿童教育的书籍，而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只出版了500本。

北佛罗里达大学的辛西娅·斯科特的研究发现，60%的教师和69%的学校辅导员表示，鼓励学生培养自尊感是很重要的。斯科特认为，学校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谁，而不是关注学生的成绩或行为方式。

简·腾格描述了美国小学开设的一个典型的培养自尊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名字叫“我是伟大的”。老师先选定某个学生，然后让班上其他学生说一些这个学生的优点，并将这些赞美记录下来，让那个学生去看。课堂结束时，老师让这个被赞美的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一下自己的优点。

在体育赛事中，人们希望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能在赛场上坚持同样长的时间，最后，不管他们表现如何，只要出场了，尝试了，都会获得奖励。

在竞赛中获取成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培养学生对于自己在学校的良好感觉则是比较重要的。提高分数是认可学生、淡化学生竞争意识的主要手段。2004年，48%的美国大学新生称自己在高中阶段的成绩平均为A，而在1968年，只有18%的大学新生这么认为。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美国高中生用于做作业的时间以及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都有所下降。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多孩子的真实成绩下降却获得了更高的分数时，大学理事会的霍华德·埃弗森回答说：“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自尊感和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曾经播出了一次关于学生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转变的调查。调查者问2000级的学生“是什么让你们对自己形成了积极的感觉？”有33%的学生回答说自己的自尊感，而只有18%的学生说是在校表现，13%的人说受人欢迎。

事实证明，美国校园开展的自尊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大学生的自尊心高于1968年86%的男大学生，而女大学生的自尊心高于1968年71%的女大学生。

虽然自尊感强烈是一个积极的品质，但简·腾格与其他教育工作者不赞成学校课程过度提高学生们的自尊感，因为如果学生认为自己的价值过高，往往容易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评估往往不切实际，加剧自恋倾向，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他们旋转。20世纪50年代，在14～16岁之间的青少年中，只有12%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却增加到了80%。

问题是，当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人更重要时，他们就变得不那么宽容了，不愿意容忍批评。失败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他们遭遇失败时，不知如何应对。他们也不善于对他人表达同理心。

自恋和追求名声具有一个漫长而纠缠的历史。如果说一个人的自恋倾向加剧，就认为他在追求名声，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以及很重要，那么这种看法是不难接受的。

我们的年轻人真的自恋和自私吗？难道我们培养了一代只关心自己的自恋狂吗？现实中的证据比调查研究提出的证据复杂得多。一些教育家认为，由于各种反馈信息敲响了警钟，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过度注重提高孩子自尊感的情况已经开始缓和了，学校和父母已经开始采取较为适度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尊感。

简·腾格的大部分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和2003年之间开展的。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却为我们揭示出一番略微不同的情景。与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被遗忘的那一代美国人不同的是，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达到成年的千禧一代似乎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我。

对千禧一代的分析

千禧一代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社交网络、短信等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新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分布式特征以及它们催生的协作式关系，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了这一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上。

首先，千禧一代不同于婴儿潮一代和被遗忘的一代。婴儿潮一代往往充满叛逆精神，经常反抗父母的权威，被遗忘的一代往往被他们的婴儿潮一代父母忽视，而千禧一代与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家庭的依恋关系和信任关系更加强烈。千禧一代的孩子，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50%的孩子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父母，45%的孩子每天都用手机与父母通话。

调查还显示，与被遗忘的一代不同，千禧一代往往更具有同情心，更愿意主动了解每个人的观点，更愿意平等对待每一个组员的意见，更愿意协同工作，寻求共识。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不太可能接受专家的话，更有可能相信大众的集体智慧。他们不认同传统上那种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体制，而更加认同诸如Linux和维基百科等开源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参与的知识搜集方式。

在《千禧巨变》一书中，莫利·威诺格拉德与迈克尔·海斯援引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千禧一代更加渴望融入较大的社区，甚至走向全球。他们更加关心地球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更渴望支持可持续发展，反对不受监管、毫无节制的增长。在2007年的调查中，“18～24岁的人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列为国家亟须解决的5个问题”。在千禧一代中，43%的人赞同牺牲经济增长去保护环境，而这个比例在被遗忘的一代中只有40%，在婴儿潮一代中只有38%。

他们还比前几代人更加支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千禧一代中，73%的人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而其余的成年人口中68%的人持有这种观点。此外，在千禧一代中，73%的人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而这一比例在其余的成年人口中只有66%。总体来说，千禧一代比之前历代美国人更加支持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69%的千禧一代认为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服务，而其余的成年人口中只有39%的人这样认为。

千禧一代在对待环境、社区和穷人需求时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同理心，这一点从他们比较积极的公民参与行为中就能体现出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在2007年开展的一个调查项目报告称，“80%的千禧一代在过去的一年里都参与了某种社区或社会改善计划”。

千禧一代也是美国历史上世界主义程度最高的一代。千禧一代大学生中，70%的人都去过美国以外的地方。在18~24岁的人中，59%的人踏出过美国国门。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是全球化最热情的支持者，其中有37%的人强烈支持全球化，而在其余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0%。世界主义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在千禧一代中，52%的人支持移民，认为今天的移民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才能增强了美国的力量，而在其余的成年人中，只有39%的人支持移民。千禧一代的观点与当前盛行的反对移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反对者认为移民会冲击到美国的就业、住房和医疗，会对美国构成一种负担。

千禧一代之所以具有更加强烈的同理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种族构成。千禧一代的种族构成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其中40%是非洲裔、拉丁裔、亚裔或混血，而在之前历代美国人中，这些族裔的人所占的比例只有25%。

统计数据显示，千禧一代是历史上最有宽容精神的一代，他们最支持性别平等，最愿意支持残疾人、同性恋者和其他生物的权利。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如此。

尽管新的数据令人鼓舞，但还是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即新技术可能会阻碍全球意识的发展。虽然互联网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千禧一代走向全球，但新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技术可能严重削弱当前一代的社交能力。一方面，这些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搜集、储存和交换信息的能力，因此受到了大肆追捧，而另一方面，却可能削弱人们的口头交流能力，使人们无法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感觉和想法，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然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去10年里的调查表明，盯着屏幕长大的千禧一代的交际能力的确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下降趋势。他们掌握的词汇量大幅下降，阅读熟练程度和有效沟通能力也都双双下降，这些对他们能否对他人表达同理心具有深远的影响。2003年，美国成年人读写能力评估的结果令人非常不安，因为结果显示与之前历代成年人相比，千

禧一代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大幅下降。1992年，40%的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达到“熟练”的标准，而到了2003年，尽管大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但读写能力达到“熟练”标准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生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31%。

更糟的是，研究表明，互联网和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读写能力下降的根源。埃默里大学英文教授马克·鲍尔莱因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研究和分析部门的主管。他解释说，电子媒体与报纸以及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等传统的印刷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子媒体使用的生僻字大为减少。这里所说的生僻字，指的是使用频率排名在前10 000位之后的字。

比如，在传统的报纸上，每1 000字里平均包含68.3个生僻字，在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中，每1 000字里平均包含52.7个生僻字。相比之下，在黄金时段播放的、供成年人观看的电视节目中，每1 000字里只包含22.7个生僻字。互联网注重速度、浏览、多任务处理和快速推荐，喜欢简单的字词和简单的语句结构。推特等新型通信工具和信息收发工具进一步简化了语言结构。这个过程明显减少了生僻字的使用，常用词汇和术语的范围不断缩小。

这个趋势是令人不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导致人们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时间大幅减少，而正是这些传统纸质媒介才能让人们接触更多的生僻字。

在历史上，每一次通信革命——从口语到文字，再到印刷，都增加了人类的词汇量，人们掌握了更丰富的隐喻和更复杂的语言结构，在此基础上，更广泛的词汇量使人们能够形成和表达更加复杂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同理心作用的范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意图和期望。

但现在，我们再次遭遇了一个历史悖论：互联网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知识和沟通渠道，但互联网的性质可能会大幅降低人类以深刻而有意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能力，阻碍人们培养相互理解精神、追寻共同愿景以及表达同理心。那么，我们的千禧一代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目前，形势一点儿也不清楚。在千禧一代中，有些人梦想着出名，

也有很多人致力于社区服务，帮助弱势群体。这一代人可能既自恋，又有同理心。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日薄西山，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世界秩序的混乱程度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个人和集体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幻想症的表现，甚至很可笑，从而会削弱人们的自恋意识。如果一个集体存在自恋意识，那么这种自恋很容易演变成严重的排外心理，会贬低少数民族、其他国家与其他文化，认为他们都是劣等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的确曾经发生过。

困难时期也可能导致同理心意识的拓展，因为大家认识到了“我们在一起”，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了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催生了同理心的觉醒，至少在美国是这样，邻居们在可怕的时期相互体谅，守望相助。

人类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换句话讲，分布式资本主义唤醒了人类相互合作的属性，人类致力于追求共同利益，形成了新的生活质量观念，谋求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即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可怕的现实悖论。一方面，人类的社会架构日益复杂和广泛，能源与物资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同理心也趋于增强，但另一方面，人类的每一个进步导致的熵账单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世界各地，经济衰退已经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富裕人群正在学着如何依靠更少的物资维持生活，而贫穷人群却被无情地抛到了生死边缘。

富裕群体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让人类因祸得福。也就是说，这样会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甚至在经济危机之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简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思自己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注重物质财富的多寡。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得出的一条结论：人类只需要少量的收入来购置生活中的基本用品，维持适度舒适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财富的增加其实会降低社会的幸福感。

现在，数以亿计的人迫于经济环境的恶化而不得不削减生活开支，但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变传统的幸福观，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到更加注重培养有意义的关系，从市场资本到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只要不糟糕到威胁每个人生存的地步，就有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推动人类同理心实现新的提升，因为人们更加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己同他人处于同样的困境，会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相互支持和帮助。

如果人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注重财产的多寡与价值，而是更加注重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质量与意义，或者说更加注重生活质量，那就需要改变固有的时间与空间观念。那种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排外的、自治的个体意识逐渐淡化，而包容的、注重与外界关系的自我意识逐渐强化，登上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全球公共舞台。之前，人们不遗余力地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现在人们则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培养同理心，加强同其他人的联系，改善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21世纪，如果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构建更有意义的、更加可持续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同理心增强与熵账单增加的悖论。

更加公平地分配大自然的财富，可以让富裕群体改变原来那种过于骄纵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贫穷群体的命运也能够得到改善。发达国家在形成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帮助贫穷国家的人们提高生活水平与幸福感。这样一来，人类的消费习惯就会逐渐适应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推动人类文明平衡发展。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便在几年前，它听起来似乎也很理想化，很不切实际。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人类的需求、愿望以及最为关注的事也变了，尤其是对于如何才算过上一种好的、体面的生活，人们的心态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新的分布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价值在于，它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利用地球上的可再生能源，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在当地就可以获取的能源。

这意味着我们既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分布式能源体系建立起复杂的全球人类文明，提升和拓展人类的同理心，又能减少熵账单。这会促使

人类在全球经济大潮下形成生物圈意识。

第15章 经济大潮下的生物圈意识

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所有意识阶段仍然存在，而且不管从各种层面上，还是从程度上讲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到遥远的历史的影响，零散地保留着祖先的部分意识，这些意识既可以是神话意识、神学意识，也可以是思想意识、心理意识和拟剧意识。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人类意识提升到生物圈意识的新高度，以便打破同理心提升与熵账单增加之间的悖论对人类发展的束缚。

因此，我们首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团结起来的紧要关头，每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差甚远。我们人类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完全依赖于一个共同的生物圈，而气候变化却正在威胁着这个生物圈，并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存。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个性化，由处于不同意识阶段的人类构成，该生物圈本身可能是唯一能够实现人类团结的环境。

虽然新的分布式通信技术（很快将还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正在将人类密切地连接在一起，但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人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应该连接起来。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利用和融入全球通信网络，但对于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星球上进行通信却毫不关心，也不关心为什么几十亿人类应该联系得更密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无力的解释是分享信息、娱乐、促进商业交流，以及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以上几点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类加强联系的理由，但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何近70亿人应该相互连接并融入一个全球化的社会。70亿个体不存在任何一致目的的连接似乎是对人类能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无任何真正超越目标的全球连接存在着人类意识缩小，而非扩大的风险。

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说过：“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那么整个世界就像一颗钉子。”今天，我们或许也同样可以说：“如果我们只有连接

到互联网的个人计算机，那么整个世界就像关系网络。”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人们对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关系也获得了更好的认识。年青一代不再把世界看作剥夺和获取客体的仓库，而更喜欢将其视作一个有待接触和探索的迷宫。

那么，我们将如何利用新发现的关系意识呢？有趣的是，在我们开始探索自己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之际，我们也开始理解这个地球上各种生命之间的联系。

生物圈世界

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科学理念认为，要充分理解整体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整体拆分开，对每个部分进行单独分析。该分析方法将所有现象拆分为最基础的元素，然后分别探究每个元素的属性，以期更好地理解整个结构。正如第5章所述，这种机械式的科学观主要来自当代流行的机械隐喻。机器可以通过把它们拆开，分析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重新将其组装成整体去理解。但在真实的自然世界中，人类行为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有条件的、开放式的，且容易受其他现象的影响，并随着周围的活动模式而不断变化。

只要科学技术被狭隘地用于解决加速和位置问题，那么牛顿的机械论就非常实用。人们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拆开分析、能够用时间来度量、能够被严格量化的现象才是真实的现象。到了20世纪，还原论和机械论仅局限于捕捉自然的内在属性。对于科学家而言，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理解社会或自然需要理解现象与元素（不只是内在的）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家开始产生疑问，除了分析一个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之外，有没有其他方式来了解这个人呢？如果只是研究关于这个人的一系列信息，比如出生地、年龄、身高、体重、体格和情绪特征，几乎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仍然无从得知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通过理解其与所融入的较大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人所共有的多种关系，我们才能对某个人有一定了解。在旧结构中，人是其个人特点的总和，而在新结构中，人是他所从事活动模式的快照。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互动模式，那为什么整个大自然不是这样呢？在20世纪，科学家们重新检验过许多最基本的假设，结果那些假设都没能论证成功。事实上，了解个体需通过分析他们与所在整体的关系来理解。一句话，没有任何事物是作为一个自发的个体而孤立存在的。相反，每个事物都和其他事物相关联地存在着。这个新科学名为系统理论，它怀疑早期的关于自然本质的思考。系统理论也给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其余观念蒙上了一层阴影，包括自主运作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下，在分离的、拥挤的、自我优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竭力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系统理论认为，整个自然的力量大于个体力量的总和，原因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体层面能创造出质的不同。例如，从个人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活的生物与一具尸体有着质的不同。在死亡的那一刻，所有使活的生物成为一个整体的关系都不复存在了，仅仅丢下一副躯壳。

这个新的系统性思路在新兴的生态学领域得到了体现。生态学模式挑战了达尔文的模型，达尔文的模型重点强调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生物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新的生态模式下，大自然是一个多面共生和协同关系的集合体，其中每个有机体的命运是由互惠关系和竞争优势决定的。达尔文的生物学重点关注各类有机体和物种，并把环境等同于各类资源的集合体，而生态学则主要关注环境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自然界和万物。

早期的生态学家把精力放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上。然而在1911年，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发表了一篇文章，把生态关系的理念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他这样描述了所谓的生物圈：“地壳上的各类动植物和其他转换装置能将宇宙辐射转化为地球能量，包括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等。”

在192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生物圈》的书中，韦尔纳茨基打破了当时正统的科学观念，认为地球上的地球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是同时演变的，并且会相互促进。在这一点上，他的激进观点与达尔文的正统理论相悖。达尔文认为地球化学过程是独立演变的，创造了大气环境，使有机体能够形成、进化和生存。此外，达尔文认为环境就是资源的宝库。相反，韦尔纳茨基认为，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循环受到生物体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因此，生物体的活动能够影响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质量和数量。今天的科学家们认为，生物圈是构成地球及其周围大气层的统

一的生命及生命保障系统，各种形式的生命自然地存在于生物圈中。

生物圈是非常薄的，仅仅从海底延伸到平流层。海洋深处的大部分生命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整个生物圈从洋底到外层空间的高度还不到64千米。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生物和地球的地球化学过程相互作用，相互维持。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杰姆斯·洛夫洛克和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提出了“盖亚假说”，进一步发展了弗尔纳茨基的理论。他们认为，地球的运转方式就像自我调节的有机体一样，动植物和大气化学成分的相互作用把地球的气候维持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地球适合生命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通过甲烷与氧气含量自动调节的例子，解释了生物体活动与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地球的气候会维持自我平衡状态。他们提醒说，地球上的氧气水平必须控制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否则整个地球可能会爆炸，摧毁一切生物体，至少是地表上的所有生物体。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当大气中的氧气含量超过特定水平时，大气系统就自动发出某种警告信号，促使微小的细菌产生更多的甲烷。多出的甲烷分散到大气中，就会降低氧气含量，直到再次达到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甲烷扮演着一个调节器的角色，能够适时地提高或降低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生物体与地球化学成分之间的互动和反馈过程是永不停息的。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统一的系统，维持着地球的气候与环境，并保护着生命的存续。因此，整个地球更像是一个生物体，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物体，它能自发地让自己处于一种有利于生命存续的稳定状态。根据“盖亚假说”为我们提供的思路，生物体的演变与进化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地球自身的演变和进化。每一个生物体与地球化学过程之间都是持续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确保地球上的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物种能够生活在相应的生物圈之内。

在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贡献的基础之上，很多科学家纷纷对盖亚假说进行调整、诠释和拓展。20多年来，人类在重新思考生物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时，“地球犹如有机体一般运作”的理念已经变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探索路径。

事实上，地球确实就像一个有机体。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生物圈的生物化学过程，无论是对人类生活还是对整个地球，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燃烧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的人类活动，现在，化石燃料的燃烧已经导致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日益意识到地球就像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一样运作，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全球的风险性、脆弱性及安全性。如果每个人、所有物种以及其他所有生命形式都是相互交织的，而且与地球化学过程存在丰富多样和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人类就对其他生命具有依赖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类有责任维护整个生物圈的健康。要履行这个责任，我们就要确保自己在街区和社区以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物圈的方式生活。

新科学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反馈。新科学最有趣的方面或许就在于它体现了网络化的思维方式。目前，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社交、商业和政府的运作模式之中。生态学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都是关于关系、反馈和网络的。生态学家伯纳德·帕顿提出："生态即是网络，了解生态系统最终就是了解网络。"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指出："随着网络概念在生态学中变得越来越突出，思想家们开始用网络思维去分析各种层级的系统。如同把生态系统理解为由独立的有机体组成的网络一样，他们把有机体视为由细胞、器官和器官系统共同组成的网络。"

换句话说，每个有机体都是由较小的器官和细胞构成的网络，同时也是更大的网络的一部分，各种层级的网络共同构成了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及生物圈。每个网络都被置于上级网络中，并由下级网络构成，卡普拉将这类网络称为"生命之网"。卡普拉说，在亿万年的历史进化过程中，"许多的物种已经形成了联系非常紧密的群落，以至于整个生态系统就变成了一个由多种生物组成的庞大有机体"。

新科学的原则和假设更符合网络化的思维方式。旧科学把自然看作孤立存在的物体，新科学则把自然看作各种关系。旧科学的特征是拆分自然、利用自然、分解自然和破坏自然，新科学的特点则是融入自然、保护自然和与自然的协调，是整体论。旧科学致力于让大自然变得多产，新科学则使自然变得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旧科学追求超越大自然的力量，新科学所追求与大自然合作。旧科学主张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

而实现自治，而新科学强调人与自然互利共赢。

新科学使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们以殖民者的观点看待自然，把它视为需要掠夺和奴役的敌人，现在我们采用新观点，将自然视为需要培育的集体群落。之前将自然视为财产，认为人类有权开发、利用和拥有自然的观点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治理自然的义务和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自然的使用价值正在慢慢地让位于自然的固有价值。

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我们新开发了能够在平行轨道上多任务同时工作和操作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在寻求相关性和嵌入性，我们愿意接受互相矛盾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以过程为导向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倾向于进行系统思考。如果我们能把整体主义思维应用到新的全球道德中，使人们认识到并采取行动，协调统一那些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运转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将跨过鸿沟，进入几近顶点的世界经济和生物圈意识。

生物圈教育

美国的教室正在快速转变为培养年轻人生物圈意识的实验室。在全美各地的学校中，学生们正在接受教导，学习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动力学。老师教育学生，我们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回收利用垃圾废品、培育野生动植物并保护生物群落。同样重要的是，课堂教育开始强调个人消费习惯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比如，孩子们现在会学到，如果在家里或者开车时浪费能源，就将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接下来将引起全球气温升高，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发降水量的减少和更多的旱灾，危害食品生产，使世界上更多的穷人受到营养不良甚至饥饿至死的威胁。孩子们正在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影响着其他每一个人类的生活，影响着地球上其他生命物种和我们共同栖居的生物圈。他们逐渐理解，就像我们在博客空间的社交网络上联系十分紧密一样，我们在组成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之中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新出现的生物圈意识正伴随着最先进的课程设置，旨在帮助

年轻人发展出更为深入的互联意识，并培养个人心理层面的社会责任感。

自尊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课堂（程度比美国低），但如上文中提到的，对运动的结果褒贬不一，于是新的教育革命开始强调同理心的培养。2009年4月，《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国课堂上正在发生的同理心革命的。现在共有18个州设有同理心讲习班和同理心课程，而对这些先锋教育改革项目的早期评价令人鼓舞。各学校都报告称，在其校园内，攻击、暴力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显著减少，违反纪律的行为有所下降，学生之间的合作得到增强，出现了更多亲社会的行为，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学生的学习意愿更强，批判性思维技能也有所提高。

同理心课程帮助培养学生建立起全球情感联系，就像环保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起全球生态联系，其教育方式是一样的。纽约斯卡斯代尔一所中学的校长迈克尔·麦克德莫特这样说道：“作为一所学校，我们做了大量关于人权方面的工作。但是你不能要孩子们一边援助达尔富尔，一边又在餐厅里孤立同龄人。这些都要得到协调。”

很多学校的同理心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学生年龄在五六岁。其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创新当属“同理心之根项目”，该项目由一位加拿大的教育家玛丽·戈登发起，已经成功地进入加拿大各地的课堂，并于最近被引进到美国。有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每个月都参加一次该课程，持续一整个学年。（在该学年开始时孩子只有5个月大。）在他们到访之前，学生们需要提前准备在会面时可以学到什么、应该注意什么以及如何同婴儿和母亲互动。老师将要求他们密切地观察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尤其要观察他们是如何交流以及相互回应的。他们还将观察母子的性格、情绪和意图，他们要特别注意观察，因为在拜访后的任务报告中，他们要向小组的同伴回忆和汇报他们的印象和感觉，尤其要强调他们在情感上的反应。学生们将被鼓励去挖掘自身的记忆和生活经历，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婴儿可能的感觉、想法或意图。比如，如果婴儿正在因为试图坐起来却没有成功而产生挫败感，老师就会问学生们婴儿的感受是怎样的，并要求他们回忆自己在学习新事物，比如学骑自行车但没有成功时体验到的挫败感，然后把自己的感受同婴儿的感受联系起来。

随着每月拜访的继续，学生们会注意到婴儿的情绪、精神和心理发展，注意到他对母亲的依赖性和母子关系的发展演变，注意到婴儿开始

出现好奇心和探索行为，注意到他的协调和沟通技能得到提高。他们会观察母亲如何回应婴儿的沮丧、快乐和好奇，以及母亲的回应对婴儿的影响。在经过整整一年之后，孩子们会逐渐体验到，婴儿和他的母亲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都需要并渴望获得亲密的关系和喜爱的情感，这和他们自己是一样的。他们会习惯于理解婴儿的感情，并同婴儿和母亲都发展出一种同理心关系。

这样的学习经历往往对学生自身的情感和认知发展有着改变人生的影响力。戈登讲述了一个曾经在八年级留级两年的少年的故事。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少年，4岁的时候，他曾亲眼看见母亲在自己面前被人谋杀，随后他被送到一个又一个寄宿家庭。他独来独往，在班里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人。

一天，在一次母子拜访期间，母亲在班里吐露说，她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她的孩子不是很喜欢拥抱。即便她把婴儿抱在怀里，他也宁愿把头转向外面，而不愿意和母亲拥抱。

在某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名叫达伦的问题少年问他能否试一试把婴儿抱在怀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老师、母亲和所有的学生都惊讶无比。达伦把婴儿抱在怀里，让他面对自己的胸膛，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轻轻地前后摇晃，而婴儿则舒适地依偎在达伦胸前，拥抱着他。几分钟后，达伦回到母亲和老师身边，他问道："如果没有人爱过你，你觉得你还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吗？"就在那一瞬间，一个没有被人爱过的少年感受到小婴儿无条件的爱意，让他第一次体会到被人爱和爱别人的感觉。他经历了一次同理心的突破，这将改变他的人生。戈登已经记录了数千次类似的经历。虽然不是每次都和这个例子一样富有戏剧性，但是孩子们都逐渐了解到感情素养的概念，戈登对其的定义是"在彼此身上找到人性的能力"。

同理心之根课程面向3个年龄群体，包括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和七至八年级。针对每一个年级组，教育者都会根据其发展阶段培养他们与婴儿之间更为成熟的同理心关系。比如，对于年纪最小的同龄组，要鼓励他们学习"表达感觉的语言"和分享自己的经历，而10岁的孩子们将学习如何驾驭更加复杂的情感体验，比如"情绪传染"，以及学习如何控制同时出现但又常常相互矛盾的情感。

该项目把学生和母子之间互动的经历融入教学课程中。学生们可以

在写作、社交课程、美术、音乐、数学和其他各类课程中表达和应用他们在互动中学到的东西。比如，老师可能利用流行的儿童文学来考察学生们在母子会面中体会到的情感，像孤独感、挫败感、悲伤或者快乐。这些故事旨在鼓励换位思考。

数万名学生已经参与过同理心之根项目。教育者们发现在课堂上发展同理心技能会带来更大的学术成功。戈登指出，大量资料将同理心发展和情绪发展以及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有问题的孩子不太可能像快乐的孩子一样成为细心又投入的学习者。同理心的成熟和批判性思维尤其相关，包容各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和思想，理解没有确定答案的情况，从多个角度处理问题和倾听他人的观点都是建立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情感组件。戈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观察结论，即“爱有助于智力成长”。

戈登说，让学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同理心纽带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联系，对于培养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扩展到整个生物圈的成年人来说，是关键的一步。她写道：

> “同理心之根的课堂正在创造世界公民，孩子们正在发展同理心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认为我们呼吸相通。这些孩子们将一代又一代地建立一个更加有爱、和平和文明的社会。”

同理心之根项目提供了一个分散式的、相互协作的学习环境，孩子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情感和想法，通过这些做法，他们会逐步将教育过程看作一次分享的经历。

因为同理心参与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深刻的协作经历，要在课堂上激发孩子们的同理心天性要求采取协作式的学习模式。遗憾的是，传统的教学课程继续强调，学习作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经历，目的在于通过和他人竞争获取并掌控知识。然而，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及社交网络的普及和协作式的网上参与，正在给正统的教育方法带来深深的裂痕。结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修改课程设置，向课堂引入分布式和协作式的学习模型。从新的思考方式来看，智力不是一种分配给众人的东西，而更像是一片经验的领域，由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在第5章提到，我们同彼此和周围世界分享的经历被我们赋予不同层次的意义，这些就是真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课堂强调合作

重于竞争以及分享思想。教育成为一项协作性的事业，而非个人追求。所有知识的目标都是关于存在的，即通过我们分享的经历和我们从中获得的意义，越来越理解存在的含义以及我们在其演进中所处的位置。技术性或者职业性的知识在对这一宏大目标的追求中，成为仅能发挥辅助性作用的工具。

协作性教育开始的前提是，集体共同的智慧多半要强于任一特定成员的专业知识，通过集体共同学习既能增加集体的知识，也能增加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协作性教育的核心是关于“教育关注的中心从个人思想转移到关系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医院的阿伯克龙比进行的研究使协作性教育的价值第一次为人所知。阿伯克龙比博士观察到，医学系的学生在诊断患者时，几人在小组中协作性地工作比起单独一个人工作能够更加快速和准确地确定患者的身体状况。协作性的工作环境使学生们可以有机会挑战彼此的假设，然后在大家的意见和观察的基础之上，对于患者的身体状况达成一致的诊断。

接下来的几年里，另外一件证明协作性学习优越性的逸事也开始在学术圈内传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数学家尤里·特雷斯曼疑惑地注意到，他的亚裔美国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经常比他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学生好很多。为了试着找到原因，特雷斯曼在校园中跟踪了所有3组同学，想看看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是否有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他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经常成群结队地行动、吃饭和社交，他们在对话中频繁地讨论课堂作业、验证假设、挑战彼此的观点、分享各自的见解，此外，跟阿伯克龙比的医学学生一样，他们在完成作业时也会相互协商得出集体性的理解和共识。对比之下，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学生更有可能独自行动，他们在一起讨论课业的情况也比较少。

为了验证这是否就是造成课堂上成绩分层现象的关键因素，特雷斯曼召集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美国学生，给每组分配一个学习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地、协作地工作。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许多经过他“矫正”的学生成绩提高到了优秀和良好。

长久以来，协作性的工作环境在商业领域和公民社会都是标准条件。科学家、律师、承包商，以及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和自助团体的相关人员都有在协作性的环境中工作的传统。但是，学校系统在这方面

却迟迟没有赶上，现在这一情况将开始改变。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定，但是大学和中学，甚至更低年级的课堂都正在被改造为协作性的工作环境，至少是短期的。现在课堂上大的团队经常会被分为规模较小的小组，学生们协同合作完成分配的任务，然后在全体会议上重新集合，分享各自的发现，通常是以小组报告的形式进行。如此一来，老师的作用变得更像是一名促进者，而非教导者，他担负的责任是建立起这样的环境，解释任务的本质，记录不同小组的报告并且在大家努力在全班范围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起到各式各样的裁判作用。当学生们期待老师分享他自己的学术知识，并且指出老师所属学科的观点和学生们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之间的异同点时，他的输入就会被视为促进对话的重要贡献，但是他的话也并不能够对正在讨论的话题主旨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在协作性学习环境中，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传统分层学习模型让位于用互联网来组合知识的学习形式。学习不再只是把专业知识灌入学生的脑中，而是要以合作和批判的方式思考。协作性学习如果要取得效果，就要求所有成员必须相互尊重，愿意倾听其他观点，欢迎他人的批评意见，愿意分享知识，对整个团体负责，承担责任。

在协作性学习环境中，教师的作用发生了转换。《协作学习》的作者肯尼斯·布鲁菲认为，新的教师“认为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一种语言，他们想加入的团体所使用的语言”。因为协作性学习强调要处处留心，适应他人，不带成见的与他人互动，承认每个人独特的贡献，认可深入参与的重要性以及深厚关系所带来的共同的意义，所以，协作性学习一定会促进更多的同理心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作性学习将教室变为同理心表达的实验室，同理心表达反过来也会丰富教育的过程。

同理心科学的教学

如果要追溯传统的、启蒙时期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源头，那么应该能追溯到科学方法的传授。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几个世纪，这种学习方法几乎被神化。在孩子们中学时，老师向他们介绍科学方法，并告诉他们，这种方式是学习知识和了解周围世界的唯一方法。

学生被教导说，探究一种现象，发现真相的最好方法是客观观察。

教师们高度赞赏不带感情的中立立场。用客观方法来分析现象的方式，是假定这个世界是由可被独立分析的物体构成的，物体独立于由物体所组成的世界。一个科学的观察者从来都不是他或她所观察的现实的参与者，而只是偷窥者。他或她观察的世界，只是个没有爱，冷漠的地方，这里没有敬畏，同情之心和目标。就连生命本身也被视作是无生命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各个部分。前人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物产丰富，但是没有质量。

这样，长久以来，上学的孩子都认为学习经历是令人气馁，让人有疏离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期待孩子们不要心怀敬畏之情，不要有激情，从而变得立场公正，以旁观者的身份存在。这样一来，谁能寻找到个人的意义，在这种世界中活跃起来呢？

科学方法几乎和我们所知的人类天性和世界本质相左。科学方法否认现实状况的关联属性，严禁参与到现实中来，不为同理心的想象留有余地。事实上，是要求学生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外星人。

应当注意到，即便在理性时代开始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弗朗西斯·培根搜寻出自然的真理的方法。歌德就反对这种方法。歌德认为参与者比一个认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更接近自然。举例而言，在研究一株植物的形态时，植物学家必须进入到这株植物的生命之中。歌德将他的科学方法叫作“细致的经验主义，是以最本质的方式，把自己看作与对象一样，于是这种经验主义也就变成了实际的理论”。

歌德的科学方法几乎和培根的科学方法完全相反。歌德认为他的“思想力量和对象连接在一起时是活跃的”，并且他的“思考并未将思考本身和思考的对象分开”。歌德认为真正的洞察力不是源自超然的观察，而是要深入参与到所观察的现象中去。

歌德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思考在130年多来都被人忽视，但在20世纪下半叶，一些心理学家再次提起他的理论。海因茨·科胡特是第一个重新修正这种以参与的手法来进行科学调查的方法的人。他认为现有的科学方法“远离经验”，因此从现实的观察中移除了这种科学方法，并建议另一种实验理论，他称其为“相近经验”，因为收集到的数据直接来自同理心和内省。

科胡特相信，精神分析对科学思考最大的贡献在于“融合同理心和传

统的科学方法”。将同理心视作“观察工具”引入科学领域，按照科胡特的说法，使“一些科学原则指导下的调查变得更有深度和广度”。科胡特还认为，将同理心植入严苛的科学方法论十分重要，可以使科学追求不至于“越来越远离人类生活”。科胡特提醒他的同事，这种对待科学冷酷、冷漠而又理性的态度，在20世纪残忍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导致“一些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目的”。

科胡特并不打算完全抛弃传统的科学探究方式的抽象本质，而只是要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更加深刻，这种抽象化正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科胡特总结道：“将同理–内省的数据收集与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解释结合在一起，是人类科学史上革命性的一步。”科学上新的奋斗目标，“可以浓缩为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我们不但要为科学的同理心奋斗，也要为同理心科学而奋斗。”

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反对科胡特关于新科学的观点，他提出对于科学来说什么是最危险的挑战，试图安抚科学派日益不满的情绪。他写道：

> “我当然希望人们把我看作努力扩展科学，而不是摧毁科学的人。没有必要从经验方法和抽象方法中二选一。我们的任务是将两者合二为一。”

马斯洛蔑视这种观点，他不认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不参与现实和存在，从现实和存在中移除出去的人，可以对现实或是存在的活动和意义产生多少深刻见解。像歌德、科胡特以及马斯洛推断的那样，“更敏感的观察者可以将世界更多地融入自身，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认同并与更宽广、更具包容性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圈子产生同理心”。

马斯洛用匿名戒酒会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相比一个公正中立的旁观者，一个正在恢复的嗜酒者当然更了解嗜酒者的现状。马斯洛号召用一种被他称为“包容性策略”的方法去了解事物，这是指“以包容性的开放心态，怀着不干涉的意愿，让事物保持原来的样子，是一种有耐心，等待事物向我们展现自身内部结构的能力，是去找寻秩序而不是订立秩序”。他指出，在某些特定领域——人类学、动物行为学、临床心理学和生态学——采用这些方法可以带来更好的科学结果。

马斯洛甚至比科胡特走得更远，他建议科学界按照被调查现象的本质，采用两套科学方法。他写道："我希望提出更多根本性的问题：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知识是否都可以概念化成知者和知识相互关心爱护的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种认识论和现在主导'客观科学'的认识论放在一起运用，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两个认识论吗？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可以并且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两种方法论。我不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马斯洛的"关心客观性"观点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第一次反映出人们需要另一种科学方法的事实。新一代的同理心研究者，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已经开始在科学探究中应用同理心方法，她利用"相近经验"法引出关于自然本质的新发现和新见解，而如果应用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的传统科学方法是无法想象和理解这些发现和见解的。

很多国家的教育系统正开始改造其课程体系，使之能够帮助年轻人准备好参与到生物圈之中，但它们仍处于非常初始的阶段。要成功融入生物圈的世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种重新参与有多深入。现在，人类做出重新参与自然的决定，这与标志着人类初期发展的原始参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过去，参与自然不是出于人类的意愿，而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当时人类自我的发展还不足以让人类能够做出有自我意识的选择。对于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的祖先而言，他们畏惧自然的愤怒，但也有同样的依赖，这种感情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现在的人类运用自由意志自愿地重新参与自然，这一点就把生物圈意识同之前的一切都区别开来。

让学生准备好重新参与到生物圈之中，就要求学生能够积极地走出课堂，在自然环境中参与各种活动。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重新建立起亲生命性的联系，那么在他们关于生物圈的学习经历中，就要充分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课外活动和课堂学习同样重要。全美各地的学校已经开始把课堂扩展到室外，提供各种学习项目、实习项目和广泛的实地考察。和生物圈重新建立亲近关系是一项具有同理心的经历，这种经历必须为人们所感受并转化为知识才有意义，同时还必须付诸实践。

在一些社区中，学校的建筑正在被改造成可再生能源工厂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如此一来，就能够为即将在智能电网生产和分享自己所用能源的下一代人提供现场学习的环境，就像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互联网上生产和分享的信息一样。如果我们要为21世纪培养高科技工作人员，学生们将需要在技术上精通新型分布式能源技术，就像他们现在精通信息和通信技术一样。2009年，洛杉矶社区大学成为世界上首个开始将其校园建筑改造为一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态基础设施的学校，同时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大学将很有可能在未来效仿。

新的生物圈学习环境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开放课堂，帮助下一代人为人类意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从岩石圈拓展到生物圈。

历史意识的尾声

不断蔓延的全球危机正在开始包围人类文明，这迫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正像伟大的水利文明的到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开端一样，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对于普世归属感的追寻让我们突然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每一个结构所推出和填补的内容都超越了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占领了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并建好了脚手架，准备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文明，能够把所有人类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这样做要付出熵的代价，威胁到人类的存亡。

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阶段，从采集狩猎时代和农耕文明时代到第一次、第二次和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意识不断扩展到能够囊括我们所创造出的复杂的能源与通信系统。神话意识、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心理意识和现在的拟剧意识标志着人类精神的演进历程。随着意识的每一次重新定位，同理心情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随着人类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加恐怖的向爆，特别是，一方面，差异化和个体化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人类又要与我们所创建的复杂系统更紧密地融合，两者相互碰撞。

人类需要不断地重新调整其自身的时空定位，才能够适应社会对其生理和心理所提出的许多新要求，在这方面，人类并不总是成功的。虽然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深的物种，我们追寻归属感并且渴望得到普

遍的接受，但是我们在生理上倾向于由30～150人组成的亲密单元。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难解之谜，使我们成为唯一一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敬畏感和焦虑感的生物。对于亲密和普世的同时追求持续地迫使人类的思想向这两个方向扩展。虽然这两个领域看起来经常相互矛盾，但现实是人类永远都在追寻“普世的亲密”，即一种完全的归属感。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双方的奇特融合，但实际上是一份深深根植于人类内心的渴望。正是我们的同理心本质使我们能够经历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悖论，即在更广的范围内享受更深的亲密。对普世亲密的追求正是我们所说的超然性的本质。

有时，个体化和一体化之间的较量，以及亲密和普世两者背后的动力变得过于紧张，或者是新的联系失败，或者是现存的联系崩断。就是在这些充满恐慌和惧怕的时刻，社会步履蹒跚，失去对亲密感和普世感的有力控制，人性中的恐惧感以不可控制的压迫和暴力形式大规模地释放出来。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如此的灾难。

根植于我们自身的同理心倾向，并不是一套具备自动防故障功能的装置，使我们能够完善自身的人性。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次不断增强人类纽带，使之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机会，但是这需要不断地为人们所实践。遗憾的是，当社会各种力量面临分崩离析时，在这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同理心驱动力常常被人们弃之一旁。

我们可能正在接近这样的一个时刻。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分布式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使我们能够塑造一个新的方法来达成全球化，而这个新方法注重的是自下而上的大洲化。因为大体上来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是均等的，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有能力来保障自身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并同时可以通过智能电网与各国甚至各大洲内的不同地区紧密相连。

虽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仍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但大洲化很有可能会在商务、贸易的扩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电网以及随之出现的物流系统更倾向于在连续的陆地范围内分享可再生能源。

当每个社区在当地被赋权后，不管是字面上的还是比喻上的，它都可以直接参与地区性、跨国性、洲际或有限的全球贸易，而不用遭受因地缘政治带来的各种严厉限制，这些限制监管着“精英”化石燃料和铀能

源的分配。

大洲化已经带来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伴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单一民族国家为管理能源体制制定了管理性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范围是以地理界定的，这对于作用范围是整个生物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通过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智能物流和供应链，将本地或区域内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在所处大洲内公开分享，需要大洲级别的管理体系。

欧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大洲级别的管理体系。欧盟已经开始着手建设“四大支柱”基础设施，来打造一个全欧洲范围内的能源机制，这一机制包括各种准则、规范和标准，以期在21世纪中期有效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的交通运输、通信和能源网络，覆盖范围从爱尔兰海直至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洲级别政治联盟也正处在建立之中，这些联盟很有可能会在2050年成为各自大洲内的主要管理体系。

在这个分布式能源的新时代，管理体系更多的是像其所管理的生态系统一样运作。正如生物栖息地在生态系统中运作，而生态系统又在生物圈之中运作，三者共同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中一样，管理体系也同样是在一个协作关系网中运行的，在这个网络中，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体紧密融合。这种新的复杂的政治机制的运行方式正如其所管理的生物圈一样，共同协作，相互作用——这就是生物圈政治。

地缘政治总是基于这样一种假想，即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每个人都须参战，对抗其他所有人，我们相互战斗争夺资源，以保障自身的生存。而生物圈政治则与之相反，其理念是，地球就如同一个活的有机体，由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组成，我们需要管理好更大的、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

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大洲化和全球化能使我们完成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任务，并开创新的可能性，将同理心情感拓展至整个人类族群，以及其他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

现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伊始，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固化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很可能还要持续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期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智慧，正是它们将我们

带入人类历史上如此危险的僵局。我们还要准备好一个有力的新说法，来给予我们的后代人以指导，正是他们肩负着治愈地球、创造可持续环境的重大责任。

但讽刺的是，气候变化正逼迫着我们从本质、而非表面上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以及共处的困境，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确确实实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再也无处可逃、无处可躲。人类所欠下的巨额熵账单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地球，并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存亡。

在我看来，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正在飞速改变。最初的态度是在冷淡和否定之间摇摆不定，最好的情况也只是不完全的接受，也就是说没有相匹配的情感和政治上的承诺。但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气候变化的“实时”影响正冲击着世界上的各个区域和大部分的人类。对此，人们一开始感到恐惧，为早期的受害者们感到愤怒，那些暂时还未受到影响的人则假装对此兴趣十足。在未来几十年内，随着气候变化的冲击开始扩大，并开始影响更多的人，这种情况将会快速改变。

在某个关键时刻，人们终会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邻居所遭受的苦难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到了那个时候，责骂和惩罚都将于事无补，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巨大危机。只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建立起与整个生物圈亲密联系的共同意识，从而有机会保障我们的未来，而这需要我们建立生物圈意识。

同理心文明正初具雏形。我们正快速将我们的同理心情感拓展到整个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然而，虽然我们急切地想要建立普遍的同理心联系，但却遭遇了急剧恶化的巨大障碍——以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式存在的熵。我们能够及时建立生物圈意识和全球性的同理心从而避免地球的崩溃吗？

致谢

我要感谢丽莎·弗里德伯格，她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卓越的指导工作。本书涉及的研究工作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搜集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覆盖各大学科与专业领域，但她的能力非常卓越，能找到关键信息，做好协调工作，并且能把手头的大量研究资料做好分类，这极大地推动了项目的进展。

我还要感谢萨莉·文格洛维尔博士，她负责协调本书最后的出版工作。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细节问题，她的知识面也很广泛，对本书涉及的很多领域都很熟悉，这是无比宝贵的。我还要感谢下列实习研究员为本书做出的贡献：狄安娜·赵、胡利·戴蒙德、克里斯蒂娜·邓菲、丹尼尔·弗劳利、阿什利·戈德瓦塞尔、埃里克·哈默施密特、卡拉·霍顿、阿德里安·哈维尔、金莱康（音）、阿莱克斯·朱、阿尼鲁·坎德瓦尔、西迪·卡拉、安德鲁·利诺维茨、格奥尔格·勒夫·曼、维贾伊·罗摩克里希纳、恰伊·拉夫加登、理查德·萨维奇、埃丽卡·夏皮罗、希瓦尼·索夫塔、詹娜·特雷布斯、马克·文森特、米丽娅姆·韦斯以及科姆利·威尔逊。

我很感激克拉拉·麦克，她帮助我准备了大量原始资料，她力求把事情做得完美，这有助于推动整个研究过程。我还要感谢珍妮弗·劳伦斯和尼古拉斯·伊斯利在最后几周内为本书编辑工作提供的认真协助。感谢德鲁·约翰斯顿和安杰洛·孔索利在不同阶段为本书付梓做出的贡献。我还要感谢列达·沙因塔布为本书最后一稿所做的专业审校。感谢我的出版代理人罗伯特·巴尼特。

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多年好友杰里米·塔彻，这么多年来，他的出版社一直为我预留一席之地。我要感谢霍埃尔·福蒂诺斯，他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感谢他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兰斯·菲茨杰拉德，幸赖他的努力，本书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长期以来的编辑米奇·霍罗威茨，他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令人愉快的对话，为本书最终付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感谢塔彻出版社及其母公司企鹅出版集团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适当引用之前拙著中的资料。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卡萝尔·格鲁内瓦尔德，我们就本书中一些关键的、核心的主题和观点进行过多次热烈的探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理心文明／（美）里夫金著；蒋宗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书名原文：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ISBN 978–7–5086–5525–3
I. ①同… II. ①里… ②蒋… III. ①经济史 - 研究 - 世界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592号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 by Jeremy Rifkin
Copyright © 2009 by Jeremy Rifki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remy P. Tarcher,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同理心文明
著者：[美]杰里米·里夫金
译者：蒋宗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